

新中國考古五十年

启功题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本社 编

文物出版社

出 版 说 明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本书是继《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之后而编集的。本书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以来全国的考古工作，尤其侧重介绍近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其他如博物馆工作、地面文物保护工作等基本未作介绍。全书稿件由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管理部门或研究单位提供。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澳门也将于今年12月回归，介绍港澳五十年来的考古成果的文章已收入本书。海峡两岸虽尚未统一，但为使读者了解五十年来台湾省的考古概况，我们特编写专稿介绍了台湾考古成果。

本书是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同志的提议和关心下编集的。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书向祖国和人民献礼。

文物出版社

1999年9月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齐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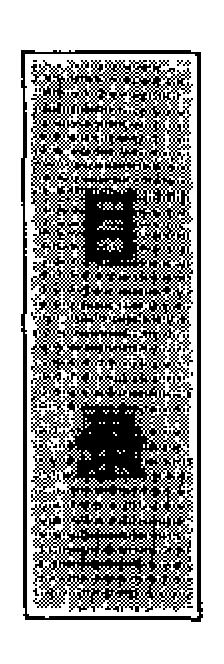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本社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9
ISBN 7－5010－1160－5

Ⅰ.新…　Ⅱ.国…　Ⅲ.考古－成就－中国－文集
Ⅳ.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0575号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本社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安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开　印张：34
1999年9月第一版　1999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160－5/K·472　定　价：140.00元



北京市考古五十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故都的北京，除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之外，考古领域的工作几乎一片空白。而今，定陵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辽京城垣博物馆、上宅文化陈列馆、山戎墓葬陈列馆相继建成。北京考古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　五十年历程追思

回顾北京五十年的考古历程，可从三个阶段去温故知新。

1949年至1965年是扩充新发现的阶段。北平解放时，为保护城内古迹，中共北平军事接管委员会中特设文物部，从国民党手中接管了故宫博物院、皇家园林以及一些破败不堪的古建筑。1951年7月，北京市文物调查组成立后，年轻的考古队员怀着满腔热忱翻开了北京考古的新篇章。金中都的调查、明万历帝定陵的发掘、董四墓村明代妃嫔墓的清理都是当年令考古界瞩目的事件。尤其定陵是建国后有计划发掘的第一座皇陵，1959年开辟为博物馆。同年北京开始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工作，11个区县调查登记了7445项文物[①]。虽然古墓葬和古遗址所占比例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更多的是地面文物，但以考古学发展史的眼光看，不能苛求只培训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员们不漏掉任何蛛丝马迹，几百个墓葬和遗址已经是填补空白的壮举了。

1966年至1984年是缓慢发展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考古队员焦灼、无奈地注视着毁古建、拆长城、砸佛像的破坏行为，四处维护，疲于奔命。据统计，从炼钢厂熔炉前救出的金属文物有117吨，从造纸厂碎纸机下抢回的图书资料有320余万吨，从查抄物资集中点里拣选出的各类文物有53.8万件，但是仍有700多尊佛像和121通石碑被砸成碎块，54公里的长城多处被拆毁。在1984年文物普查登记时，除了新发现4772项外，由1959年11个区县7445项文物锐减到19个区县共1457项[②]，-

个满目疮痍的数字！连 1972 年首次进行大规模发掘的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也是从推土机前力保下来的[③]。其间，元大都遗址、大葆台西汉墓的发掘在断续地进行中。

随着 1985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成立，北京的考古工作者进入了一个理性思维阶段，深感对文物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清理、保护、描述上，需要从更高的层次来把握考古文化的脉络。在此前后，国家文物局推出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将考古发掘和整理的要点规范化。又由于国外学术思潮的涌进，中国考古界呈现出活跃的态势，一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理论探讨，另一方面期望着田野资料的新信息为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应运而生，北京市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带着课题发掘的考古工地，基建考古也全面铺开，构成巨大的基建网络。其间大大小小的发掘和调查百余处，北部的旧石器遗址调查，东北的平谷上宅新石器遗址的发掘，西北的延庆玉皇庙春秋战国墓地的发掘，西南的房山镇江营先秦遗址、琉璃河燕国城址的发掘和金陵调查，西部的门头沟辽金时期龙泉务窑址以及金中都水关遗址、元代耶律铸墓的发掘尤为重要。西周燕都、辽金城垣等 4 个博物馆就是此间建立的。考古人用汗水营造着北京考古的黄金时代！

二 石器时代的北京先民

石器有着漫长的历史，与之相伴的北京先民经历了气候的转变、工艺的进步，充分展现了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近年来诸多考古资料的出土，使得北京的专家学者对石器时代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

1. 两种旧石器工业

本世纪 30 年代前后发现了周口店旧石器早期北京猿人诸地点和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遗址。1949 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一直没有间断[④]，1973 年发掘了旧石器中期新洞人遗址[⑤]。90 年代调查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旷野活动地点或遗址 38 处，计早期 1 处、中期 18 处、晚期 19 处[⑥]。建国以来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地点也有 40 余处，多为晚期，有相当一部分与人类活动遗迹共存[⑦]。90 年代的调查结论认为，大多数地点的标本较少，多无冲磨和风化痕迹，属原地较快地掩埋。推测当时人类活动于河岸和丘陵地区，在进行采集和狩猎时就近制作生产工具，短期停留后离去，这些地点均属临时性的宿营地和活动场所。可见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愈加频繁地活动于平原区域，不断地增强生活能力，为最终走出洞穴做好准备。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北方存在着三种工业，其一为小石器工业，其二为细石器工业，其三为细石器与小石器共存的工业[⑧]。北京地区已知的有两种工业，即第一种和第三种。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 20 处地点中，平谷县马家屯、小岭两处属于第三种工业，其余 18 处均为小石器工业（含山顶洞人遗址）。东城区王府井的东方广场是一处重

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临时活动营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揭露面积780平方米。1996年12月至1997年8月，发掘并进行了重要遗迹的迁移。出土标本近2000件，其中石制品700多件，有石核、石片、石锤、石钻、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原料以燧石为主，多为石片石器。骨制品有骨核、骨片、骨器，有些骨片上有人工砸击和刻划的痕迹，还有些骨制品和石制品上附着赤铁矿粉。用火遗迹有烧骨、烧石、木炭和灰烬。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牛、马、鹿、兔、鸵鸟等。^{14}C年代测定数据之一为距今24030±350年。

由此向前追索，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地点均以小石器为主。

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猿人生息于距今46万年～23万年之间。其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9]。出土的石器数以万计，原料主要为劣质的脉石英，后期水晶、燧石类原料有所增加，并尽可能地选用优质石英，表明长期的生产实践使北京猿人对岩性的认识逐步提高。石片制造方式多采用砸击法。石制品中以石片工具为主，多向背面加工，有相当多的未经第二次加工就使用的石片，还存在着许多小工具。早期用大石片做工具，主要分为砍砸器和刮削器两类，砍砸器约占一半。中期出现端刃刮削器，砍砸器减少，工具有小型化趋势。晚期尖状器、雕刻器数量增加，砍砸器锐减，小型工具明显增多。通过对石器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猿人文化不断进步的连贯性过程。1991年发现的密云县上甸子乡黄土梁地点[10]，出土石制品16件，地面采集36件，以劣质的安山岩为主，打片采用锤击法，偶尔采用碰砧法，加工方式为向背面，石制品较粗大，多数标本在60毫米以上。其与北京猿人石制工具的差别应为遗址类型的差别，黄土梁地点更符合旷野活动的特点。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家坟地点[11]位于平谷县东部约21公里处，出土石制品19件，地面采集7件。多为小型石片，5件石器均是石片加工的刮削器，长度在40毫米以下。原料以石英岩和燧石为主，采用锤击法打片，偶见砸击法。修整石器的方式多为向背面加工。细石器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打制石器的逐渐小型化是其产生的前兆。

与石器工业发展相伴随的是人类体质的进化。建国前后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计有203件[12]，约代表40多个男女个体。有1个晚期的中年男性头骨的脑容量为1140毫升，大于早期4个头骨的平均脑容量，并具有枕骨圆枕退缩、眉嵴较弱、脑颅骨壁较薄等特征。新洞人的男性左上第一前臼齿的形态较北京猿人进步，各项测量数据介于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填补了二者体质发展上的缺环。山顶洞人化石有7～10个男女个体。60年代初，有关专家对山顶洞人进行重新研究，认为其基本特征代表了原始的黄色人种，与欧洲古人类有明显差异。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地安人这三个黄种人的支系，很可能是由山顶洞人或更晚的近山顶洞人散布到各地后演变而成的。

关于距今70万年到更新世结束期间环渤海地区古气候的变化，已有专家进行了精

辟概括[13]。总趋势是由温暖湿润走向寒冷干燥，森林减少而草原增加。距今70～20万年间，曾有多次暖湿、干冷的交替，但温润的时间多，北京猿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距今20万年始，气候渐趋干冷，降水量渐少，搬运能力减弱，河流中很难找到大块优质砾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小石器为主的旧石器工业的发展速度和文化改观。距今1.15万年，气候走出最恶劣期，渐趋温暖，山顶洞人出现于此时。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资料来源应包括采集和狩猎，一般的遗址和地点均分布于依山傍水之处，对谋取食物十分有利，在某些季节里可能是相当丰裕的。

2. 新石器文化的断层

据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14]，距今2万年后的华北平原终于进入末次大冰期，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0℃还多，在又干又冷的气候作用下，黄土迅速堆积。距今1万余年时，冰期过去，气候温润，万象更新。距今8000年始，是一派草木繁荣和禽兽出没的景象。

北京地区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15]和怀柔县转年遗址[16]。东胡林遗址发现了轻度石化的人骨和装饰品，未发现陶器及磨光石器，转年遗址的遗物填补了这些空白。转年遗址位于怀柔县宝山寺乡转年村西、白河第二阶地上，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分四层，第4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由于采用了水洗法提取微小遗物，收获丰富，共获遗物18000件，多为石器，有打制的石片、砍砸器、尖状器等，磨制的石斧、石钵等。细石器制作精良，有石核、石叶、刮削器等。陶器以夹粗砂褐陶为主，烧制火候较低而质地疏松，内外器表颜色不一。从陶片断面观察，可看出片状贴筑痕迹，器类简单，均为平底的筒形罐和盂，器表素面，个别口沿施堆纹和乳丁纹。数量众多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石容器共存，是转年遗存的突出特点。^{14}C年代数据一为距今9210年，一为距今9800余年。

距今8000年前后，北京地区迎来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环境，同时诞生了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

镇江营一期文化是以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最下层堆积命名的[17]，分布区域自北京西南部达河北省中南部，叠压在后冈一期文化（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二期遗存）之下。文化内涵可归纳为：⑴红陶占绝对多数，胎质含云母颗粒及粉末，器表为均匀的红色，也有外表多红色，并夹杂着灰色、黑色斑块；⑵素面为主，个别器表局部有锥刺纹和划纹；⑶圜底器为主体，釜、钵、红顶碗、小口壶、支脚是常见器物；⑷极少鼎，彩陶只有1片，系用尖状物蘸着红颜料划出的纤细的网状纹；⑸大量地使用打制的石片石器，多为河卵石加工而成，有砍砸器、斧、磨盘、磨棒等，细石器较少，磨制石器更少。陶器胎质软，推测是采用露天式覆烧方法烧成，烧成温度低。用泥片接筑法制陶，陶器易残断，胎壁厚薄不匀。房屋的踩踏面形状不规则，看上去更像一个简陋的窝棚。有的烧灶建在屋外。^{14}C树轮校正年代数据证明，镇江营一期文化是距今9000年

～7000年的一支文化，在已区分的早、中、晚三期中，中期的遗迹、遗物非常丰富，说明这支文化的繁荣期当在距今8000年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中期的灰坑里出土了1件盂，口沿下施一周刻划的折线纹，与磁山文化的盂十分相似。

上宅文化是以平谷县上宅遗址的第二期遗存和北埝头遗址命名的[18]，分布于北京的东北部和天津市、河北省的唐山地区，叠压在兴隆洼文化（上宅遗址第一期遗存）之上，后冈一期文化（上宅遗址第三期遗存）之下。陶器以夹砂和夹滑石的红褐陶为主，有的可看出贴筑法痕迹，器壁厚而火候低，颜色不匀。器表多有抹压、刮条、压印“之”字、篦点、剔刺麻点、刻划等纹饰。多平底筒形罐，另有盆、钵、舟形器、鸟首形镂孔器以及猪、羊、熊、海马等小型动物塑像。石器以打制的大型盘状器和琢制的细石器为多，磨制石器较少。房屋为半地穴式，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长径在4米以上，室内无明显门道痕迹，居住面中部均埋有一二个深腹罐，罐内存有灰烬和木炭，靠墙的地面上发现较多的陶、石器。上宅文化可区分为三期，^{14}C数据为距今6540±100年、6220±110年、6000±105年。若有树轮年代校正，有望达到距今8000年前后。

后冈一期文化发现于房山县镇江营遗址（镇江营新石器第二期遗存）、平谷县上宅遗址（上宅第三期遗存）、密云县燕落寨遗址[19]。该文化分布在南至河南省中部、北达内蒙古南部、西迄山西省东部的广大区域，可分为三期。中、晚期的年代经树轮校正为距今6400～6000年[20]。北京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多为零星的灰坑和文化层，其文化内涵可概括为：(1)泥质红陶为主，较少的夹云母褐陶；(2)素面占多数，少量的划纹和弦纹；(3)圜底器稍多于平底器，钵碗类器物较多；(4)伴生少量的釜形鼎和直线条红彩；(5)基本使用磨制石器。

雪山一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昌平县雪山遗址的下层而得名[21]，其后在房山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三期遗存）乃至河北省的蔚县、易县均有发现。为进一步了解雪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再一次发掘雪山遗址。该文化的陶器以夹云母褐陶为主，陶色偏暗，器表素面，典型器物是高领双耳罐和筒形罐，均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从镇江营遗址提供的地层叠压关系得知，雪山一期文化晚于后冈一期文化，早于雪山二期文化。

雪山二期文化见于雪山遗址的中层[22]、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四期遗存）、昌平县燕丹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泥质灰陶。器表多有纹饰，如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器形以有耳或无耳、高领或矮领等诸多形制的深腹罐为主，其次是平底盆、双腹盆，另外还有鬲、甗、鼎、器盖等。其他省区龙山时期文化常见的快轮制陶方式在雪山二期文化中并不普及，一般只在器形稍小的盆、壶、罐、碗类泥质陶器上使用，大型器物仅口沿有快轮修整的痕迹。石器制作相当精良，通体磨光。房屋为椭圆形半地穴式，东南壁有门道，居住面的东北部遗有烧灶。依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

四期遗存的^{14}C树轮校正数据，雪山二期文化的年代应在距今4800年以降。

为使年代的脉络更加清晰，摘取有关资料简约成下表。

年代（距今）\ 分布区域	西南地区	东北地区
约10000年～9500年	东胡林遗址	转年遗址
约8500年～7000年	镇江营一期文化	上宅文化
约7000年～6000年	后冈一期文化	
约5400年～5000年	雪山一期文化	
约4800年～3900年	雪山二期文化	

如表所示，距今7000年之前，北京地区同时生息着两个文化系统，即以镇江营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圜底器系统和以上宅文化为代表的平底器系统。二者的器物群各具特色，尤其是早期的陶器群，看不出文化交流的迹象。二文化以永定河为界，各安其境。上宅文化到了晚期阶段，出现了少量的红顶碗。该文化的传统是夹砂陶，早期几乎不见泥质陶器，就文化发展的惯性而言，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像红顶碗这样的细泥陶器，只可能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才有的新变化。镇江营一期文化始终伴生红顶碗，并有演变规律可循。若将红顶碗看作圜底器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圜底器系统跨过永定河向北方推进，发生在上宅文化的晚期阶段。

上宅文化与亦属平底器系统的转年遗址的文化继承关系尚不清晰，因为从转年遗址素面盂向上宅文化布满纹饰的筒形罐的转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至少还存在着相当长时间的缺环。

距今7000年以后，后冈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雪山二期文化相继覆盖了北京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区别甚大，前者属泥质陶器为主的圜底器系统，直接继承了镇江营一期文化，后者属夹云母陶器为主的平底器系统，与上宅文化的关联并不紧密。后冈一期文化的釜鼎不可能衍生出雪山一期文化的双耳罐，二者没有文化承袭关系。雪山一期文化和雪山二期文化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雪山二期文化以三足器作为炊器，不可能由雪山一期文化的平底器演化而来。并且这三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年代上的缺环。

可以说，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前期呈现出两种文化系统的割据状态，后期则是不同种文化系统的逐次更替局面。每个文化系统的中心区都不在北京。镇江营一期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均产生在河北省中南区域，上宅文化的腹地在河北省的唐山地区，雪山一期文化、雪山二期文化的来龙去脉虽然还很模糊，但是，就其突兀登场和陡然匿迹的情形看，也很难说是北京地区土生土长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地区是不同系统文化圈

的切合部位，各种文化如匆匆过客交替登台，始终没有形成本土的文化。

三　商周燕国觅踪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夏代，新石器时代那种几度江山易主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北京由此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圈。商代甲骨文之“妟”、西周铜器铭文之“匽”、东周西周铜器铭文之“郾”、西汉之“燕”，绵延数千年而成为北京的代称。这一扭转乾坤之变应归功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支人马的大举南迁及其后裔与祖地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除了西周殖民性的北徙外，更多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反复南下，造成了该文化圈强烈的北方文化色彩。

1. 夏商之燕

据镇江营遗址孢粉分析，商代的北京处在干旱草原型环境下，植被以灌木和小乔木为主，遥想当年，必是一片田园牧歌的景象。

昌平县雪山遗址曾被称为雪山三期文化，类似夏家店下层文化。由于田野资料未发表，无法参照对比。随着京津唐考古工作的展开，又产生了燕山类型[23]、燕南类型[24]、大坨头类型[25]等称谓。经过分期和年代方面的研究，这类遗存被界定为夏至商前期的遗存[26]。北京地区的此类遗存时代较晚，以房山县塔照遗址塔照一期遗存为例，其四个^{14}C树轮校正数据在公元前1881～前1429年之间，基本开始于夏的后期，结束于商之前期。除昌平县雪山遗址、房山县塔照遗址和镇江营遗址之外，类似的遗存在昌平县下苑和张营[27]、丰台区榆树庄、平谷县刘家河[28]、密云县凤凰山[29]、房山区琉璃河[30]和西营[31]等遗址均有发现。

年代较早的以密云县凤凰山墓葬为代表。该墓发现于1984年，长方形土坑竖穴，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南，未见葬具。随葬筒腹鬲、鼓腹鬲、假圈足罐、折腹尊、粗把豆等8件陶器，置于头部附近。鬲、尊、豆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32]同类器物相比，均有变化，大甸子墓地的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735～前1463年，凤凰山墓葬的年代应相当于夏之后期。

年代稍晚的以房山区塔照一期遗存为代表。塔照遗址的最下层发现11座墓葬，集中在发掘区的中南部，分东、中、西三排，多为东西向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2座儿童墓墓圹较小外，余9座成人墓墓圹大小相近，长2.3～3米，宽1米左右。二次葬占40%，头向东者占74%。侧身屈肢面北者占一半以上。皆备木棺。木棺四周的填土形成熟土二层台。少数墓有殉牲现象，计有羊、牛、猪。兽头吻部朝东，与人骨头向一致。成人合葬墓是此墓地值得注意的现象。9座成人墓中有4座合葬墓，其中仅1座异性合葬墓，余3座皆男性合葬。2具人骨分上下两层摆放。下层人骨放入木棺内，均为

二次葬。上层人骨置于木棺盖板之上，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这一点与单人墓葬明显不同。单人墓无一例外地全为一次葬，而合葬墓里二次葬占75%。随葬品分陶器和石器两类，多在1～3件之间，连儿童也有一二件器物随葬。组合为鬲、盆、盂，豆、罐、盂，簋、罐、盂。夹砂褐陶约占陶器总数的80%，余泥质灰陶。陶质均含云母粉，使器表看上去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器表颜色不尽均匀，以泛黑褐、灰黑色为多。器表多施有纹饰，较常见的是竖绳纹，其次为划纹、附加堆纹、圆圈纹等。一件陶器上有时可见到几种纹饰，如瓮的肩部施网状划纹，腹部施竖绳纹，后又以划弦纹隔断绳纹。器形有鬲、甗、瓮、罐、豆、尊、盆、簋等。可区分为先后三个阶段，第一段年代与凤凰山墓葬接近，第三段的早组共生有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假腹豆，故知此类遗存在北京结束的时间应略晚于二里岗上层时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是塔照二期文化，过去一直不为人所识，至今也有将其作为张家园上层文化一部分的。其实二者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如张家园上层文化中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则为塔照二期文化所少见，而塔照二期文化极具特点的瘦高敛口深腹钵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所没有的。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陶器呈红褐色，塔照二期文化的陶器则泛黑灰色等等，所以区分为先后两种文化，有利于认识它们各自的文化特征。

由于近年来较注意塔照二期文化的存在，已于房山区塔照和镇江营、皇后台遗址、平谷县刘家河[㉘]和龙坡遗址发现此类遗存，以塔照遗址的中层最为典型。陶质中皆含云母粉，以夹砂陶居多，占84%。泥质陶较少。器表颜色较均匀，泛黑褐或灰褐。器表纹饰以绳纹居多，也有弦纹、附加堆纹、划纹等。素面陶器较少。常见器物有鬲、甗、瓮、罐、甑、盆、钵等。最常见的是领部有附加堆纹的高领鬲和敛口深腹钵。高领鬲不仅具有高领、鼓腹、袋足、粗壮足跟的特征，而且模制袋足的作法别具一格，以其形制、制法、纹饰三方面的特点形成了独特风格。另外，器表滚印的粗深而僵直的绳纹也不见于前期文化。塔照二期文化在陶器形制、制陶方式等主体方面都继承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塔照一期遗存的风格，高领鬲和领部附加堆纹等则是新的气象。可以这样理解，当塔照一期遗存发展到二里岗上层之后的阶段时，受到了一种具有高领鬲、领部附加堆纹、绳纹粗而僵直的文化的冲击，这种外来的新文化因素属于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于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通过塔照二期文化走向张家园上层文化。塔照二期文化的^{14}C树轮校正年代数据为公元前1266～前1070年，相当于商的中、晚期。

张家园上层文化于商末覆盖了永定河南北区域，目前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琉璃河遗址[㉙]、平谷县韩庄[㉚]、顺义县牛栏山[㉛]，天津市区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廊坊、唐山地区有广泛的分布。以镇江营遗址为例概括其文化特征。房址均为圆形半地穴式，大房屋直径约3米，浅穴。地面用黄土铺垫，除有两个椭圆形主灶外，沿墙还有二三处烧土面。南壁有斜坡门道通向地面。大房屋周围有众多的圆形小房屋，深穴，直径1.5～2.5米。

地面铺垫干草、树皮，没有烧灶。只能居住1～2人。如果将大房屋推测为家族性活动场所无误的话，小房屋应是用于单独居住。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头向东，基本无随葬品，几乎所有未成年儿童都葬在房屋附近的灰坑里。陶器高大而厚重，以夹云母褐陶为主，有筒腹鬲、鼓腹鬲、袋足鬲、甗、盆、甑、罐、簋及有特色的制陶模具、角制工具和陶印模。角制工具相当多，常见麋鹿角制作的用于刨土的镢。陶印模则带有某种意识色彩。每个印模的表面图案排列均不相同，很可能代表着某一个家族或某个有特殊地位的人。有一件印模的表面刻画有人面图案，髡发，双髻，两颊纹面，也许表现的就是当地土人的形象。伴随主体文化因素的另一种文化因素以袋足鬲、簋、四系罐和极少量的灰陶甗为代表，明显地属于商文化系统。尤其是泥质灰陶簋的三角缘、器表折线划纹的形态与殷墟晚期至西周初期的簋完全相同。这一文化可区分为三段，^{14}C树轮校正数据在公元前1408～前930年，因而三段经历了商末至西周中期的阶段。商文化因素大量地涌现在西周早期，很可能与周灭商时商人北退有关。到西周中期，出现折沿、联裆、有矮足根的小型鬲，有的沿面还带有弦纹，属于周、商两种文化的结合体。西周晚期，这种结合体覆盖了镇江营遗址，张家园上层文化随之绝迹。但在河北涞水、安新、天津市蓟县等处遗址仅见张家园上层文化，尚没有发现被取代的情况。

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可东至滦河沿岸，北到承德一线，西止太行山，南达大清河。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永定河以南地区与商文化和周文化首先发生碰撞，而永定河以北地区与北方的文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张家园上层文化客观上有区分地方类型的可能性，这将是今后研究张家园上层文化应加以注意的课题。由夏家店下层文化、塔照二期文化一脉相承而来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商末达到鼎盛时期。有专家考证，该文化具备建立国家政权的实力，否则很难抵御商文化的强大攻势[37]。商王乙、辛之前，燕国的族徽就出现在金文中[38]，如果商代有燕国存在，那必定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建立的古国。

2. 西周之燕

史载周武王灭纣后封燕。西周时期的燕国，自第一代燕侯起，有八世燕侯无任何文献记载，直至第九世燕惠侯继位时，已是公元前864年。即西周早、中期历时约200年的历史，在文献中是一片空白。要了解这段历史，释读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尤为重要。

西周燕文化以周文化和商文化为主体构成，绝不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的继承者。含此类遗存的有房山县琉璃河[39]、镇江营、焦庄遗址，昌平县白浮[40]和小北邵遗址[41]。镇江营遗址的民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多，袋足鬲、矮足跟鬲、侈口罐、四系罐、多孔甑、高圈足簋等为常见的陶器组合。房屋基本平地起筑，长方形，内外套间，墙基用黄土垒砌，地面用细沙多次铺垫，西墙处建有烧灶，并有烟道通向墙外。遗址中出有卜骨，背面经过平整和钻凿，正面刻出米粒大小的两行数字，专家鉴定为易经卦象。镇江营遗址

西周燕文化的初期曾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最晚期并行过一段时间，但前者很快覆盖了整个遗址，迫使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人们离开了家园。

琉璃河遗址在燕国的中心位置，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于1997年列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点课题。1986年，燕侯墓M1193随葬的铜罍、铜盉上发现了有关封燕内容的铭文，于是，该遗址作为燕国的始封地已无异议。琉璃河遗址东西长3.5、南北宽1.5公里，面积5.25平方公里。遗址中部伫立着一座夯筑古城，略呈长方形，南半部被河水冲毁。东西长约829米，南北残长300余米。由于城址的最南端发现一处残存的城墙内护坡，推测南、北城墙的距离应有700米左右。城墙的部分地段挖有基槽，大部平地起筑，分为主墙和内外护坡，主墙基宽3米左右，夯打坚实，模板夯筑的痕迹相当清晰，板宽20厘米，夯层亦厚20厘米，此种筑城方式是西周燕都城的建筑特点之一。内外护坡夯打稍差，城外有宽3米的护城河。东城墙的北端发现一条卵石铺就的排水沟。城中偏北有夯土台基六处，应为宫殿区。宫殿区的西南是祭祀遗迹，有的祭祀坑中葬有整头的牛或马，出有很多经过钻、凿的卜甲、卜骨，其中一片刻有“成周”二字。城外东南即燕国大型墓地之所在。已经发掘了数百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以及原始青瓷和成组的漆器。青铜器中带有“匽侯”铭的有十余件，此外还有朝觐、赏赐等内容的铭文。城内民用陶器的器类要比镇江营遗址丰富，如原始青瓷器、仿铜陶礼器、铸铜的陶模和陶范。琉璃河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早期周文化、商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共生。中期之后，后者逐渐消失殆尽。根据城中夯土台基西周晚期已遭破坏的情况看，该城址西周晚期已不再是都城。

琉璃河遗址的考古成果使得西周燕国文化的研究达到了更高的层次。首先，燕国的始封当在营建“成周”之后。其次，琉璃河城址主要使用于西周早、中期，晚期迁往他处。第三，琉璃河墓地是燕国公墓，并非仅是贵族墓地。由于西周燕国考古资料的积累，已能够进行燕国人等级层次的划分。目前可分为六个等级层面[12]，即燕侯、燕侯宗族的显贵、异族贵族、周人与异族中的次贵族、燕国平民等。依据是琉璃河墓地诸墓的规格，墓室越大，等级越高，反之越低。墓室的面积已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城址中出土有张家园上层文化陶器，在墓地中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墓葬。镇江营遗址的此类文化墓葬与琉璃河墓地的葬俗大相径庭，显然是使用琉璃河墓地的人们排斥的一种文化，应列为另外一种受排挤的等级层面，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大大小小的墓多随葬有兵器，燕侯和贵族阶层尤多，甚至还陪葬车马坑。可以看出，燕侯本人尚武，手下贵族多是军事统领，西周燕国的战争还是相当频繁的。

周人在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区域内建立燕国，不可避免地与张家园上层文化发生冲突。1975年发掘的昌平县白浮的三座中型墓充分显示了这种冲突的结局。白浮墓的铜鼎垂腹柱足，铜簋带盖有珥，铜壶瘦长有盖，年代当在西周中期。白浮墓出土的陶鬲，

沿面唇边凸起，折沿，浅腹，平裆，矮足跟，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鬲接受周文化而产生的一种鬲。此外，昌平白浮木椁墓头向北，墓底挖有腰坑，并葬有狗骨架，与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的异族葬俗相同。就是说，昌平白浮墓从铜、陶容器及随葬习俗三点看属于西周燕国范畴。但同墓的青铜短剑、兽首刀、有銎斧、头盔、镶满铜扣的皮靴等均带有浓厚的异族文化的特色，可见墓主的着装、佩戴的兵器遵循着本民族的习惯，而使用的青铜礼器和埋葬习俗已纳入西周燕国的轨道。因此，推测墓主人为臣属于西周燕国的异族首领之一。墓中出土的铜戟和卜甲刻有“儿”字，也有人认为是族徽。昌平白浮墓位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区域内，除一些头面人物臣服燕国之外，这一区域内很少见到周文化因素。尽管张家园上层文化被周人排挤，从永定河以南区域退却、消失，但在永定河以北却不绝如缕。

3．东周之燕

东周是燕国文化、经济、疆域迅速扩展膨胀的时期，遗址的密集程度出人意料。仅在房山县张坊乡和南尚乐乡的山前高地上就发现了22处东周遗址[43]。1965年，在宣武门和和平门一带发现东周陶井数十座。出土燕国货币的地点更是数不胜数。遗址之多，不胜枚举。

北京市东周燕国研究面临的第一个课题是燕上都和中都的寻觅。

燕上都蓟城的寻觅始于50年代。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王喜“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战国策·燕策》亦载，乐毅攻取齐国都城后，掠回的珍宝重器均运往蓟城献祀。可知直至战国末年，蓟城一直是燕国的中心。50年代至60年代，从西单大木仓到陶然亭一线发现数百座战国至汉代的陶井，密集区在宣武门、和平门一带[44]。随后，在陶井密集区的南部地区的永定门、天坛、定安里又发现大量的战国至汉代小型墓葬，特别是白纸坊、法源寺附近的2处战国墓群，还在中南海至龙潭湖之间发现一条永定河故道，为探寻蓟城提供了线索。根据陶井和墓葬的分布推断，蓟城北墙在西长安街以南，南墙在法源寺以北[45]。但是迄今为止，地面无遗迹可寻，亦无进一步的资料佐证此观点。

与蓟城的情况相反，燕中都的寻觅已有了结果。1957年在房山窦店镇西、琉璃河城址北3公里左右发现一座古城[46]。经过1959年、1962年的两次调查，尤其是1986、1990年的试掘，基本搞清了该城的整体状况。窦店古城近方形，东西长1230、南北宽1040米，除去东汉至北魏修建的外城墙和小城，大城的修建不晚于战国早期，直至战国晚期仍在不断地整修和加固。保存较好南墙和西墙最宽达16米，地表城墙高6米。东、西、南墙的中部各有一门，城中主要街道呈“十”字形。夯建技术相当成熟。墙体分块夯筑，每块宽3米，夯层均匀，夯窝密集。为防止夯具粘着，夯面屡见垫草痕迹，夯打出来的墙体非常坚硬。该城的地理位置为汉之良乡县，据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

记》卷六十九载："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水经注·易水》燕下都条下引傅逮《述游赋》曰："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将良乡与蓟城、武阳并提，足见其地位之重要。所以，窦店古城为燕中都已成定论[47]。簇拥着燕中都城址的几座古城均分布在房山区境内，有蔡家庄古城[48]、广阳古城和长沟古城[49]。每座城址又与周围的遗址相呼应，如前面所说的房山县张坊乡和南尚乐乡的山前高地上的22处东周遗址，形成了蔡家庄古城北面的屏障。蔡家庄古城建在南拒马河南岸的高台地上，方形边长约300米。现存的南墙、西墙的中部遗有城门，估其城内街道与燕中都城址相同，为"十"字形分布。有趣的是，1995、1997年对广阳城址进行了探查，该城为边长500余米的方形，亦为四个城门。或许这种"十"字形的街道布局是燕国城址的一种模式。

北京市东周燕国研究面临的第二个课题是东周燕文化综合性的分期。

尽管北京市东周城址较多，但均未经过正式发掘，难以提供地层参考，因而东周燕文化的分期[50]是以河北省易县燕下都的考古资料为依据的。北京市能够纳入分期的有窦店古城和一些已发表的遗址、墓葬。在东周燕文化所分的春秋早、中、晚，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早、中、晚七期中，窦店古城自春秋战国之际延续使用至战国晚期以后，怀柔县城北23座陶礼器墓[51]和1座铜器墓[52]时代跨越整个战国时期，其余多相当于东周燕文化的某一期。如春秋早期的有顺义县龙湾屯墓[53]，战国中期的有房山区片上遗址[54]、北京西郊瓮棺[55]、昌平县松园墓[56]、丰台铜器墓[57]、通县中赵甫墓[58]，战国晚期的有房山区黑古台遗址[59]、西郊白云观遗址[60]、昌平县半截塔东周墓[61]。90年代，在房山区刘李店配合基建钻探出21座东周墓，清理了其中4座，亦属战国时期[62]。继而对黑古台夯土墓进行了钻探，地面封土高约8米，夯层紧密，"凸"字形墓圹，墓穴上方填有白膏泥，^{14}C年代数据在战国末期。对于北京地区东周燕文化资料分期综述的意义在于，目前已知的东周燕国遗址和墓葬基本属于战国时期，仅顺义县龙湾屯一墓的资料很难说明春秋时期燕国的文化面貌，可以说，北京春秋时期燕国考古还处于待填补的空白状态。

北京市东周燕国研究面临的第三个课题是燕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该课题源于1965年。延庆县军都山一带30年来有十余处地点发现青铜短剑遗存。1975年，西拨子村出土的一件青铜釜内装有50余件青铜器，有鼎、斧、锛、刀、戈等[63]。1985～1990年，在葫芦沟、西梁垙、玉皇庙三处墓地进行大规模的发掘[64]，清理了500余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身份较高者用木椁。单人仰身直肢，头向东，面部以小铜扣为覆面饰物，大都有项链和耳环。墓圹东部的填土中用肢解的马、牛、羊、狗的头和腿作象征性的祭祀。男性多随葬包括青铜短剑在内的武器和工具，女性则多随葬锥、针之类的缝补用具和装饰品。1994年，西梁垙又发现了12座墓，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均无板灰和殉牲，大型墓有石椁，随葬青铜容器、金器和兵器、马具。其余葬俗同于以前的发现[65]。关于这类遗存的族属有不同看法，有人据文化面貌和

年代断定为屡次侵燕的山戎族文化[66]，有人据地望和文献记载的考证认为是属于北狄文化圈的无终戎遗存[67]。根据西梁垙、玉皇庙两处墓地出土的青铜容器形制的比照，这类青铜短剑遗存的年代主要在春秋时期，最晚至战国初年。北京东周燕文化春秋时期的资料较贫乏，缺少与这类青铜短剑遗存可资对比的资料，所以，东周燕文化与这类青铜短剑遗存的碰撞问题的研究需待考古发现的补充方能有所进展。

四　汉唐北方重镇

中国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北方一直是统治者需要提防的地带。由于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的南下，作为中央政权北面屏障的北京地区基本处于诸多民族杂处的状态。随着历史走进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1. 城址的沿袭使用

或许因为北京的民族情况较复杂，一些州县均构筑设防的城墙，并因地制宜地沿用了战国时期的旧城。

西汉在今房山区窦店燕中都城旧址设置了良乡县，属涿郡，《汉书·王子侯表》载西汉成帝曾封赵共王子交为良乡侯，守城十六年。良乡县三国魏属范阳郡，西晋改属范阳国，十六国时先属后赵，后曾附属过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北魏时隶属幽州燕郡，此后至隋唐不改。三国至北魏的战乱在良乡县城留下了深重的痕迹。1986、1990年的两次试掘[68]的结果表明，西汉时期在战国城墙的内外两侧加修了护坡，两晋前后在大城的外面又仓促滚夯了一道外城墙，墙体土质混杂，坚硬程度较差。外墙下的层面随处可见铁铤铜镞。两墙之间的低洼地掩埋着相互重叠的男性尸骨，有的缺少头骨，有的头骨上带着箭镞。据《魏书·地形志》所载，燕郡所辖良乡等五县，人口总数锐减到两万余人，因而北魏的良乡县只能弃大城，在大城北部，借部分西墙构筑边长430～450米的小城以利防守。

燕上都蓟城是西汉燕国、广阳国的首府，唐幽州、范阳郡治所，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与蓟城有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巡行燕地，颁布毁坏诸侯城郭之令，蓟城可能即毁于当时。西汉复修蓟城，武帝子燕刺王刘旦谋废昭帝未遂，自杀于蓟城。刘秀以蓟城为基地，南攻洛阳，建立东汉政权。唐“安史之乱”时，范阳等三镇节度使起兵响应。1965年在八宝山西约500米处发现1座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夫人华芳墓[69]，墓志上说“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墓中出土骨尺1把，以其长度折算晋里，二十里相当于今8712米，今会城门附近即蓟城西墙之所在。1974年，在推定的蓟城西墙左近白云观的所谓“蓟丘”进行发掘[70]，清除上层之后，发现呈西北转角状的夯土残城墙，墙土下叠压着3座东汉砖室墓，其中一座随葬有陶壶、陶奁、陶楼等，确属东汉中晚期。说明这

段城墙的修建年代晚于东汉，只可能是西晋蓟城。除此之外，蓟城已无迹可寻。好在许多唐代墓志对埋葬地点的记载相当具体，70年代以来，根据近百块唐代墓志和唐代石经题记及十余块辽代墓志所载的幽州城的方位，开始了复原唐幽州城的工作。城垣的大致方位亦已确定[21]，即东墙在法源寺东墙的南北延长线上，西墙在会城门村东的南北延长线上，南墙在白纸坊东西街的延长线上，北墙在白云观北的东西延长线上。墓志中记载了城中25个里坊、蓟县6个乡、幽都县9个乡的名称[22]。最近出土的唐墓志涉及到唐幽州城的有数块，但无新增添的乡坊名称。唐幽州城的复原对西晋蓟城乃至汉以前的蓟城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此外，从良乡镇东的广阳城、长沟镇东的西乡城、清河镇朱房村古城的出土遗物判断，这些古城都是战国故城的沿用。

2. 重要墓葬

西汉墓葬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74年发掘的丰台区大葆台1号、2号墓[23]。两墓西临永定河，南靠京广铁路，东西并列，封土连成高大土丘。两墓形制相同，2号墓稍小，并被火焚，仅遗12根地栿痕迹。棺床上的1具骨架经鉴定为女性。1号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墓圹南北长26.8、东西宽21.2、深4.7米，南面的墓道残长16.7、宽4.25米。墓道葬有彩漆绚丽的朱轮华毂车3辆，马11匹。"黄肠题凑"位于外回廊内侧，用约15000根黄肠木堆砌而成。尽管墓室早年被盗，又遭火烧，剩余的陶、铜、铁、玉、漆器、丝织品等出土物仍近400件。据考证，两墓应是死于公元前45年的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夫人的并穴合葬墓。2号墓下葬的时间略晚于1号墓。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黄肠题凑"墓，1号墓的规模迄今仍居"黄肠题凑"墓之首。

汉墓的发掘数量是各类墓葬中最多的，有怀柔县城北30座[24]，昌平县白浮46座[25]，史家桥48座[26]，半截塔21座[27]，平谷县西柏店和唐庄子共15座[28]，顺义县临河1座[29]。90年代后，又在海淀区上地村发掘523座，顺义县临河热电厂发掘40余座，密云县提辖庄发掘7座。其余零星发掘不一一列举。西汉时期的墓葬有土坑和瓮棺两种形制，均南北向。土坑墓多出一套棺椁和一组陶器，单人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品置于头部一端。东汉时期的墓葬有砖室、土坑、瓮棺三种形制，均南北向。砖室墓一般后室置棺，前室和耳室置随葬品。土坑墓的葬俗与西汉墓相同。由于汉墓资料的积累，使汉墓的综合分期研究势在必行，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964年，北京西郊发现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及墓表的石构件17件[30]，是东汉时期的一组神道阙。其中一件方柱的左侧面刻有"乌还哺母"，充分体现汉代"孝"的意识。

西晋墓葬较少，以前面提到的华芳墓规模最大。墓志纪年为永嘉元年（307年）。长方形墓室，墓道设二重石门和四堵封墙。早年被盗，出土骨尺、漆盘、料盘、银铃等

器物8件和200余枚铜钱。墓志除记载蓟城的位置，对望族、官阶的记载几乎占全文之半，可见晋人崇尚门阀风气之盛。顺义县大营村的8座砖室墓[⑧]中，M8出土有“泰始七年（271年）”的纪年砖。石景山区的一座墓志纪年为永嘉元年的墓葬有3个不足周岁的婴儿，他们之间又是姑、叔、侄关系。这种不同性别、不同辈份的两代人同葬一墓的情况十分罕见[⑧]。西晋时期墓葬反映出两个特征，一是早期的砖室墓从形制、结构、随葬品方面还保留着东汉的传统，二是北京地区西晋墓的墓室均呈刀形，与中原不同，反映了西晋燕国的特点。

唐“安史之乱”参与者之一的史思明的墓在丰台区林家坟村西约百米处被发现[⑧]。此墓在唐代已遭破坏，“文化大革命”中再度受劫，面目全非。1981年进行抢救性发掘。墓室系仿帝陵形式，用汉白玉石条砌成，单室，两侧各有耳室，甬道两侧壁上有壁画残迹。出土遗物多已毁坏，剩余遗物中有工艺精湛的铜坐龙和40余枚汉白玉磨制而成的玉册，每枚玉册刻11字，字口填金，字中出现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的名字。唐归义王李诗墓发现于房山区东北隅，其子李献诚是安禄山之婿。史思明是突厥族人，李诗是奚族人，说明当时唐幽州地区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有壁画的唐墓较少，1991年延庆县发现1座保存完好的唐代壁画墓[⑧]。墓室椭圆形，穹顶，门券之上绘四神，两侧绘守门武士、侍者，东壁绘太阳和十二生肖，北壁绘六幅画，表现墓主人饮酒吟诗的生活情景，用墨笔书写的砖墓志在北京属首次发现。1998年陶然亭东发现1座唐砖室墓，方形单室，墓室四角和四壁有砖砌影作立柱、阑额、斗拱、挑檐等结构。四壁上部对称砌出12个小台，上置整砖刻出兽首人身的十二生肖，现只余2个人形躯干。西壁绘有墓主人、侍女形象，北壁绘有马厩，墓门两侧墙上的小龛里有砖雕力士和菩萨。该墓早年被盗，按墓志记载为“大燕柳城何府君”夫妇合葬墓。

最近对河北中北部地区唐墓的研究逐渐展开。经过分期认为，这一地区的唐墓更多地继承了北朝圆形、弧方形的风格。随葬品中缺少三彩器，出现一些人首兽身的怪异陶俑，墓葬等级混乱，物质文化发达程度较两京地区低，直至中唐时期才形成唐代特征，尚没有走向繁荣，即转入衰落。这些特点与民族杂处、唐帝国影响薄弱有关[⑧]。

3. 宗教遗迹

房山区西南的太行山余脉，当地俗称小西天。山下建有云居寺，山中凿有石室，贮藏历代石刻佛经，又名石经山。隋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秉承师父刻造石经的遗志，从隋大业中始刻，至唐贞观十三年去世（639年），约30年间从未间断[⑧]。辽至清续刻，历时千余载，共镌刻佛教典籍1100多种，3500余卷，15000余石，分别藏在石经山9个洞内和云居寺南塔前的地穴中，堪称传世宏著，是研究佛教兴衰和经典的无价之宝。1981年，修补房山石经山雷音洞地面时发现隋代安置的佛舍利2粒，被汉白玉大石函、

青石函、汉白玉函、镀金银函、小型白玉函层层包裹，引起佛教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87]。

五 辽金元帝都再现

中国的北方崛起过众多强悍的骑马民族，创造过史诗般的辉煌业绩。在北方大地的战争漩涡中，马上征服者走上了帝国宝座。

1. 辽南京城与佛塔、窑址遗迹

936年，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攻下燕云十六州，设幽州为辽五京之一的南京，又称燕京，1012年改称析津府。南京城在唐幽州旧址加以修建，《辽史·地理志》记“燕京地方三十六里。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供宸”。城内街道从相对城门延伸交叉呈“井”字形。根据出土墓志及实地勘察，其东垣在今法源寺以东，北垣在今复兴门南，南垣大致与今右安门城墙相近，西垣在今会城门东，皇城位于城内西南隅。城中卢龙、隗台、北罗等九坊的名称已见于辽代墓志和碑记。

辽墓集中在今北京的西部及西南部，较重要的有南郊北平王赵德钧夫妇合祔墓[88]、大兴县马直温夫妇墓[89]、八宝山韩氏墓地[90]、门头沟斋堂壁画墓[91]、顺义县木林乡辽墓[92]、丰台区永定路李熙墓[93]等数十处。除赵德钧墓是辽中期穆宗时期的墓葬外，余皆为辽晚期兴宗、道宗、天祚时期的墓葬。绝大多数为砖室墓，圆形的占80%以上，分单室、双室、九室等形制。火葬约占40%。约半数左右的墓葬墓壁绘有人物、花卉和仿木结构图案壁画，基本属汉人习俗。随葬品中鸡冠壶、鸡腿瓶为契丹风格外，余多为汉人生活常用器。总体说来，北京的辽墓均为汉人墓葬，显示出汉族的文化传统，但是某些马背上的实用器物和仿毡包的圆形墓无不与契丹人带来的风尚有关。

辽代是佛教盛行的时期，南京城内外庙宇相望，佛塔林立。后因佛塔倒塌而清理的塔基有数座。房山区云居寺南的南塔又称“压经塔”，辽天庆七年（1117年）建，50年代在塔基旁的洞穴中发掘出石经板10082块，辽圣宗至辽亡期间，刻经近5000块。1976年清理房山区北郑村建于辽重熙二十年（1051年）的辽塔塔基，在地宫中发现镌刻年款的石函及石经幢。第一层塔身中间立有1座陶幢，四周立4座陶塔，象征着佛教四面立佛之说[94]。1990年清理房山区岳各庄天开塔地宫，出土文物30余件，在石雕莲座上发现石函，内套铜函、银函，最里层的塔状水晶瓶内装5颗舍利，另外还有木桌椅，是北京最早的木器。据地宫四壁铭文记载，此塔唐龙朔三年(653年)建成，辽代倒塌，乾统九年(1109年)重建[95]。顺义县净光舍利塔修建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地宫中的银盒内有盛舍利的琉璃葫芦，还出土一批带官款的罐、盒、壶等白瓷。有一件“童子诵经壶”堪称精

品，器形呈稚童静坐诵经状，经书翻卷为壶流，莲花形发束为注口，可谓匠心独具[96]。1988年清理密云县城东北的冶仙塔，出土30余件陶质彩绘塔形经筒，有一件绿釉璎珞纹净瓶，釉质和造型极佳，白瓷圆碟、方碟均轻薄莹润[97]。

有相当一部分辽墓和塔基出土的瓷器是辽南京本地的瓷窑烧造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了几处辽金窑址，如房山区磁家务、门头沟龙泉务、密云县小水峪、平谷县刘家河等处，以龙泉务和磁家务较重要。龙泉务窑址于1991～1994年发掘，揭露作坊2处、窑址13座。窑炉为马蹄形倒焰窑，以匣钵叠烧方式装烧。产品主要是白瓷碗碟类，三彩器有佛像、瓦当、吻兽等，釉色以白釉为主，酱釉、黑釉、三彩釉次之。龙泉务窑瓷器质地细腻，釉色光亮，制作精良，应为辽代官窑，出土的“寿昌五年”（1099年）款识的黄琉璃釉瓷片为窑址烧造年代提供了依据[9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琉璃样品经化验，含氧化硼10%～12%、氧化铅0.4%～1%，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我国陶瓷工艺研究上的一项空白，据证实，比国外类似釉质的出现早500多年。磁家务窑址是1981年调查发现的，采集标本有盘、盆、瓶、玩具等。釉色分青、白、黑、酱色，花纹有刻花、贴花等。从规模、器类、釉色方面看，此窑在北方古窑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北京的辽代窑址一般都被金代延续使用，有的窑址甚至沿用到元代。

2．金中都及金皇陵

女真族的金国攻取辽南京，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析津府为大兴府。从此，北京成为中国半壁河山的中心。金与辽的最大区别在于，辽代的北京很少发现契丹人的墓葬，而金代的北京不仅有皇陵，女真贵族的墓葬也时有发现，可见女真族政治中心的转移。中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口大大增长[99]，金国一统河山的气魄确不同于辽国。

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东、西、南三面各扩展1.5公里。综合专家的调查考证[100]和1966年中科院考古所的勘测，可对金中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北垣与辽南京北垣重合，东北转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今白云观西1公里有会城门，是北垣西边的门。西垣的北端在会城门东不到0.5公里的地方，南端在今万泉寺西面的凤凰嘴村，南北端之间有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夯土层厚5～10厘米不等，今北京西客站东面的蝎子门为西垣北边的彰义门旧址，1958年调查时尚存城门遗迹。1992～1994年配合北京西客站工程基建的考古过程中发现西垣的地下遗迹700余米。南垣的西南转角在今凤凰嘴村，东南转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东南的四路通，两端之间有一段由西向东流的凉水河，曾作为金中都的南护城河，北岸可见断续土丘状城墙。1991年又发现金代水关遗址，基本确定了南垣的一个出水口的具体位置。东垣已无痕迹可寻，根据东南转角在四路通的推测，东垣应在今陶然亭公园东墙的南北延长线上。据《金史》记载，四墙共有十三个城门。1996年，中轴线上的南城门丰宜门、南垣东边的端礼门、北垣西边的会城门等三

门的内大街以及丰宜门和端礼门之间的横向街巷都已勘定。根据考古复原研究，原属辽南京的街道仍保持着唐代街坊的形式，金代扩展的街巷部分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两种不同形式的街道共处于一个城市是金中都规划的特点。

金中都南垣水关遗址1991年发现于菜户营和祖家坟的凉水河北岸[10]，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平面呈“】【”形，南北长43.4、东西宽7.8、北端入水口宽11.4、南端出水口宽12.8米。整体建筑为木石结构，最下层基础密置木桩，上铺用木“银锭锁”相接的衬石枋木，再上面铺一层用铁“银锭锁”连接的石板。进出水口、泊岸两侧均埋有木桩。水关建于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1151～1153年），采用宋《营造法式》的作法。水关的发现对于金代沿用宋代官式建筑、金中都的地理位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金中都内城的四墙已无迹可查，宫殿是按照北宋开封都城设计的，均配置在中轴线上。1966年勘测出大安殿面阔11间，与文献记载相符。90年代，北京西厢道路工程北起西便门、南至菜户营，正处在金中都的中轴线上。1990～1991年配合该工程完成考古勘探15万余平方米，发掘400平方米，发现夯土13处、路土9处、水井和墓葬10余处[11]。从鸭子桥到椿树馆街之间发现连续的大片夯土区，最大的一片南北长70、东西残长60米。夯土区由南而北应是应天门、大安门、大安殿遗址，仁政殿在其北。又据《金史》，大定二十八年所记仁政殿是辽的旧殿，推测金宫城的中轴线很可能也是辽子城的中轴线。

金代为皇帝修建的陵墓坐落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境内层峦叠嶂的大房山下，17座王陵背靠青山，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环形山谷。明代曾遭破坏，清代对其进行了局部整修。如今地面上的建筑已成废墟。1986年至198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展开了艰苦的金陵考古调查[12]，发现了一段御道及大量汉白玉、花岗岩、青石等建筑构件。御道两旁竖立有繁缛凸雕花纹的汉白玉栏板，上面彩云缠绕，中间的牡丹花丛中奔腾着两条龙，一派富贵骄奢的王者之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金睿宗景陵陵碑。睿宗未曾做过皇帝，其子世宗称帝后加以追封，使乃父荣登皇册。据《金史》记载，世宗的兴陵位于太祖陵和景陵左近。景陵碑的出现，令考古工作者燃起了叩响帝门的希望。

金墓三分之二以上是石椁墓，绝大多数实行火葬。随葬品中常见瓷器、陶砚、金银器、玉饰件以及铜钱。出土的9盒墓志中有6盒是女真贵族的墓志，且多为金大定年间以后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真政权中心转移的时间。具代表性的女真贵族墓有丰台区乌古伦氏家族墓地[13]、通县宣威将军夫妇墓[14]、香山蒲察胡沙墓[15]等。乌古伦元忠夫妇墓出汉白玉棺椁和整块汉白玉雕成的棺床以及汉白玉墓志。元忠志刻“大金故开府右丞相判彰德尹驸马都尉任国简定公墓志铭”，其妻墓碑刻“世宗皇帝长女皇姊鲁国大长公主墓”，显得堂皇富贵。

3．元大都与元墓分期

元大都始建于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当时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后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以至今天的北京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留着元大都布局的旧迹[37]。1964～1974年对元大都的城墙、街道、水系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并发掘了十余处遗址[38]，在此基础上，复原了元大都的平面布局。

元大都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600、东西宽约6700米。南垣在今长安街稍南。西垣从今复兴门沿阜城门大街、西直门大街向北延伸到黄亭子，至今北段地表仍遗有夯土城墙。东垣从今建国门沿朝阳门大街、东直门大街向北延伸到土角楼。北垣在今北三环北面，夯土城墙仍存于地表。1991年配合市政道路工程，发掘了北太平庄的北垣。墙体呈梯形，底宽22、残高8.4米，夯窝密集，排列有序。为加固墙体，在夯土中使用横木和竖柱。皇城位于城南部中央，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东墙在今南北河沿西侧。宫城偏于皇城东部，南门（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北，东西墙在明代已拆除改建。景山北门外的南北大街遗迹是元大都的中轴大路，宽达28米，此后明清北京城沿袭未变。

元大都城内的水系可分为两个，一为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一为金水河、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在大都东垣中段和西垣北段、北垣西段的夯土墙基下，清理了3处石砌排水涵洞，是在筑城前预先构筑的。城内大街两侧的排水渠发现于今西四地下，系用石条砌筑的明渠，在通过主干道时，顶部加盖石条。

后英房元代居址是一所大型住宅，主院正房坐落于台基之上，前出轩廊，后有抱厦，正房前有东西厢房，东院南北正房之间有柱廊相连。出土遗物多为瓷器，以黑白花的磁州窑瓷器最多，还出有景德镇、龙泉窑、钧窑瓷器以及螺钿漆器、水晶石、紫端砚等。雍和宫后的居址是一处三合院，从出土的“内府公用”款漆器推测，可能是某衙府的院落。

元代墓葬广布于宣武、朝阳、海淀、昌平、密云等区县，近40座。保存较好的有密云太子务村元墓[39]、宪宗七年（1257年）海云和尚墓[40]、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耶律铸夫妇墓[41]、大德九年（1305年）张弘纲墓、皇庆二年（1313年）铁可父子墓[42]、天历二年（1329年）耿完者秃墓[43]等。按葬俗可分为土葬和火葬两类，如果将元定都北京到灭亡的近百年的时间区分为前、后期，前期土葬墓较多，后期世俗之民崇尚火葬者骤增，蒙古高官也不例外。葬俗的转变很可能与佛教的盛行有关，从中透视出元代统治者信仰的转变。

前期土葬墓以元初中书令、契丹人耶律楚材次子耶律铸夫妇墓规模最大。该墓位于颐和园，1998年清理，为南北向的多室砖墓。前室及东西侧室、后室均为长方形砖砌穹隆顶结构，室中砌有棺床，后二侧室为长方形砖石混砌券顶结构，东侧室内壁绘云

朵、花草、鸟兽类壁画。每室各葬1人，后室葬耶律铸，前室葬其妻奇渥温氏，前二侧室葬二妾，后二侧室葬者身份有待考证。尽管该墓已被盗，剩余遗物仍有瓷器、银器、铜牛、汉白玉马、陶俑等180余件。手执十二时牌的力士俑面部表情生动，造型古朴，枢府釉高足碗、影青玉壶春瓶、影青双鱼盘、"福寿千秋"双鱼铜镜都堪称精品。耶律铸的墓志为汉白玉质，记载耶律铸官至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的显赫职位，与妻共葬于至元二十二年。铁可墓1962年发现于崇文区，为巨大的青石板垒砌的长方形三室墓。铁可与二夫人葬于其中。铁可在《元史》里有传，色目人，是元初勋贵。小红门张弘纲墓的葬俗较罕见，墓主人与一夫人火葬，另一夫人土葬。张弘纲是元初重臣，大德五年卒，大德九年做合葬墓时镌刻墓志，书丹者为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1955年拆除位于西长安街庆寿寺西南的双塔时，在海云和尚塔基下发现石函，函内海云的骨灰用丝绸包裹，除元代丝织品外，紫色荷花缂丝的年代可早至北宋，是研究宋元时期缂丝工艺的重要遗物。

后期火葬墓增多，墓室变小，结构简约，随葬品冥器化，有的将骨灰和冥器一起放入石函中。1990年朝阳区南豆各庄M1的石函由一块岩石凿成，长0.83、宽0.8、深0.48、壁厚0.15米左右，这么小的空间里放了墓主人的骨灰木匣和13件陶冥器。墓志靠在石函外，记墓主名耿完者秃，应为蒙古人，官至秩从一品的宣政院判，天历二年（1329年）葬。

六 明清皇城余辉

自明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北京即成为明清两代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北方经济的大都会，是贵族王公、达官巨贾聚居之地。因此，北京的明清时期地面文物是最多的，因本文内容所限，介绍的重点界定在考古成果方面。

1. 北京城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占领元大都后，废弃大都北部，将北垣向南缩进2.5公里，改大都为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年）改称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新宫竣工后正式迁都北京。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南面外城。60年代配合城墙拆除工程解剖了明代北京城垣，发现内城的东西城垣与南北垣结构有所不同。东西垣系在元代夯土上包筑夹杂着碎砖的明代夯土，内墙皮包砌厚约1米的明代大砖，外墙皮包两层砖，里层为厚约1.3米的元代小砖，外层为厚约0.7米的明代大砖。城墙的顶面铺一层三合土，其上铺砌一层大砖海墁。南垣主要是明代夹碎砖的夯土，在崇文门东发现墙心用横木夹筑起夯的遗迹。北垣的做工相当粗糙，显系仓促而就，墙心的明代夯土层厚薄不一，土质较软，有的地段甚至夹杂着未清理的房屋、帐柱、石碑、旗杆等，内墙皮与

夯土之间填充砖瓦瓷片。南北垣外墙皮构造同于东西垣，但墙基发现衬垫近2米厚的木料，在崇文门至宣武门一带的流沙层中纵横交错铺置15层木料，既增强墙体的稳固性，又利于墙基承重。

北京城平面呈"凸"字形，内城9门，外城7门。宫城在内城中央，前为皇极殿（清太和殿），后为乾清宫。宫城前方左太庙，右社稷坛，后方用人工堆出万岁山（今景山）以为屏障。宫城之外筑皇城，南门承天门（清天安门）至大明门之间设千步廊，左为宗人府和吏、户、礼、兵、工五部等，右为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等，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外，中央主要官署集中在此，一改元大都官署分散之布局。内、外城街道基本沿袭元大都旧路，中轴线不变。可见明北京城的规划重点在宫城、皇城的建设上，特别是在中轴路的两侧对称布置太庙、社稷坛、中央官署，加强了纵深效果，突出皇权至高的思想，在封建王朝都城设计上是非常出色的[18]。清代沿袭使用明北京城，基本未作改变。

1998年配合平安大街工程，在地安门东的吉祥胡同清理出一段东不压桥南河堤，上部为民国青砖砌筑，下部为明代青石条砌筑，这条水路从什刹海向南，过东不压桥、沙滩、正义路，出城垣东达通州，连接大运河。此发现为明清北京城的水系研究提供了线索。

2. 明皇陵与妃嫔墓

明永乐以下14帝中的13帝均葬于昌平县天寿山下，以永乐帝的长陵为中心，左右排列，形成宏伟庞大的陵墓群。1956年至1958年清理了其中的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与二皇后合葬的定陵[19]。高大的宝城封土下的墓室由前、中、后殿及左右配殿组成，全部用石材垒砌起券，高大宽敞，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所有的门均用整块汉白玉雕成，每扇门上有乳钉九排。中殿设石供案3个，置五供和长明灯。后殿有汉白玉棺床，上置梓宫三具，中为万历帝，左孝端后，右孝靖后，均一棺一椁。出土各类文物2648件，多置后殿的棺床上和梓宫内，有堪称稀世珍品的金冠、凤冠、衮服、百子衣以及大量的金、银、玉、瓷器和木制谥册、谥宝。万历帝的金壶和金爵镶满各色宝石，华光夺目。

昭陵和思陵之间有成化帝的万贵妃墓、万历帝的郑贵妃墓[16]，二人生前是显赫一时的皇帝宠妃，死后受特殊礼遇才陪葬陵园内，单独建冢。两墓构造基本相同，园寝地面建筑前方后圆，前寝原有享殿和两庑，现仅存柱础石。长陵的东西井共十六妃从葬。1957年调查时，绿瓦、断碑、残垣依稀可见。

北京西北、颐和园迤西，明代曰金山。清顺治年间，能看到墓冢53处，葬有明景泰帝、夭殇的明诸王和公主、不从葬的明妃嫔。1951年在董四墓村清理过2座妃嫔墓[17]，一号墓葬天启帝的3个妃子，二号墓葬万历帝的7个内嫔。墓室为"工"字形的前后室结构，隔墙中间有石门相通，前室置放祭品，后室用石条砌筑棺床，上置棺椁，

各有相应墓志。1963年在镶红旗营发现成化帝妃子墓7座，南北向，并列成一横排，形制同董四墓村墓，不同的是每墓葬1妃。

3．贵族墓

明代外戚墓有右安门外的成化帝万贵妃之父万贵夫妇墓、南苑正德帝毅皇后之父夏儒夫妇墓、西郊八里庄万历帝生母李太后之父李伟夫妇墓。三墓主人地位近似，墓葬规模略同。用三合土夯筑墓圹，然后砖砌墓壁，内置木棺椁，上盖青石条，再以三合土夯筑封顶，由于结构严密，墓室内遗物保存完好。万贵墓出土大量的金银、珠宝、玉器，金银器物的总重量达500两。夏儒墓出土大批丝织品，图案繁杂，式样齐全。这些遗物多是宫廷制品，标有宫名、年号，外戚因女而贵的生活可见一斑。

明代弘治年间户部尚书李衍家族墓地于1995年勘探，查明墓葬80余座。而世袭新宁伯谭氏家族墓、骠骑大将军王邦吉墓均因施工期间破坏严重，仅存墓志。

荣禄是清慈禧后期的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葬于朝阳门外高碑店乡荣家茔地内。水泥墓室，长方形，南北向，荣禄及妻妾三人四棺共一椁，用钢骨水泥封顶，其上以三合土夯筑圆形宝顶。棺内随葬大量金银珠宝，还有西洋怀表，有1件金葫芦重达139.6克，刻有“内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为慈禧对荣禄60寿辰的赏赐。荣禄《清史稿》有传，称“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知荣禄贵及一时。清达官贵族墓还有几座较重要，1953年东郊发现的恭亲王墓和1952年西郊发现的洪承畴墓因被盗破坏严重，仅存墓志；1952年清理了右安门外福建总督祖泽溥墓，虽未被扰乱，墓葬形制、随葬品均难与荣禄墓相比。

1962年在西郊小西天发现清初辅政大臣一等公索尼7岁夭折的孙女黑舍里氏墓[10]。砖砌正方形墓室，东、西、北壁设砖雕仿木结构壁龛，饰朱漆彩画。置骨灰匣的棺床前设汉白玉供桌和汉白玉碑，龛内随葬品中有明代斗彩、五彩、青花瓷器及唐代传世玉鹿、宋仿战国的错金银铜壶等稀世珍品。

4．太监墓

太监是明清京城的一道风景线。近千座太监墓中多数较清贫，极少奢华。一般建有石、砖墓室，内置木棺，随葬陶瓷器具和小件玉佩，均备有墓志。

明代太监墓地位于城外广安门以北、西便门以南。1980年在香山饭店清理了明太监刘忠墓[11]。墓室依山开凿，后壁为天然石壁，用青石、青砖砌筑两壁、甬道、前室。墓门、甬道门为汉白玉制，后室地下凿出长方形棺穴。由于被盗，仅剩墓志和石雕。前室的石碑造型如梳妆镜，碑身与碑座浮雕出龙戏珠、云鹤、八卦等图案，后室的石阁雕出歇山顶、鸱尾、勾头、立柱、围栏等，其他如石墩、门铺首、自来石也精心雕镂。刘忠9岁入宫，历经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做了59年的太监，跟随嘉靖帝33年。嘉靖帝极力崇奉道教，一心修道求仙，刘忠墓就是仿照想象的神仙洞府修造的，具有浓厚的

道教色彩。

清代太监墓地有阜成门外恩济庄、西直门外皂君庙、大钟寺等9处。雍正帝御赐恩济庄茔地，准建关帝庙。1958年普查恩济庄墓地时，有墓碑者近300人，更多的是荒草土冢，传说约有2700多人葬于此地。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墓坐落在关帝庙北[49]。地面部分有祠堂、东西配殿、石桥、牌坊、五供、宝顶等，牌坊后立汉白玉碑2通，一为墓地记碑，一为墓志碑。墓穴结构二门五楦，汉白玉门，第二道门建有汉白玉门楼。石刻棺床上置贴金画的朱漆楠木棺椁，棺内出土50余件金、玉器，以直径1.6厘米的钻石帽正、花宝石镶钻戒指、光绪款金烟碟、汉代满黄浸玉镯为珍品。李莲英9岁入宫，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61岁时慈禧死后出宫，64岁卒。传李莲英被人暗杀而身首异地，但从棺内尸骨看，此说殊难成立。

七　结语

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积累，自然产生了相关课题，如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类型与谱系的研究等。应当说课题的重点在遗迹、遗物的形态和特征方面，或者在文化关系的亲疏和年代的判定上。不容否认，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文化之间关系的探索是进行更高层次综合研究的基础。近十年来，北京市的考古学基础研究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尤其先秦时期的文化类型的划分、诸文化本身的分期已有了清晰的脉络，汉唐时期文化的分期等问题正在梳理之中。但是考古学文化不能仅仅成为权威性的专业术语，它的历史从属性要求对文化所处的背景、环境乃至精神作出合理的解释，要复原它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而不只是遗迹、遗物的堆砌。

今日北京考古学使命在肩，一方面仍有相当多的科目急需考古学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恢复历史原貌的责任呼唤更有活力的课题。北京考古人给自己提出了燕文化研究、都城沿革考等课题，试图解释历史缘何几度选择北京这块无险可守的平原作为京畿重地。我们任重而道远！

（执笔：陈光）

注　释

① 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组：《近几年来的北京文物工作》，《文物》1959年9期。平谷、密云、顺义等区县当时不属北京地区，三县的文物不包括在内。

② 所藏文物普查档案。

③ 邹衡的发言，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

版社，1997年。

④ 吴汝康、贾兰坡：《周口店新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古生物学报》1954年9月第2卷第3期；张森水：《周口店第22地点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年3月第7卷第1期。

⑤ 顾玉珉：《周口店新洞人及其生活环境》，见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古人类论文集》（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论文汇编），科学出版社，1978年。

⑥⑩ 郁金城、李超荣：《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新收获》，《北京文博》1998年3期。

⑦ 黄万波、侯连海：《北京云水洞的脊椎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学报》1984年4月第22卷第2期；袁振新：《房山区又发现一处古文化遗址》，《北京文物报》1988年7月试刊第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1页，第一编第一章附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北京猿人遗址诸地点和新洞人遗址。注（6）表一之中有两处地点伴出古生物化石。

⑧ 张森水：《环渤海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回顾》，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石家庄·1992），知识出版社，1996年。

⑨ 关于北京猿人石器研究成果引自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⑪ 李超荣、郁金城《北京平谷县首次发现旧石器》，《文物春秋》1994年4期。

⑫ 有关北京猿人体质特征的研究成果引自《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⑫ 同⑧，关于山顶洞人的年代也有距今18000年或更早的说法，张森水先生认为与山顶洞人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中喜暖的属种多，磨制骨针出自第一文化层。^{14}C测定上部堆积的年代为距今10470±360年，因而其年代晚于气候最恶劣期。本文从张先生说法。

⑭ 周昆叔：《关于环境考古问题》，《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⑮ 周国兴、尤玉柱：《北京市东胡林人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6期。

⑯ 郁金城、李超荣、杨学林、李建华：《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3期。

⑰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经过1986年至1990年的发掘，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确定了北京地区先秦时期存在着九种文化。新石器时代四种。第一期为镇江营一期文化，第二期为后冈一期文化，第三期为雪山一期文化，第四期为雪山二期文化。商周时代五种，第一期为塔照一期遗存，第二期为塔照二期文化，第三期为张家园上层文化，第四期为西周燕文化，第五期为东周燕文化。以下凡镇江营、塔照两遗址的资料均引自此书，不另注。

⑱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均载《文物》1989年8期。

⑲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一编第二章图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⑳ 陈光：《试论后冈一期文化》（待刊）。

㉑ 向群：《在昌平县以西雪山村附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代遗址》，《北京日报》1961年11月21日。以及注⑲图九。

㉒ 同注⑲图一〇及图版四。

㉓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认识》，《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㉔ 李经汉：《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㉕ 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㉖ 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㉗ 王武钰：《昌平张营发现一处商代遗址》，《北京考古信息》1990年第1期第3版。

㉘㉝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㉙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二编第一章图一四，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㉚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1期。

㉛㊸㊹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9年3期。

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四十八号，科学出版社，1996年。

㉞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㉟㊶㊺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㊱ 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青铜器》，《文物》1983年11期。

㊲ 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㊳ 葛英会：《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年。

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琉璃河考古队：《1981年～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琉璃河遗址考古队：《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第1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文物》1997年4期。

㊵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期。

㊷ 陈光：《西周燕国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

㊹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外城东周晚期陶井群》，《文物》1972年1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古瓦井》，《文物》1972年2期。

㊻ 冯秉其、唐云明：《房山县古城址调查》，《文物》1959年1期。

㊼㊽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8期。

㊽ 王汉彦：《周口店蔡家庄古城遗址》，《文物》1959年5期。

㊾㊿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3期。

㊿ 陈光：《东周燕文化分期论》，《北京文博》1997年4期及1998年1、2期连载。

(51)(7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战国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5期。长方形土坑竖穴、单人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品置头顶的棺椁之间或二层台上。

(52) 《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简介》第16页，1977年11月。

(53) 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8期。

(55) 安志敏、伊秉枢：《北京西郊发见的瓮棺》，《燕京学报》第39期，1950年12月。

(56) 苏天钧：《北京松园战国墓葬发掘记》，《文物》1959年9期。
(57)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丰台区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8年3期。
(58) 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铜器》，《文物》1985年8期。
(60)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7期。
(61)(77)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和两汉墓》，《考古》1963年3期。
(62) 《琉璃河遗址发现战国墓群》，《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19日第1版。
(63)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村窖藏铜器》，《考古》1979年3期。
(64)(6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6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龙庆峡别墅工程中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1994年。
(67) 陈平：《试论“山戎文化”先民的族属及其有关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2期。
(6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12期。
(70) 赵其昌：《蓟城的探索》，《北京史研究》第一辑，1986年。
(71) 鲁琪：《唐幽州城考》，《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1982年。
(72) 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73)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7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白浮村汉、唐、元墓葬发掘》，《考古》1963年3期。
(76)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史家桥汉墓发掘》，《考古》1963年3期。
(78)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县西柏店和唐庄子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5期。
(7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顺义县临河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6期。
(80)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11期。
(81)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
(82) 王武钰：《石景山老山西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
(8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9期。
(84) 王武钰：《延庆县铝箔厂唐代壁画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
(85) 刘耀辉：《试论北京地区唐墓》，《北京文博》1998年4期。
(86) 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二集。
(87) 《佛舍利发现记》，《北京日报》1987年4月29日第4版。
(88)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5期。
(8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12期。
(90)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年。
(91)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门头沟区文化办公室发掘小组：《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8期。
(92) 《顺义县木林乡辽墓》，《北京文博》1997年3期彩插四。
(93) 王有泉：《丰台区永定路辽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94) 齐心、刘精义：《北京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2期。
(95) 王武钰：《房山区天开塔地宫》，《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96) 苏天钧：《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8期。
(97) 《密云冶仙塔出土文物》，《北京文博》1996年3期彩插二、三。

98 黄秀纯、刘义全、齐鸿浩：《略论龙泉务窑址归属问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1994年。

99 齐心：《从金代遗迹遗物看金中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100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9期；徐苹芳：《金中都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01 祁庆国：《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10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西厢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1994年。

10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四编第二章第四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10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年。

105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1期。

106 齐心：《金代蒲察墓志考》，《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980年。

107 徐苹芳：《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环境变迁》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年。

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72年1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5期。

109 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年6期。

110 北京市文物组：《北京市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绵织品及绣花》，《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9期。

11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第1版。

112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元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1期。

11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地区发现两座元代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114 徐苹芳：《明北京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15 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7期、《考古》1959年7期。

116 王岩、王秀玲：《明十三陵的陪葬墓》，《考古》1986年6期。

117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通讯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2期。

118 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期。

11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香山明太监刘忠墓》，《文物》1986年9期。

120 鲁琪、刘精义：《清代太监恩济庄墓地》，《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3期。

天津市考古五十年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一

天津市介于北纬38°33′00″至40°15′02″，东经118°42′05″至118°03′35″，面积11305平方公里，它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北枕燕山，东临渤海。从山地到海滨的地形大体分为山地丘陵、洪积冲积平原、河流冲积平原、海积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几个区域。海河与蓟运河等河流分别在天津入海。

“天津”得名于明朝永乐年间，意为天子经由的渡口。1949年以来，天津市的隶属关系和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变动，1979年确定了现区划。今辖13个区5个县。

以现天津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古代遗存为对象的天津考古，其实质是以海河水系区和蓟运河水系区为重心的区域考古。天津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天津考古成为中国北方沿长城地带与环渤海地区考古的结合点。

二

天津考古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试掘、调查和小型发掘，本阶段主要以年代学研究与历史地理考证为主。第二阶段（70年代至80年代），侧重遗址的编年分期和专题研究，初步建立起天津地区的考古遗存编年。第三阶段（90年代以来），学科目的日趋明确，科研体系逐渐形成。

目前一般认为，天津考古始于1956年12月天津市文化局试掘东郊张贵庄战国墓[①]。其实，现天津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最早的考古工作应当是1953年3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宁河县四遗址[②]。宁河调查和东郊试掘都认识到，所发现的遗存对于研究天津历史与地理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为天津考古开了个好头。此后，天津史编纂室和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分别对渤海湾西岸海河水系区和西北岸蓟运河水系区进行考古

调查[3]，初步确定了以（1）古遗存年代，（2）通过古遗存研究天津平原海陆变迁，（3）通过古遗存研究天津古代史，为基本内容的研究方向。1965年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4]，在天津考古界最先提出根据遗址的地层和遗物对遗址分期。这次试掘为下一阶段研究重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70年代至80年代，天津考古对遗址编年分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有了蓟县围坊遗址[5]、张家园遗址第二次[6]和第三次[7]、宝坻牛道口遗址[8]等代表性发掘。这几处遗址的青铜遗存，不仅成为天津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重点，而且随着沿长城地带考古课题的深入展开，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天津汉城调查与汉墓发掘，是本阶段天津考古的又一重点。与此同时，还从汉代考古与渤海湾西岸海岸线变迁研究中派生出“西汉后期渤海湾西岸海侵”问题[9]。蓟县围坊、张家园、下埝头[10]和宝坻牛道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相继发现，把天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提到日程上来。1979年和1989年，进行了两次全市范围文物普查，基本搞清天津市地上地下文物分布情况。结合发掘，初步建立起天津地区考古遗存编年序列。

90年代以来，在《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指导下，规范了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天津考古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蓟县青池新石器—青铜遗址、弥勒院新石器—青铜遗址、宝坻秦城战国汉遗址、武清兰城战国汉魏遗址、宝坻哈喇庄金元明清遗址、南开区明清天津城东门遗址、河东区大直沽中台元明清遗址、大直沽天妃灵慈宫等遗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为完善和深化天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明清的考古遗存编年序列，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骨干资料。

城市史学给予天津考古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近年来，在天津战国汉城、明清天津城的调查、发掘、考证的基础上，正在逐渐形成旨在探讨城市与人类文明关系的天津城市考古。

环境考古学把天津考古带有某些历史地理色彩的贝壳堤与海岸线、天津平原成陆、汉代海侵等专题研究，改造为旨在探讨天津地区全新世以来人地关系的天津环境考古。

历史学不满足天津考古多年来在补史证史方面做的工作，对天津考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天津考古正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建立天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历史，揭示阐释在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规律，通过文化变迁过程结合历史文献，复原天津古代社会和城市历史。

博物馆学教会天津考古如何从书本里跳出来，走到群众中去。近年来，天津考古开始思考科研向科普转化的新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天津考古自从张贵庄墓发掘，就遇到了配合工程的问题。80年代以来，许多汉墓和重要遗址大都是在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如大秦铁路、盘山热电厂等）中发现的。但是至今天津考古工作尚未纳入城乡建设程序里，工作很被动。总结80年代以来配合工程考古工作正面与负面的经验教训，在被动中多少争得一些主动的最好办法是，把将要发

生和正在发生的配合工程考古置入既定的科研体系里，使配合工作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学术性，确实能够解决一些学术问题（如编年序列问题、城市探源问题等）。同时做好科普和舆论宣传工作。这几年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所以才更加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支持。

三

迄止目前，天津市发现古代遗址、墓葬、建筑和碑刻近900处，约占天津现有文物资源的60%。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统计，明代以前（包括明代）的古遗址、墓葬共计568处。在天津市18个区县分布情况见表一。

现将天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考古遗存编年序列概括如下[11]：

1. 新石器时代前期

（1）青池一期[12]

（2）青池二期

（3）青池三期、下埝头一期、弥勒院一期

（4）下埝头二期、弥勒院二期、围坊一期[13]、张家园一期[14]等

2. 新石器时代后期

弥勒院三期、张家园二期[15]、牛道口一期

3. 夏商时期

张家园三期[16]、围坊二期、弥勒院四期、牛道口二期等

4. 西周时期

张家园四期[17]和铜器墓、围坊三期、弥勒院五期、牛道口三期等

5. 春秋战国时期

（1）津南巨葛庄和商家岭子陶鬲[18]、蓟县西山北头青铜短剑[19]

（2）兰城一期、秦城一期、西钓台城址战国遗存[20]以及张贵庄墓、巨葛庄墓、牛道口墓[21]、西北隅墓[22]等

6. 两汉时期

秦城二期、兰城二期和三期、西钓台城址汉代遗存以及双口墓[23]、体育学院墓[24]、宜城墓、牛道口墓[25]、东关墓[26]和别山墓[27]、辛西墓[28]、田庄坨墓[29]、兰城墓[30]、东滩头墓[31]等

7. 魏晋北朝时期

（1）兰城四期后段、西南坣遗存[32]、城顶子（即大海北）遗存等

（2）大港窦庄子造像[33]

表一

天津市古代遗址墓葬分布表

时间 数量 区县	新石器前期	新石器后期	石器地点	夏商	西周	春秋	战国	两汉	魏晋北朝	隋唐	宋	辽	金	元	明	总计
蓟县	5	2	0	8	8	1	11	31	0	1	0	9	1	1	7	85
宝坻	0	1	4	3	1	4	15	20	0	1	0	31	4	41	15	140
武清	0	1	1	0	1	0	8	35	1	5	0	21	1	36	10	120
宁河	0	0	3	0	1	0	11	18	1	0	1	1	0	7	7	50
北辰	0	0	1	0	0	0	7	1	0	0	0	0	0	1	0	10
西青	0	0	0	0	0	0	4	1	0	0	2	0	3	3	7	20
东丽	0	0	0	0	0	0	3	4	1	5	1	0	0	0	0	14
津南	0	0	0	0	0	1	20	2	0	1	3	0	0	0	0	27
静海	0	0	0	0	0	0	9	11	0	2	5	0	1	3	0	31
大港	0	0	0	0	0	0	9	11	1	1	2	0	3	15	14	56
河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6
河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河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红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和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汉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4
塘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5	4	9	11	11	6	97	134	4	16	14	62	14	111	70	568

8. 隋唐时期

(1) 窦庄子隋墓[34]、张村隋墓[35]等

(2) 军粮城唐墓[36]、蓟县唐墓等

9. 宋辽金元时期

(1) 双港寨、泥沽寨、三女寨遗址以及东滩头宋墓[37]、西钓台宋墓等

(2) 抬头村辽墓[38]、营房村辽墓[39]等

(3) 小云泉寺遗存[40]、哈喇庄二期以及东滩头金墓、上沽林金墓等

(4) 哈喇庄三期、小甸子遗存[41]、大直沽中台一期、天妃宫一期以及弥勒院元墓等

10. 明清时期

明清天津城址、大直沽中台二期和三期、天妃宫二期和三期以及莱园明墓[42]、敦信墓[43]等

新石器时代前期，蓟县山前平原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第一种以青池遗存为代表，出现的年代较早，大约距今8000年。典型陶器为夹砂褐陶“之”字纹筒形罐、圈足钵、盆、鸟（或蛇）首形镂孔器等。晚期出现了少量泥质红陶器。这种遗存跟北京平谷上宅遗存[44]的面貌、年代都很接近，属于以“之”字纹筒形罐为代表器的燕山文化系统。第二种以弥勒院遗存为代表，出现的年代较晚，大约距今6000年。典型陶器为夹砂褐陶素面釜、支脚和泥质红陶盆、钵、壶等。晚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黑彩红陶器。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有一些夹砂褐陶“之”字纹筒形罐（与青池的形异）与典型陶器共生。这类遗存不仅见于州河流域的弥勒院遗址，还见于洵河流域的下埝头、张家园遗址。目前这类遗存在考古文献中还找不到合适的对比材料，只知其晚期的面貌跟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类遗存从整体上看，基本属于以釜、支脚为代表器的太行山东麓文化系统。

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弥勒院三期为代表的遗存，典型陶器为夹砂绳纹罐、泥质篮纹罐、瓮、大口尊及素面杯等。未见空足三足器。目前这类遗存发现不多，面貌反映得不充分。据现有资料，大约能够跟河北蔚县三关三期[45]、北京昌平雪山二期[46]等冀北龙山时期遗存相比较。

新石器时代石器地点共发现9处。北辰区和武清县、宝坻县发现的石器多数是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石耜、石磨棒及扁圆宽体石斧。石器埋藏深度：北辰、武清器，距地表8.1米～5.6米，宝坻器，距地表4.7米～4米。宁河县发现的石器主要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近似圆柱状长体石斧及石凿。石器埋藏深度距地表2.5米～1.5米。

以张家园三期、围坊二期为代表的夏商时期青铜遗存，主要见于蓟县、宝坻。关于这类遗存的属性，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个类型[47]，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立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48]。据北京密云凤凰山[49]、房山琉

璃河[50]、河北蔚县三关等遗址[51]的同类遗存分析，这种遗存的遗址陶器与墓葬陶器存在一定的区别。就遗址陶器而言，与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陶器差别较大，就墓葬陶器尤其是“筒形鬲”而言，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器又很相似。若依墓葬陶器定性，可将这类遗存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个类型。但迄止目前，天津尚未发现以张家园、围坊为代表的墓葬遗存，因此关于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与进一步深入研究。

西周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类青铜遗存。一类以张家园四期为代表。典型陶器为高领叠唇柱根绳纹鬲、甗、罐、盆、瓮、敛口钵等。口部叠加泥带拍印绳纹是这类陶器常见的作风。张家园第二次发掘 F1 和 H1、第三次发掘 87 临 T4②，可能代表了早晚不同阶段。F1 的陶器与 H1、87 临 T4②的形态有别，H1 和 87 临 T4②有西周早期鬲、簋共生。据此推测，F1 为代表的年代可能在商周之际（帝辛、武王时期）。另一类以围坊三期为代表。典型陶器为斜领无足根绳纹鬲、甗、罐、盆、瓮、敛口钵等。交叉僵直的绳纹是这类陶器多见的特征。围坊遗址 T5①和 T8②两组陶器有别，暗示着年代的区别。目前天津地区内还没有发现张家园、围坊两类遗存在同一遗址存在，因此在层位上找不到二者直接的年代关系。如果把张家园四期和北京琉璃河[52]、河北涞水炭山[53]等遗存视为同类文化遗存，把围坊三期和河北宣化李大人庄[54]、河北涞水渐村[55]等遗存视为同类文化遗存，那么在天津周邻地区也没发现两类遗存并存在同一遗址内。至今在围坊三期一类的遗存里尚未见到商周陶器共生，这一现象或许能够作为这类遗存仅有可能早于张家园 H1 和 87 临 T4②为代表遗存的依据。以往关于张家园四期和围坊三期是同一文化的认识[56]，以及二者是早晚接替的两种文化的认识[57]，都有再检讨的必要。

这个时期的墓葬发现了两种。张家园、刘家坟以铜鼎、簋为随葬器。据器形、组合和铭文，知为周人墓。弥勒院五期墓以敛口陶钵为随葬器，殆为土著人墓。后种墓葬属于张家园四期抑或围坊三期，尚有待研究。

周人铜器墓在张家园四期遗址里出现，商周陶器在遗址里和土著陶器共生，明白地反映出随着周初分封，土著文化被涵化与燕文化形成的过程。

春秋遗存暂付阙如。大约春秋晚战国早的津南区巨葛庄、商家岭子鬲和蓟县西山北头青铜短剑，分别透露出燕文化和北方系青铜文化（山戎）在平原与山前地区活动的线索。

战国时期，燕文化占据了天津绝大部分地区，北部地区仍可见到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的遗存存在。南部地区发现了齐文化曾于一个时期插入的现象。

在静海、武清、宝坻，都发现有战国城址。秦城、兰城等遗址出土的各类建筑瓦件和各种陶器，表现出和河北易县燕下都[58]同类器物的相对一致性。在其他遗址调查采集的遗物，也大都与此相近。张贵庄、歇马台等墓葬，据陶器大体分为三类：（1）红陶直腹柱足鬲（燕式鬲），如张贵庄 M1、M7。（2）灰陶三足罐，如张贵庄 M6、M8、M14、

M30。(3) 灰陶三足罐和仿铜礼器，如张贵庄 M3、M4、M23。红陶鬲一般不和灰陶仿铜礼器发生组配关系。作为瓮棺墓葬具的夹云母（砂）红陶釜，有卵形和筒形两种，多为同形器组配使用，间或有异形组配者。以上三种陶器墓和瓮棺墓，目前都被视为燕文化遗存。至于三种陶器组合墓的社会含义，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宝坻牛道口 M7 和 M11 随葬的褐陶、灰陶素面罐，明显区别于同时期的燕文化陶器。这种含有非燕文化因素的陶器墓，又见于河北、辽宁等地。以牛道口 M7、M11 为代表的遗存，或许是北方部族在天津北部地区活动的物证。

静海西钓台城址出土的“陈和忐左廪”陶量残片和大港沙井子出土的“平阳”戈、“平□”戈[9]等齐国遗物，反映了齐国和燕国争夺领土的历史。过去所说的巨葛庄“区釜”齐量器[10]，在山东省齐国境内从未发现过。检齐国量器亦无自名为“区釜”者。巨葛庄器上被释为“区釜”二字的形体，跟山东出土的齐国陶文“区”、“釜”[11]二字差别很大。过去的释读和据以为说均误。目前能够定为齐国遗物的，仅限于有铭器物。陶器和其他器物估计应当存在，但需从已有的资料中比较甄别。

原属燕国的“宝坻秦城”，于燕国灭亡后被纳入秦朝郡县制体系里。在秦城内采集的石质印范（母范），一面刻有“泉州丞印”，另一面刻有“范阳丞印”，阴文，田字界格，具有秦印特征。泉州、范阳，西汉时分属两郡，秦时属何郡、为什么这两县刻在同一印范上，这些都有待研究。只有解决好印范的疑问，似乎才好确定秦城与文献记载的对应关系。宝坻秦城出土遗物能确定为秦物的，仅印范一件。其他的遗物，尤其是陶器，尚混在战国或汉代遗存里没有区别出来。

过去报道天津发现有 6 座汉代城址，即静海西钓台、宝坻秦城和武清城上、邱古庄、兰城、大宫城古城[12]。据地面勘察，西钓台古城长、宽均为 500 余米，城上古城边长约 500 米，大宫城古城长 600 米、宽 500 米，“邱古庄古城”并不存在。经钻探，秦城为不规则的四边形，北墙长 910 米（在 462 和 448 米处磬折），东墙长 658 米，南墙长 820 米，西墙长 474 米，总面积近 50 万平方米。此城形制大小均与汉城不合。城址发掘表明，该城建于战国晚期，废于西汉早期，不是汉城。1991 年对兰城进行了钻探，此次钻探没有发现城墙。试掘出土的各种板瓦、筒瓦和大量陶器，似乎又非一般居址所有。故而兰城是否为城址，目下一时难下结论。近年在今蓟县县城地下发现可能存在的汉城。

汉墓分布范围较广，但不均匀。静海县汉墓相对集中在西钓台城址所在的陈官屯乡。武清县汉墓以兰城遗址所在的高村乡最为密集，鲜于璜墓就在遗址附近。蓟县汉墓以今县城城关周围和邻乡最多。宝坻县汉墓分布在县北部地势稍高处，数量不多，分布不密。宁河汉墓不多。市四郊汉墓仅有零星发现。汉墓这种分布特点，应当和汉城的存在有关。

汉墓形制分为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前者多为西汉，后者多为东汉，两类并见于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墓的随葬陶器粗略分为两大类：壶、罐，瓮、罐，壶、瓮、罐一类；壶、瓮、罐和盒、奁、盘、勺、杯、仓、灶、井、猪、狗、鸡、鸭等一类，这类或有楼。前一类组合可延至东汉初早期，后一类组合的部分器物（如盒），可出现在西汉中晚期。后一类组合器物的种类、数量都多，且有陶楼者，多为东汉中晚期较大的墓。这种粗略的分类，分别见于北辰双口、宝坻宜城、牛道口、宁河田庄坨、蓟县东关、别山、辛西、邦均和静海东滩头等墓葬。目前天津已积累了近250座汉墓发掘资料，汉墓编年分期研究，亟待进行。

原战国燕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汉代遗存，往往继续沿用夹云母（砂）红陶釜和小盆，大约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天津的考古发现和北京、河北、辽宁见到的情况基本相同。

武清兰城遗址最晚的遗存里有一种瓦头捏成波状的“花边板瓦”，被视作汉魏遗物。这类“花边板瓦”又见于宁河城顶子、东丽西南堼遗址。如果“花边板瓦”断代不误的的话，那么宁河、东丽这两处遗址为探讨曹魏开凿的泉州渠的位置，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地理坐标。北朝遗存仅在大港窦庄子一带相继发现一批北魏铜造像。而见诸北京、河北的北齐墓，不知何故至今没有发现。

隋唐时期遗存主要分布在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多是单室墓，尤以东丽区军粮城靠近隋唐海岸线一带相对集中。军粮城唐墓出土的人首鱼身俑，带有鲜明的沿海色彩。这些很容易使人和文献记载的唐“三海口”产生联想。近年来在蓟县开始发现晚唐单室墓。

需要提及的是，市区三汊河口附近发现的唐“永徽二年”石造像，过去认为和唐“三会海口”及所谓“务本唐城”有关[8]。地质资料表明，天津市区（主要是海河两岸地区）成陆年代很晚，大约为距今3500年至3000年。迄今还没在市区范围内发现唐代的文化堆积。该造像不是发掘品，出土情况不详，考虑到天津近年时有古代石造像（甚至外国神像）出土，这尊造像不应是天津市区唐代的遗留物。

海河以南的宋代寨铺遗址尚未发掘，宋墓只清理了几座。海河以北的辽墓，因工作有限，编年不清。时下每每提及辽墓，则举抬头、官庄二例，或谓之两个类型。

宝坻哈喇庄金元时期遗址的分期和河东大直沽中台、天妃灵慈宫元明清遗址的分期，为天津地区金元明清考古遗存编年提供了标尺。同时对遗址常见的砖、瓦、勾头、滴水等建筑构件和瓷器、陶器的断代，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金元明清的民居和寺庙建筑，有了更多的了解。

元代的遗址，多数靠近河流分布。根据遗址分布走向，结合沉船地点，可以大体复原出元代漕运的三条路线：(1) 南运河—北运河，(2) 海—直沽口—北运河，(3) 海—北塘口—蓟运河。根据遗址分布走向还能看出古今河道的变化。

70年代以来，配合市区建设，先后发现1902年以后埋入地下的明清天津城的东、

西、北墙基。清理了东门瓮城基础。发掘了三岔河口炮台基址。这些考古发现，在建城修城的时间、次数、建筑工艺及旧城墙与现今围城马路的对应关系等方面，有所收获，为明清天津城的复原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过去天津史学界普遍认为天津传统时期（城市史指古代而言）城市起源于老三岔河口地区（小直沽，今南开区天后宫一带）。自从河东区大直沽考古发现元明清三个时期的堆积和宋金遗物、元代建筑基址后，史学界开始对过去的认识进行检讨。以元代天妃宫（东庙）为重心的大直沽地区，是目前市区内发现的文化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遗址区。该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探讨金代直沽寨、元代海津镇的所在，提供了可能。而目前在小直沽地区还不具备城市探源的条件。但是，地质资料表明，小直沽地区的人工堆积层厚度和大直沽的一样，深达6米。该地区也有元代的天妃宫（西庙，比东庙始建年代略晚）。小直沽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展开，将会使城市探源问题复杂化。

四

由于天津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天津考古从50年代开始时就注意到古遗存和贝壳堤、海岸线的关系[6]。据渤海湾西岸古代遗存和贝壳堤而提出的海陆变迁研究[8]，据古遗存“年代割裂现象”而提出的西汉后期海侵研究[8]，成为60年代至80年代天津考古最具特色的阶段性成果。90年代以来，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然科学，明确提出天津环境考古的研究课题。

地质学关于渤海湾地区的最新认识，为天津考古提供了考察史前和历史时期人类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

开始于距今12000年的全新世海进，至距今6000年左右时，从宝坻—武清—沧州一线后退，海进变为海退，原先被海水淹没的地区逐渐成为陆地。距今4000年是天津环境变迁的重要分界线。此前气候温暖，降水充沛。此后气候转冷，降水减少，以海洋影响为主的环境逐渐让位于陆相影响不断增强的环境。从而导致了天津南部贝壳堤平原和北部牡蛎礁平原的形成。

贝壳堤在气候寒冷期最发育，而牡蛎礁仅存在于气候温暖期。发育的贝壳堤和死亡的牡蛎礁，均可视为古海岸的标志。一系列贝壳堤和牡蛎礁的绝对年代，为研究海陆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贝壳堤平原上每一列贝壳堤向陆的一侧均有宽浅的洼地，尤以白塘口—沙井子一列和军粮城—岐口一列之间的最为发育，存在着较大的水体。牡蛎礁平原上，近东西向岭地（坨子）和洼地（如七里海）相间布列。人类活动由于受到众多洼地的阻隔，因此遗留下的遗址、墓葬多呈条块状分布。发现于贝壳堤和牡蛎礁之上的古遗存年代，往往比贝壳堤或牡蛎礁的年代晚数百年或千余年。这是因为

贝壳堤形成后或牡蛎礁死亡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为湿地或沼泽环境，需要进一步堆积或与内陆连通才能满足古代先民居住的最低条件[62]。

如果从宁河芦台向西而南依次连结距离海岸线最近的战国、汉代遗址，一直连到河北省黄骅、海兴县，能够大体勾勒出一条像侧伸张开的手掌样海岸线。有遗址的岭地外凸若三角洲，没遗址的洼地内凹若小海湾。市区河东大直沽 ZH4 孔柱状剖面显示，距今 10000 年至距今 3000 年为海相堆积，从而证实了“小海湾”的存在。被认作西汉泉州故城的武清城上村城址坐落在“天津小海湾”的西北，适与《汉书·地理志》载沽水、治水至泉州入海相吻合。指状岸线和“小海湾”的复原为北南向各列贝壳堤断续分布和局部存在西东向贝壳堤的现象找到一种解释。渤海湾西岸岭地与洼地从北向南相间分布的成因，大约和新构造活动的沉降、断裂以及泥沙质冲积物、海积物垂向加积作用有关。隋唐岸线大致和战国汉岸线相似。宋代以后形成和现岸线平行的弧状岸线。

距今 8000 年以来的天津先民活动，始终受到环境变迁的制约。距今 8000 年至距今 6000 年的文化遗存，仅存在于蓟县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区。距今 5000 年至距今 4000 年的文化遗存，随着海退，分布到天津北部河流冲积平原区。西周文化遗存分布的南界，可达武清城上至宁河俵口一线。天津南部海积冲积平原上最早的遗存（巨葛庄鬲）不早于距今 2500 年。离海最近年龄最轻的上沽林贝壳堤上发现的遗存，只有距今 700 年左右。不难看出，文化遗存年龄越老的越靠近山脉，年龄越年轻的越靠近海洋（参见前面的“天津市古代遗址墓葬分布表”，注意黑线的走向）。天津先民从山前向平原、沿海迁徙过程，与中晚全新世海退过程、环境变化过程相适应。假如环境从不发生变化，那么也就没有任何文化会获得对它所处环境的适应了。

现在看来，过去天津考古界所说的渤海湾西岸古遗存在编年上存在的“年代割裂现象”，只不过是受当时认识和工作局限造成的假象，实际上并不存在。已发表的渤海湾西岸考古资料里，有多处西汉晚期至魏晋、北朝的遗存。如宁河芦台西汉晚期（竟宁元年）墓、城顶子（即大海北）西汉末东汉初和汉魏遗存，西青区体育学院西汉晚期墓，东丽区西南堼东汉和魏晋遗存，务本二村、三村东汉遗存，津南区万家码头东汉初墓，静海东滩头东汉中晚期墓，大港区窦庄子东汉初墓、北魏造像，以及河北黄骅李官庄、北辛庄、北王曼、许官庄等东汉遗存[63]。过去据古遗存“年代割裂现象”提出的“西汉后期海侵”，显然得不到考古学方面的支持。起码在目前，还得不到地质学方面的证实。过去涉及的“海侵”概念含义和援引的证据，均缺乏科学性。“西汉后期海侵”的说法跟前文所述的全新世以来渤海湾西岸地质环境变迁也不协调。

（执笔：陈雍）

注 释

① 天津市文物组、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联合发掘组：《天津东郊发现战国墓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 3 期。

② 安志敏：《河北宁河县先秦遗址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 4 期。

③ a. 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考古》1962 年 12 期；b.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65 年 2 期。

④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1 辑。

⑤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 年 10 期。

⑥(56)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 年 8 期。

⑦(57)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 年 4 期。

⑧(58)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宝坻县文化馆：《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1 年 7 期。

⑨(60) 韩嘉谷：《西汉后期渤海湾西岸的海侵》，《考古》1982 年 3 期。

⑩ a. 梁宝玲：《蓟县下埝头、弥勒院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b. 梁宝玲、宋国：《蓟县下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

⑪ 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均为未发表资料。

⑫ 以下所述分期均为本文拟定。

⑬ 参见注⑤引文。围坊一期以 T8⑤、T10③为代表，不应包括 T8④、T9④一类遗存。

⑭ 参见注⑦引文。以 87T26②为代表。

⑮ 同上。以 87T12②为代表。

⑯ 参见注④、⑥、⑦引文。过去或称“张家园下层”。

⑰ 同上。过去或称“张家园上层”。

⑱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南郊巨葛庄战国遗址和墓葬》，《考古》1965 年 1 期。

⑲ 梁宝玲：《天津蓟县发现青铜短剑》，《北方文物》1993 年 2 期。

⑳ 赵文刚：《静海县西钓台战国、汉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

㉑ 张贵庄墓见注①和《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5 年 2 期）。巨葛庄墓见注⑱。牛道口墓见注⑧。

㉒ a. 邸明：《蓟县西北隅战国至辽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b. 纪烈敏：《蓟县西北隅战国至辽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㉓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北郊发现一座西汉墓》，《考古》1972 年 6 期。

㉔ 同注③b。

㉕ 赵文刚等：《蓟县东关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

㉗ 赵文刚：《蓟县别山汉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

㉘ 梅鹏云：《蓟县辛西村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

㉙ 邸明：《宁河县田庄坨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 9 辑。

㉚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 年 3 期。

㉛ 赵文刚：《静海县东滩头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

㉜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军粮城海口汉唐遗迹调查》，《考古》1993 年 2 期。

㉝ 天津市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编写组：《天津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㉞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南郊窦庄子隋墓和汉代瓮棺墓》，《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

㉟ 赵文刚：《静海县张村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㊱ a．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军粮城发现的唐代墓葬》，《考古》1963年3期；b．同㉜。

㊲ 邸明：《天津静海东滩头发现宋金墓》，《考古》1995年1期。

㊳ 魏仲明等：《蓟县抬头村早期辽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

㊴ 赵文刚：《天津市蓟县营房村辽墓》，《北方文物》1992年3期。

㊵ 纪烈敏、张俊生：《蓟县小云泉寺金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

㊶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西郊小甸子元代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

㊷ 魏克晶：《河北宝坻泉园村明墓群》，《考古》1965年6期。

㊸ 张俊生等：《蓟县城关镇明敦信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

㊹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管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

㊺ 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2期。

㊻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㊼ 李经汉：《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㊽ 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㊾ 同注㊻，第二编青铜时代。

㊿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1期。

51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

5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53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4期。

54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0年5期。

5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58 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

59 此戈题铭“平”下一字，或释为“舒”（韩嘉谷：《“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三期），不确。

60 见注㉝，并见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1979～1989年天津文物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89年。

61 参见高明编著《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年。

62 63 见注60引后一文。

64 见注①、并见云希正：《天津市郊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与发掘记略》，《北国春秋》1959年1期。

65 见注③a、b；韩嘉谷：《天津地区成陆过程试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67 a．王宏：《渤海湾全新世贝壳堤和牡蛎礁的古环境》，《第四纪研究》1996年1期；b．王宏、李凤林：《地质环境变化对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影响》。

68 陈雍：《渤海湾西岸东汉遗存的再认识》，《北方文物》1994年1期。

河北省考古五十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949年以前，河北省考古仅在局部地区做过小规模零星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北省文物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五十年来，河北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发现了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各类文物，其中有不少是闻名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对这些考古发现的科学研究成果，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河北考古为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旧石器时代考古

阳原盆地是河北旧石器考古的中心。阳原盆地又称泥河湾盆地，这里第四系地层发育良好，蕴藏着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就开始在泥河湾进行地质和古生物学考察研究工作。1965年，盆地中部虎头梁村附近发现了可靠的旧石器，自此真正揭开了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序幕。1972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陆续在盆地内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文化遗址或地点，如虎头梁（1972年）①、许家窑（侯家窑）（1974年）②、小长梁（1978年）③和东谷坨（1981年）④等。1983年以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积极在泥河湾盆地开展旧石器考古工作，新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50余处，重要的有：岑家湾（1984年）⑤、板井子（1984年）、新庙庄和漫流堡⑥、益堵泉⑦、西白马营（1985年）⑧、西水地大西梁南沟和豹峪⑨、油房（1984年）⑩、籍箕滩（1986年）⑪、火石沟和新庙庄大西沟⑫、雀儿沟（1990年）⑬、飞梁和马鞍山（1995～1998年）等⑭。这些发现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详尽发展序列的建立，提供了最新资料。

泥河湾盆地最早的文化遗存当属马圈沟遗址⑮，其与东谷坨、小长梁旧石器遗存属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一般称小长梁—东谷坨文化⑯。文化遗物埋藏于下泥河湾层的粘土或砂层中，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石器制作以锤击法打片为主，砸击法辅之，石器形体普遍较小，器形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较少。石器加工技术属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系

统。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或地点有板井子、新庙庄、漫流堡、雀儿沟和许家窑（侯家窑）等，文化遗物多埋藏在湖相或河相沉积中，其中以许家窑遗址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被称为许家窑文化。许家窑文化包括古人类化石、石器、骨角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许家窑人化石计有顶骨、颌骨等 17 块，代表十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体制特征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比北京人有所进步。石器以细小型为主，制作工艺上承小长梁—东谷坨文化，属华北小石器系统，器形主要有刮削器和尖状器等。石球数量很多，构成了许家窑文化的显著特色。动物化石经铀子系法测定，年龄为 10 万年左右[17]。根据地层分析和动物群性质推断，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初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泥河湾盆地，以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虎头梁文化最具典型性。文化遗物多埋藏在桑干河第二阶地的砂质黄土层中，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较晚阶段。虎头梁 73101 地点和马鞍山遗址发现有人类烧烤取食的灶坑遗迹。石器加工技术发达，工艺为进步发达的细石器文化系统。石器类型有细石核、细石叶、圆头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有研究者将虎头梁、籍箕滩、油房等遗址为代表的石器文化，归入细石器文化系统，其石器制作工艺应属细石器工业传统的开始；而将西白马营遗址一类遗存视作传统小石器文化系统的继续发展[18]。特别要指出的是，1997 年于家沟遗址发现了距今约 1 万余年的陶片，这是我国华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有陶石器时代遗存之一，为研究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和陶器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重要信息。与上述考古发现相应，一些学者对泥河湾旧石器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岑家湾等遗址石制品的拼合研究，开辟了旧石器文化研究的新途径[19]。

1958 年发现的迁安爪村旧石器地点位于滦河三级阶地，这个河北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的石器材料，直到 80 年代才得到正确的认识[20]。与此同时，泥河湾盆地以外的河北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遗址或地点，主要有：燕山南北的承德四方洞洞穴遗址（1980 年）[21]、滦县东灰山（1985 年）[22]、玉田孟家泉（1986 年）[23]、昌黎亭泗涧（1990 年）[24]、抚宁所各庄、唐山双桥（1990 年）[25]以及冀南地区的涉县新桥等。这些发现扩展了对河北旧石器文化的认识领域。

二　新石器时代考古

1976 年武安磁山遗址的发掘，揭开了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探索的序幕[26]。磁山遗址经过 1976～1977 年、1978 年、1985～1988 年、1994～1998 年等多年连续性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27]。以磁山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磁山文化，因此而掀起的一场热烈讨论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活动，成为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考古学界的一件盛事[28]。磁山文化的遗迹非常丰富，磁山遗址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石器陶器

组合堆积、石片砾石堆积、窖穴和灰坑等，其中尤以大量的深井式直壁竖穴状的深窖穴和石器陶器组合堆积最具特色。有的深窖穴底部堆积着大量腐朽的粟的遗存，反映了旱作农业的发展。石器陶器组合堆积一般由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和陶盂、支脚、三足钵、双耳壶等组成，这些堆积往往许多组相邻连成一片，其确凿性质尚待研究。磁山遗址的器物群以石磨盘、石磨棒、夹砂褐陶盂和支脚最具代表性，晚期泥质红陶双耳壶和三足钵的数量有所增加。磁山文化的年代据^{14}C测定，约在公元前6400～前5400年左右[28]。磁山文化的遗址发现得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冀南地区的洺河流域[30]。冀中地区容城上坡一期、易县北福地一期乙类遗存等[31]，其陶器群也是以盂和支脚为代表，但与磁山遗址的陶器相比略有差异，而且不见流行于磁山遗址的有足石磨盘等器形，此或许是一种地域性差别。

与磁山文化的生存年代大致同时，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兴隆洼文化。主要遗址有：三河孟各庄[32]、迁西东寨[33]、迁安杨家坡[34]、承德岔沟门[35]等。文化面貌与辽西地区基本相似，属同一文化系统[36]。陶器群以夹砂红褐陶筒形罐和钵为主要器形，不见泥质陶。流行压印或刻划的几何形纹饰。石器除磨制石器外，还有打制石器和细石器。

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北福地文化，是略晚于磁山文化阶段而早于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其与周边的北辛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37]。主要遗址有：易县北福地和七里庄、涞水炭山[38]、三河刘白塔[39]、徐水文村[40]、安新留村[41]、正定南杨庄[42]、任县卧龙冈[43]、永年石北口等[44]。陶器群以夹砂红褐陶釜和支脚最具典型性，其次有泥质红陶钵、壶和盆等。无论从地层关系上，还是从器物演化轨迹上观察，都反映出北福地文化是后冈一期文化的直接前身。

寻找比磁山文化的更早的新石器遗存，一直是考古学界所关注的课题。1986～1987年，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余年的有陶新石器遗存，这是我国北方地区第一次发现地层清楚、年代最早的有陶新石器遗存[45]。1997年对南庄头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重要收获是发现了用火的遗迹并获取陶片40余片。用火遗迹是一条自然小沟和附近的红烧土面，上面分布着烧过的树干、木炭、破碎的动物骨骼、石块和陶片等。出土遗物有陶片、石器和石料、骨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陶片的陶质均系夹砂陶，颜色不纯，灰色或褐色，质地疏松，火候低。器表除素面外，纹饰有绳纹、堆纹和刻划纹。器形可分辨出有平底直口或微折沿的罐类。石器主要是石磨盘和石磨棒。骨器以磨制精致的骨锥为代表。动物骨骼多为肢骨碎片，推测为人类食用的残留。南庄头遗址年代早，其文化内涵对研究新石器早期人类的生存方式、陶器起源以及当时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河北仰韶时代文化主要有两大系统：冀中南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燕

山南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冀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形态。60年代，河北的文物工作者曾将河北境内的后冈一期文化遗存，称为仰韶文化"南杨庄类型"[46]。河北的后冈一期文化遗址主要发现在冀南地区，除南杨庄外，重要的还有磁县界段营[47]、武安赵窑[48]、永年石北口[49]以及蔚县四十里坡下层等[50]。文化遗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分打制和磨制两种，种类有斧、铲、刀、镰和镞等。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次为夹砂褐陶和灰陶。器表以素面为主，有少量的弦纹、划纹和彩陶。器形以各式的钵为主，多为敛口或直口，圜底或小平底，常见红顶式钵。鼎和罐是仅次于钵的器种，其次还有盆、细颈瓶和双耳壶等。彩陶多见于钵类陶器上，红彩为主，次为黑彩，图案有带状纹、多组竖线纹、平行线组合的斜三角纹和网纹等。

1957年，邯郸市百家村遗址发现了类似大司空类型文化的遗存，被河北的文物工作者称为仰韶文化"百家村类型"[51]。大司空文化的遗址主要在冀南地区，重要的有：磁县下潘汪[52]、界段营，邢台柴庄[53]、永年洺关[54]等。文化遗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的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器表以素面或磨光为主，纹饰主要是篮纹，还有少量的绳纹、划纹和堆纹。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彩色以红彩和棕彩为主，图案主要有弧形三角纹、平行曲线纹、蝶须纹、水波纹、同心圆纹和锯齿纹等，主要施于钵盆类陶器上。陶器以平底器为主，主要器形有折腹盆、曲腹钵、高领罐等。冀中地区发掘的容城午方和东牛遗址，也发现了类似大司空文化的遗存[55]。但冀中地区的遗存表现出有别于冀南的较浓厚的地方特色，如陶器群中除了类似大司空文化的器形外，还存在大量的刮条纹筒形罐、带鋬盆、敛口罐和小口斜肩鼓腹双耳彩陶瓮等一批具有独特特征的器类。经调查，以午方和东牛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在冀中地区有较广泛的分布，它们的文化性质应至少是大司空文化内的一个地域类型，或者是一支新型的文化。

1954年，曲阳钓鱼台遗址发现了类似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遗存，被河北的文物工作者称为仰韶文化"钓鱼台类型"[56]。目前这一类型的遗址发现得很少，除钓鱼台外，冀西北地区蔚县三关遗址也发现了类似庙底沟类型的遗存[57]。1997年，对钓鱼台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彩陶文化资料。钓鱼台遗址的彩陶与庙底沟类型的比较相似，可视为庙底沟类型彩陶向太行山东麓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代表[58]。

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确立，推动了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认识和探讨。燕山南北地区属于赵宝沟文化的遗址主要有：迁安安新庄[59]、三河孟各庄[60]、滦平后台子[61]和迁西西寨等[62]，其中以西寨遗址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西寨遗址的文化遗迹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和陶器群堆积等。有的灰坑底部铺有一层砾石。陶器群堆积的器形包括筒形罐、红顶钵和碗等，有的筒形罐内发现有石球等遗物，堆积中还发现有小型的石雕人头像。出土遗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分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种类有斧、锛、铲、石坠、盘状器和刮削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和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红

陶和黑陶。器表大多数饰有纹饰，主要是压印或刻划的几何形纹饰，种类有之字纹、斜条纹、折线纹、横条纹、坑点纹和刮条纹等。器形以筒形罐为主，其次有碗、钵、尊形器等。燕山南北地区继赵宝沟文化之后是红山文化。目前红山文化的遗址在这一地区发现得较少，主要有玉田西蒙各庄等[63]，文化面貌与辽西地区的大致相似，应属同一文化系统。

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的过渡遗存或称龙山时代早期遗存，在河北发现得较少。河北平原地区以永年台口遗址一期遗存为代表[64]；冀西北桑干河流域地区以宣化贾家营遗址早期[65]和阳原姜家梁墓地为代表。台口一期遗存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器表除素面磨光外，纹饰以篮纹较多，其次是绳纹，器形主要有罐、瓮、盆、钵等，存在少量彩陶。贾家营早期遗存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器表以素面和篮纹占多数，主要器形有罐、盆和钵等。1995年发掘的姜家梁遗址和墓地，发现房址8座、墓葬70多座。这是河北首次发现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墓地。墓葬分布有一定规律，形制分土坑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种，葬式多为仰身屈肢葬。多数墓葬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陶质多为夹砂灰褐陶，有的陶器上饰红色或黄色几何形彩绘。陶器群特征与雪山一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陶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这批墓葬资料，为研究燕山南北地区仰韶末期文化的面貌与性质、墓葬制度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提供了最新依据。

河北龙山时代文化从目前的考古资料观察，主要有三个文化系统：河北平原地区的华北平原龙山文化、冀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龙山文化和燕山南麓地区的大城山类型遗存[66]。河北平原上的龙山文化南北面貌基本一致，冀南地区以邯郸涧沟和龟台[67]、磁县下潘汪[68]、永年台口遗址等为代表，冀中地区以任邱哑叭庄遗址为代表[69]，涞水北封村也发现有龙山遗存[70]。涧沟遗址发现有人骨架层叠枕压的丛葬坑，人骨上有砍痕或烧痕，显属非正常死亡。另外在房址内还发现有砍痕和剥皮痕的人头骨，表明当时可能存在剥人头皮的习俗，反映了龙山时代复杂的社会形态。河北平原龙山遗存出土遗物有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等，涧沟遗址发现大量的家猪头骨，标志着养畜业的发达。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的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黑陶。器表纹饰以绳纹和篮纹较多，方格纹次之，素面磨光也占相当的比例。器形以平底器为主，主要有深腹罐、小口瓮、大口瓮、甗、盆等，另外还有少量的鬲、鼎等陶器。冀西北龙山文化遗址以蔚县境内的庄窠、筛子绫罗和三关等为代表[71]，宣化贾家营、怀来小古城、崇礼石嘴子等遗址也都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存[72]。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蚌器和陶器。石器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三种。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的灰陶为主，颜色一般较浅，其次是褐陶。器表以篮纹和绳纹为主，次为素面和堆纹等，方格纹极少。主要器形有鬲、罐、甗、斝、瓮、盆和豆等，以鬲、斝、瓮为最具特色的陶器。与河北平原上的龙山文化的陶器群有较大差异。燕山南麓的龙山文化遗存以唐山大城山遗址为代表[73]，另外丰润韩家街等遗址也发现了

龙山文化遗存[74]。大城山遗址出土遗物有石器、骨蚌器和陶器。石器除磨制石器外，还存在大量的打制精细的细石器。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的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黑陶。器表以素面和磨光为主，纹饰主要是绳纹和篮纹。器形以平底器占多数，主要是各种类型的罐和瓮，流行子口和横耳。陶器群特征兼具河北平原龙山遗存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同时更具自身独有的特色。

三　夏商周考古

河北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大致可分为两个区域或系统：冀中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和商代文化；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或称张家园上层文化）。两个区域的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其分界大致在拒马河流域一带并因时间不同而南北有所偏移。

学术界一般将下七垣文化视作先商文化[75]。河北的下七垣文化遗址主要有石家庄市市庄[76]、邯郸涧沟和龟台[77]、磁县下七垣[78]、下潘汪和界段营[79]、永年何庄、[80]、内邱南三岐[81]、邢台葛庄[82]等。80年代以来，冀中地区发现了一批文化面貌与下七垣文化相似的遗址，如容城午方和白龙[83]、安新辛庄克[84]、定州尧方头、易县下岳各庄等[85]。下七垣文化的遗迹发现有灰坑、房址和陶窑等，午方遗址发现了水井，井底有木制的井盘起加固作用。文化遗物发现有石器、骨器、陶器和铜器。石器以磨制为主，铜器仅见小铜泡和小刀。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的灰陶为主，次为黑陶。器表除素面磨光外，以绳纹为主。器形主要有鬲、盆、罐、甗、瓮、器盖、豆和鼎等。冀中地区的陶器群与冀南地区的有不少差异，如冀中缺乏冀南常见的深腹罐、鼎和素面盆等，一些器形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冀中地区的独特特征，或是一种文化内的地域性表现，或是另一种系统的考古学文化。

冀中南地区继下七垣文化之后，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商代文化。重要遗址有：邢台商代遗址群的曹演庄[86]、南大郭[87]、贾村[88]、尹郭村[89]、东先贤[90]和西关外等[91]，邯郸涧沟和龟台[92]，磁县下潘汪、界段营[93]和下七垣[94]，武安赵窑[95]，藁城台西[96]和北龙宫[97]，灵寿北宅[98]和西木佛[99]，正定新城铺[100]，新乐中同村和无极东侯坊[101]，沧县倪杨屯[102]，定州北庄子[103]等。台西遗址是殷墟以北重要的商代聚落遗址，经过1973、1974年的两次发掘，发现房址14座、墓葬112座、灰坑134个，出土各类遗物3000余件。1983～1985年、1997年，对该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新材料。房址分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建筑两种形式，平面多呈长方形，除单室外，还有双室和多室的房子。墙体夯筑或用土坯垒砌。墓葬均为中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三分之二的墓有随葬品，一般为1至2件，包括陶器、铜器和石器等。有一座墓出土1件铁刃铜钺，反映了

在商代早期就对铁的性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1991 年发掘的北庄子墓地发掘商墓 42 座，皆土坑竖穴墓，有二层台和腰坑。大型墓中有殉人，随葬品亦依墓葬形制大小而多寡有别。随葬品种类有铜器、陶器、玉器和骨器等，铜器包括礼器和兵器，有鼎、簋、斝、觚、爵、卣、戈和斧等。1998 年正式发掘的东先贤遗址，发现了与曹演庄下层相似的丰富的商代遗存，其年代晚于白家庄期，而早于殷墟一期，为商王祖乙迁邢（邢台）说的最终确定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台西、东先贤遗址和北庄子墓地的发掘，是殷墟以北商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商代的北方和商文化的分布及地域特征提供了重要依据。新城铺、西木佛、中同村、东侯坊等地出土的带铭青铜器，对研究商代的族群及方国部族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蔚县庄窠和四十里坡[104]、涞水富位[105]、安新辛庄克[106]等遗址也都发现了商代文化遗存，但其文化内涵中又含有不少独特的地方文化因素，反映了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主要有：唐山大城山和小官庄[107]，承德伊犁庙，平泉化营子、沟门子和黑山口，兴隆小东沟以及隆化于家沟[108]，大厂大坨头[109]，卢龙东阚各庄[110]，滦南东庄店[111]，唐山古冶[112]，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和四十里坡[113]，涞水渐村和庞家河[114]，张家口市白庙[115]，宣化李大人庄等[116]。文化遗迹发现有灰坑、房址和墓葬等。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随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盆、罐等。小官庄发现有石棺墓，形制较独特。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和铜器等。石器以磨制为主，另有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群以夹砂绳纹褐陶和灰陶为主，有的黑陶器上饰红、白、黄粉彩。器形主要有鬲、甗、盆、罐、豆和瓮。拒马河流域附近的文化遗存含有一些下七垣文化的因素，冀西北地区的陶器群存在一定数量的三足瓮和卷沿高领绳纹鬲等特色器类。河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以大坨头、大城山等遗址为代表的燕山以南地区；其次是壶流河流域诸遗址代表的冀西北地区；至于燕山以北则与辽西同属一个区域。

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围坊三期文化或称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与辽西地区的魏营子类型文化有可能属同一文化系统。主要遗址有卢龙双望[117]和东阚各庄[118]，唐山古冶[119]，遵化西三里[120]，迁安小山东庄[121]，易县北福地和涞水炭山[122]、北封村[123]，唐县洪城[124]等。陶器群以夹砂或夹云母的褐陶为主，器表除素面外，以绳纹和附加堆纹最为常见。主要器形有鬲、甗、罐、盆、豆、钵和瓮等，其中尤以口沿饰附加堆纹的花边口沿鬲最具特色，是典型代表性陶器。陶器群中还含有一些晚商和早周文化的因素，小山东庄墓葬出土了周式青铜礼器，反映了其与商周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

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地区进入西周时期以后，文化面貌趋于统一，基本处于周文化控制之下，这是周人和周文化向东方扩展的结果[125]。西周文化的遗址主要有：磁县下潘汪和界段营[126]、邯郸龟台[127]、大厂大坨头[128]、唐县南伏城[129]、元氏西张村[130]、满城要

庄[11]、邢台南小汪和葛庄[12]等。1978年西张村发现的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铜器和玉器39件，其中铜器34件，分礼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等。礼器包括鼎、甗、簋、尊、盘、盉、卣和爵等，其中簋和卣上有长达几十字的铭文，记载了邢侯与戎作战和軧国的情况，反映了軧国的存在和邢国与戎的关系，证明了西周邢国的初封地即今天的邢台。西张村铜器群对研究西周史尤其邢国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82～1983年发掘的葛庄遗址和1991年发掘的南小汪遗址，都是重要的大型聚落遗址，特别是南小汪遗址发现了一块西周刻辞卜骨残片，残存文字11个，这是河北首次发现的甲骨文。1993年以来，葛庄西周墓地发掘墓葬200多座，车马坑20多座，出土一批铜器、陶器、玉器等重要遗物。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分大、中、小型三种，大型墓有墓道。这批墓葬资料对研究西周邢国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河北西周文化的陶器群与陕西关中地区的陶器面貌基本一致，唯其早期的陶器明显含有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当与该地区原属商人故地有关。另外，冀中地区的遗存还含有一些北方文化的因素，反映了与北方邻境文化的交流。

东周考古主要有两项内容：都城城址的勘察和各种类型墓葬的发掘。燕下都、赵都邯郸城和中山灵寿城遗址，是河北东周时期三个著名的都城城址。燕下都和赵邯郸城早在30～40年代就做过小规模的调查工作。1957年以来，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这两座城址进行了多次详细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基本搞清了两座城市的布局，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遗迹和遗物[13]。1977～1982年，又对中山灵寿故城遗址进行了全面勘察[14]。此外，还在许多地方发现一些规模较小的一般城址或聚落遗址，如临城柏畅城战国城址[15]、武安午汲战国城址[16]、石家庄市市庄遗址[17]、邢台曹演庄和南小汪遗址[18]、丰润东欢坨遗址等。燕下都遗址位于易县东南2.5公里处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是战国时期燕国都城遗址。城址平面略成长方形，东西长约9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分东城和西城两部分，其间有一道城垣和一道古河道分隔开来。东城是全城的主体部分，城内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和一般居民区，城西北角是墓葬区。西城城内文化堆积较少，应是防卫东城的郭城。城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其次有铁器、铜器、骨器等。陶器除盆、罐、瓮、豆等生活用陶外，还有大量建筑用陶，如板瓦、瓦当、水管道和井圈等。赵都邯郸城遗址位于今邯郸市区，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遗址。赵城由宫城和郭城组成。宫城一般称赵王城，分东、西、北三个小城，平面呈品字形排列，城内发现多处大型夯土台基址，应是宫殿区所在。郭城在宫城东北方向，两城相距60余米。郭城内主要是平民居住区，发现多处各种类型的手工作坊遗址。另外，城西北部发现有与西城垣相连的建筑基址群。郭城以西的百家村附近，分布着稠密的战国墓葬[19]。故城西北15公里处的三陵村一带，分布着5组赵王陵墓。中山灵寿故城址位于平山县北7公里处的三汲村附近，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遗址。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宽约4公里，南北最长处约4.5公里。

分东西两城，中央有一道隔墙。东城的中部和北部是宫殿区，西部是手工业作坊区。东城和西城的南部是一般居民区。西城的北部是王陵区，另外，城址以西2公里处还分布着另一处王陵区。城址东北分布着中小型墓葬。城内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包括生活用陶和建筑用陶两大类。

东周墓葬发掘较多，时代多属战国时期，形制以中小型墓为主。战国时期大型墓葬的发掘主要有三处：一是1974～1978年发掘的平山中山国国王的两座王陵1号和6号大墓[40]；二是1978年发掘的赵都故城西北王陵区的周窑1号大墓[41]；三是1964年发掘的燕下都遗址16号大墓[42]。这些大型墓葬皆有封土和墓道，墓主身份是国王或王室的高级贵族。中山灵寿故城址王陵区的1号大墓墓室平面呈中字形，有南北两个墓道。椁室内积石积炭，被盗扰严重，但在椁室两侧的器物坑内出土有丰富的随葬品，种类有铜器、漆器、陶器和玉器等。铜器大多有铭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铁足大鼎、夔龙纹方壶和圆壶是刻有长篇铭文的重器。椁室出土的兆域图铜版不仅用金银镶错了一幅陵园平面规划图，并注明了建筑各部分的名称、位置及尺度，而且还刻有中山王命的铭文，是一件珍异的重要文物。许多铜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如错金银虎噬鹿形器座、错金银龙凤方案、错金银犀形器座、错银双翼神兽等。大墓周围有陪葬墓和外藏坑，外藏坑包括车马坑、船坑和杂殉坑。墓主身份依铜器铭文推断，应是中山王譽。6号大墓的形制与1号大墓大致相同，亦出土了丰富精美的重要文物。中山王陵的发掘是我国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的珍奇文物制作之精、史料价值之高世人瞩目。燕下都九女台墓区发掘的16号大墓，墓室平面呈中字形，有南北两个墓道。椁室盗扰严重，但出土了大量随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陶器是整套的彩绘仿铜陶礼器，种类有鼎、豆、壶、盘、匜、鉴和编钟等，其中鼎为列鼎9件一组。该墓的墓主人至少是王室高级贵族。赵城王陵区的周窑1号墓是一座带东西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大墓，椁室积石，盗扰严重，墓主身份亦应是王室贵族一级。

发掘的东周中小型墓葬主要有：1952年发掘的唐山贾各庄战国墓葬22座[43]、1956年在武安午汲古城址发掘的战国墓葬20座[44]、1957～1959年两次发掘的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葬49座[45]、1958年发掘的邢台南大汪战国墓7座和东董村战国墓葬131座[46]、1977～1982年在中山灵寿故城址发掘的东周墓葬多座[47]、1986年发掘的徐水大马各庄春秋墓葬37座[48]、1998年在中山灵寿故城址内和城外东北部的岗北、青廉墓区发掘战国墓葬500多座等等。此外，零星清理发掘少量战国墓葬的地点还有：行唐李家庄[49]、唐县北城子[50]、三河大唐回和双村[51]、永年何庄[52]、新乐中同村[53]、灵寿岔头村[54]、临城中羊泉[55]和迁西大黑汀等[56]。这些地点的中小型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随葬品依墓葬形制大小有所区别，中型墓随葬大量铜器和陶器等，小型墓一般仅随葬几件陶器。北城子、中同村等地的战国墓随葬品中含有一些北方文化的因素，如铜釜、动物形牌饰、兽首直刃剑

和金盘丝等，反映了北方文化对中原周文化的影响。

1957～1960 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承德地区进行了数次文物普查，发现了许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其中主要有平泉柳树泉、黄窝子山，滦平营房、茴子沟，丰宁胡沿沟、城根营，隆化胡家沟和朝梁沟等[57]。1965 年在平泉东南沟发掘了 11 座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墓葬形制分石棺墓、石板覆盖的土坑墓和土坑墓三种类型，随葬品有铜器、骨器和贝等，铜器包括戈、短剑、刀、牌饰、铜泡和耳坠等[58]。1983 年发掘的滦平后台子遗址上层，属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表多为素面，主要器形有鬲、甗、罐、豆和钵等[59]。

在冀西北和冀北地区，还发现-批具有浓厚北方文化色彩的东周墓葬，如 1964 年在怀来北辛堡清理的两座墓葬[60]、1979 年在滦平虎什哈炮台山发掘的 35 座墓葬[61]、1980 年在怀来甘子堡清理的 21 座墓葬[62]、1985 年发掘的宣化小白杨墓地[63]和 1988～1989 年清理的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等[64]。这些墓葬的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有木棺。有棺椁的墓室填土中，流行埋葬杀殉的马、牛、羊和狗等。随葬品有铜器和陶器等。铜器主要有直刃匕首式短剑、环首刀、动物形牌饰以及各种小型装饰品，另外还有鼎、豆、壶、盘、匜和各种车马器等具有中原周文化特色的铜器。陶器主要是褐陶素面罐。随葬器物群具有浓厚的北方文化色彩，但其中也包含有许多中原文化的囚素。

四　秦汉考古

1986～1991 年秦皇岛金山嘴秦代建筑群遗址的发掘，是我国秦代考古一大重要发现[65]。遗址位于北戴河区金山嘴附近的滨海高地上，总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分金山嘴、横山和横山北三个南北相间的地点。其中横山地点发掘面积 15000 多平方米，揭露出大型建筑基址和大量建筑遗迹，出土了丰富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等文化遗物。横山建筑群基址布局紧凑，中央区域分布着三个大型院落，两翼分布着两个南北狭长的院落。每一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外围都普遍环以围墙，单体建筑内部多分室或分堂、室。建筑结构上采用夯土筑墙和室内用柱，屋顶系瓦顶，用板瓦和筒瓦铺叠而成。横山地点与金山嘴、横山北等地点一并构成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体遗址，其性质初步推测为秦始皇东巡的行宫遗址。

汉代考古的主要内容是墓葬的发掘，其中又以汉中山国陵墓的发掘最为引人瞩目。汉中山国领域大致包括今以定州为中心的周围十几个县，定州当时名卢奴，乃中山国首府。1968 年发掘的满城陵山一号和二号汉墓，是西汉中山国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并穴合葬墓[66]。墓葬形制是凿山为墓的大型石洞室墓，由墓道、甬道、南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耳室为库房和车马房，中室象征厅堂，后室象征内室。死者身穿金缕玉衣，

这是我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成套玉衣，为研究汉代玉衣形制结构和玉衣使用制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两墓出土了丰富的铜器、玉器、陶器、金银器、漆器和纺织物等随葬品，共计约4200多件，另外还出土五铢钱4200多枚。铜器铭文中有“中山府”、“中山内府”等字样，许多铜器造型华美、设计精巧，是汉代铜器中的艺术珍品，如“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等。墓中还出土了金银医针和刻有“医工”铭文的铜盆等一些医用器具，为研究医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满城汉墓的发掘是我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对研究汉代历史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定州周围分布着稠密的汉代墓葬群，已经发掘的大型陵墓主要有：北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之墓[⑩]、北陵头东汉中山穆王刘畅之墓[⑪]、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之墓等[⑫]。北庄汉墓是一座带斜坡墓道、平面凸字形的大型多室砖室墓，砖室外用加工的石材叠砌成一道围绕墓室的石壁，有人认为此属石构题凑之墓。该墓用石4000多块，其中174块石材上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是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姓氏，又以“北平石”、“望都石”者为多。墓中出土鎏金铜缕玉衣片5000余片，应属于两个个体。北陵头汉墓系一大型多室砖室墓，出土金银器、铜器、玉器和银缕玉衣片1000多片。八角廊汉墓是一座凸字形带墓道的木构题凑之墓，墓中除出土金缕玉衣、麟趾金、马蹄金和玉器等随葬品外，还发现了大批炭化的竹简。竹简的内容包括《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论语》、《文子》等重要古籍。1952年和1954年发掘的望都所药村一号和二号东汉壁画墓，是汉中山国陵墓发掘的又一重要发现[⑬]。墓葬形制为大型多室砖室墓，墓室壁画内容主要是衬托墓主人身份的属吏形象，人物像旁有墨书榜题，如“门亭长”、“门下小吏”、“主簿”等。这些人物图像高近80厘米，线条流畅，形象传神，是东汉壁画作品中的上乘佳作。

1971年清理发掘的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是河北又一重要的壁画墓[⑭]。该墓亦为一大型多室砖室墓，墓内壁画描写了墓主人车马出行盛况、下属官吏治事、谒见及墓主人生活情况，同时辅以衙署和宅院等画面。墓内发现有“惟熹平五年”的题记，故其年代当在东汉末年灵帝时期。

汉中山国之外的河北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大批重要墓葬。1978年发掘的石家庄小沿村西汉墓，是一座大型中字形土坑木构题凑之墓，这是已发现的最早的木构题凑之一[⑮]。墓内出有篆刻“长耳”二字的印章，发掘者据此推测墓主可能是汉初赵王张耳。出有玉衣片的大型汉墓还有：邢台北陈村西汉墓[⑯]、蠡县城西东汉墓[⑰]、石家庄市柳辛庄东汉墓等[⑱]，其墓主身份当为王侯或高级贵族。1992～1994年发掘的获鹿高庄汉墓，为一大型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积石墓，出土有铜器、陶器和银器等大量随葬品，铜匜铭文中有“常山”字样，推测墓主可能是西汉常山国国王或高级贵族[⑲]。抚宁邴各庄发现

的三墓道十室东汉砖墓[143]、迁安于家村由东西主通道和四面回廊连成一体的多室东汉砖墓[144]、沙河兴固砖石混合结构的多室东汉墓[145]、阳原三汾沟西汉时期斜坡式和竖井式墓道洞室木椁墓[146]、涉县索堡西汉时期竖井式墓道砖木混合结构洞室墓等等[147]，反映了河北汉墓形制的多样性和地域特色。阜城桑庄东汉墓出土的2米多高五层仿木构釉陶楼，是陶楼作品中的精品[148]。

1977年开始的张家口、承德地区长城调查，在明长城以北发现战国燕、秦、汉时期的古长城遗迹三道：最北一道为秦长城，其南为燕长城，最南一道为汉长城[149]。

五　魏晋北朝考古

临漳县邺城遗址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等六个朝代的都城遗址，它由邺北城和邺南城两座相连的城址组成，现今的漳河横贯其间[150]。邺北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400米，南北宽1700米。城墙夯土筑成，东墙和北墙各发现一座城门址，门道宽20米左右。城内北部中央为宫殿区，发现多处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区以东为贵族所居戚里及官署区，以西为禁苑铜爵园，发现有铜爵台、金虎台两座夯土台基址。城址南部是一般衙署和居民区。宫殿区以南有一条南北向的中阳门大道，和一条东西向的大道。邺北城布局分南北两区，以北区的宫殿区为主体，宫殿区正南的中阳门大道为全城的中轴线，这一布局开辟了我国都城布局的新形制，对后世的都城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邺南城由于河流泛滥，已全被沙土湮没。经钻探可知，城址平面长方形，最宽处南北长约3460米，东西宽约2800米。城内布局与北城相似，唯城墙外侧筑有马面，东南、西南城角为圆角，体现了军事防御功能。南面正门朱明门经过发掘，发现有双阙存在。

邺城西北郊的今磁县西南地区是北朝的陵墓区，亦即原来所谓的“磁县七十二疑冢”，这一带发现有许多重要的北朝墓葬，主要有：磁县东陈村东魏墓[151]、北齐尧峻墓[152]、东槐树村北齐高润墓[153]、大冢营村东魏茹茹公主墓[154]、湾漳北朝墓[155]、孟庄北齐元良墓等[156]。这些墓葬的形制一般是带墓道和甬道的单室砖墓，墓室方形而略有弧度，墓内常见有壁画和墓志，随葬品盛行陶俑，另有瓷器、陶器及金银器等。壁画内容以青龙白虎为先导的仪仗出行队列、墓主人与侍从形象以及天象图等最具特色，画面宏伟壮阔，线条豪放，人物栩栩如生，表现了北朝壁画的高超水平。陶俑表饰彩绘，制作精美，形象生动，对研究北朝服饰和仪制具有重要价值。东魏武定八年茹茹公主闾氏墓出土的“萨满巫师俑”，应是与公主自身民族即柔然族有关的文化遗物；而尧峻墓中的三盒墓志，记载了吐谷浑等族的情况[157]。此反映了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融合与汉化。茹茹公主墓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则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湾漳北朝墓的性质，有人推测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武宁陵[158]。

邺城近畿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发现有不少的北朝墓葬，重要的有：景县封氏墓群[193]、无极甄氏墓群[194]、河间南冬村北魏邢伟墓[195]、赞皇东魏李希宗墓[196]、平山北齐崔昂墓[197]、吴桥北朝墓[198]和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等[199]。其中景县封氏和高氏[200]、无极甄氏、河间邢氏等墓地，是北朝豪门望族的族墓地。这些墓葬出土的陶瓷等随葬品及墓志文字资料，对研究北朝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北朝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瓷器产品，对瓷器史研究颇具重要意义。景县封氏墓地出土的仰覆莲六系青瓷尊，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了印贴、刻划和堆塑等手法通体饰满纹饰，是北朝时期北方青瓷的代表作品。河间北魏邢伟墓出土有青瓷唾壶及碗，为探索北方青瓷出现的时间提供了线索。平山北齐崔昂墓发现的黑釉四系罐，釉色匀净光亮，是比较成熟的黑瓷产品。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发现一件黑釉瓷器残片，表明至少在东魏时期已有黑瓷存在了。景县东魏天平四年高氏墓出土的黄褐釉兽柄四耳瓶，是北朝黄褐瓷器的精品。磁县东魏武定五年尧赵氏墓出土的酱褐釉瓷器，是研究酱褐釉瓷器出现时间的重要依据。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河北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比较丰富。造像遗存主要有：曲阳修德寺北魏至唐代石造像[201]、藁城北齐石造像[202]、邺南城郊出土的北朝石造像和铜造像[203]、唐县北朝隋唐石造像等等[204]。修德寺石造像是数量最大的一批，总数有2000多尊，其中含纪年铭的造像有200多尊，以东魏、北齐和隋造像居多。这批石造像以小型单体像为主，残高20～30厘米，造型生动，是佛教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石窟寺院遗迹以邯郸鼓山响堂山石窟最为重要，它包括南响堂石窟、北响堂石窟和水浴寺石窟3处。鼓山西麓北响堂石窟的附属建筑常乐寺遗址，在1960年和1979年曾做过清理，出土石造像等遗物400多件。根据寺内金正隆四年的碑文记载，常乐寺建置的年代不晚于北齐，与北响堂石窟的开凿时间大致相同[205]。鼓山南麓的南响堂石窟据第2窟隋代《滏山石窟之碑》记载，其始凿年代当为北齐天统元年[206]。引人注意的是窟檐的剥露，显出柱、斗拱和屋顶等仿木建筑遗迹，提供了北朝时期建筑的形象资料。鼓山东麓的水浴寺石窟，俗称“小响堂”，其西窟发现了“武平五年”纪年刻铭，因此水浴寺石窟的开凿时间当为北齐武平年间[207]。另外，涉县中皇山的北齐佛教摩崖刻经，共镌刻6部经文，长达13万多字，是佛教早期经籍中的重要资料[208]。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城内东北隅塔基址下出土的北魏石制舍利函，函盖上有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的铭文，函内有金银器、铜器、琉璃器、珠宝玉器和波斯银币[209]。波斯银币共计41枚，均为萨珊朝遗物，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210]。

六 隋唐考古

隋唐时期的墓葬过去一直发现较少。70年代末期以来唐墓出土逐渐增多，才使人

们对河北唐代墓葬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隋代墓葬重要的有：曲阳大业八年尉仁弘墓[illegible]、获鹿大业六年迁葬的北魏东梁州刺史阎静墓[illegible]、饶阳开皇六年迁葬的李敬族夫妇合葬墓等[illegible]。墓葬形制多为单室方形四壁外凸的砖室墓，随葬品主要是陶俑、陶畜禽模型和瓷器等，与北朝墓葬情形基本相似。唐代墓葬多为中小型墓，大型陵墓只有位于隆尧境内高宗时追尊的祖宣皇帝的建初陵和祖光皇帝的启运陵。陵区破坏严重，仅存一些石刻，有石马、石柱、石狮等，雕刻生动，与陕西诸唐陵的皇家陵墓雕刻遥相媲美，弥足珍贵。陵区的附属建筑光业寺已不存，但幸存有一通《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其碑文证实李唐祖籍的“赵郡李”说当属正确，亦即今河北隆尧应为李唐祖籍[illegible]。

唐代中小型墓葬多为零散发现，集中的墓群见于唐山刘庄[illegible]。比较重要的墓葬有：易县北韩村咸通五年孙少矩墓[illegible]、清河丘家那咸亨元年孙建和孙幺则墓[illegible]、正定木庄大中九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墓[illegible]、涿州杨楼大历十二年张光祚墓[illegible]、大名万堤咸通六年何弘敬墓[illegible]、沧县前营村咸通九年刘元政墓[illegible]、南和侯郭垂拱四年郭祥墓[illegible]、文安麻各庄咸亨三年董满墓等[illegible]。这些墓葬的形制上承北朝，多为单室方形或圆角方形四壁外凸的砖室墓，一般带有墓道和甬道，同时也存在不少的圆形墓。邯郸南吕固发现有石结构的墓室[illegible]。墓内出土遗物主要有墓志、彩绘陶俑、陶畜禽模型和瓷器等，罕见中原地区常见的三彩器。许多墓志的铭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弥补或纠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之处，如王元逵、张光祚和何弘敬等人的墓志铭中，均反映了晚唐时期河北一带藩镇割据、社会混乱的局面。彩绘陶俑主要包括武士、文吏、女侍和胡人等，神态各异，制作精致。曲阳涧磁村晚唐墓出土的定窑白釉瓷器[illegible]、临城唐墓出土的邢窑白瓷器[illegible]，为研究两大名窑的烧造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石家庄市元和七年孙岩墓发现的贴花人物瓷壶[illegible]、晋县北张里唐墓出土的白瓷执壶等[illegible]，是唐代瓷器的重要产品。宽城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银盘和银执壶，是河北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illegible]。

1994 年发掘的曲阳五代同光二年北平王王处直墓，是一座填补时代空白的大型墓葬[illegible]。该墓形制为带墓道的方形前后室并有左右侧室的石室墓，墓室内绘有精美的壁画。室顶的天象图与四壁嵌入的彩绘十二生肖浮雕相毗连，壁画内容有云鹤、花鸟、奉侍和山水等，内容丰富，色彩绚丽。特别是后室镶嵌的内容表现奉侍和伎乐的两块汉白玉彩绘浮雕，刻工精美，线条流畅，人物形态栩栩如生，是古代雕刻艺术的精品。这座墓葬在形制和壁画等方面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是研究唐末、五代考古的珍贵资料。

历史上“类银”、“类雪”的著名唐代邢窑白瓷器，在 80 年代以前一直未发现其窑址。1980 年，临城县西部的岗头、祁村和西双井一带，发现了唐代的邢窑窑址[illegible]；1982 年，临城陈刘庄至贾村之间发现隋代邢窑窑址[illegible]；1984 年，与临城毗邻的内邱城关和中丰洞一带，也发现了邢窑遗址[illegible]。至此，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邢窑窑址问题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邢窑的制瓷历史始于北朝，极盛于中唐，至唐末五代衰落。隋代的邢窑就已

生产出厚仅0.7～1毫米的透影白瓷[24]，磁县贾壁村还发现有隋代的青瓷窑址[25]。这些发现对研究隋唐瓷器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　宋辽金元考古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26]。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27]。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28]。邯郸峰峰矿区和雄县发现的宋代地道,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29]。

河北北部地区北宋时属辽，因此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近年来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30]。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窿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耶律加乙里妃墓[31]、重熙十五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32]，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时立爱墓[33]、兴隆金天德二年契丹人墓等[34]。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35]。

1994年石家庄市后太保史氏家族墓地的发掘是元代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36]。共发掘墓葬8座，其中1号墓规模最大，为一座带墓道仿木构大型砖室墓，主室八角形，东西侧室为圆形。该墓群只有4号墓出土一方墓志,墓主史杠。发掘者据此推定该墓群为史氏家族墓地,而1号墓的主人有可能是元中书右丞相史天泽。重要的元代墓葬还有满城元蔡国公张柔墓,易县还发现有张柔第九子张弘范的墓志[37]。磁县东部南开河村附近是漳河故道,1976年在此发掘出6只元代木船的残骸。船上出土遗物有陶瓷器、铜器、铁器等,其中瓷器370多件,以磁州窑产品最多,为研究磁州窑制瓷史提供了重要资料[38]。

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曲阳涧磁村附近的瓷窑址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是定窑的主要遗址。涧磁村定窑创烧于唐，盛于北宋，废灭于元末[39]。1985年以来，在涧磁以

及北镇、野北和燕川等地进行调查发掘，发现大量窑炉和各种瓷器遗物15000余件，为研究定窑烧制史增添了新资料。磁州窑是五代到北宋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窑，窑址位于今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附近[28]。1987年又对观台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窑炉遗迹10座，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和其他遗物近万件，瓷片30多万片。发掘证明，磁州窑创烧于五代末北宋初[29]。另外，井陉境内近年来新发现的以烧制白瓷为主的窑址已受到人们的注意[30]。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谢飞、郭瑞海两位先生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

（执笔：段宏振）

注 释

① 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4期。

②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贾兰坡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17卷4期。吴茂霖：《许家窑遗址1977年出土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8卷3期。

③ 尤玉柱等：《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5卷1期。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④ 卫奇等：《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卷3期。

⑤ 谢飞、成胜泉：《河北阳原岑家湾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9卷3期。

⑥⑨⑫⑱ 谢飞：《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研究新进展》，《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4期。

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益堵泉旧石器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0年3期。

⑧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西白马营晚期旧石器研究》，《文物春秋》1989年3期。

⑩ 谢飞、成胜泉：《河北阳原油房细石器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1期。

⑪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籍箕滩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址》，《文物春秋》1993年2期。

⑬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泥河湾盆地雀儿沟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季刊》1996年4期。

⑭ 中美泥河湾考古队：《飞梁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⑮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马圈沟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⑯ 贾兰坡等：《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⑰ 陈铁梅等：《许家窑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铀子系法年代测定》，《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卷1期。

⑲ 谢飞、李君：《拼合研究在岑家湾遗址综合分析中的应用》，《文物季刊》1995年1期。

⑳ 裴文中等：《河北迁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发掘简报》，《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2卷；黄万波：《迁安爪村"假石器"——订正一个历史的误解》，《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2期；张森水：《河北迁安县爪村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2期。

㉑ 兴隆县文物保管所：《承德市四方洞旧石器文化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2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四方洞——河北第一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㉒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考古》1989年11期。

㉓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玉田县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1年1期。

㉔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昌黎亭泗涧细石器地点》，《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㉕ 唐山市文物管理处：《唐山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文物春秋》1993年4期。

㉖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6期。

㉗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㉘ 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1期；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5期；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考古》1979年4期；安志敏：《略论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考古》1984年10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磁山文化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蔡莲珍：《碳十四年代的树轮年代校正——介绍新校正表的使用》，《考古》1985年3期。

㉚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洺河流域几处遗址的试掘》，《考古》1984年1期。

㉛㊳(85)(109)(122)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4期。

㉜(60)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考古》1983年5期。

㉝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㉞(74)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河北唐山地区史前遗址调查》，《考古》1990年8期。

㉟ 承德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省承德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2年6期。

㊱ 段宏振：《燕山南麓新石器时代文化初论》，《北方文物》1995年1期。

㊲ 段宏振：《太行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认识》，《文物春秋》1992年3期。

㊴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95年8期。

㊵ 商志刚等编：《徐水县文物志》。

㊶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安新县梁庄、留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0年6期。

㊷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正定南杨庄遗址试掘记》，《中原文物》1981年1期。

㊸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任县卧龙冈遗址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0年4期。

㊹㊾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永年石北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3期；《永年县石北口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㊺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㊻ 孟昭林：《河北正定县南杨庄卧龙冈彩陶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正定南杨庄遗址试掘记》，《中原文物》1981年1期；郑绍宗：《有关河北长城区域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考古》1962年12期；唐云明：《试谈有关河北仰韶文化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64年9期；文启明：《略谈河北仰韶文化南杨庄类型》，《考古与文物》1985年4期。

㊼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6期。

㊽(9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3期。

㊿(104)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51) 罗平：《河北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4期。另参见注㊻。

(52)(6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53) 唐云明：《河北邢台柴庄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6期。

5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永年县洺关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春秋》1990年4期。

5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容城县午方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学集刊》第5集。

56 董增凯等：《河北省曲阳县发现彩陶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赵印堂等：《曲阳县附近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考古通讯》1955年1期。另参见注46。

57 71 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2期。

58 段宏振：《试论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传播》，《文物春秋》1991年1期。

59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4集。

61 109 承德地区文物保管所等：《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3期。

6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63 马洪路：《河北玉田县发现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5期。另参见注54。

64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12期。

65 陶宗治：《河北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

66 段宏振：《试论华北平原龙山时代文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67 77 92 107 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6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70 1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涞水北封村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0期。

72 《河北怀来小古城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12期；张家口地区文管所：《河北崇礼石嘴子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2期。

73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75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76 81 唐云明：《河北境内几处商代文化遗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2集。

7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2期。

79 93 139 同注47和52。

80 135 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省永年县何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4期。

82 贾金标、任亚珊：《邢台葛庄先商遗址及两周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

83 保北考古队：《河北省容城县白龙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3期。

84 106 保北考古队：《河北安新县考古调查报告》，《文物春秋》1990年1期。

86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

87 唐云明：《邢台南大郭村商代遗址探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3期。

88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贾村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0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邢台地区古遗址古墓葬的发现与清理》，《文物》1959年9期。

8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邢台尹郭村商代遗址及战国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0年4期。

90 唐云明：《河北邢台东先贤村商代遗址调查》，《考古》1959年2期。

91 唐云明：《邢台西关外遗址试掘》，《文物》1960年7期。

94 同注78。另见罗平：《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殷代青铜器》，《文物》1974年11期。

9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⑰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年10期。

⑱ 陈应祺：《河北灵寿县北宅村商代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2期。

⑲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

⑽ 刘友恒等：《河北正定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年2期，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县新城铺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1984年12期；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

(101) 文启明：《河北新乐、无极发现晚商青铜器》，《文物》1987年1期。

(103) 沧州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沧县倪杨屯商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3年2期。

(10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07) 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1957年第7册。

(108)(15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承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62年12期；另参见注⑥郑绍宗文。

(109)(126)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1期。

(110)(12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卢龙县东阚各庄遗址》，《考古》1985年11期。

(1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滦南县东庄店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9期。

(112)(1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古冶商代遗址》，《考古》1984年9期。

(113)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另参见注⑩。

(11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另参见注③。

(115) 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10期。

(116) 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5期。

(117) 李捷民等：《河北卢龙县双望乡发现细石器与陶器》，《考古通讯》1958年6期。

(119) 刘震：《河北遵化县发现一座商代墓葬》，《考古》1995年5期。

(120) 唐山市文物管理处等：《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时期墓葬》，《考古》1997年4期。

(121)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唐县洪城遗址的调查》，《考古》1996年5期。

(125) 段宏振、张翠莲：《试论太行山东麓地区的西周文化》，《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128)(154) 郑绍宗：《唐县南伏城及北城子出土周代青铜器》，《文物春秋》1991年1期。

(129)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考古》1979年1期。

(13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3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3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

(134)(14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集。

(135) 刘龙启等：《河北临城柏畅城发现战国兵器》，《文物》1988年3期。

(136)(144) 孟浩等：《河北武安午汲古城发掘记》，《考古通讯》1957年4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中的窑址》，《考古》1959年7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的周、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7期。

(137)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138) 同注(66)和(139)。

(139)(145)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12期。

(14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嚳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141)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6期。

(14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2期。

(143)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3年6册。

(146)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邢台南大汪村战国墓简报》，《考古》1959年7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印：《邢台战国墓发掘报告》，1959年。

(14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徐水大马各庄春秋墓》，《文物》1990年3期。

(149) 郑绍宗：《行唐县李家庄发现战国铜器》，《文物》1963年4期。

(150) 廊坊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三河大唐回、双村战国墓》，《考古》1987年4期。

(15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6期。

(154) 文启明：《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文物》1986年6期

(155) 临城县文化局：《河北临城县中羊泉东周墓》，《考古》1990年8期。

(156) 顾铁山等：《河北省迁西县大黑汀战国墓》，《文物》1996年3期。

(159) 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考古》1977年1期。

(16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5期。

(16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

(162) 贺勇等：《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文物春秋》1993年2期。

(163) 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宣化县小白杨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

(164) 承德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4年2期。

(16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金山嘴秦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7)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168)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

(16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8期。

(170) 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59年。

(17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

(172) 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

(173)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5期。

(17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蠡县汉墓发掘纪要》，《文物》1983年6期。

(175) 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石家庄北郊东汉墓》，《考古》1984年9期。

(176) 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河北获鹿高庄出土西汉常山国文物》，《考古》1994年4期。

(17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抚宁县邴各庄汉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7年3期。

(178) 迁安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清理》，《文物》1996年10期。

(17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沙河兴固汉墓》，《文物》1992年9期。

(18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1期。

(181) 邯郸市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涉县索堡汉墓》，《文物春秋》1996年1期。

(18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1期。

(183) 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

(184)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1期；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7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考古》1997年3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1期。

(185)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186)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4期。

(187)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188)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

(1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

(190) 磁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磁县北齐元良墓》，《考古》1997年3期。

(191) 周伟洲：《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文物》1985年5期。

(192) 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文物》1994年11期。

(193)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194) 孟昭林：《无极甄氏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59年1期。

(195) 孟昭林：《记后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峦墓的发现》，《考古》1959年4期。

(196)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

(197)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11期。

(198) 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9期。

(199) 王敏之：《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9期。

(200)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3期。

(201) 罗福颐：《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3期。

(202) 程纪中：《河北藁城县发现一批北齐石造像》，《考古》1980年3期。

(203) 河北临漳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1980年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出土的北朝铜造像》，《考古》1992年8期。

(20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县寺城涧村出土石刻造像》，《文物春秋》1990年3期。

(205)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邯郸鼓山常乐寺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10期。

(206) 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文物》1992年5期。

(207)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鼓山水浴寺石窟调查报告》，《文物》1987年4期。

(208) 马忠理、张沅等：《涉县中皇山北齐佛教摩崖刻经调查》，《文物》1995年5期。

(20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5期。

(210) 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5期。

(211) 薛增福：《河北曲阳发现隋代墓志及瓷器》，《文物》1984年2期。

(212) 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梁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5期。

(213) 刘玉杲：《饶阳县王桥村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10期。

(214) 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4期。

⑮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山市陡河水库汉唐金元明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3期。

⑯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4期。

⑰ 辛明伟、李振奇：《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文物》1990年7期。

⑱ 刘友恒等：《唐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

⑲ 欧潭生等：《唐代张光祚墓志浅释》，《文物》1981年3期。

⑳ 邯郸市文物管理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8期。

㉑ 沧州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考古》1991年5期。

㉒ 辛明伟、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年6期。

㉓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文物》1994年1期。

㉔ 邯郸市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南吕固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8年1期。

㉕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发掘的唐宋墓葬》，《考古》1965年10期。

㉖ 李振奇等：《河北临城七座唐墓》，《文物》1990年5期。

㉗ 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石家庄市振头村发现唐代贴花人物瓷壶》，《考古》1984年3期。

㉘ 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北晋县唐墓》，《考古》1985年2期。

㉙ 宽城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考古》1985年9期。

㉚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宿白：《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文物》1996年9期。

㉛ 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9期。

㉜ 杨文山：《隋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文物》1984年12期。

㉝ 内邱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邱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9期。

㉞ 张志中、王会民：《邢窑隋代透影白瓷》，《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㉟ 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

㊱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

㊲ 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㊳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㊴ 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

㊵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8期；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10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文物》1995年2期。

㊶ 郑绍宗：《耶律加乙里妃墓志铭》，《考古》1981年5期。

㊷ 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8期。

㊸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

㊹ 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㊺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㊻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247) 孟繁峰：《张柔墓调查记》，《文物春秋》1996年3期。易县博物馆：《河北易县发现元代张弘范墓志》，《文物》1986年2期。

(248)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木船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6期。

(24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5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

(251) 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252) 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山西省考古工作五十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省内山环水绕、地貌多样，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1926年，第一次由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科学发掘，就选择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由此掀开山西现代考古工作的序幕。然而，山西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展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五十年来，山西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调查统计，目前全省已发现各时代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城址、碑刻造像、漕运遗迹等共8000余处。通过发掘大批遗址和墓葬，积累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并对有关学术课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

山西是西部高原走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质框架古老，地貌类型多样，埋藏环境优越，是早期人类进化与繁衍的重要地区之一。早在1929年山西就有旧石器遗存的发现报道，而真正有规模的多学科考古发掘和研究是从1954年丁村遗址开始的。几十年来，山西省已发现3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其中已发掘约30处，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专著、研究报告和论文，这些不仅使我们对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有一个大致了解，而且将山西境内已知的人类历史提早了100余万年。

山西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晋西南黄河沿岸和汾河流域，比较重要的遗址有芮城县的西侯度与匼河、襄汾县丁村遗址的早期地点。这一时期的工具器形较大，制作技术原始且粗糙，类型比较简单，常见的有三棱大尖状器、砍斫器、石球和刮削器。生态环境和石器功能反映了早期人类采集、渔猎的原始经济。西侯度遗址距今180万年，内含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文化[①]。西侯度的石制品数量不多而且经过不同程度的水流搬运磨蚀，虽然有些学者对西侯度遗存内的人类行为信息提出质疑[②]，但我们仍然认为石器中的很多特征难以用非人工因素来解释。我们赞同原研究者的结论：西侯度石制品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创造的原始文化。这批古朴的标本还

存在着某些相对进步的信息：当时的人类对石料有一定的认识和选择；制作石片已采用了三种方法；石器的刃部刻意制成直、凸、凹三种形态，说明工具的使用已有相当的分工。西侯度的石器尚不是人类最早的工具，最初的石器还应到上新世地层中去寻找③。

匼河遗址由近20个地点组成。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多次发掘匼河遗址，获得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匼河的石器技术和类型显得比较简单，年代应早于北京猿人文化。通过比较研究，它和汾河流域的丁村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后者加工技术更为娴熟，产品更精致一些。两地共见的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可以把二者的垂直关系连贯起来，丁村文化是由匼河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由于师氏剑齿象和三门马等古老种属的存在，匼河遗址的时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④。有些学者则认为其时代仍在北京猿人的时代范畴之内⑤，个别地点甚至可以晚到中更新世晚期⑥。

丁村遗址早期地点发现于汾河左岸第四级阶地的砂砾层中，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其石制品原料、制作技术和工具类型与丁村中期文化基本一致。三棱大尖状器、砍斫器、斧状器、石球、双阳面石刀等共同的器物组合反映了二者清晰而密切的文化传承关系⑦。

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国最著名的两处中期遗址均在山西，即北部桑干河流域的许家窑遗址和南部汾河流域的丁村遗址。许家窑遗址1974年发现于一套湖相沿积物中，经多次发掘出土了代表10余个个体的人类化石20件、数万件石制品、部分骨角器及大量动物化石。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早期⑧，绝对年代距今12.5～10.4万年⑨。许家窑人类化石的形态特征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可归入人类进化系统的早期智人阶段。石制品中除了数以千计的石球外，粗大的石器较为少见，大部分石器器形细小。漏斗状石核和原始棱柱状石核分别为华北以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锥形石核和棱柱状石核的母型；小型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等工具组合大都是北京猿人地点和峙峪地点常见的类型。许家窑文化是中国北方小石器文化传统中北京猿人文化发展到峙峪文化的重要过渡类型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丁村文化分布在汾河流域，埋藏于第三级阶地下部，1953年发现，1954年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石器和化石，其中在54：100地点发现3枚人牙化石和1块小孩右顶骨化石⑩。70年代以后，在丁村遗址范围内又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遗存。这些重大发现不仅丰富了丁村文化的内涵，而且解决了丁村文化的来龙去脉问题，基本建立起本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序列⑪。

就目前的资料显示，山西省旧石器时代中期存在着两支平行发展的旧石器文化。二者除共有石球外，北部的许家窑文化以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小型工具为特色；南部的丁村文化的典型工具则是大型的三棱尖状器、砍斫器、斧状器和双阳面石刀。前者源于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和冀北泥河湾盆地早期文化；后者则是西侯度文化、匼河文化

发展到丁村早期文化之后的产物。这些区域性文化特色可能是人类为适应不同生态环境而逐渐形成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在这一阶段主要有小石器传统文化和细石器文化两大系列。小石器传统文化分布于北部桑干河流域和东部太行山区石灰岩洞穴，它们承袭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小石器文化的传统特色，工具小型化；制作石器仍以直接打制技术为主，偶尔采用间接压制法；工具组合为式样繁多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弓箭、装饰品和磨制技术产生。重要遗址有朔州峙峪[12]、陵川塔水河[13]、阳高神泉寺等。峙峪遗址发现于60年代初，绝对年代距今2.8万年，发现1.5万件石制品，1件人类枕骨化石，1件经磨制的石墨装饰品及5000余枚动物牙齿。石制品中有中国最早的石镞。动物化石研究表明，在不大的发掘面积内至少有200余匹野马野驴个体，反映出当时人类高超的狩猎技能。

细石器文化的重要资料有70年代发现的沁水县下川[14]，襄汾县丁村77：01地点，80年代发现的蒲县薛关[15]、吉县柿子滩[16]和榆次市大发[17]。这些遗址的时代大致在距今2.5～1万年间，此时文化的空间分布更为广阔，地区性文化色彩愈加鲜明，出现了不少新技术和新发明，压制工艺发达，复合工具兴盛，打制石器的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准。下川细石器是用黑色燧石制作的，典型工具有石叶、细石叶、端刮器、箭头、雕刻器、尖状器、琢背小刀等，器形规整、刃缘平齐。另有一些大型工具如研磨盘和锛状器，预示着大规模拓荒和农业的诞生。薛关和柿子滩位于西部黄河左岸，工具包含两类，一是选择石英岩砾石石片为素材，以软锤技术和压剥法制作卵圆形弧刃刮削器和双尖尖状器；另一类是加工精美的石镞、端刮器等典型细石器工艺。这一带的石制品特色与黄河上游的水洞沟文化以及内蒙古南部同时期文化有不少相近之处。

山西北部的桑干河沿岸90年代也有重要发现，朔州市南磨遗址揭露出3个用过火的灰堆，可能是篝火或火塘遗迹，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要发现[18]。在阳高县尉家小堡和神泉堡发现了与虎头梁文化类似的细石器文化，埋藏着丰富的石制品和装饰品，为探索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提供了珍贵资料。

二

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可上溯到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的夏县西阴遗址发掘[19]，此外至40年代末仅在1931年小面积试掘了万泉（今万荣）县的荆村遗址[20]，其他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是一片空白。建国50年来，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通过全省范围的文物普查、重要区域的专题调查、重点遗址的科学发掘、典型遗存的综合分析，基本建立了各区域的文化序列与谱系，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80年代以前，山西未发现前仰韶时期遗址。1984年，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征集到属于磁山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各1件[21]。1991年5月，在翼城县北橄乡枣园村发现并确认了山西第一处前仰韶文化遗址[22]，出土的富有特征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褐陶较少，颜色不太纯正，器表均素面，钵类器口沿有一周与器体颜色不一的彩带；主要器类有各种小平底钵、假圈足钵、折沿盆、敛口高领双耳壶、釜、器座等。类似的遗存在闻喜坡底[23]、阳城町店大宁[24]等地也有发现，分布区域覆盖山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类遗存与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同时期文化遗存既有相近的时代特征，也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可称为"枣园文化"，这是山西南部前仰韶时期最后阶段的典型代表。

仰韶时期文化是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内容。1958年至1960年发掘的芮城东庄村、西王村遗址确立了"东庄类型"和"西王村类型"[25]，较全面地反映了晋、陕、豫交界地区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此后直至80年代，主要研究工作仅局限于对这类遗存的分析研究[26]。1990年至1991年翼城北橄[27]、大同马家小村遗址[28]的发掘使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山西仰韶时期文化，近年来侯马褚村[29]、垣曲古城东关[30]、宁家坡[31]等遗址与晋中相关遗存文化内涵的充分揭示，完善了我们的认识。仰韶前期，山西南部以古城东关、宁家坡、褚村等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与枣园文化--脉相承，陶器仍以泥质红陶、夹砂红褐陶为主，多见素面、弦纹，部分陶器口部仍常见不太规整的彩带，主要器类有敞口钵、大口假圈足钵形盆、壶、折沿盆、器座等，但未见尖底瓶和成熟的彩陶，这是与关中地区半坡文化前期东西并列的一支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晋中地区以太谷上土河H1[32]、娄烦童子崖F2[33]等为代表的遗存与晋南地区有较大区别，这类遗存的陶器多泥质红陶，习见素面、弦纹，但有少量宽带状纹彩陶，代表器类有敛口弦纹罐、直口钵、内折沿壶、盆等，属于后冈一期文化的基本范畴。仰韶中期，山西完全被庙底沟文化占据，代表性遗址有翼城北橄、夏县西阴[34]、大同马家小村等。该文化继承了山西南部仰韶前期的主体因素，形成过程中接受了半坡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的影响，北橄遗址一至四期遗存将该文化的形成与兴盛过程表现的淋漓尽致；西阴村遗址充分揭示了晋南地区该文化的空前繁荣，具有典型代表意义；马家小村遗存则包括有后冈一期文化的一些因素。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双唇口尖底瓶、折沿盆、敛口或直口钵、侈口或敛口夹砂罐为主要组合，盆、钵、罐等类器物上腹外饰有繁缛绚丽的彩陶图案。仰韶晚期，大一统局面被打破，晋南地区以喇叭口尖底瓶、带流器、退化彩陶为特点的西王村文化保留有较多的庙底沟文化遗风。晋中地区以太谷白燕[35]、太原义井[36]等遗址为代表的义井文化接纳了大司空文化的某些因素，具有突出的自身特色，这种分化趋势开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不同类型的先河。

山西庙底沟二期遗存早在30年代就有零星发现，但直到80年代其文化面貌才被充

分认识，90年代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阶段来研究。代表性遗址有垣曲古城东关[37]、宁家坡、丰村[38]、龙王崖[39]，侯马东呈王[40]、乔山底[41]，襄汾陶寺[42]，太谷白燕，石楼岔沟[43]等。共同的特征是陶器以灰陶为主，流行篮纹与绳纹，附加堆纹发达，以斝、鼎、釜灶、夹砂罐、小口高领罐为主要组合。该文化最初形成于晋豫交界的中条山南侧，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北传播，形成了晋西南、晋南和晋中地区不同的类型，每个类型又可划分出时间大致相当的不同阶段。其中最发达的文化分布在晋南临汾盆地，陶寺、下靳墓地[44]中墓葬规模、葬制、随葬品上的区别显露出文明时代的某些特点，我们认为这些遗存就是被先秦典籍推崇备至的唐尧部族的物质遗存，此前已较兴盛的北方文化通过晋中为该部族文化的繁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之雄踞于诸方国之首。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在垣曲宁家坡遗址发现了由两座保存完整的陶窑、窑前活动场、小路、制坯取土坑组成的烧陶窑场[45]，这是绝无仅有的重要发现，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龙山时期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50年代的专题调查和小规模试掘中，1974年起大规模发掘夏县东下冯遗址时首次确认了晋西南地区的三里桥文化遗存[46]；1979年开始发掘的襄汾陶寺遗址又确立了内涵独特的陶寺文化[47]；80年代初期和中期又先后发掘了太谷白燕、长治小神遗址[48]，从而认识了晋中与晋东南地区的龙山文化面貌；近十年来通过对长治小神、曲沃东许[49]、方城[50]、洪洞侯村[51]、翼城南石[52]、太谷白燕、忻州游邀[53]等地资料的研究，我们的认识逐渐明确。上述几个地方类型文化构成了山西龙山时期的主体，它们共同属于庞大的中原龙山文化系统，但白燕类型文化以双鋬斝式鬲、斝、甗、盉等为主要组合的特征具有北方文化特色，东下冯、古城东关的鬲、罐、双腹盆等主要器类又与豫西的三里桥文化颇多相似之处；长治地区的小神类型文化是近年具有拓荒意义的工作，它具有辉卫地区与晋南、晋中地区文化的一些因素，是一支组合独特、特征鲜明的区域文化，对该文化的认识将有助于对相关区域文化交流与汇聚的研究；陶寺文化无疑是这一时期最发达的物质文化遗存，在本地区的主体上接纳了来自周边诸文化的因素，具备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群中的中心地位，以直口肥袋足鬲、圈足罐、扁壶等众多器类为代表的特别组合，真实地反映了唐尧部族所具有的史前期文化最高水平，东许遗址找到的分期线索和侯村的最新资料，不仅扩大了该文化的研究内容，也提供了其发展兴盛的具体过程。这种多种文化并行发展的格局折射出山西作为中原与北方联接地带的民族大熔炉性质，其稳定并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与中心地位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文明时代即将到来。

三

探索夏文化是山西考古工作的重要课题。50年代末期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汾河流

域、涑水河流域进行了多次普查[34]、复查，取得了重要收获，为80年代发现“陶寺”和“东下冯”两大类型文化奠定了基础。

陶寺类型文化：主要分布于临汾、襄汾、翼城、曲沃等地。襄汾陶寺遗址[35]，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址和墓葬两部分。1978年以来主要发掘了1000多座墓。其中大型墓6座，中型墓60～70座，小型墓约1000座。陶寺墓地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阶级差别和世袭制的痕迹以及最早的礼乐制度。经^{14}C测定，其年代为：早期，B.C.2400年以上；晚期，B.C.2100～B.C.1950年。陶寺的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范围，即步入有阶级的文明时代，陶寺类型遗址早期可能与帝尧——陶唐氏有关，晚期可能是夏人的遗存。

1998年春又在临汾附近下靳村发现了大批陶寺类型的墓葬，目前正在工作中。

东下冯类型：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东下冯村青龙河畔[36]，面积约25万平方米。遗址可分为6期，其中1～4期属东下冯类型遗存。遗迹有灰坑、房子、墓葬、水井、沟槽、陶窑等。房子有窑洞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3种。遗物以陶器为主，陶质主要是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大宗，也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等。主要器形有鬲、尊、罐、盆、甑、斝、蛋形瓮等，鼎少见。时代与二里头文化1～4期基本一致，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相近，因此也可将之称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参照二里头的^{14}C测定，东下冯类型的年代大致在B.C.19～B.C.16世纪，都在夏纪年范围之内。

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的分布地点，在临汾地区有大柴、感军、曲村、南石、苇沟北寿城、单家庄、上鲁村、陈郭、刘村、西阳呈、大小苏村、安吉、东白冢、天马、张桥、西王村、北木板、西石桥等地，运城地区有阎家庄、小王、大泽、庄头、燕掌、西社、祁郭、赵村等地。

在晋中地区，文化面貌基本相同而又有地区差异的相当于夏文化的遗址有太谷白燕[37]，忻州游邀，太原狄村、东太堡、光社、许坦、一电厂，汾阳杏花村、峪道河，娄烦的何家庄，榆社台曲，孝义柳湾二十九亩地，长治小神遗址等。

商文化遗址，山西境内可以分为二里岗时期和殷墟时期两个阶段。

二里岗时期商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为：北自晋中地区起，南至黄河畔的平陆，东至长治、晋城地区。特别是在山西南部平陆前庄村、垣曲古城镇和夏县东下冯都有突破性的新发现。

平陆前庄遗址[38]，位於平陆坡底乡前庄村、黄河之滨。1990年初发现，面积约1万平方米。遗迹有半地穴式的居住址、窖穴，出土铜器有大型方鼎、圆鼎、罍、爵、斨、针，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耳瓮、瓿、簋、盆、豆、纺轮等，石器有磬、杵、镰、刀、等。还出土了有钻、灼、凿的无字卜骨。其中大型青铜方鼎的铸造具有原始性，似装配式的铸造方法。陶器的时代与东下冯遗址第6期陶器相近。

垣曲商城遗址[49]：位于古城镇南关黄河、亳清河、沇河交汇地的高台地上。1984 年发现。经钻探和发掘，古城略呈方形，周长 1470 米，北城垣在地面上清晰可见，其他只保存有城墙基槽。南、西二城墙见有双道夹墙。城外有城壕。城墙宽 2.5～14 米。在西、北、南三面城墙上有缺口，似为城门。城内中部偏东为宫殿区，有大型夯土台基 6 座，城区的东南部为一般居住区，遗迹还有灰坑和墓葬等。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灰陶为辅，器形有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等，另有少量只钻不凿的无字卜骨。南城墙东段清理了一座打破城墙夯土的小墓，出土铜鼎、斝、爵和陶鬲、盆等，时代属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证明古城址的下限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

垣曲商城是继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它位于黄河中游夏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处于豫西和晋南黄河南北的中间过渡地带，对于研究山西商代方国文化，探讨当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充分地反映出晋南、豫西两地文化面貌的明显差异，以及两种文化在这交叉地带交流融合的情况。

夏县东下冯遗址[50]：遗址晚期即 5、6 期，与郑州二里岗下层和上层基本相同，属于商代早期。

文化遗存有：1. 古城址，现仅查明了城址的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南段，城墙破坏严重，全部覆盖在商代二里岗上层文化的下面。2. 圆形建筑，位于城址内的西南角，共有 7 排，每排 6～7 座，总数大概有 40～50 座。每座直径 8.5～9.5 米，高出地面约 30～50 厘米，中间有一个大柱洞，周围有 30 余个小柱洞，台基上还有十字形排列的小柱洞，将圆形建筑分隔成四室。这些建筑复原后，侧视应呈圆锥形。此外还有窖穴和灰坑。

遗物中生产工具很多，分别为石、骨、蚌、陶、铜质。陶器以生活用具为主，陶质以泥质灰陶、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有鬲、鼎、簋、盆、罐、甗、尊、盂、钵、盘等。鬲成为最常用器，占全部陶器的 1/4，形制和郑州二里岗薄胎分裆羊角尖足鬲极为相似。鼎较少。

特点是：1. 陶器以鬲为主。2. 铜器开始使用，器类有小刀、斧、镞，还有铸铜用的石范，不仅有单器范，而且还有铸造镞、凿、斧等工具的多用范。这非常重要，证明当时已经步入青铜时代。

太谷白燕遗址[51]：位于太原盆地的东缘太行山西麓的山前缓坡地带，面积有 35.5 万平方米。其第五期文化遗存的早期属于二里岗时期。遗迹主要是灰坑。陶器陶色以灰陶为主，其次有灰褐、棕褐和红褐陶等，纹饰以中粗绳纹为主，另有少量的特粗绳纹，弦纹常见，附加堆纹减少，三角划纹增加，新出现了饕餮纹和云雷纹。器形主要流行大型侈沿深腹鬲和翻缘小鬲，与之并存的有弧腹鬲和斜腹鬲，晚期有大型直腹鬲等。制法是以筒改制成鬲。

白燕没有大型的贮藏器大口尊，而以敛口三足瓮替代。保持着与晋南二里岗时期不同的特点。

山西中部地区二里岗时期的遗址还有忻州游邀，柳林高红，太原光社、许坦等。各遗址的文化面貌不尽相同，各有特征，反映出山西中部地区夏商时期文化的复杂性。

山西殷墟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分为两大类[69]，第一类分布在晋东南地区的长子、潞城和黎城等地。这些地方与河南殷墟相邻，都出土青铜器，出土物基本上一致。可以长子北高庙商代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两座墓共出土鼎、斝、爵、甗、觚、罍、戈、镞等19件。其特点是：1. 器形多仿陶器。2. 纹饰为单层花纹带状饕餮纹。罍、觚都与郑州白家庄M3罍、觚相似。黎城、潞城出土铜器与此相仿。这一带可能是殷王朝管辖的王畿范围。

第二类是以石楼为中心的方国文化。分布范围广，地跨陕西东部、内蒙古、河北沿长城地带。所发现的遗物均出自墓葬，极为丰富，主要有富于浓厚的地方色彩的青铜器和金首饰。由于这些遗存最早发现于石楼，遗址又集中在石楼及其周围的县，文化内涵丰富，因此将其命名为石楼类型青铜方国文化。到目前为止，石楼类型的青铜方国文化中，仅在山西灵石旌介村用科学方法发掘了两座方国首领墓。

石楼类型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与殷商王朝关系较为亲密，相随征伐敌方，可以灵石旌介商墓为代表。另一组与殷王朝为敌，经常争战，可以石楼等地商墓为代表。

灵石旌介的两座商墓，均为有棺、椁的夫妻合葬墓，其西面为一个车马坑。两墓的特点是：1. 共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41件，其中有族徽"冈"者占36件之多，经考证该族徽为"丙"，所以这里应是丙方首领的墓地和丙方所在地。2. 葬式：夫妻均用棺，合葬在同一椁室内，妻子都侧身面对丈夫。有别于殷墟墓葬的情况。3. 随葬遗物分A、B两组，A组基本上与殷墟遗物相同，主要有铜蚕纹鼎、雷纹斝、饕餮纹簋、饕餮纹觚形尊、弦纹罍、提梁卣、觚、爵、觯、矛、镞、弓形器、铃，陶鬲，玉器有鱼、鸟、管、璜，石镰和骨管等。B组与北方青铜器相似，具有草原民族文化特征。主要有铜圆饼纹鼎、銎内戈、透雕纹戈、柳叶镞、兽首管状器、兽头小刀等。4. 器物组合基本是以10爵、4觚，作为身份高低的标志。

石楼为中心的青铜文化遗址，密集地分布在以石楼为中心的黄河东西两岸高原山地，仅石楼县出土地点就有19处之多。近年在山西永和、柳林、隰县、吉县、忻州、保德、右玉等县和陕西省绥德、清涧、延川、淳化、子长等县也都有墓葬出土同类型的青铜器。这类文化的分布区域，北至内蒙古鄂尔多斯，南至汾河下游的吉县、乡宁、洪洞一带，西到洛河、泾河上游，以子午岭为界，与同时期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相邻，东南以太行山脉为界。在这个范围内发现的遗存在面貌上不完全相同。青铜器也分A、B二组，A组基本上与殷墟的器物和纹饰相同。B组更富于地方色彩，器物或掺杂在器

群中，或单独成组。以石楼后兰家沟、桃花庄为代表。地方色彩主要表现在生活用具、武器和小工具上，普遍地使用铃铛和动物图案，有特色的器物如马头刀、羊头刀、虎形匕、二蛇斗蛙勺、铃首剑、长管銎钺、三銎刀、铃铎等，所饰纹饰很简单，有方格纹、斜线纹等。大件铜礼器有鼎、簋、盘、觚、觥、细颈双耳壶、饕餮纹贯耳壶、铃豆、卣、铎等，有的器形与殷墟器物的器形相似，但在器物的某一部位都有族徽或简单的铭文，有的器形不同于殷墟器物，如龙形觥、三扁足盘等。纹饰普遍用云纹、回纹、直线瓦棱纹、饕餮纹。器物组合以爵、觚或斝、觚、爵为主。墓葬中还经常出土金扁盘丝形珥饰、金弓形饰、金丝饰品等。B组墓葬出土遗物，与内蒙古朱开沟文化出土文物有许多相似之处，与长城内外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内蒙古地区距今7000～3500年间气候由暖转冷，寒冷干燥恶劣的生态环境，迫使人们由农耕转为半耕半牧，且逐步向南迁移到今山西、陕西的黄河沿岸，与当地商文化民族争夺生存环境、势力范围，由此发展成石楼类型商代方国文化。古文献中所提到的鬼方、土方的活动地区就在这一带。

西周文化遗存的研究，始终围绕着晋文化和周初始封地而展开，发掘工作集中在霍山以南的临汾盆地。近年来集中力量在曲沃曲村和翼城天马遗址及其周围的西周遗址做工作。

曲村—天马遗址[9]，1963年发现，1979年起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遗址位于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包括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自然村。面积3800×2800平方米。年代以西周早中期到春秋早期为主，其次为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遗迹遗物极为丰富。近20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晋侯墓地和晋国邦墓地上。

晋侯墓地的发掘是从1992年打击盗墓活动、进行抢救性发掘开始的。至今已在墓地发现了8组17座大墓，形制有中字型和甲字型两种。甲字型墓早，中字型墓晚。大部分有棺、椁，积石积炭。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有铜簋、壶、鼎、兔形尊、编钟、石磬等。50余件青铜器有铭文，其中部分铭文记载晋侯的名和字。

根据出土文物及铜器铭文初步推论，这些墓系自晋武侯至晋文侯八位前后相继的晋侯及夫人墓。年代大致可定在西周中期早段至两周之际。晋侯墓地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有晋侯僰、断、稣、喜父、邦父、家父等名，但关于他们排名的先后，以及与哪位晋侯名对应意见则不完全一致。1998年初于侯马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的初步意见如下表：

周王		成王	康王	昭穆	恭懿	孝夷	厉王	宣王			幽王
晋侯		叔虞	燮父	武侯	成侯	厉侯	靖侯	釐侯	献侯	穆侯	殇叔、文侯
晋墓				M9、13	M6、7	M33、32	M91、92	M1、2	M8、31	M62、63、64	M93、102
墓中出土带铭铜器						僰马	喜父	執、断	鉌	邦父	家父

出土文物中晋侯鉌钟和楚公逆钟，都有数钟合成的长篇铭文，是十分重要的文字材料。马承源同志对晋侯鉌钟的评价是："晋侯鉌编钟的铭文……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烈，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这不仅是晋侯墓地最重要的器物，也是西周青铜铭文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⑭]楚公逆钟对研究楚史、晋文化及晋楚文化关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澄清传世楚公逆镈的真伪、国别及铭文释读诸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物证。

晋侯墓中出土有数以万计的玉器，是研究晋国早期玉器的重要资料，它们既保存有商末周初的风格，也为晋国晚期玉器制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80年代在曲村村北和村西发掘了600余座中小型西周墓，这些墓属晋国"邦墓"。规模比侯墓小，分布密集，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墓道。葬具最多者为三重椁，一般为一椁一棺，规格最高的铜器墓是3鼎2簋。出土遗物有铜鼎、簋、甗、觯、爵、尊、卣、盘、匜、觚、簠、盉、鬲、盆、斝、甬钟、戈、矛、剑、镞、軎、辖、马冠、当卢、衔、銮铃、节约等。陶器有鬲、盆、豆、罐，少量的簋、大口尊、壶、三足瓮等。个别墓出土有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装饰品有玉玦、璜、璧、戈、圭、环、柄形器、鸟、兽、鱼、虫，料器，玛瑙，骨器和贝器。还曾出土宁𤔲方鼎，有27字铭文，此鼎可能是晋初周天子分封诸侯颁赐宗彝时，将战获宗庙彝器颁赐给晋国的器物。

根据考古成果和文献资料考证：曲村—天马遗址应是晋国早期都城"唐"的所在地。霍山以南，临汾地区的临汾、襄汾、翼城、曲沃、新绛等地应是唐国疆域，与《史记·晋世家》"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望相吻合。

洪洞南秦遗址，位于洪洞县东北部，包括南秦村，是西周至东周时期古文化遗址，其东西两侧是永凝堡和坊堆两个古墓群。在历年工作基础上，80年代末又在这里抢救发掘中小型古墓12座。1996年春天，洪洞博物馆曾在永凝堡征集到1件带盖双耳圈足簋，时代在两周之际，盖和器底均有铭文："㬂尚父作宝毁，子子孙孙永宝用"。《新唐书·表第十一下》："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广韵》也有类似记载，说明南秦西周遗址可能是西周时老杨国的所在地。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闻喜故曲沃"[⑮]。从70年代中期以来，对闻喜上郭邱家

庄遗址做了多次考古发掘。上郭村有周代古城址残垣，城址北至邱家庄是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古墓地，墓均为土坑竖穴，葬具有棺、椁，出土遗物丰富，主要有铜鼎、盘、匜、豆、壶、小匜鼎、编钟、石磬等。有铭文的铜器有荀侯匜、贮子匜、鼄五氏矩方甗、陈公孙寣父旅瓶等。西周晚、春秋早期的各式小匜鼎数量较多。还有1件精美的"刖人守囿"六轮挽车。

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春秋早期青铜子犯编钟12件（另有4件由私人收藏）。这些编钟据说是由闻喜晋墓中盗出的。钟上面有铭文，其中8件大小成列，铭文各异，编为甲套一组，余下4件铭文内容不完整，编为乙套，整套铭文共132字，记载了晋文公复国，并由晋文公及其舅父狐偃号子犯相从率师伐楚的史实，即《左传》、《史记》所载的晋楚间城濮之战和践土会盟，此为晋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子犯钟当是子犯墓的随葬品，是研究晋国历史、音乐理论、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物。

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遗址，经过数十年工作后，遗址面貌更加清楚，其平面布局由四部分组成：1. 宫城区，有早晚两组古城址。2. 手工业作坊区，分工明确，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大。3. 东部宗庙区及其周围祭祀遗址，包括杀殉、盟誓、杀牲等遗迹现象。4. 浍河南面的上马、柳泉两个古墓地。新田的品字形城市建筑形式是晋国城建的特点，对邯郸赵王城的城建有很大影响。

近年来，主要发掘了北部的北坞古城[⑩]和西南部虒祁宫遗址及其祭祀坑。北坞古城属于拱卫京地的大夫城。由相邻的东西二城构成，方向15度，西城近方形，边长380米，城墙宽4～5米。东城为长方形，长580米，宽530米，城墙宽8～10米。两城相距10米。两城均有夯土遗迹。东城西南部有三座并列的仓库类建筑。东城西部为居住区，有小型建筑、窖穴、灰坑等。

虒祁宫遗址目前正在工作中，已发掘了一大批宫址附近的祭祀坑，内有牛、马、羊等牺牲。

1987年以来，我们在太原南郊晋阳古城附近清理东周墓地，并发掘了晋国赵卿墓。后我们又在东侧发掘了一批东周墓，其中4座规模略比赵卿墓小，其主墓室出土遗物有大铜鼎、莲瓣盖圆壶、镶嵌红铜鸟兽的圆壶、扁壶、罍，乐器有大编钟以及一组8件小编钟，另有1件硕大的圆形建鼓架座，饰高浮雕蟠螭纹。还有几组冥器编钟，制作简陋、粗糙。另有车马坑，长方形，规模略小，分车库和马厩两部分，车库内一般是放6辆木车，形制同赵卿墓的木车。马厩安放马20余匹不等。这批古墓的时代属战国早、中期。这批墓葬位置均在赵卿墓的下方向，器物的时代比赵卿墓的略晚，估计墓主都是赵卿的后代。所以该墓地应是晋国赵氏家族墓地。

进人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近十年来在榆次猫儿岭墓地、夏县禹王城为配合基建工程做了很多工作。

在榆次猫儿岭主要是清理了一批战国到汉代的小型墓葬，出土陶器主要有鼎、豆、盖豆、壶、匜、盒、高柄壶和彩绘陶器。近年出土了一大批鎏金或包金的铜带钩，有竹节形、琵琶形、动物形等，其中动物形的形态各异，是战国时期的艺术精品。

夏县禹王城，在城区内主要做了大量普查工作和少量试掘。在城区内，庙后辛庄村之北，有一片保存较好的古代冶炼铸造作坊。遗存有大量铁渣和含铁质琉璃烧结物。遗物有锛、锄、刀、镢、斧、构件和货币等的范。范呈鲜土黄色、坚硬。有许多范是一器一范，或二器一范。还有锄模。货币范是一范铸两个钱币，一个半圆形浇铸口，分二道各铸一个平首布。无论浇铸技术、制范技术都比侯马晋国铸铜技术有很大进步。

山西中部滹沱河流域的代县城关，原平刘庄、塔岗梁、峙峪、东社，忻州忻口[67]、上社、奇村，定襄中霍村和昔阳闾庄、大寨、东冶头等的一批墓葬，有别于中原地区。其特点是：1. 墓室均用石椁，较大的墓分前后室，或石砌壁龛。夫妻合葬在同一墓室。2. 春秋时期古墓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鼎、豆、壶、甗和豆形器，少量的青铜小刀、车马器。战国时期除继续随葬铜鼎、豆、壶、甗外，大量随葬陶鼎、豆、壶、筒形器、盘、匜等，忻州奇村、上社墓地每墓放置黑色泥质陶多达 20～30 件。3. 器形都与晋式铜器不同，鼎、豆、壶、甗都与河北中山国相似，经常伴出有内蒙古草原地区常见的鹤嘴锄、兽头刀、剑、有銎斧、豆形器等。还有金丝盘条珥饰、串珠、泡和绿松石串珠、玉串珠。铜器纹饰主要有勾连纹、乳丁蟠螭纹、乳丁蟠虺纹等。参照文献和河北中山地区出土文物，这些墓应属于山西东周时期戎狄文化的墓葬。

四

从秦汉起，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正式建立，中华民族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中，是统一的文化因素逐渐增多。但是，山西由于特殊地理自然条件所决定，在秦汉及其以后遗址墓葬中，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儒学与宗教的交互影响渗透及区域文化的色彩均表现得比较浓厚。

山西境内秦汉时期的重要遗址有夏县禹王城，即古安邑，也是秦汉河东郡治，为数百年来中原的历史名城。文化堆积丰富，遗址总面积达 13 平方公里。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庙四个部分。从 60 年代至今，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多次在此调查勘探。90 年代，还对小城和中城进行了试掘。发现的遗迹有各类灰坑、陶窑、半地穴式工作面、水井、道路等。出土遗物有陶器、砖瓦、货币、铁渣、炉壁残块、炉渣和鼓风管残片，还出土了大量的农具和手工工具以及少量陶范和陶模。有的范上印有阴文“东三”二字，当为汉代河东郡官府作坊之标记。其时代除所出叠铸范为东汉的之外，大多为西汉遗物。考古工作者还在这里采集到多种货币范，如汉代半两钱范和王莽时期的“大泉五

十”范。范有石质、泥质、铜质之分，说明手工业作坊在禹王城内占有很重要的位置[68]。

较重要的秦汉时期墓葬有榆次王湖岭墓地[69]、平朔汉墓群[70]、浑源毕村汉墓群[71]、孝义张家庄汉墓群[72]、平陆枣园汉代壁画墓[73]、晋南汉空心砖墓[74]和壁画墓[75]以及吕梁山地区的汉画像石墓。1990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右玉县善家堡鲜卑族墓地，清理墓葬23座，均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出土文物413件（组），种类有容器、酒器、农具、日常用具、兵器、装饰品等，分陶器、铁器、铜器、金器、骨角器和玉石器，时代当为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其中以戳刺纹大口罐、铁刀、铁矛、弧形骨器、铜带扣、双耳铜镀、骨角器居多，与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物所反映的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有明显的共性[76]。

90年代以来，在吕梁地区离石、柳林等地又陆续发现并发掘了一些东汉画像石墓，皆为砖石混砌墓。画像石均为砂岩质页岩。都是在预制的石材上经过磨平，由画工用墨线勾勒出物像后，再由石匠雕刻成浅浮雕作品。内容以表现墓主门第身份的车骑出行及羽化飞升、仙禽神兽等为主。年代集中在东汉桓帝、灵帝年间[77]。

北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都近百年，北齐时，晋阳（今太原市）因是高欢丞相府所在地而成为北齐的政治中心，因此，山西有许多北朝文化遗存。较重要的有平城遗址、方山遗址、永固陵[78]、云冈石窟、北魏司马金龙墓[79]、北齐库狄迴洛墓和东安王娄睿墓等[80]，出土大批文物，尤其是在司马金龙墓和娄睿墓发现的木板漆画和壁画更为珍贵，库狄迴洛墓中的一件鎏金铜瓶与日本群马县观音山古坟出土的金瓶形状相似，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1988年，配合大同电焊器材厂扩建工程，我省的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大面积的北魏墓群，共发掘墓葬167座，出土陶、铜、金、银、铁、玉、木等各类器物1088件（组），其中玻璃碗、铜镀及鎏金刻花银碗很有代表性，而且玻璃碗和鎏金刻花银碗很可能是同时期的波斯产品，对研究当时的“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皆很有意义[81]。

90年代以来，在大同和太原等地，还陆续发掘了一批北朝墓葬[82]，在全省各地还发现不少造像石刻[83]，在灵丘县还发现了北魏文成帝时的《皇帝南巡之颂》碑[84]。

1992年起，配合云冈石窟“八五”保护维修工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对窟前地面遗址进行全面清理发掘，揭露面积4000余平方米，清理出石砌河坝遗迹1处，建筑遗址4处，出土北魏至辽金的石雕造像、建筑物件、石器、陶器、瓷器、铁器、钱币等2000余件，初步探明了窟前遗址的发展脉络[85]。

1995年，在大同市发现北魏定都平城时的明堂辟雍遗址，经钻探与发掘表明，该遗址平面呈圆形，直径达290米，明堂位于遗址中央，是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43米，外围是环形水沟，即辟雍，周长约900米，宽6～15米，深1.4米，皆用沙岩块石砌

壁。出土遗物主要是建筑构件，如槽纹砖、板瓦、筒瓦等，有的筒瓦上有刻划文字和戳记。该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寻找北魏京城的城垣和中轴线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坐标[86]。

山西境内发现的隋代墓葬不多，有明确纪年的墓在80年代发现2座，一座为太原斛律徹墓[87]，一座为汾阳梅渊墓[88]。隋代遗址发现的有“绛守居园池”和“汾阳宫”遗址，1992年，山西省考古所对前者进行发掘，发现有砖瓦、础石、路面和“子午梁”等遗迹[89]。

新中国成立以来，唐代墓葬在山西时有发现，以太原和长治地区较多，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类。壁画砖墓是太原地区唐墓的一大特点，如新董茹村赵澄墓[90]、金胜村唐墓群[91]、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92]等。均是于墓室四壁和棺床边缘抹一层0.3～1厘米的白灰泥皮、上施彩绘。墓顶壁画中常见的内容有挽结的花幔，日、月、星象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墓壁壁画常见内容有侍卫、侍女、女童、文吏、牛车、马夫、驼马人物和树下老翁等。其中树下老翁图较普遍，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

长治地区有明确纪年的唐墓较多，已发表资料的有唐调露元年王深墓[93]、显庆四年范澄夫妇墓[94]、开元四年长征墓[95]、永昌元年崔拏墓[96]、天授二年冯廓墓[97]、长安四年王义墓[98]、景元元年李度墓和贞元八年宋嘉进墓[99]、大历六年王休泰墓[100]、文明元年乐道仁墓和仪凤四年乐方士则墓[101]、大中三年郭密墓等[102]，这些墓中都有记载墓主人身世地位的墓志，同出土的还有丰富的陶制俑类、模型明器、生活用具、瓷器、三彩器、铁器、钱币等随葬品。

1995年，在万荣县皇甫村发掘一座大型唐墓。该墓由墓室、甬道、天井、过洞、壁龛、墓道组成，墓室为砖砌，穹隆顶。葬具仅存一石椁，石椁整体如一庑殿顶之房屋形状，由10块石板间10根石倚柱相接而成。石板内外皆雕刻有供侍人物、门、直棂窗等图案，倚柱内和石椁底座上雕有多种花草鸟兽，皆为唐代石刻艺术佳作。随葬品有铁器、铜器、陶瓷器、陶俑、墓志等。据墓志，墓主为唐驸马都尉薛儆。此墓是山西发掘规模最大的唐墓，文化面貌与西安地区的大型唐墓有较强的一致性[103]。

近年来，五代十国时期的墓葬在山西也发现一批，有纪年墓和无纪年墓两种，砖室墓墓室平面近圆形，有的墓室有壁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勗之父李克用之墓。

唐代遗址在山西较重要的有永济蒲津渡遗址和黄河古栈道遗迹。1991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开始发掘永济蒲津渡遗址，发掘出唐代所铸铁牛4尊，每牛由一铁人策之，面向西，分南北两排前后站立，又各以矩形台面河卵石围固。四尊铁牛中间，又有南北排列的铁山两座。另有3个圆柱形铁墩。铁牛身长约3米，高1.9米，形体矫健强壮。铁牛尾后有锚，腹下有山，其下有6根径粗0.4、长3米多的铁柱斜向前插入地下，功同地锚，非常稳固。在遗址东北部，还清理出7根高约3米、径粗0.4米的大铁柱，分布

形式为北斗七星状。此外，这里还发现房屋、明代石堤等遗迹，出土唐、宋、金诸朝代的钱币。该渡口遗址是我国唯一经过发掘的古渡口遗址，它的发现，对历史地理、水文地质、桥梁交通史、冶金科技史及黄河变迁史的研究，都是极有价值的[illegible]。

1997 年，配合小浪底水库建设工程，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垣曲、夏县、平陆三县黄河沿岸地段，共发现和勘测黄河古栈道遗迹 5000 余米。发现方形壁孔、牛鼻形壁孔、桥槽孔、底孔 2600 余个，立式转筒遗迹 20 余处，历代题记和石刻画 40 余处，经初步研究，古栈道历代都有修建，始建于汉代，繁盛于唐代，唐以后走向衰微[illegible]。它的发现为研究黄河航运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宋、辽、金考古在山西也很可观，遗迹主要有墓葬、塔基地宫和窑址。宋墓在太原、晋城、长治、忻州、运城等各地市均有发现，分土洞墓、砖室墓、罐葬墓三种[illegible]，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仿木结构建筑的砖雕墓。宋代是砖雕墓滥觞之时期，在晋城南社[illegible]、沁水县[illegible]、长治壶关[illegible]都发现有宋代砖雕墓，砖上雕有二十四孝图、人物图、牧牛图、楼阁图等。1993 年和 1995 年，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在临猗县清理了 2 座被盗的北宋塔基地宫，出土石函、银棺、舍利瓶、宫碑、银净瓶、石雕佛像、铜镜、瓷瓶、瓷炉等，碑和石函上分别有北宋熙宁和嘉祐年题记[illegible]。

辽与宋曾在山西并峙。辽墓在大同、朔州等地均有发现，多为砖室壁画墓。在大同卧虎湾 3 号墓，出土“净法界真宫碑”和刻写有“陀罗尼”的石棺[illegible]。1991 年，在朔州又发掘一座辽壁画墓，壁画有骑马出行图、驼车归来图、供奉图、备宴图和散乐图等[illegible]。

山西金代墓葬分土坑竖穴墓、土洞墓和砖室墓三种，后者主要为仿木构建筑的壁画墓与砖雕墓。新发掘的壁画墓以大同金墓[illegible]和平定金墓[illegible]为代表，两地有关乐舞杂剧的壁画资料都很有价值。金代砖雕墓又有发展，其建筑和砖雕技艺更为精美，如侯马 102 号金墓前室北壁中砌有山华朝前的五脊六兽、单檐歇山顶仿木构门楼[illegible]，稷山 4 号金墓北壁单檐歇山顶门楼及左、右次间的雕花格子门[illegible]，稷山马村 8 号金墓南壁下的双层须弥座，须弥座上的单檐、重檐及四周的回廊勾栏[illegible]，皆以特制砖精雕而成，再现了木构古建的精丽雄浑。砖雕内容也更丰富，具体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妇人半掩门”、杂剧表演、戏剧舞台、民间乐舞、八仙人物、体育活动、二十四孝、家居生活、亭台楼阁、仙禽猛兽、花草树木、历史故事等。其中许多与戏剧内容有关，如 1995 年发掘的侯马天德年金墓和大安二年金墓[illegible]，稷山马村金墓 M1、M4、M5[illegible]，闻喜小罗庄金墓[illegible]，寺底金墓[illegible]，新绛三林镇金墓[illegible]，范庄金墓[illegible]，襄汾荆村沟金墓和上庄金墓[illegible]，南董村金墓[illegible]，皆有戏剧砖雕、伎乐砖雕或民间散乐砖雕。

金墓中随葬品不多，但有些很有特色，如在稷山马村 M4 四壁回廊下陈列的一套二十四孝故事立体雕塑，造型生动，是难得的艺术精品[illegible]。另在离石马茂庄金正隆四年墓

内，出土1件魂塔，泥质灰陶，彩绘，由6件个体组成一套[16]。类似的魂塔在保德、繁峙、苛岚、五寨等县也有出土，反映了佛教对葬俗的影响。

元代墓葬在山西有几种类型，一是土坑墓，二是继承宋金遗风的仿木构砖雕壁画墓[17]，三是仿木构石室壁画墓。如交城洪村乡裴家山村元代石砌八角叠涩顶单室墓，四壁和拱眼壁绘主人起居图、出行图、侍酒图、回归图、燕居图、孝子图等，西北壁刻“至正十六年三月吉日建”[18]。

山西省为我国古代北方重点产瓷区，见于历代文献记载的就达30多个县，在中国古代陶瓷手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60年代末，山西仅发现、报道了2处窑址，70年代至今，又发现了60～70处古窑址，有的陶瓷品种在古代中国居领先地位，例如经试掘，长治八义窑的彩瓷，品种多，色彩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规模最大、时间较早的彩瓷生产地[19]。浑源窑，是目前国内仅见的烧造镶嵌青瓷的窑址。介休窑的白瓷，经科学测试，白度高于同时期的名窑——定窑的产品。此外交城窑的花瓷、霍州窑的白瓷，都是较为有名的。

（执笔：张庆捷、石金鸣、陶正刚、薛新民、孟耀虎）

注 释

① 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② 张森水：《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17卷第2期。

③ 贾兰坡、王建：《上新世地层中应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文物》1982年2期。

④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匼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科学出版社，1962年。

⑤ 邱中郎：《匼河文化遗址的时代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3期。

⑥ 陈哲英：《独头村旧石器的发现与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⑦⑪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3期。

⑧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贾兰坡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4期；吴茂霖：《许家窑遗址1977年出土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3期；吴茂霖：《许家窑人颞骨研究》，《人类学学报》1986年3期。

⑨ 陈铁梅等：《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的铀子系年代序列》，《人类学学报》1984年3期。

⑩ 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⑫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1期。

⑬ 陈哲英：《陵川塔水河的旧石器》，《文物季刊》1989年2期。

⑭ 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考古学报》1978年3期。

⑮ 王向前、丁建平、陶富海：《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1983年2期。

⑯ 解希恭、阎金铸、陶富海:《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3期。
⑰ 李壮伟、王志刚:《山西榆次大发地点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2年4期。
⑱ 《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17日第一版。
⑲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3种,1927年。
⑳ 董光忠:《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师大月刊》第三册,1933年,北平。
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晋南和吕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㉒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枣园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文物季刊》1992年2期。
㉓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调查资料。
㉔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沁水、阳城两县新石器遗址》,《文物季刊》1994年3期。
㉕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1期。
㉖ 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1期。
㉗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北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季刊》1993年4期。
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遗址》,《文物季刊》1992年3期。
㉙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褚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季刊》1993年2期。
㉚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山西垣曲古城东关仰韶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7期。
㉛ 宋建忠、薛新民:《垣曲县宁家坡遗址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8日。
㉜ 张忠培、乔梁:《后冈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3期。
㉝ 晋中考古队:《山西娄烦、离石、柳林三县考古调查》、《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文物》1989年4期。
㉞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㉟ 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第一地点发掘简报》,《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3期。
㊱ 戴尊德:《太原义井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61年4期。海金乐:《晋中地区仰韶文化研究》,《山西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㊲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1982~1984年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6期。张素琳、佟伟华:《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集刊(5)》,科学出版社,1987年。
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龙王崖遗址的两次发掘》,《考古》1986年2期。
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侯马东呈王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1年2期。
㊶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市乔山底遗址的发掘》,《文物季刊》1996年3期。
㊷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5年2期。
㊹ 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2期。

[4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垣曲宁家坡烧陶窑址》，《文物》1998年10期。

[46] 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1期。

[4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山西省长治小神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1期。

[4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博物馆：《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曲沃方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4期。

[5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洪洞县博物馆：《洪洞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3] 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4期。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6）》。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高天麟：《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汇报》，《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1985年11月，侯马。

[56][60][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57][61] 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3期；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狄村、东太堡出土的陶器》，《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

[58] 卫斯：《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物》，《文物季刊》1992年1期。李百勤：《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4期。

[59] 佟伟华：《山西垣曲古城文化遗址的发掘》，《晋文化座谈会纪要》，1985年11月，侯马。

[62] 陶正刚：《山西出土的商代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63]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34期，1998年3月25日。

[64] 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七期。

[65]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中华书局；朱启新：《关于子犯编钟的讨论》，《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31日；张光远：《故宫新藏春秋晋文称霸"子犯和钟"初释》，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总145期）。

[66] 山西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15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67] 陶正刚：《山西东周戎狄文化初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论文集》（排印中）。

[6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张童心、黄永久、王在京：《禹王城地坑式陶窑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198～2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69] 王克林：《山西榆次古墓发掘记》，《文物》1974年12期。

[70] 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6期。

[71] 山西省文管会：《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文物》1980年6期。

[72] 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7期。

[73] 杨陌公、解希恭：《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9期。

㉔ 王寄生：《闻喜西官庄汉代空心砖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襄汾县博物馆：《襄汾县南寨汉空心砖墓》，《文物季刊》1993年1期。

㉕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地区文化局、夏县文化局博物馆：《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壁画墓》，《文物》1994年8期；运城行署文化局、永济市博物馆：《山西永济上村东汉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7年2期。

㉖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胡生：《山西省右玉县善家堡墓地》，《文物季刊》1992年4期。

㉗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离石县文物管理所：《山西离石马茂庄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92年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离石再次发现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96年4期。

㉘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

㉙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㊵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⑧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8期。

⑧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12期；李学文：《山西襄汾出土东魏天平二年裴良墓志》，《文物》1990年12期；常一民：《太原神堂沟北齐贺娄悦墓整理简报》，《文物季刊》1992年3期；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8期；王银田、韩生存：《大同市齐家坡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1期。

⑧③ 晋华：《山西寿阳出土一批东魏至唐代铜造像》，《文物》1991年2期；运城地区河东博物馆：《山西运城柏口窑出土佛道造像碑》，《考古》1991年12期；穆盛荣、杨纯渊：《山西昔阳出土一批北朝石造像》，《文物》1991年12期；卫斯：《山西平陆出土北魏至隋佛教造像》，《文物季刊》1993年4期；王睿、吕辑书：《山西垣曲县宋村发现西魏造像基座》，《文物》1994年7期；李竹林：《山西运城发现北周刻石题记》，《文物》1995年12期。

⑧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12期。

⑧⑤《云冈窟前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16日。

⑧⑥ 刘俊喜、张志忠：《大同发现北魏明堂辟雍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21日。

⑧⑦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10期。

⑧⑧ 山西省博物馆、汾阳县博物馆：《山西汾阳北关隋梅渊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10期。

⑧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257～26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⑨⓪《太原市西南郊新董茹庄唐墓》，《山西文物介绍》十五。

⑨① 沈振中、吴连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发现唐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6期；李奉山、沈振中：《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8年8期；戴尊德：《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9期；边成修：《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考古》1960年2期；侯毅、孟耀虎：《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12期；侯毅：《太原金胜村555号唐墓》，《文物季刊》1992年1期。

⑨② 宁立新、马升：《太原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12期。

⑨③ 杨富斗：《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5期。

⑨④ 侯艮枝、李奉山：《长治县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6期。

⑨⑤ 王秀生、丁志清：《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8期。

⑨⑥ 王进先：《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年8期。

⑨⑦ 侯艮枝、朱晓芳：《山西长治唐代冯廓墓》，《文物》1989年6期。

(98) 山西省文管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2期。

(99) 侯艮枝：《长治市西郊唐李度、宋嘉进墓》，《文物》1989年6期。

(100) 沈振中：《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8期。

(101) 沈振中、李奉山：《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9期。

(102) 王进先、朱晓芳：《山西长治县郝家庄唐郭密墓》，《考古》1989年3期。

(10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薛儆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7年3期。

(10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273～27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5) 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8期。

(10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279～28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7) 晋东南文物工作站：《山西晋城南社宋墓简介》，《考古学集刊》1981年1期。

(108) 李奉山：《山西沁水县宋墓砖雕》，《考古》1989年4期。

(109) 长治市博物馆、壶关县文物博物馆：《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文物》1997年2期。

(110) 乔正安：《临猗县仁寿寺北宋塔宫地基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1期；临猗县博物馆：《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3期。

(111) 张秉仁：《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年8期。

(1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朔工作队：《朔州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2期。

(113)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4期。

(11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平定宋、金壁画墓简报》，《文物》1996年5期。

(11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

(116)(117)(1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稷山马村4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4期。

(1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期。

(1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两座金代纪年墓发掘报告》，《文物季刊》1996年3期。

(1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闻喜县博物馆：《山西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8期。

(122) 闻喜县博物馆：《山西闻喜寺底金墓》，《文物》1988年7期。

(123) 杨富斗：《山西新绛三林镇两座仿木构的宋代砖室墓》，《考古通讯》1958年6期。

(1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期。

(1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襄汾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10期。

(126) 陶富海：《山西襄汾县南董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8期。

(127) 商彤流、王金元：《离石马茂庄发现一座金墓》，《文物季刊》1994年1期。

(12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乔村金元墓》，《文物季刊》1996年3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市区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6年3期；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3年2期；王银田、李树云：《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2期。

(129) 商彤流、解光启：《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石室墓》，《文物季刊》1996年4期。

(13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文物季刊》1998年3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

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我国北部，属于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南北方文化融汇的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一 史前考古

内蒙古地区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大致起自公元前4世纪初，在此以前漫长岁月的历史，都属于史前史。因此，内蒙古的史前史，包括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种划分方式，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时代考古，基本上属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内蒙古地区则将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入了史前考古学的范畴。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方面的重大成果，是70年代在呼和浩特市郊大窑村南山发现了距今70万年前的旧石器制造场。1976年在大窑村二道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层发掘中，出土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手斧、石锤、石球等石器，还出土有普氏羚羊和鹿骨化石。由于这里出土的龟背形刮削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独特的特征，因而命名为“大窑文化”。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在大窑村南山四道沟进行发掘，发现了典型的地层剖面，共分为7层。第4层至第7层为红色土层（离石黄土层），形成于更新世中期。在第4层底部发现有肿骨鹿化石，以及远古人类打制的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石刀、石核等，其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经科学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0.3万年。在第3层发掘的石制品，其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在第2层发掘的石器，则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窑村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是内蒙古地区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它不仅填补了内蒙古旧石器时代的空

白，而且也为研究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除大窑村遗址外，还在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距今约5万年至3.7万年），以及“河套人”化石。在呼伦贝尔盟扎赉诺尔，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的“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等，其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此外，在阿拉善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呼和浩特、赤峰等地，也发现若干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历史发展情况不同，内蒙古地区有两大区域古代人类活动频繁，一是内蒙古东南部的西辽河上游及大凌河支流地带，二是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山岳地带。经过考古人员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已基本上弄清了这两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发展情况，为初步建立内蒙古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搭起了时空框架。

在内蒙古东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最早的首推以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赤峰林西县白音长汗村则发现了这一文化的另一种类型。继后是以敖汉旗赵宝沟聚落遗址为代表的赵宝沟文化。以赤峰红山后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以巴林左旗富河沟门聚落遗址为代表的富河文化。在赤峰附近发现了继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发现不多，有学者称之为小河沿类型。这些考古学文化早到距今8000年左右，晚到距今约4000年左右。

兴隆洼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1.5公里的台地上。1983～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4次发掘，共揭露房址80余座（均为半地穴式），最大的房址面积为140平方米。兴隆洼遗址的陶器，以大型夹砂直筒罐为主，饰压印“之”字纹、篦点纹和交叉划线纹等。石器以锄形器为主，骨器也很发达，还出土有石雕人头像等石刻。在遗址中，首次发现有碧玉玦，经科学测定年代，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年左右，是内蒙古及东北各省中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了稀世珍宝——红山文化碧玉龙。这件玉龙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其时代为距今5000余年的红山文化时期。玉龙为墨绿色，高26厘米，为猪首蛇身，蜷曲若钩，长吻休目，长鬃高扬，显得极有生气，令人感到神秘而敬畏。

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敖汉旗小河沿乡和翁牛特旗石棚山等地，发现了著名的“小河沿文化”，在其中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划纹、几何纹、原始文字符号、抽象动物花纹等。特别是神秘的原始文字符号，在我区当属首次发现，它比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原始文字符号更为发达，虽然它仍类似图画，却已经显示了象形文字的雏形。

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现有以乌兰察布盟凉城县王墓山下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称为王墓山下类型，其年代约距今6000年左右。有以黄河流域托克托县海生

不浪遗址为代表的海生不浪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发掘了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庙子沟和大坝沟两处遗址后，进而发现了环岱海、环黄旗海周围山地都分布有同时期遗存，学术界称之为“庙子沟文化”。在凉城县老虎山遗址，还发现与包头郊区阿善遗址相同的聚落遗址和石围墙，命名为“老虎山文化”。

在内蒙古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发现的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以及星罗棋布的原始聚落遗址，说明内蒙古地区的先民们在新石器时代，为缔造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过去，总有人认为内蒙古是荒凉的游牧之地，而实际上，内蒙古地区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4000余年的老虎山文化，曾经有过发达的原始农业文化，当时的气候湿润温暖，植被繁茂，雨量充沛，适于农业。因而，原始先民们制造石锄以开垦土地，种植粟米以供生计，烧制陶器以供炊煮，建造房屋、挖掘窑洞以供居住，还开挖围壕、垒砌石城以供防卫。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原始农业文明。后来，由于内蒙古地区古代气候逐渐由温暖变为干冷，原始农业才逐渐南移，农牧业交错、因地制宜的经济形态渐渐形成主导经济，这种形态即是今天的经济特点之一。

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工作，始于60年代。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内蒙古工作队”。1960年4月，该队在赤峰市郊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进行发掘，发现了位于辽河上游地区两种时代和文化性质都不相同的青铜时代文化，经研究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至前1500年之间。主要分布于辽西、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其陶器的特点明显，以青灰色为主，手制、泥条盘筑，火候较高，而彩绘陶器多出土于墓中。它的居住址很大，形成规模，多位于沿河两岸的高地，周围有围墙和壕沟，门向东南开。其墓葬都发现在居址近旁，很有规模，多达千余座，排列密集而有规律，青铜器有鼎等礼器。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有：60年代在赤峰克什克腾旗和赤峰郊区出土的弦纹青铜甗；1974～1980年在敖汉旗大甸子发掘的大批古墓，共计804座，出土了极为丰富的陶制礼器和部分铜器、骨器等；1981～1984年在赤峰翁牛特旗头牌子出土的4件大型青铜器（为1甗3鼎）；1987～1988年在赤峰宁城县三座店遗址发掘出的91座房屋遗址。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000至前300年，属东胡（山戎）文化，主要分布在赤峰、哲里木盟以及辽西、河北北部。该文化的青铜器种类繁多，以工具、武器、饰件为最多，在器柄上常铸有动物纹，以青铜短剑最具特色，剑身是直刃的，也有曲刃的。居住地大部分在临河两岸的高地上。墓葬排列有序，随葬器物十分丰富。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有1985年春在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村发现的大型贵族墓。该墓出土文物达800余件，其中青铜器品类繁多，内容丰富，铸工精致，包

括青铜礼器、武器、工具、车马具以及各种牌饰。此外，在宁城县南山根第101号大墓中，也出土青铜器等文物500余件。这些大型贵族墓及丰富的随葬品，说明在今宁城地区，与战国的燕国为邻的地方，曾是东胡民族建立强大邦国的地区之一。对于其青铜器来源的考古发现，也取得了重要成果。1976年，在赤峰林西县大井村，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铜矿遗址。这个铜矿包括露天开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艺的遗迹，共发现矿坑40余个、炼炉8座以及许多陶制鼓风管、陶范和炼渣，还有1500余件开采铜矿的工具，如石锤、石镐、铜凿等。

内蒙古中南部的青铜时代考古，经过正式发掘的，先是由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大口村发现了大口二期文化遗存，继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以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大口遗址是1962年发现的，1973～1983年发掘5次，这是一个龙山至夏商文化的遗址。大口一期文化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大口二期文化相当于中原夏或早商文化。大口二期文化的生产工具中有大量的石器和骨器，陶器有袋足瓮、甗、大口尊，多为瓮棺葬具，器形高大，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或郑州二里岗文化相近，正是夏或早商时期。

朱开沟遗址发现于1974年，此后经过4次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1300余件，时代分为龙山文化晚期、夏代和早商3个时期，由于资料丰富，因而更能反映内蒙古中南部夏商文化的特征。在朱开沟文化第5期遗存内，发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戈与青铜刀，从而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时代上限上溯到二里岗文化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经多次发掘判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是属于商周时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遗存，其时代下限晚到距今2500年。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比西方斯基泰文化早1000年，它可能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创造该文化的民族，可能是对中国史及至世界史有过深远影响的中国北方狄－匈奴族。

二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考古

考古发现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一直生息在今内蒙古地区。大致而言，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在春秋时统称为狄人或北狄；战国时期称为匈奴、林胡、楼烦等。对这一时代的考古发现，以1972～1973年在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沙窝子中保护征集的一批匈奴王族金银装饰品最为珍贵。其中金饰件为218件，银饰件5件，主要有鹰形金冠饰、金冠带、大型虎牛争斗纹金饰牌、虎纹和羊纹饰件、鸟纹金扣、金项圈、刺猬、兽头形金饰件以及狼鹿纹银饰牌、银虎头饰件等。金、银饰件大都是半浮雕或圆雕的动物形图案，制法有铸、压、锤打及抽丝等工艺，细致入微地塑造出打斗、站立、蹲踞、静卧等各种动物造型。被文物专家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的金制鹰形冠

饰，是我国迄今所发现唯一的匈奴王金冠饰。它由1件鹰形冠饰和3件冠带组成。金冠为半浮雕狼、羊咬斗图案的半环面体，顶部傲立1只由金片制成的展翅雄鹰，鹰的头部、颈部镶嵌两块绿松石，头尾均以金丝连接鹰身，稍有触动，雄鹰就会左右摇头摆尾。冠饰上部为雄鹰展翅俯视狼与羊，想象力十分丰富。金冠带是由3条圆形金条组成，每条冠带左右两端均有半浮雕状的虎、盘角羊、马等动物图案。鹰形金冠饰配上金冠带，共重1394克，是匈奴王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1973年在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沙窝中发掘的6座匈奴墓，是内蒙古地区首次发掘的早期匈奴墓。从墓中出土的文物有青铜短剑、铜鹤嘴斧、小铜锤以及铜饰件。从发掘情况看，当时匈奴人死后，挖一长方形坑，把尸体及随身佩带的物品一起埋入，再将死者生前用过的各种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品放到里面，最后割取牲畜的头、蹄殉葬，以表现死者生前的富有。这反映了早期匈奴人特殊的埋葬习俗，构成了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显著特点，为内蒙古地区匈奴考古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

秦代，云中郡城、九原郡城均沿用战国旧城，广衍县（上郡辖）城址，在今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秦代的秦人墓葬，有1975年在准格尔旗秦代广衍县城址附近发掘的14座秦墓。其中，有10座为屈肢葬，随葬品有陶器、铜器。在铜戈上发现刻着秦小篆“十二年，上郡守寿造，漆垣工师乘，工更长骑”及“洛都”的铭文。秦代由咸阳修到九原郡（今包头、巴盟前旗一带）的“直道”遗迹，也于1974年在东胜漫赖海子乡发现，其路基断面明显，路面宽达22米，秦直道的发现，有助于研究秦代交通及中原地区与北部边疆的联系。

对于汉代考古，几十年来，在全区境内发现并勘测了近百座汉代古城遗址，这些两汉时期的郡县古城遗址，反映了当时开发建设北部边疆的情况。例如：1973～1974年，在伊克昭盟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址中，出土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泥质钱范及“中营司马”、“西河农令”等官印，证明该城为汉代西河郡所在地。再如：1972～1976年，考古人员为配合乌兰布和沙漠农田开发，调查了汉代朔方郡的3座县城遗址，试掘了有名的鸡鹿塞。1992～1995年，又在这一地区发现大批的汉墓，确认这些汉墓都是汉代朔方郡屯田将士和平民的墓葬。

在汉代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72年在和林格尔县发现的东汉壁画墓。墓主人为东汉中央政府派往边地的“护乌桓校尉”，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及3个耳室构成，为穹庐顶多室砖墓。墓内共绘有彩色壁画50多幅，是一组榜题最多、构图丰富完整的壁画。这座墓虽早年被盗，但各室壁画保存较好，它生动地描绘了死者生前历任的官职，以及当时各族人民群众的形象。壁画中还绘有牧马、牧牛、放羊、农耕、园圃、采桑、沤麻、捕鱼、狩猎等场面，以及舂米、酿造、厨役等家内劳动；城市、庄园建筑、手工业作坊、官署、庭院、学校、市场、粮仓、桥梁、关隘等，

有些还标着名称，如“居庸关”。在描绘社会生活的壁画内容中，有车骑、乐舞、百戏、筵宴，以及衣冠、祥瑞、历史故事等，堪称东汉时期的社会缩影。

由我区考古人员最先确认的汉代鲜卑人的墓葬，是1959～1960年在呼伦贝尔盟呼伦湖畔发掘的扎赉诺尔古墓群，以殉葬马、牛、羊等牲畜，随葬红褐陶罐、狩猎纹骨板、鱼骨串和马弭为特征。以后，又在陈巴尔虎旗完工、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察右后旗三道湾等地，陆续发现了此类文物。这些发现表明，鲜卑族曾在东汉时期游牧于东部草原，以后随着势力的增长，逐渐向西迁移，最后到达了匈奴故地（今阴山河套地区）。

三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考古

在魏晋南北朝考古中，较重要的发现，有1991年在伊克昭盟乌审旗出土的赫连勃勃大夏国纪年墓志铭，这是十六国时期文物的首次发现，十分珍贵。特别重要的发现，是1980年7月由我区考古工作，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嘎仙洞石壁上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到先祖石室祭祀祖先的石刻祝文。祝文隶书汉字19行，共计201字，与《魏书》所记内容基本相合，证实了嘎仙洞即是北魏王朝的创建者——拓跋鲜卑人的发祥地（即先祖石室），从而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拓跋鲜卑起源地的重大课题，对于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以及古代北方民族历史地理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在南北朝时期，鲜卑、乌桓民族与中原民族友好交往，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物遗存，较重要的有1956年在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小坝子滩发现的西晋王朝颁赐给乌桓、鲜卑上层人物的金印和银印。其中，“晋乌丸归义侯”、“晋鲜卑归义侯”为驼纽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为驼纽银印。此外，还发现有金耳环、金饰牌等。在一件兽纹金饰牌上，还刻有拓跋鲜卑部落首领的名字，这对于研究拓跋鲜卑部落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1976年，在内蒙古大学附近，发现一座北魏墓葬，出土34件陶质文物，有舞乐俑、赶车和牵马人俑、镇墓武士俑，还有家畜、牛车等。这些文物造型生动、形态各异，真实地反映了鲜卑人吸收中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自1975年以来，在哲里木盟科右后旗和科左中旗多次发现鲜卑墓葬，出土的金饰件有金马牌饰、兽形金牌饰、金扣、银钗等。1981年，在包头市达茂旗发现金饰件5件，有金龙、金牛头鹿角、金马头鹿角饰件等。金龙是用金丝编成，龙身由270环连缀，可自由错动，其他为鲜卑贵妇的“步摇冠”。

80年代初，在和林格尔县、土左旗发现了一批鲜卑金器。和林格尔的金器有金碗、野猪纹金带饰牌等，野猪作奔跑状，腹部嵌有宝石，共2件。土左旗的金器有神兽纹金带饰、火焰纹金饰牌等，是很珍贵的鲜卑贵族金饰品。此外，在商都、包头、乌兰察布

盟、哲里木盟等地，都发现有鲜卑文物和城镇建筑遗址，现已基本确定的北魏古城有：北魏旧都盛乐城址（位于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云中镇城（在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沃野镇城（在今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怀朔镇城（在今固阳县城库伦古城）、武川镇城（在今武川县土城梁古城）、抚冥镇城（在今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柔玄镇城（在今察右后旗白音查干镇东北古城）、白道城（在今呼和浩特坝口子古城）。关于鲜卑族生活场景的壁画，较重要的发现是1993年在和林格尔县出土的北魏时期的"狩猎图"和"杂技图"、"出行图"。其中，狩猎图描绘了鲜卑贵族骑马行猎于阴山下的情况，图中山川、河流、车马、猴子、虎、鱼都十分生动。

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有墓葬、城址、金银器、碑刻等，还有一些反映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与民族交流情况的文物。1976年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阿拉奔公乡，清理一座唐墓，出土了"王逆修墓志"。从铭文得知，王逆修生前任天德等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侯等官职，死后"安茔于军南原五里"。据此，解决了长期众说纷纭的唐代天德军的位置问题。在墓北约2公里的地方，确实有一座古城，它肯定就是唐代天德军城所在地。由于这座军城的位置确定了，史书上所记载与天德军有里程距离的唐代丰州城、横塞军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以及隋代的大同城等古城位置，也都逐一确定，其意义十分重要。例如，1976年调查的唐代西受降城，它的位置确实在唐天德军城西北近100公里的地方，与文献中所记天德军西至西受降城180里的记载基本相合。

在辽阔的锡林郭勒盟草原和乌兰察布盟北部草原地区，发现许多石墓，有的在墓地上立着石人。这种石人墓由圆、方或长方形石圈围着，石雕人像的造型、姿态不尽相同，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石人墓与不同历史时期活动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关，有的墓葬可能即是隋唐时期突厥人的墓茔。

有关唐代中西交流的文物发现，有1975年在敖汉旗出土的一批银器和金带饰。其中，有一件带柄银扁执壶，在其柄部和口缘相接处，饰有鎏金的胡人头像，其状为高鼻深目，有八字胡须，短发向后，经考证，这是地道的波斯银执壶。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呼和浩特坝口子古城内曾经发现波斯萨珊王朝银币4枚，还在毕克齐发现东罗马金币等，这些文物表明了内蒙古地区在唐代，也是中西交通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内蒙古出土的唐代文物中，最精美的是1976年在喀喇沁旗哈达沟发现的6件银器，其中金花大银盘4件，其上有錾金花卉、火焰宝珠、狮、鹿等图案。这些银器是唐朝宣州的地方官向朝廷进贡的，后来才流散到草原地区。大银盘的直径达47厘米，工艺十分考究，在我区尚属首次发现，在国内也极为难得和珍稀。

关于隋唐突厥民族文物的发现，1981年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吉日木图出土的97件文物，包括金腰带饰件和铁刀等物。这条腰带上的皮革已朽，金饰件上既有中原风格的鱼子纹和卷草纹，也有草原风格的狩猎纹和动物纹，在长方形金銙上铸有人骑马

拉弓射狮子，而狮子回首疾奔的图案，十分生动传神。这批金带饰是隋唐文物而又反映游牧民族的特点，应当是此期突厥民族的金器。

四　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时期考古

对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是我区考古工作的重点，成果也比较多，现将其精华略述其详。

1994年5、6月间，考古工作者在清水河县的山跳峁村发掘了7座五代时期的墓葬。在砖室墓壁上，有砖雕若干，题材有格门、剪子、尺子、熨斗、茶具、弓箭等。在墓室中出土的文物有鎏金铜腰带、酱釉穿带瓶和陶塔罐等。在墓内壁画中，发现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以及武戏、劳作、吹奏、侍应等内容，这些文物反映了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山跳峁墓地的发掘，为研究五代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宋代的钱币铸造十分精良，在我区境内有大量实物，还发现北宋时期的银铤多件，这是当年宋辽和平交往后，由北宋王朝输入辽境岁币银的一部分。宋代在今内蒙古地区有辖城一座，为藏才族首领王承美所筑，北宋王朝授予其官职，赐名丰州，故址经确认，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五字湾乡境内。

关于西夏考古，较重要的发现有：1958年在伊金霍洛旗出土的西夏文"首领"铜印；同年在巴彦淖尔盟临河高油房古城出土的大批西夏铁钱；1966年在该城又发现一批金器，有金佛、盏托、碗和耳坠等；1963年在额济纳旗绿城子西夏小庙中，出土被沙土掩埋的25尊彩色塑像，有佛、菩萨、金刚力士和供养人像，其造型各异，神态端庄，服饰多样，十分精美，堪称我国西夏彩塑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1993年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发现西夏壁画艺术的宝库——百眼窑石窟群，其中有西夏早、中、晚三期壁画百余幅，包括有佛教显宗与密宗多种内容，特别是藏传佛教早期派别苯教以及宁玛派、嘎当派的护法神、双身曼荼罗绘画，这些绘画保存较好，内容丰富，是研究早期密宗教派的宝贵实物。考古工作者还调查发掘了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了许多西夏文书档案。

关于契丹—辽代考古，可分为城址与墓葬两类。1959～1960年间，重点发掘了赤峰市宁城县辽代中京遗址，基本上探明了辽中京建筑的分布情况：它由外城、内城和皇城组成，城内街道布局整齐，坊市和主要建筑物都对称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1962年曾对契丹族所建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遗址进行勘测，基本上了解到辽上京皇城和大内的建筑和街道布局。近几年来，又对辽中京城墙、辽中京大塔塔基以及辽代的一批古城进行勘察试掘，取得了新的认识。

对辽墓的发掘，“文革”前的重要发现是宁城县大明城辽墓、小刘仗子辽墓和赤峰市大营子乡的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后者出土文物达2162件，有大量精美的金银器、瓷器、玛瑙器，还有8组完整的马具，以及许多盔甲、刀剑、箭镞（包括鸣镝实物）。据出土墓志，墓主人为辽太祖之女质古与驸马萧室鲁（即肖屈列）。“文革”期间，主要发掘了哲里木盟库伦旗的前勿力布格辽墓群，发现巨型壁画若干幅，内容有出行、仪仗、狩猎等，人物众多，场面浩大，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1981年在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子湾子山辽墓群发现一具身穿一套特制的铜丝网络葬服、面戴鎏金铜面具的完整的契丹女尸。这次发现，不仅提供了契丹人埋葬习俗的较为完整的资料，而且提供了契丹妇女髡发的发型样式。同时，也为研究契丹民俗、葬俗、人种学、病理学提供了新资料。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发现的辽代墓葬中，出土文物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契丹贵族墓葬，应是1986年6月至8月在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发掘的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这座墓保存完好，没有被盗，墓主人为辽景宗的孙女、辽圣宗的侄女陈国公主和她的丈夫萧绍矩，葬于辽开泰七年（1018年），墓中出土精美的金银器、陶瓷器、玻璃器等千余件文物。公主和驸马都是头枕金花银枕，脸部罩有金面具，头戴鎏金银冠，脚穿金花银靴，尸体全身着银丝网络。这两套完整的金银殡葬服饰葬具，第一次展示了契丹大贵族独特葬俗的全貌和真象，为研究辽代中期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

契丹文物的另一次重大发现，是1992年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打击盗掘古墓犯罪斗争中，抢救发掘的契丹大贵族耶律羽之墓。据墓志所证，辽太宗会同四年耶律羽之病故，同年下葬。耶律羽之其人，《辽史》有传，是早期契丹皇族成员之一，其墓室建造得十分豪华，由绿色琉璃砖砌筑，这种形制在辽墓中罕见。据墓志所记，耶律羽之家族先祖为鲜卑石槐，这为契丹族与鲜卑族的继承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所收回的300余件文物，包括金银器、瓷器、铁器、木器和大量的丝织品，其中，錾花金杯工艺精湛，有唐代遗风；白、褐釉瓷瓶，器型硕大、胎质细腻、釉色莹润，为辽瓷中的精品；刻有“万岁台”的包银砚台，应为皇帝御用赏赐之物，极为珍奇；丝绸长袍虽经千年仍可舒卷，其上花纹繁丽多姿，丝工精良，是辽代丝织物中的瑰宝。通过对耶律羽之墓的抢救保护，推动了考古发掘的深入进行。在这座墓周围，发现了耶律羽之家族墓地，陆续又发掘了耶律羽之其子甘露、其孙元宁、曾孙道宁等人的墓葬，还发掘其旁枝耶律祺之墓，获得契丹大字墓志一方，全文近3000字，仅新发现的“新字”就有数百个，属重要发现。此外，还出土了辽代大贵族随葬用的木制“送终车”残件，以及一批车饰、铜铎和一套做工精巧的修车工具。

随着耶律羽之墓的保护与发掘，考古工作者在阿鲁科尔沁旗全境重点调查，于1994年在该旗宝山发掘2座契丹大贵族墓。在1号墓壁上，发现“天赞二年”（923年）

题记，这是全国迄今发现的有纪年辽墓中时代最早的一座。墓内建有由雕刻精细的巨石板组成的石房子，其外围建寝帐式圆形建筑，在墓壁上绘有战马、花鸟、文具、武器，用笔着色十分考究，绘画中使用了大量金箔，至今依然光彩照人。在2号墓的壁画中，发现有“苏娘”题记的仕女画，具有典型的中原唐代风格。壁画为工笔重彩，出自宫廷画师之手，仕女着盛装，梳唐式发髻，据墓中题记考证，墓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契丹的汉家闺秀。宝山壁画是契丹—辽代壁画艺术品中的精美之作，可视为唐、五代画风在草原地区的延续，填补了晚唐至五代绘画作品的遗缺，其价值颇为重要。

关于辽代壁画的探寻，还有对巴林右旗辽庆陵东陵壁画的全面临摹（共计120平方米），其中“四季山水图”技法高超，描绘了庆州地区的四季风光。对赤峰敖汉旗羊山辽墓的揭取和临摹，获得了“契丹烹饪图”、“西瓜图”、“打马球图”等大批宝贵的辽壁画原作。“西瓜图”是我国时代最早的西瓜图画，在《农业考古》1996年第1卷发表后，引起考古界和农艺史研究界的关注。“契丹烹饪图”则是由契丹画师所作，用笔豪放，人物造型颇具契丹人特色，与传世的《卓歇图》相比，毫不逊色。

关于辽代佛教文物的重大发现，主要是1989年维修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宝塔时，在塔顶“天宫”处发现的一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这批文物不仅有佛像、菩萨像、小型法舍利塔及诸供具等160件，还有装置在小型法舍利塔内的陀罗尼咒、经卷及塔幡等，共达600余件之多，而且保存状况较好。其中尤为珍贵的有木雕金妆释迦佛坐像、琥珀观音立像、银鎏金凤衔珠法舍利塔、七佛贴金法舍利塔等。此次发现的佛经很多，最小的两部手写《佛说摩利支天经》和《金刚经》，只有5厘米见方，佛经为小楷手抄，工整精巧，是辽代写经中罕见的袖珍经书。写于辽应历十七年（967年）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七十六》，是迄今发现的辽代最早的写经。历时3年完成的《妙法莲花经》，总长20余米，宽0.19米，纸薄字密，精工印刷，容7卷28品佛经于一长卷，是辽代雕版印经的精品。此外，同时出土的大批纺织品、药材、金属器以及建塔铭牌、钱币等，为研究辽代佛教文化和经济生活、建筑管理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关于辽代制瓷遗址的重大发现，是1995年对赤峰市松山区缸瓦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出土大批辽代窑具、瓷器残片，并确定了辽代官窑遗址的位置。在这处方圆数公里的烧瓷遗址区，遍布辽金元三代的瓷片，有辽白瓷、青瓷，也发现部分三彩器残片，文化层堆积厚达2米，被学术界命名为“草原瓷都”。

金代考古工作的重点，首先是查清了一批金代城址的确切位置，例如：金代北京路城址在今赤峰宁城县大明城，临潢府路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古城，西京路城址在今呼和浩特东郊白塔古城，云内州城址在呼和浩特西郊西白塔古城。此外，这些路下辖的州县故城也有的被查清，这就为金代考古确定了方向和重点。内蒙古地区金代制瓷遗址的发掘，也有较大收获，在缸瓦窑出土有“大定”等年号的瓷片，并发掘出许多晶莹亮

泽的黑蓝色瓷罐、碗、盏等，制作工艺十分考究。我区发现的金代墓葬较多，但多为中小墓，发表的资料较少。已清理发掘的金代墓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埋葬尸体，另一种为埋葬火化骨灰。在敖汉旗英风沟清理的5座墓，2、5号墓内用小石棺盛放骨灰，2号墓内出土小石碑一通，铭记为镇国上将军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宗室完颜之墓，明昌三年（1192年）入葬，明昌七年（1196年）重建。在呼和浩特郊区野马图村清理的金代班氏家族墓地，都用石棺盛放骨灰，资料未发表。关于金代遗物的发现，有呼和浩特哈拉沁沟出土的铜佛、铜镜等，在铜镜边缘，刻有“富民县官□”5字，据史书所记，金代铜禁甚严，禁止私人铸镜，只由官府造镜，因此要在镜边刻出铸造地点和官署名称，哈拉沁沟出土的铜镜，即反映此特点。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呼和浩特、清水河县、武川县、察右中旗、集宁市、巴林左旗等地，发现金代的村落遗址、碑刻、钱币、墓葬等。

内蒙古大草原是成吉思汗的故乡，也是元朝成立的地方，因而在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文物考古工作，一直受到普遍的关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武川县五家村征集到1方铜印，重1.4公斤，印文为“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监国公主是成吉思汗的三女儿阿剌海别吉，她嫁给汪古部首领，成为汪古部的代表人物，并管辖河北地区，权重位高，监国公主印是我区发现的与成吉思汗家族有关的重要文物。1993年，在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中，发现元代“祭祀成吉思汗家族图”大型壁画，壁画中绘出了盛大的祭祀场面，成吉思汗及其3位夫人和4个儿子端坐正中，接受祭拜，这是国内已知时代最早的成吉思汗家族图。1988年，在镶黄旗哈沙图发现1座蒙古汗国时期的贵族墓，出土有金马鞍饰件、金耳坠、金杯、铜镜等，以及丝绸残片和固姑冠残片。元代墓葬的发现，主要有1982年在赤峰元宝山区宁家营子和1991年在凉城县后德胜村发现的2座壁画墓。元宝山元墓壁画人物形象生动、构图准确，有“男女主人对坐图”、“旅行图”、“山居图”等，从墓主人服饰看，其身份应为元朝六品官员。凉城县元墓壁画，是内蒙古西部地区首次发现的元朝壁画，其最大的画面为“宴饮图”，绘有墓主人及其妻妾、侍从共11人，形象地反映了元朝贵族的宴居生活。这两座墓中的壁画上，墓主人都穿蒙古服装、戴圆盔帽，民族特点鲜明，为研究元代舆服制度和民族学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元代皇帝及蒙古宗室大贵族死后，都北葬蒙古高原，且实行“秘葬”，因而此类墓葬至今在国内外均未发现。为祭祀先祖，元朝皇帝在元上都城外设置祭坛。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正蓝旗羊群庙发现并发掘一处大型元代祭祀遗址，出土汉白玉蒙古帝王像3尊，雕刻十分精美（惜已不存头部），帝王像残高1.37米，身着龙袍，端坐椅上，是蒙元皇帝（大汗）的遗像。这些雕像及其周围的祭祀建筑遗址，对于研究蒙古皇族的祭祀和祖先崇拜，具有重要价值。

内蒙古地区元代瓷器、纸币、丝织品和生活用品的发现十分丰富。1970 年在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的辽、金、元丰州故城内，发现窖藏的 6 件元代大型瓷器，制作工艺十分考究，其中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的钧窑大香炉，高达 42 厘米，器型硕大，胎骨厚重，通体施天青釉，经过烧制窑变，使天青釉色中呈现灿烂的红霞，显得气势雄浑、美观大方。在香炉颈部有 3 个贴塑的麒麟，正面有一方形题记，刻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的铭文，乙酉年当是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我区出上的元代瓷器，还有许多上乘之作，如 1979 年在包头市燕家梁征集的 1 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罐；1977 年在哲里木盟库伦旗白庙子乡发现的窖藏元瓷中，出土 1 件精致的青花玉壶春瓶；在察右前旗元集宁路故城中出土的 1 件白釉剔花牡丹纹罐，以及 1 件刻有“葡萄酒瓶”4 字的黑釉小口长肩瓶；1978 年在赤峰哈金沟村出土 79 件元瓷，有一部分胎骨厚重，其明显特点与缸瓦窑的元代产品相似，缸瓦窑元代瓷器多为仿定白瓷、酱釉瓷和铁锈花瓷，是颇具地方特色的瓷器。

我区是世界上保存有时代最早的纸币实物的地区，1982 年考古人员在维修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时，在塔内发现了一张现存时代最早的元代纸币“中统元宝交钞”（元中统元年＜1260 年＞年发行），在国际纸币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1985 年又在额济纳旗黑城遗址中，陆续发掘到元至正十年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1350 年版），以及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发行的“至元通行宝钞”。同年，这两种纸币又在额济纳旗吉日格郎图发现一批。目前，内蒙古已成为全国保存各类元代纸币最多的省区。

关于蒙元时期丝织文物的发现，主要有 1976～1977 年，在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遗址出土的数十件元代丝织品，有织锦、素罗、提花罗、绢和纱等。丝织衣物有被面、夹衫、长袍、有的仍可折叠，特别是一件左衽提花绫长袍，印有块状金花与天青色的绫面相辉映，显得典雅而灿烂。其后，又在达茂旗明水村发现一批蒙古汗国时期的丝织物，有纳失石辫线袍，绢质绣花靴套等物。“纳失石”为波斯语，意为“金线”。在明水出土的这件纳失石辫线袍上，还绣有头戴王冠的狮身人面像，具有西方文化的特征。对于研究蒙古汗国时期的对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蒙元时期对外交流十分活跃，各种宗教遗物在我区时有发现（包括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景教、道教的文物）。在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及周围，发现许多刻有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字的墓顶石，这是景教的文物遗存；在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在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寺，发现元代喇嘛教壁画和蒙古文书写的佛、菩萨、罗汉颂词；在元上都古城中，发现有佛教、道教建筑遗存等等。元代的驿路交通十分发达，在四子王旗达忽拉嘎查发现元代驿站遗址，在当地罕乌拉山顶还发现元代守卫驿站的军事设施，后又改建为敖包祭祀天地，其直径达 30 余米，是内蒙古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敖包遗存。反映元代驿路交通的珍贵文物，最重要的是兴安盟出土

的铜铸五体文夜巡牌。这件铜牌的中心铸有“元”字，右侧铸“天字拾壹号夜巡牌”，牌面铸有八思巴文、回鹘蒙古文、察合台文、蒙文及汉文。这是迄今发现的元代各种牌符中使用文字最多的一件铜牌，也是反映元代驿站管理制度的珍品。

元代的碑铭石刻在我区多有遗存，在赤峰喀喇沁旗龙泉寺发现元代龙泉寺碑和巨型石狮雕像，其年代分别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和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 年）。在赤峰翁牛特旗的国公府村，保存有元代“张氏先茔碑”（刻于元顺帝元统三年，即 1335 年），碑文计有汉字 2500 余（正面），蒙古文 3000 余（背面）。书写汉字者为元代大书法家康里巎巎（1295～1345 年）。该碑是研究元代民族关系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

对于元朝在草原所建城邑的考察发掘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已发现元代古城遗址 30 处，分为都城、路城、府城、州城、县城，还有蒙古汗国时期分封宗王所建的城邑等。1995～1996 年发掘了元朝陪都元上都遗址（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五一”牧场），发现了大型宫殿遗址及许多汉白玉、琉璃建筑构件，从而证实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元上都宫殿豪华情况的记载。1998 年在对元代丰州城万部华严经塔题记考察中，发现多条古波斯文、古叙利亚文题记，以及“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1275 年）汉文题记，其内容与马可·波罗 1275 年 5 月对丰州城考察的记述相同，为证明马可·波罗曾经到过中国以及其《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重要佐证。

五　岩画及长城考古

现已查明，我区境内共分布有古代岩画 3 万余幅，可以划分为西部区的阿拉善岩画、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东部区的赤峰岩画，呼伦贝尔岩画，共五个区域。这些由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刻画的艺术作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一直延续到蒙元以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它分布在东起包头固阳县，西至阿拉善左旗的阴山山脉中。岩画内容有虎、狼、鹿、熊、牛、马、羊等 40 多种动物形象。还有独猎、双人猎、群猎场面。反映意识形态和原始崇拜的有太阳神、天神、人面像、手印、足印，以及祭祀、舞蹈、部落战争等画面。岩画的上限，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元明之际。绘制岩画的，有原始部落先民，有匈奴、突厥、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

举世闻名的我国长城遗迹，分布在全国的 16 个省、市、自治区，而内蒙古地区的历代长城，以其修筑的朝代最多，里程最长而居于全国之首。据 1986～1996 年多次普查，内蒙古历代长城的总长度达 1.7 万公里，约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 1/3。其建筑朝代包括战国、秦、汉、金、明等朝。内蒙古现存最古老的长城，是战国七雄之一魏国所筑

的魏长城，其遗迹位于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黑岱沟乡。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长城遗迹，有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西部的秦长城，巴彦淖尔盟、包头、呼和浩特地区的赵长城，赤峰、锡林郭勒盟的燕长城。在这些长城沿线，还发现有烽燧、望楼和城、障、亭等军事设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燕、赵长城的基础上，兴筑了著名的“万里长城”，在伊克昭盟西部、乌海市、巴彦淖尔盟、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赤峰等地，均发现秦始皇长城遗迹，特别是1990～1996年间，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小佘太至包头固阳县的阴山之中，发现保存较完整的秦长城遗迹。据调查，这段秦长城全长200公里，全由黑石块垒成，高3～6米，底宽4米，顶宽1.5米。每隔0.5公里在长城上筑小烽火台1座，每隔5公里在长城上筑大烽火台1座，每隔10余公里在长城南侧筑屯驻戍卒的军事营垒1座，这是研究秦始皇时期“万里长城”营建方式的重要实例。此外，在这段长城旁，还发现了大批匈奴岩画。

汉代沿用秦代长城并加以改造和增筑，我区汉代长城最为著名的是位于额济纳旗戈壁上的汉代居延遗址。居延遗址全长250公里，包括城障、烽燧和塞墙等，始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废弃于东汉末年。居延都尉所辖烽燧塞墙，分属于卅井侯官、甲渠侯官和殄北侯官。在居延泽（今金斯淖尔湖）以西，殄北塞以南，甲渠塞以东，卅井塞以北的大片河流冲积地带，为居延都尉府和居延县所在，也是当时的主要屯田区，遗址分布在今查科尔贴以北地域。肩水都尉所辖烽燧塞墙，分属于户水侯官、橐他侯官和广地侯官，遗迹分布在今查科尔贴及其以南地域。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曾作过全面调查，并统一编号，在大湾、地湾、破城子等30处遗址中发掘和采集了汉简约1万枚。1972～1976年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作了复查，并发掘了甲渠侯官治所（即破城子）、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3处遗址，出土汉简约2万枚。发现了障、邬、虎落等遗迹，同时出土有弓箭、铜镞、铁甲片、转射、铁农具和工具，以及各种生活用品。这些文物，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金代为防御蒙古族而兴筑的堑壕，有宛似城墙的长堤，故称之为金界壕、金长城。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文物部门自70年代以来投入大量人力，反复调查了金界壕。现已查明，金界壕在内蒙古地区的总长度为1.5万公里，沿线都兴筑有戍堡、关隘、边堡等一系列屯戍驻扎的营垒。1981年发掘了哲里木盟霍林郭勒市的两处戍堡遗址，堡内都筑有子城，出土文物有陶瓷、铁、石等质地的器物。经调查发掘，金界壕的构筑形制分为双堑双堤和只挖单壕，在壕南侧堆土成长堤的两种形制。

明代兴筑的长城，分布于内蒙古中部，有主边和次边两条。主边基本上是今内蒙古和山西省的分界线，原分别属于明朝的宣府、大同、山西等三镇管辖，东起今河北与山

西省交界的马市口，西至内蒙古清水河县老牛湾的黄河东岸，总长约480公里。次边的东端也是从马市口开始，向西延伸时逐渐偏北，南距主边20至40公里不等，保存状况较差，现今地表只可看出断续绵延的遗迹。

（执笔：王大方、张文芳）

参考资料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997年，北京。

② 《草原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年，香港。

③ 《内蒙古文物志》（内部资料）。

辽宁省考古工作五十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解放前辽宁地区考古工作很少，只对少数遗址或墓葬进行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解放后全省的考古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取得了一批引人瞩目的新成果。营口金牛山古人类遗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北票喇嘛洞墓地、绥中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和朝阳北塔塔基遗址分别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或重大考古发现提名奖。下面将 50 年来，尤其是近 10 年来辽宁考古工作简要介绍如下。

一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已经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不同时期的地点和古人类遗址 10 处，大致搞清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特征及其与周边地区关系，并建立了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1984 年在营口金牛山 A 洞发现了包括头骨、体骨在内的“金牛山人”化石，距今 26 万年，这是目前东北地区时代最早又保存较完好的人类化石。金牛山人头骨比较进步，肢骨却比较原始，显示了人类进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金牛山人大致处在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1993 年至 1994 年对 A 洞又进行第九和第十次发掘[①]。这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金牛山人”生活的居住面和以九个灰堆为代表的用火痕迹、打制石器、烧骨及敲骨吸髓后遗留的大量骨片。文化层堆积达 1 米多厚，敲碎的骨片上万件，以石英岩、硅质灰岩为原料制成的刮削器、尖刃器有 200 多件，说明这里是金牛山人的长期居住地。

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还有本溪庙后山遗址，时代为距今 14 至 40 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喀左县鸽子洞遗址，距今 5 至 7 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海城仙人洞、丹东前阳、凌源西八间房、大连古龙山等地点，前者不仅发现人牙化石和数以万件用脉石英打制的石器，还发现可以缝制衣服的骨针、捕鱼的双排倒钩鱼叉及穿孔牙饰、蚌饰，时代距今为 2 至 4 万年。

二

解放前辽宁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几乎是空白。解放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和墓地，经多年研究，基本搞清了辽宁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分期、文化特点、年代及其与邻近地区关系。依其文化面貌及谱系关系可分为三个大的考古文化区，即辽东、辽中和辽西地区。其中辽东地区又可分为辽东半岛和东部山区两个亚区。按照时代来说，最早为距今8000年，最晚距今4000年左右。

查海遗址从1986年以来已发掘6次[②]，揭露面积近1万平方米。发现房址55座，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排列密集有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房址内侧有两圈柱洞，灶址居中。房内出土了大批石器、陶器和玉器。房址间有打破关系。结合陶器特点，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红褐陶、素面斜腹为主；中期以红褐陶、刻划纹为主；晚期则以灰褐陶、规矩之字纹为特征。1994年在中心大房址附近发现小型墓地及长19.7米的龙形堆石尤为重要。在一件筒形罐腹壁上有贴塑的蟾蜍、蛇衔蛙图案（这种图案在青铜时代常见），还发现有龙纹陶片。查海发现的玉玦、玉匕、玉斧、玉凿等均为透闪石、阳起石一类软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真玉器。

位于沈阳北郊的新乐遗址，属辽河流域一处较早的新石器遗址，经^{14}C测定距今6800～7200年。从70年代到90年代经过5次发掘，已揭露房址40余座，出土陶器有平底筒形罐、斜口器等，制作比较精细。出土的木雕鸟形饰及形状大小不一的煤精制品，不仅是艺术珍品，而且也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关系。

丹东后洼遗址可分为早、晚二期，分别称为后洼下层和上层[③]。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洼上层发现数件陶塑和石雕人头像，具有程式化的倾向，明显具有精神文化上的寓意。此外还在下层发现1件陶埙，经测音为G、G#，这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吹乐器，为研究我国乐器发展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北吴屯遗址位于庄河市黑岛镇北吴屯村[④]，滨临黄海。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物分析，该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直径4～5米，周边有柱洞和一短门道，屋内有石砌方形灶址。遗址周围还有围栏性质的遗迹。陶器多含滑石粉，以夹砂红褐、黑褐陶为主，纹饰以之字纹居多。总的看文化面貌与后洼下层接近。晚期房址则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屋内有圆形土灶。陶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其文化特征与小朱山中层接近，时代上可能略早于小朱山中层。

位于辽西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近年主要发掘了第二地点[⑤]，它位于牛河梁顶南麓的平坦岗地上，共有6座积石构筑的冢、坛，3号圆形祭坛居中，1、2号冢在西侧，4、5号冢在东侧，6号冢居北。3号为祭祀遗

迹，用三重红色石桩围砌出圆坛，直径分别为22米、15.6米、11米。每层台基高差0.3～0.5米，石桩为多棱体，高20～40厘米不等，里层较细小，外侧较粗大，直径在10厘米以上。石桩内置一圈筒形器。

积石冢的共同特点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冢的四周均用块石或石板砌出整齐的石墙，呈台阶式，现可见两层。石墙外缘置彩陶筒形器，仅1号冢北部内外墙间就有60多个。筒形器多为泥质红陶绘黑彩，也有素面或在上半部有多道弦纹带。各冢均有中心大墓。靠南侧则埋藏一批石棺墓，墓圹或以石板立砌，或平铺。有多墓首尾相接。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亦有拣骨葬。在1、2、4、5号冢共发掘墓葬47座，除4号冢有三座仅随葬彩陶，另一座随葬陶器与玉器共存外，多数墓只随葬玉器。出土了勾云形玉佩、环、箍、璧、龙及动物纹饰牌等，其中21号墓出土了20件玉器，显示出“唯玉为葬”的特点。

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圆形祭坛、积石冢加上80年代发现的女神庙，曾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讨论，甚至提出“重建史前史”观点，说明其意义相当重要。

三

辽宁的青铜时代文化最早出现在大约4000年前，根据文化特征的不同，可以分成辽南、辽东、辽北和辽西四个区。

辽西地区青铜时代遗址发掘较多，发展演变关系较为清楚，早期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遗址有建平水泉、北票丰下、康家屯城子地、西大川等。

北票康家屯遗址是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址，除北墙被河水冲毁外，东墙、南墙及西墙大部保存较好。城墙系用青石板垒砌而成，残高近1米，墙外为2米深的壕沟，墙与壕沟间的地面经夯实，在东墙与南墙转角处，南墙与西墙的转角处及南墙外缘有多处舌状或圆形石构筑物，现仅见底部，似晚期城的“马面”设施，应是一种防御工事。在城内由东西向一道宽墙及南北向一窄墙将城内至少分成四个区，每区有若干座圆形、方形石构房址。房址均建在地面上，外用青石板垒砌，到一定高度形成一个高台为居住面。中心部位有一圆形烧土面，在外侧继续砌筑石墙，其内为土墙。不见柱洞，门址均在一侧开口，有的砌出“八”字形短墙，底部均用石板铺门道，有的门址上还发现了“门轴石”。在房址附近还发现用石板砌出的“井窖”式建筑，在已清理的J1、J2中发现人骨及完整的石器、陶器、骨器，据此推断应是墓葬。目前这处城址还在发掘中。

辽西地区青铜时代中期遗存称为魏营子类型，这一类型的代表遗址有朝阳魏营子、喀左和尚沟、义县向阳岭等。70年代相继在喀左马厂、波汰沟、山湾子等地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大部分铜器具有中原商周传统作风，也有一些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

族作风的北方式青铜器，包括容器和武器、工具等。1993年对义县向阳岭遗址的发掘，加深了我们对魏营子类型文化内涵的认识[⑥]。该遗址可以分成四期，其中一、二期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期属魏营子类型，四期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属于二期的一个灰坑内发现50余件器物，其中4件陶器颇具魏营子类型陶器特点，为探讨魏营子类型的来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晚期遗存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凌河类型。青铜器种类繁多，炊器、容器发现较少，工具、武器、饰物发现较多，其中尤以各式青铜短剑最具代表性。

辽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为高台山文化，代表遗址有新民高台山、彰武平安堡、阜新平顶山等。晚期青铜文化以新乐上层文化为代表。近几年发掘的主要有勿欢池墓地[⑦]，一共37座，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陶器的组合为高颈壶、高圈足钵及罐、碗、杯等。器物多置于死者足部的填土中，一般分二至三层叠放，极具特色。值得重视的是在墓区的周围发现纵横交错、相互贯通的人工水渠17条，长245米，有干渠、支渠、毛渠等三种。沟渠上宽下窄，两壁斜直。在东北部还发现呈三角形的分流区，在干渠与支渠之间有可放置挡板的设施。综合分析，这是一处距今约3500年属于高台山文化又略早于墓地的农田灌溉系统，联系大连大嘴子发现了同时期水稻的考古资料，这里也应与古代稻作有关，并为探索稻作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传播路线提供了新的依据。

在辽南即辽东半岛区，早期青铜文化包括双坨子一、二、三期文化。陶器组合以壶、罐为主，含少量青铜工具，葬俗以多室积石墓为特点。近几年发现的有大连大嘴子遗址[⑧]，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三面环海的台地上，面积约5000平方米，其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与双坨子一、二、三期相当。其中第三期还可分为前、后二段，前段房址为土坑半地穴，后段则为石建房屋。大嘴子三期年代距今3500年左右，因发现人工栽培的水稻而引起人们关注。

辽东地区较早阶段的青铜文化为别具一格的以洞穴墓地为特征的马城子文化。其中马城子A洞、B洞、C洞，张家堡A洞，山城子B洞，C洞，北甸A洞共计145座墓的材料，已于1994年以《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存》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并提出了“马城子文化”的命名。1992年又在本溪县偏岭乡泥塔村太子河畔高于河床80余米山上发掘了一处洞穴墓地，共发现墓葬51座，均为火葬，多数是拣骨葬。每座墓都有陶、石器随葬。陶器组合除壶、罐、碗外，出现类似高台山文化类型的带有红陶衣的高足杯。同时首次出土数把石剑，这类石剑以前在丹东地区出土过，而高台山类型的陶器则表明其与沈阳地区同时期文化有着某些联系。

辽东、辽南青铜时代晚期是以石棺墓和大石盖墓为代表的遗存，随葬品组合多为带器耳的圈足壶、长颈壶、深腹罐和鼓腹罐，同时伴出青铜短剑。近年发掘的有风城东山大石盖墓群[⑨]，共发现30座墓，已发掘11座。从发掘的墓葬看，墓室呈长方形，墓坑

较浅，有的墓壁用二至三层石块叠砌而成，有的在上口砌一层石块，有的墓底铺满卵石，但普遍特点是在墓顶覆盖一块大的花岗岩盖石。随葬品放在墓室两端。陶器有壶、罐等，上腹多横扳耳、竖扳耳、鸡冠耳。出土的2件高领鼓腹平底双耳壶，在颈部和上腹部饰数道弦纹。一件与本溪洞穴出土的马城子类型陶壶相近，一件与辽南地区“双房类型”弦纹壶相同，似较辽阳、开原、抚顺等地石棺墓常见的弦纹壶（伴随出土青铜短剑）时代要偏早一些。

四

战国时期，燕昭王派兵“袭破走东胡”，在辽宁地区设置了辽东、辽西等郡，并分两次修筑了南北两道（即内线、外线）长城。在辽宁地区发现大批这一时期的城址和墓葬，如建平达拉甲古城、朝阳袁台子墓地、辽阳新城子战国墓、喀左眉眼沟战国墓、沈阳大西门战国墓等，此外还发现多处战国窖藏坑，出土一批战国货币及铁农具等。

80年代文物普查时，在葫芦岛市邰集屯地区发现3座古城，1992年和1993年对小荒地村西一座古城进行发掘[⑩]。该城呈方形，边长约200米。城内堆积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战国晚期，晚期为汉代。此城当始建于战国晚期。值得一提的是，发掘时征集到“临屯太守章”封泥。临屯郡是汉武帝在朝鲜设置的四郡之一，这一发现正好与《汉书·地理志》的有关记载印证。此外，发现了“且虑陶量”，有人据此考证此城乃战国辽西郡郡治且虑县[⑪]。

沈阳故宫北侧宫后里城址是施工时发现的。城墙分两次夯筑而成，其中内侧墙保存较好，宽8.5米，存高2米，夯层厚13厘米，其时代可能早到战国晚期；外侧墙保存不好，时代为汉。以往学术界多认为沈阳最早筑城为辽代，即沈州城。宫后里战国晚期城墙的发现，把沈阳筑城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同时为探索汉代侯城的地望提供了线索。

秦汉时期中央政府进一步开发东北，迄今已发现数十座汉代城址和大批墓葬。50年代发掘了辽阳三道壕汉代村落遗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面貌。近些年最重要的成果当属绥中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的发掘[⑫]。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连续十多年的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已对这处秦汉时期的大型宫殿址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它以石碑地遗址为中心，以止锚湾、黑山头为两翼，其后包括瓦子地、周家南山五处建筑址及大金丝屯窑址共同组成了一个遗址群，建成于始皇三十二年前后。除了石碑地遗址的前半部在汉武帝时继续使用外均为秦代建筑。石碑地遗址是这个遗址群的中心，它外廓呈曲尺形，东西300、南北500米。以连续墙基组成十个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其主体建筑建在40米见方、海拔高度约12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在这一大型夯土台基的北

部有两组保存较好的大型殿址，东西对称排列，每处殿基平面呈曲尺形，残高1米，南北各有一个门，以空心砖砌成踏步，台基外有檐廊和散水，台基上靠内侧各有两个南北对称的井窖及用方砖砌成的漏斗状水池，池下有排水管道通往殿外的渗水井。此外遗址内还发现了类似浴室的设施。

整个遗址是一处兼有苑囿和礼仪性质的大型行宫遗址，与秦始皇东巡碣石有关。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辽东太守公孙度乘机割据辽东，考古工作者在辽阳（当时的辽东郡首府襄平）附近发掘了一批西汉末至西晋的壁画墓，墓葬为多室石板墓，在墓室石壁上绘有壁画，它对后来发展起来的高句丽壁画有很大影响。

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工作有两个大的课题，即辽西的三燕考古和辽东的高句丽考古。

鲜卑族是魏晋时期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曹魏初年入居辽西大凌河流域，公元4至5世纪先后在朝阳地区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三个地方政权。这一时期遗存较多，继前些年发掘前燕御花园龙腾苑、北票房身石板墓群、后燕昌黎太守崔遹墓和北燕冯素弗墓外，近年又发掘了朝阳北塔塔基遗址、北票喇嘛洞、苍梁窖、朝阳田草沟和王子坟山等墓地。

朝阳北塔塔基遗址发掘是结合北塔维修进行的。发现有三燕、北魏、隋唐和辽代等不同时期的建筑基址，其中北魏时期建筑布局较为清楚。在三层夯土台上，中心有五开间封闭式的回廊，每面11间，进深2间，于正中明间设置门道，塔与廊间有墁道、踏步等，在廊的壁龛中置大批陶塑佛像，后毁于大火。其时代应早于洛阳永宁寺塔，对我们研究中国早期的伽蓝建筑有重要意义。现北塔塔基的四角各置一块大型的雕龙、凤、虎纹础石，1件覆斗式、3件覆盆式，础石均为方形，每边1.23～1.27米，高0.52～0.53米。经考证当为慕容廆建都龙城时和龙宫殿址的础石，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孝文帝祖母、北燕最后一帝冯泓的孙女、文成明皇后冯氏临朝听政“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三燕宫殿址的础石也就为北魏所用了。

仓梁窖墓地位于北票市大板镇八代沟村[13]，已发现的几座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土陶壶、陶罐、铜镳斗、提梁罐、衔镳等，特别是一件铜三铃环，与日本、韩国出土的同类器物有密切关系。这个墓地属前燕时期，约在4世纪中叶以前。

喇嘛洞墓地位于北票市八家子乡四家板村喇嘛洞屯西300米的一处向阳山坡上，自1992年以来已进行了5次发掘。墓地中有一条冲沟，沟东墓地发掘60余座，沟西已发掘300余座，整个墓地规模较大，依山势自上而下、从东到西呈扇面状，排列有序，最

多一排21座墓，墓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多土坑竖穴墓，有木椁，前后大小相等，1998年在坡下的一批墓中，发现石椁墓，呈大头小尾。根据墓葬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圹为5×4米，中型墓为4×2.5米，小型墓为2.5×1米。大型墓很少，如沟东区的M5、M17，沟西区的M266等；绝大多数是小型墓，随葬品亦不多。这批墓少见合葬墓，多为单人葬，墓葬分布极为密集，但不见打破关系，在沟东区有男女两墓成对布局现象，可能是同墓异穴。从葬俗上看，在填土中随葬陶器也是一个特点。沟东一般常见2件陶罐或壶，而沟西区最多有4件陶器随葬。随葬品除陶器外，还有数量较多的铁兵器、铁工具、铁农具，特别是大型墓中出土全套的甲骑具装更引人注目。另外还出土鎏金铜銮镳、鎏金铜带饰、鎏金铜鞍桥、鎏金铜寄生、鎏金铜叶包木马镫，各种形制的金耳饰、铜鹿形器、各种类型铜斧、数量众多的长铁剑、环首铁刀等，为我们探讨这批以鲜卑人为主体的三燕早期文化内涵及与周边地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此外，还在锦州发现东晋永昌三年李廆墓[14]，平面呈长方形，墓顶双层拱券，随葬品有陶灯、壶、钵，铁多棱灯架，铜镜、釜、甑、魁和五铢钱、货泉等，出土一件砖质墓表，正面阴刻楷书3行凡15字"燕国蓟李永昌三年正月廿六日亡"，东晋永昌三年不存，应为太宁二年（324年），相当慕容廆时期。原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座前燕墓葬，实际该墓出土的随葬品均为典型东晋风格，而且按《晋书·地理志》记载，燕国乃幽州七郡国之一，蓟为燕国首县，可证李廆原籍当在今北京附近。李廆墓是一座有确切纪年的东晋墓。

高句丽是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在浑江和鸭绿江中下游，公元前37年建国。辽东地区已发现大量高句丽城址和墓葬，继早年调查一批高句丽山城和对桓仁附近高句丽墓进行发掘以后，近年又对桓仁五女山、丹东虎山山城和桓仁将军墓进行了发掘。五女山山城以前只做过零星调查，近年对山城进行了勘探、测绘和发掘，基本搞清了山城的范围、布局和堆积情况。山城可以分为山顶及山下两部分，上下高差260米，城墙或人工用楔形石砌成，或利用天然陡崖峭壁，南北最长处达2000米，东西宽近800米，周长为5100米。城内堆积可以分为四期，一期以竖耳大陶壶和舌状板耳下接双横耳筒形罐为代表，时代应在高句丽建国前；二期以一处保留七块大础石的建筑址为代表，出土陶器多为折口大沿小平底器，其沿与肩部有双竖耳，年代当在两汉之际，即高句丽前期；三期以大批曲尺形半地穴式房址为代表，陶器盛行双横耳，铁器数量较多，时代约相当于魏晋时期，即高句丽中期；第四期发现一批石砌房址，时代为辽金时期。虽然尚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座山城就是高句丽早期都城——纥升骨城，但城内的早期遗存及山城附近的早期墓葬材料为我们结合文献记载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1992年在桓仁米仓沟发掘了一座封土石室墓[15]，当地人称"将军墓"。这座墓的封

土呈覆斗状，高出地面8米，周长150米，墓室由墓道、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主室呈方形，边长3.5、壁高2.1米，顶部为四层券顶，通高3.5米，两个完整的石棺床位于主室两侧，主室及耳室均有壁画，主室壁画以侧视莲花为主，耳室为王字流云纹。据县志记载，该墓于清咸丰四年被盗，现仅存黄釉陶灶、展沿四耳壶、铁灯及鎏金铜饰件等随葬品，该墓与集安长川2号墓有许多共同点，时代也应相同，约为5世纪初。将军墓是辽宁省目前仅知的一座高句丽时代的壁画墓。

1997年5月至12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沈阳市考古队对蒲河北岸石台子山城进行了发掘。该山城呈不规则三角形，周长1384.1米，墙体剖面呈梯形，底宽6~7.2米，高3.74米，顶宽3.9~5.6米，内外均有护坡。城墙均用石块构筑，壁面上为打制工整的楔形石，未加工的梭形石做内插石。山城发现四座门，即东、西北、西、西南门。经清理的西北门，门道进深6米、宽4米，门柱础与门枢础连体呈阶梯式，础石槽内有内圆外方的铸铁门枢。各门道均见大量烧土灰烬，表明这座山城毁于大火。在每座门的一侧底部均见石砌排水通道，在西北门至东门墙体外侧筑有马面10座，是为加强防御之用。据分析，这座山城约建于魏晋时期。

六

朝阳是隋唐时期的营州，这一带发现了大批唐代时期墓葬，多为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的砖室墓，有别于陕西等地唐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继前些年发掘左才墓、韩贞墓、张秀墓、朝散大夫墓后，近年又发掘了朝阳柴油机厂唐墓、工程机械厂蔡氏父子墓和教学研究中心的唐墓。

朝阳柴油机厂唐墓是朝阳已发现的150余座唐墓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该墓为砖砌圆形单室，主室直径7米，存高3.4米，前有4.5米长的甬道和21米长的墓道。该墓曾经被盗，现存80余件陶俑，有武士俑、骑马俑、侍女俑、十二生肖俑、风帽俑、乐俑、马、骆驼、镇墓兽等，其中在甬道壁龛中左右各立一件石俑，非常少见。男女石俑均辫发、高靴、宽袍、束带，高1米多。男俑左手架海东青、左手提杖，女俑叉手胸前，形神兼备，均满身施彩，在唐墓中罕见，保留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及风俗特色。

1993年在朝阳教学研究中心院内发掘3座唐墓，其中M3为方形单室墓，墓中出土了东罗马金币、1枚动物纹饰的金饰牌和1枚金戒指。这几件金制品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唐营州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作用提供了新资料。

七

辽代考古工作除对一些辽代城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外，主要对墓葬进行了发掘，重要的是以北府宰相肖义墓为代表的法库叶茂台辽墓群，北镇龙岗耶律宗政、耶律宗允墓，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等。近年发掘的主要有凌源八里铺辽墓，一共发掘了11座，其中10座为有长墓道的木椁墓、1座为砖室墓。M1为木椁墓，由八角形的主室及两个方室和两个方形耳室组成，主室中后部横置石质棺床小帐，为三间硬山式，屋面石上刻有彩绘的人物、动物、出行等图案。随葬品很丰富，其中银冠、鎏金覆面、铜带饰及白釉瓷器都是辽代文物中的精品。另外这处墓地在墓道及墓外殉全马的习俗也是以前所未见的。

朝阳七道泉子金墓为砖砌圆形单室墓，内壁有仿木砖雕和彩绘影作，以及三组不同题材的壁画。北壁为墓主人起居生活图，西壁为宴饮图，东壁为侍女图，三组壁画由黑框彩绘花卉屏风相隔，这是辽宁地区已发现的金代壁画墓中保存较好的一座，为研究金代历史、艺术及辽金墓葬的区分增添了新的证据。

1991年绥中渔民在大南铺村南水域中打捞一批瓷器[16]。随后由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历史博物馆会同沿海各省文物干部组成了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调查和探掘，发现了一艘元代运送瓷器的沉船，沉船长21米、宽7米，打捞上来的瓷器有白釉龙凤大罐、鱼藻大盆、净瓶、白釉黑花碗、黑釉碗等。目前水下工作已告一段落，初步分析是河北磁州地方窑产品在运往辽东或海外时，船只沉没。

明代考古主要是发掘了明代万里长城东端虎山长城和西端九门口长城遗址。长城东端起点位于宽甸县虎山乡虎山村南鸭绿江边，经发掘，现已清理出一座用土夯筑成的方型台基，边长36米，存高2～5米，其东壁接筑长城墙，墙体用稍经加工的自然石块砌成，大部分已塌毁。九门口长城遗址位于绥中县李家堡乡新堡子村新台子屯西的九江河上，在这里清理出面积达700平方米的平整铺石，经考证，这里便是史书上多见记载而久不可确指的“一片石”。在“一片石”中部发现8个梭形桥墩，这些等距离分布的桥墩与九江河两岸方形边台构成九孔城桥，在城桥外侧发现两座围城，构成一处完整的防御体系，是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

（执笔：顾玉才）

注　解

① 吕遵谔：《金牛山遗址1993、1994年发掘的收获和时代探讨》，《东北亚旧石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1996 年。

②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 1987～1990 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 年 11 期。

③　许玉林等：《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 年 12 期。

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 年 3 期。

⑤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筒形器墓的发掘》，《文物》1997 年 8 期。

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辽宁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待刊）。

⑦　辛岩：《阜新县勿欢池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1994 年。

⑧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大连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考古》1996 年 2 期。

⑨　许玉林等：《凤城东山大石盖墓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0 年 2 期。

⑩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锦西小荒地秦汉古城址试掘简报》，《考古学集刊》11 集。

⑪　王成生：《汉且虑县及其相关陶铭考》，《辽海文物学刊》1997 年 2 期。

⑫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辽宁省绥中县石碑地秦汉宫城遗址 1993—1995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 10 期。

⑬　孙国平等：《北票仓粮窖鲜卑墓》，《文物》1994 年 11 期。

⑭　辛发等：《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 年 6 期。

⑮　辛占山：《桓仁米仓沟高句丽"将军墓"》，《东北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97 年。

⑯　王云刚：《绥中沿海发现沉船瓷器》，《辽海文物学刊》1992 年 1 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在无数世代中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是历史馈赠给后世的珍贵文化遗产。在旧中国，吉林省没有专设的文物管理机构，文物不被重视，许多非常重要的古代城址、遗址、墓葬和碑刻非但得不到应有的修缮和保护，甚至还屡遭破坏和掠夺。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吉林省文物考古事业蓬勃兴起，机构不断健全，队伍逐渐成长，重点文物得到有效保护，田野工作和科学研究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经过1960年和1982至1986年两次大规模文物普查，调查、复查不可移动文物遗存6000多处，征集、采集了大量文物标本，编写了全省各市、县文物志48部，并编辑出版了《吉林省志·文物志》[①]和《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②]。这项文物考古基础建设的浩大系统工程的实施和完成，使我们基本掌握了全省境内文物宝藏的底数和历史文化的概貌，积累了丰富资料，锻炼了专业队伍，为全面加强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进而开创21世纪吉林文物考古事业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0年来，吉林省的田野考古发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配合建设工程项目进行部署的。丰富的田野发掘成果，已使我们有可能开始着手构建吉林省古代文化区系、类型和序列的框架，并为吉林省古代历史发展的壮阔图景勾勒出大致的轮廓。而近年来开展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则使我们有条件在更高的基点上对一些重要遗存重新进行审视、开掘和探索，增加了不少新的认识。

吉林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代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先人一起在这里劳动、生息，共同为开发祖国东北、缔造祖国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代生活在今吉林境内的少数民族大体分三个族系：一为肃慎，其后称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主要居于东部；二是涉、貊，涉——夫余居于中部，貊——高句丽居于南部；三是东胡之鲜卑、契丹、室韦和蒙古等，主要居于西部。考古资料证实，吉林的历史文化与中原古代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血肉联系；吉林省古代各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动地记录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各族人民勤劳、勇敢、智

慧和巨大的创造力，是祖国历史多元一体的有力见证。

一

吉林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完全是新中国以后建立起来的。近年来考古调查发掘资料表明，吉林省很可能属于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也已有露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这一带活动的空间已相当可观，许多地方都地留有他们的踪迹。

1989年11月，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哈拉毛都乡王府屯西北沟发现了几件具有打击痕迹的石制标本；经1990年发掘，又获得数十件类似的标本。发现者倾向于认为它们属于人工制品。这批标本出土于平台组和白土山组的砂砾石层中，以片状毛坯占优势，基本上都是小型的，多刮削器，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具有华北旧石器文化共有的特点和性质，与河北阳原泥河湾组小长梁和东谷坨旧石器文化相近，属于早更新世[③]。这一发现，为探讨吉林省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早期人类向北扩散的进程展示了充满希望的前景。

桦甸市寿山仙人洞，是吉林省少数经过一定规模试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洞穴位于哈达岭山脉东坡之上部。1991年试掘出土的47件石制品，原料主要是角岩，其次是石英和流纹斑岩，器形有石核、石片、石锤、刮削器和砍砸器等，多用锤击法，偶然亦用砸击法，修理方法为反向加工和复向加工，此外还有骨制的刮削器和尖刃器。1993年发掘时，在第2～4层堆积中出土打制石器200余件，并伴生有动物化石鸟类2种、哺乳类10种，分属4目8科。经铀系法测定，距今约2～16万年；人类活动遗迹集中在第2层，距今约2～10万年，应属旧石器时代中到晚期[④]。

蛟河市新乡砖场遗址，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遗址位于蛟河盆地北缘拉法河的二级台地上。石器以大砾石为原料，形体较大，制作粗糙，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打制石片，器形有石核、砍斫器和手斧等，不见刮削器。同时发现有松花江猛犸象等3个种属的哺乳动物化石。文化特征与华北匼河—丁村系相似，其绝对年代距今约6.2±0.6万年[⑤]。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除过去已知的榆树周家油坊[⑥]、安图明月沟（因发现过一枚成年人右下第一前臼齿化石而确定为“安图人”）[⑦]、榆树大桥屯[⑧]和上述桦甸寿山仙人洞之外，近年来还在长春红嘴子[⑨]、吉林市九站西山[⑩]、蛟河市小砬子仙人洞[⑪]和抚松仙人洞[⑫]等地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表明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吉林省境内开拓的活动空间已经相当广阔。从这些地点出土的器物和共生动物化石及植被遗存分析，在更新世晚期，这一带气候正从冷湿向冷干变化，山地、平原和江河两岸是茂密的森林和草

原植被，栖息着种类、数量较多的动物。当时人们用锤击法直接打制小石器，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从考古文化类型看，与“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相近。

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起步较晚。经过最近20年的努力，这一时代文化面貌才初露眉目。总体看，吉林省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形制单一，是以饰刻划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等组成富于变化的各种纹饰或几何图案纹的筒形罐为代表，广泛使用精美的细石器，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吉林省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地域环境为依托，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文化面貌和特点，反映了不同人们集团在不同条件下的开拓和创造。其年代距今约7000～4500年左右。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大致可以从地理分布上划分成六个区域。

西北地区是多湖泊、河流、沙丘的草原地带。这里广泛分布着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多以髓石、石英、玛瑙、燧石等琢压成精细的各式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等，伴以少量的磨制石器，与之共生的是低火候，饰附加堆纹、指甲纹、刻划纹、压印圆点纹等掺蚌的黄褐或灰褐陶手制陶罐等。浅地穴式带柱洞的房址表明，当时至少已经有了季节性的定居生活。较早的镇赉黄家围子遗址[13]，年代距今约6500～5500年左右，文化面貌与昂昂溪文化有很大的一致性。稍晚的镇赉南岗遗址[14]，细石器减少，磨制石器增多，并出现了石犁。白城靶山墓地[15]为长方形土坑浅竖穴墓，葬式为单人、双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以上遗存年代均在距今约5500年左右，可称为黄家围子—南岗类型。这一文化的人们当以渔猎为其主要生活来源。

西部沙丘草原地带分布着以腰井子遗址[16]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其主要特征是建筑在地面上的房址居住面用黄白粘土抹平，周边修抹一道鱼脊形凸棱，可能属于似蒙古包式的建筑，遗物中多见精致的细石器，堆积中有大量的鱼骨、鱼鳞、蚌壳、兽骨等。年代约在距今7000～6000年左右。其经济来源应以渔猎为主。

中部平原及相衔接的丘陵地区，分布着以左家山一、二、三期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农安左家山遗址[17]分为三期四段，三期文化存在着不少差异。一期距今约7000～6500年左右，二期距今约6500～6000年左右，三期距今约5000～4500年左右。相距不远的农安元宝沟遗址[18]的发掘是对左家山一、二期文化的有力补充。这里的筒形罐腹偏鼓，纹饰更富于变化，并发现有左家山一、二期所不见的彩绘。值得一提的是左家山二期出土的雕刻小石龙古朴别致，元宝沟出土的石雕女人像粗犷生动，是吉林省新石器早期文化中难得的艺术珍品。

在中部地区，近年来还对伊通羊草沟[19]、杏山[20]、长春腰红嘴子[21]、公主岭肖家屯[22]、九台腰岭子[23]等遗址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发掘。这些遗址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分别与左家山的各期文化既有许多相同因素又有明显区别，有的则与新乐下层文化更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羊草沟和腰岭子都发现了面积较大的房址。羊草沟的房址面积近百平

方米，呈浅穴圆角长方形，居住面不平整，中部低凹，近壁边沿和中部凹下部分及长条形斜坡门道周边都有柱洞。腰岭子大房址为深地穴式圆角长方形，面积达 132 平方米，居住面平整，北部经烧烤，中部有石砌圆连环式灶，南边两角有窖穴，有门道，未发现柱洞。在居住面上有成堆小石片和大片兽骨，还发现未石化的猛犸象牙，出土细石器达 700 余件，很像是石器加工场。杏山房址中出土的有节石铲，为这一具有地方性特征器物的断代提供了可信的地层依据。

东丰西断梁山一、二期文化[24]是研究中南部丘陵地带新石器文化的重要资料。第一期陶器器壁较薄，以圆唇直口筒形罐为主，主要饰压印或刻划的之字纹。二期主要为直口或侈口筒形罐，还有陶塑人物、动物等，陶器纹饰丰富，有刻划或压印人字纹、交错平行线纹、叶脉纹等。第一期出土的石祖和第二期出土的不少陶塑均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和造型艺术的珍品。一期距今约 6000 年左右，二期距今约在 5000 年左右。

金谷遗址[25]、兴城遗址[26]的发掘揭开了东部长白山区新石器文化的面纱。从兴城遗存的资料看，大体可分两期。早期房址为浅地穴，小面积，有门道，柱洞不规律而少，无固定灶位。陶器以火候不高的夹砂陶为主，火候较高的砂质磨光陶较少，多直口筒形罐。纹饰以粗犷豪放的戳印或压划枣核连点纹、枣核形人字纹、直线纹、斜线纹为主。晚期房址为深地穴式，大面积，圆角长方形，居住面以白粘土抹平，中间有灶，有规律性的柱洞，无门道。陶器增加了侈口鼓腹罐、敛口鼓腹盆等，高火候磨光砂质陶明显增多，出现了红衣陶。石器增多，有较多大型亚腰石锄等。其时代距今约 5500～4500 年左右，可称其为金谷—兴城文化。

在南部长白山区，王八脖子遗址[27]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房址呈圆形浅穴式，有用石板立砌的灶址。陶器以火候不高的直口、敞口砂质褐陶饰纹筒形罐为主。可分早晚两段，早段纹饰多退化的之字纹，距今约 5500 年左右；晚段流行刻划交叉纹，距今约 5000 年左右。

二

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工作早在 1948 年就拉开了序幕[28]。50 多年来，青铜时代考古成果斐然。吉林省青铜时代文化多见青铜铸造的剑、矛、扇形斧、镞、小刀、锥、环扣、镜、泡形饰、牌饰等武器和小型制品，不见大型青铜礼器，青铜的使用似乎并不广泛。生产中仍大量使用磨制和打制石器，陶器以素面为主，其年代约在距今 4000～2300 年前后。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大致可以从地域分布上划分成五个区域。

在西部和西北部的多湖泊、沙丘草原地域，分布着以高火候饰篦点纹、刻划纹等组成几何图案纹的筒形罐、长颈壶、带耳鼓腹小罐及彩绘长颈壶、绳纹鬲等陶器为代表的

汉书一期文化。经发掘的大安东山头墓地[29]、大安汉书下层墓葬[30]、大安北岗子墓葬[31]等，多为土坑竖穴无葬具墓，还有无墓圹的平地封土墓，葬式有单人葬和男女二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出土的卧羊牌饰、鹿纹牌饰造型生动逼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一文化的年代约在春秋至战国。

分布在中部区域有两种文化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分布在偏北部平原区域的邢家店类型[32]。墓葬均为浅穴土坑长方形，不见葬具，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一、二次多人合葬及少数火葬。陶器火候高，表面磨光，陶罐数量多而富于变化，多饰桥状竖耳或瘤状耳。豆的型式也多样而别致，有的空心把座上还饰有各式镂孔。其年代当在战国前后。第二种类型是以第二松花江上游为中心，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的西团山文化。这是吉林省分布最广、发现最早、工作最多、积累资料最丰富的一种青铜文化。在吉林市长蛇山[33]、猴石山[34]、永吉杨屯[35]、舒兰珠山[36]等遗址，清理房址近60座。从房址建筑形式、地层叠压和器物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房址多在山坡风化岩上凿成穴壁或挖成竖穴的圆形或长方形小面积建筑，有些不见门道和灶。陶器以火候很高的砂质黑陶为主，以深腹圜底鼎、斜敞口漫鼓腹壶、尖唇漫鼓腹贴耳小罐为代表，未发现鬲。其年代当在西周早、中期。第二期，房址以石块垒砌为主，中间或边沿用石块隔成双间或垒砌小间，均以石块砌灶，多有明确门道。陶器以火候不高的砂质褐陶为主，以近平底、腹较浅、足外撇的鼎，浅袋高实足、根足外撇的鬲，侈口深腹高大的横耳罐为代表。年代当在西周中晚期。第三期，房址均在平地的高岗上，浅地穴、面积较大，地面经烧烤，有明确的门道、柱洞，还有多个灶址。陶器以火候稍高的红褐陶为主，多敞口深腹撇足鼎，出现了多种形制的鼓腹罐，壶均为长直颈。其年代下限当在战国。

西团山文化墓地，经过发掘的有西团山[37]、骚达沟[38]、土城子[39]、星星哨[40]、猴石山、泡子沿前山[41]、狼头山[42]、小西山[43]等十多处，总计可达500余座。墓葬大体有四种类型：即石棺墓、简化石棺墓、土坑竖穴墓、瓮棺葬。其中95%以上为石棺墓。石棺墓是在挖成的长方形风化岩坑或土圹内砌长方形石棺，上盖石板。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以不规则的石板对砌，少见青铜器，年代较早。第二类，两头以厚重的石板立砌，两边用石块垒砌，年代略晚。第三类，边框均以石块垒砌，其中有些墓底平铺石板，有少数砌有长方形小副棺，年代较晚。第二、三类墓出土石器中有些仿青铜器形制，并有青铜器随葬。随葬品摆放有一定的规律，随葬品种类因性别的差异而不相同，普遍存在随葬猪头骨的风俗。简化石棺墓、土坑墓、瓮棺葬年代最晚。从总体看，西团山文化延续时间应从西周到战国末。这一文化的人们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其经济生活应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经营。其族属，多数学者认为是古代涉族。尽管西团山文化的鼎、鬲具有自身器形特征，但其根源应是受中原鼎、鬲文化的影响。近几年发掘的羊草沟、北红嘴子、肖家屯等遗址中的上层文化遗存，亦是一种以砂质红褐陶为主，以

鼎、鬲、壶、罐为典型器的一种“鼎鬲文化”。

在中南部山区和丘陵地带，分布着一种以大架山遗址[44]、宝山遗址[45]下层遗存为代表的“宝山文化”类型。其房址是修筑在风化岩上的浅穴长方形建筑，居住面经焙烧，中部有石砌灶。在清理的同时代墓葬中，多为石板对砌或石块垒砌上盖大石板的石棺墓。葬式为二人合葬或多人火葬。陶器以砂质红褐、灰褐陶为主，流行瘤状和小形桥状竖耳，其中侈口矮形鼓腹罐、浅盘饰各种镂孔的喇叭形高圈足豆、戳印成组的小枣核形纹饰极具地方特色。出土的短剑枕状器、窄刃形青铜短剑石范和刻有网格纹的扇面青铜斧石范，是罕见的重要发现。

东部长白山区北坡图们江流域，最重要的是兴城遗址青铜时代遗存的发掘，我们称其为“兴城文化”，并已分成三期。其突出特征是：房址为分布密集的深地穴式无门道的大面积建筑，居住面以粘黄土铺垫平整，中部有凹坑圆形灶，边沿及中间有密集规律的柱洞。陶器以火候较高的素面手制砂质褐陶、灰褐陶为主。器形有多饰齿状花边的大小不一的筒形罐、鼓腹罐、垂腹罐、大型瓮、敞口碗、敛口钵、高足杯和各式纺轮。石器中有精心压琢的黑曜石镞、矛、尖状器、刮削器等，打制、磨刃的长大石铲、亚腰石锄、长方形大型磨盘、长大的磨棒和各式研磨器都极具特色。骨器极为发达，有各式锥、凿、矛、镞、匕、簪、角、锥，还有精细如现在钢针的各式骨针。从^{14}C测定看，最早者距今3885±150年，最晚者距今3200±110年。

对于比兴城稍晚些的青铜时代至早期引进铁器时代遗存，发掘亦较多。如百草沟[46]、一松亭[47]、金谷水库南山[48]、新光[49]等遗址。这一时期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圆角长方形，居住面多经焙烧，多有斜坡形门道和圆坑式灶，有较规律的柱洞。陶器以火候不高的素面砂质红褐陶和褐陶为主，器形有大型瓮、筒形罐、单孔或多孔甑、敞口豆、碗、盆、杯等，少有鼓腹器，流行乳状耳，稍晚流行柱状耳。其年代距今约3000～2300年左右。

这一区域内青铜时代的墓葬发掘，主要有小营子、新华闾[50]、金谷[51]、金城[52]、新兴洞[53]、北山[54]等墓地，计150余座。大体可分石棺墓和土坑竖穴墓两大类。与西团山文化石棺墓不同的是，这里的石棺有几座首尾相连或边框相连成为一组的，而且葬式有单人、双人一次葬，多人二次葬，单人一次葬与多人二次葬合葬及少数火葬等多种葬式。土坑竖穴墓发现较多，墓口用河卵石或碎石封盖，少数用土封。封土墓多为单人一次葬。随葬品中少有青铜器。从器物形态及^{14}C测定看，小营子墓群多为偏早类型，大体与兴城文化相近，其墓葬年代在距今约3000～2300年左右。

这一区域的青铜文化，仅在较晚遗存中发现极少青铜器，而且仅限于扣、泡、饰等小件，反映出青铜器冶铸极不发达。另外，在较晚的遗存中多见环状石器，有的边缘磨成刃状，有的呈花瓣形，有的厚钝，有的精细。对这一极具地方特征器物的用途，尚有

不少假说，值得进一步研究。

南部长白山区南侧的青铜文化，可以通化王八脖子遗址二、三期遗存为代表。第二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形有镂孔矮圈足豆、袋足鬲、侈口桥耳罐等。其时代约当西周。第三期房址为半地穴式，分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居住面均经火烧。陶器质地与二期相近，有少量泥质磨光陶，器形有竖桥耳、瘤状耳和无耳罐，圜底罐、方足鼎等。石器有柱状斧、双孔平刃刀、镰、枕状物、棍棒头、剑范和斧范等。铜器有扇面形斧、削，骨器有针、刀、镞、簪等。其时代约当春秋到战国。

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在南部和中南部的大柳河流域至头道江流域，分布约有70座由巨石支立的石棚。这种石棚或孤立一座或十几座成群建立在高山顶上，在梅河市、柳河县等地分布尤为集中。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应是青铜时代貊族的墓葬[55]。

三

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燕、赵势力已直接达到吉林中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1987年调查发掘的梨树县二龙湖古城[56]，是吉林省首次发现的战国城址，也是目前所知地理位置最偏北的一座战国古城，为战国时期燕国的北界树立了鲜明的坐标。至于省境南部，集安除了出土了燕“明刀”，还曾出土过“安阳布”、“平阴布”等赵国货币[57]。1980年，在集安高台子出土一件赵国青铜铍[58]。1985年，柳河向阳乡王八脖子采集到一批刻有“左得工”或“右得工”字样的铁铤铜镞[59]。1981年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八道沟镇葫芦套农民，在杂有尸骨、石镞和陶片的石堆中发现一件长胡三穿的青铜戈，戈身刻有“相邦”、“廿年丞闪(蔺)相女(如)邦左□庖智冶阳”和“肖(赵)”等铭文[60]。赵国货币和兵器相继在吉林南部鸭绿江畔发现，引起了学界很大的关注和兴趣；而与古代名臣蔺相如相关的文物迄无传世或出土，首次在东北边陲发现的蔺相如戈，确实弥足珍贵。

吉林省境内已认定属西汉的城池共3座，集中分布在省境南端。一是通化市自安山城[61]，二是通化县赤柏松古城[62]，三是集安市国内城[63]。对于研究西汉玄菟郡的建制，具有重大价值。

吉林中部汉代遗存发现最多的是今吉林市附近的平原地带。如吉林市的七城子、龙潭山、东团山和永吉的杨屯、学古东山等地，都曾发现以轮制泥质灰陶为代表的汉代遗存，主要器物有鼓腹罐、柱把豆、敞口钵，以及铁制的镢、锛、凿、矛、锥等。1973年、1975年试掘的学古东山遗址第一次明确这种遗存叠压在西团山文化之上。同样的叠压关系在永吉杨屯遗址亦有发现。这些发现是公元前2世纪末西汉设置四郡之后在这一带进行管辖的生动反映。

中原战国—汉代政治势力直接达到吉林，对这里原有土著文化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

影响，其最鲜明的标志是铁器很快得到普遍使用。这一点在吉林各地发现的这一阶段考古遗存中有着相当清楚的反映。

吉林中部可以桦甸西荒山墓葬[63]、榆树大坡墓地[64]、吉林市帽儿山墓地[65]为例。1979年在桦甸市西荒山发掘了8座墓葬，均为多人多次火葬的岩坑竖穴墓，墓底铺有厚厚的桦树皮。出土铁器有镬、镰、刀等。铜器有丁字形曲刃短剑、触角式短剑、柄身饰叶脉纹的曲刃刀、交错三角纹镜、双翼镞和一些饰件。陶器为手制夹砂褐陶罐、杯、钵等。石器有斧、刀、穿孔器、纺轮、磨盘、砺石、研磨器和各种珠管饰件。其铁器则与战国燕下都的典型器一致，应是战国晚期涉族的遗存。

1980～1981年发掘的榆树县大坡乡老河深墓地和1989～1997年发掘的吉林市郊帽儿山墓地性质基本相同，只是老河深年代稍早，约当西汉至东汉初年，帽儿山则大致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南北朝。对于它们的族属，曾有鲜卑和夫余两种不同认识，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是夫余遗存。

帽儿山墓地是80年代末在修建电缆塔的工程中发现的，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与中原汉代同类墓葬极其相像。从1989年起，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相继在这一带开展了5个年度的钻探和试掘工作，发掘墓葬150余座，出土文物近千件。根据已经取得的资料，这个墓地范围很大，墓葬分布密集，总数当在七八千座以上。主要是竖穴式土坑木椁墓，有单椁、双椁和三椁之别，椁室以厚重的大木枋构筑，敷有白膏泥，有的髹红漆，有的有棺床，有的还带头箱。这类墓的地表多有石堆或石圈为标识。尽管绝大多数墓葬都已被盗，仍可看出原来随葬品相当华美而且丰富。有动物纹金牌饰、金泡饰、金管饰等金制品；铜器有鎏金铜泡、人饰头形车辖饰、铜釜、铜镜、腕饰、马镳和带扣等；铁器有镬、臿、犁铧、马衔等；此外还有漆耳杯、漆勺、丝织品及大量玛瑙珠。陶器以火候不高的素面夹砂褐陶为主，有双桥耳陶罐和壶等。1993年在帽儿山墓地西山墓区18号墓中曾出土一副马镫和一批丝织品，引起了考古界的普遍关注。马镫由铜片夹裹木芯，以铆钉缀合加固，形制与集安高句丽墓出土的同类马镫相似，无疑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马镫之一。出土的丝织品残片有纱、绢、帛、锦等多种。其中有一幅帛画残片，出土时折叠着置于墓椁一角，展开后残长42、高36厘米，上以墨线描绘几组两方连续图案，图案由带箭头的十字形和如伸臂布指状的树木（?）组成，间隙中有两道平行曲折的虚线通过，用笔朴拙，结构工整，线条均匀，富有装饰性。据初步研究推测，整个图像或是示意引导灵魂归天的通路，可能系丧葬行列中的引幡。

1986、1987年发掘的东丰县大架山遗址上层和宝山遗址上层，展示了战国晚期至西汉吉林省中南部丘陵地区文化的基本面貌。这一带房址多分布在山头上，面积一般在25平方米以上。出土的典型器物是汉式的铁镬、铁镰、铁臿、铁刀、铁凿、铁镞和传统的石斧、石刀、石锤、石镰、石铲和砥石。陶器主要是手制的砂质褐陶的罐、壶、

碗、瓮、豆和纺轮，也有少数带绳纹的轮制泥质灰陶罐和钵。据^{14}C测定，距今为1976±72年。

吉林西北部松嫩平原战国—汉代文化，可以汉书二期文化为代表。大安市汉书遗址是1974年发掘的，房址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在灶址旁还发现过炭化的糜子。出土器物中不但有较多汉式的铁斧、铁刀和铁锥，而且还发现大量铸造矛、镞、鱼钩、扣、马蹄形牌饰、护心镜等器用的陶范和铁炼渣。陶器多泥质红陶，器形以绳纹鬲、船形器和彩绘红色的壶、罐、碗、钵、杯等最富特色，纹饰有条状纹、雷纹、之字纹、三角几何纹等。青铜器数量不多，主要是刀、锥、扣等，还见有青铜短剑的石制枕状物。骨器发达，有大量的锥、矛、锤、镞、匕、笄、甲片和纺轮等。^{14}C测定为距今2380±100年。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墓葬，曾在通榆兴隆山和大安渔场进行过发掘。1979年在通榆兴隆山清理的一座土坑竖穴墓[67]，没有葬具，为四具成年骨骸的仰身直肢一次葬。出土遗物颇具特色且非常丰富，计378件，有金马牌饰、金耳饰、铜铃、铜鸣镝、三角架形铜饰、带管的圆形镂孔铜饰等；陶器有长颈壶和鸭形鼎，为细泥磨光红褐陶，手制；还有五铢钱和大量珠、管、环、片饰件。当为西汉中期的鲜卑遗存。1974年在大安渔场发掘的14座墓葬[68]排列有序，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单人葬，无葬具，有一次葬和二次葬。随葬有铁镞、铁削、铁环、铁挂钩，骨制的镞，弓弭和桦皮制的弓囊和箭囊，陶器中除少量轮制泥质灰陶外，多为手制的泥质红褐陶壶和罐。墓地中还发现有只出马头骨的祭祀坑。有人认为属东汉前后的鲜卑遗存。

吉林南部是高句丽崛起之地。1997～1998年发掘的通化市王八脖子遗址第四、五期遗存，第一次揭开了浑江流域西汉至魏晋时期的文化面貌，为探究高句丽建国前后的文化形态提供了重要线索。这里的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居住面曾经火烤处理，有灶址，室内北部有石块叠砌石板盖面的火炕。出土有铁锤、带铤铁镞、鎏金铜钗等。陶器以轮制泥质灰黄色陶和手制夹滑石粉的褐陶为主，器形有平折沿罐、叠唇鼓腹罐和柱把豆、直颈壶等。

四

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是古代高句丽的发祥地。50年来，以高句丽中前期都城所在地集安为中心，对高句丽遗迹展开了比较全面的考察。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都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今集安），并构筑尉那岩城。70年代以来，曾多次对国内城进行调查、测绘和探掘[69]。濒临鸭绿江的国内城址是一座石城，平面呈方形，周长2686米，有城门6座，四面城墙共有14个马面。探掘资料证实，高句丽迁都国内之初，曾直接利用汉代构筑的土垣；

今存的国内城石垣，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高句丽在土垣基础上加修的。城内北部常见红色瓦砾，并不断发现凿造工整的大型础石，应是当年的宫殿和官衙区；近南城门内侧，曾发现铁钻和铁工具等铁制品，或意味着有当年的手工业作坊区。

尉那岩城址，即凭借自然山势构筑在国内城西北2.5公里高山上的山城子，亦即丸都故城。经调查、实测，此城平面略呈南北长的长方形；30年代日本人在《通沟》一书中将此城平面绘作东西宽的椭圆形，分明是错误的。

为了拱卫国都和王都，高句丽在通往国内城和丸都城的通道上重重设防，构筑一系列关隘、哨卡和城堡，形成一道道严密的屏障。在陆路方面，北道有关马山城、大川哨卡和通化的石湖关隘堵截通路；南道有望波岭关隘和霸王朝山城进行控扼。沿鸭绿江水路，则在凉水乡的海关和外岔沟都发现有抵挡由水上登陆的关隘遗址[20]。

高句丽建筑遗址发掘不多。1959年集安城东东台子清理了一组建筑群，其中比较完整的一座四周绕有回廊，室内设有火炕，中央矗立有一方被认为是祀主的巨石，可能是4世纪末高句丽王室的社址。令人感兴趣的是1995年在韩国公州百济都城遗址，也发现一处与这一社址具有同样规模、格局、形制和设施的建筑址，显示了高句丽文化对古代百济的深刻影响。

高句丽建筑多用石材，尤多花岗岩。集安市西北23公里高台子发现的高句丽采石场，不但可以看到大量开采下来待运的大型石材毛坯，而且在山岩岩体上到处可以发现成排的圆形凿孔，为了解高句丽采石工艺提供了依据。

通过多年调查发掘，对高句丽墓葬的分布、形制、年代、演进的轨迹和动因以至葬俗等等，都已获得比较深入的了解。50年来，吉林省清理发掘的高句丽墓约1200座。高句丽墓分石坟和土坟两类，石坟早，土坟晚；石坟有土圹和石室两种，土坟则只有石室。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石坟出现基坛以至阶坛，是为克服积石流失而渐趋完善的措施，反映了高句丽石造技术的不断积累和进步；而石圹向石室的转变则是与火葬向土葬的转变相联系的，显示了高句丽前后两种不同的葬俗和生死观。石圹适应焚尸升天，意味着对天国的孜孜追求；石室则是为死者营造的一个能安息长眠的环境，透露着对尘世的依依留恋。从现有资料分析，在集安一带高句丽墓实现由火葬向土葬的过渡，大抵在4世纪中叶至5世纪前叶[21]。近年来高句丽石墓多相互连属形成“串墓”的现象，已开始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从墓群整体着眼，对串墓的组群和数量、沿袭和盛衰开展分析，或将成为从考古学角度对高句丽社会结构形态进行探索的有价值的参照系。

高句丽古墓壁画是高句丽珍贵文化遗产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璀璨明珠。50年来新发现并清理的一批壁画古墓，是高句丽考古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重要的有麻线沟1号墓[22]、禹山下1041号墓[23]、长川1号墓[24]、通沟第12号墓[25]、五盔坟4号墓[26]、五盔坟5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27]等，这些发现使我们掌握的集安壁画古墓总数骤增至30座。

多姿多彩的画面和场景，鲜明而生动地展现了高句丽社会生活、精神世界、绘画艺术的方方面面；其中1041号墓第一次表明高句丽壁画古墓也包括石坟；而仅以黑墨绘制简洁影作梁架的1368号墓，则标示了高句丽壁画古墓的全新类型。

必须提及的是，在近年实施大遗址保护的基础工程中，对著名的将军坟、太王陵和禹山下3319号古墓所开展的新探索[76]。将军坟是高句丽第20代长寿王的陵墓，继前些年发现墓顶四周石材上凿有成排柱洞并出有铁链，在南隅发现有排水的涵洞之外，1998年还在墓域内靠陵墓后方发现了长达59米的建筑遗址，为研究高句丽陵寝制度增添了新资料。1992年重新测绘高句丽第19代好太王陵，并对墓室作了清理，证实这座每边长65米、高14米的宏大陵墓，不同于一般阶坛积石石室墓，形制十分独特。除最底下两层基坛石材硕大、积累颇高之外，其坟垄上的碎石和砾石原来也简略砌成阶状，总计阶坛可达16级；墓室构筑在阶坛顶部宽阔的平台之上，室中原筑有两坡水的巨大石椁，内置两铺棺床，对开的门扉向西通甬道。禹山下3319号墓位于国内城北山麓的台地上，曾因出土盘口青瓷壶、饰卷云纹铭有"万世太岁在丁巳五月廿日"文字瓦当和在东侧保存有人面刻石而引人注目。1997年对此墓作了清理，发现该墓原是一座阶坛积石砖室壁画墓，左、右耳室和墓室起券部分已经坍塌，出土有盘口青瓷壶、黄釉陶瓮和大量铁甲片，并在墓室西北角砖墙上发现了壁画残迹，初步认定年代为4世纪中期。这次清理不仅为高句丽古墓增加了新的类型，而且对进一步认识高句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及高句丽石室墓和壁画墓的起源，具有不容忽视的珍贵价值。

80年代，我国学者对著名的好太王碑开展调查研究，新识读出碑文67字，使洋洋1775字的碑文空前顺畅地得以通读，基本廓清了笼罩在这座重要碑刻上的重重迷雾[79]，被国外学者誉为开辟了此碑研究的新时期。

在大量发掘、调查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第一部综合体现我国高句丽考古成果的专著和高句丽研究丛书，也纷纷出版[80]。

在靺鞨—渤海考古方面，遗址和城址的发掘做得不多，除一般普查和复查工作之外，仅对渤海"旧国"址敦化敖东城、中京显德府址和龙西古城、东京龙原府址八连城和敦化城子山山城等重要城址作了重点探测[81]。敖东城破坏严重，格局已不清楚，仅知外城周长约2公里，为夯土构筑，南墙中部6米的豁口当为城门，门外长条土堆或当瓮门残迹。西古城和八连城均仿效唐代中原城市布局，都有方整的墙垣和整齐的街道，宫苑和官署都集中在北部。1984年发掘的浑江市松树镇永安村遗址[82]，使我们对渤海时期"鸭绿朝贡道"上的村落布局和生活状况有了较多了解。

清理发掘靺鞨—渤海时期的墓葬，总计近300座。80年代以来，在第二松花江畔的永吉杨屯、榆树老河深和永吉查里巴清理的一批墓葬[83]，为认识粟末靺鞨在建国前后的变化提供了资料；而1973年和1988年在和龙北大地墓群清理的65座墓葬[84]，则展

现了渤海建国之后的埋葬风习和社会状况。敦化六顶山墓群和和龙头山墓群因分别发现过贞惠公主墓[85]和贞孝公主墓[86]，并出土有石狮、墓志和壁画等珍贵遗存而被认定是渤海王室贵族的墓地，备受世人瞩目。近年来，运用物探技术，对这两处墓群作了复查。查明六顶山墓群第一墓区有古墓56座，第二墓区有古墓110座，共计保存有166座古墓，并对过去各家相当混乱的编号一一核实清理，作了统一编号；对龙头山墓群的三个墓区，也分别作了探测，查明龙湖墓区有古墓21座，龙海墓区有古墓14座，石国墓区有古墓13座，共计保存有48座古墓，并在墓群中发现有6处建筑遗址，为研究渤海的陵园制度提供了新线索。1998年，在清理石国墓区1号墓时，发现这是一座在同一坟垄下包括三个独立墓室的大型石室墓，原被盗的只是中间的墓室，东、西两个墓室并未破坏。东墓室有青砖砌筑的棺床，出土有4件三彩女俑、银笄、鎏金铜棺环、泡钉和铁钉等；西墓室有石块砌筑的棺床，出土有绞胎瓷枕、鎏金铜冠饰、带銙、棺环、泡钉和铁钉等[87]。三彩女俑和绞胎瓷枕造型精美，在渤海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形制和工艺都与唐代的相同，进一步证实了渤海文化实际上是唐文化的组成部分，又一次向世人炫耀了唐代"海东盛国"的绰约风采。

唐代渤海与中原同样盛行佛教，原有许多佛塔建筑，但多颓圮。1973年，曾在珲春马滴达清理了一座塔基的地宫；1984年，又对长白灵光塔的地宫作了清理[88]。长白灵光塔是一座方形的楼阁式空心砖塔，共5层，高近13米，由于年久失修，塔身向一侧倾斜，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近年来，经过严密观测和论证，制订了比较完善的维修方案，于1998年修葺竣工，使这座惟一现存的渤海佛塔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五

吉林省境内的辽金古城多达260余座。多年来，结合文物普查，对所发现的城址一一作了调查和测绘，并对一些比较大型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古城，作了多次复查和论证[89]。调查材料表明，吉林境内西部的所谓辽金古城，一般多建于辽代，金代继续沿用；而东部的辽金古城，往往只见金代遗物，实际上恐怕都是金代兴建起来的。其中有的古城，曾在历史上长期沿用，如明代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中心城堡乌拉古城，原来就是一座辽金古城。

近20年来，对辽金时代的居住遗址作了一些发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双辽电厂贮灰场遗址[90]、德惠后城子古城[91]和德惠揽头窝堡遗址[92]等，房址中都发现有与灶相连的折尺形火炕。双辽电厂贮灰场清理的8座房址均为长方形的地面建筑，小者30余平方米，大者百余平方米，房柱立于墙中，下有础石，出土有篦点纹、小方格纹的轮制泥质灰陶器和"崇宁通宝"，当属辽金之际的遗存。后城子房址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出土器

物丰富，其中有大量典型的金代铁器和“大定通宝”，大抵是金代中期遗存。1998年发掘的揽头窝堡遗址，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聚落址，房址分布密集，间距才2～5米，均为土墙瓦顶的木构架地上建筑，小的几十平方米，其中最大的6号房址，东西宽13米，南北长14米，面积达180多平方米，室内没有间壁，东北角还有一个袋形底铺青砖的贮粮窖。出土文物300余件，有白釉铁花瓷罐、定窑印花大盘和围棋子、瓷羊雕塑等，年代大致是金代晚期。以上收获，为金代遗址和器物研究竖立了标尺。

辽代墓葬继双辽骆驼岭辽墓和双辽高力戈墓群[93]清理之后，1995年在梨树偏脸城址（辽代三迁后的韩州）北2.5公里胡家屯发现了一处辽代墓群，并对其中两座辽代晚期的砖筑墓作了清理[94]。其中1号墓是一座八角形彩绘仿木外檐式结构的建筑，墙面抹白灰，上绘破子棂窗，是吉林境内首次发现的辽代壁画墓，墓主人可能是驻守韩州的显赫权贵奚人。

1979年至1980年舒兰小城子金代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的发掘[95]，使我们对金初贵族的葬制有了具体了解；1985年对镇赉黄家围子金代平民墓地的发掘，则是研究金代平民生活的具体资料。

东夏是金末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在吉林东部建立的割据政权。有的学者根据这一带历年出土的东夏铜印款识，结合文献资料，对东夏的年号作了考订。论证了东夏自1215年建国至1233年灭亡的19年中，共有两个年号：一为天泰，共9年；1224年改元大同，又历10年[96]。无疑是以考古论证历史的一项积极成果。

在松花江东流段上游今扶余一带，保存有许多元明时期的墓葬[97]，随葬有相当多景德镇民窑瓷器，反映了明代中原与这一带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1992年曾在扶余砖厂墓地清理了73座墓，出土瓷器100余件，经^{14}C测定为1493～1671年[98]。1992年，扶余岱吉屯出土了一件元代“至正年制”款的缠枝花卉彩瓷碗[99]，发现者以此为断代标尺，认为这一发现表明：元代确有彩瓷生产；有相当一批过去认为是明代中晚期的彩瓷和青花，其中包括有“大明年造（制）”款的瓷器年代，应提前至元末明初；元末明初瓷器生产并不存在空白。这一与陶瓷史相关的突破性认识，引起了陶瓷史界的热烈讨论[100]。

明代城址和遗址所做工作不多，只对海西女真扈伦四部的乌拉部、辉发部和叶赫部的中心城堡作了实测和调查[101]。

70年代，吉林师范大学曾经对清代遗迹“柳条边”进行调查。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又对这一遗迹作了一些解剖。查明清康熙初年所筑的柳条边，自辽宁开原入吉林省境，跨四平、梨树、公主岭、伊通、长春、九台、德惠至舒兰止，全长343.1公里，保存较好的边墙，今高1.5米，沟宽5米，深1.5米左右。在四平，还保存着当年布尔图库苏巴尔汗边门戍卒居住的房屋。

（执笔：刘景文、方起东）

注 释

①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文物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年。

③ 姜鹏:《吉林前郭王府屯旧石器的发现》,第13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大会论文,北京。

④ 陈全家等:《吉林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3卷第1期。

⑤⑩⑪ 陈全家等:《吉林市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东北亚旧石器文化》,韩国出版,1996年。

⑥ 孙建中等:《吉林榆树周家油房旧石器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1982年第19卷第3期;姜鹏:《吉林旧石器晚期人类生活环境的讨论》,《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辑;刘祥等:《榆树县周家油房旧石器新资料》,《长春地质学院学报》1998年18(1)。

⑦ 姜鹏:《吉林安图晚更新世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1975年第13卷第3期;《安图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第四纪地质》1978年论文摘要。

⑧ 姜鹏:《吉林榆树大桥屯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9卷第1期。

⑨ 程新民:《吉林长春市郊发现旧石器地点》,《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5期;程新民等:《长春市郊区红嘴子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长春地质学院学报》1993年第23卷第2期。

⑫ 姜鹏:《吉林抚松仙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东北亚旧石器文化》,韩国出版,1996年

⑬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黄家围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8年2期。

⑭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向阳南岗子遗址和墓葬发掘报告》(待刊)。

⑮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2期。

⑯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长岭县腰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8期。

⑰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2期。

⑱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农安元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89年12期。

⑲⑳㉑㉒㉓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资料。

㉔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东丰西断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91年4期。

㉕ 延边博物馆:《吉林省龙井县金谷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1年1期。

㉖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龙兴城遗址》(待刊)

㉗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化市王八脖子遗址田野发掘资料。

㉘ 杨公骥:《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初步发掘报告》,《东北日报》1949年2月11日。

㉙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安东山头古墓葬清理》,《考古》1961年8期。

㉚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辑。

㉛㉜ 白城市博物馆等:《吉林省镇赉县坦途北岗子青铜时代墓葬清理报告》,《博物馆研究》1993年1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农安邢家店北山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4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德惠县北岭、王家坨子墓地调查与发掘》,《考古》1993年7期。

㉝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发掘》,《考古》1980年2期。

㉞ 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3年3期。

㉟ 刘振华:《永吉杨屯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3年8期;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第

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7集。

㊱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4期。

㊲ 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西团山石棺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4期；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1期。

㊳ 段一平等：《吉林市骚达沟石棺墓清理报告》；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市骚达沟山顶大棺整理报告》，均刊《考古》1985年10期。

㊴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学报》1957年1期；康家兴：《吉林江北土城子附近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通讯》1955年1期。

㊵ 吉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3期；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星星哨石棺墓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3集。

㊶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考古》1985年6期

㊷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郊二道水库狼头山石棺墓地发掘简报》，《北方文物》1989年4期。

㊸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磐石吉昌小西山石棺墓》，《考古》1984年1期。

㊹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东丰县大架山遗址发掘报告》（待刊）。

㊺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东丰县宝山遗址发掘报告》（待刊）。

㊻㊿ 王亚洲：《吉林汪清县百草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8期。

㊼ 李云铎：《吉林珲春南团山、一松亭遗址调查》，《文物》1973年8期。

㊽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金谷水库南山遗址试掘报告》，《博物馆研究》1985年3期。

㊾ 吉林图珲公路考古队：《吉林延吉市新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7期。

5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延吉德新金谷墓葬清理简报》，《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辑。

5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汪清金城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2期。

5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珲春新兴洞墓地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92年1期；图珲铁路考古队：《吉林珲春市迎花南山遗址、墓葬发掘》，《考古》1993年8期。

54 图珲铁路考古队：《吉林珲春市河西北山墓地发掘》，《考古》1994年5期

55 王洪峰：《石棚墓葬研究》，《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56 四平地区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6期。

57 古兵：《吉林集安历年出土的古代铜钱》，《考古》1964年2期。

58 张雪岩：《吉林省集安县发现赵国青铜短剑》，《考古》1982年6期；赵书勤：《集安两件馆藏文物名称小考》，《博物馆研究》1997年2期。

59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柳河县文物志》第110页，1987年。

60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发现蔺相如铜戈》，《文物》1998年5期。

61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通化市文物志》第25页，1986年。

62 邵春华、满承志、柳岚：《赤柏松汉城调查》，《博物馆研究》1987年3期。

63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1期。

64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桦甸西荒山青铜短剑墓》，《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辑。

6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⑯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市郊帽儿山墓群发掘资料。

⑰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3期。

⑱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大安渔场古代墓地》，《考古》1975年6期。

⑲ 集安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吉林省考古研究室、集安博物馆：《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均载《文物》1984年1期。

⑳ 吉林省博物馆集安考古队等：《吉林集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2期；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集安县文物志》，1984年；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通化县文物志》。

㉑ 方起东：《高句丽墓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2期。

㉒ 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10期。

㉓ 吉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

㉔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辑。

㉕ 王承礼、韩淑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考古》1964年2期。

㉖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2期。

㉗ 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4期。

㉘ 集安市文物保管所资料。

㉙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㉚ 魏存成：《高句丽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倪军民、耿铁华、杨春吉主编：《高句丽研究丛书·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㉛ 王承礼：《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考古》1962年11期；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

㉜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浑江永安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2期。

㉝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7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㉞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简报》，《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辑；延边博物馆等：《吉林省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1期。

㉟ 王承礼：《敦化六顶山渤海墓清理发掘记》，《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3期。

㊱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渤海贞孝公主墓清理简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㊲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资料。

㊳ 邵春华：《长白灵光塔》，《博物馆研究》1983年1期；方舟：《长白灵光塔维修中发现地宫》，《博物馆研究》1994年2期。

㊴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文物志》第68～76页。

㊵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双辽电厂贮灰场辽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4期。

㊶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省德惠县后城子金代古城发掘》，《考古》1993年8期。

㊷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刘立志、姜杰：《我们的身边就是历史——德惠揽头窝堡遗址发掘及以外的东西》，《长春晚报》1999年1月10日。

㊸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双辽高力戈辽墓群》，《考古》1986年2期。

㊹ 梨树县文物管理所：《吉林梨树胡家屯辽代壁画墓》，《博物馆研究》1996年3期。

⑮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文物志》182页。

⑯ 张英:《东夏国纪年》,《博物馆研究》1986年1期。

⑰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扶余县文物志》1982年。

⑱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扶余土城子砖厂明墓》(未刊)。

⑲ 张英:《从"至正年制"彩瓷碗的发现谈"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文物》1994年2期。

⑩⑩ 扶余市博物馆:《扶余市石桥欢迎砖场元墓清理简报》;李锋:《也谈岱吉屯墓出土"至正年制"碗的年代》,均刊《文物》1995年4期。

⑩①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文物志》第68—85、90页。

黑龙江省考古五十年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局

在近代历史上，黑龙江省一度曾是俄、日等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有少数俄人和日人学者在此间作过一些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一时期的黑龙江考古，无疑有着明显的殖民地色彩。1931～1932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先生参加过哈尔滨顾乡屯遗址的发掘和黑龙江东部地区的调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于1930年主持了齐齐哈尔昂昂溪史前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并于1932年写出了《昂昂溪史前遗址》这一发掘报告。他的这项工作堪称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发掘的典范，是黑龙江省具有近、现代意义的严格的田野考古学的肇始。因而，梁思永先生是黑龙江省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逐渐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起来，考古机构趋于健全、考古队伍逐渐壮大，较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开展起来，积累了较多的新的考古资料，使人们能够比较系统地描绘出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及其在全国考古与历史上的地位。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省考古走上正轨，有了许多空前的新发现，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黑龙江考古的认识。

一

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成绩是突出的。考古工作者重新审定了早年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地点，又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存，并对这些地点的文化性质作了探讨。哈尔滨顾乡屯旧石器地点发现于30年代中期，但是长期以来，对顾乡屯组有无地层意义一直存在争议。1957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偕周明镇、胡长康等也调查过顾乡屯。直到1978年，经过多次发掘，东北地层断代总结第四纪哈尔滨顾乡屯调查组才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哈尔滨黄山旧石器地点，也发现于30年代中期，但直到1957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偕卫奇等在黄山大西沟采集到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块属旧石器时代遗物，以及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黄山西侧哈一机砖厂剖面的顾乡屯组地层中采得一枚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这一地点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性质才得以确认。

除了重新审定上述两处旧石器地点，我们新发现了旧石器地点多处。1996 年 10 月和 1997 年 7 月，清理发掘了阿城市交界镇石灰场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出土了动物化石 1300 余件，石制品 100 余件。动物化石有梅氏犀、鹿、狍子、獾、兔、鼬、鼢鼠等，有的骨片上带有明显的人工砍砸痕迹。石制品主要有刮削器、砍砸器、石片、石核、石块等。经对该洞穴出土的梅氏犀牙齿化石进行铀系法年代测定，初步得出绝对年代数据为距今 17.5 万年。这是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处重要文化地点[①]。在黑龙江省境内，至今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但已发现有晚期遗存和地点多处。

五常市学田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有石片、石核、石块等，石器的尺寸比较小；有多件有人工打击痕迹的动物骨骼和猛犸象门齿；与文化遗存同出的古动物化石有松花江猛犸象、披毛犀等哺乳动物等[②]。其年代为距今 4.2～2.4 万年。

哈尔滨市阎家岗遗址，出土有 9 件石器，包括石片、砍砸器、单刃刮削器。石器以小型为主，属以小石器为主体的石器工业。出土的碎骨中有人工打击痕迹的占碎骨总数的 14%。骨器有尖刃类和有刃类两种。角器数量少，见有锯和砍痕。最具特色的是发现两处用动物骨骼垒筑成的半圆形遗迹，系古代人类的临时居住址。在遗址中获得的脊椎动物化石共达 3000 多件，有最后鬣狗、披毛犀、真猛犸象、野牛、野马等 29 种。其 ^{14}C 年代为距今 22370±300 年[③]。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大兴屯地点，出土石制品 128 件，其中石核 15 件（包括锤击石核、砸击石核、细石核）、石叶 17 件、石片 71 件（包括锤击石片、砸击石片、残石片）、工具 25 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石器原料以玉髓、玛瑙和燧石为主，火成岩和石英砂岩少见。该文化是以小石器为主体并有细石器的石器工业，与华北地区的细小石器传统关系密切，但又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与文化遗物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 11 种，主要有野兔、普氏野马、东北野牛、原始牛等。根据动物的灭绝种属和 ^{14}C 测定结果为距今 11800±150 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④]。

塔河县十八站地点，出土石器在千件以上。石器的原料为凝灰岩、燧石和流纹岩等砾石，均产自当地。器类有刮削器、雕刻器、小砍砸器、锛状器、龟背状砍砸器、楔形石核等，其中以刮削器为最多。工具以小型为主，文化层中的石制品具有自下而上由大变小的特点。制法以打片为主，也存在间接打片，工具修理主要用直接加工修理，也存在压制法修理。这种以细小石器为主体的石器工业，应属于华北的"长石片——细石器为主"的文化系统[⑤]。

讷河市清河屯遗址，出土石制品有石核、砍砸器、刮削器、多面体石核、船底形石核、石片、石锤，以及雕刻器等，石材以灰色页岩和棕褐色硅质岩为原料，系就地取材。工具属中型或稍大类型工业。其年代，经地层比较分析，其上限应距今约 21000 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⑥]。

以上，讷河清河屯属大石器为主体的石器工业类型；阎家岗属以小石器为主体的石器工业类型；昂昂溪大兴屯、塔河十八站属细石器为主体的石器工业类型⑦。此外，还有龙江缸窑、呼玛老卡、漠河老沟、饶河小南山等地。

二

黑龙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很大的发展。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黑龙江大地的人群，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条件下，创造和发展了各具特色而又丰富多采的文化。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考古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如果以 1930 年梁思永先生调查和发掘昂昂溪史前遗址为起点，那末，半个多世纪以来，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全省范围内已有普遍发现；二是类似昂昂溪遗址的文化遗存也有多处分布；三是发现了早于昂昂溪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现在可以确定黑龙江省早于昂昂溪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两支。一支是密山市的新开流文化。这支文化的陶器的基本器类有直口筒形罐、侈口筒形罐、敛口筒形罐、钵等，器表纹饰繁复，常饰篦点条带纹、方格纹、菱格纹、鱼鳞纹、三角纹、圆窝纹、席纹等，其中有几种纹饰饰于一器者；有磨制和压制的石器，骨角器发达，还有骨雕工艺品鱼和鹰头等。M5 人骨经树轮校正的^{14}C 年代为距今 6080 ± 130 年⑧。桦川万里霍同、鸡西刀背山、抚远亮子油库、依兰无风浪、饶河小南山等地点出土的陶片纹饰，有与新开流文化陶器纹饰相同和相似之处。

另一支为肇源小拉哈遗址一期甲组遗存。“该组遗物的陶器主要是以夹砂直口筒形罐为基本器形，以刻划弦纹、席纹和戳印纹为主要纹饰。从弦纹和席纹的特点来看，分别与辽河流域新乐下层文化和第二松花江流域左家山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同类纹饰相同。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左家山一期的早段和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均处在公元前 5000 年以前，其总体特征是陶器的底部均经加厚处理。由于小拉哈一期甲组筒形罐的口沿普遍较薄，唇不加厚，因此年代可能略晚。在一定程度上应与左家山一期遗存的晚段相当，即处在公元前 4500 年左右”⑨。

与昂昂溪文化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肇源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主要以施条形附加堆纹的罐类为主。另见有少量的细石器和骨器。从陶器表面附加堆纹的特点和骨枪头的造型风格来看，该组遗存在年代和性质上无疑应纳入本地 30 年代发现的昂昂溪文化范畴。此次发掘出自 H3602 的陶片标本经热释光检测，年代为距今 4000 ± 360 年（TK353）；出自 G3002 的动物骨骼经^{14}C 的测定，年代为距今 3688 ± 104 年，树轮校正为 B.C.2130～1777 年（ZK-2686），表明该文化应属本地区年代最晚的新石器时代遗存”⑩。但是，昂昂溪文化的年代，如参照与其文化性质相同的吉林省白城靶山墓

地的两个经树轮校正的^{14}C年代测定数据，为距今5460±110年和距今5175±130年。由于时代的不同，在30年代发掘昂昂溪遗址的当时，尚无测定年代的技术，现在只从文化性质上比较，昂昂溪文化分别同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和靶山墓地有相同的性质，而其年代则相去甚远。这一矛盾将继续推进对昂昂溪文化的年代学方面的研究。在昂昂溪已发现有昂昂溪文化类型的地点百余处，依安县乌裕尔河桥南遗址，杜尔伯特县李家岗墓葬、木吐那亚遗址，泰来东翁根山遗址等地的文化遗存也可能属于昂昂溪文化的范畴。

晚于或与昂昂溪文化同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有宁安市莺歌岭下层遗存，出土陶器有筒形罐和钵两种，器表纹饰富于变化，有篦点纹、划纹、压印纹、梳齿纹、圆窝纹等，出土石器有有肩石铲、鞋底状石器等，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11]。

还有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出土玉器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依兰县倭肯哈达遗址、尚志市亚布力遗址、饶河县小南山遗址等。倭肯哈达洞穴遗址出土陶器以双唇盘口罐、钵为主，器表饰篦点条带纹、圆涡纹、附加堆纹和刻齿纹，出土玉器有异形玉璜、玉璧等。亚布力遗址出土陶器有盘口罐、钵等，器表大多饰纹，有绳纹、篦点条带纹、席纹、刻划纹等，复合纹饰少见，并出土有三联玉璧等。尤其是1991年7月，饶河小南山之巅的墓葬中，出土随葬品126件，其中有玉器67件、石器56件、牙坠饰3件。玉器有玦、环、珠、斧、矛、匕、簪和斜刃器等。石器有斧、凿、镞、锥形器、砺石和石斧的半成品等[12]。其中玉器的数量，几乎相当于建国以来黑龙江省各地出土的史前玉器之总和[13]。小南山脚下有乌苏里江流过。“乌苏里”系满语，意为“天王”。因此，有人将墓主人与“天王”相联系，认为“应是一位地位显赫、掌握很高权力、占有相当财富且受人尊重的人物”[14]，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仅如此，该墓主人还应是掌握制造这些石器和玉器技术的权威。该墓葬的发现是黑龙江省近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认为小南山是“黑龙江的牛河梁”、“阿速江畔的金字塔”是并不为过的[15]。倭肯哈达出土的玉器，形态上同红山文化的玉器少相似之处。但亚布力出土的三联璧和嫩江流域古代遗址出土的双联璧与红山文化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小南山出土的玉环、玉玦等可能要早于红山文化，且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突出的是出土了砺石和石斧的半成品，可以看出当时当地人们制作玉、石器的切割和磨制技术的特点。黑龙江省出土玉器的重要地点还有延寿县的火烧嘴子、庆安县的莲花泡等。

黑龙江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反映着渔猎经济，有的地方兼有采集经济和原始农耕的特点。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新开流文化和昂昂溪文化，时间虽有早晚，文化面貌也有不同，但都是不同类型的渔猎文化，说明当时人群不仅是以这种经济和文化从“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的，而且也是以这种文化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

三

黑龙江省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不同，无大型青铜礼器，只有少量镞、削、笄、环、扣、泡、牌饰等，常常伴出有大量石器，属于小型青铜器类型。正因为如此，过去考古学界都把这种青铜文化混在新石器时代之中而未予区别。随着这类遗存发现日多，人们认识到其文化面貌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年代也要晚于后者，所以，考古学界把这种文化从原来的断代中分离出来，而确定其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目前为止，在松嫩平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是肇原小拉哈文化。以小拉哈遗址二期遗存命名这一文化。这期遗存的陶器绝大多数为素面，只有少数施附加堆纹或刻划几何纹、乳丁纹。器物造型主要以直口假圈足为主，不见三足器。许多假圈足器的底面一侧刮出凹窝，然后自外向内斜穿两孔。平底器不见假圈足。器物类别仅见罐、壶、碗、杯、盂、钵和带流器七种，其中以前三种数量最多，后四种数量极少。具体有直颈鼓腹双耳壶、敛口鼓腹罐、敞口弧腹罐、单耳杯、折腹碗、斜腹碗等，台底和矮圈足底富有特征。出土铜器极少，有青铜刀、青铜笄和双联泡饰等小件青铜器，多石器、骨器和蚌器等，还有玉璧、玉坠等。小拉哈二期 H0001 陶片经热释光检测，其年代为距今 3830±340 年（TK－354），大致处在中原地区的夏的纪年范围[16]。

所谓先白金宝文化，即是以白金宝一期为代表的遗存和小拉哈二期为代表的小拉哈文化。基本陶器为直颈鼓腹壶、敞口筒腹罐、矮颈鼓腹罐、双耳罐、单耳杯、斜腹碗、袋足鬲等。以素面陶为大宗，纹饰有乳丁纹、篦点几何纹、戳印纹、绳纹等。F3019 和 F3012 经树轮校正的 ^{14}C 年代测定分别为距今 3260±70 和 3090±60 年[17]。小拉哈二期遗存[18]与白金宝一期遗存具体器物尚有所区别，具体年代也有早晚之别，但就其都早于白金宝文化来说，宜以小拉哈文化相称。

松嫩平原地区晚期青铜文化是以白金宝遗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白金宝文化。这种文化是从白金宝一期遗存发展而来的。其基本陶器有筒腹袋足鬲、筒腹罐、侈口筒腹罐、折腹小平底盆、单耳杯、斜腹碗等，纹饰有篦点纹、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等，以几何篦点纹构成的鹿、羊、蛙、鸵等图案最富特色。从年代上看，属于白金宝文化的 ^{14}C 年代数据，早的为距今 3260±70 年（ZK－2660），晚的为距今 2790±65 年（ZK－0324），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学术界有人认为，白金宝遗址的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面积如此之广反映了古代这里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表明这里应是当时嫩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中心，标志着当时此地已率先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四

如果说把以小拉哈文化、白金宝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从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分离出来，使黑龙江考古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向青铜时代考古迈出了一大步，那么，把黑龙江早期铁器时代考古从青铜文化考古中分离出来，是使黑龙江考古又迈出了一大步[19]。现在看来，黑龙江省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分布比较普遍，兹分为松嫩平原地区、牡丹江及绥芬河流域地区和三江平原地区进行叙述。

松嫩平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可分为早期铁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两期。早期遗存有：1.肇源小拉哈三期文化，包括白金宝三期遗存、卧龙遗址三期、肇东哈土岗和七棵树遗址等，基本陶器有大口矮裆鬲、侈口束颈鼓腹壶、矮颈鼓腹罐、单耳杯、舟形器、斜腹罐、支座等，纹饰有绳纹、戳印纹、粗篦点纹、红彩绘等。其年代相当于汉书二期，^{14}C年代测定为距今2405±105年。2.泰来平洋文化，包括平洋砖厂和战斗两处墓地，肇东东八里墓地、齐齐哈尔大道三家子墓地、富裕小登科墓地等也应划入这一范畴之内，基本陶器有束颈壶、直颈壶、平底碗、圈足碗、鸭形器、鬲、小三足器、匜等，器表饰红彩绘、篦点纹、戳印纹等。平洋墓葬中有甲、乙两类墓，甲类墓以壶、碗为随葬器物，乙类墓以小三足器、鬲和陶支座为随葬器物。平洋M4棺木经树轮较正的^{14}C年代测定距今2410±8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20]。3.宾县庆华遗址，基本陶器有敛口瓮、堆纹圆口罐、双耳壶、双耳罐、矮足鬲、甑、斜腹碗、鬲、匜等，多素面，有些陶器器表涂红衣或绘红彩绘图案[21]。松嫩平原铁器时代遗存有望奎厢家围子遗址，基本陶器有直颈鼓腹壶、侈口罐、盘口罐、双耳罐、双耳壶、水波纹罐等，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戳印纹、水波纹等[22]。这里出土的铁器已远比早期铁器时代遗址丰富，并有较大型的铁器如铁刀等的出土。

牡丹江及绥芬河流域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有：1.团结文化，以东宁县团结遗址命名，其基本陶器有下腹急收为小平底的瓮和大罐，浅盘高圈足豆、柱把豆、敞口斜壁甑、盆、碗等，多素面，瓮、罐、甑、盆上常安有圆柱状双钮，还出土有铁镰和五铢钱等。F5门道踏板和F1木炭经树轮校正的^{14}C年代为公元前420±105年至公元前65±85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到西汉后期。学术界把团结文化称作沃沮文化[23]。2.东康类型，以宁安市东康遗址命名，陶器有侈口筒腹罐、敛口筒腹罐、侈口壶、敞口碗、杯等，多素面，瓮、罐、盆上多饰乳丁双钮。F2炭化粟经树轮校正^{14}C年代测定为公元315±95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24]。宁安牛场、大牡丹、东升等遗址可划入这一文化范畴。3.东兴文化，以海林县东兴遗址命名，陶器有浅腹柱钮罐、浅腹单把罐、侈口深腹罐、侈口浅腹罐、壶、甑、

敞口碗等，多素面，少量饰附加堆纹、划纹、压印纹等。这类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器类较早期有所增加，浅腹柱钮罐、浅腹单把罐、侈口浅腹罐的器身渐次变矮。F6木炭经树轮校正^{14}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56年至公元118年。属于这类文化的有河口遗址、木兰集东一期遗存等。这类遗存中共生的圆柱状双钮和斜柱状单把，反映了团结文化的圆柱状钮与滚兔岭文化的斜柱状单把的结合。晚期遗存有：1.以河口三期侈口罐、直腹缸为代表的遗存，其在微侈的口沿下安有四个乳突的特征，是东康类型陶器的影响。2.河口三期重唇花边口罐、花边假圈足碗为代表的遗存，表明其与三江平原同仁文化的关系[25]。

三江平原的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文化也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有：1.滚兔岭文化，以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命名，陶器有侈口鼓腹大罐、重唇花边口罐、单把罐、直口鼓腹壶、敛口碗、敞口碗等，多素面，以斜柱状单把最富特征。出土铁器有镞、刀、甲片、环和带扣等。F7和F2木炭经树轮校正^{14}C年代测定为距今2140±70和1955±7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汉时期[26]。2.蜿蜒河类型，陶器有喇叭口细颈鼓腹弦纹罐、敞口短颈方格纹罐、喇叭口碗、红衣彩绘壶等，纹饰有方格纹、附加堆纹、指捺纹、凹弦纹、波浪纹等。F2木炭经树轮校正的^{14}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1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27]。晚期遗存有同仁文化，陶器有盘口束颈大罐、重唇花边口小罐、扁身斜口器、敞口碗等，纹饰有条状篦纹、条状划纹、连续折线纹、附加堆纹、平行锥刺纹、指甲纹等。划为同仁文化的遗存有同仁一期、四十连遗址、团结墓地遗存等。四十连F3和F1木炭经树轮校正的^{14}C年代测定为距今2090±95和1660±9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东汉前期到东晋早期。同仁F3木炭经树轮校正的^{14}C年代测定为距今1420±8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南北朝晚期。学术界认为，同仁文化应是黑水靺鞨的物质文化遗存[28]。

在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三江平原地区汉魏古城和聚落址的调查、发掘情况。至今已发现这类遗址632处，其中城址270处，仅双鸭山市境内已发现约510余处，随着调查的进展，这类遗址还在不断成批地被发现。其中友谊县凤林古城，周长6.13公里，占地面积约120多万平方米；中间方城周长490米，城有门、角楼、马面和护城壕，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铁器、铜器（双耳铜釜、铜铃）等。据方城东垣出土木炭经树轮校正测定为距今1735±89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三国中期。凤林古城处于三江平原汉魏古城和聚落址的中心地带，这座古城是这一类城址中的最大古城址。宝清县炮台山古城与凤林古城隔七星河相望，系由平面三圈和立体三层城垣构成，最下层城垣长约4000米，其中两城当为最早的瓮城[29]。学术界认为，这里古城林立的文物景观，展示着这一时期三江平原已进入了以城邦为主要形式的国家阶段，或谓酋邦方国时期。标志着三江平原在这一时期已跨入了文明时代。对于这种考古文化的族属，有的学者认

为是挹娄文化[31]，有的则认为是豆莫娄文化[32]。还有的学者认为，上述现象反映了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江平原的挹娄国、勿吉国、北夫余国、豆莫娄国等方国的各族争雄和文化交融。

五

黑龙江地区的唐代渤海考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取得了重大突破。首先是渤海古城址、古建筑址的发现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对渤海古城作了调查和考证，有人提出东宁县大城子古城是渤海率滨府故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海林三道河子的兴农古城址，周长600米，城内有居住址，设曲尺形火炕；并出土有"开元通宝"，这座中小型古城建筑特点极近唐风。在牡丹江市北部山区，还发现了渤海边墙，俗称"小长城"。1981～1985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渤海上京京城遗址的1、2号房址和3、4号门址，对"午门"、一殿台基和部分宫墙进行了清理，并找到了宫城的护城河。另外，对一殿前广场和宫城西墙进行了钻探，对宫城、御苑及内城作了实测，探掘了一殿西廊南北段基础、东西向段和2号门南端入口处门道等[33]。继之，又发掘了宫城外的官衙址。1997年，新发现了外城墙11号门址，内城夹墙以及御花园址东城墙外的古道，在城内白庙子村发现了七层套的舍利函[34]。在离上京城不远的牡丹江畔杏山一带，发现和发掘了当年为建造上京烧造砖瓦等建筑物构件的窑址。在上京城址范围内，曾发现过许多珍贵文物，如铁盔、"天门军之印"等印鉴、"开元通宝"、云形大盘、白瓷碗、紫瓷罐、金佛、金带饰、鎏金铜佛和铜人、舍利函、鎏金铜鱼、铜镜等。出土的大批铁器有犁、铲、镭、镰、锤、钳、剪、钉、镞、杈、门楣、门框、带铐、鼎、铃等，反映着渤海上京地区的冶铁技术水平和手工业、农业的发展状况[35]。在东宁县团结村，海林县渡口、振兴、鹰嘴峰、细鳞河等地的渤海村落遗址，清理出了一批小型半地穴式房址，对渤海平民住宅形式和生活面貌增进了了解[36]。二是渤海墓葬的清理和发掘。多年来，清理了海林山嘴子、三道中学、柴河北站、二道中学、东沙府、哈达湾、洋草沟，牡丹江桦林石场沟，宁安东莲花村[37]，东宁大城子等地的部分渤海时期的墓葬。1991年，在宁安市三陵局部地区开展了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发现地下有墓葬群，其中有3座较大型的坟墓，其余为小墓，按勘探编号，以三陵3号墓为最大。首先对一座较小的三陵2号墓进行了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渤海时期的壁画墓。该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上部结构为抹角叠涩藻井。墓道填土中出土有陶兽头、铁镞、蚌壳、兽足、陶盆等物品。在墓室顶部、四壁及甬道两侧有精美的壁画，其内容分花卉、人物两类，花卉图案美观，色泽艳丽，人物皆女性，姿态生动传神。墓室内摆放着10余具人体骨骼。这是我国正式发掘的渤海国大型石室墓，为渤

海史研究提供了葬俗、人种学、建筑艺术、服饰、礼制等方面的实物资料。这次发掘，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将对渤海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产生重大影响[37]。1996年，又在2号墓西北150米处，发现了4号墓，清理出土了渤海三彩熏炉和银制棺环，以及人体碎骨等。这件熏炉是渤海三彩的代表作。三陵地区的地球物理勘探尚需全面开展，以完全摸清地下墓群的分布情况。三陵墓群的勘探与发掘或许意味着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渤海王陵区终于被找到了。1992～1995年，在宁安渤海虹鳟鱼场发掘了320余座靺鞨—渤海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2000余件，为靺鞨—渤海文化的分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这一发现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38]。

六

辽代在黑龙江西部地区设泰州。泰来、龙江等地是出土辽代文物遗迹较多的地方。泰来塔子城古城，周长4562.8米，有东西南北四座瓮门，城垣之外环有两重护城壕。有人考证塔子城是辽泰州故址，为辽代主要控扼室韦诸部的北方军事重镇，又是汉族早期聚居的地方。1956年，该城出土的辽大安七年（1091年）刻石记有“泰州河堤”字样和47个汉族人的姓氏，证明公元11世纪末，已有大量汉族聚居于黑龙江地方了[39]。

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之间，辽朝设五国部节度使，依兰五国头城为越里吉故城、汤原双河古城为盆奴里故城、桦川万里霍同古城为越里吉故城、绥滨奥里米古城即奥里米故城等。在伊春大丰金山屯还曾出土过契丹大字双勾阴文“敕走马”金牌。

三江平原地区的辽代考古主要是提出和研究辽代五国部女真人的物质文化类型。根据绥滨新城二号辽代古墓群的清理发掘和绥滨地区的考古调查，首次提出二号文化类型为五国部文化类型。文献记载，黑龙江绥滨县境是辽代五国部之一奥里米部之所在，奥里米古城至今保存完好。属于这种文化类型的陶器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侈口复唇深腹平底夹砂粗陶罐，间或饰以弦纹和拍印小方格纹，均手制，用作炊煮器。另一种是细泥质灰陶罐，有素面灰陶罐、瓜棱罐、喇叭口长颈壶和瓜棱壶等，皆轮制，用作饮具或食具。铁器有小铁削、铁刀、铁镞和铁腰带等。铜器有锻制长方形和半月形刻花鎏金带銙和铸造的镂孔花纹带銙，后者上饰铜铃，还有成套镂孔铜胸饰等。石器有用矽化木制作的砺石等。考古工作者分析了这种文化与黑水靺鞨和金代女真文化的异同及其渊源和继承问题，指出这是受契丹文化影响的辽代北方女真人的物质文化遗存，即属于辽代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五国部文化[40]。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麦德维捷夫撰文评说，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东北部中世纪考古方面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在哈尔滨新香坊墓地、阿城双城一带墓地也发现了辽代女真人的遗物，可以说是辽代生女真完颜部的遗留，如灰陶瓜棱罐、铁吊锅、银盏、银杖、铜带銙等。铜带銙中有

如绥滨三号出土的锻制带铐，更有海东青捕捉天鹅图案的铜带铐。这些都是典型的女真文物[41]。

12世纪初，生女真完颜部以阿什河、拉林河流域为中心起兵反辽，建立了金朝政权，灭辽和北宋后，长期与南宋对峙。金朝上京路及所辖蒲与、胡里改、速频、曷赖等路管辖着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上京路素有“金源”、“内地”之称，金朝前期都城上京会宁府故址即今阿城白城。黑龙江省境内已发现金代古城近200处[42]，都是金代路府州县建置的所在。古城大多均设瓮城、马面和角楼，有一定数量的“对面城”、“子母城”。金上京故城，受辽上京建制影响，周长11公里，气势宏伟。克东蒲与路古城、肇东八里城古城、兰西郝家城子古城、青岗通泉古城、依兰土城子等都是金代军事重镇。蒲与路古城和依兰土城子，是确定金代北部壤地封疆的地理坐标。从蒲与路古城向北三千里到外兴安岭火鲁火疃谋克为金代北部边界[43]。以依兰土城子为胡里改路路治所在地，从此向东北，管理着兀的改、吉里米诸野人之境，也即是金代的东北边境。

金代东北路界壕边堡，即金长城，达斡尔语称“乌尔科”。这是金朝为抵御西北蒙古（包括阻卜、鞑靼、盲骨子）的窜扰，修筑的漫长的界壕边堡线，分东北、临潢、西北、西南四路。东北路界壕边堡200余公里的段落在黑龙江省西境，已于1959、1960年调查清楚。它起自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北之后宜卧奇附近（“后宜卧奇边堡”即《金史》记载的“达里带石堡子”），循大兴安岭东南麓，越诺敏、阿伦、音河、耶鲁、济沁等河向西南延伸。在界壕内侧部署了19座边堡和3座大型屯军城。界壕在金初由泰州都统婆卢火开始修筑，代有增修，至金章宗承安元年、二年（1196、1197年）全部告竣[44]。

1973年，在黑龙江畔发掘绥滨中兴金代墓群，出土了较多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铜钱、铁器等。其中精美丝织品和名窑瓷器（定州、耀州、磁州窑）可以肯定为中原产品；“飞天石雕”是受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影响的作品。墓中出土了一颗带有汉字“郎”字的私人石印，“郎”是女真人女奚烈氏改的汉姓。在女真人的故乡黑龙江流域也出现了改用汉姓的社会风习了[45]。

在历史上黑龙江地区中部和北部大量开采铁矿，生产和使用铁器是在金代。在阿城小岭五道岭一带发现冶铁遗址，有古矿洞10余处、炼铁炉址50余处及冶铁工具等，说明金代初期采矿、冶铁、锻造已成系统。肇东、五常、宾县、伊春、依兰、逊克、虎林、饶河等地都有批量不等的金代铁器出土，表明当时铁器已普遍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种类完备，制作水平较高，有斧、锤、凿、钳、锯、刨、刀、剪、犁、镰、锹、镐、矛、镞、冰穿、铡刀及各种兵器、车具、刑具和生活用具等。其中鲫鱼形铡刀、箍缝向上的铁锹、葫芦形剪刀等都是可据以断代的铁器标本。尤其是七台河出土的一柄錾有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款的腰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对黑

龙江流域出土的金代铁器生产技术水平，俄罗斯学者曾做过金相分析，指出12～13世纪的女真人在发展生铁铸造方面比欧洲领先了200年[46]。

金代前期，汉人工匠的大量迁入，促进了金源内地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里出土的诸多石刻、铜镜、铜坐龙、金帽顶、金腰带、有"上京香家"款的金器、银制龙纹马鞍桥、银骨朵、银炉、银盘、银盏、金列牒、以"春水秋山"为题材的玉器（玉人、玉马、玉鱼、玉羊、玉鹿等，以及精美的陶瓷器，都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珍品。

黑龙江各地出土过许多金代官印，是金代军政机构和疆理区划的实物证据，如"胡里改路之印"、"蒲峪路印"、"恤品河窝姆艾谋克印"等。金代窖藏铜钱时有出土，多者达1000公斤。收集到的1枚"靖康通宝"折三钱是古钱币中的珍品。出土的14枚金代"承安宝货"填补了中国货币史中实物的空白，这是白银货币从银锭发展到银元的过渡形态，属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

1988年，阿城巨源乡城子村金齐国王完颜晏夫妻合葬墓被发现，出土有"太尉开府仪同三省事齐国王"银牌、"玉逍遥"、玉天鹅、金项链、金锭、金耳环、金鞘玉柄刀、竹杖和男女墓主人的多层套多式服饰，男著8层17件，女著9层16件。这些丝织品种类有绢、绸、罗、锦、绫、纱等。服饰种类有袍、裙、带、巾、冠、鞋、袜等。其针法灵巧多变，颜色富丽多彩。这些金代丝织品和服饰堪称孤品，填补了中国金代服饰实物的空白。完颜晏，女真名"斡伦"，是金太祖完颜旻（阿骨打）的堂弟，生前封太尉、齐国王。城子村小城当是他的故乡和封地。像这种地位很高的皇室贵胄，陪葬品如此精美重要而又未遭任何破坏的墓葬，在考古工作中就是几百年也是不容易遇到的。有的考古工作者，将齐国王墓誉之谓"塞北的马王堆"[47]。

金朝末年，蒲鲜万奴在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东部地区建立了东夏国。经考证，宁安城子后山城即为东夏国城址。近年出土的天泰七年十二月少府监造"夺与古阿邻谋克印"、天泰二年元月北京行六部造"万户天字号印"、天泰二年造"古州之印"、"北京劝农司印"、"勾当公事之印"、"祥州节度使印"等印章，均刻有"天泰"年号，是为东夏国遗物。"古州之印"出土在牡丹江市附近，有人考证古州即在此一带。"北京劝农司印"发现于海林旧街，有人也考证旧街古城可能为东夏国的北京治所。

七

元代，黑龙江地区归辽阳行省下辖开元路、水达达路和征东元帅府管辖。在今黑龙江省境内常发现有元代遗址和文物。汤原县固木纳城古城，虽于早年发现，但考证其为元代桃温万户府治所则是后来的事。肇东八里城为元代所沿用，是肇州屯田万户之所在。泰来塔子城，也为金元所沿用，于元代为泰宁路故城，在城内西北部有大面积元代

建筑群落废墟，遗有汉白玉及花岗岩石柱础、琉璃釉瓦及龙纹、牡丹花纹滴水等，有人考证，这里是元代宗王斡惕赤斤系家族故墟。阿城出土的至正十五年（1355年）七月中书礼部造八思巴文“镇宁州诸军奥鲁之印”、“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印”、“扬州元宝”和铜火铳、桃形瓷壶，宝清发现的甲寅年六月塔查国王发“管民千户之印”、“总押所印”等，都是元代重要文物。

明代，黑龙江地方归奴儿干都司管辖。沿松花江而设置的海西东水陆城站遗迹不断有所发现，有人考证抚远县的莽吉塔站古城即是其中的一站，证明这是明代从内地通往奴儿干都司的交通干线。当年明朝内官亦失哈的船队曾12次从这里航向特林地方。依兰马大明墓出土的双螭耳玉杯和依兰、肇源、绥滨等地明墓中出土的青花瓷器等，丰富了黑龙江省明代考古的内涵。

黑龙江地方是满、蒙、达斡尔、锡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的故乡，遗留下许多清代各民族的古城、民居、寺庙、桥梁等古迹和文物。尤其是依兰永和、德丰的清代赫哲族墓葬中，曾出土一批赫哲族文物，堪称清代赫哲文物的模式标本。1975年5月，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发现的“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制造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月二日”，炮身长248厘米，重1000公斤，是康熙年间“平定罗刹故物”，为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抗击沙俄侵略的功勋炮，其历史功绩可与鸦片战争中的虎门大炮相提并论。今日，屹立于黑龙江省博物馆大厅里的这门大炮，仍闪耀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辉！

（执笔：干志耿）

注　释

① 于汇历：《阿城市交界镇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1日。

② 于汇历：《黑龙江五常学田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初步研究》，《人类学报》9卷1期，1990年；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第19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哈尔滨市文化局：《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文物出版社，1990年；《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

④ 黄慰文等：《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人类学报》3卷3期，1984年。

⑤ 魏正一、干志耿：《呼玛十八站新发现的旧石器》，《求是学刊》1982年第1期。

⑥ 于汇历：《黑龙江清河屯遗址的旧石器》，韩国国立忠北大学校先史文化研究所、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北亚旧石器文化》，1996年。

⑦ 《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第196～197页。

⑧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4期。

⑨⑩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1期。

⑪㉗㉘㉞ 谭英杰、孙秀仁、赵虹光、干志耿：《黑龙江区域考古学》，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⑫ 佳木斯文物管理站、饶河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6年2期。

⑬ 孙长庆、殷德明、干志耿：《黑龙江省玉器文化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探赜索隐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叶启晓、干志耿、殷德明、孙长庆：《东域访古》，《北方文物》1992年4期；《黑龙江饶河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

⑭⑮ 《东域访古》；《黑龙江饶河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

⑯⑱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

⑰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朱永刚：《松嫩平原先白金宝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1998年1期。

⑲ 张伟：《松嫩平原早期铁器的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1997年4期。

⑳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志军、郝思德、李陈奇：《平洋墓葬》，文物出版社，1990年；杨志军、刘晓东、李陈奇、许永杰：《平洋墓葬研究》，《北方文物》1996年4期。

㉑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宾县庆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7期。

㉒㉕ 杨志军、许永杰、李陈奇、刘晓东：《二十年来黑龙江区系考古》，《北方文物》1997年4期。

㉓ 林沄：《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1期。

㉔ 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康原始社会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3期；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宁安东康遗址第二次发掘记》，《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3期。

㉖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97年2期。

㉙ 王学良：《双鸭山地区汉魏时期典型城址简介》（待刊）。

㉚ 贾伟民、魏国忠：《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北方文物》1989年3期。

㉛ 张博泉：《〈大金国第一都〉序》，白玉奇主编《大金国第一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㉜㊲㊶㊼ 干志耿：《东北考古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1期。

㉝㊱ 李陈奇：《渤海考古学的新进展》，《北方文物》1999年1期。

㉟㊹㊻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㊳ 《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4日、16日。

㊴ 谔士：《跋黑龙江泰来塔子城出土的辽大安残刻》，《考古》1960年10期。

㊵ 孙秀仁、干志耿：《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

㊷ 干志耿：《黑龙江考古与民族历史》，《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3期。

㊸ 吕遵禄、干志耿、吕东、干振玮：《黑龙江省的金代古城》，《辽金史论集》8期。

㊺ 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年5期。

上海市文物考古五十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最前缘。上海不仅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1949年建国之前，只在金山戚家墩发现了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可以说上海的田野考古和地面文物保护工作基本是一个空白。建国五十年来，经过上海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遗址和墓葬，悠久而精绝的古代文化遗存毋庸置疑地证明，先民们已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创造了6000年的历史。古代建筑和近代优秀建筑也得到了妥善保护和维修。

一　新石器时代考古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共发现17处，其文化内涵为距今约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5000多年前的崧泽文化和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

马家浜文化，目前仅见青浦崧泽和福泉山、金山查山三处遗址。经过分析比照，它们都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偏晚阶段，文化面貌明显反映是由今浙北、苏南地区较早阶段的马家浜文化向东扩展而形成。石器以磨制石斧、石锛为主，斧的穿孔已开始使用管钻法，也有琢凿而成者。玉器少见，上海地区仅见玉玦1件。陶器中，夹砂陶以羼石屑、粗沙的红陶、灰褐陶器为主，形制有腰檐釜、鼎等。泥质陶中红陶居多，也有一部分灰陶和少量黑陶，器形有豆、钵、罐、壶等。骨器制作精美，有磨制骨笄、锥、镞、指环等。生活遗弃物中有大量的麋鹿、梅花鹿、獐和鱼类等动物遗骸，反映了当时渔猎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马家浜文化的最重要发现，是1987年和1989年在崧泽遗址发现的两口水井[1]。其中保存完好的一座为直筒腹，口略呈椭圆形，圜底，井壁光滑，直径67～75、深226厘米。从井口往下约100厘米积满灰黑土，质地松软。出土夹砂深腹红陶盆、宽沿釜及人们食用后丢弃的麋鹿等动物的遗骸。考古资料表明，浙江河姆渡遗址也有年代相当的水井发现，但其结构为打栅栏桩、面积达28平方米的锅形浅坑，十分罕见。而崧泽遗

址的这两口马家浜文化直筒形水井，形制为后世所延续，因此它们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最有代表性的水井实例，为我国水井发明史上最重要的新资料。

崧泽遗址在1961年发掘中出土马家浜文化的稻谷颗粒，经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教授鉴定为籼、粳两个不同亚种，这在当时是中国出土的年代最古老的重要标本之一，为研究水稻起源、开展农业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

崧泽文化遗存，在崧泽、福泉山和松江姚家圈等七个遗址中都有发现。由于1961年崧泽遗址大型墓地的发现、发掘与及时报道，使学术界了解了太湖地区距今5000多年前的这一新的文化遗存，并认为其文化内涵具有此阶段的典型意义，后来被命名为"崧泽文化"。

崧泽遗址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过发掘，1994～1995年又一次发掘，一共清理了135座崧泽文化墓葬，是这个阶段最大型的墓地之一。崧泽墓地延续时间长，随葬器物丰富，组合清晰，形式完整。墓葬分为三期，各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为崧泽文化的全面分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的发掘，新发现四座墓葬有叠压或打破关系，再次为文化分期提供了地层学依据。崧泽墓地的分布、埋葬习俗是探讨5000年前社会性质的珍贵资料。1980年和1989年分别在松江汤庙村和姚家圈遗址发掘，又发现了晚于崧泽墓地第三期的遗存，从而填补了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过渡的缺环。

崧泽文化的石器多施精磨，穿孔用管钻法，形制有斧、锛、凿、犁等。其中在汤庙村遗址墓葬中发现的一件三角形石犁，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石犁之一。犁耕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使农业经济与渔猎业经济的天平，由此明显地倾向了农业。1995年崧泽墓地出土了一件带有骨质柄饰的石钺，证明了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权杖性质的礼器。

崧泽文化玉器用量增多，器形多见璜，还有少量环、镯和琀等。从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琀，有小饼形、鸡心形和环形几种，均出自人骨架的口中。玉琀既非生产工具，又非装饰用品，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用玉文化由此进入了意识领域的更深层次，并直接为后续的良渚用玉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中国新石器时代玉石的矿源问题，历来困扰着中国的考古界。为此，上海考古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一起，对崧泽玉材的来源进行了科学考察，发现上海境内"几座山上出露的基岩同属一套中酸性火山岩系，是中生代侏罗－白垩纪时期火山喷发的产物。崧泽遗址出土的石器和玉器的主要岩石类型和岩性与这些山上出露的基岩一致"。从而率先提出了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石来源是就近取材的崭新观点。

崧泽文化陶器已经使用慢轮修整，夹砂陶以灰褐色为主，羼和料习用蚌壳屑和谷壳，形制以鼎为主，少见釜形器。泥质陶以灰黑陶为主。器形多豆、盆、罐、壶、瓶，还有澄滤器和匜。器表压划竹编勾连纹，镂孔为三角形与圆形的组合。福泉山出土的夹

砂折角足大鼎[3]、崧泽遗址的勾连纹黑陶豆、猪首形匜和青浦寺前村的双层镂孔壶是崧泽文化陶器中的佼佼者。折角足大陶鼎，口径45厘米，高36厘米，重达6千克，硕大厚重，制作规整，是上海迄今发现个体最大的陶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鼎中大器。勾连纹陶豆，直口斜腹浅盘，瓦楞纹细高把，喇叭足外撇，造型精巧，壁薄匀称，呈现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神似竹编的优美造型。猪首形陶匜，是陶工充满想像力的又一工艺佳作，他们把猪的凸吻巧妙地设计在匜的流部。双层镂孔壶则别出心裁地在满饰镂孔纹的陶壶中部另置内胆，使其既具备了容器的最基本功能，又能让工匠在外层充分施展艺术才华。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辉煌发达的文化之一。上海的良渚文化遗存，在福泉山、寺前村和青浦金山坟等十六处遗址中发现。

80年代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研究最重大的突破，当时曾经在中国考古界引起轰动[4]。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并得以确认的人工堆筑的高土台墓地、祭坛，为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高土台性质的认定、科学清理乃至80年代中期一批著名遗址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先例。福泉山良渚墓地的另一特点是相互叠压关系很多，1986～1987年第三次发掘的21座墓葬中就有13座存在叠压关系，这是良渚文化分期研究中难得的地层学依据。另外，随葬丰富的大墓都集中地埋葬于高土台上，随葬贫乏的墓葬则埋葬在遗址近旁的低洼地上，这对探讨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的组成、埋葬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等均有直接的研究价值。

自1982年在福泉山高台墓地的东侧发现了第一座良渚大墓至1987年，大墓一座接着一座被发现，随葬的玉石陶器丰富精致、美不胜收。玉器形式骤增，工艺精湛，数量庞大，用途纷繁，代表着中国第一个用玉高峰的到来。玉器种类有琮、璧、钺、璜、坠，还有晶莹剔透的玉钺、组合复杂的项链、光滑圆润的玉珠和全国最早的玉带钩等。M9的一件琮形手镯特别精美，湖绿色透光，器表凸起四块方座，以四角的中线，各刻一组兽面纹，每面四只展翅欲飞的鹳鸟，只只羽毛丰满，翅膀、尖喙刻琢精细，炯炯有神的眼睛像一颗细小圆润的珍珠，很难想像它居然产生于没有（至少至今未曾发现）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增见了扁平穿孔平刃斧、有肩钺、有段锛、耘田器、多孔刀以及收割庄稼的专用工具——镰刀。不少经研磨抛光的钝锋石钺，毫无使用痕迹，明显地用作礼器。陶器盛行快轮工艺。夹沙陶摒弃了崧泽文化习用的蚌壳与谷壳屑，代之以云母与细砂，器形以缸形器、鱼鳍形和T字形足鼎最常见。泥质陶以双鼻壶、袋足鬶等最为典型。细刻繁密纹饰的黑衣夹砂陶鼎与泥质陶双鼻壶等精制品，明显地加入了礼器队伍。胎质轻薄的黑衣陶壶、杯，以及来自良渚域外的大汶口文化红彩背水壶等，都是罕见的文物珍品。M65一件细刻纹阔把黑陶壶，鬼斧神工般的工艺水平，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那轻纤的分量让你掂在手上不敢相信这是一件陶制的水壶，

而只以为是纸或漆木质材料的器皿。刻纹纤细繁密，恰似几只小燕掠翅于柳条、雨丝之间。无疑，这些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巅峰杰作，已经不再是日常使用的器皿，而应该是与珍贵的玉石礼器相配伍的良渚人礼天祀地、敬神祭祖的重要器具。

除福泉山外，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60年代发掘闵行马桥遗址，发现良渚文化遗存直接叠压在贝壳沙堤上，确认了这里就是古海岸线，从而为深入研究上海的成陆进程提供了科学依据⑤。

马桥遗址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衣泥质陶杯的底部刻两个原始文字，这是我国最早的二字连用的实物资料，在探讨汉字起源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其拓片曾被郭沫若先生作为我国古文字发明的稀有依据，收入《中国史稿》一书⑥。

金山亭林遗址1988年和1990年两次共发掘23座良渚文化晚期墓葬，其中6座墓葬有用木板盖垫的葬具痕迹。十座墓葬人骨架严重错位⑦，反映了良渚文化比较特别的一种埋葬习俗。

二　夏商周时期考古

上海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分三个发展阶段，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商末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马桥文化的代表性遗址马桥遗址发现于1959年，60年代进行了两次发掘，初步揭示出上海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此后发掘的含有马桥文化遗存的遗址，比较重要的有金山查山和亭林、奉贤江海等。1993～1994、1994～1995、1997年又在马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获得了大批重要资料，首次揭示了夏商时期环太湖地区的大型村落遗址面貌，对马桥文化也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⑧。

马桥村落遗址坐落在一道贝壳沙堤上，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村落布局为适应地理环境，平面呈宽带状，其走向与沙堤的走向完全一致。与居住遗存相关的遗迹发现了柱洞、陶片堆、水井、灰坑等。柱洞多为直立形，洞口近圆形，锥形底或圜底。也有少数倾斜柱洞，倾角40～45度，是建筑在立柱旁的斜撑柱柱洞。陶片堆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遗迹现象，由成片堆积分布的残陶器、陶片、石器和动物骨骸堆积，因其中大多数是陶片，故而名之为陶片堆（代号TD）。它们堆积在平地上或低洼地中，分布面积不等，周围边界不很清晰。陶片堆IITD204，分布面积大约为6～7平方米。堆积陶片百余片，器类有鼎、豆、盆、罐、觯等，生产工具有石镰和石凿，在它的中部偏西处有两个柱洞。陶片堆IITD205，分布面积大约为3～4平方米。陶片器类以鼎和罐为主，还有少量酒器，其中一件带把杯基本完整。在陶片堆的中部有一对很大的麋鹿角，近旁有一个柱洞。这两处陶片堆在同一个探方、同一地层，二者之间只有一条比较窄的分隔

带，分隔带陶片稀疏。陶片堆中有近乎完整的陶器和完好的石器，鹿角对称放置，似非随意丢弃，而且又有柱洞伴于近旁，据此判断这两处陶片堆可能是房址的废墟。当房屋因天灾等不同的原因倒坍之后，各类用具与摆设就被压埋在地下了。水井共发现 12 座，几乎都是土坑直筒形，坑壁近直，壁面似经过加工处理，比较平整。井口为圆形或近圆形，以直径 100 厘米左右者最为常见。水井的底部近平或者微圜，直径略小于井口。水井自深在 120～178 厘米之间。灰坑可以分为近圆形、近椭圆形、近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一部分灰坑的坑壁经过加工，比较规整，有的灰坑壁上保留了明显的加工痕迹。灰坑 IIH290，坑口近椭圆形，直径 40～46 厘米，坑壁内收成小平底，深 61 厘米。从坑内出土一件饰叶脉纹和条格纹的红陶高领罐。

在马桥遗址还第一次发现了马桥文化的墓葬，共有 4 座。其中的一座（IIM102）墓口近似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口长 100～117、宽 66～70、深 30～44 厘米，墓坑为正南北方向，单人屈体，上肢折向背后，下肢盘屈，作被紧紧捆绑状，为一青年女性。另两座为单人成人墓，无随葬品。还有一座是儿童的二次葬。

1996 年在奉贤江海遗址发现了马桥文化唯一的一座陶窑。陶窑平面为长圆形，残长 3.9 米，分为窑口、火道和窑床。窑口部分已残损，火道内残存几根直径 5～6 厘米、夹贝壳砂的陶条（炉条?），窑床由数道矮泥墙构筑，在窑底还残留着一层黑灰。

马桥文化的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中最常见的器形是鼎和甗，以及器盖。泥质陶比较复杂，色质、器类及其功能、纹饰、制法等方面呈现出纷繁的多样性和内在的相关性。从外观色质上，泥质陶可以分黑、灰、红褐等。从制作技法和器皿用途上看，一部分泥质灰陶和黑陶比较接近，普遍采用轮制法，器形大类主要是圈足器和平底器，如簋、豆、觯、觚、鸭形壶等，器表装饰多见云雷纹。它们同良渚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又与黄河流域的夏商文化相互影响。在红褐陶中，色质也有差别，可细分为桔红、红褐、灰褐和紫褐等，硬度也随颜色的变化渐次变硬。红褐陶普遍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绝大多数都是盛储器，器表一般都拍印纹饰，条格纹与叶脉纹最常见。

原始瓷器的制作是马桥文化的一大发明。在马桥、金山坟等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有施青釉，也有施黑釉，烧成温度接近 1200 度。施黑釉的器物发现在相当于商代前期的地层中，釉层的厚度达到 150～250 毫微米，而且光亮透明，已经完全形成玻璃态，称之为黑釉原始瓷当之无愧。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于夏代（二里头文化）的地层中也发现了器物上有人工施加的黑色涂层，涂层比较薄，约为 100 毫微米，还没有完全形成玻璃态层，仅在局部光亮，因此还不能称釉。但是这种黑色涂层显然是黑釉的先驱，为黑釉的诞生作好了物质和技术上的准备。

马桥文化生产工具与武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品类有斧、钺、戚、锛、凿、锄、刀、镰、戈、矛和镞等。石器制作是在打制成型的基础上进行磨制，不很精致。钻孔以琢制

法最为流行，还有锥钻法和管钻法。马桥文化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少。经发掘出土的有斤、凿等小型工具。

马桥文化的一部分陶器上刻有陶文，在马桥遗址发现较多，经初步统计，90 年代中叶的资料共有 250 多个单字，大多数陶文刻在陶罐口沿的沿面上，一小部分刻在鼎类炊器的口沿面上，只有极其罕见的几个刻在器盖和陶盆上。绝大部分陶文是入窑焙烧前刻的，也有极少数陶文是陶器烧成后刻的，刻划陶文的工具，有竹、木、骨质的尖锐器，还有以指甲作为工具。经排比归纳，陶文分为 59 种，多数为一器一字的资料，少数一器两字。陶文的载体绝大多数归类于红褐陶系，其特点是普遍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有的烧成温度很高。红褐陶系的生产工序多，技术要求高，是比较特殊的陶器大类。陶文相对固定在红褐陶器大类可能与它们的工艺过程比较复杂有关，在这类陶系上刻陶文是为了记录一些与制陶相关的事情。

在马桥遗址 90 年代的发掘中，特别注意对地层内包含的自然遗物进行收集与研究。对古微生物的研究表明，良渚文化时期海水离遗址还比较近，遗址时常遭受海水的侵袭。到马桥文化，海水距离遗址比较远，文化遗存在沙堤两侧有广泛的分布。在动物研究方面，自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猪、狗、牛的数量由多到少，而梅花鹿、麋鹿和小型鹿科动物的数量却由少到多。考虑到猪、狗、牛等与畜牧活动相关，鹿科动物则通过狩猎获取，动物比例的差异应该反映了人类获取肉食的方式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商末、西周时期，以青浦寺前遗址中层和骆驼墩墓葬遗存为代表。这个时期的陶瓷器中，硬陶和原始瓷已经占有相当比例，质量明显优于马桥文化，器形规整，烧成温度比较稳定，原始瓷上釉的附着力明显增强，代表了当时陶瓷手工业最高的技术水平。硬陶的曲型器有卷沿圆球腹圜底罍、扁腹平底瓿和卷沿高颈平底罐等，原始瓷的典型器为矮圈足豆。陶器种类丰富，炊器有甗和鼎，不见鬲，甗为鼎、甑合体形，口沿变化比较多，有折沿、剖面为 T 形口沿和外翻沿等，是从马桥文化的陶甗演变而来。食器有高圈足簋、浅盘细高柄豆和高三足盘等。刻槽盆比较流行，器壁内刻多线菱形浅细槽。器表装饰分印纹、刻划纹和贴塑三类，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技法。印纹有压印的绳纹、拍印的梯格纹、席纹、叶脉纹、折线纹、云雷纹、回纹和复线菱形纹等，印痕多比较深。绳纹在甗、鼎等炊器上比较常见，刻槽盆上也有发现。拍印纹饰多是通常所称的几何形纹饰，常饰于罍、瓿、罐等盛储器上。戳印纹饰比较少，只有圆点纹。刻划纹饰中的三角纹很有特色，以前未见。贴塑装饰有小圆饼和扉棱等。

春秋战国时期，在青浦重固、金山戚家墩、嘉定外冈等地发现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根据墓葬的随葬品分析，这些墓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墓葬的随葬品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主，具有浓郁的本地文化色彩，属于吴越文化传统，是当地原有居住者的墓葬。戚家墩的五座墓即为第一类墓葬，随葬器物中有坛、罐、盆、鼎、盅等[②]。第二

类墓葬的随葬品以泥质灰陶为主，为楚人之墓，属于楚文化传统。在重固发掘的四座战国晚期楚墓，均为长方形土坑墓，随葬品以鼎、豆、盒、壶为基本组合形式，此外还有罐、钫、勺、玉璧、陶俑头和陶俑手等[10]。这是战国时期楚文化已经深入到上海地区的实证。

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瓷器制作相当规整，器壁厚度比较均匀，常见平底器，或平底下附三个乳丁小足，不见圜底器，有的器肩部附贯耳。陶器形制流行折沿或卷沿短颈深腹的坛、直口圆肩罐、敛口扁腹罐，陶质硬，烧成温度高，器表拍印几何形纹饰，以席纹、方格纹、米筛纹、麻布纹、米字纹等最为常见。原始瓷器釉色青绿或青黄，器形主要有卷沿扁腹碗和直腹内饰轮旋纹的碗和盅等。

三 汉代至明代考古

汉唐时期，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保留到今天的汉唐遗存发现不多，主要有青浦县福泉山汉墓、虹口区广中路南朝瓷器、川沙县严桥唐代村落遗址和浦东川扬河唐代古船。福泉山汉墓是已发现的汉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西汉墓葬群，共有西汉早中期墓葬96座，都是小型土坑竖穴墓，分布密集，没有叠压关系。随葬品最多的一墓40件左右，少者1～2件。多为釉陶和灰陶的鼎、盒、壶、瓿、罐、盆等，次为铜镜、铜质和泥质钱币、石砚台、石琀、石塞、料珠、铁剑、铜矛、铜印等。一方石砚上留有使用的墨迹。墨迹经红外图谱分析，初步定为炭制墨。这对研究我国古代制墨史具有重要意义[11]。1973年在虹口区广中路发现南朝瓷碗、瓷罐各1件，这是上海市区发现的惟一的南朝遗存；1975年又在浦东严桥发现唐代村落遗址，出土大量唐代瓷器，有越窑青釉、黑褐釉瓷执壶、长沙窑青黄釉瓷壶及陶纺轮，石锤，砺石，牛头骨料等，这两处遗存的发现，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唐代上海市区的大部分以及整个浦东地区还在海中，没有成陆的说法，初步确定了上海唐代海岸线已向东延伸到今天的下砂、周浦、北蔡、江湾、月浦一带[12]。川扬河隋唐古船发现于唐代海岸线外侧海滩细泥沙堆积中，古船残体仅剩船底独木、独木两侧搭接的舷侧板和舱内桅下板。其结构和制造工艺都较原始，是从独木舟向木板船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它的发现为研究船舶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13]。

宋元明时期，上海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保存在地下的文物极为丰富，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主要有墓葬、水井、古船、古塔地宫等等。宋代墓葬发现十余座，有土坑木棺墓和石板砖室墓两种。土坑木棺墓为一般平民的墓葬，随葬品仅有几件粗瓷碗、盘和几枚铜钱币等；石板砖室墓是一种等级较高的墓葬，规模较大，青砖砌筑长方形墓穴，上盖石板为顶，一般系夫妇合葬双穴墓，有墓志。墓室四角多设龛，龛内置镇墓的铁牛，墓

内有瓷盒、钱币等随葬品。1979年发掘的嘉定北宋赵铸夫妇墓中的赵铸一穴，青砖平砌墓室，其夫人的墓室是用一种外包皮纸，内是糯米浆掺石灰搅合制成的砖块砌成的。其制作方法为，先把糯米烧熟后捣成浆，掺入石灰制成砖块状，并用皮纸包起来，错缝叠砌。这种特殊的造墓方法是以往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过的，具有水泥般的硬度和密封性。包砖的皮纸原料为桑皮，色泽洁白，纤维匀度好，拉力强，可与现代纸媲美，是研究宋代造纸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14]。1958年发掘的朱行南宋张𬀩墓的形制较为特殊，墓室内分上下两层，每层又分为两间，上层的一间置木棺及随葬品墓志、铁牛、铜镜、影青瓷盒、钱币等，另一间空无一物。在放木棺的下面一间，四角同样放四只铁牛，正中置1尊石雕道教神像，神像后面有一块浮雕有道教人物、松树等图案的砖刻插屏，神像前面有一件影青贯耳瓶，可能同墓主人生前信奉道教有关[15]。1972年清理的宝山谭氏夫妇合葬墓是已发掘的宋墓中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其夫人墓内随葬有1尊陶人像，2件陶屋模型，22件金饰件，6件银饰件和11件漆器。金银饰件中的鎏金心形香囊上透雕“交颈鸳鸯戏荷图”；瓜棱形银盒盖面刻有观音坐像、祥云、仙鹤、童子、龙女，盒底刻有松、竹、山、石、溪水、梅花鹿、祥云及“福”字等，其优美的造型、独特的构思、精巧的做工，在宋代考古中是罕见的，反映了宋代精湛的工艺技术发展水平[16]。

元代墓葬在上海发现不多，以1952年清理的青浦任氏墓群为代表[17]，共有墓葬6座，出土文物有瓷器、漆器、金银器、砚台、墓志等。瓷器中的官窑胆式瓶、贯耳壶、戟耳瓶，漆器中的八瓣莲花形漆奁、陶渊明赏菊图雕漆盒为元代文物中的精品。墓志6通，分别为任仁发与其子任贤能、任贤德，孙媳钦察台守贞，弟任仲夫之子任良佑、任明等六人的墓志。任仁发为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和画家。任氏家族墓地是50年代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元代遗存，为研究元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明代墓葬遍布上海市区及郊县，多为家族墓地，绝大部分一横排排列，也有采用左昭右穆排列法的，如1997年发掘的卢湾区李惠利中学明墓群。墓室青砖砌筑，上盖大石板，糯米浆三合土封顶。墓内随葬品多寡不一。大族和显贵墓中往往有丰富的随葬品。1960年发掘的上海大族潘氏墓，为潘惠夫妇、潘允徵夫妇、潘允修夫妇，三座墓内共随葬木俑、家具、金银器、锡器、铜器等300余件。其中官职为“光禄寺掌署监事”的潘允徵墓内随葬有一队仪仗木俑，由乐俑、文武官俑、隶役俑、侍吏俑、侍童俑、轿夫俑及轿子等组成，场面宏大气派；一整套家具明器，从室内陈设床、榻、衣橱、箱、桌、椅、凳、几、衣、巾、盆架到生活用器马桶、桶座、面盆、脚盆、砚台盒、长方盒、圆盒等，应有尽有，为明墓中所罕见，是明代木俑、家具断代的标尺[18]。1969年清理的上海名门士族陆深及子陆楫夫妇墓，随葬文物149件，绝大部分为金银玉饰件等，主要有金冠饰、金镶玉发簪、金镶玉饰、金镶宝石花饰、银发罩、玉发冠、玉簪、玉童人、玉蝉、玉幻方等。从金饰品用极细的金丝编绕或以金叶雕制，多镶嵌各

色珠宝翠玉，和玉簪头部雕琢的玉观音、玉麒麟、雄狮等看，明代的玉雕工艺和金属工艺在江南一带有着相当高的水平[19]。1966年清理的宝山朱守诚墓，随葬文物100多件，最有代表性的为嘉定竹刻名家朱小松透雕的“刘阮入天台”竹刻香熏，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23把绘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的折扇，15件笔筒、笔插屏、砚台、镇纸、印盒等文房用具，反映了墓主生前是一个爱好艺术的文人雅士，死后便将喜爱的文房用具和几、案陈设等一起随葬，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20]。在嘉定宣姓墓中发现一批明成化七年到十四年（1471～1478年）北京永顺堂用竹纸刊印的十一种“说唱词话”和一种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版框高约17·5厘米、宽约11·5厘米。这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和唱本发展过程的研究上，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发现，是过去中国任何书上从来没有著录过的，为了解明代的“说唱词话”提供了第一手资料[21]。此外，松江明墓中多随葬有松江布和松江布缝制的服装等，其中一条松江蓝印花布罗裙同松江造“药斑布（蓝印花布）”的记载相吻合，为研究松江布，特别是蓝印花布的制造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大批松江布的发现显示了明代松江纺织业的兴盛。

古塔地宫、天宫的发掘清理是宋元明考古的又一大收获，已发掘清理的有松江宋兴圣教寺塔，俗称“方塔”地宫；明李塔地宫、明西林塔地宫和天宫；嘉定元法华塔地宫。1974年清理兴圣教寺塔地宫，为券顶、方形，内供奉石函、鎏金铜卧佛、铜供养人、舍利银盒、铜钱币等[22]。1995年清理李塔地宫，为长方形，北壁砌有三层供台，供台和地面上供置有银、铜造像，银舍利塔，鎏金阿育王铁塔，琉璃炉，石钵，银鼎，水晶杯，玛瑙弥勒佛饰件，玉带饰，玉、水晶、玛瑙、琥珀、青金石、珊瑚等小饰件60余件。1995年发掘的法华塔塔心室下有明代和元代两个地宫。明代地宫是一个象征性的地宫，方形，高仅6厘米，内供奉1面铜镜和25枚铜钱币等；元代地宫筑于厚1米多的毛石条塔基础下，长方形，内装藏石函、石菩萨像、铜佛像、铜熏炉、铜双鼻壶、鎏金银盒、瓷盒、玉弥勒佛、玉舞女、玉鱼、玉鹅、玉母子猴、玛瑙双鹅、玛瑙羊距骨、水晶蝉、水晶葫芦等37件器物和铜钱币100多公斤。三只石函形制规整，盖面上分别减地高浮雕“双狮滚绣球”、“双凤穿牡丹”、“二龙戏珠”图案，形象生动，刀法粗犷，线条流畅，为元代石雕中的上乘之作。1994年清理了西林塔地宫和天宫，地宫近方形，深82厘米。地宫后半部为凹形三级阶梯式供台，上供奉鎏金银、铜佛像，鎏金铜佛诞生像，鎏金银、铜塔，玉石佛像，汉白玉弥勒佛像，鎏金铜金刚铃等。地面上置有铜鼎、铜香炉、良渚文化玉璧、仙人龟鹤铜镜、八棱铜镜、六瑞兽铜镜、玉碗、玉璧、铜钱、压胜钱等。另有玉、玛瑙、珊瑚、水晶等饰件400余件，主要有玉腾云童子，鱼龙玉饰，团龙纹玉带饰，龙穿牡丹玉带饰，鹭采莲纹玉炉顶，双螭灵芝纹玉炉顶，螭纹玉炉顶，秋山图玉炉顶，龙首玉、水晶带钩，龙首螭纹玉带钩，螭纹玉带板，云龙纹玉带环，龟鹤齐龄纹玉带环，螭纹、谷纹、卷云纹、乳丁纹玉璧，云纹玉剑格，

螭纹、兽面云纹玉璏，玉剑珌，玛瑙单耳杯，莲花形玉盘，兽钮玉印，龙凤玉佩，持荷玉童子，玉、珊瑚人物，玉瓶，玉凤，玉鸳鸯，玉象，玉鹿，水晶兔，水晶骆驼等。地宫中还置有《松江华亭西林禅院》石碑一通，记载西林塔为明正统九年（1444 年）开始迁建，正统十年六月封存地宫。西林塔天宫位于塔刹覆盖之下的砖砌体内，方形。内藏有鎏金银铜佛像，鎏金铜佛诞生像，玉持荷童子，玉罗汉，玉砚，玛瑙念珠一串，玉、玛瑙、水晶等饰件，佛牙，铜钱，压胜钱等。天宫中还置有《西林大明禅寺重建圆应宝塔志》石碑一通，记载天宫为明正统十三年（1448 年）十二月所封存。从天宫、地宫的清理现场看，其应为明正统年间原封存，没有被扰动过。西林塔地宫、天宫的发现是近年来上海文物考古中最重要的收获，其重要性在于：(1) 明确了西林塔的迁建年代和建造周期。西林塔迁建始于明正统九年，天宫封于正统十三年，然后再做塔顶，安装塔刹，这样整座塔的建造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2) 大批银、铜造像，玉、水晶、玛瑙、珊瑚等饰件，特别是几百件造型优美、构思奇妙、琢工精湛的玉器，代表了明代民间玉器高超的工艺发展水平。这批文物的下限为明正统十三年，为明代早期文物的断代提供了标尺。

四　地面文物保护

上海地面文物的保护，着重在地面文物调查、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和管理、近代优秀建筑保护以及古代建筑维修等方面开展工作。

地面文物调查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56 年至 1957 年，调查范围主要集中于上海市区，因为现属上海市的郊区当时尚归江苏省管辖。第一阶段共调查了历史文物 800 余处，其中有许多是上海市通志馆、文献委员会所未掌握的。第二阶段从 1959 年至 1965 年，调查的重点是 1958 年后由江苏省陆续划归上海市管辖的十个郊县。上海市文管会与各郊县文化部门，对市郊文物进行复查和鉴定，提出了一批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三阶段从 1978 年至 1991 年。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前两阶段文物调查的档案资料多有散失，故市文管会从 1978 年 2 月起，对全市境内的文物进行了复查。这次复查共查实近、现代文物 240 处，古建筑及历史建筑物 972 处，石刻及其他文物 52 处。至此，上海市的城乡文物基本做到了有案可查。

文物保护单位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公布的历代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能整体移动的文物。自 1959 年起，上海市人民政府及各区、县人民政府，在各时期文物部门的调查基础上，陆续公布了 200 多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上海市境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3 处，市级 112 处，区、县级 134 处。此外，根据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实际情况，各级政府还分别公布了市级

纪念地点29处，保护地点15处；区、县级纪念地点9处，保护地点4处。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方面，着重落实了“四有”工作，即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有保护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护组织。

1986年10月21日，市文管会与市规划局经过多年艰巨、细致的调查研究，划定了全国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报市政府批准公布。此后，各区、县也相继对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作出规定，从而规范了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环境保护的管理。

保护标志的树立，是一项繁琐的具体工作。自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市文管会将这一工作常抓不懈，随着第二、三、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以及上海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陆续公布，保护标志的树立已成为经常性工作，全市已基本完成了标志说明的树立工作。

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记录档案，是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基础。建国以来，上海市文管会始终重视文物保护单位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上海的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1995年后，上海市文管会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档案的工作规范，整理了各种访问记录、修缮资料、有关论著、报告、照片和图纸等档案，分别为全国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了主卷、副卷和备考卷，上海的记录档案工作从此进入了新的起点。

建国以来，上海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为政府直管的单一模式，未能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上海的文物保护组织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形成了以市文管会、区、县文管会、文化局为领导，各区、县博物馆、纪念馆、文保所为骨干，由众多文物使用单位、文物保护小组和广大文物保护员参与的文物保护网络。

上海是中国近代百年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近代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商业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也是全国建筑活动最为频繁、成就最为突出的城市。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展，各国将不同建筑风格的教堂、银行、办公楼、旅馆、影剧院、商店、医院、花园住宅、公寓、夜总会等西方建筑形式引入上海并大批建造，使上海成为世界建筑博览会。与此同时，在西方建筑东渐上海的影响下，上海出现了一种以传统建筑为基础，融入西方建筑风格和手法的新型住宅建筑——里弄建筑。上海的近代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建筑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上海对近代优秀建筑的研究起步较早。1958年时，上海市文管会即已参加《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的调查、研究和编写工作。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近代优秀建筑的不断重视，市文管会会同市规划局共同组织各有关单位，对本市的近代优秀建筑进

行了大规模全面调查，最后在深入研究和专家评审的基础上，将具有典型英国大住宅式样的英国领事馆、文艺复兴风格的法国领事馆、希腊陶立克柱式装饰的江海关大楼、英国古典主义式样的英国总会、法国文艺复兴古典主义风格的法国总会、西班牙式的新康花园住宅、挪威式的马勒住宅、美国式的美童公学、仿罗马风格的中法学堂、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徐家汇天主教堂、芝加哥学派的沙逊大厦、现代建筑风格的国际饭店等61处优秀近代建筑，于1989年9月和1993年7月，分两次上报市政府批准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上海外滩建筑群和上海邮政总局，已于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优秀近代建筑，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在近代中国城市建设史或建筑史上有一定地位，具有建筑史料价值，有些建筑是中国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

（2）在建筑类型、空间、形式上有特色，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3）在我国建筑科学技术发展上有重要意义；

（4）反映上海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有些已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1992年1月1日，为了更好地保护近代优秀建筑，市文管会与市规划局、市房地局共同研究、制定了《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经上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从此，上海的近代优秀建筑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上海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众多著名的近、现代革命文物，同时也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上海的250余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近50％是各类古代建筑，其中不乏松江方塔、真如寺正殿、松江唐经幢、豫园、龙华塔、嘉定孔庙、松江清真寺等全国著名的古建筑。建国五十年来，市文管会对文物建筑的维修从未有过间断。至1998年，经过维修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已有103处（不包括常规性维修保养工程），其中革命遗址18处，名人故居、祠墓30处，古建筑55处。市级以上的古建筑，大多进行过全面维修，重要的区、县级古建筑，也均进行过程度不同的修缮。鉴于文物建筑的维修，既是建筑施工的过程，更是对文物建筑研究的深入和继续，市文管会通过古建筑维修实践，不仅取得了一些适应上海实际情况的古建维修管理经验，同时也对上海的古建筑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上海的古建筑维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通过1954年至1955年对龙华塔的维修，发现塔的底层地坪下有20层砖基，下有13厘米厚的垫木，其下还有3米深的木桩。如此坚固的塔基，尤其是桩基的使用，在中国古塔建筑史上实属罕见。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古建专家的瞩目，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古塔基础研究的空白。

（2）1963年至1964年的真如寺正殿落架大修中，发现大殿的额枋底部，有双勾阴

刻始建年代，证实了大殿是元代延祐七年的建筑，为江南仅存的两处元代木构建筑之一，极为珍贵。大修中还在大批木构件的榫卯隐蔽处，发现许多工匠墨书的构件名称和部位名称。这些墨书与宋《营造法式》和《清式营造则例》相对照，证明真如寺正殿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承前启后的实例，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3）1975年至1977年，市文管会对松江方塔进行大修，发现全塔留存的177朵木斗拱中，尚有宋代原物111朵，占62.7%。斗拱的形制符合宋《营造法式》中大木作制度的规定。修缮中还发现三层塔身外墙面绘有宋代彩色跏趺坐佛像壁画两幅。松江方塔是国内极少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北宋塔，也是我国楼阁式砖木结构古塔的杰出代表。它以其修长的塔身，平坦的腰檐，古朴的平坐，被誉为江南最美的古塔。

（4）运用现代科技对青浦青龙塔和嘉定法华塔进行整体纠偏。青龙塔纠偏前向东北倾斜2°50′，中心位移1.2米。1991年10月至1992年4月，市文管会会同杭州曹氏建筑物纠偏加固研究所，运用沉井纠偏法，将塔纠正。经长期观察，证明塔身稳定，整体纠偏不失为古塔保护的理想手段。青龙塔的纠偏，成为我国古塔纠偏的先声。它为此后太原双塔的纠偏成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1995年9月至1996年1月，市文管会还与浙江大陆建筑特种工程公司合作，运用改进后的沉井纠偏法，对法华塔进行了整体纠偏。法华塔在纠偏前向东南倾斜2°0′45″，中心位移1.2米。纠偏后，法华塔的垂直度符合3‰的国家标准，中心位移仅5厘米。法华塔的纠偏成功，说明沉井纠偏已是一项成熟的技术，可在国内外古塔保护中广泛应用。

（5）在东林寺大殿、宝山孔庙大成殿、张闻天故居的大修中，运用整体顶升（吊升）新技术，减少材料损耗，缩短工期，节约资金，使这些建筑的木结构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样，免去了落架时木构件的登记、编号、拍照等繁琐工序，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错乱，保证古建筑维修中“不改变原状”，从而提高了古建维修的质量。

（6）五十年来，上海的十三座古塔中，有12座得到了彻底维修。一些古塔在依据充分的前提下恢复了原状，如松江的西林塔、李塔；青浦的泖塔；嘉定的法华塔、南翔寺砖塔等。通过这些古塔的维修，掌握了上海地区不同时代的古塔法式特征、建筑手法、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为今后的古塔维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抢救维修了奉贤县“华亭东石塘”。1996年上半年，在奉贤县奉柘公路降坡与拓宽工程中，一段长4公里，高约4米，顶宽1.5米、底宽3米的古代海塘暴露出地面。海塘全部用青、黄条石垒砌，远远望去宛若长城，十分壮观。经查史料，这条海塘就是清雍正三年（1725年）至十三年（1735年）建成的华亭石塘之一段。华亭石塘全长23.76公里，清代号称“四十里金城”，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古的石构海堤遗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但在发现初期，由于建设部门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大量堤顶条石被移作它用。后在市文管会的直接干预下，县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并将此段海塘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在华亭东石塘的维修中，发现海塘设计合理，施工精良，塘身极其坚固。其石榫、石卯、梅花桩基、铁榫、铁销的科学使用，代表了我国古代东南沿海海塘建筑史上的最高成就，对现代江、海大堤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执笔：宋建、张明华、何继英、谭玉峰、于存海）

注　释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1992年3期。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3期。

④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2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10期；黄宣佩、张明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1期。

⑤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1期。

⑥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

⑦ 王正书：《金山县亭林良渚文化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王正书、孙维昌：《金山县亭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⑧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遗址1993—1995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2期。

⑨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1期。

⑩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考古》1988年8期。

⑪ 王正书：《上海福泉山遗址西汉墓群发掘》，《考古》1988年8期。

⑫ 黄宣佩、吴贵芳：《从严桥遗址推断上海唐代海岸的位置》，《考古》1976年5期。

⑬ 上海博物馆王正书：《川扬河古船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

⑭ 王正书：《上海嘉定宋赵铸夫妇墓》，《文物》1982年6期。

⑮ 《上海西郊朱行乡发现宋墓》，《考古》1959年2期。

⑯ 《南宋谭氏夫妇墓》，《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一编第三节元明清时代墓葬，《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编纂委员会编，1997年。

⑰ 上海博物馆沈令昕、许勇翔：《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文物》1982年7期。

⑱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卢湾区明潘氏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8期。

⑲ 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明陆氏墓记述》，《考古》1985年6期。

⑳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诚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5期。

㉑ 赵景深：《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文物》1972年11期。

㉒ 上海博物馆：《上海市松江县兴圣教寺塔地宫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2期。

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

南京博物院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四十年，江苏共发现3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2处人骨化石和人牙齿化石地点，7处旧石器地点。其中经过发掘的有溧水县神仙洞、丹徒县莲花洞化石地点和东海县爪墩、吴县三山岛旧石器地点，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器标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这些发现及研究，奠定了江苏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①]。

近十年来，“中华曙猿”化石和“南京人”化石的发现，不仅是江苏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成果。

1986～1994年，在溧阳市上黄水母山发现大量动物化石，地质年代为第三纪中始新世，距今4500万年。动物群种类包括12目36科38属63种，种类之多为亚洲之最，世界也较为罕见。最具震动性的成果是发现了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高级灵长类的始祖——中华曙猿化石。中华曙猿是重约130克的小型灵长类，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高级灵长类的共同祖先。长期以来，世界古生物学界、古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级灵长类动物起源于北非，然后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最终导致人类的出现。中华曙猿化石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认识，同时说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灵长类的共同祖先的起源地。这是世界各有关学科对全球高级灵长类起源的生物地理中心的最新认识。同时发现的有袋类动物化石，为全球古地理环境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科学证据；兔猴化石的发现，证明了古生物学界关于晚始新世初期出现的斯氏马嘎利塔猴是从亚洲而不是从非洲迁人美国和欧洲这一推断的正确性。中华曙猿及其伴生动物群化石的发现，是20世纪生物学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相媲美。中华曙猿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将作为经典动物群永载史册[②]。

1993年，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小洞中发现的2件人头骨化石和1枚人牙齿化石，被

命名为"南京人"。南京人头盖很低，矢状方向显得较长，眉骨嵴很粗壮，额骨和眉骨之间有一条手指粗的横沟。根据这些特征，确定其为"直立人"。其地质年代与北京直立人晚期相当，铀系法所测绝对年代为距今35万年。与南京人共生动物群化石，经鉴定的标本1325件，共代表148个个体，古脊椎动物种类包括4目11科13属15种。其中只有为数甚少的剑齿象、猪獾（?）属南方动物，而大量的棕熊、中国鬣狗、中华貉、肿骨鹿、葛氏斑鹿、梅氏犀等动物，则是北京周口店动物群的典型动物，属华北动物群。南京人及其共生动物群化石的发现，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古脊椎动物学和地理学等学科提出了新的课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③]。

二

江苏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前四十年，多次文物普查发现遗址185处，发掘遗址50处，清理和出土了一批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基本建立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框架结构。1951年首次发现青莲岗遗址及稍后青莲岗文化的命名，对考古学文化的探讨和研究由此展开；50年代对北阴阳营遗址的四次发掘，显示了我省主持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能力和研究水平；对二涧村和袁家埭遗址的发掘，得出了青莲岗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结论；60年代和70年代对大墩子和草鞋山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确立了大江南北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80年代对赵庄、大伊山和万北等遗址的发掘，又一次引起了对青莲岗文化的讨论和对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深入研究；北阴阳营、大墩子、刘林、草鞋山、圩墩、张陵山等氏族墓地的相继发现，不断将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形态的研究引向深入；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玉琮和玉璧的出土，解开了玉琮的时代之谜；1982年寺墩3号墓良渚文化"玉敛葬"的发现，由此拉开了探索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的序幕[④]。

在前四十年工作和研究的基础上，近十年来又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使我省的考古学研究，上升到探索文明起源、重建史前史和实行多学科结合的层面。

青莲岗文化是考古学界长期广泛讨论而难以定性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根据淮河中、下游地区一批新的考古资料，对青莲岗文化所作的研究认为，青莲岗文化是淮河中、下游地区距今7000～6000年间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应分为侯家寨、双墩、青莲岗三个类型。侯家寨类型分布于淮河中、下游地区；双墩类型主要分布于淮河中游，延伸至淮河下游及宁镇地区；青莲岗类型主要分布于淮河下游地区。三个类型应作为地方类型，可能也因早晚关系所形成。至于青莲岗文化的去向，则是江淮西部地区、皖南和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等后续文化[⑤]。

兴化市南荡（1992年）、高邮市周邶墩（1993年）、龙虬庄（1993～1996年四次发

掘)、阜宁县陆庄（1995年)、东台市开庄（1996年)、江浦县牛头岗（1991、1992年）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青莲岗文化形成了又一种新的认识。龙虬庄遗存由釜到鼎的演变过程、带流水器发达、流行三足器和高圈足器及使用骨角工具等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色，代表着一支独特的文化类型。以此为基础，遂将江淮东部地区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的原始文化分为三期：一期包括龙虬庄一期遗存和青莲岗遗址出土的部分遗物；二期包括龙虬庄二期遗存、青墩下文化层、青莲岗遗址出土的大部分遗物；三期为青墩遗址中文化层的4A层[⑥]。淮河中、下游地区青莲岗文化说和江淮东部地区青莲岗文化说，又一次将青莲岗文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南荡遗址出土的陶器与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基本一致，晚于王油坊类型而早于宁镇地区点将台文化。周邶墩遗址第一类文化遗存亦来源于王油坊类型，第二类文化遗存则与岳石文化尹家城类型基本一致。陆庄遗址的文化遗存则为晚期良渚文化。这些材料显示出距今4000年至3600年间几支古代先民迁移的轨迹：有一支王油坊类型的先民沿淮河东移，然后南下到达宁镇地区；岳石文化尹家城类型的先民则沿泗水南下，越过淮河，最终到达宁镇地区；而良渚文化先民最终因水患被迫沿海滨向北迁移至射阳河流域，作短暂停留后又踏上了迁移的路程。这样，江淮东部地区作为江南和淮北的文化走廊的面貌，就基本上清晰可见了[⑦]。

在淮北地区主要发掘了新沂市花厅（1989年)、连云港市朝阳（1995年)、藤花落（1996年）等遗址。花厅遗址的重大发现（包括1987年的发掘)，对于探索海岱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花厅墓地北区发现了10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墓，随葬大量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其中8座墓殉葬17人，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以人殉葬的典型实例[⑧]。关于这些大墓的文化归属问题，有人认为陶器和玉器的很大部分具有良渚文化风格[⑨]；有人认为陶器和玉器均以大汶口文化器物为主体，只有琮、璧、钺等少量玉器和少量陶器来自良渚文化[⑩]；也有人认为确定特定文化的归属，需要更多地依靠反映人类精神生活的器物[⑪]。关于花厅大型墓葬中为何出现良渚文化器物和殉人的性质问题，有人认为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支武装力量北上征服了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花厅居民，征服者在埋葬阵亡战士时给他们随葬本族的玉器、陶器和战利品，甚至将敌方未能逃走的妇女儿童同猪狗一起为之殉葬[⑫]；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社会都已进入了古国时代，应将花厅文化遗存所代表的实体命名为花厅古国，良渚文化某一古国与花厅古国可能在联姻的过程中进行了文化交流，而殉人的身份则是因社会分化所形成的债务奴隶及其子女[⑬]。

在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东部发掘了张家港市东山村（1989、1990年)、吴江市广福村（1996年)、常州市圩墩（1992年)、武进市乌墩（1992、1993年)、丹阳市三城巷（1993年)、凤凰山（1989年）等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发现了多处房基和大量

墓葬，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东山村遗址的文化内涵时代跨度较大，马家浜文化遗存和崧泽文化遗存紧密衔接，对文化的分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4]。乌墩、三城巷、凤凰山等遗址处于太湖地区西部和宁镇地区东部，其文化遗存受到宁镇地区原始文化的影响，对文化的分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15]。

在太湖地区先后发掘了昆山市赵陵山（1990、1991、1995年）、少卿山（1997年）、吴江市龙南（1991、1997年）、常熟市罗墩（1992、1993年）、武进市寺墩（1993、1994年）等良渚文化遗址，一系列重大发现对于探索太湖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龙南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房屋建筑遗迹[16]；罗墩、少卿山、赵陵山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人工堆筑的祭坛，其上排列着随葬大量玉器和陶器的大墓；少卿山遗址清理出多个祭祀坑[17]；罗墩遗址出土了一件浮雕龙纹的环形玉器，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例证之一[18]；赵陵山遗址发现了人牲遗迹（19具人骨），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以人祭祀的实证[19]；寺墩遗址发现了五号大墓，从而确定了贵族大墓的分布规律[20]。

对良渚文化重要遗址（中心有祭坛）形态的考察，把研究良渚文化的目光，从大墓、玉器和祭坛引向古城古国。对赵陵山和寺墩等遗址形态的研究，结合太湖地区多水的地理环境因素，认为良渚文化重要遗址的周围有一周河道存在，这一周河道具有城墙的功能，赵陵山和寺墩等重要遗址是良渚文化古城；赵陵山和寺墩等古城也应是良渚文化古国，赵陵山古国处于古国时代的初级阶段，寺墩古国处于古国时代的高级阶段[21]。

1996年是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南京博物院编辑了《东方文明之光》这一大型纪念文集。文集分甲、乙、丙三编，共收入考古报告和论文等56篇。乙编的36篇论文，内容涉及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观念形态、聚落形态、族属、自然地理环境、美学精神、思维特点、制玉工艺等各个方面，几乎涵盖了良渚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所有主要课题。所有研究显示良渚文化是一支高度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当时社会已进入文明时代，或已将举步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22]。

镇江市四脚墩（1991年）、金坛市三星村（1993～1998年6次发掘）、高淳县朝墩头（1989年）、薛城（1997年）等遗址的发掘资料，展示了宁镇地区原始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于进一步完善宁镇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和探索中国文明的源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朝墩头遗存既受到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影响，又受到来自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23]。薛城遗址上层为一氏族墓地，年代相当于北阴阳营文化时期；下层为一处居址，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中晚期；遗址位于古丹阳大泽之滨，丰富的文化遗存极具地域特征，可能代表了苏浙皖交汇地带的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24]。三星村遗址位于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的交界地带，文化内涵具有双重性，自身特点也很明显，在所发掘的64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1000余座墓葬，叠压分布十分密集，时代跨度为1000年（距今6500～5500年前）。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中，有一

些器类为首次发现。在一件彩陶豆上所刻的云雷纹，与商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颇为相似；出土的一件石钺，与雕刻有鳄鱼形和猫头鹰纹的饰件组合成权杖，比良渚文化的玉钺要早1000多年[25]。这两件器物以及其他同时出土的一批艺术品，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晨曦。

我省还发现两件弥足珍贵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一件是溧阳市发现的玉圭，扁平长条形，有一圆孔，圆孔之上的正、背两面雕刻有以人、鸟、兽为主题的图案，鸟、兽形似金乌与玉兔。这件玉圭对研究古代宗教、神话及礼仪制度具有重要价值[26]。一件是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的刻文陶片，刻文两行对应，左行四个近似甲骨文，右行四个类似动物图形。释读陶文者颇多，均认为是研究我国文字起源与发展的极为宝贵的资料[27]。

1992～199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与日本宫崎大学合作，对吴县草鞋山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和研究工作，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44块，用于排水、蓄水和灌溉的水沟6条、水井10口、水塘2个。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水稻田遗迹和水稻种植灌溉系统。另据蛋白石形态分析、植物遗体DNA分析和炭化米形态分析，马家浜文化时期所种植的水稻属粳型稻[28]。此外，龙虬庄和三星村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标本，为水稻栽培和水稻种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发现和研究证明，长江下游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广福村、少卿山、圩墩、三星村、薛城、龙虬庄、花厅等遗址出土了近2000具新石器时代的人骨标本，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又一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民族学的研究也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近十年来，我省在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对所发掘的遗址取样所进行的孢粉分析，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的植被、气候与环境有了相当的了解；对环境和海岸线变迁的探讨，发现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29]；对良渚文化自然环境的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决定良渚文化先民的生活方式和良渚文化的发展与衰退[30]；利用岩相和X射线定量法对花厅遗址的陶器所进行的测试分析证明，花厅墓地出土的属于良渚文化的陶器并非本地烧制，可能是来源于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区[31]。这些工作大大深化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开创了我省实行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工作的新局面。

三

江苏商周考古前四十年成果卓著。1965年在丘湾遗址揭露出商末以人、狗祭祀社神的遗迹，这是中国迄今唯一典型的“社祀”遗迹；丘湾、高皇庙、九龙口、赵庄、万北等商代遗址和墓葬的发掘资料，既反映了东夷、淮夷曾受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显示出原住民文化的特征；1951年江宁湖熟镇遗址群的发现和稍后对宁镇地区十

多处同时期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以宁镇地区、江淮之间和皖南东部为范围的商周时期地区性文化——湖熟文化；点将台、城头山和团山等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以点将台下文化层为代表的文化，使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湖熟文化衔接起来；1983年在苏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对刘家浜、彭家里、钱底巷等遗址的发掘，明确了马桥文化在苏南东部的分布范围；对宁镇地区土墩墓的调查和对大量土墩墓的发掘，总结出了其葬俗、形制分类、时代特征和分布规律；对太湖地区石室土墩的调查与发掘，为深入研究其性质提供了大量资料；对江北六合程桥和江南丹徒沿江山脉等地随葬大量青铜器的两周大型墓葬的发掘，促进了吴文化研究的深入；对武进淹城遗址的多次调查和五次发掘，确定其为吴国的地方封邑，而非周初曲阜奄国的南迁遗迹。涟水三里墩西汉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青铜器，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六合程桥墓中出土的铁弹丸和铁条，是我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掌握冶炼生铁和块炼技术的可靠物证，比欧洲出现生铁要早1900多年[32]。

近十年来，我省发掘商周时期遗址九处，墓葬（群）十多处，又有一系列新的重大发现，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江淮之间发掘了江浦县牛头岗（1991、1992年）、田转村（1990年）、仪征市神墩（1995年）等遗址和盐城市龙岗商代墓葬。牛头岗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连续不断，特别是发现了相当于夏代的文化层，对于建立滁河流域古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33]。神墩遗存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晚期，出土遗物中不见鼎、矮圈足豆和原始瓷豆等宁镇地区常见器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为研究长江两岸文化的异同提供了重要资料[34]。三处遗址都发现周代房屋建筑遗迹，神墩的多座排房建筑隔间一般为9～22平方米，居住面和壁面经过烧烤。这种建筑形式已构成江淮间周代文化遗存的一个特点。盐城龙岗发现的商代墓葬，出土了商代假腹豆和具有地方特点的鬲、盆、罐、壶等陶器，填补了这一地区商代文化的空白[35]。

在宁镇地区发掘了丹阳市沈家山（1993年）、贺家山（1993年）以及三城巷、四脚墩等周代遗址，为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批新的资料。

对土墩墓的发掘和研究是我省商周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十年来，主要发掘了丹徒县南岗山（1990年）、横山（1990年）、华山（1990年）、镇江市丹徒（1991年）、丹阳市河阳（1991年）、大泊（1993年）、金坛市连山（1991年）、溧水县和凤（1991年）等地的土墩墓（群）。这些发掘使对土墩墓的认识得到发展。

丹徒县南岗山发掘的14座土墩分东西两组，每组的大土墩内无墓葬，小土墩中的墓葬头向俱朝大土墩，以一墩一墓为主，有的有墓坑，并首次发现木质葬具[36]。金坛市连山土墩墓群和南岗山墓群相似，墓葬位于土墩的中心部位，在其上的每层封土层之间分布着多处器物群，这些器物群可能跟祭祀有关[37]。溧水县和凤乡二号土墩的顶部发现

有圆形石砌祭台[39]。这些资料显示出家族墓群特有的分布特点，反映当时曾举行祭祀活动，并含有对土墩墓作分期研究的信息。丹阳市河阳乡大夫墩和丹徒县华山大笆斗土墩墓坑壁以竹篱笆为挡墙，这种现象属首次发现。大笆斗墓坑中部有棺床，棺床两侧有5组对称的柱洞，说明入葬时墓坑内经过精心布置[39]。大笆斗墓中出土两件大型原始青瓷罐，结合以往发掘资料，这种大型原始青瓷罐只出土于大型土墩墓中，一般不与青铜重器同出，可能是原住民贵族用来表示身份和地位的一种原始青瓷重器。

1994年和1995年，在邳州市九女墩发掘了3座随葬青铜器的大墓，其中2号墩为春秋晚期土坑木椁墓，虽早年被盗，仍出土具有楚器风格的青铜编镈6件、编钟8件、青铜匜、鼎、壶以及8件石制编磬，随葬的麻布纹硬陶罐则具有吴越文化风格，两侧二层台上有殉人5具[40]。这一资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具有参考价值。

苏州西郊真山墓群的发现，是我省近十年来商周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1992～1995年，在真山发掘土墩6座。1号墩为战国晚期墓，虽经破坏，仍清理出鼎、提梁盉、剑、戈等一批精美青铜器，并出土铜印1枚。9号墩位于真山主峰，为春秋中晚期墓，封土达万余立方米，凿山为穴，有棺床和二层台，有斜坡墓道和排水沟设施，规模较大，惜早年被盗。棺椁漆皮重叠十层，应为多重棺椁。大量玉器中有玉覆面、玉牌饰和一万多粒串珠，当初有可能穿联成衣（珠襦与玉柙）。一漆箱已朽，内装海贝数千枚（完整的有1160枚）、玉贝112枚，有作为货币使用的可能。根据九号墩所处的位置、墓葬规模、重棺重椁的规格及随葬品分析，有可能是吴国王室大墓。经调查真山山脊上有土墩57座，其南阳山和其北华山皆有土墩分布，这一带可能是吴国王室的一处墓地[41]。对这一墓地进一步进行考古工作，将有利于吴文化的深入研究。

四

江苏秦汉考古前四十年的成果，显示了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对盱眙东阳城遗址的勘察，明确了筑城年代与古城概况；徐州小龟山、北洞山西汉楚王陵和土山东汉彭城王陵的发掘及大量珍贵随葬品的出土，反映了地方王国的强盛；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的发现，揭示了汉代军队建制和兵种配备情况；高邮神居山西汉广陵王陵墓的发掘，揭示了“黄肠题凑”的完整形制；扬州甘泉山东汉广陵王陵墓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仪征石碑村东汉木椁墓中出土我国早期天文仪器铜圭表，反映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几乎遍及全省的大量土坑墓、木椁墓、砖室墓、石室墓、画像石墓、崖洞墓、瓮棺墓的发掘，墓葬形制和出土随葬品反映了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风貌；许多画像石的画像内容生动地再现了地主阶级的奢侈生活和劳动人民牛耕、纺织的生产情景；徐州利国驿遗址的发掘资料，展现了汉代采矿和炼铁的过程；六

合李岗铸钱作坊遗址和徐州北洞山、云龙山铜质钱范的发现，证明了汉代郡国自铸钱币；盱眙南窑庄金银器窖藏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对研究战国史和西汉前期的手工业、度量衡及货币制度具有重要价值；高邮邵家沟东汉村落遗址的发掘资料，呈现出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的全面调查与研究，说明了佛教艺术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并揭示早期佛、道两教之间的关系[42]。

近十年来，我省又在徐州、连云港、扬州、南京等地区发掘了一批汉代（主要为西汉时期）诸侯王、列侯、官吏及平民墓葬，取得了重要的发掘和研究成果。

所发掘的诸侯王一级的陵墓有徐州驮篮山汉墓（1989～1990 年）和狮子山汉墓（1994～1995 年）。驮篮山汉墓两墓并置，坐北朝南，为西汉早期分封于徐州地区的楚王夫妇的“同茔异穴”陵墓。墓室结构为前堂、后室、耳室，并设置厕间和沐浴室。墓室雕琢精细，壁面遍涂朱漆，装饰考究；完整的盥洗设施，为西汉大墓所罕见；各墓室依用途凿成平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顶、盝顶等样式；墓室四周及甬道两侧有完整的排水设施。二墓早年被盗，但仍出土玉璧、鎏金铜铺首、石磬、铜镜、铁甲片、陶俑等文物1000 余件。西部 1 号墓墓室数量及规模优于 2 号墓，并设置武库，墓主人应为男性[43]。

狮子山汉墓是 1984 年发掘的西汉早期兵马俑坑的主墓。墓葬坐北朝南，总长 117 米，总面积 851 平方米，有 12 个墓室，规模宏大，并有陪葬墓一座。主体建筑部分早年被盗，墓道与附属建筑中的陪葬墓及三个耳室保存完好，共出土玉器、金银器、青铜器、铜铁兵器、印章封泥、铜钱、陶器等七大类 2000 余件文物。玉器多为和阗玉质，玉戈、蟠龙形玉饰、玉螭虎饰、玉枕、玉卮、玉耳杯等为稀世珍品。金银器中的金扣缀贝带为首次完整发现，应是文献所记载的黄金饰具（贝）带。铜铁兵器有剑、戈、戟、铍、矛、殳等，填补了汉初兵器史的空白。印章封泥依内容分为楚王廷官员、军队武官、地方职官三类，为研究西汉早期楚王国官制、印信制度、区域地理、王侯国行政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新颖翔实的材料。根据墓葬建筑粗糙、部分墓室尚未完工和附属兵马俑坑为仓促掩埋等现象以及出土的有关文物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吴楚“七国之乱”的主谋之一——第三代楚王刘戊[44]。

在徐州簸箕山发现汉代墓群。1 号墓（1990 年）出土金饼等珍贵文物[45]。3 号墓（1994 年）规模较大，为宛朐侯刘埶墓。出土有“宛朐侯埶”金印、黄金饰具（贝）带、玉佩、人物画像铜镜、陶编磬等文物 100 件（组）。该墓西北 30 米处有一陪葬俑坑。刘埶参加了其侄楚王刘戊发动的“七国之乱”，其结局历史记载有所不同，刘埶墓的发掘，为研究“七国之乱”后中央对叛乱分子的政策提供了物证[46]。

西汉时期官吏墓葬可分为两类，一类出有玉衣或玉套、缀玉覆面，墓主人身份可能相当于列侯，如徐州市西汉早期的韩山刘婞墓（1992 年）、火山刘和墓（1996 年）、拖龙山汉墓（1992 年）、后楼山汉墓（1991 年）；一类为普通官吏墓，如东海县尹湾师饶

墓（1993年）、扬州市胡场汉墓群（1995～1997年）、仪征市团山汉墓群（1989～1990年）。

刘婞墓出土的文物中玉器较具特色，有玉衣、玉印、玉枕、玉璧、玉珌等，玉印一枚双面印文为“刘婞”、“妾婞”[47]。刘和墓保存完好，出土银缕玉衣、玉枕、玉印、铁剑等文物，银缕玉衣是迄今我国出土玉衣中时代最早的一件，也是西汉时期唯一完整的一件[48]。拖龙山汉墓两座，1号墓保存完好，出土玉器、铜器等文物120余件，铜器多件有“楚”字铭文[49]。后楼山汉墓出土玉枕、玉面罩、玉珌、玉璜、鎏金车马明器等，所出陶俑与100米以南的北洞山汉墓随葬陶俑相似，应为北洞山汉墓的陪葬墓[50]。

东海县尹湾发现一处家族墓地，已发掘6座。6号墓主人为曾任东海郡卒史、五官掾、功曹史的师饶，墓中出土一批重要文物，最为珍贵的是一批简牍，共157枚，近4万字，依内容分为集簿、郡属县乡吏员定簿、长吏迁除簿、吏员考绩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礼钱簿、六甲阴阳书、历谱、遣策、谒、元延二年起居记、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神乌傅（赋）等，为研究西汉中晚期的历史、社会、生活以及东海郡的建置、区域地理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51]。

扬州市胡场发现汉代广陵国的墓葬群，面积约1平方公里，有墓葬数百座。发掘的14座墓葬，多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椁内多为一棺一箱，大都有天花隔板结构。棺室与侧箱的分隔板上木雕门窗等建筑图案，20号墓的木板雕刻宫殿、楼阙、鼓亭、照壁、游船及金乌、玉兔图案，这一木雕艺术与汉代画像石相同。出土了一批制作精良、风格独特的漆器，器类有常见的杯、盘、卮、勺、樽、壶、筒、案等盛食用器，有奁、盒、梳、篦等化妆用具，有刀、剑、削、矛等兵器，还有文具、度量衡、溺器等；胎质多木胎与夹纻胎；普遍使用铜扣、银扣镶嵌等装饰手法；画面构图或粗犷奔放，大幅写意，或构思严谨，细腻规整。有一件银扣漆奁在彩绘画面上贴饰以金银箔片剪制的羽人、狩猎、马戏图案，极为精致，可代表汉代漆器工艺的最高水平。出土漆器的数量之多和制作之精再一次说明，汉代广陵国是一处重要的漆器产地。这批墓葬的时代为西汉时期，是中级官吏阶层和一般平民的墓葬[52]。

仪征市团山发现西汉早期墓群，已发掘的4座墓南北向一字排开，均为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品有玉璜、铜印、漆奁、木俑及陶器等共200余件。这批墓葬可能是西汉江都王刘非陵墓的陪葬墓[53]。

经过发掘的两汉时期的墓葬，较为重要的还有徐州市郊陶楼（1989、1990年）、九里山（1991年）、万寨（1992年）等汉墓群，铜山县李屯汉墓（1990年）和米山汉墓群（1991年），仪征市张竹汉墓（1989年）和刘集汉墓群（1997年），江宁县湖熟汉代家族墓地（1989、1995年），高淳县固城东汉墓（1989年），以及泗阳县红墩（1998年），睢宁县锅山（1992年）、墓山东汉画像石墓（1992年）等。这批汉墓出土大量文

物，值得研究汉代的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的重视。

五

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南京，江苏是六朝考古的中心区域。江苏六朝考古的前四十年，对南京六朝都城、扬州郡城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并予以妥善保护；对若干处纪念性石刻、栖霞山千佛崖石窟和三十二处陵墓石刻的普查、修复和研究，再现了六朝特有的艺术风貌；对南京、丹阳、宜兴等地的二十多处陵墓和世家大族墓地的发掘，重现了六朝兴替的历史和门阀士族兴盛的庄园经济；陵墓常见有羽人戏虎、竹林七贤、骑乐仪仗等各种砖印壁画，是研究六朝绘画艺术、服饰制度和思想意识、时代风尚的重要资料；大量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六朝史和书法艺术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宜兴南山青瓷窑群的发现和全省各地大量精美青瓷器的出土，体现了六朝时期手工业方面的突出成就；南京雨花区长岗村五号墓出土的青瓷釉下彩盘口壶，说明我国在三国时期就已掌握烧制釉下彩瓷器的工艺，这是对陶瓷装饰艺术的重大贡献[54]。

近十年来，我省的六朝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又有了很大的进展。

在城市考古方面有镇江市铁瓮城遗址的发掘（1991、1992、1994 年）。铁瓮城南北长 340 米，东西宽 220 米，总面积 7.5 万平方米；筑城时将铁瓮山外侧略加修整成台阶状，依山堆筑城垣，使铁瓮城与铁瓮山浑然一体[55]。铁瓮城的发现，使对六朝时期京城、京口城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献。

在佛教艺术方面，1996 年对南京栖霞山千佛崖第 13 窟的四座佛像进行清理使之恢复原貌，该石窟凿于南齐，与云冈石窟同时期造像比较研究，显示出六朝时期佛教的南传系统中，南北的石窟艺术相互影响[56]。1993 年淮安市出土一块东魏石刻铭文造像碑，碑正面雕刻佛像，结跏趺坐于仰覆莲花座上，碑底座刻有狮、象，碑背铭文 7 行 153 字，为供养人发愿文[57]。该碑是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

我省六朝考古工作做得最多的是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六朝墓葬主要集中在南京地区，建国以来已在南京地区发现六朝时期墓葬 1000 多座，其中纪年墓 100 多座。近十年来，在南京地区所发掘的六朝墓葬主要有西善桥黄法氍墓（1989 年）、“辅国将军”墓（1991 年）、农业大学东晋墓（1991 年）、殷巷东晋南朝墓（1991 年）、尧化镇东吴墓、西晋墓（1992 年）、雨花台吴末晋初墓（1992 年）、铁心桥家族墓地（1992 年）、江宁县下坊村东吴墓、东晋墓（1993 年）、杨家山西晋墓（1995 年）、花神庙南朝墓（1996 年）、白龙山南朝大墓（1997 年）、富贵山六朝墓地（1997 年）、杨梅山高崧家族墓地（1998 年）。

尧化镇东吴墓所出陶器均为泥质灰陶，与以往所见同时期墓葬多出红陶器不同，提

出了新的学术问题[59]。江宁下坊村东吴墓出土青瓷器9件，极为精美；青瓷堆塑罐上除堆塑出魂瓶上常见的造型外，还贴塑甲鱼、螃蟹、鱼等“美食”，器物造型浑然一体，形象生动，着釉匀净，体现出青瓷生产的高超水平；青瓷堆塑灶层亭叠阁，凤鸟瑞兽栩栩如生，充满神秘色彩，设计优美、结构复杂的庭院造型，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宝贵资料[59]。下坊村东晋墓内有一具完整红漆木棺，以铜钉加固，解开了以往六朝墓中常见铜钉的用途之谜；所出奁盒等漆器光亮如新，为六朝漆器之珍品；文房用品齐全，毛笔和木柄刻刀为首次发现[60]。西善桥萧梁“辅国将军”墓中出土的石马造型优美，昂首挺胸，雄视远方，堪称艺术珍品[61]。南朝陈侍中、中权大将军黄法氍墓，是迄今发现的官阶最高的六朝墓，墓志内容具有较高的史学研究价值[62]。殷巷南朝墓出土完整古墨一锭，端面模印莲瓣纹，虽埋藏千年，仍漆黑如新，填补了南朝墨史空白[63]。花神庙南朝墓出土一批玉、石器，是研究六朝玉文化的珍贵标本；玉人秀骨清相，飘逸绝伦，充满神韵，既填补了六朝玉器品类的空白，又可在中国历代玉人作品中代表六朝风格[64]。

1964年在富贵山发掘了晋恭帝冲平陵，1997年又在此处清理东晋早期至南朝晚期墓葬6座。墓葬结构、规模和随葬品显示，有4座墓其主人应是皇室成员或权臣；4号墓出土的玻璃罐、琥珀管、琥珀狮和炭精狮当为舶来品，是研究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史的新资料[65]。在麒麟门白龙山北麓发掘的大墓，平面呈“凸”字形，全长13.4米，由封门墙、甬道、墓室、排水沟构成，规模较大，惜早年被盗；在其正北1000米处有肖宏陵前石刻，结合以往考古资料，认为此墓可能是肖宏的陵墓[66]。杨梅山东晋高崧家族墓地，后背山体，前面为开阔地，东西两侧有水塘，其地理环境为典型的六朝家族墓地特点；在各墓的排水沟前面，有一条更深的横向排水渠通向水塘，这一成套的排水系统前所未见；已发掘的6座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玉器、金银器、玻璃器都成组成套，玉器主要为玉佩、玉璜等玉礼器和装饰品，金银器主要为羊、鸟、麒麟等动物模型，成批的金银器、玉器在六朝墓中是首次发现[67]。随着对高崧家族墓地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将会为六朝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提供新的资料。

除南京地区以外，还在六合县发现南朝画像砖墓（1993年）、泰州市发现南朝青瓷窖藏（1994年）、苏州市发现东吴墓地（1998年）。六合县樊集南朝画像砖墓早年被盗，现存花纹、画像砖种类多样，画像砖均为侍女图；画像砖墓在江淮东部地区为首次发现[68]。泰州市西郊窖藏青瓷器16件，属越窑产品，其中莲瓣纹盖罐造型新颖别致，纹饰庄重大方，釉色鲜翠晶莹，为青瓷艺术珍品[69]。苏州留园村发现东吴墓地，发掘的5座大墓虽早年被盗，残存的随葬品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70]。

近十年来，对东晋帝陵、南京六朝墓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祔葬墓、南京六朝石刻分别进行了综合性研究[71]，把六朝考古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六

江苏前四十年的隋唐五代考古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扬州唐城的文献资料整理和十多年的调查、钻探与发掘，为研究古城的范围、兴废和布局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发掘南唐二陵所揭示的陵墓建筑特色和所出土的文物，代表了五代时期南方建筑、彩绘、雕塑艺术和制陶工艺等方面的成就；全省各地为数众多的隋唐五代墓志和买地券的出土，为研究当时的政治、官制和经济补充了资料；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中出土950余件文物，其中酒令筹等专用酒具属首次发现；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的调查资料，反映了唐代采矿业的发达；宜兴唐代龙窑的发掘品经鉴定，较六朝青瓷的烧造工艺有很大进步；对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的维修和对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的发掘，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22]。

近十年来，唐代城市考古是我省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扬州市唐城遗址连续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证明，其罗城的修筑年代晚于初唐；清理一处规模较大的属于富商大贾居址的建筑遗迹，出土的遗物中有波斯陶器、玻璃杯瓶和仿皮囊壶瓷器等，说明唐代扬州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埠；经钻探发现唐代古河道一条，城内部分全长6300米，确定了文献中唐代扬州“二十四桥”中十九座桥梁的大体位置，南北向桥梁间距一般为500米，东西向桥梁间距约350米。这种特有的城市规划模式，是和唐代扬州繁荣的商业经济相适应的[23]。镇江市发现了唐代官衙遗迹和木构下水道遗迹[24]。苏州市发现了唐代城墙遗址[25]。

1989～1990年，对连云港市境内的石室土墩进行了调查，发现200座，并在云台山和伊芦山发掘24座。石室平面有长方形、刀形和凸字形三种，其砌筑方法与太湖地区的石室土墩基本相同，石室内出土隋唐时期的瓷器等遗物[26]。对于连云港地区石室土墩的时代和性质等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铜山县花马庄唐墓和苏州市虎丘唐墓虽为残墓，但仍清理出一批陶俑等文物，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7]。

七

江苏前四十年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主要有：淮安汤庙北宋墓群和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了一批漆器；镇江北宋章岷墓出土了一批青瓷器；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溧阳小平桥发现一批银器；江阴宋代葛闳墓中出土的一把钢剑，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夹钢制品；在建于北宋的苏州瑞光寺塔中先后两次发现佛教文物；吴县黄桥吕师孟墓和无锡钱裕墓中均出土大量元代金银器；丹徒大路元代窖藏瓷器分属于多个

不同的窑系；江阴明墓出土了外科医疗器械；淮安明代王镇墓中出土多位名家的书画作品25幅；南京明代徐俌墓中出土大量金、银、玉器和丝织品；吴县清代毕沅墓中出土大量反映清代官僚奢侈生活的金银珠宝[78]。

近十年来，江苏宋、元、明、清时期考古同样有一些新的重要发现。扬州市宋三城的勘探与发掘，探明了宋大城、堡城、夹城的位置、范围和布局结构，三城的出现与两次增筑及特有的布局特点，充分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79]。宝应县城、江浦县新甸、溧阳市沙河、江阴市夏港等地的宋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漆器和砚台等文物[80]。丹阳市河阳宋墓木棺盖内漆绘有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星宿星象图[81]。镇江市发现的一处“泥孩儿”作坊遗址，在国内尚属首例，出土的儿童等泥塑造型具有艺术研究和民俗研究价值[82]。

在徐州市大山头发现一座元代纪年画像石墓，四块画像石的内容以人物和花卉为主，随葬瓷器等文物20余件，其中一尊石香炉腹部镌有纪年书款[83]。这种有绝对纪年的元代画像石墓，为江苏首次发现，全国亦属罕见。

全省各地都发现了明代墓葬，其中武进市黄山桥王洛家族墓群和泰州市鲍家坝刘湘夫妇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84]；江宁县东善桥宋铉夫妇墓和南京铁心桥萧氏夫妇墓出土了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和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等瓷器珍品[85]。为配合沪宁高速公路基本建设所进行的考古工作中，在苏州市、吴县和丹阳市等地共发掘100多座明清墓葬，出土了一批文物[86]，这些发现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文化艺术和手工业经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执笔：车广锦）

注　释

①④㉜㊷[54][72][78]　南京博物院：《江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南京博物院：《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②　《江苏发现始新世化石》，《化石》1989年2期；狄富保：《江苏溧阳上黄发现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化石》，《南方文物》1997年3期；齐陶：《江苏溧阳上黄中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发现与意义》（待刊）。

③　南京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汤山考古发掘队：《南京人化石地点》，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⑤　邹厚本、谷建祥：《青莲岗文化再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1期。

⑥　张敏：《江淮东部古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发掘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95年4期。

⑦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4期；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江苏高邮周邶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4期；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江苏阜宁陆

庄遗址》,《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⑧ 南京博物院:《1989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⑨⑫ 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制度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6期。

⑩ 栾丰实:《花厅墓地初论》,《东南文化》1992年1期。

⑪ 徐坚:《花厅墓地浅析》,《东南文化》1997年3期。

⑬ 车广锦:《海岱地区文明起源初探》,《东南文化》1994年4期。

⑭ 《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⑮ 乌墩考古队:《武进乌墩遗址发掘报告》,《通古达今之路——宁沪高速公路(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文集》,《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三城巷考古队:《丹阳三城巷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凤凰山遗址考古队:《丹阳市凤凰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0年1、2期。

⑯⑰⑱⑳ 苏州市博物馆发掘资料。

⑲ 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

⑳ 江苏省寺墩考古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四、第五次发掘》,《东方文明之光》。

㉑ 车广锦:《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东南文化》1994年5期。

㉒ 南京博物院:《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史宗刚:《无愧于东方文明之光——〈东方文明之光〉评介》,《文物》1997年7期。

㉓ 《高淳县朝墩头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

㉔ 《南京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28日。

㉕ 《金坛三星村遗址考古喜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13日。

㉖ 汪青青:《溧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神人兽面鸟纹圭》,《东方文明之光》;王奇志、车广锦:《玉器三题》,《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㉗ 张敏:《从史前陶文谈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东南文化》1998年1期。

㉘ 谷建祥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3期。

㉙ 吴建民、孙世英:《江苏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与环境、海岸线变迁关系》,《第四纪沉积与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91年增刊。

㉚ 王富葆等:《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陈杰、吴建民:《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古环境》,《东方文明之光》。

㉛ 池锦祺、王昌燧等:《中国新沂市新石器时期古陶器的产地分析研究》,《东方文明之光》。

㉝ 《江浦县牛头岗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㉞ 《仪征神墩遗址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17日。

㉟ 《盐城首次出土一批商代文物》,《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9日。

㊱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徒南岗山土墩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㊲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金坛连山土墩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

㊳ 《溧水和凤乡土墩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

㊴ 大夫墩考古队:《丹阳市河阳大夫墩发掘报告》,《通古达今之路——宁沪高速公路(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文集》,《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丹徒县馒尔墩、大小笆斗土墩周代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㊵ 南京博物院发掘资料。

㊷ 《苏州真山墓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5年11月19日；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2期。

㊸ 《徐州市驮篮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

㊹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8期；韦正等：《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8期。

㊺ 邱永生：《徐州郭庄汉墓》，《考古与文物》1993年1期。

㊻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2期。

㊼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㊽ 《徐州汉代考古又有重大发现——徐州汉皇族墓出土银缕玉衣等文物》，《中国文物报》1996年10月20日。

㊾ 《徐州市拖龙山西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3年。

㊿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4期。

(51)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8期；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年8期；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8期；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52) 《扬州胡场汉墓发掘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23日。

(53) 南京博物院等：《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年4期。

(55) 《镇江铁瓮城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16日。

(56) 林蔚：《栖霞山千佛崖第13窟的新发现》，《文物》1996年4期。

(57) 王锡铭、陈锦惠：《江苏淮安出土石刻铭文造像碑》，《东南文化》1994年4期；张同标：《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东南文化》1994年4期；窦修林、张适：《〈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质疑》，《东南文化》1996年4期。

(58) 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尧化镇六朝早期墓》，《考古》1998年8期。

(59) 《江苏南京市江宁县下坊村发现东吴青瓷器》，《考古》1998年8期。

(60) 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8期。

(61) 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东南文化》1997年1期；朱国平、王奇志：《南京西善桥"辅国将军"墓志考》，《东南文化》1996年2期；章湾、力子：《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志质疑》，《东南文化》1997年1期。

(6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1993年11期；王素：《陈黄法𣰋墓志校正》，《文物》1993年11期。

(63)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殷巷东晋南朝墓》，《东南文化》1993年2期；王志高、邵磊：《试论我国古代墨的形制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3年2期。

(64) 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花神庙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8期。

(65) 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8期。

(66) 南京市博物馆发掘资料；梁白泉：《南京的六朝石刻》第78～80页，南京出版社，1998年。

(67) 南京市博物馆发掘资料。

(68) 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六合南朝画像砖墓》，《文物》1998年5期。

(69)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出土一组南朝青瓷器》，《文物》1996年11期。

⑫ 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3、4期；王去非、赵超：《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综考》，《考古》1990年第10期；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祔葬墓》，《考古》1991年10期；梁白泉：《南京的六朝石刻》，南京出版社，1998年；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⑬ 《唐代扬州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市文化馆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5期；《扬州宋城与唐代古河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

⑭ 《镇江发现唐代官衙遗迹》，《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1日；《镇江市唐代润州木构下水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

⑮ 《苏州市梅家桥古城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

⑯ 《连云港云台山、灌云伊芦山石室土墩》，《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纪达凯、陈中：《连云港地区土墩石室遗存时代性质新考》，《东南文化》1993年1期。

⑰ 徐州市博物馆：《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考古》，1997年3期；《苏州市虎丘唐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

⑲ 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宋三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1990年7期。

⑳ 《宝应北宋墓群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9日；《江浦县星甸北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狄富保：《江苏溧阳沙河宋代木椁墓》，《东南文化》1994年5期；《江阴县夏港北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㉑ 《丹阳市河阳砖瓦厂宋代星象图木棺》，《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㉒ 《镇江发现宋"泥孩儿"作坊遗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16日。

㉓ 邱永生、徐旭：《江苏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考古》1993年2期。

㉔ 武进市博物馆考古资料；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相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8期。

㉕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南郊明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7年1期。

㉖ 沈家山考古队：《丹阳市沈家山明户部尚书沈闵墓神道石刻》，《通古达今之路——宁沪高速公路（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文集》，《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沈家山考古队：《丹阳市大泊明代墓葬》，《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苏州段考古队：《宁沪高速公路苏州段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

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浙江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尤其是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良渚文化、商周土墩墓、瓷窑址考古等主要课题研究上获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展现了浙江考古事业的重要成就和光明前景。

一

浙江，是一个多山脉和多丘陵地区，蕴藏较多的典型地质剖面和化石。1997 年 1 月，经国际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邮投，正式批准常山县黄泥塘中奥陶系达瑞威尔阶底界的连续地层剖面为全球层型剖面点，成为我国获得的第一个“金钉子”剖面[①]。化石主要分布在金华、江山、巨县、兰溪等浙西丘陵和临海、天台、嵊县等浙东山区，大多为晚白垩世的恐龙和恐龙蛋化石。其中临海上盘发现的翼龙化石，两翼展翅可达 5 米以上，填补了我国无齿翼龙和晚白垩世翼龙的空白[②]。1974 年在建德李家乌龟洞发现的古人类右上犬齿化石，与大熊猫、中国犀、最后鬣狗等哺乳动物化石共生，属距今 5 万年的晚更新世[③]。“建德人”化石的发现，为探索浙江境内远古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直是浙江考古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全省已发现古遗址不下千处，发掘的地点近百处。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区块，即杭（州）嘉（兴）湖（州）（与苏南和上海地区同属环太湖流域考古区系）、宁（波）绍（兴）、金（华）巨（州）和温（州）台（州）地区。前两个地区是浙江的平原，古遗址丰富，工作开展较多；后两个地区多山丘，虽作过多次调查，但发现较少，工作开展相对亦较薄弱，近年来也有新的发现。

（一）1990 年肖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④]，是我省探索早于 7000 年史前文化遗存的重要收获。遗址地处钱塘江南岸，文化层被古湘湖淤积层覆盖，虽有厚达 2 米左右的古文化堆积，但各层的变化不大，可视为同一时期的遗存。陶器以夹砂陶、夹炭陶和粗泥陶

为主。夹砂陶多为釜类，夹炭（主要是植物炭末）陶多为盘、罐、豆。陶色以黑灰为主，少量红陶。石器以锛为主。木器有锥、镞、器柄和一些用途不明的器物。骨器有锥、匕、哨、针、勾勒器等。经送检的木块、橡子的^{14}C测定，分别为距今7069±210年、7282±155年、7618±242年（以上数据均未校正）和7310±176年（已经树轮校正）。这是目前浙江境内年代最早的古文化遗存。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虽然与相邻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自身特征明显，不宜划归上述文化序列之中。由于仅此一处，缺乏可比资料，因而暂且以“跨湖桥类型”称之。

（二）70年代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5]，极大地震惊了国内外考古界。河姆渡遗址由于一直深埋于水位之下，不仅陶、石器保存完好，而且众多的动、植物，骨、角、牙、木、漆器和大量的木质建筑构件等几乎都保存至今，堪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宝库。依据河姆渡遗址独特的陶器群，考古学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该遗址文化堆积厚达4米左右，划分为四个文化层。从第4层到第1层的绝对年代，大约依次分别为距今7000年至6500年、6500年至6000年、6000年至5600年、5600年至5200年，其年代跨度长达2000年。有些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即遗址的4层（分为4期）是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有些学者则认为河姆渡文化指的是遗址的3、4层，表述为河姆渡一期至四期文化，并认为还存在相当于良渚文化的“第五期文化”，不宜将河姆渡四期文化看成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发展过程[6]。这方面的争论，迄今仍未结束。

关于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似乎公认为钱塘江南岸至东海（包括舟山群岛），即常说的宁绍平原。目前宁绍平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数十处，以姚江两岸的分布相对集中。宁波沙溪、慈湖、小东门，奉化名山后，象山塔山，余姚鲻山、鲞架山，舟山马岙、孙家山遗址[7]等均在宁波和舟山地区；而绍兴地区的马鞍、仙人山遗址[8]等似可归入良渚文化；肖山跨湖桥遗址则是新的古文化类型。所以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也是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题目。

由于河姆渡遗址保存特别完好，两次实际发掘的面积已达2600余平方米，获得的各类遗存又特别丰富，以致后来的其他遗址发掘中，虽然在器物方面有所补充，并填补了若干缺环，但没有堪与河姆渡遗址本身相比者。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余姚鲻山遗址的发掘，虽然发掘面积仅350平方米，但遗址的下层与河姆渡第四层面貌极为相似。数百件打制小石器的出土，包括锤击器、刮削器、尖状器、凿形器、斧形器五大类，为深入了解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提供了新资料。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与河姆渡文化的确立，对于我国史前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原中心论或黄河流域中心论是一个巨大冲击。对我国探索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稻作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带有榫卯的木构建筑、制漆工艺以及古生物、古环境等诸多学科研究，都有着广泛而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杭嘉湖平原是中国史前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早在1936年就有考古先驱者施昕更的良渚遗址调查、发掘。建国以后，江浙沪考古工作者在太湖流域的考古工作，更是成绩卓著。1959年正式命名的“良渚文化”，改变了“仰韶—龙山”一统天下的局面；吴兴邱城遗址下层、嘉兴马家浜遗址[9]等的发现，又为“马家浜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基石。1979年桐乡罗家角遗址[10]的发掘，不但把马家浜文化的年代上溯到7000余年，也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罗家角类型”的确认，改变了“河姆渡→马家浜”的模糊认识，为钱塘江两岸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古文化发展序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余杭吴家埠遗址[11]的发掘和1993年邱城遗址第4次发掘，以及长兴、安吉沿浙北西部的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现，为马家浜文化遗址划分不同的类型创造了条件。“罗家角—马家浜”、“吴家埠—邱城”、“圩墩—草鞋山”，为初步确认的马家浜文化的三个类型。它们有共同的渊源，共同的因素，但它们的根还不清楚。探索“前马家浜文化”的工作尚需努力。

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即崧泽文化，是有待探索的复杂课题。浙江境内崧泽文化的遗存，早在1957年邱城中层墓葬就有所发现。1973年嘉兴双桥遗址下层[12]出土的凿形足釜形鼎、鸡笼形镂孔豆把、折肩折腹盆或罐、花瓣形圈足壶或杯等，都与上海崧泽墓地遗物具有相同的特征。1983年发掘的嘉兴雀幕桥遗址下层、1986年发掘的嘉善大往遗址下层[13]等，都属于崧泽阶段的文化堆积。但总的说来，浙江境内崧泽文化的发掘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一环。1996年嘉兴南河浜遗址[14]的发掘，则是继崧泽遗址以后的一次重大发现。在近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中，除上层有少量良渚文化遗存外，其余90余座墓葬和20多个灰坑都属于崧泽时期。这些墓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随葬丰富的陶器，还有玉钺、半璧形玉璜等玉礼器以及骨、石器；第二等级仅有少量陶器或有小件玉器；第三等级无随葬品。出土700余件器物，以及明确的层位关系，为崧泽文化的分区和分期研究，及其与良渚文化的发展关系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人工营建土台的发现：土台高约90厘米，面积为10×10米，呈覆斗状；经解剖后，明确地显示了营建、使用、扩建的连续过程，还存在祭奠活动的遗迹。使良渚文化普遍发现的“祭坛”遗迹现象找到了渊源。墓葬中反映的显贵者与平民的分野、玉礼器的出现、祭坛的礼仪意义等，都对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作为良渚文化命名地的浙江，虽然五六十年代即有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余杭苏家村[15]等的不同规模发掘，并大体认识了良渚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但缺乏重大突破。1978年开始，在海宁千金角、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等地[16]相继发掘了一批良渚文化遗址，其中墓葬就达近百座，大体可树立起良渚文化从距今5300年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考古分期的基本标尺。

1986年正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我们在良渚遗址范围内的反山[17]发掘了良渚文化显贵者墓地。660平方米的发掘区虽然仅占反山墓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却发现排列有序的大墓11座，且多有棺椁葬具；随葬品多达1200余件（套），玉器占90%以上，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新器种。精雕细琢的“良渚神徽”，龙首形纹样、浅浮雕、镂孔，细如发丝的阴刻纹等等令人惊叹不已。由于精心剥剔、操作得当，对玉器在墓内的原来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的认识：除了琮、璧、镯等玉器没有组合成套之外，大量玉器都是组装件（即用硬质的柄、杆连接为一整体，如玉钺）、穿缀件（即用线或带连成一件，如串饰和璜）、镶嵌件（即无孔的玉料粘贴或嵌入胎体，如嵌玉漆杯）的配套形式。这座人工营建的土台，土方用量高达2万立方米左右，在目前已发现的数十座良渚文化土台中，以反山土台的规格和等级为最，堪称“良渚王陵”。

反山发掘把良渚文化研究推上了考古学科的前沿，新的重大发现接踵而至。1987年距反山东北5公里的瑶山又发现了一座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18]，这是良渚文化首次揭示的遗迹现象，清理发现，瑶山祭坛人工营建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有多重阶级状石堪及护坡，是良渚文化常见的祭坛遗迹中规模最壮观的一处。祭坛上埋有显贵者大墓十余座，南北两列有序，多数有棺椁作葬具，随葬品700余件（套），玉器占90%以上，发现了许多新的器种和纹样。1991年在距反山以西仅2公里的汇观山又有了与瑶山相似的发现[19]。祭坛平面呈“回”字形三重结构，面积超过1600平方米，显贵者大墓仅存四座，随葬品170余件（套），玉器100余件（套）。4号墓随葬石钺多达48件，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1993年发掘的横山2号墓随葬石钺高达132件）。反山、瑶山和汇观山出土的陶器基本上都可归在良渚文化第二期前后。三地所出的玉器风格也有相似之处。

反山发掘以后，联系良渚一带历年来的调查和发掘资料，我们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20]。在余杭县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辖区内，天目山余脉的长条形谷地中，3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集中了五十余处遗址，从西端的吴家埠遗址开始，有汇观山、反山、桑树头、钟家村、马金口、黄泥堪、罗村、姚家墩、梅园里、钵衣山、瑶山等，至东端的荀山周围，遗址成串连片地密集分布，除了吴家埠下层、梅园里下层和荀山东坡下层发现马家浜文化堆积外，均属良渚文化时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聚居中心之一。

“良渚遗址群”真正确立为良渚文化的中心，是1987年试掘发现、经1992年至1993年发掘的莫角山遗址。这是一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出地面七八米的大土台。试掘发现此台为人工营建。土层最厚处达10米以上，在试掘区内还发现了直径20米左右的“燎祭”遗迹。在30万平方米的大土台上，还有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座土台。1992年在三座土台之间发掘了1500平方米，发现了良渚人工夯筑的基址及两排大型柱洞[21]。夯土由砂层和粘土层相间夯打而成，厚70余厘米，夯窝密集，夯

层均匀。大型柱洞的发现，证实基址上应有宏大的地面建筑。经初步勘查，夯土基址的范围就在三座土台之间，约超过2万平方米。莫角山遗址四周分布着反山、桑树头等出土大量玉器的著名遗址，显示了莫角山遗址的重要地位，它在良渚遗址群范围内，是一处“中心址”。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在聚落形态上，存在着不同时期、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若干中心，而“良渚遗址群”是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

良渚遗址群中发掘面积最多的是庙前遗址，经1988、1990、1993年三次发掘，揭露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22]。下层有马家浜文化堆积，上层为良渚文化的多层堆积。发现良渚墓葬50余座，大多为良渚早期，随葬品以鼎、豆、罐为基本组合。还发现一座“井干式”木质窖藏，其中陶器等58件。发现柱洞下铺垫木板的房址两座。庙前遗址是依傍沼泽的较大聚落，成排的木桩间隔了居址与沼泽，居址经过泥土填筑，这对了解良渚时期的聚落形态十分有益。

1988年海宁荷叶地遗址[23]的发掘，发现了一座呈圜丘状的中型祭坛。祭坛四周为灰土沟。在面积约400平方米的土台上埋有16座良渚墓葬，除一座墓随葬玉琮等器物外，大多以陶、石器和小件玉器随葬。1990年海宁达泽庙遗址[24]的发掘，同样发现了一座圜丘状的小型祭坛。从地层上表明，祭坛是不同阶段增高扩大的。良渚早期祭坛面积直径不足10米，其上发现两座墓葬；增高扩大后祭坛直径约16米，其上发现墓葬三座，年代为中期偏晚。随葬品均以陶器为主，部分墓有小件玉器。1996年海宁畲墩庙遗址[25]、1997年海盐龙潭港遗址[26]、1995年至1998年中日合作发掘的桐乡普安桥遗址[27]等均发现了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良渚文化祭祀场所与墓地复合的遗迹。良渚文化这些可供比较研究的遗迹现象的大量发现，集中反映了多层等级的社会结构，对探讨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的出现，手工业日趋专业化，先进的制陶术，大量的玉礼器，大型礼仪性建筑，不同等级的贵族与平民的分野等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同时期其他古文化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研究中，有着突出的价值和作用。

良渚文化的去向或消失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课题，良渚式的玉琮、V形石刀等曾在陕北、晋南、粤北等相距遥远的遗址中发现，商周青铜礼器上的兽面纹亦与良渚玉器上“神徽”图像的构图方式极其相似，这些迹象可以视为良渚文化在文化交流、融会过程中曾起过某些重要作用。1997年浙江遂昌好川墓地的发现[28]，为探索良渚文化的去向及后续文化等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线索。好川墓地位于浙南山区，瓯江源头。发掘清理大小墓葬80座，墓向均偏东，布局排列十分有序。随葬品组合以早晚、等级不同而有演变发展。陶器特征大多为良渚晚期因素，但少量拍印条格纹、曲折纹、条纹、叶脉纹的圜底器、圈足器又是早期印纹陶的特点。石钺、有段石锛、石镞等与良渚文化同类

器相近。玉器有钺、锥形器、管珠等，均素面无纹，值得重视的是镶嵌或粘接在某种器具上的玉片，其中几件玉片形状与良渚玉璧上铭刻的“⾠”形图纹一致。总之，好川墓地和出土器物具有良渚文化相似的总体风格或浓重影响，又出现了稍晚的自身特点，由于这处大型墓地没有发现相应的遗址，没有可供比较的资料，又不宜简单归属良渚文化范畴，故暂将其称为“好川类型”。

（四）良渚文化和河姆渡后续文化之后的考古工作，始终是浙江省的薄弱环节。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江苏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江西的吴城文化阶段，虽然在全省范围发现较多的相当于该阶段的遗物，如石器中的石磨盘、石磨棒、断面扇形的斧、凹槽式有段锛、断面呈六棱形的镞等，陶器大多用泥条盘筑法制作，盛行绳纹、条纹、编织纹、方格纹等，炊器有鼎、釜、连体束腰甗，而绝无鬲，高领罐、细把突棱豆、鸭形壶极具特色，罐、盆多见圜底或凹底等，表明了浙江境内地域性的文化特点，但多属调查、采集的资料，为研究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在良渚文化分布区相同的地域内，是以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的发现而命名的马桥文化。我们经过认真地探索也有所进展。1983 年嘉兴雀幕桥，1985 年嘉善大往、绍兴仙人山，1986 年湖州邱城等遗址[29]的发掘均在其上层确立了马桥文化的堆积，但地层较薄，遗物也不丰富，石器、陶器的某些特点与良渚文化同类器似可找出演变轨迹，但更多的文化面貌与内涵显然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后续。如石器保留较多的打琢痕迹，不及良渚文化石器通体磨光；制陶术多泥条盘筑，与良渚文化快轮制陶有别；各种印纹的陶器与良渚文化光素陶器判然不同；迄今未发现马桥文化的玉器，而良渚文化有丰富的玉器等等。马桥文化中石镞和陶网坠数量较多，反映经济生活中渔猎占有较大比重，与良渚文化以稻作农业为主也有较大变化。总之马桥文化是在自然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也处于重新组合的大变革之后，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形态在本地区的产物。

二

浙江地区虽然有过十分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却并未反映出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那种较为直接的、或较为单纯的文化传承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相当明显而复杂的文化变异现象。

（一）以封土成墩为其外在表现形式、随葬印纹陶与原始瓷为其基本内涵特征的土墩遗存（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因其遗存分布广阔，保存情况较好，时间延续长，故而被选作浙江商周考古的主要突破口。50 年代至 60 年代即开始注意到太湖沿岸地区的土墩遗存，并进行过小型清理。70 年代末江山峡口肩头弄等地的清理发掘[30]，鉴于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采用了按器物组合分类研究的方法，这种开拓性探索为后来的工作与

研究创造了条件。80年代展开了土墩遗存的大规模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其中重要的考古发掘有：1982年的长兴便山[31]，1984年的海宁夹山[32]、杭州湾南岸的慈溪彭东、东安[33]，1989年的长兴石狮[34]等。而黄岩小人尖青铜墓的发掘[35]，则是浙江土墩墓出土青铜礼器的首次明确发现。

与以往相比，这一阶段由于积累了大量的新资料，大体上掌握了土墩石室墓的分布范围；基本上弄清了石室的结构及其出土遗物的特点，并发现了一些有关土墩石室墓与无石室的土墩墓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的考古学证据；在考古方法上更注意某一地点或小区域内发掘资料的系统性或整体性。这些考古实践，无疑有助于了解和把握该地点某一区域内此种遗存的总体特征，从而使得不同区域同类遗存之比较研究，有可能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野外工作中成功地剥剔出墓葬掩埋次序的层位关系，从而确立了土墩遗存研究的基本单元——应是先后埋入墩内、各自具有独立时空范畴的墓葬个体。平地起封的大型土墩墓中存在木质葬具迹象的考古学判断，把土墩顶部封土的塌陷现象与墓葬内部可能存在的葬具结构的损毁相联系，无疑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有的大型土墩墓存在先堆筑熟土台、用卵石铺设石床再行埋葬的迹象，显然对这种平地掩埋、堆土成墩之特异埋葬方式渊源的探讨，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广泛流行于太湖—杭州湾地区的土墩石室墓的发掘，从考古学上确认了土墩石室墓是从土墩墓演化、派生出来的一类遗存。其建筑程序可大致概括为：平整地基或挖掘墓坑→垒墓壁→石片或碎石土层铺底→室外积石堆土→盖顶封门→总体封土成墩。值得指出的是石室内不同时期“器物组”的关系揭示、或不同器物组的上下地层叠压、或在同一平面不同部位的分组放置现象，与石室封门和拆动重封迹象存在相互对应的关联，从而表明此类石室是一种曾被先后多次使用之遗存。这一现象的确认，不仅对于认识此类遗存的复杂内涵、探析其性质用途、进行分期和探讨埋葬习俗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还表明它和土墩遗存一样，不能简单地将整个土墩或整座石室作为考古断代的单位，而应以石室内的“器物组”作为基本的考古研究单元。

（二）分布在瑞安、平阳、苍南、三门等浙南沿海地区的“石棚墓”，是与土墩遗存有别而又存在颇多共性的另一类形制独特的商周时期墓葬。1993年对瑞安岱石山石棚遗存的发掘及对该类遗存分布区域的考古调查[36]，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成果，此类墓葬，用未经加工的长条石或长方块石在地面构架起三面体，上盖巨石，形成棚状建筑。出土器物中，有印纹陶、原始瓷、青铜器、石器，可以划分为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从文化内涵分析，石棚墓与土墩墓应是分别属于越人不同分支的文化遗存[37]。

（三）关于浙江商周时期的生活居址考古，虽自50年代以来对淳安进贤[38]、肖山蜀山[39]和绍兴袍谷[40]等遗址相继进行了发掘，但未能找到较为理想的原生文化堆积。1991年春发掘的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41]，收获虽然不丰、少见土墩墓中常见的印纹陶和原始

瓷，但该遗址出土的主要陶系——泥质陶与夹砂陶，却为浙江土墩墓所未见[42]。

（四）浙江在商周时期乃于越之地，存在过强盛一时的越国。1982年绍兴坡塘306号越墓出土的精美青铜器以及玉耳金舟等，曾轰动中外。1996年至1998年考古工作者又抢救发掘了绍兴里木栅的印山大墓。墓葬开凿在山丘的中心部位，墓坑上口长46米，坑底长40米，上口宽14～15米，底宽12米，坑深14米。东壁正中设有长达54米的宽大墓道。墓室系用巨大的枋木构建，分前中后三室，中室有独木棺一口。墓室横截面呈三角形，现存空间高达4米余，长33.4米，底宽5米。室内面积达160平方米。估计所用木材量在430立方米以上。坑底铺厚达1.65米以上的木炭层，三角形墓室顶部纵向压盖半圆形厚木。整个墓室先用140层树皮包裹，再填筑1米左右的木炭层，炭层外表再用数层树皮包护。整个墓坑填筑青膏泥。墓坑以上筑有长径70米、短径30米、中心部位高达10米的巨型封土墩，并经分层夯筑。墓地周围挖有隍壕，形成一个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陵园空间，显示出一种高等级的王陵规格。惜此墓早期被盗，墓内遗物几洗劫一空。依据发掘者们的初步研究，推定印山大墓当是文献记载中“木客大冢”，乃越王勾践之父允常之陵寝[43]。

“木客大冢”的发现，揭开了越国王陵的神秘面纱，是越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它那两侧斜坡式、横断面呈三角形的墓室结构形制，恰好与土墩石室横断面呈梯形的长条形巷道相近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土墩石室遗存乃系于越先民独特葬俗的判断。

三

瓷窑遗址考古研究，是浙江考古的重要课题。

（一）龙泉窑考古始于30年代陈万里的八次龙泉之行[44]。50年代至6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部门曾多次开展调查，并分别对丽水吕步坑和保定、龙泉大窑和金村[45]等窑址做了发掘。《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46]不仅成为该时期的成果总结，而且《关于传世“宋哥窑”烧造地点的初步研究》[47]还曾引发了陶瓷界的一次大讨论。80年代由浙江和国内诸多学术研究单位的考古工作者联合组队的龙泉东区窑址发掘[48]，是瓷窑址考古中的一次壮举，被国内考古学界确认为瓷窑址考古在我国大规模崛起的一大标志！因众多窑址群的发掘而获得了大量堆积层位关系明确的考古资料，从而使龙泉窑的地层编年和考古分期研究具备了丰富而坚实的考古学基础。考古学研究，把龙泉窑制瓷历史明确地划分出自北宋至清代的六个考古期别；提出了“厚胎薄釉刻划花”和“薄胎厚釉形制类官”两大发展系列、三种产品类型的综合性论断；由于在考古学上两大系列于“龙泉四期”平行共生关系的确立，不仅纠正了以往薄釉刻划花“绝迹于南宋”的错误，并且依据对各期遗存内涵特征的再认识，提出元代龙泉青瓷业生产是

继南宋晚期之后，更大更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传统的“南宋顶峰论”和“元代下坡”说得到了重新评价[49]。

1982年至1983年的龙泉源口窑址发掘[50]，堪称龙泉窑考古发掘中一个成功的实例。在近500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获得由10座龙窑遗迹相继形成的百米长烧成区，在其两侧揭示出7处作坊遗存区，把窑址堆积6个层位明确地划分成三个期别，清晰地呈现出元代龙泉青瓷三阶段之演变。其中第二期堆积中多处“素烧炉”遗存结构的清理，不仅在考古学上首次获得了龙泉窑厚釉工艺的充分实证材料，而且连同其相应的“厚胎厚釉”青瓷新品种，向人们传递了新的历史信息：原本属于源流各异的两个制瓷工艺系统，在“龙泉五期”终于交相融溶、结合一体，“厚胎薄釉”—“薄胎厚釉”—“厚胎厚釉”，恰好是一个正反合的历史逻辑过程[51]。

（二）1985年至1986年浙南地区瓷业遗存的考古学区系调查，发端于1984年的江山港流域窑址调查。“青绿釉瓷器”、“淡青釉瓷器”—“灰青釉瓷器”、“青白釉瓷器”、“黑釉瓷器”—“青花瓷器”等不同遗存类别先后相继的时序形式，并非浙江境内同一窑系连续发展的三阶段[52]，而是源流不同的闽浙赣三省瓷业的交互共存。

（三）南宋官窑考古，继50年代杭州市郊乌龟山窑址发掘[53]之后，1985年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获得了突破性的考古成果[54]。揭示出保存较好的龙窑遗迹1座，并完整地清理出作坊中练泥、成形、修坯、上釉、素烧、烧成的系列遗迹现象。青瓷器物的“薄胎薄釉、支钉支烧”和“薄胎厚釉、垫饼垫烧”，表现为早、晚两个阶段的特征性差异；“大宋国浙”刻铭窑具和“己亥岁”干支纪年铭青釉平底钵残件的发现，不仅从考古学上进一步确证“郊坛下官窑”的瓷窑址所在，而且为推断它的创设年代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南宋官窑》发掘报告[55]和许多相关学术论文的发表，把南宋官窑考古研究推向了历史的新阶段。

对于文献记载中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由于“南宋官窑窑址就在乌龟山麓郊坛附近一带，别无所谓修内司窑址的存在”[56]观点的提出，围绕“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与否及它的具体地点问题，形成一时的热门话题。“北宋官窑→内窑（龙泉仿北官）→郊坛下官窑”[57]、“前官窑—官窑—仿官窑”[58]、“官汝窑→（修内司窑）→郊坛下官窑”[59]等，众说纷纭。1996年至1998年杭州市老虎洞窑址的调查发掘，已获重要的阶段性考古成果，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争议问题，可望在不久得到新的回答。

（四）越窑考古，自30年代直至80年代的半个世纪，一直处于窑址地面调查阶段。1990年至199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越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勘测、调查和发掘。在库区近5平方公里范围内，进一步查证了117处窑址。唐宋以来依其州县命名的“越窑”，其中心产地和典型遗存集中在上林湖及其周邻之白洋湖、里杜湖、上岙湖和古银锭湖一带，已发现窑址200余处。它与集中分布在上于曹娥江流域的东汉—南朝以降时

期的青瓷窑址大型群落，构成地域有别、时代不同而又存在发展渊源关系的两个瓷业文化。因此，我们曾提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的考古学新概念[60]，在陶瓷考古界引起不同反响。

至于“秘色瓷”、“贡窑”、“余姚官窑”和上林湖窑业“置官监窑”等一系列问题，素来是越窑研究中的历史难题和核心，自然也是我们考古工作中所着重关注的所在。《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61]和《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从低岭头类型谈起》[62]等文，从瓷窑址考古研究的角度，就上述相关诸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论述。

1993年至1995年的上林湖高岭墩、荷花蕊窑址发掘，是越窑考古中的首次科学发掘活动。分别获得北宋和唐代龙窑遗迹各1座，其中荷花蕊窑址的7个堆积层位，均处在唐代中晚时期，“会昌三年”刻铭匣钵的出土，又一次给越窑制品及其烧制工艺技术的演进变化，刻划出一条重要的时间界线。1998年9月至12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的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发掘，更堪称越窑考古中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在已发掘的堆积中，明确地划分出自晚唐历经五代、北宋并延续到南宋初期的7个层位；在6层下清理出北宋中期的作坊遗址。获得瓷器标本3万余件（片），同时还清理出南宋龙窑1座。这一发现，不仅为唐宋越窑的地层编年和考古分期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考古学依据，而且纠正了文献记载和传统认识中越窑“消亡于北宋”的错误观念。

（五）通过对浙江瓷窑址的专题考古调查，发现浙江青瓷遗存的分布空间和时间形式，并不表现为地理区划或遗存分布区块或是分别冠以州县名称之诸窑的各自独立演进，而往往可以发现同一时期诸地域遗存形态特征的互动和协变现象。从而表明瓷业生产的历史演进是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地域关系的结合，因此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制瓷中心，明确地表现出地域变迁的转换现象。对瓷窑址的考古研究，必须从窑址堆积层位关系和产品类型特征研究的科学基础出发，揭示不同类型之间内在关联的本质关系，这才有可能真正地触摸到古代瓷业“自我”演进的历史轨迹。

（执笔：王明达、任世龙）

注　释

① 陈旭、王志浩、张元动：《中国第一个“金钉子”剖面的建立》，《地层学杂志》1998年1期。

② 蔡正权、魏丰：《浙江临海晚白垩世一翼龙新属种》，《古脊椎动物学报》1994年3期。

③ 韩德芬、张森水：《建德发现的一枚人的犬齿化石及浙江第四纪哺乳动物新资料》，《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1978年4期。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⑤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5期。

⑥ 刘军：《河姆渡文化的再认识》，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均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奉化名山后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科学出版社，1993年；《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⑧ 王明达：《绍兴马鞍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文物出版社；王明达：《绍兴仙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

⑨ 梅福根：《浙江吴兴邱城遗址简介》，《考古》1959年9期；姚仲源、梅福根：《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7期。

⑩ 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⑪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⑫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双桥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⑬ 牟永抗：《嘉兴雀幕桥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科学出版社，1993年；王明达：《嘉善县大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

⑭ 见《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5日第1版。

⑮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⑯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北部地区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1978—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⑱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⑲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管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7期。

⑳ 王明达：《良渚遗址群概述》，《良渚文化》，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7年；《良渚遗址群田野考古概述》，《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余杭市文管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㉑ 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

㉒ 丁品：《余杭良渚庙前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㉓ 刘斌：《海宁荷叶地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

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㉕ 见《中国文物报》1995年8月6日第1版。

㉖ 见《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4日第1版。

㉗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联合考古队：《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4期。

㉘ 见《中国文物报》1997年10月19日第1版。

㉙ 牟永抗：《嘉兴市雀幕桥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王明达：《嘉善县大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王明达：《绍兴县仙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刘斌：《湖州市邱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文物出版社。

㉚ 邱鸿炘：《浙江吴兴苍山古战堡试掘》，《考古》1966年5期。

㉛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便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㉜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县夹山商周土墩石室结构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

㉝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彭东、东安的土墩墓与土墩石室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石狮土墩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市博物馆：《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㊱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97）》，长征出版社，1997年。

㊲ 陈元甫：《浙江石棚遗存的初步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㊳ 参见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㊴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㊷㊸ 陈元甫：《浙江商周时期考古工作二十年》（待刊）。

㊹ 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

㊺ 牟永抗：《丽水青瓷调查发掘记》（未刊）。参见注㊼。

㊻ 朱伯谦等：《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63年1期。

㊼ 周仁、张福泉：《关于传世"宋哥窑"烧造地点的初步研究》，《文物》1964年4期。

㊽ 龙泉东区窑址发掘工作由紧水滩工程考古队统一负责，各发掘单位采取分段作业方式，其中浙江组发掘的窑址有山头窑、大白岸、源口和云和水碓坑等。

㊾ 任世龙：《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㊿ 任世龙：《浙江瓷窑址考古十年论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51 任世龙：《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52 任世龙：《浙南瓷业遗存类型初析》，《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山市博物馆：《江山碗窑窑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53 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54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编著：《南宋官窑》，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⑯ 沙孟海：《关于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沙孟海：《再论南宋官窑窑址和有关资料》，《浙江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

⑰ 阮平尔：《南宋官窑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2期；李刚：《论宋代官窑的形成》，《东南文化》1989年6期。

⑱ 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3期，岳麓书社，1986年。

⑲ 陈元甫：《乌龟山南宋官窑产品类型及分期》，《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⑳ 任世龙：《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1。

㉑ 任世龙：《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文博》1995年6期。

㉒ 沈岳明：《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从低岭头类型谈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五十年来的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

安徽省文物局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1983年至1986年的全省文物大普查，初步查出地面文物17623处，基本摸清了全省文物的数量、种类和分布情况。同时也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对古遗址和古墓葬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①。

一

安徽旧石器时代考古曾一直是个空白。80年代以来，“和县猿人”②、“巢县智人”③，以及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④的发现，揭开了境内古人类和旧石器研究的序幕。至90年代，全省已发现旧石器地点近50处，丰富了旧石器文化研究的内容。尤其是繁昌癞痢山⑤早期灵长类化石和石器的发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98年5月，在繁昌孙村镇癞痢山人字洞发现一批更新世早期灵长类化石，计有上颌骨4块、下颌骨5块、下颌联合部1块、牙齿45枚，初步观察为四五个个体。伴出的脊椎动物化石，计有龟鳖类、鸟类、翼手类、啮齿类、食肉类、长鼻类、奇蹄类、偶蹄类等600多件，50余种。同年秋，于洞的上部堆积中出土40余件人工打制石器、10余件骨器，以及许多小铁矿石块。其中，石、骨器打制疤痕明显。人字洞哺乳动物群化石含古老种类比例较大，并有第三纪残存种，与四川巫山龙骨坡中部动物组合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其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早期，距今200万年以上。繁昌人字洞发现的更新世早期灵长类化石，时代早，个体多，并伴有打制石器共存，材料之丰富，实属罕见，在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对寻找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线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境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主要分布在水阳江、巢湖、沿江及皖河等流域或地区⑥。石器出土地点大多位于河流二、三级阶地，埋藏于网纹红土层中，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中期，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或偏晚。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点多面广，以宣州陈山旧石器地点[7]最为典型。该遗址于1988年至1992年发掘，出土700余件石制品。地层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下蜀黄土，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或中期；下层为网纹红土，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类型有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镐等。其文化面貌独特，代表了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旧石器文化的特点。巢湖[8]和皖河[9]流域出土的石制品，与水阳江流域出土石器比较，总体上特征相近，属于砾石工业类型，应归为中国南方主工业区[10]。

1997年，在宁国毛竹山遗址[11]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露天生活遗迹。遗迹为东西长10米、南北宽6米的半圆形砾石环带，面积60平方米。环带中空，宽2米，由1200余件石制品和砾石构成。初步统计，石制品与砾石的比例为1：20。石制品多为石片、石核，成形的工具较少，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和镐等。有的石片直立于地面，属就地打制形成。根据地层判断，砾石环带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绝对年代大于40万年。迄今为止，类似毛竹山遗址的早期遗迹，在国内尚属罕见，其用途很可能与早期露天营地或石器制造场有关，对研究早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怀宁腊树[12]、潜山彭岭[13]等地发现的小石器，比较特殊。石器含在灰白色粉砂质岩粘土层中，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有石片、石核、石片刮削器等。这类石器组合的性质属石片工业类型，在省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接近北方主工业区[14]的特点。

二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我省有着广泛的分布。1978年以前，仅开展了一些调查和试掘工作，发现萧县花家寺、亳州钓鱼台等一批史前遗址[15]。1979年以来，随着潜山薛家岗遗址[16]的发掘及“薛家岗文化”的命名，集中在江淮地区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重点发掘了潜山天宁寨[17]、宿松黄鳝嘴[18]、望江汪洋庙[19]、霍邱红墩寺[20]、定远侯家寨[21]、肥西古埂[22]、含山凌家滩[23]等一批遗址，初步揭示了江淮地区原始文化的内涵。近10年来，随着苏鲁豫皖先秦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开展，在淮北及江淮地区发掘了一批史前遗址，同时在皖南也做了一些调查和试掘工作。这些工作，为研究安徽地区原始文化的谱系及相互关系奠定了基础。

濉溪石山子遗址[24]，是淮北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该遗址经1988年至1993年发掘，包含四期文化。其中一、二期文化面貌相近，时代较早，比较典型。陶器以夹砂含蚌末的红褐陶为主，胎质疏松厚重。常见纹饰有指窝纹、指甲纹、划纹、弦纹、堆纹、戳印纹。流行半月形扁鋬手、竖装方形单孔或半月形双孔耳、鸟首形耳突等。器形有釜、鼎、罐、钵、盆、盂、器盖、柱形支座等。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凿、石杵、石臼、石磨盘、石磨棒、蚌器、陶拍和鹿角靴形器等。与一期

文化相近的遗存，在宿州小山口和古台寺下层[25]均有发现。但后者不见双耳罐、鸟首形耳突、角质靴形器，时代可能略早。小山口下层^{14}C年代测定，分别为B.C.6077～B.C.5720年（ZK—2622），B.C.5958～B.C.5650年（ZK—2621）[26]，距今约七八千年。石山子一期文化遗存，与山东北辛文化大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但有明显的地方差别，是分布于淮北及周邻地区一种新的原始文化类型。与石山子二期文化相同的遗存，有凤台硖山口[27]（1992年发掘）和怀远双古堆下层[28]（1990年发掘）。此期，除保留一期文化特点外，薄胎红陶略多，流行鸟首形耳突。常见器形有侈口深腹釜、长锥形罐形鼎、钵形扁足鼎、杯、钵、盂及柱形支座等。其文化分布可达沿淮地区。

1993年，在亳州后铁营[29]发掘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清理墓葬30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属二次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玉石器较少。陶器以泥质黄褐陶为主，少数为泥质黑陶。陶器种类较多，有直筒杯、觚形杯、鼓腹杯、罐形鼎、钵形鼎、釜形鼎、卷沿盆、平底碗、圈足碗、扁圆壶、豆、器盖等。后铁营文化遗存与石山孜二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时代略晚，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相当。

淮北地区含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址分布比较普遍，约有40余处，基本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除60年代和80年代发掘的萧县花家寺、亳州付庄[30]等遗址外，近十年来发掘的遗址，有萧县金寨（1991年发掘）[31]、灵璧玉石山[32]（1991年发掘）、宿州小山口中层、古台寺中层、芦城孜下层（1990年发掘）[33]、蒙城尉迟寺下层[34]等，为淮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蒙城尉迟寺遗址，是淮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大汶口晚期聚落遗址。1989年至1995年连续发掘9次，揭露面积近1万平方米。共发现红烧土房址41间、各类墓葬210余座、灰坑160余个，以及兽坑、祭祀坑、广场、围壕等遗迹现象，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遗址分两期，一期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二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以大汶口文化遗存为主。

已发现的房址，围绕遗址中心分别以2间、4间、5间为一排，呈东南—西北走向四面排列。一般面积为10平方米，大者近30平方米。室内平台普遍遗留器物。墓葬集中分布在遗址北部，有成人土坑墓和儿童瓮棺葬，头向均为135°左右。随葬品有多寡之别，多为日用陶器。少数墓设二层台。发现个别拔牙现象。儿童瓮棺葬多为2～3岁的婴幼儿，葬具由2～4件陶器套合组成。在大口尊上发现5种刻划符号，部分涂朱。这些符号，与山东境内大汶口晚期发现的符号相同。围壕环遗址构筑，椭圆形，南北跨度约230米，东西跨度约200米。壕沟宽29.5～31.4米，深4.5米。广场位于遗址南部，总面积约280平方米。尉迟寺遗址是迄今为止大汶口文化中保存最完整的聚落形态，布局之严谨，在我国史前考古中属罕见。它作为一种新的史前聚落模式，学术价值颇高。

尉迟寺一期文化以陶器为主，常见器形有鼎、鬶、罐、壶、杯、大圈足豆等基本组合。文化面貌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般特征，但自身特点也很浓厚，属于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即尉迟寺类型。

龙山阶段的文化遗存，除蒙城尉迟寺二期外，还有宿州小山口上层、古台寺上层、芦城子中层、灵璧玉石山上层以及固镇苇塘[35]（1992年发掘）等。这一阶段，石质工具较少，骨角器和蚌器较多。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常见纹饰有篮纹、方格纹、绳纹等。轮制陶器普遍。主要器形有罐形鼎、大口罐、子母口罐、平底盆、单把杯、双耳壶、高领罐、薄胎鬶、黑陶杯、浅盘豆、甗、平顶器盖等。这一阶段的文化性质自身特点不明显，因地处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碰撞地带，两者因素兼有。其中早期与“王油坊类型”关系密切，至中晚期在京沪线东区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较多，如鬼脸式鼎足等在宿州小山口、芦城子均有出土，南可达淮河南岸的怀远禹墟[36]。

蚌埠双墩遗址，经1986年至1992年连续三次发掘[37]，出土的文化遗物非常丰富，文化内涵很有特色。陶器以夹蚌末粗砂红褐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器大胎厚，均为手制。器表流行半圆形鋬手、鸟首形耳及扁牛鼻式耳等装饰。纹饰多素面，有篦点、刻划、戳刺纹，并有少量的彩绘和红衣陶。主要器形有罐形和钵形釜、甑、小口罐、器座、矮圈足碗、钵、支座等，鼎较少。生产工具，石器有锛、斧、网坠、砺石等，骨角器有锥、针、凿、镞、镖、匕、簪和角质靴形器等，蚌器有锯、刀、匕等。其中，以带鋬钵形釜、罐形釜、矮圈足碗、祖形支座、角质靴形器等最具特征。该遗址分为两期，早期以带鋬钵形釜、牛鼻耳罐、红衣碗为主，鼎少见；晚期以带鋬罐形釜、盂、鸟首形耳罐、彩绘豆盘等为主，出现长锥足鼎。在部分陶器底部刻划符号较多，有鱼、鸟、猪、蚕等动植物或几何形图案20余种，是研究汉字起源的极好材料。遗址内含有大量的蚌壳和动物骨骼，表明当时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很大比重。双墩遗址是沿淮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年[38]。它的发现，为探讨淮河流域早期原始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

1990年，发掘六安王大岗遗址[39]，出土一批陶器及玉石器，陶器主要有高颈折腹釜形鼎、高圈足镂孔豆、广肩罐、盆、觚形杯、鬶、壶形器、瓮、缸、陶球等。该遗址文化面貌比较复杂，含有薛家岗文化因素，但更接近肥西古埂文化遗存[40]。其时代介于古埂早晚期之间，填补了江淮中部原始文化中晚期谱系研究的缺环。

含山凌家滩是江淮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41]。1998年秋再次发掘，发现祭祀遗迹1处、墓葬29座，出土遗物300多件，取得重要收获[42]。祭祀遗迹面积约500平方米。祭祀遗迹上有祭祀坑和少量火烧痕迹，表面有不少石块。墓葬均围绕祭祀遗迹分布，尤其是西、南两面比较密集。墓葬均为土坑墓，有的叠压或打破祭祀遗迹。墓葬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不同，主要为陶器和玉石器。陶器多红陶和灰陶，火候低，

易碎。器形有三足鬶、罐、壶、豆、杯等，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石器有斧、舌形和风形铲、锛、戚、环等，器形规整，磨制精致。玉器较多，有龙、人、鹰、璜、玦、环、管、珠、铲、斧等。尤其是衔尾龙形环、鹰形饰、人形佩、乳丁头石钻等比较罕见，甚为珍贵。凌家滩遗址祭祀遗迹及氏族墓地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氏族社会结构、原始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薛家岗文化的研究，是重点发掘了安庆夫子城（1990 年）[43]和望江黄家堰（1997 年）[44]两处墓葬，其中黄家堰比较典型。这批墓葬为氏族墓地，计发现 56 座，均为土坑墓，少数有二层台，并有叠压打破关系。墓向均为东北。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亦有二次葬。随葬品主要有陶器和玉石器，一般为 3～10 件，大墓达 30 多件。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墓有猪下颚骨，1～6 件不等，多放在墓主的头部和胸部。M7 内有大量的朱砂，其北端有用小石粒堆塑的鸟形图案，比较罕见。出土遗物除陶器外，玉石器较多，有斧、锛、刀、璜、玦、管、镯、钺、珠等，材质有阳起石、透闪石、石英、玛瑙等，通体磨光，制作精良。该墓地可分早晚两期，年代分别相当于薛家岗二、三期文化[45]。这两批墓葬的发现，丰富了薛家岗文化埋葬制度的研究内容。

皖南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现较少，可分四类。繁昌缪墩遗址是皖南地区所知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存[46]。遗址坐落在峨溪河床中，发现过成片的木桩，估计为干栏式建筑遗迹。陶器以夹蚌末和炭的红黑陶为主，也有少量的泥质陶。器类以平底器、圜底器为主，亦有少量的圈足器，未见三足器。器形种类简单，有釜、罐、壶等，釜的形式较多。在泥质陶器上有用戳印、篦点、贝纹等纹样压印的精美图案，其手法与湖南安乡汤家岗大溪文化早期[47]、宿松黄鳝嘴的陶器[48]图案相似，但更显得原始。缪墩文化遗存与河姆渡三、四层文化和马家浜下层文化风格比较接近，其年代大体相当，距今约 7000 年左右。文化性质应归于长江下游地区原始文化系统。

晚于繁昌缪墩的遗存，有以芜湖蒋公山[49]、莲塘[50]，宣州孙埠[51]下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以繁昌洞山[52]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以及以马鞍山七庙田[53]，郎溪欧墩[54]，泾县四古墩、丁家塌、瑶庄[55]等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三类遗存的时代分别相当于北阴阳营期、崧泽和良渚阶段。文化内涵与宁镇地区相近，但相互之间缺环较大，尚需进一步研究。

新安江上游地区的遗址，主要有歙县新洲、桐子山、下冯塘等[56]。陶器多夹砂红陶，褐陶和泥质灰陶次之。器形有鼎、豆、釜、壶、钵、罐、鬶等，其中以广肩垂腹壶和罐最具特征。石器有斧、铲、锛、凿、网坠、半月形刀、柳叶形和三角形镞等。该地区原始文化含有崧泽、良渚文化的因素，时代当与之大体相当，其地方特色也比较明显，文化性质尚待确定。另外，在黄山区蒋家山、龙王井[57]，青阳中平[58]等遗址，还发现了双肩石刀、马鞍形石刀，与江西山背文化相似，说明该区原始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有一定的联系。

三

夏商周时期，境内曾发生过“桀奔南巢”、“征人方”、“淮夷兴邦”和吴越楚争夺江淮等重要历史事件。建国以来，有关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寿县斗鸡台[59]、含山大城墩[60]、屯溪西周墓[61]、南陵千峰山土墩墓[62]、舒城九里墩春秋墓[63]、寿县蔡侯墓[64]，以及肥西、阜南、颍上等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吴越楚蔡青铜器和群舒青铜器等[65]。这些发现，对研究安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原和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近十年来，这一时期的考古又取得了新的收获。

1989年，发掘了枞阳汤家墩遗址[66]。遗址时代为商末至西周。出土遗物主要有石器、铜器和陶器。陶器以黑衣夹砂陶为主，并有少量的印纹硬陶共存。纹饰有绳纹、菱形绳纹、附加堆纹，尤其菱形绳纹最多，颇具地方特色。陶器有锥足鬲、袋足鬲、鼎、甗、斝、罐、簋、碗、豆、盆等。铜器有臿、锛、镰、斧、镞、刀等。在西周文化层中还发现陶范和坩埚残片，陶范上的器形与出土的铜质生产工具雷同，表明当地曾有铸铜作坊。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江淮中部周文化相近，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怀宁跑马墩遗址于1992年发掘[67]，出土陶器、石器、铜器和骨器等一批遗物。陶器为大宗，主要有鼎、鬲、罐、盂、豆、钵、壶、缸、盘、碗、甗、纺轮、陶拍等。遗址分两期，早期以夹砂黑皮陶居多，流行锥足盆形鼎，多甗；晚期以夹砂红陶为主，平足鬲多见，足上饰绳纹。其时代早期为商周之际，晚期为西周早期。该遗址出土的锥足鼎、带流三足盉、附环耳罐、圈足罐等，与潜山薛家岗商周文化一致，具有皖西南土著文化的特点。

六安东城都是一处重要的古城址。该城址现保留南、北、西三面城垣，南北长310米，东西宽220米，城垣高9米。过去关于该城址的年代一直不清。1997年，通过对该城址的解剖[68]，发现城内堆积除含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外，主要为西周时期。其城垣的构筑年代应定为西周。该城年代的确定，为探讨六国的地望提供了线索。

继皖南古铜矿发现之后，近年来在皖南南陵围绕古铜矿、古城址和土墩墓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1989年至1991年，在南陵重点发掘了江木冲、刘家井、西边冲等3处炼铜遗址[69]。发现炼铜炉及残迹15座、残房基4座，出土一批重要的冶铜遗物和生活器皿。在江木冲发现的3座炼铜炉比较重要，尤其是冰铜锭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掌握了采冶硫化铜矿技术，大大提前了中国冶炼硫化铜矿的历史。据江木冲炉4 ^{14}C 标本年代测定，其距今2755±11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2815±115年，属于西周晚期[70]。刘家井、西边冲两遗址的年代略晚，约为春秋时期。

1997年，运用遥感技术对南陵牯牛山遗址进行了探查[71]，并结合考古钻探和局部试

掘，确认其为西周时期的古城址。该城址属水城，外围由古水道即护城河环绕，南北长900米，东西宽750米，总面积70万平方米。城内北半部有五个台地，其间以水道隔开，相互独立，水道均与外围护城河相通。钻探表明，城内台地文化层含灰坑、灰层及红烧土较多，并有夯土遗迹，属于重要生活区。城内南半部地势平坦，文化层较浅，包含物少，应为生产活动区。城内出土遗物有陶器、原始瓷器、铜器和石器，其文化面貌与宁镇地区湖熟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牯牛山古城址的建造方式与江苏淹城类似，带有南方特色。

南陵是皖南土墩墓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1996年至1998年，应用遥感技术对该县境内的土墩墓进行了初步调查[72]。土墩墓主要沿漳河及支流分布，计发现千峰山、吴家大山、九龙凸、戴家汇等土墩墓群23处，确认认现存土墩墓3019座。这项研究工作，对总体上了解南陵境内土墩墓的分布、数量及特点，有着积极的意义。

南陵境内发现的古城址、铜矿遗址和土墩墓群十分重要，三者之间的年代和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内在关系紧密。这一现象决非偶然，它表明西周至春秋时期，南陵曾是皖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研究吴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各地均有发现。1992年，在六安金陂塘发现3座西周晚期墓葬[73]。其中1号墓规模较大，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连墓道总长23.4米，宽8米，深8.5米。出土器物较少，计有黑衣陶罐26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1989年，在六安走马岗发现一座春秋中期墓葬[74]，出土铜器有尊、盘、鬲形盉、勺、盖、柄等，另有原始瓷碗和印纹硬陶碗。其中鬲形盉，与舒城凤凰嘴、怀宁人形河等地出土的相同。1994年3月，桐城长岗出土一批春秋时期的铜器，有尊、鼎、矛、锛等[75]。这些墓葬及铜器的发现，为研究群舒的文化面貌提供了资料。

铜陵是青铜器发现较多的地区。近年来，在境内的金口岭[76]、谢垅[77]、董店[78]、西湖[79]等地点集中出土4批春秋中晚期青铜器，多为墓葬出土。器形主要有鼎、牺鼎、甗、盉、甬钟、矛、戈、剑、镞、车軎等。这些青铜器，除有吴越文化的越式鼎、无首剑等外，还有群舒铜器中常见的牺鼎、弦鼎和带流鬲形盉等，表明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与群舒文化有较多的交流关系。

1995年，青阳龙岗发现2座春秋晚期墓[80]。其中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内置有一椁一棺，并有陪葬棺和边箱各1个。其主棺系用整段圆木剖制而成的独木棺，比较特殊。出土随葬品有铜器、陶器和竹木漆器等，吴越文化特征比较明显。该墓还出土2件铜鼎，与楚式鼎雷同，风格一致，为研究吴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实物例证。

四

战国时期，安徽全境渐为楚属，因而考古发现的各种遗址、遗迹、墓葬和遗物特征

多具楚文化色彩。战国初年，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一度称雄江淮。但为时不久，楚国重返淮河流域，于公元前447年灭蔡，公元前333年灭越，扩地泗上、远至江南，形成了势力强大、版图空前的南方大国。

考古发现的战国遗址与遗迹主要有以寿县寿春城为代表的一批古城址[31]，南陵至铜陵一带发现的战国秦汉古矿冶遗址[32]，还有寿县、贵池等县市发现的楚金币、铜器窖藏[33]，肥西、固镇、巢湖、广德、临泉等20多个市县发现的楚贝币窖藏等[34]。战国墓葬群的发现以寿县、长丰、六安最多，分布最为集中，发掘的材料也最多[35]。其他在宣州[36]、潜山[37]、舒城[38]、淮南、蚌埠、凤阳、枞阳、安庆等地也有一些发现，多属于小型的楚墓、越墓。在重要遗物的发现方面，寿县出土过"大府"铜牛[39]、"鄂君启金节"[40]，凤台出土过"大府"铜量[41]，繁昌出土过楚贝币钱范[42]，巢湖出土过楚砝码[43]，寿县、六安、阜南等地发现过为数多少不一的楚金币[44]，阜阳市所属各县市还出土过不少战国有铭兵器[45]，淮南、合肥、蚌埠等许多地方出土过楚五山镜、四山镜以及其他式样的铜镜等。

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中心东移。公元前278年楚都迁陈；考烈王十年（前253年）又徙钜阳（今安徽太和县境内）；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史记·楚世家》），直到秦灭楚国，寿春一直是楚晚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关于寿春城的地望，古今皆以为在寿县。但其具体位置的确定，却是20世纪80年代才获得的科学结论。80年代初，安徽省文物考古部门采取实地调查和遥感技术应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钻探和发掘验证，确定了楚寿春城位于寿县城关镇东门外和东南方一带。城廓西垣从今城南门向南经马家圩、小岗至范河村南250米处；城廓南垣从范河村南向东经葛小圩、小刘家圩至顾家寨一带；北垣和东垣因水患破坏，北部至柏家台一带。该城南北长约6.2公里，东西宽约4.25公里，总面积26.3平方公里。城外有护城河和天然河道，还有分布密集的陶瓷井，城内有城濠、纵横有序的水道。宫殿建筑区、墓葬区、城区布局呈中轴线对称。在柏家台南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遗址，总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已挖掘的部分表明：该建筑建在一个大型夯土台基上，基址面阔53.3米，进深42米，每间面阔5米多。外围安放大型石柱础，附有一排小石柱础和两排槽形砖，地面铺设素面地砖，还发现大量凤云纹、树纹、云纹、四叶纹瓦当等，推测此为楚宫殿建筑的一部分[46]。

江淮之间的楚墓，据不完全统计已发掘了200多座。其中仅有几座战国早期墓，绝大多数为中晚期墓葬。六安市城西2号墓是一座早期楚墓，长方形竖穴土坑，东端有墓道，重椁重棺。椁室内分棺室、头箱、足箱和左右边箱。主棺置于椁室中间，在右边箱和足箱中各放一具陪葬棺。随葬器物有铜器、陶器、竹木器、玉器和皮甲片等。椁周填青膏泥，棺作悬底，具有典型的楚墓特征[47]。

战国中期的墓葬，在六安市城北窑厂发掘了40多座。均为土坑竖穴，无墓道。椁周多填青膏泥，少数墓积沙积石，葬具有单棺、一椁一棺或一椁重棺。随葬品多见仿铜陶礼器，青铜礼器少见。较典型的墓葬是1991年在城北窑厂发现的一座中期楚墓[⑧]，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墓长6.4米，宽5米，一椁重棺。椁室分成棺室、头箱、足箱、边箱四部分。随葬品分置于各隔箱内：头箱放铜礼器、仿铜陶礼器；边箱放兵器、车马器；足箱放衣物丝织品，计110多件。

在寿县至长丰一带，有3处分布密集的战国晚期墓葬区：第一处是寿县寿西湖至双桥一线，为战国中型墓葬区；第二处是寿县八公山之南、淝水之北，为战国小型墓葬区；第三处是距寿县城30多里的长丰杨庙、朱集一带，为战国大型墓葬区。《越绝书》记载的"寿春城东凫陵亢者，古诸侯王所葬也"，即指此处。30年代曾两次被盗掘的长丰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和1977年至1982年发掘的长丰杨公11座楚墓，均是在此范围内的楚王室贵族墓。

李三孤堆楚王墓是迄今唯一可以确定的楚王之墓，也有学者认为是考烈王后、李园之妹的墓葬[⑨]。此墓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东端有一条22米长的斜坡墓道，坑口下每壁设9级台阶，总深度约15米[⑩]。因被盗掘，椁室布局不清楚，估计有多重棺椁，出土各类文物4000多件。铜器上铸造或镌刻许多铭文，有"铸客"鼎（即楚大鼎）、"王后"鼎、"集脰"鼎、"王后"镐、"太子"鼎等等，为研究墓主身分及铜器铸造年代提供了文字依据。

在长丰杨公发掘的11座楚墓均为中型墓葬[⑪]，其共同特点是地面上原都有高大封土堆，墓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中多为木椁，极少有石椁。坑口以下均以台阶的形式逐层内收，一般有2至5个不等，台阶以下，斜收至底。多数墓在后壁设二层台，墓道分斜坡与阶梯式两种。大木椁内用纵横隔梁分成3至5室，椁室四周普遍填青膏泥。常见两墓并列的现象，此特点与淮阳地区的楚墓相同。随葬品以仿铜陶礼器为主，基本组合为鼎、豆、壶、盒、钫、罐、簠等，铜器多见兵器戈、矛之属，少见铜礼器。值得注意的是杨公楚墓随葬大量的玉器，种类有璧、璜、佩、环、觿、圭、管和条形、三角形饰件，玉质坚硬，雕刻精细。为其他地区的楚墓所罕见。

在寿县、舒城、潜山、六安、淮南、蚌埠、枞阳等地发现的一些小型楚墓，其特点是地面上一般没有封土，均为土坑竖穴，无墓道。上层填土多经夯实，坑内填青膏泥。葬具为一棺一椁，个别为重棺，椁室均小，有的仅能容棺。舒城秦家桥2号墓的结构比较特殊，椁室外设头龛、边龛各一，室与龛之间有直棂窗相通。这些小墓的随葬器物有铜、陶、玉、漆木器等。陶器组合为鼎、豆、壶、盒；铜器为鼎、壶、盘、匜、盉、勺、戈、剑、镜等；漆木器有奁、盒、盘、耳杯、木俑、棂床、梳、篦。这些器物的组合和特征与战国晚期两湖地区及河南地区的楚墓相比较，已经没有明显区别，显示出楚

文化在南方地区已趋于一致[100]。

安徽秦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宿州市境内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遗址和起义时的首攻之城——蕲县城，以及铚城（今濉溪临涣镇）、下城父（今亳州城父乡）等城址。陈胜、吴广起义遗址位于宿州市大泽乡刘集村南约1.5公里处，是一个平面近方形的呈覆斗状的高台，又曾名涉台、涉故台、射鼓台。台高4.5米，台上口长67.6米，宽65.5米。台上原有楼台寺和古钟楼，现均已废毁，仅存明代以来的碑刻几通，台周围还有不少秦汉时的小型坟墓[101]。

蕲县城位于宿州市南22.5公里处。早在秦朝设县之前，蕲地已是楚国的一个重要居民村落和军事据点。蕲县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1600多米，东西宽1400多米，周长近5公里，面积2.2平方公里。城外有天然河道和人工开挖的护城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3～5米不等。城垣下宽20多米，上宽15米。城内遍布砖瓦和陶器残片[102]，省考古部门曾在此做过试掘。

安徽汉代考古涉及到汉代城址、矿冶遗址、水利工程、古墓葬发掘和重要遗物等几部分。其中关于汉城发现，省文物部门的研究人员做过专门的统计分析[103]，专门的考古调查有西汉向县城[104]、芜湖楚王城[105]、东汉阜陵城[106]等。矿冶遗址的清理发掘主要在铜陵市金牛洞遗址上进行[107]，在1号发掘点发现了2条竖井、4条斜井、3条平巷，发掘出铜器凿、镦，铁器斧、锄，木器桶、木柄、木楔、耳杯，竹筐以及石球、陶器等遗物，与湖北铜绿山西汉古矿井出土的同类器完全一致，年代当属西汉时期。

建国以来，安徽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两汉墓葬。发掘结果表明：安徽西汉时期流行土坑木椁墓，也有少量的石椁墓和砖室墓；东汉时期以土坑砖室墓和画像石墓为主。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区域，往往形成了不同的埋葬习俗，常常有多种形制墓葬同存的现象。据统计，经过考古发掘的较重要墓葬有：天长安乐乡西汉墓群[108]、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109]、芜湖市贺家园西汉晚期墓[110]、霍山县迎驾厂西汉墓[111]、天长县三角圩西汉墓群[112]、巢湖市放王岗西汉吕柯墓[113]、宿县褚兰东汉画像石墓[114]、定远谷堆王东汉砖室墓群[115]、亳州市东汉曹操宗族墓群[116]、怀远县唐集东汉石椁墓[117]、歙县西村东汉砖室墓[118]、濉溪岳集东汉画像石墓[119]等等，其他在六安市城东、潜山县彭岭、固镇县濠城乡、萧县城关老虎山、全椒县梅花垄、歙县稠墅、寿县双桥等地也都分别发现了十多座乃至上百座汉墓。几乎在全省各县市都有汉墓的分布。

天长市三角圩西汉墓群计有24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单人葬小墓，随葬器物少；二是木椁葬，有棺椁、头箱、足箱或边箱，随葬品多。共出土遗物730件，其中陶器121件，器形有鼎、盒、壶、罐、杯、钵、豆、勺、灶、仓等；铜器有168件，有鼎、洗、鐎盉、壶、鋬、钫、钟、甗、锅、釜、匜、镈、熏炉、博山炉、灯、三足炉、温酒炉（实为染炉）、舟、耳杯、弩机、短剑、勺、带钩、铜镜、

印章、五铢钱等；铁器 78 件，有釜、削、刀、匕首、剑、矛、戟、铲、斧等 28 件一套的木工工具；漆器 179 件，有奁、案、盒（多种形式）、匜、虎子、洗、钵、盘、印等；玉器 90 件，多为和阗玉料，雕刻精细，有的为战国遗物。有璧牙、环、龙形佩、璜、龙、佩、凤、印以及带钩、玉具剑、九塞玉等；木器 82 件，有弩、弓、杖、剑、枕、罩、束腰器、案形器、梳、篦、印等；角器 8 件以及琉璃蝉、玛瑙珠、磨石等，其年代为西汉早期和中晚期。此墓群中以 1 号墓的形制最大，一椁双棺，出土的器物种类和数量也最为丰富。墓中出土 5 枚木、漆、铜、玉质印章，为“桓平私印”、“桓平之印”、“臣平”、“桓盖之”、“广陵宦谒”，证明墓主桓平为西汉时广陵王国的属官。

巢湖市放王岗汉墓是一座西汉时期的长方形大型土坑木椁墓，西壁正中有一条斜坡墓道。外椁长 7.62 米，宽 5.72 米，内高 2.04 米，椁室上下均用长 5.8 米、宽 0.3～0.5 米、厚 0.27～0.3 米的枋木扣榫横列，四周环立木板。椁室内分前后室，双椁双棺。此墓共计出土漆木器、铜铁器、玉器、角质器 700 余件，其中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墓葬形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棺椁形制的特殊，均为安徽已掘汉墓中所未见。根据墓中内棺出土的一方白玉印章“吕柯之印”，证明墓主名吕柯。从墓中出土 20 枚早期五铢钱判断，此墓的年代为西汉中期或稍晚的昭、宣时期。

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在靠近江苏徐州市的安徽淮北市、宿县一带有较多分布。近十年来，新公布的重要材料主要有两批，一是 50 年代发掘的宿县褚兰画像石墓，另一是 90 年代发掘的濉溪县岳集古城村画像石墓。

褚兰镇位于今宿州市东北近 70 公里处，距徐州市仅 30 公里。镇西南有座九女坟，附近还有一座“建宁四年”的“辟阳胡元壬墓”，均为东汉画像石墓。九女坟由地上石祠、墓垣、地下墓室组成，青石构筑。墓室由双甬道、横前室、双后室、耳室组成，是一座夫妇合葬墓。有 18 块画像石，内容有神仙人物、祥禽瑞兽，以及表现官吏富豪享乐生活的画面。胡元壬墓的年代为公元 171 年，有 14 块画像石，刻有楼台、飞鸟、纺织图、迎宾图、捕鱼图、拜谒、轺车出行等，均用减地浅浮雕技法雕刻，画面生动，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49]。

濉溪县岳集乡古城村北的两座东汉墓同在一个封土之下。1 号墓为砖室墓，墓砖刻有“元和五年”字样（按汉章帝元和年号仅有 3 年，此当为刻者之误）。2 号墓为画像石墓，刻有双龙穿璧、珍禽异兽等。均为浅浮雕，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是安徽省目前发现最早的东汉早期画像石。两墓计出土随葬器物 100 多件，有不少器物形制独特，如龙首陶匜、铁六边器、铁镜、盘龙石灯以及早期青釉瓷器等[50]。

五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安徽省

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物主要以马鞍山市和沿江两岸的东吴与西晋墓葬为代表，计30多座。在合肥市还发现了魏国建筑的“三国新城”遗址，出土了一批铁撞车头、铁逆须钉、铁镞等文物[128]。有人对此城的历史进行了研究[129]。1984年发掘的马鞍山雨山乡朱然墓[130]，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三国志》上唯一有姓名可考的名人墓葬。墓中出土了140多件器物和6000多枚钱币。有精美华丽的彩绘漆人物盘，犀皮黄口羽觞，越窑青瓷卣形壶，模印篆书吉语的“富贵万世”文字砖，中国最早的名片木刺、木谒，以及可以修改钱币铸造史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直百五铢”等。此墓成为三国考古中有明确历史纪年的标尺，对研究东吴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马鞍山市佳山东吴残墓出土了30多件青瓷器和一些钱币。除壶、碗、熏日用品外，还有谷仓、碓、灶、磨、牛车、家禽家畜、鸡鸭笼、羊圈、俑、镇墓兽、穿山甲等遗物[131]。南陵县麻桥4座东吴砖室墓共出土各种器物30多件[132]。釉陶器有罐、钵、壶、灶、仓、钵、炉；青瓷器有盒、盆、钵、碗、碟；铜铁器有铜洗、熨斗、铁戟；漆器有果盒、奁、各种形状盒、尺、织梭、线板、纺锭、墨书木方、漆砂砚（原报告中未记载）、铅锡买地券等。据铭文记载此为赤乌八年（245年）萧氏家族的墓葬。另外，全椒卜集和繁昌新潮等地的东吴砖室墓，所出陶瓷器、铜镜以及墓葬形制、砖室砌法，也与马鞍山的东吴墓基本一致[133]。其他像繁昌三国东吴将军严圭铜洗[134]，当涂东吴凤凰三年锡质买地券等[135]，都是研究东吴历史的珍贵文物。

两晋墓葬在马鞍山、当涂、和县、合肥、凤台、广德等地均有发现，均为单室或双室的砖室墓。从形制上看，西晋墓葬既有较复杂的包括排水沟、墓门、前室、耳室、甬道、后室的不规则结构[136]，也有常见的前、后室长方形结构[137]。出土器物以和县西晋墓为多，材料最完整。有瓷器盂、壶、罐、碗；陶器釜、仓、猪圈、鸭舍、磨盘、镇墓兽、狗、鸭、马、牛、羊、舂具等；铜器炉、钵、镜、发夹以及角质发钗、银戒指、银手镯、料珠若干，铜钱大泉当千、大泉五百等。

值得一提的东晋墓葬是1976年在马鞍山佳山发掘的孟府君墓[138]。在这座平面呈腰鼓状的单室砖墓里，除了出土陶、瓷、铜、铁、石等器物30多件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5方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砖刻墓志，其中三方为今隶，二方为真书。志文为“泰元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晋故平昌郡安丘县始兴相散骑常侍孟府君墓”，这是安徽省发现的最早的墓志，证明此墓主人的入葬时间为公元376年。

南北朝时期的遗物遗迹，比较重要的发现是1965年在亳县咸平寺旧址出土的一批北齐石刻[139]。经清理发现，计有北齐天保、河清、天统、武平等年号的石刻造像碑11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据研究，这批北朝石刻是因受北周灭佛影响，在北齐行将灭国之时被僧侣埋之地下的，后又在宋天圣年间被人发现移藏于塔基之中。

安徽的隋唐时期考古遗迹主要是墓葬、窑址、摩崖石刻以及钱币窖藏等。

在墓葬方面，隋墓在合肥和亳州有所发现。1973 年发掘的合肥西郊的隋开皇六年（586 年）墓，墓志记载死者为"伏波将军"，出土陶瓷器和人物陶俑 44 件[34]。1982 年，合肥市西门干休所工地又发现隋代砖墓一座，出土隋代寿州窑早期产品青瓷瓶、碗、盏、罐 4 件，丰富了研究寿州窑的资料[35]。1973 年在亳县机制砖瓦窑厂出土的两座隋代纪年墓，一为大业三年（607 年），一为开皇二十年（600 年）[36]。前者为单室砖墓，出土石质墓志一盒，陶盒、器座、烛台和青瓷四系罐、黄釉罐、黄釉高足豆、白瓷盅等，还有 17 件陶俑。开皇二十年王干墓为平面不规则形，甬道内有对称耳室，主室的东部和南部又各有一耳室。主室方形，四壁外弧。墓甬道正中置放一合墓志，顶刻"王君之墓"。出土白瓷器 6 件，青瓷器罐、瓶 2 件，黄釉盘、碗 2 件以及铜镜、石座、"五行大布"钱币等。还出土陶俑 43 件。

安徽唐代墓葬在全省许多市县都有发现。多为小型砖室墓。在望江、肥西、青阳、南陵发现的唐墓都未出土墓志，仅有瓷注壶、碗、盏、钵、盂、盒、铜镜、铁剪等生活用品[38]；在淮南、肥东、全椒、合肥、巢湖、无为、和县等地则发现了一批带有墓志的唐墓，有助于了解墓主生平及社会地位。这类墓葬大多为唐代晚期前后的两室砖墓，墓主通常曾当过唐朝中下级官吏或为富冠乡里的豪绅。如 1983 年 11 月清理的巢湖市伍贾圩会昌二年（842 年）伍子胥后人伍钧墓[39]和 1995 年在合肥市发掘的元和元年（806 年）冯遇墓[40]，均为前、后室，前方后长，后室呈船形。伍钧墓虽然在历史上曾被盗掘，但仍出土了长沙窑彩绘执壶 5 件，白瓷碗与青瓷碗 3 件，白釉钵、茶托各 1 件，陶盏、药碾各 1 件，还有风字形砚台及古钱币若干，据墓志记载，墓主伍钧为乡居的富豪。

安徽六朝及其隋唐瓷窑址的发现，是这一时期考古的一大收获。80 年代以前，人们对安徽历代古瓷窑址的生产及其分布认识不清。随着近 20 年来的工作开展，逐渐发现了一大批古窑址，丰富了研究安徽乃至中国陶瓷史的资料。

位于淮南市境内的寿州窑曾是唐代名窑之一。经过考古调查，发现这一窑场横跨淮南、宿县、蚌埠、滁州四地市，范围极其广大。始烧于六朝晚期，到隋代形成凤阳武店临泉寺窑、官塘上刘庄窑和淮南管家咀窑的特大型窑场[41]。到唐代则进一步扩展到宿县地区的萧县白土镇一带，成为后来萧窑的前身。隋代寿州窑烧制的器形有碗、盏、钵、豆、盘、盘口壶、流口壶、罐、瓶、鸡首壶等，以青釉色为主，有小开片现象。

寿州窑发展到唐代，釉色为之一变，形成了以生产黄釉瓷为特色的窑址，产品在淮河两岸畅销，远至江、浙一带。到唐晚期，还兴烧黑釉枕、壶以及民间日用瓷之外的建筑用材等。唐代黄釉瓷器的器形有壶、杯、钵、注子、盘、碗、枕、盏、狮形足、玩具等，胎质较粗，少数较精细，使用了支托、支柱和匣钵技术。

这一时期，宿州市曹村镇境内也曾烧制过瓷器，年代为北朝晚期至隋唐，主要为豆青釉的直壁深腹碗和高足盘、壶盏、罐等[42]。宣州境内的宣州、芜湖、泾县三市县，已

发现的隋唐瓷窑有卫东窑、新河窑、里桥窑、东门渡窑、琴溪窑。在唐代歙州境内已发现竦口窑、岩前窑等[45]。这些以烧制青釉或青灰釉、青黄釉日常用具为主要特征的窑址广泛分布于江南和淮河沿岸，反映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安徽境内的瓷窑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

摩崖石刻是我国文物的一大类型，也是过去金石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目前所知，安徽最早的摩崖石刻是宿松县小孤山上的隋代“总管杨益”题名石刻，有 20 多字[46]。唐代摩崖石刻在潜山县山谷流泉、滁州市琅玡山上和凤阳县禅窟洞玉蟹泉边均有一些，总计十余处。其中琅玡山上的六处摩崖较有价值。这批石刻不仅是安徽最早、最集中的唐刻文字，而且可以校对订正宋代《金石录》的若干误载，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和书法史料[47]。

安徽发现的唐钱窖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钱币史的内容，并有助于解释唐代经常发生的“钱荒”原因。1984 年至 1986 年，先后在东至、来安、宿州市发现了唐代用陶罐藏钱埋于地下的情况。东至县的一罐内全是唐开元钱。来安县水口乡的一罐内装有 118 斤钱币，唐以前的占 1%，为汉半两、五铢、新莽货泉、东汉五铢、隋五铢；唐代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占 99%[48]。宿州市城村乡发现一罐钱币 57.5 公斤，计 1.38 万枚。唐以前的钱币有西汉五铢、新莽货泉、北齐常平五铢、隋五铢等计 29 枚，以唐钱为主[49]。这批钱币由于埋藏较深，基本没有腐蚀，品相极精，反映了唐代铸币工艺具有较高水平，也说明了唐晚期社会动荡不宁，导致了有意识埋钱入土以避时祸的情况发生。

六

五代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上衰落的时期。安徽此期的考古发现表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本省内区域性文物的特点减弱，而具有共性特点的文物增多。同时，原有的一些文物类型减少，在皖中、皖南山区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文物类型。

安徽历代古窑址是安徽古代轻工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全省仅发现寿州窑、萧窑、繁昌窑三处窑址。80 年代和 90 年代，又在泾县、宣州、芜湖、繁昌、霍山、绩溪、庐江、太湖、金寨等地新发现了 20 多处古瓷窑场[50]，分布范围比隋唐时更为扩大，并在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窑系和釉色特点[51]。

安徽宋元明时期窖藏的类型主要有钱币、金银器和陶瓷器。钱币窖藏主要有 1979 年合肥市阜阳路出土南宋金铤、金牌、金钮，计 33 件，重 813 克[52]；1985 年六安县罗管乡出土南宋银铤，计 12 件，重 4330 克[53]；1983 年和县腰埠公社汉至宋钱窖藏，出土

铜钱700余斤[13]；1983年至1984年在滁州市发现南宋铁钱窖藏，重80余斤[14]；1988年蚌埠市青年街元代窖藏出土一批唐至元代钱币；1984年宣城县政法大楼出土清代银元宝，计有50两重元宝9个，10两重元宝4个[15]。其他在肥西、合肥、金寨、颍上、寿县、青阳、阜阳、宁国、巢湖等地，都有宋至明代钱币窖藏发现。

窖藏金、银器的材料主要有两批，一批是1955年在合肥老文庙内发现的制作精细、造型美观的101件元代金银器[16]，系由元"至顺癸酉"年庐州工匠制造的；另一批是1981年在宁国县政府大楼工地出土的50余件银器，有莲花伎乐鎏金高足杯、荷花形八仙贺寿鎏金盘、菊花鎏金高足杯、鎏金银钗、牡丹拱花高足碗、镂空银饰、银勺、银簪等，精美非凡[17]。

窖藏瓷器的出土，是安徽陶瓷考古的一大收获。解放以来，安徽先后发现元、明、清瓷器窖藏多起，总数达上千件。1977年安庆市反修路89号房基出土8件元代瓷器，有元青花盘、匜各1件，米黄釉盘、把杯各1件，淡青釉盏1件，葵花口盏2件等。据研究为景德镇窑的产品[18]。1982年和1984年在歙县城关出土两批元代瓷器，计160多件[19]。其中在县人民银行工地一次出土54件，有元青花高足杯、蓝釉爵杯、青白釉爵杯、高足杯、折腰碗、盘、匜、带座香炉、卵白釉戗金把杯、卵白釉葫芦执壶、卵白釉高足杯等。在县医院公司工地一次出土100多件元代枢府窑卵白釉瓷器，其中的缠枝牡丹纹盘，釉下面模印花纹和"枢"、"府"两字，极其珍贵。

1975年合肥市明清天王寺旧址内出土28件明代瓷器[20]，有青花杯、碗、盘和白瓷碟、白瓷盘等。1997年在寿县正阳关镇一次出土50余件明代青花瓷器，有碗、盘、碟、杯等[21]。1996年在寿县城关镇的一个方形池窖中，一次出土清末瓷器窖藏600多件，有杯、盘、碗、盏、碟、盆、罐、瓶、帽筒等，为安徽窖藏瓷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

宋代墓葬在皖中、皖南都有发现，共发掘了100多座，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合肥包拯家族墓、马绍庭墓，无为虹桥胡士宗墓，全椒西石张之纥墓，繁昌县老坝冲宋墓群和休宁县南宋朱晞颜墓等。

1973年合肥市清理了宋代名臣包拯夫妇及其子孙的墓葬[22]，总计12座，其中四座墓有墓志可考，分别为包拯夫妇迁葬墓、长子包繶夫妇墓、次子包绶夫妇墓、长孙包永年墓等。墓室分石室墓和土坑墓两种，因墓地曾被有意识地破坏和盗掘，仅出土各种器物50余件，墓志6块。墓志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及其子孙衍生的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墓志形体巨大，方形，边长1.25米，厚0.27米，是安徽已发现的40多方宋代墓志中形体最大、文字最多（3200多字）、墓主品级最高（二品官）的一块。

1988年发掘的马绍庭夫妇墓为一长方形竖穴坑木椁墓[23]，墓圹中并列两座木棺，墓

中出土漆木器、瓷器、金银器、铜器和文房用具65件，另有钱币1200余枚。其中“歙州黄山张谷”墨锭、“九华朱觐墨”锭以及文具盒中的五支毛笔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

1983年在无为虹桥清理的宋代石椁双室墓和1986年在全椒西石发掘的砖石结构单室墓，分别代表了江淮之间宋墓的两种类型。虹桥宋墓为石椁双室，南宽北窄，东西并列，中有隔梁，内置棺木，顶封条石。出土陶瓷器10件，银器2件，铜镜2面，还有钱币、棺钉等。墓志记载为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胡士宗夫妇墓[64]。西石宋墓为砖砌墓壁、顶封石条的单室墓，出土青白瓷碟6件，碗5件，熏炉2件，执壶、洗、钵、盒各1件，素胎盒1件，黑釉碗1件，铜镜1件，铜勺1件，铜筷1双，水晶兔及饰件各1件，端砚1方，铜钱若干，墓志1盒[65]。墓志记载墓主张之纥，为左朝奉郎之子，元祐四年卒于吴郡，元祐七年（1092年）迁葬全椒。

1984年繁昌县老坝冲基建工地发现宋墓群，共清理了13座[66]。墓葬均为长方形单室墓，分为砖室墓和土坑墓两种，其中部分墓用残窑具匣钵、垫饼与瓷片封顶。计出土随葬器物210多件，以瓷器、陶器为大宗，还有铜镜、银器、钱币等。时代从北宋早期到中晚期。

1952年皖南休宁县城关镇发现南宋朱晞颜墓，墓葬被人毁坏，文物散失。调查得知为长方形砖室墓，墓顶平铺石板。墓门外置放“宋故修史工部侍郎朱公圹志”石一块，刻文近600字[67]。墓中出土文物以金器为多，其次为银器、玉器，还有一把钢剑、二方歙砚、二面铜镜。墓主朱晞颜官至工部侍郎，卒于庆元六年（1200年），享年66岁。于嘉泰元年与妻洪氏合葬于县南枫林祖茔之右。

除上述朱墓外，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墓志与买地券资料。像枞阳县天圣二年张府君买地券[68]、宿州市熙宁八年苗正伦墓志[69]、合肥市熙宁五年任氏墓志[70]、望江县元符二年吕府君墓碣[71]、南陵元祐六年刘士安墓志[72]、宣州绍兴二十八年章钢妻王氏墓志[73]、铜陵市淳熙九年王溍墓志[74]、黄山区宣和三年沈公夫人包氏墓志[75]等等。此外，还有宿松县、望江县以及太湖、黄山区、歙县、寿县、无为、合肥等地出土的五代至北宋的石质墓志与买地券等，其价值也不容忽视。

宋代的摩崖石刻，在安徽各地有广泛分布。如滁州琅琊山尚存约20多处宋人题刻[76]，潜山县山谷流泉有100多块宋代题刻[77]。在枞阳浮山、贵池齐山、休宁齐云山、青阳刘冲、桐城披雪岩等地，也都有数十处乃至数百处宋人摩崖题刻。此外，目前已发现的安徽历代石窟寺与佛造像遗存不多，这与安徽的历史发展背景以及缺少可供开凿的石质材料有关。巢湖市的王乔洞窟造像和灵壁县磬石山摩崖造像，均为北宋时期雕刻，是安徽省仅有的两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佛像体量、佛寺规模以及存在数量都不是很大[78]。其他在枞阳浮山、东至等地也有个别石刻佛像的孑遗。

安徽现存的宋代地面建筑，除青阳等地保存几座小型的南宋纪年石梁桥以外，主要为佛塔建筑，有近 30 座之多。其中歙县新州石塔、九华山后山净居寺塔是石结构，其他均为砖石、砖木结构。造型以楼阁式为多[15]。

安徽的重要元墓主要有：1956 年安庆市棋盘山古墓，墓主为南宋降元将领范文虎夫妇。范文虎卒于大德五年（1301 年），其妻卒于大德九年。墓为砖室，长 4.5 米，宽 5 米，双穴并列，中有隔墙，各立墓志。出土玉带、玉印、玉圭、铜佛像、木笏、丝绸衣袍、漆纱幞头、金冠、金花、银钏、铁牛、铁猪以及陶瓷器等 500 余件[16]。

1976 年在歙县下天堂村挖出一早年被盗的元代元统二年（1334 年）砖室墓，双穴并列。随葬品虽已不存，但其青石祭堂保存原样。平面凸形，前廊后堂，三层祭台，台下竖石雕刻狮子、花卉，台上中间石刻“武功万六承事太君胡氏生茔”墓碑等[17]。

1981 年六安市嵩寮岩乡发现两座石室墓[18]。墓室为长方形石坑。1 号墓长 2.7 米，宽 1.1 米，深 1 米。2 号墓长 2.75 米，宽 1.06 米，深 1 米。两墓均出有若干遗物，以银器为主，这在其他地区尚不多见。

安徽明代考古，主要围绕着地面文物保护和配合各种基本建设清理发掘墓葬进行。在文物保护方面，安徽从 50 年代开始在皖南地区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明代建筑，比较重要的有全国唯一的明万历年间八柱落地的歙县许国石坊、皖南最大的祠堂徽州区罗东舒祠、安徽文物保护史上最大的搬迁工程徽州区潜口民宅，还有徽州区的老屋阁与绿绕亭以及号称砖、木、石三雕艺术的殿堂——绩溪县明代胡氏宗祠等。

位于凤阳县境内的明中都城与皇陵石刻，始建于明洪武二年，停建于洪武八年。该城面积近 50 平方公里，由内皇城、中禁垣、外中都城三道城组成，城内有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长 6.75 公里。中轴线两侧对称建筑官署府衙，现尚存皇城午门、西华门及西城砖垣。其中午门下长达 400 米的汉白玉基座浮雕和大殿基址上的蟠龙石础等，都是举世罕见、具有元代风格的大型石雕艺术品。

在凤阳中都城西南 7 公里，有明皇陵石刻。皇陵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的雕琢精美的 32 对石像生，是目前所知明代最早、数量最多、刻工最精细的皇家陵园石刻。在紧靠陵墓山南端，有朱元璋亲自撰写的“皇陵碑”，碑文长达 1105 字。此外，肥东县吴复墓石刻、枞阳阮面峰墓石刻、方以智墓、青阳汪珊墓、蚌埠市汤和墓、祁门郑之珍墓等，也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物。

建国以来，安徽各地发现的明代墓葬数量不少，但经科学发掘者不多。初步统计在合肥、安庆、明光、滁州、凤阳、桐城、定远、歙县、休宁、怀远、肥东等地就有 100 多座，但缺少系统的出土材料。出土文物比较丰富又有一定考古价值的明代墓葬，主要有蚌埠汤和墓、凤阳余庄严端王墓、歙县城关永乐墓葬、明光李贞墓、合肥杨氏墓、怀远杨应聘墓等。

汤和墓位于蚌埠市东郊曹山南麓，1959 年调查发现[17]。该墓前有 200 多米长的神道，两侧有石像生多件。发掘证实，此墓为长方形石坑砖石结构多室墓，长 10.4 米，宽 5.8 米，深 6.2 米，有前、后室和一个侧室。该墓过去虽曾被盗，仍出土金、银、玉、陶瓷、铜木器百余件和一方墓志。墓主汤和，卒于明洪武二十八年，封东瓯王，谥襄武王。此墓是安徽目前所知墓主身分最高的明代墓葬。

1990 年凤阳县余庄村发现一座明永乐六年严端玉砖室墓[18]。墓为长方形，在东、西、北三壁各有一个方形小耳室，北耳室置砖质门枋一座。该墓曾被盗掘，现清理出各种遗物 54 件，其中有 18 块一套的玉带板，压铃梵文、横长 16 厘米的金发冠和金耳坠，圆锥金簪，凤凰纹金钗以及银器瓶、罐、壶、碗、盘、杯、炉、盒、盏、烛台等。此外还有 5 件青瓷器和 1 方石质墓志、1 方砖质买地券等。墓主严端玉，卒于永乐元年（1403 年），为明中都留守司副留守韦善之母。

1969 年嘉山县（今明光市）发现明太祖朱元璋的姐姐、姐夫合葬墓[19]。该墓有一个前室和两个后室，全长 7 米，宽 4.2 米。出土文物 34 件，有金器耳挖、金簪、耳坠、压发、金钱等；玉器有玉碑、童人、玉饰、鹦鹉、玉凤等；铜器有锅、铲、勺等；另在墓室门外出土圹志一盒，志盖上刻“有明陇西恭献王墓”8 个字。墓主李贞生于大德七年（1303 年），卒于洪武十一年（1378 年），死时朱元璋亲临祭奠，追封陇西王。

1993 年在歙县黄山仪表厂基建工地发现的一座明代初年土坑木棺中，一次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 6 件金器、玉器。金器有霞披金坠、凤形金钗、永乐款圆锥形金簪等。玉器有尖首形青玉谷点纹圭和一套 15 件的玉佩饰，是明代初年的玉工佳作。从墓中出土金、玉器的形态、规格及有关铭文考察，可知此墓主人当系女性，与明初皇宫内院应有一定关系。

1983 年在合肥市清理的一座明洪武丁卯年（1387 年）杨氏墓，出土了 10 余件家具模型，有木榻、条案、面架、交椅、木扇以及角梳、陶罐、铜盒、木箱、木俑、墓志等。该墓室较大，内长 6.88 米，宽 3.6 米，高 3.9 米。前后两室，中间有木门相通。棺椁均用楠木，保存完整，有助于研究明初的丧葬礼制与家具形态演变[20]。

清代以后，安徽省的田野发掘工作开展不多，仅有零星发现清墓和遗物的报道，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文物保护和文物维修上。关于清末时期太平天国方面的文物，在安庆和宣州市发现过太平军兵器和库码，在望江发现过太平天国的地契，其他还有太平天国会议旧址、壁画、战壕遗迹以及钱币等。

（执笔：杨立新、张宏明）

注　释

① 前 40 年，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均为文物出版

社出版。

② 黄万波等：《安徽和县猿人化石及有关问题的初步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0卷第30期，1982年。

③ 许春华等：《安徽巢县发现的人类枕骨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学学报》第3卷第3期、

④ 房迎三：《安徽文化溯源——安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的十年进展》，《东南文化》1991年2期。

⑤ 郑龙亭等：《繁昌发现更新世早期灵长类动物化石》，《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第1版；郑龙亭等：《繁昌旧石器考古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16日第1版。

⑥⑨ 韩立刚：《安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

⑦ 房迎三：《安徽省宣州市陈山旧石器地点199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第16卷第2期（1997年），《宣州市向阳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⑧ 方笃生、韩立刚：《巢湖市望城岗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

⑩⑭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物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1994年

⑪ 韩立刚、房迎三、黄蕴平：《宁国发现旧石器早期人类露天生活遗迹》，《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0日第1版。

⑫ 韩立刚：《怀宁县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⑬ 韩立刚：《潜山县彭岭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⑮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1期。

⑯㊺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3期。

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1期。

⑱㊽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松黄鳝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1期。

⑲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望江汪洋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1期、

⑳ 杨德标：《霍邱县红墩寺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

㉑㊳ 阚绪杭：《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㉒㊵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7期。

㉓㊶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4期；张敬国：《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

㉔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濉溪石山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3期。第二次发掘材料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待刊。

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安徽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3年12期。

㉖ 吴加安等：《皖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及其性质》，《文物研究》第八辑，1993年，黄山书社。

㉗ 贾张等：《凤台县硖山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㉘ 贾庆元、何长风：《怀远县双古堆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

㉙㉜ 张敬国：《近年来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1994年。

㉚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萧县花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6年2期；韩康信：《亳县富庄新石器时代墓葬人骨的观察》，《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6辑。

㉛ 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萧县金寨村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玉器》，《文物》1989年4期。1991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材料待刊。

㉝ 叶润清：《安徽省宿州市芦城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1994年。

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皖北尉迟寺新石器聚落群考察》，《考古》1996年9期。

㉟ 贾叶、张刘：《固镇县苇塘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㊱ 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原始文化初探》，《文物研究》第四辑，黄山书社，1988年。

㊲ 阚绪杭：《蚌埠双墩遗址的发掘与收获》，《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

㊳ 阚绪杭：《试论淮河流域的侯家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㊴ 高一龙等：《安徽六安王大岗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1年2期。

㊷㊽㊾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材料待刊。

㊸ 杨德标：《安庆市夫子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㊹ 张敬国、贾庆元：《望江黄家堰遗址发掘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10日第1版。

㊻ 徐繁：《繁昌县缪墩遗址调查简报》，《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

㊼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1期。

㊾ 殷涤非：《芜湖蒋公山调查小记》，《考古》1959年9期。

㊿㊼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材料。

(51) 余宜洁：《孙埠遗址》，《宣州文物》第1期，1983年。

(52) 陈衍麟：《繁昌先秦文化浅识》，《宣州文物》第6期，1988年。

(53) 吴志兴等：《马鞍山市郊古文化遗址调查》，《宣州文物》第6期，1988年。

(54) 宋永祥：《安徽郎溪欧墩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3期。

(55) 泾县文化局编：《泾县文物志》，1986年内部印刷。

(56) 歙县文化局编：《歙县文物志》，1989年内部印刷。

(58) 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中平遗址调查》，《考古》1997年11期。

(59)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等：《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60) 张敬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四辑，黄山书社，1988年。

(61) 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4期。

(6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考古》1989年3期。

(63)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2期。

(64) 安徽省文管会、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65) 详见①中有关注释部分。

(66) 杨德标：《枞阳汤家墩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

(67) 杨德标等：《安徽怀宁跑马墩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

(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七）》，《考古》1990年7期。

(71) 《皖南遥感考古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文物报》1998年10月18日第1版。

(72) 刘树人、杨则东、张廷秀：《安徽省南陵县土墩墓及古城遗址遥感调查初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环境遥感考古专辑（二）1998年4期。

(73) 李德文等：《六安县青山乡金陂塘西周晚期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74) 安徽省博物馆、六安县文管所：《安徽六安县发现一座春秋时期墓葬》，《考古》1993年7期。

⑮⑯ 安徽省文物志编辑室：《安徽省志·文物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

⑯ 张国茂：《安徽铜陵市金口岭春秋墓》，《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

⑰ 张国茂：《安徽铜陵谢垅春秋铜器窖藏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0年4期。

⑲ 铜陵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材料待刊。

⑳ 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8年2期。

㉑㉕ 详刘和惠著：《楚文化的东渐》，张宏明撰附录—"寿县及其邻县地面战国城址调查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㉒ 汪景辉、杨立新：《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6期；杨立新：《安徽沿江地区的古代铜矿》，《文物研究》第8辑，1993年，黄山书社。

㉓ 涂书田：《安徽省寿县出土一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10期；刘和惠：《郢爰与战国黄金通货》，《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

㉔ 汪本初：《建国以来安徽出土古钱币述略》，《钱币文论特辑》（第二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

㉖ 丁邦钧等：《宣城县上坑木椁墓》，《安徽省考古学会学刊》第7辑。

㉗ 潜山县文物管理所：《潜山县彭法山清理一座战国墓》，《文物研究》第二辑，黄山书社，1986年。

㉘ 舒城县文物管理所：《舒城县秦家桥战国楚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

㉙ 殷涤非：《安徽寿县新发现的铜牛》，《文物》1959年4期。

㉚ 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4期

㉛ 安徽省阜阳地区展览馆文博组：《安徽凤台发现楚国"郢大府"铜量》，《文物》1978年5期。

㉜ 陈衍麟：《繁昌的楚铜贝范及其铸币工艺》，《中国钱币》1996年3期。

㉝ 张宏明：《谈谈巢湖发现的楚国砝码》，《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

㉞ 阜阳地区展览馆：《安徽阜阳地区出土的楚国金币》，《考古》1973年3期；吴兴汉：《楚金币研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

㉟ 韩自强等：《安徽阜阳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铭文兵器》，《东南文化》1991年2期。

㊱ 丁邦钧：《寿春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1年2期。

㊲⑩⑩ 李德文：《江淮地区楚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

㊳ 褚金华：《安徽省六安城北楚墓》，《文物》1993年1期。

㊴ 刘和惠：《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大墓墓主的再认识》，《东南文化》1991年2期。

⑩⑩ 李德文：《朱家集楚王墓的形制与棺椁制度》，《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

⑩⑪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2期。

⑩⑫ 张宏明：《陈胜、吴广起义遗址》，《安徽著名文物古迹》，黄山书社，1997年。

⑩⑬ 张宏明：《蕲县古城遗址》，《安徽著名文物古迹》，黄山书社，1997年。

⑩⑭ 张宏明、张南：《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6期。

⑩⑮ 张宏明：《西汉向县城址地望新证》，《文物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

⑩⑯ 谢小成：《芜湖县"楚王城"遗址调查简报》，《文物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1994年。

⑩⑰ 李文清、李政新：《东汉阜陵城位置辨正》，《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⑩⑱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金牛洞铜矿古采矿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10期。

⑪⑩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天长县发现汉代木椁墓和一批重要历史文物》，《安徽日报》1976年2月26日。

⑪⑪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112)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芜湖市贺家园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3期。

(1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安徽省的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1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9期。

(115) 李德文：《巢湖放王岗西汉墓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15日第1版。

(116) 王步毅：《安徽省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4期。

(11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定远谷堆王九座汉墓的发掘》，《考古》1985年5期。

(118) 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8期；亳州市博物馆：《安徽亳州市发现一座曹操宗族墓》，《考古》1988年1期。

(119) 杨鸠霞、嵇培君：《怀远县唐集汉墓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二辑，黄山书社，1986年。

(120) 杨鸠霞：《安徽歙县西村东汉墓》，《考古》1995年11期。

(121)(122) 宫希成：《濉溪古城发掘东汉画像石墓》，《中国文物报》1993年6月13日第1版。

(123) 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4期。

(124) 合肥市文物管理组：《合肥出土三国城防器械》，《文物》1982年9期。

(125) 房迎三：《合肥三国新城考》，《文物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1988年。

(12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

(12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5期。

(128)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11期。

(129) 朱振文：《安徽全椒县卜集东吴砖室墓》，《考古》1997年5期；徐繁：《繁昌新潮东吴墓》，《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130) 陈衍麟：《安徽繁昌发现三国吴将严丰铜洗》，《考古》1994年2期。

(131) 王俊：《当涂县发现东吴晚期地券》，《文物》1987年4期。

(132)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安徽和县西晋纪年墓》，《考古》1984年9期。

(133) 胡欣民：《凤台县南金三座西晋墓》，《文物研究》总第2期，1986年；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等：《安徽马鞍山桃冲村三座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11期。

(134)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马鞍山东晋墓清理》，《考古》1980年6期。

(135) 韩自强：《安徽亳县咸平寺发现北齐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9期。

(136) 安徽省展览博物馆：《合肥西郊隋墓》，《文物》1976年2期。

(137) 王业友：《合肥出土寿州窑早期产品》，《文物》1984年9期。

(138) 亳县博物馆：《安徽亳县隋墓》，《考古》1977年1期。

(139) 青阳县文管所：《青阳县三增唐墓》，《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汪景辉、杨立新等：《安徽南陵清理一座唐墓》，《考古》1994年4期；席为群：《肥西县刘河唐墓出土的几件文物》，《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宋康年：《望江县城郊唐墓清理》，《文物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1994年。

(140) 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安徽巢湖市唐代砖室墓》，《考古》1988年6期。

(141) 程红：《我市又发现一唐代墓葬》，《合肥晚报》1995年12月12日第2版。

(142) 胡欣民：《寿州窑隋代青瓷的认识》，《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胡悦谦：《谈寿州瓷窑》，《考古》1988年8期。

(143) 王化民：《曹村窑址》，《安徽省志·文物志》，方志出版社，1993年。

(14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歙县竦口窑调查》，《考古》1988年12期；张宏明、程思宝：《宣州发现大面积古窑址》，《新安晚报》1995年12月19日第1版。

(145) 张宏明：《小孤山石刻》，《安徽著名文物古迹》，黄山书社，1997年。

(146) 张宏明：《滁州琅琊山唐代摩崖题刻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2期。

(147) 章书范：《来安县水口乡出土的唐代钱币》，《安徽金融研究钱币增刊》1988年1期。

(148) 汪本初：《从宿县出土的唐代窖藏钱币来探讨“会昌开元”钱的一些问题》，《安徽金融研究钱币增刊》1988年2期。

(149) 李广宁：《琴溪古陶瓷窑址调查初记》，《宣州文物》1984年年刊；李广宁：《安徽古代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初探》，中国陶瓷学会1987年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陈衍麟：《安徽繁昌柯家村窑址调查报告》，《东南文化》1991年2期；谢小成：《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东南文化》1991年2期；王业友：《调查肖窑取得的新收获》，《东南文化》1990年4期。

(150) 张宏明：《安徽古代陶瓷生产史略》，《安徽经济文化史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151)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合肥市出土宋代金铤和金牌》，《考古》1981年6期。

(152) 邵建白：《安徽六安出土南宋银铤》，《文物》1986年10期。

(153) 张宏明：《安徽省和县发现古代窖藏铜钱》，《考古》1984年12期。

(154) 章书范：《滁县出土南宋铁钱及相关问题》，《中国钱币》1988年2期。

(155) 徐之田、凤运新：《宣城出土的银锭》，《宣州文物》1984年刊

(156) 吴兴汉：《介绍安徽合肥发现的元代金银器皿》，《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157) 刘楨楠：《窖藏宋代鎏金银器》，《宣州文物》1984年刊。

(158) 胡悦谦：《安庆市出土的几件瓷器》，《文物》1986年6期。

(159) 叶涵鎏等：《歙县出土两批窖藏元瓷珍品》，《文物》1988年5期。

(160)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合肥市发现明代瓷窖藏和唐代邢窑瓷》，《文物》1978年8期。

(161) 张宏明：《寿县出土一批明代瓷器》，《新安晚报》1997年7月7日第1版。

(162) 安徽省博物馆：《合肥东郊大兴集北宋包拯家族墓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3)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年3期。

(164) 张宏明：《安徽省无为县发现宋代石室墓》，《文物》1987年8期；张宏明：《安徽无为县宋代胡士宗墓志考释》，《东南文化》1988年3、4期。

(165) 滁县地区行署文化局等：《安徽全椒西石北宋墓》，《文物》1988年11期。

(166) 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县老坝冲宋墓的发掘》，《考古》1995年10期。

(167) 卢茂村、王少清：《休宁朱晞颜墓志出土遗物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安徽文博》总第4期，1984年。

(168) 王乐群：《枞阳发现北宋时期地券》，《文物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1994年。

(169) 张宏明、王化民：《宿县出土的宋代苗正伦墓志初释》，《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170) 程如峰：《合肥北宋任氏墓志》，《安徽史学》1984年5期。

(171) 张宏明、宋康年：《望江县收藏的一方北宋墓碣》，《文物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

(172) 刘平生：《蔡卞撰刘十安墓志铭》，《东南文化》1990年4期。

(173) 徐之田：《一方言简情深的墓志》，《中国文物报》1990年3月15日第3版。

(174) 叶波：《宋抗金将领王洽墓志考》，《文物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1986年。

(175) 程先通：《安徽黄山发现宋墓》，《考古》1997年3期。

(176) 滁州市文化局：《琅琊山石刻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177) 张宏明：《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安徽著名文物古迹》，黄山书社，1997年。

(178) 张宏明：《王乔洞石窟造像》，《安徽著名文物古迹》，黄山书社，1997年。

(179) 李虹：《浅谈安徽古塔》，《东南文化》1991年2期。

(180) 白冠西：《安庆棋盘山发现的元墓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

(181) 邵国榔：《歙县天堂元墓石刻画像》，《中国文物报》1987年3月6日第3版。

(182) 邵建白：《安徽六安县花石咀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10期。

(183) 蚌埠市博物馆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2期。

(18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余庄村明墓》，《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

(185) 吴兴汉：《嘉山县明代李贞夫妇墓及有关问题的推论》，《文物研究》第四辑，黄山书社，1988年。

(186) 李德文：《合肥明初何杨氏墓》，《文物研究》第四辑，黄山书社，1988年。

五十年来福建省文物考古的主要收获

福建省博物馆

福建省的文物考古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起步发展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关怀领导下，两代文物考古工作者辛勤努力，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两次（50年代及80年代）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从地面至地下，较全面、系统地摸清了全省的文物概况。同时，在配合基本建设中，田野考古和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

福建省旧石器时代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是80年代末取得的最重要成果。1987年东山县博物馆征集的来自海底的一小块轻度石化的人类右肱骨残片，经鉴定为更新世晚期或全新世早期①。1988年5月，福建省考古队同三明市文物普查队在清流县沙芜乡洞口村的狐狸洞内发现一枚距今1万年以前的晚期智人下臼齿化石②。1989年11月，福建省考古队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三明市博物馆等联合对这一地点进行正式发掘，又在同一胶结层中发现剑齿象、巨貘、熊、豪猪、鹿等晚更新世晚期动物化石和5枚人类牙齿化石③。这是福建省首次发现和有层位记录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1987年福建省考古队首先在同安县新墟发现打制小石器，1989年漳州市文物工作者又在北郊发现打制小石器。1990年6月，福建省考古队协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漳州市文化局等发掘了漳州北郊莲花池山遗址及竹林山遗址。遗址堆积分上、下两层。下层发现的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一批打制石器，年代推测为4～8万年前。上层以细小石器为特征，推测为旧石器时代末期或中石器时代。漳州地区所发现的包含细小打制石器的地点已达118处，采集标本达1500件以上④。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福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也为探索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以及远古时期闽台历史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

福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起步较早，但在80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闽江下游地区，并确立了福建境内第一个考古学文化——昙石山文化。之后，1978年，又在闽侯县境内发掘了白沙溪头遗址[5]，1981年至1983年发掘了榕岸庄边山遗址[6]，1996年对昙石山遗址又进行了第八次发掘[7]，这三个遗址均属“贝丘”遗存，而这三次发掘亦是福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规模最大的，所获资料亦最丰富。其中溪头遗址下层、庄边山遗址下层与昙石山遗址中、下层同属于昙石山文化。这些新资料的获得，不仅大大地丰富了“昙石山文化”的内容，而且对该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分布地域及其文化性质等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使“昙石山文化”的考古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8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工作逐步向全省各地铺开。1985年对平潭壳坵头贝丘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8]。所获考古资料表明，其文化内涵与金门富国墩遗址十分相似[9]，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新的文化类型，其某些文化因素显然同昙石山文化有承继关系，年代上又早于昙石山文化，因而被称为“壳坵头类型”、“壳坵头文化”，亦称“富国墩文化”。这是目前所知福建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在年代上继昙石山文化之后的最重要遗存——霞浦黄瓜山遗址，是1989年至1990年正式发掘的[10]。该遗存文化内涵中以橙黄陶和彩陶最富特征，曾见于庄边山遗址上层、昙石山遗址上层及福清东张遗址中层，有广泛的分布地域。在台湾凤鼻头遗存中也有类似的发现。过去曾将此类遗存笼统地归并于昙石山文化之中，现在看来需要另立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自80年代以来，已有学者将其称为“庄边山上层类型”、“黄瓜山类型”或“东张文化”。福建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已初见轮廓。

在闽北地区，1989年和1990年两次在浦城县发掘了牛鼻山遗址[11]。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9座，出土了一批很有特色的陶器群。其特点同福建闽江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壳坵头、昙石山诸文化有明显差别，而与毗邻的江西、浙江等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而成为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性遗存单位，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1994年至1995年，又相继在闽北武夷山市和邵武市两地发掘了梅溪岗遗址和斗米山遗址[12]，其中在梅溪岗遗址下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了三组略呈圆形的单体建筑遗迹；斗米山遗址下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亦发现了三组建筑遗迹和七座同时期墓葬，出土了一大批石器、玉器和陶器。玉器主要是玉玦、玉锥、玉璜等，为福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地点。陶器中有鼎、壶、罐、豆、杯、盘等，其中某些器物形态特征同于牛鼻山新石器时代墓葬。从而为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又增添了一批崭新的内容。

在邵武斗米山遗址的上层还发现15座墓葬，出土了一批器表以施黑衣为特征的陶器群，许多器物的形态特征是以往所未曾认识的，仅个别曾见于庄边山遗址的上层、黄瓜山遗址，因而推测其年代应与之相当。此外，1988年明溪县南山洞穴遗址的发掘，1989年南平市樟湖坂宝峰山遗址的发掘[13]，以及1990年至1992年武夷山市葫芦山遗址的发掘，其下层文化内涵也有与之相似的文化因素。这些新近获得的科学考古发掘资料，对于重新认识闽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及其建立该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都具有重要价值。

近半个世纪以来，福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及其研究，已经初步可以划分出闽西北地区和闽东南沿海地区两大区块，它们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大体反映了两条文化发展序列。闽西北地区由于地缘上联结内陆，因而其文化内涵中显示出较多的同内陆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似的因素。而东部沿海地区面向海洋，又受到闽中大山带所造成的地域分界的影响，其文化内涵则显示出浓厚的地域特色。

三

福建境内的青铜器发现不多，且年代一般较晚，因而福建青铜时代考古的时间概念同内陆地区相比更晚得多，其上限年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在全省文物普查中，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点达2000多处，采集实物标本数以万件。表明福建境内该时期的人类居所已相当密集，人类活动相当频繁。

在闽江下游地区，继70年代在闽侯黄土仑遗址发现19座墓葬，出土了一批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陶器群[14]，并将之称为“黄土仑类型”或“黄土仑文化”之后，1996年在昙石山遗址进行第八次发掘中，在遗址北部地段的该时期层位中又发现一条壕沟遗迹和两个带有祭祀意义的坑，其中一个坑埋放一具完整的狗骨架；另一坑埋放原始瓷器（器盘上还摆放有禽类动物骨骼）。这次发掘不仅在层位上证明了黄土仑遗存晚于以橙黄陶为特征的庄边山上层类型文化遗存，同时对于探讨黄土仑类型文化晚期的社会性质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闽北地区，80年代初于光泽县崇仁一带清理了一批墓葬[15]，其中以白主段的几座墓葬为代表，出土了一大批类似于黄土仑墓葬的陶器群，亦将其称之为“白主段类型”。之后，1995年在光泽池湖的发掘中，又清理了10座墓葬[16]，墓内随葬器物以印纹硬陶为主，也发现一些原始瓷器及石锛、石戈等小型工具。其中有两座大墓堪称迄今福建发现的该时期墓葬之最。墓葬结构均为竖穴土坑，平面呈长方形，其中一座前方带有长条形墓道。墓室分别长7～8米，宽3.5～4米。墓底四周均发现有排列有序的柱洞和柱洞之间相连的沟槽，表明墓壁四周当为木质架构。随葬器物成堆成组地摆放在墓室四周，

从器物盖身脱离，摆放零乱等现场清理状况分析，当时墓底亦有木构平台。其建造方法、构筑形式均属独特，为本省首见。其中一墓随葬器物达93件；另一墓为80件。除部分石锛、石戈、石镞、石矛外，主要是陶质生活用器，还有个别原始瓷品。品类齐全，形态繁杂，其中许多器物形态为本省前所未见，如原始瓷尊、云雷纹大罐、三足盆、高柄杯、双耳簋、支钉状盖罐等，造型美观、工艺精湛。这两座古墓的主人生前可能为部落酋长一类人物。这次发掘资料，是我省商周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福建地区3000年前"七闽"的历史，以及同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等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闽南地区，从南安大盈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中[17]，可以看出在西周时期已具相当成熟的发展水平。但这一地区的正式发掘资料相对缺乏，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分别在诏安、平和、南靖等地清理了多座墓葬，出土物中以无栏石戈和拍印竖篮纹的硬陶器、原始瓷器为特色[18]，可以看出同闽江下游区域的同时期文化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与粤东地区的"浮滨类型"十分相似。此类遗存在闽南，尤其在漳州地区的分布相当广泛。1988年发掘的云霄墓林山遗址[19]也反映了闽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地域特色。

福建地区近半个世纪所积累的青铜时代考古资料，使我们对本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闽北、闽南以至闽江下游等区域的青铜文化各具特色又相互联系，可以分为若干个地方类型。所获得的新资料，在不断填补各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序列缺环的同时，也为谱写福建境内先秦古地方文化搭起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四

战国秦汉时代的福建，是闽越人活动的地区。半个世纪以来的文物考古，为探寻闽越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50年代在浦城、邵武、崇安（今武夷山市）、闽侯、福州等地发现了多处汉代遗址或墓葬[20]。80年代又在建阳、政和、沙县、宁化、上杭、连城、武平、长泰、龙海及福州屏山、新店等地发现了战国晚期至汉代的遗迹、遗物[21]。1960年和1982年先后在闽侯庄边山遗址清理9座排列整齐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以鼎、豆、盒、壶组合为主的具有浓郁楚汉特色的陶器和瓿、瓮、匏壶等越式陶器[22]。但是，最具福建地方特点的汉代遗存是武夷山市城村的古粤城遗址。

该城址依山傍水营建，平面近似长方形，周长约2900米（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面积48万平方米。夯土城墙残高4～8米，墙面宽约4～8米。城墙外大部地段有宽6～10米、深5米的护城濠。这是我国南方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一座汉代城址，1959年曾进行过小规模试掘；1980年8月至1984年1月，对城址内外进行了系统

的勘探和重点发掘；近年又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了遥感探测。发现在城内外约 500 万平方米范围内都有汉代遗迹分布，并探明城内外大小建筑基址、道路、制陶作坊等汉代遗迹 30 多处及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基本摸清了城址形制和地层堆积情况。

1959 年在城内马道岗揭露 864 平方米，清理出一座东西长 47 米，南北宽 10 米（面阔 20 间，进深 4 间）的长方形房基。1981 年至 1986 年在城内高胡南坪揭露 16400 平方米，在地表下 20 厘米处清理出宫殿建筑基址一处[23]。该建筑群建在高台基上，由围墙、东西两处南大门、东西门房、庭院、正殿、东西厢房、西廊房、西侧殿、东西天井等组成，总面积达 8470 平方米，形成以庭院、正殿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大型“四合院”式布局。其中正殿东西长 37.4 米（面阔 7 间），南北宽 24.7 米（进深 6 间），单体面积约 960 平方米。1984 年 10 月至 1988 年 9 月先后三次发掘东墙外北岗建筑基址，面积 2200 平方米，清理出一处面积达 1500 平方米，由南北三进院落组成的四面围墙的封闭式建筑群基址[24]。此外，1981 年以来，在城外门前园居址、东城墙南段、东城门和城内下寺岗建筑基址都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和解剖。从 1959 年至今，在城内外，共揭露 22000 平方米，清理出重要建筑基址五处，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汉代遗物。

这个时期的考古发现为解决诸多悬而未决的福建古史，如闽越国史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武夷山市古粤城址的布局，建筑基址的形制特点，出土的大量“万岁”、“乐未央”、“常乐万岁”、“常乐”等文字瓦当，锦纹铺地砖，大型壁纹空心砖，大型陶水管以及“中门信印”铜印，鎏金青铜伞盖构件，铜钟，铜镜，篆文封泥等遗物遗迹，不少学者判断此城址决非一般的县城或军事城堡，而是闽越国时期的一座王城。福州屏山一带也出土了与此类似的瓦当等建筑材料。结合文献记载，一般认为闽越国都“东冶”应在福州[25]。

五

我省两晋至南朝时期的考古工作，以墓葬发掘为主，至今已发掘的这时期墓葬总数约 170 余座，其中纪年墓 50 余座，年代最早的是霞浦县松城镇眉头山吴“天纪元年”（即西晋咸宁三年，277 年）墓[26]。此外，在霞浦松城、故县等地清理的 15 座西晋至南朝墓中，有西晋“元康九年”（299 年）墓、东晋“永和二年”（346 年）墓以及东晋“咸康八年”（342 年）墓砖[27]。在闽北将乐县清理的五座砖室墓中，有东晋“太和四年”（369 年）墓和“太元廿一年”（396 年）墓，另外还采集到纪年为“宁康”、“元嘉”等墓砖[28]。在福州谢坑村铁头山清理的二座南朝墓，墓室平面呈刀形，有棺床、供台等，出土的青瓷器质地精良，釉色莹润，为近年来出土六朝青瓷中之精品。器形有鸡首壶、盘口壶、唾壶、碗、盘、罐、杯等。另有薄胎铜钵一件，底部虽残，但腹部仍灿亮如新[29]。

六

隋、唐、五代时期的遗址考古，仅在福州市北大路发掘了一处五代夹道遗迹。遗迹长约60米，上口宽10.8米，底宽10米，深2.5米；两壁上部为石块垒砌，高约1.2米，厚0.5米，下部为3厘米厚的木板，并在木板里侧埋栽木桩加固，一部分木板上烙有“闽”、“官”字样。夹道应是五代闽国的一处官修或内廷使用的运河遗迹[⑩]。

这时期的瓷窑址，除以往发掘过的建阳将口窑、福州怀安窑、晋江磁灶的双溪口山窑址（其堆积的上层为唐代、下层为南朝）之外，1992年省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了建窑的庵尾山窑址，清理了二座唐、五代的窑炉遗迹（Y5和Y10）。二座窑炉均为斜坡式长条形龙窑，Y5残长74.6米，窑壁砖砌，以烧各式青瓷罐为主；Y10现存三重窑壁，说明曾经三次修筑，均用土坯砖块加泥垒筑，窑壁上尚保存修筑时的竹木痕迹。窑室最长的尚有90余米，为我省已发现这时期的窑炉之最。Y10的产品有青釉花口碗、碟、盘以及青釉、酱釉的盘口壶、执壶、小罐等。推断Y5与Y10的年代为晚唐至五代[⑪]。它们的发现，证实唐代建州水吉一带已有窑业生产。除此之外，经调查还在建瓯的东游、邵武上屯、浦城水北、政和澄源、宁化淮土、厦门杏林等地发现唐、五代时期的青瓷窑址，其分布以闽北地区较集中，但已发展到南部沿海的厦门地区。

七

经历了晚唐、五代较为安定的发展，福建在宋元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制茶，作为手工业的重要行业之一，在福建有着悠久的历史。五代时，地处今建瓯市东峰镇裴桥村的北苑，就已是贡茶的主要产地，北宋仍在此设官焙，生产供御的龙凤团茶等。1995年对北苑遗址进行了发掘，两期发掘面积共计646平方米，揭露了一部分宋代官署建筑和制茶作坊遗迹，与附近的摩崖石刻文字及文献得以相互印证[⑫]。

继1986年泉州清净寺奉天坛遗址发掘之后，为配合“南少林”问题的研究，我省又先后发掘了莆田县的林泉院、福清市的少林院等寺庙遗址。林泉院遗址位于莆田县西天尾镇林山村，1990年至1992年二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954平方米，清理出早晚四期建筑基址，有房基、墙基、磉墩、道路、水井、灶、灰坑等，并出土一批遗物，包括建筑构件、生活用品等。已可确定该遗址即林泉院，年代自唐至明末清初，并推测与“南少林”有关[⑬]。

少林院遗址位于福清市东张镇少林村，1995年至1996年二次发掘，发掘面积近

6000 平方米，揭露的建筑遗迹可分为早晚五期，包括殿堂、房屋、天井、台阶、炉灶、水沟、道路、墓葬、护坡、台基以及厕所等，出土遗物有日常生活用品、建筑材料及构件等，年代自五代至清代。因揭露面积较大，主体建筑的布局、结构较完整清晰。根据出土遗物上的墨书文字（有"少林"等字样）可确定其即是宋代文献所记的"少林院"，从而证实福建古代确有少林寺[34]。

自邵武发现宋代银器窖藏之后，在闽北地区又有二处重要的发现。一是在建宁县黄埠乡发现一处钱币窖藏，出土钱币 70 余万枚，总重量近 5 吨，钱币年号达 78 个，分属西汉、新（王莽）、东汉、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各朝代，以宋钱居多，其中一枚折三背"九"字的"咸淳元宝"为国内首见的实物。推测此处窖藏为南宋军饷，是在转移途中临时埋藏的[35]。另一处是泰宁城郊的银器窖藏，共计发现各类银器 37 件，主要有杯、盘、炉、壶、贯耳壶及头饰等，一部分为鎏金银器，高浮雕装饰，工艺精湛。其中六棱盘、椭圆盘等较少见[36]。

已发掘的这时期墓葬，较重要的如福州北郊茶园村的南宋端平二年（1235 年）墓，经初步整理，随葬遗物中较重要的除犀皮雕漆器、包金木梳、丝裹木质鱼袋等外，还有多达 400 余件纺织品，其中多数为丝绸类，有罗、绢、纱、绉、绸、花绫，装饰技法有绣、提花、印花以及贴金、银箔等，图案以牡丹、缠枝花、菊花、团花为多。织物种类有各式衣、裤、裙以及鞋、帽。一部分织物保存较好，鲜亮如新[37]。该墓是继南宋黄昇墓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是研究宋代纺织、丝绸史的珍贵资料。1990 年清理的福州西郊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是一座竖穴式平顶三圹砖室墓，出土有咸淳八年（1272 年）墓志和银器 32 件及铜器、铁器、漆器、木器、骨器、笔、墨、砚、寿山石俑等物品，其中一部分银器为鎏金器，有执壶、镜盒、发冠、坠饰、佩饰、碗、杯等，个别银器上还有"张念七郎"、"低银刘打"等刻铭[38]。福州北门胭脂山以往曾发掘过宋墓。1997 年因基建施工，在其近旁又发现一座长方形石板双室墓，出土有金、玉、陶、瓷等珍贵文物，特别是总数多达 80 余件的寿山石俑，内容包括人物、佛像、生肖、动物等，雕刻精细、形象生动，无论数量、质量都超过以往所发现的同类器物[39]。此外，还在邵武市四都乡清理了南宋宗室司农卿赵善恭（1148～1217 年）墓。墓葬破坏严重，仅出土完整墓志一方，及零星随葬瓷器残片。但因墓室的填土中含有大量瓷片，从而为其附近的四都窑址提供了年代依据[40]。自 1982 年以来，在我省北部的将乐、尤溪、三明、南平等地曾陆续发现宋元壁画墓，已经发掘清理的达 13 座。墓葬结构均为砖砌的长方形券顶单室或双室墓，墓室多设有壁龛放置陶俑。一般在墓壁涂刷石灰面，在其上施墨绘，或配以红、黄彩，绘画内容有人物、生活起居、仪仗、四神、家禽、动物等，有的还在墓壁砌有砖雕青龙、白虎。其中尤溪县城关埔头村壁画墓还出有北宋靖康元年（1126 年）墓志。

福建的窑业，在宋元时期发展到鼎盛。瓷窑址遍布全省各地，因而古瓷窑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为福建省文物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几年来，他们重点发掘了建窑、南平茶洋窑、晋江磁灶的土尾垵窑以及三明中村垧瑶窑等窑址。

建窑，是宋代著名的黑釉瓷产地，1989年至1992年，我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建窑遗址作了全面调查，并在大路后门山、源头坑、庵尾山、营长墘等地点作了重点发掘，总计发掘面积200余平方米，揭露窑炉遗迹10座，其中有晚唐、五代烧青瓷的窑炉2座、两宋时期专烧黑釉瓷的窑炉7座以及宋末元初烧青白瓷的窑炉1座。五座较完整的黑釉瓷窑长度均在百米以上，其中的Y1、Y3长度超过130米，创全国宋窑长度之最。此外，黑釉瓷与青瓷的窑炉间、青白瓷与黑釉瓷的窑炉间，均有叠压、打破关系，从而得以较完整地显示建窑瓷业生产的历史进程[41]。1993年至1994年发掘三明中村垧瑶窑址时，在草寮后山揭露了一组包括有淘洗、沉淀、练泥池和工棚、陶车坑以及神龛在内的较完整的瓷器作坊遗迹，并在其近旁清理一座烧青白瓷的龙窑遗迹，据其产品特征初步推断窑炉的年代为元代中晚期。这一作坊遗址的发掘，在我省还是首次[42]。1995年秋，晋江磁灶土尾垵窑址的第二次发掘（第一次是1987年，由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发掘），发现龙窑残迹一段，出土大批青釉、黑釉、黄绿釉等陶瓷器标本，有些标本则为以往调查、发掘所未见，是研究宋元磁灶窑陶瓷器外销的重要资料。1995年底在南平茶洋窑址的大岭干和安后山两地共发掘600余平方米，揭露龙窑遗迹11座、工棚遗迹1处，出土大批青瓷、青白瓷、黑釉和绿釉瓷标本及窑具。初步的分析表明茶洋窑包含有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乃至磁州窑等多种窑系的技术成分。经对比研究可知，著名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所出的一部分黑釉瓷茶碗和日本茶道中著名的“灰被天目”茶碗，均是该窑的产品[43]。此外，初步的测试证实，茶洋窑的绿釉瓷是经高温烧成的，表明福建省在宋代已掌握了高温绿釉的烧成工艺。

80年代中期曾报道在福建连江县定海湾打捞到大批古代文物，说明当地海域有古代沉船。1990年春，首届中澳合作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就选择这里的白礁遗址进行水下考古实习。经过三个多月的水下调查和试掘，发现了白礁1号沉船遗址，采集瓷器标本200余件。1995年春夏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合作，对白礁1号遗址作第二次水下考古发掘，打捞了瓷器等文物千余件，并对沉船的整体面貌有了更全面、清楚的了解[44]。

八

福建省明清时期的考古工作，近年来有所加强，主要有长乐市漳港大王宫遗址的发掘、三明石造像群的发现、沙县明代尚书墓的清理以及闽南地区漳州窑的发现与发掘。

大王宫遗址在长乐市漳港镇仙岐村，原被沙丘掩埋。1992年发现并清理，是一座两进、三开间、进深五柱的宫庙建筑，有明、清两期的遗迹。出土彩绘泥塑神像44尊及一批陶瓷供器。塑像中女性14尊，其余均为男性及武士像；塑像大小不一，高度自0.33米至1.3米不等。衣饰着红、绿、黑彩及贴金，姿态神情各异、衣着举止不同，多数是明代作品，少数为元代和清代，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45]。三明石造像群发现于明溪县与将乐县交界的陇西山仙水岩的山上，共计55尊（块），其中圆雕37尊，有佛像、观音、罗汉、布袋僧、弟子等。其余高浮雕有天王像、禄寿、狮戏等。此外还有石塔、石花瓶。石造像中年代最早的为元代，多数是明代作品[46]。沙县明墓在城南洋坊村，占地约700平方米，墓主为明代宣德朝户部尚书陈山。墓前排列有石翁仲一对及石虎、羊、马等石像生。墓平面呈风字形，砖构。墓室长方形单室，仅存墓志一合。墓砖多模印钱纹、莲瓣以及龟、鹤、狮、虎、马等纹样[47]。

漳州窑的窑址遍布漳州大部分市县，因其反映的窑业技术及产品风格基本一致而称之。漳州窑的产品以青花瓷为主，兼烧白瓷、青瓷和酱、黑、黄、蓝等单色釉瓷以及五彩（又称红绿彩或彩绘）、素三彩瓷。主要品种有盘、碗、碟、炉、瓶、壶、罐、盒等，多用剖面呈“M”形匣钵装烧、器底垫砂而成为“砂足器”，尤以青花和五彩的大盘及素三彩香盒最具特征和代表性。1994年底发掘了平和县南胜、五寨的花仔楼、大垅、二垅窑址，1997年发掘了田坑素三彩窑址，1998年又发掘了洞口窑址，共计揭露窑炉遗迹8座，均为砖构横室的单室窑或多室窑（阶级窑）。经分析，漳州窑的青花和五彩瓷，即是明清时期外销瓷中著名的“汕头器（SWATOW）”，其五彩还被日本称为“吴须赤绘”或“赤绘”。素三彩即被称为“交趾三彩”或“华南三彩”，其各种动物、水禽造型的香盒在日本茶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漳州窑的发现对明清时期我国外销瓷以及海外交通、贸易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48]。

（执笔：王振镛、林公务、栗建安）

注 释

① 尤玉柱：《东山海域人类遗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福建文博》1988年1期。
② 尤玉柱等：《福建清流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人类学学报》1989年3期。
③ 尤玉柱等：《清流发现人类牙齿化石记述》，《人类学学报》1996年11月。
④ 曾五岳、尤玉柱：《福建首次发现旧石器》，《福建文博》1990年1期；尤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⑤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4期。
⑥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庄边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2期。
⑦ 福建省博物馆：《1996年福建考古的重要收获》，《福建文博》1997年1期。

⑧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潭壳坵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1期。

⑨ 林朝棨：《金门富国墩贝丘遗址》，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33、34期合刊。

⑩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4年1期。

⑪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牛鼻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⑫ 福建省博物馆：《武夷山梅溪岗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斗米山遗址资料尚未发表。

⑬ 福建省博物馆：《南平漳湖坂宝峰山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91年1期。

⑭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

⑮ 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12期。

⑯ 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池湖古墓葬的清理》，待刊。

⑰ 庄锦清、林华东：《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考古》1977年3期。

⑱ 郑辉：《福建诏安考古调查》，《福建文博》1987年1期；郑辉、朱高健：《福建平和县发现一座西周墓》，《东南文化》1991年1期；郑辉、林聿亮：《福建南靖县三凤岭西周墓》，《东南文化》1990年4期。

⑲ 尤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⑳ 曾凡：《福州浮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2期；福建省文管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10期。

㉑ 建阳县文化馆：《福建建阳县邵口垴汉代遗址》，《考古》1988年7期；杨琮：《福建建阳平山汉代遗址调查》，《考古》1990年2期；福建省博物馆：《1996年福建考古的重要收获》，《福建文博》1997年1期。

㉒ 欧潭生：《闽侯庄边山汉墓应为战国楚墓》，《福建文博》1990年1期。

㉓ 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11期。

㉔ 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崇安汉城北岗一号建筑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3期。

㉕ 福建省博物馆：《闽越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㉖ 曾凡：《关于福建六朝墓的一些问题》，《考古》1994年5期。

㉗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霞浦两晋南朝唐墓》，《福建文博》1995年1期。

㉘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将乐永吉东晋墓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5年1期。

㉙ 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1997年发掘资料。

㉚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五代夹道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福州专辑》1994年2期。

㉛ 建窑考古队：《福建建阳县水吉建窑遗址1991—199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2期。

㉜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建瓯北苑遗址第一、二期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96年1期。

㉝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莆田林泉院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2年2期。

㉞ 福清少林寺重建委员会、福清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福清少林寺研究会编：《福清少林寺》，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96年。

㉟ 曹建新、钟琼奎：《建宁出土的古钱币》，《福建文博·三明专辑》1995年2期。

㊱ 福建省博物馆发掘资料。

㊲ 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资料。

㊳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10期。

㊴ 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资料。

㊵ 邵武市博物馆：《邵武四都宋墓》，《福建文博》1991年1、2期合刊。

㊶ 建窑考古队：《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2期；《福建建阳县水吉建窑1991～1992年度发掘报告》，《考古》1995年2期。

㊷ 福建省博物馆、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三明市博物馆：《三明中村坳瑶元代窑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三明专辑》1995年2期。

㊸ 栗建安：《福建茶洋窑址出土的宋元黑釉茶碗》，《福建文博》1997年1期。

㊹ 栗建安：《福建水下考古工作概述》，《福建文博·纪念中国水下考古十周年专辑》1997年2期。

㊺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福建文博·福州市专辑》1994年2期。

㊻ 李建军：《三明市发现一批明代石造像》，《文物》1991年2期。

㊼ 福建省博物馆、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沙县博物馆：《沙县明代陈山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6年1期。

㊽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五寨洞口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江西省考古五十年

江　西　省　博　物　馆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半个世纪来的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经历了从几乎没有到开始起步，从打下初步基础到稳步前进，再深入发展几个阶段。建国前，除零星考古调查外，几乎没有真正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省各地、市、县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和博物馆，逐步建立起一支文物考古工作队伍，开展了有组织、有目的的文物调查、保护和发掘，获得了数以万计的大批历史文物①。近十年来，考古发现捷报频传，考古研究硕果累累，如新干商代大墓和中美合作对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洞的发掘先后被评为我国“七五”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和唐代洪州窑的深入发掘分别被评为1991年和199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一

江西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较长一段时期来是一空白。虽然60年代初期在乐平涌山岩（洞）发现过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为寻找原始人类及其文化遗物提供了线索”②，但终因材料太少而未被人们注意。这种状况一直到1989年考古工作者相继在安义县和新余市发现了五处旧石器地点才得以改观③。五处地点共获取石制品标本80余件，它们分别出自潦河和袁河第二级阶地的红色粘土（网纹土）中，可初步确认的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石器多采用自然卵石打击而成，加工方法简单，以单面打击为主，二次加工者较少，其特征与华南各地旧石器晚期的石器特征相同，概属于“砾石砍砸器—刮削器传统”④。上述发现，填补了江西旧石器考古的空白，为本地区乃至全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

万年仙人洞是我国较早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早在60年代初就进行过两次科学发掘，发现了不少人类活动遗迹和丰富的文化遗物⑤，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为了探索人工驯化稻的起源，1993年和1995年，中美农业考古队两次对该洞穴和距仙人洞约800米的吊桶环洞进行了考古取样和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⑥。首先，确凿无误

地证实仙人洞和吊桶环洞有着从旧石器末期到新石器早期完整而清晰的上下两层地层堆积，大量^{14}C测定数据表明，上层大约距今14000～9000年；下层大约距今20000～15000年。这种完整的地层堆积，在已发现的华南地区诸多洞穴遗址中是罕见的，从而为探讨人类如何从旧石器过渡到新石器以及新石器革命是在何种环境、何种状态下发生提供了科学的资料。其次，两次出土人工遗物相当丰富，在华南地区诸多洞穴遗址中是出土物最多的。据初步统计，石器474件（片）、骨器248件、穿孔蚌器19件、原始陶片297块，还出土了20多块（片）人骨标本以及数以万块兽骨残片。有的骨器或骨管上刻有一道道划痕，这是中国目前所见较早的记事或表数的刻划痕。原始陶片，夹粗砂，胎厚，火候低，陶胎多用泥片分块贴拍，也有近底部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形的。器形主要为直口筒腹圜底罐形器，器表多饰错乱甚或叠压的粗绳纹或条纹，也发现有用草搓擦的错乱条纹，有的器物内壁饰有横向纹饰。最早的陶片年代可能到12000年左右，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片之一，这无疑对于研究陶器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第三，两洞穴采集标本的孢粉和植硅石细胞分析结果表明，两处遗存都有野生稻和人工稻的线索，尤其吊桶环遗址的下层大量存在野生稻，上层的野生稻虽占多数，但发现有人工栽培稻的扇形体，这就为探索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

自仙人洞上层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后，目前的考古资料尚有一段缺环。新余拾年山一期文化遗存，年代上限为6000年左右[7]，属新石器时期中期偏晚，其文化面貌目前在江西尚未发现相同者。它既有大溪文化的因素，又有与马家浜文化相类似的器物。这种文化内涵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复杂性，无疑和新余地处多种文化群体相互接触与交融的地区有关。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即距今5000年～4500年这段期间，是赣鄱地区史前聚落快速发展和繁荣时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聚落遗址数量的增多和分布地域的扩展，除60年代在赣西北地区发现的“山背文化”[8]之外，近几十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更证实在鄱阳湖周围及赣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着一支被命名为“筑卫城文化”[9]或称“樊城堆文化”[10]的聚落遗存，其代表性的遗址有樟树筑卫城下层[11]、樊城堆下层[12]、永丰尹家坪[13]、九江神墩下层[14]、湖口文昌洑[15]、城墩坂[16]、瑞昌大路口下层[17]、靖安寨下山下层[18]以及新余拾年山二、三期文化[19]等。其四至为：南起永丰县境，北达长江南岸，西起新余市境，东界尚有待进一步探索。很显然，以樟树筑卫城、樊城堆的新余拾年山遗址二、三期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广泛分布于赣鄱地区的腹地，即赣江中下游两岸。从全省已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晚期遗址看，这一地带的聚落遗存点最为密集，表明筑卫城—樊城堆文化是赣鄱地区新石器晚期的一支主体文化，此后的商周青铜文明就是根基于这一地域的主体文化而发生发展起来的。

广丰社山头遗址是赣东北地区一处典型的经过三次大规模发掘的古文化遗存[20]，发

掘者将其下层分为三期，一、二期为新石器晚期文化。一期文化中的盘形鼎、丁字形鼎足、表面饰纵沟的凹面鼎足、有棱座豆、圈足壶、杯形豆、鬶等表现出与筑卫城文化相同或相近的因素；但圈足盘、鹰头状足、两侧饰按窝的鸭嘴形足等，则在筑卫城文化中不见。到二期，筑卫城文化中不见的因素更趋增多，而与之相同的因素则基本消失，加以自身固有的文化特征，如大量的垫土房基、随葬品组合中普遍缺鼎的墓葬等，都似乎表明社山头一、二期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种有别于筑卫城文化而具有独特内涵的新的文化类型。其一期文化年代大体与筑卫城文化相当，即距今约 5000 年至 4500 年；二期文化年代当在距今约 4500 年至 4000 年之间。至于靖安县境内的郑家坳墓地，距今约 5000 年左右，从其葬式和随葬品分析，它并非江西原始土著文化，而是远古时期与长江北岸古代文化交融的结果，与安徽薛家岗文化关系密切。

二

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我们开展了有关相当于夏文化遗存的发掘与研究[21]。过去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存诸如筑卫城文化中层和高安下陈等遗址看来实应是相当夏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后新发现和发掘的广丰社山头三期，鹰潭龙冈、板栗山，新余珠珊[22]以及萍乡市虹桥[23]等遗址中，都出土有类似于河南偃师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器物，如卷沿深腹盘、敞口深腹外饰凸棱平底盆、束颈冲天流盉以及白陶斝、平底觚和石戈等，将相当于夏文化时期的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中区分出来，这应该是一大突破，但必须注意的是，不论是筑卫城中层抑或社山头三期都是植根于下层基础之上，是从本土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自身文化内涵还是主要的，故此只能称其为相当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似不能简单称之为夏文化。

90 年代初对九江县龙王岭遗址的发掘[24]，在 1 号水井中出土一批器物，如翻唇鬲、折肩罐、高圈足盘、深腹盆和陶鼎均与郑州二里岗下层早商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同类器相近，这就为寻找比樟树吴城文化更早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以此为契机，研究者将过去发现的一些青铜文化遗址重新认识排比[25]，认定诸如德安石灰山遗址一、二期，九江神墩遗址小水井和瑞昌铜岭矿冶遗址第 11 号竖井等，都应为早期殷商的文化遗存。特别是 1998 年春夏再次对德安县石灰山遗址进行发掘[26]，证实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吴城文化基本一致，但黑衣陶比吴城盛行；印纹陶、釉陶和原始瓷不及吴城发达；鬲类器保留着较多的早期因素，少见或不见颈腹分明有折度以及弧裆、瘪裆的晚期形制。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该遗存的年代比吴城文化第一期早，大体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下层的早商阶段。

樟树吴城遗址是目前南方地区已发现的众多商周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出土物最为

丰富的遗存。它的发现，不仅是江西也是整个南方地区先秦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自1973年被发现以来，先后进行九次科学发掘[27]，出土了石器、陶器、玉器、石范和青铜器等约2000余件遗物；发现有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与符号160余个；清理出房基、灰坑、陶窑、水井、墓葬和熔铜作坊等；还揭露出一处大型宗教祭祀场所。它由鹅卵石铺成的路面、建筑基址、红土台座、柱洞群和红土台地五部分构成[28]，对于探讨吴城文化的祭祀礼仪制度以及复原昔日吴城人在红土台地上举行神圣庄重的献祭仪式场面提供了极可贵的资料。人们之所以称之为吴城，是因为遗址上筑有一座壮观的土城，发掘证实，土城与遗址系同一时代（吴城文化二期），而且城外挖有城濠[29]。这对探讨吴城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城邦布局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80年代末，在距吴城遗址10余公里的赣江东岸发现了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发掘者推定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30]。墓内出土文物相当丰富，计有青铜器485件、玉器754件（颗）、陶瓷器356件，其中尤以青铜器令人瞩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美，铸工之精，为中国南方地区所仅见。以礼器为例，品种主要有圆鼎、方鼎、扁足鼎、鬲、甗、豆、瓿、壶、卣、瓒等。器形有大有小，有高115厘米、重78公斤，被誉称为"甗王"的四足甗；也有仅10厘米的兽面纹鬲。此外，奇特的双层带门的兽面纹方鼎、怪谲的双面神人头像、威猛的双尾虎等都为古代青铜器所少见。在青铜器的纹饰及附饰上，除了常见的兽面纹、龙纹、云雷纹外，普遍使用虎的形象及带状燕尾纹，这是该地区铜器所特有的，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

大洋洲大墓是目前已发现的规模大、等级最高的吴城文化墓葬，也是目前南方地区已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商墓，因而被列为我国"七五"期间全国十大重要考古发现之一。很多学者认为，它的发现，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远在3000多年以前，赣江流域就有一支与中原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土著青铜文化，有一个青铜文明较为发达的古代青铜王国[31]。只是这一青铜王国的很多奥秘，尚待今后进一步揭示和研究。

近十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进一步证实吴城文化有着较广泛的分布，且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及鄱阳湖西北岸一带。如在赣北德安米粮铺与永修县江益交界以界牌岭为中心，有着较密集的商周遗址群。从对陈家墩[32]、猪山垅、黄牛岭[33]、界牌岭[34]、蚌壳山[35]等遗址发的掘情况看，除猪山垅较单纯为商周文化堆积外，其他都普遍有着早中晚三期堆积，上层如同九江神墩遗址上层一样，为西周时期堆积，晚或可到东周，中层一般为商代晚期遗存，下层有的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从中层出土遗物看，尽管也兼有不同程度万年类型文化因素，特别像猪山垅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说明地处赣北的门户地区，多种文化都汇集、交融于此，使其古代文化面貌呈现多姿多彩，但总的来看，其基本文化面貌仍归属于吴城文化类型。黄牛岭还发掘出土有作祭祀用的大小土台，年代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陈家墩3、4号水井出土有木垂球和木觇标墩等三件最早的

测量用具，这是科技史上的重要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地处长江边不远的瑞昌铜岭矿冶遗址附近试掘的檀树嘴遗址[36]，从出土的鬲、甗形器、假腹豆、广平折肩罐等遗物看，也明显属吴城文化类型，这无疑对探讨铜岭商周矿冶遗存的主人族属诸问题都是极有意义的资料。

瑞昌铜岭矿冶遗址，继 80 年代两次发掘之后，90 年代又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37]，发掘总面积达 1800 平方米，发现竖井 103 口、巷道 19 条、露采坑 6 处、选矿场 1 处。出土遗物有铜质的斧、锛、凿；铜木组成的复合工具锄；装载用的竹筐；提升用的木辘轳、木钩；排水工具木槽、桶；鉴定矿石品位高低的淘金斗等。选矿使用的木溜槽，结构合理，即在槽内分节安活动挡板，然后以水冲选矿。这种原始自动选矿的遗物目前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发现。根据出土陶器分析，并参照^{14}C 木样测定，铜岭遗址的开采年代从商代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开采的一处矿山，其开采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出土物之丰富，在国内已发现的铜矿遗址中是少见的。

以鹰潭角山窑场为代表的万年类型青铜文化是商代赣境地区有别于吴城文化的另一支土著青铜文化。该窑场总面积达 1 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一处商代窑址[38]。80 年代经过两次科学发掘，出土有大量几何印纹硬陶、釉陶和原始瓷的废品，器形多为甗、鼎、鬶、爵、壶、尊、豆、三足盘、盖、罐、瓮、钵、碗、盂、杯、觚、缸、支座等。特别是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制陶工具，如制作纹饰的扁长方形、扁圆体长把形和伞状陶拍等，拍面多阴雕云雷纹和篮纹、方格纹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器皿和制陶工具上发现有刻划数据符号和文字 1489 个，为目前我国所发现的先秦陶文之冠。据初步研究[39]，这些数据符号系采用五进制进位，这无疑是研究我国数学发展史的极重要资料。考古资料证明，万年类型土著青铜文化，主要分布在赣东北和赣东部分地区，如近年在玉山县发现的归塘坞遗址[40]，从采集的敛口席纹硬陶罐、盘口席纹硬陶罐、敞口高颈弧腹红陶罐和甗形器等标本看，都应属万年类型商文化范畴，延续时代自商至西周。

建国以来全省各地出土商周青铜乐器，据初步统计达 66 件之多。它们大部分出土于赣西北和赣西地区，特别是铜铙和甬钟几乎全部出于赣江以西或沿岸地区。其中像新干、宜丰、德安、万载等地出土的青铜大铙，对探讨南方特别是湘赣地区这种特有的青铜乐器的产生、发展和类型及其向甬钟的演变等有着重要的意义[41]。

继 80 年代后期上饶县马鞍山发现一处西周时代土墩墓之后[42]，1993 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上海博物馆合作又在玉山县双明地区抢救清理四座土墩墓[43]，其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上饶、玉山均地处赣东北，东与浙西相连，北近皖南，这里土墩墓的多例发现很值得注意。

樟树观上乡曹溪一带，早年即有大型战国墓葬出土。1993 年因群众建房又在郭堆垴发现一处较大型土坑竖穴墓[44]。墓葬早年被盗，只残留有墓道最低的一级台步，清理

后墓中残存文物18件，计有铜鼎、铜壶、铜鉴、铜器盖和锛、斧、刮刀、镞以及玉蛙等，从铜鼎、铜鉴的形制及蟠虺纹作风看，该墓系春秋晚期。樟树在春秋时期属吴国，联系以往这一地区屡有春秋铜器出土，这次观上春秋晚期大型贵族墓葬的发现，说明这一地区当有可能是吴国最西境的一个重要的统治据点。

三

西汉初年，为“昌大南疆”，设豫章郡，领18县，南昌即为全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60年代在南昌老福山发掘一座大型木椁墓[45]，70年代在永和门外发掘13座西汉墓葬[46]。此外，修水、高安、宜春和南康等地都先后发现了西汉墓葬。东汉时期的墓葬更是遍及全省，近年来，德安、靖安、新建、永新、瑞昌、赣县等地都有东汉墓群和墓葬的发现。

80年代初，永新县发现一座小型东汉墓葬[47]。墓为长方形砖室墓，边长1米，用楔形砖砌成券顶，四壁用云纹、同心圆纹以及车马纹砖砌成。墓室中央置放一青铜棺椁，棺椁前横置五块有榫的车马纹砖，砖中央置放一铜薰炉，炉的两侧各置一青铜小盖盒作供奉状。铜棺椁长25厘米、宽15.5厘米、通高22厘米，由底座、方椁和斩顶式方盖三部分构成，盖上有一宝珠形佛光顶。揭开方盖，中置铜内棺，长19厘米、宽7厘米、通高9厘米，同样分棺座、棺身和棺盖三部分，均有榫卯套接，椁、棺外表均刻有佛教图案和花纹。内棺中央置放一蒜头形玻璃瓶，内装大半瓶黄色灰烬，经检测主要成分是“骨灰的象征物”。用铜作葬具，且有棺有椁，在唐宋以前甚为罕见。尤为重要的是经检测为“钠—钙玻璃”瓶的出土，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它为佛教文化在我国南方的传播以及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包括玻璃生产的历史研究等都提供了极可贵的实物资料。

三国时，江西属东吴管辖。90年代以来先后在南昌、吉水、樟树、于都等地发现了东吴时期墓葬。1994年吉水县富滩发现一座中型长方形单室墓[48]，墓砖纹饰为同心圆纹。出土有31件青瓷器，器类有罐、碗、盘、壶、钵、唾壶、擂钵、盏把以及谷仓、水井、厕所、灶等明器。其中青瓷擂钵、带盖钵和盏把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成套茶具，说明“茶托子”作为一种新式茶具，至少在东吴时就已出现。它的出土，反映了三国时期我国南方地区加工制作擂茶、茶叶储存、饮茶等方面的生活习俗。在吉水县城郊俗称“三碗斋”的地方发掘一座东吴晚期大型凸字形砖室墓[49]。墓由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左、右耳室，左、右回廊，后回廊和左、右藻井组成；四隅券进式穹窿顶。该墓早年被盗，仅出土青瓷碗1件和一些青瓷片、五铢钱等。此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形似汉晋时期大地主庄园的楼阁，其“四隅券进式穹窿顶”虽在东吴晚期至西晋初期较流行，但在后室的左、右、后砌筑近似正方形回廊的作法，不仅在江西地区，就是

在整个南方地区已发现的同时期墓葬中也是罕见的。

两晋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代，江南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特别是东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更为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期的墓葬不仅在九江、南昌、靖安、吉水、临川等地多有发现，就是在地处“岭峤咽喉”的南康龙华[30]地区以及赣南东部的偏远山区会昌县境[31]也有发现，而且随葬品也多为实用的青瓷器，明器较少。青瓷器种类诸如双系罐、六系罐、扁腹罐、盘口壶、碗、钵、盏、杯等，釉色多为青黄，造型也都是赣境乃至南方地区同一时期的常见形制。褐釉点彩较为流行，莲瓣纹开始出现。九江东晋末期墓中还出土一件铁镜[32]。

1997 年秋在南昌市新火车站工地发现的晋墓群，是近年来我国六朝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33]。此次配合基建抢救清理的 6 座墓葬，集中在 1000 多平方米范围内。墓顶距地表约 2.8～3.5 米，自北向南依序排列。除 M4 外，墓室均遭严重破坏。从残存部分看，均为双室券顶砖室墓，且基本都带左、右耳室。M1 和 M3 为合葬墓，其他为单人葬。从随葬物特别是 M3 出土的永和八年（352 年）纪年木方和带“丙午”（364 年）铭文铜镜判断，该批墓葬的时代当为东晋。惟 M5 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带有明显的早期风格，与前述吉水城郊东吴晚期大型墓的墓顶结构相同，只是规模较小，其年代可能早到西晋。

六座墓葬共出土漆器、青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器、木器、滑石器等各类文物 120 余件，其中漆器 27 件，器类有奁、盘、托盘、耳杯、攒盒、槅匕、箸等数种，制作精细，风格独特，代表了当时漆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出土青瓷器 24 件，其中也不乏珍品。这批文物为研究当时南昌地区的丧葬习俗、绘画、书法艺术以及南昌城的变迁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全省各地发现的南朝墓甚多，许多墓带有纪年砖铭和其他内容的砖铭[34]。墓室结构多为券顶砖室墓，分前后室，平面多呈凹字形。德安高塘发现的一座墓前室四角、后室左右两壁以及后壁中间和两角共砌 14 个砖柱，较为奇特[35]。墓砖纹饰普遍为网线纹、线纹、网纹、对角纹等，也有同心圆纹、菱形纹、几何纹和鱼纹、八瓣莲纹等。随葬品主要为青瓷器，器形主要有壶、罐、盘、杯、盅、碗、托盘、碟、托盘三足炉、博山炉等。赣县白鹭南朝墓中出土的一件盘口壶，通高竟达 42 厘米，口径达 17.2 厘米，可谓南朝出土青瓷之冠[36]。

对汉、晋、南朝时期的古城址也开展了一些考古调查。西汉初所设 18 个县城址，经调查，鄡阳古城在今都昌县周溪乡鄱阳湖中的四望山[37]；南壄古城在大余县池江乡长江村塞上，面积约 46000 平方米[38]；两晋、南朝时期的浔阳故城位于九江县赛城湖一带，城址内发现有 200 余件生产工具，以及大批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39]。

这些古城址的调查发现，对研究汉晋时期赣境地区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四

江西隋墓历年来一直发现较少，建国以来除在南昌樟树、瑞昌和于都等地发现一批隋墓外，近年主要在黎川发掘一座纪年隋墓[50]。该墓为券顶砖室，墓砖纹饰为钱纹、车轮纹、几何纹和鱼纹等，砖侧有铭文“开皇十一年”、“开皇十四年”。随葬品有四系盘口壶、碗、盏和带托五流瓶等，其中四系盘口壶的肩颈部饰麦穗纹、三叶草和太阳图案，腹部满饰仰莲纹和卷云纹，纹饰繁缛，主次分明，搭配和谐，是隋代青瓷器的标准器。此外在会昌县西江发现一座隋代土坑墓[51]，出土的青瓷杯和铁镳斗等都是隋墓中常见物，尤其是一件铭文曰“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铜镜，更是隋代的典型器物。

继赣北的九江、永修等地发现多座唐墓之后[52]，瑞昌县范镇乡发现一座佛教僧人墓葬[53]。墓室虽被破坏，但出土的鎏金青铜塔形顶盒、鎏金青铜塔式长柄手炉和三彩脉枕等极为珍贵。前两项铜佛具与1983年洛阳七祖神会和尚身塔塔基出土的铜盒和长柄手炉极其相似[54]。唐代为佛教的极盛时期，江西又是禅宗传布最盛的区域之一，瑞昌县境重要佛具的发现，无疑为唐代佛教考古研究及禅宗在江西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

1992年瑞昌市丁家山还清理唐代墓葬11座[55]。该墓群分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砖室墓均为券顶单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壁多有壁龛。墓砖除一面饰绳纹外，均无纹饰。该墓因被盗扰，所出器物只有63件，陶器有洗、瓶、罐、器盖、风字形砚、异形器；青瓷器有瓶、壶、钵、碗、碟、盏和粉盒；铜器有熨斗、钵、杯、镜、发钗；铁器有刀、剪刀等，此外尚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

赣南地区的唐墓历年发现较多，既有土坑墓，也有砖室墓。1990年赣县梅林镇发现一座券顶砖室唐墓，平面呈长方形，墓砖纹饰有线条纹、双角叉纹、双弧纹和波浪纹等，随葬品有铁臿和青瓷碗等[56]。会昌县西江镇的一座纪年砖室墓，墓砖一侧压印一竖行反书阳纹：“□大唐乾封元年造茔”。青砖的一面饰网纹，侧面饰半同心圆纹。惜随葬品多已散失，只收集到青瓷杯等少量文物。

90年代初，九江县黄老乡大塘清理一座纪年五代南唐周一娘墓[57]。墓为长方形单室砖壁石顶结构，一改唐时的券顶结构，墓室的左、右、后三壁砌有壁龛。墓中出土文物22件，其中青釉瓷16件，如敛口钵、花口大足碗、大足圆盘、大足小碗、盏和壶等，此外尚有蜂蝶花铜镜和一方青石质“地券文契”。青瓷器中的碗、盘、盏等，圈足径偏大，足径与口径比例约近二分之一，口沿为花口和唇口，釉色青灰或青灰带绿，其造型与釉色均与景德镇湖田窑的五代遗存堆积碗类极为相似[58]。据地券得之，墓主为女性，名周一娘，葬于南唐李璟保大十一年（954年）。此一石质“地券文契”是赣境地区目

前已出土地券中较早者，证明随葬买地券的风俗在五代时的长江流域就颇为流行。

唐代城市考古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建国以后，南昌市城区在基建工程中，多次发掘出唐城墙基，还出土一批印有“大唐庚子岁”铭文城砖，说明豫章郡自东晋始移至今城之后，改土筑为砖砌[⑱]。唐时不仅郡城城墙始用砖砌，有的州治城墙也开始用砖筑。1988年高安县城在扩建瑞州路时发现一段砖包土墙城垣残迹，长22.5米，残高2.43米，且发现有瓮城和排水系统以及内台阶等。经试掘解剖，此城垣当属唐代所筑。

陶瓷考古一直是我省唐宋以后文物考古工作的重点，建国以来，先后在九江、都昌、婺源、南城、新干、丰城、宜春、铜鼓、铅山、龙南、定南、会昌、大余、于都等地发现一批唐代窑址。特别是1977年在丰城曲江镇罗湖窑址群采集到大量唐代青釉器皿，引起陶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唐陆羽《茶经》载“洪州瓷褐”并将其列为全国第六位。然而，长期以来，对洪州窑的具体地点一直众说纷纭，今丰城罗湖窑址群的发现，无疑为寻找洪州窑提供了重要线索。为彻底解决这一千古疑团，1979年对罗湖窑进行了首次发掘[⑩]，清理出龙窑2座，出土青瓷器和窑具等计2914件。这次发掘，不仅确定了洪州窑所在地应在丰城县境，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段空白，而且为研究隋唐瓷器的发展史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

为了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洪州窑，1992年和1993年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深入调查和重点发掘[⑪]，先后调查20余处窑址，采集瓷器标本600余件。在调查基础上选择了5个地点进行重点发掘，揭露面积350平方米，出土各类器物7000余件，清理3条龙窑窑炉遗迹。发掘证明洪州窑最迟在东汉晚期已烧造出较为成熟的青瓷器；东晋南朝逐渐进入兴盛期并一直延续到中唐；晚唐五代时期衰落，前后烧造长达800余年。

在烧造工艺方面洪州窑有其独特的创造，如匣钵装烧工艺一般认为始于隋代，但这次在南朝早期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废弃的匣钵，说明洪州窑最迟在南朝早期就使用了匣钵。又如玲珑瓷与芒口瓷的烧造，以往玲珑瓷在唐、宋、元少见，今据发掘资料，证明洪州窑玲珑瓷的始烧年代至少在隋代，至今已有1300年历史。芒口瓷以往最早发现于河北定窑，时代为晚唐，而洪州窑所出芒口瓷钵，始烧年代应上朔至南朝，已有1400余年历史。

总之，通过洪州窑的多次发掘，获取了大量实物资料，对全面认识和深入探讨洪州窑的相关问题以及复原汉唐时期我国陶瓷手工业生产面貌均具有重要意义。

五

两宋时期江西的经济和文化空前发展，各地发现的墓葬较多，其中不乏纪年墓葬，如余江锦江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墓[⑫]、德安县城南皇祐五年（1053年）墓[⑬]、横峰

大山坳嘉祐三年（1058年）墓[24]、德兴流口元祐七年（1092年）墓[25]、樟树阁皂山绍圣元年（1094年）道教画像石墓[26]以及鹰潭宝祐元年（1253年）墓[27]等。

樟树阁皂山石刻画像石墓，系单室石结构，墓坐西向东，墓门和后壁各用两块、南北两壁各用五块带有榫卯的石刻画像石组成。总的布局是：后壁似为墓主人筵席图；北壁刻一青龙，下排列7人，似为教仪图；南壁刻一白虎，下也排列7人，同样似为教仪图；墓门因有盗洞，石刻线条多已风化腐蚀不清。四壁石刻画像展线长7米，高1米，墓主人端坐正中，其他人物分立左右，两侧壁的青龙、白虎以及人物的芙蓉冠、巾帽、发髻、朝笏、道袍等，都赋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当是一幅道教祭奠仪式图。该墓早年被盗，随葬品仅存一青白瓷碗、二件褐釉瓷碟和墓志铭（残）以及铜钱等。据墓志得知，墓主人名“知在”，字“子中”，曾先后任“副道正”和“道教首职”、“传教威仪”，并被赐于“灵宝大师”封号，卒于元祐八年（1093年），葬于绍圣元年（1094年）。阁皂山系道教名山，唐中宗赐为天下“第三十三福地”，汉晋时期的张道陵、葛玄、葛洪都曾采药炼丹于此，这次阁皂山发现的有关道教石刻人物画像，是一幅近千年的艺术珍品，它所反映的道教首职、人物及祭奠礼仪图等，不仅在江西即或全国也甚罕见。它对于研究阁皂山道教灵宝派的历史，道教墓葬葬制、葬俗是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1985年发掘的临川庆元四年（1198年）朱济南墓[28]出土一件张仙人素胎瓷俑，其左手抱一大型罗盘于右胸前。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旱罗盘资料，说明南宋时旱罗盘就已很流行，是研究罗盘用于航海事业的极重要资料。

近十年来，元纪年墓也发现不少，见于报道的有樟树至元十八年（1281年）张氏小娘墓[29]、二十年（1283年）张瑜墓[30]，鹰潭大德三年（1299年）凌文秀墓[31]，乐平延祐五年（1318年）张氏墓[32]以及樟树山前至正三年（1343年）墓[33]等。这些纪年元墓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青白瓷和青釉瓷，其中如鹰潭凌文秀墓出土的一对青白釉堆塑瓶，造型别致，胎质细腻，釉色莹润，是元代青白瓷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这批纪年墓出土的青白瓷，为元代陶瓷的断代与研究提供了可靠标本资料。

宋元时期的江西瓷业不仅盛极一时，而且不断出现新的瓷器品种。建国以来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大量宋元窑址，并重点对一些著名窑址如吉州永和窑[34]和赣州七里镇窑[35]进行了发掘。近十年来各地又不断发现新的窑址，如铅山盏窑[36]，赣南的寻乌上甲村古瓷窑群[37]，全南县渡田坑、梅子山窑址[38]和吉安市郊临江窑等。1990年和1991年两次对吉安市临江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39]，揭露面积2400多平方米。发现有制瓷作坊遗迹如淘洗池、陈腐池、蓄泥池、凉坯台和擂釉缸等，还发现有马蹄形窑2座，出土各种窑具、工具、瓷器16000余件。临江窑与永和窑相距约15公里，都位于赣江东岸。临江窑出土的带“吉”、“礼”字款的乳白釉瓷、黑釉瓷、绿釉瓷和白地彩绘瓷等的造型、胎质、釉色、纹饰以及工艺作风，与永和窑同类器物完全一致。因此，临江窑实是一处新

发现的属吉州永和窑系的大窑场。两窑的烧造时间、窑炉形制、作坊结构、瓷器种类以及制作工艺等都基本相同，有的大同小异。临江窑的始烧时间为五代，比永和窑略晚，但终烧时间为明代晚期，比永和窑的延续时间更长。

宋元以降的窑址考古中，瓷都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现无疑更为世人所瞩目，过去有所谓“新平冶陶，始于汉世”之说，但从景德镇属的浮梁县境的沽演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⑩]看，远在四五千年前人们就能烧制原始陶器。再从景德镇市属的浮梁、乐平县境发现一批商周遗址看，说明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能烧制原始青瓷器。此后，历经汉、晋、南朝、隋、唐已烧造出了成熟的青瓷器。关于唐时的窑址，1982 年曾在市区落马桥发现了“玉璧”底圈足的唐代青瓷碗残片[⑪]，这无疑为寻找唐窑提供了重要线索，更重要的有力证据是 1990 年在白虎湾窑址出土一件刻有行书“大和五年”（831 年）铭款的青釉瓷碾（残）[⑫]，这是景德镇首次发现带纪年铭的唐代青瓷，是佐证盛唐时期瓷都窑业的宝贵资料。

至于五代、宋、元、明、清时期的古窑更是分布广泛，据多年的普查核实，总计约 150 余处[⑬]，其中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五代至明中叶）、最典型的窑址是湖田窑，它是研究 10～14 世纪景德镇制瓷工艺发展的最好的窑场。1988 年以来，配合基建对湖田古窑进行了多次不同规模的发掘，获取了不少珍贵的瓷器（片）标本。特别是 1995 年～1996 年度对葫芦窑附近、天门沟和狮子山一带的抢救性发掘[⑭]，收获最大，出土物最丰，是近年来江西陶瓷考古的重大收获。首先，清晰地揭示出这一地区地层堆积共分 5 大层，2 层及打破 3 层的作坊遗迹为明代遗存，3 层及打破 4 层的作坊遗迹为元代遗存，4 层为南宋遗存，5 层下开口的遗迹为北宋遗存。这就为研究湖田古窑的烧瓷历史、制瓷工艺和产品特征诸问题提供了层位学上的依据。其次，这次揭露的作坊遗迹较多，有房基、路面、水沟、淘洗池、陈腐池、练泥池、蓄泥池、凉坯台、轮车基座、釉缸、窑炉等，其中尤以元代窑业遗存内涵丰富。其作坊遗迹和窑炉建造方式考究，保存较好，且连成一片，布局规整有序，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和复原了湖田古窑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后半期的面貌，为探讨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第三，这次出土的各类窑具、工具、制瓷原料和其他用具，品种繁多，仅瓷片就有 6 吨之多，计有五代青釉瓷、白瓷；两宋青白瓷；元代青白釉、卵白釉、黑釉、青花瓷；明代青花、甜白及仿龙泉釉、灰青釉等，其胎质、釉色、造型、装饰和工艺等都具有鲜明的风格，代表了湖田窑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窑业生产的工艺水平，为全面深入研究湖田古窑的烧造历史和工艺提供了丰富的可贵资料。

元代瓷业的发展和成就为景德镇日后成为瓷都奠定了基础。作为瓷都的明清景德镇，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窑场栉比鳞次，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的瓷场几乎都集中在今日市区，官窑设在镇中心的珠山，又名“御器厂”，专门生

产皇宫御用瓷器。1982年、1983年、1984年和1988年，景德镇陶瓷考古所为配合御器厂范围内的基本建设，前后进行了3～5次发掘，出土了数十吨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和正统时期的各类瓷片[58]。复原或基本复原的瓷器达数千件。1992年底至1993年3月，又在御器厂遗址东院的基建工地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宣德官窑瓷片，目前已复原数百件，其中有许多是未见诸传世品的所谓“孤品”或“绝品”，如孔雀绿釉青花鱼藻纹碗、盘、靶盏，青花五龙纹蟋蟀罐以及白釉红彩款龙纹靶盏等[59]。80年代以来，景德镇明初御窑厂范围内几次大量官窑瓷器的出土，轰动了海内外，可以说它是20世纪一百年间我国陶瓷考古的空前大发现，必将对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执笔：彭适凡）

注　释

①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考古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② 黄万波等：《江西乐平“大熊猫—剑齿象”化石及其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年6期。
③ 徐长青：《江西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江西文物》1989年1期；李超荣：《江西安义县旧石器研究》，《江西文物》1991年3期。
④ 张森水：《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人类学学报》1983年3期。
⑤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
⑥ 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农业考古》1998年1期。
⑦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3期；《新余市拾年山遗址第三次发掘》，《东南文化》1991年5期。
⑧ 彭适凡：《试论山背文化》，《考古》1982年1期。
⑨ 唐舒龙：《试论筑卫城文化》，《南方文物》1996年2期。
⑩ 李家和等：《樊城堆文化初论》，《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1期。
⑪ 江西省博物馆等：《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6期；《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第二期发掘》，《考古》1982年2期。
⑫ 清江博物馆：《江西清江樊城堆遗址试掘》，《考古集刊》第1辑，1981年；《清江樊城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
⑬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永丰县尹家坪遗址试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2期。
⑭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2期。
⑮ 石钟山文物管理所：《江西湖口县文昌洑遗址调查》，《东南文化》1990年4期。
⑯ 石钟山文物管理所：《江西湖口城墩坂新石器时代遗址》，《南方文物》1997年3期。
⑰ 瑞昌市博物馆：《江西瑞昌大路口遗址调查简报》，《南方文物》1992年1期。
⑱ 王弦等：《江西靖安寨下山遗址调查简报》，《南方文物》1992年1期。
⑲ 刘诗中：《拾年山遗存文化分析》，《南方文物》1992年3期；徐长青：《拾年山遗址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研

究》，《南方文物》1996年2期。

⑳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发掘》，《东南文化》1993年4期；《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第三次发掘》，《南方文物》1997年1期。

㉑ 徐长青等：《江西夏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南方文物》1994年2期。

㉒ 彭振声等：《江西新余发现夏时期文化遗物》，《南方文物》1992年3期。1997年冬至1998年春首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此据发掘领队周广明同志的工作汇报。

㉓ 1997年冬对该遗址进行首次发掘，此据发掘领队王上海同志的汇报材料，目前报告尚在整理中。

㉔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九江县龙王岭遗址试掘》，《东南文化》1991年6期。

㉕ 龙庆等：《江西早商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3、4期。

㉖ 据李荣华同志的汇报材料，目前报告尚在整理编写中。

㉗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第八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1期。

㉘ 周广明：《吴城商代宗教祭祀场所探究》，《南方文物》1994年4期。

㉙ 占开逊等：《吴城遗址第九次发掘纪实》（待刊稿）。

㉚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㉛ 彭适凡等：《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南方文物》1994年1期。

㉜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德安县陈家墩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2期。

㉝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米粮铺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3年2期。

㉞ 邱文彬等：《江西德安、永修界牌岭商周遗址调查》，《南方文物》1993年2期。

㉟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德安蚌壳山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4年3期。

㊱ 朱垂珂等：《江西瑞昌檀树嘴遗址试掘》，《南方文物》1994年3期。

㊲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江西科技出版社，1997年。

㊳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鹰潭角山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2期。

㊴ 廖根深：《角山商代记数符号分组研究》，《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2期。

㊵㊸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玉山双明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南方文物》1994年3期。

㊶ 彭适凡：《赣江流域出土商周铜铙和甬钟概述》，《南方文物》1998年1期。

㊷ 上饶县博物馆：《上饶县马鞍山西周墓》，《东南文化》1989年4、5期。

㊹ 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观上春秋墓》，《南方文物》1997年2期。

㊺ 郭远谓：《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汉木椁墓》，《考古》1965年6期。

㊻ 江西省博物馆：《南昌东郊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2期。

㊼ 李志新：《永新古墓出土青铜镜及玻璃器》，《江西文物》1991年3期。

㊽ 李希朗：《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南方文物》1996年3期。

㊾ 李希朗：《江西吉水晋代砖室墓》，《南方文物》1994年3期。

㊿ 赣州地区博物馆等：《江西南康龙华晋墓》，《南方文物》1993年3期。

(51) 钟健华等：《江西会昌西江东晋墓》，《南方文物》1996年4期。

(52) 刘晓祥：《江西九江县东晋墓》，《南方文物》1997年1期。

(53) 彭明瀚等：《江西南昌晋墓群出土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5日；南昌市博物馆等：《南昌火车站晋代墓群发掘简报》（待刊稿）；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6期。

(54) 南昌市博物馆：《江西南昌张家山南朝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2年2期。

⑤ 于少先：《江西德安南朝墓》，《南方文物》1993年4期。
⑥ 赖斯清：《江西赣县白鹭南朝墓》，《南方文物》1992年3期。
⑦ 周振华：《鄡阳城址初步考察》，《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1期。
⑧ 张小平：《大余县发现西汉南壄古城址》，《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2期。
⑨ 李科友等：《江西九江县发现六朝浔阳城址》，《考古》1987年7期。
⑩ 杨鑫根等：《黎川县黎溪纪年隋墓》，《江西文物》1990年3期。
⑪ 钟健华：《会昌县西吕隋唐墓葬》，《江西文物》1990年1期。
⑫ 九江市博物馆：《九江市郊发现唐墓》，《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1期；吴圣林：《九江市发现一座唐墓》，《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4期。
⑬ 何国良：《江西瑞昌唐代和尚墓》，《南方文物》1998年3期。
⑭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文物》1992年3期。
⑮ 瑞昌市博物馆：《江西瑞昌丁家山唐墓群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3期。
⑯ 赖斯清：《江西赣县梅林唐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4年4期。
⑰ 刘晓祥：《九江县五代南唐周一娘墓》，《江西文物》1991年3期。
⑱ 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各类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文物》1980年11期。
⑲ 彭适凡：《再论古代南昌城的变迁与发展》，《南方文物》1995年4期。
⑳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㉑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江西丰城洪州窑址调查报告》，《南方文物》1995年2期。
㉒ 倪任福等：《余江锦江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江西文物》1990年3期。
㉓ 于少先：《江西德安发现北宋皇祐五年墓》，《南方文物》1992年3期。
㉔ 滕引忠：《江西横峰县大山坳宋墓》，《南方文物》1992年1期。
㉕ 孙以刚：《江西德兴流口北宋墓》，《南方文物》1994年3期。
㉖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樟树北宋道教画像石墓》，《江西文物》1991年3期。
㉗ 曲利平：《鹰潭宋代纪年墓葬》，《南方文物》1996年4期。
㉘ 陈定荣等：《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4期。
㉙㉚㉝ 黄冬梅：《江西樟树元纪年墓出土文物》，《南方文物》1996年4期。
㉛ 曲利平等：《江西鹰潭发现纪年墓》，《南方文物》1993年4期。
㉜ 乐平县博物馆：《乐平李家岭元墓清理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1期。
㉞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吉安市临江窑遗址》，《考古》1982年5期。
㉟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赣州七里镇木子岭窑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2年1期。
㊱ 王立斌：《江西铅山盏窑略考》，《南方文物》1997年3期。
㊲ 赣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等：《江西寻乌县上甲村古瓷窑址调查》，《江西文物》1991年3期。
㊳ 薛尧等：《江西全南县渡田坑、梅子山窑址调查》，《南方文物》1996年2期。
㊴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等：《江西吉安市临江窑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2期。
㊵ 江建新：《景德镇沽演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江西文物》1990年1期。
㊶ 廣刚：《景德镇窑址调查二则》，《中国陶瓷》1982年7期。
㊷ 黄云鹏：《景德镇首次发现带纪年铭的唐代青瓷》，《南方文物》1992年1期。
㊸ 江建新：《景德镇窑遗存考察述要》，《南方文物》1991年3期。

⑭ 据此次发掘领队杨军同志的汇报材料，有关资料报告尚在整理中。

⑮ 分别见《光明日报》1988年4月12日和《光明日报》1988年12月15日报道。

⑯ 刘新园：《明宣宗与宣德官窑》，《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展》，鸿禧美术馆，1998年，台湾版。

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山东地区的文物考古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艰难探索，逐步建立起了前后承袭、持续不断的沂源猿人（距今40万年左右）、新泰乌珠台人（距今5～2万年左右）、沂沭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细石器遗存（距今1万年左右）、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8400～7700年左右）、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左右）、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岳石文化（距今4000～3600年左右）和诸历史时期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表明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

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引人注目的主要是沂源猿人和新泰乌珠台人的发现。

1981年9月，在沂源县土门乡骑子鞍山石灰岩的一个裂隙中，发现了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后经两次发掘，共发现头盖骨1块、眉骨2块、肱骨1块、肋骨1块、牙齿6颗。同出的动物化石有肿骨鹿、李氏野猪、巨河狸等。据研究，这些古人类化石分属两个成年猿人个体，其眉骨的粗壮程度和牙齿的原始性，与北京猿人近似。哺乳类动物化石也与北京周口店动物群十分相似。估计沂源猿人化石距今约40万年左右[①]。

1983年，在沂水县诸葛镇南洼洞采集石核、石片和砍砸器等石制品7件。同出的动物化石葛氏斑鹿，是更新世中期的典型动物，因此南洼洞的石器也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②]。

1966年4月，在新泰市刘杜乡乌珠台村南一个石灰岩溶洞中，发现一颗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据研究，这颗牙齿是一位少女的左下臼齿。牙齿不粗壮，咬合面副脊不发达，齿前部宽小于后部宽，这些特征接近于智人。动物化石除披毛犀生活于更新世外，其他哺乳动物，如虎、猪、鹿和牛等都可能活到全新世。估计，乌珠台人

距今5至2万年。

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地点还有长岛县长岛[3]、沂源千人洞[4]和上崖洞[5]、日照丝山[6]、蓬莱村里集[7]等。

沂源猿人标志着旧石器时代的山东人处于猿人和直立人阶段；乌珠台人标志着旧石器时代的山东人进化到了现代智人阶段。

二

在沂沭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发现上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存，是80年代山东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个新突破，填补了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缺环。

1982年，在临沂凤凰岭汉墓的填土中第一次发现典型的细石器遗存[8]。同年12月进行了试掘，在地质时代约为更新世晚期后段或全新世早期的棕黄色粘质沙土中，发现打制石片、石叶及刮削器、尖状器等细石器文化遗存，并发现灰烬和烧土状遗留物。

1982年以后，在沂沭河流域进行的专题调查中，陆续发现七八十处细石器遗存和地点，其中在沂河上游的沂水县发现19处细石器地点，在沭河两岸的马陵山地区发现45处细石器地点，以上两处是比较集中的区域。

1984年，分别在郯城县黑龙潭和临沂市青峰岭进行了试掘[9]。黑龙潭遗址土层堆积厚度1.35～3.3米，可分为三层。中层出有打制石器及哺乳动物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上层为次生堆积，内有细石器而又不见其他更晚的遗物。由此，黑龙潭的地层关系表明，细石器文化遗存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沂沭河流域细石器分为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两大类。石质主要为石英、燧石、变质岩和水晶等。大多采用直接打击法产生石片，再用间接法修整。多数采用单面加工，压制技术比较熟练。

1989年，在汶泗河流域的宁阳、汶上和兖州进行细石器文化遗存调查，先后发现43处细石器地点。采集的细石器遗存以石片最多，工具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石钻、斧状小石器和石锯等[10]。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分析，沂沭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细石器文化遗存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以狩猎为主，兼有捕捞和采集。时代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

三

山东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确认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1988年10月，为配合济青高速公路建设，对淄河东岸的临淄区后李遗址进行了发掘[11]。在10至12地层中发现一种与山东地区已知考古学文化有明显区别的古代遗存。从地层关

系上可知，这类遗存早于北辛文化时期，当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12]。1991年7月，在对章丘市西河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清理出两座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址，出土了一组特征鲜明的陶器群。这些新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山东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和特征有了较深刻的认识[13]。

目前山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还有章丘小荆山、绿竹园、摩天岭，长清张官，万德西南，邹平孙家，寒亭前埠下等。其中小荆山和前埠下曾进行过发掘。这些遗址从最西的长清到最东的寒亭距离约250公里，均坐落在泰沂山地北缘的山前冲积平原上。从分布情况看，西部七处，大致以章丘为中心。西河遗址面积较大，堆积较厚，保存较好，器物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统计，发现和发掘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址近70座。房址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房址面积较大，多在三四十平方米之间，大者超过50平方米。半地穴式，门道多向南。西河遗址的F1，保存较为完整。南北长7.4米，东西宽6.8米，高0.5米。室内大致分为居住区、炊饮区和活动区。居住区位于西半部，面积约20平方米，居住面经火烧烤，干燥坚硬。炊饮区位于中部，有三组烧灶，每组烧灶由三个向内倾斜、半埋入地下的石支脚组成。南组烧灶为主灶，西北组烧灶上还残置一件叠唇圜底釜。活动区位于东部，放置十余件生活用陶器。

在后李遗址和小荆山遗址发现土坑竖穴和土坑竖穴侧室两种类型墓葬。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不一，无葬具。个别墓主手握蚌壳。小荆山遗址发现的21座墓葬排列有序，可能是一处氏族公共墓地。在后李遗址还发现一座陶窑。

出土的陶器造型古朴，制作基本规整。陶色以红褐色和青灰色为主，火候不匀。陶质较细，多用原生粘土烧制而成，少数夹有砂粒、蚌壳和云母。器形以圜底器和圈足器居多，平底器较少，有的器底饰4～6个乳头状小足。按其用途主要分为四大类：作为炊具的有小型陶釜和陶支脚等；作为水具的有双耳圈足罐、蛋形直口壶和陶杯等；作为盛具的有大型陶釜、匜形器、高圈足盘和平底盆等；作为食（饮）具的有圈足碗、平底钵和小口壶等。在西河遗址和小荆山遗址还发现陶面塑像和陶猪等原始艺术品。纹饰以素面为主，有的在口沿下饰一周锥刺纹或指甲纹，有的在颈部饰一周菱形或半圆形或鱼刺状的刻划纹。陶器以手制为主，有的陶器似采用泥带圈套接法制作。石器有石斧、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和石支脚等。骨器、蚌器和角器也有不少发现。

经测定，西河遗址和后李遗址的树轮校正年代在距今8400年至7700年之间。估计山东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上限要达到距今9000年以上，下限延续到同北辛文化早期年代衔接，整个文化的延续时间可能在1500年至1800年左右。山东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源流问题正在讨论之中，来源问题首先要从距今1万年左右的沂沭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细石器文化遗存上考虑。去向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从山东新

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发现的区域、层位关系、年代和文化因素上分析，认为同北辛文化是一脉相承、先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另一种认为两者是泰沂山南北两侧并列发展的两个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四

1964 年 4 月，在滕州市北辛庄遗址调查时，发现了一种以夹砂黄褐陶器为特色的古代遗存，当时推测其年代可能比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存早，因此暂以“北辛类型”命名[14]。1978 年和 1979 年先后两次对北辛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从而对北辛遗址古代遗存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提出了北辛文化的命名[15]，得到了考古界公认。

目前在山东发现的北辛文化遗址有五六十处，主要集中分布在鲁中南、鲁北地区和胶东半岛地区。经发掘的还有兖州王因[16]和西桑园、汶上东贾柏村[17]、泰安大汶口[18]、邹平苑城[19]、章丘王官、临淄后李[20]、青州桃园[21]、烟台白石村[22]、福山邱家庄[23]、栄城河口[24]等。依发掘情况可划分北辛类型、苑城类型和白石类型。

北辛文化的陶器中夹砂陶占绝大多数，陶色以黄褐色为主，陶色不正，均手制。器类以三足器和圜底器为主，器形有鼎、罐、釜、钵、器座和支脚等。器表以素面为主，夹砂陶表面饰有堆纹、划纹、指甲纹和锥刺纹。石器数量较多，磨制，形态稳定。器形有斧、铲、刀、镰、磨盘和磨棒等。大型石铲和无足石磨盘具有代表性。还有相当数量的骨、角、牙、蚌器等。北辛文化时期房屋面积较小，一般 4～6 平方米，超过 10 平方米的极少。墓葬多土坑竖穴，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头东脚西，成年人中流行拔除侧门齿风俗。

北辛文化的来源问题尚处在探索之中。有的意见认为，北辛文化是由后李文化发展而来的。有的同志进一步分析认为，泰山北侧的北辛文化主要来自后李文化，泗河流域的北辛文化则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25]。关于北辛文化的去向问题，已从 1978 年泰安大汶口的发掘中得到解决。78Ⅰ、Ⅳ区⑤～⑧层为北辛文化层，④层为大汶口文化层，由此证明大汶口文化晚于北辛文化；还可以从文化因素分析中证实北辛文化发展为大汶口文化[26]。北辛文化的年代距今 7300 年至 6100 年左右。分期问题的研究现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将北辛文化分为早、晚两期[27]；另一种意见将北辛文化分为三期六段[28]。

关于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问题。北辛文化时期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居址固定，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北辛文化时期多人合葬现象的出现和小型房子的普遍使用，说明整个社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所有制形式已开始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

五

1959年，在汶河南岸的宁阳市堡头村发掘133座墓葬和一座横式陶窑，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陶、石、玉器，其中以红陶为主兼有彩陶的崭新陶器群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只是当时人们还难以确定它的时代[29]。1962年，在曲阜西夏侯遗址发掘中，从地层上明确了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大汶口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30]。

大汶口文化遗址目前发现600余处，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全省及苏北、豫东、皖北地区。经正式发掘的有50余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兖州王因、邹县野店[31]、茌平尚庄、广饶付家和五村、胶县三里河[32]、诸城呈子、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日照东海峪、蓬莱紫荆山、长岛北庄、栖霞杨家圈、枣庄建新[33]、寒亭前埠下等。

大汶口文化陶器颜色从早、中期的以红色为主逐步转向晚期的以灰黑色为主，制陶工艺也在这个转变中完成了从手制到轮制的阶段性飞跃。典型器物有：釜形鼎、袋足鬶、觚形杯、镂孔圈足豆、背壶、高柄杯、彩陶钵和大口尊等。泥质陶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砂质陶器上少数饰附加堆纹和篮纹。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平面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小者面积不足10平方米，大者有超过30平方米的。中期以后发现地面式建筑。墓葬发现总数超过2000座，形制以长方形土坑竖穴为主。葬式繁多，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居多，也有多人二次合葬和一次合葬。中期以后男女合葬墓增多，墓葬规格差别明显，随葬品多少悬殊。大汶口文化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牙习俗。

经测定的大汶口文化^{14}C年代数据有80个，大多在距今6100年至4600年之间。详细推算早期阶段约为距今6100年至5500年；中期阶段约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晚期阶段约为距今5000年至4600年。整个大汶口文化前后延续时间1500年左右。对于大汶口文化的分期，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少意见，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分为三期六段。类型划分有的同志提出，按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划分，即早期阶段的王因、刘林和紫荆山三个类型；中期阶段的大汶口、花厅、呈子、北庄和五村五个类型；晚期阶段的西夏侯、赵庄、陵阳河、三里河、尚庄、杨家圈和尉迟寺七个类型[34]。大汶口文化的源流问题十分清晰，大汶口文化源于北辛文化，对此，1974年和1978年发掘大汶口遗址的结果从地层关系、器物组合和陶器演变等方面提供了证据。大汶口文化演变为龙山文化，已从1973年至1975年东海峪发掘和1974年至1975年三里河发掘地层关系上得到了证实。大汶口文化在当时的东方处于强势，同长江下游地区和中原地区比较，早、中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到了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占了上风。大汶口文化同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原始文化的联系始于早期阶段，自始至终是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

大汶口文化时期，农业和饲养业是主要经济来源，渔猎业退为次要地位。出土的石铲、石镰、石刀、角锄、牙镰、牙刀说明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胶县三里河F201储存了1立方米多的炭化、灰化粟粒，表明当时粮食有了剩余。莒县陵阳河出土饮酒器具——高柄杯占出土器物的百分之四十五，尚酒习俗间接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家畜有猪、牛、狗、羊和鸡，表明当时人们的饮食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大汶口文化时期，手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有制陶、制玉、制骨、建筑和纺织等。白陶鬶和薄胎黑陶高柄杯是制陶业的重要成果。玉、石、骨、角器的加工，采用了截割、琢磨、钻孔、雕刻和抛光等一系列工艺。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和骨、牙雕筒，堪称绝代佳品。

大汶口文化世人瞩目的焦点就是陶尊图像文字问题。目前已在陵阳河、大朱村、前寨、杭头、尧王城等遗址发现八种二十余字。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文字已由更早的独体字演化成复体字，是原始文字日趋发展的时期[35]。有的学者论证羽冠类图像乃“皇”字初文，这是陶尊图像文字研究上的一个突破性进展[36]。关于图像文字的用途，众说纷纭，主要有祭祀说、王权象征说、滤酒图像说和酒神说等等。

从发掘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排列和规格、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看到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男女分工越加明确、家族墓地多被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家庭形态从对偶婚走向一夫一妻制；社会结构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所有制形态由氏族所有制转向家族所有制，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已显露了中国文明的曙光。

六

龙山文化的确立源于1930年和1931年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37]。需要提到的还有1936年对日照市两城镇遗址的发掘[38]。龙山文化的大量发现和深入研究主要是近五十年的事了。

据统计，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已达到1000余处，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近同。经过发掘的遗址已达六十余处，其中重要的有：潍坊姚官庄、曲阜西夏侯、蓬莱紫荆山、邹县野店、泗水尹家城[39]、日照东海峪和尧王城、胶县三里河、茌平尚庄、诸城呈子、临沂大范庄、栖霞杨家圈、临淄桐林田旺[40]、寿光边线王[41]、兖州西吴寺[42]、邹平丁公[43]、临朐西朱封、章丘城子崖（1989～1993年）[44]、阳谷景阳岗[45]、五莲丹土[46]等。

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以色泽漆黑、造型灵巧、种类繁多的黑陶最具特色。蛋壳黑陶高柄杯是中国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作。除黑陶外，还有灰陶和白陶。此时已广泛使用快轮拉坯成形技术，陶胎薄而均匀，棱角清晰。平底器最多，三足器次之。器形主要有

鼎、鬶、甗、罐、盆、豆、杯和器盖等。器表素面磨光，流行盖、耳、流、鼻、鋬手等附件。山东龙山文化的房址，既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房屋形状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面积不大。建筑上采用挖槽筑基的方法。建筑材料上出现了土坯，并采用了错缝叠压垒砌技术。城墙的修建表现了人们改造自然的力量，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城址有：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临淄桐林田旺、阳谷景阳岗、五莲丹土等六处。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已发掘五六百座，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墓葬的规模差别主要表现为：墓室的大小、棺椁的有无、随葬品多少。

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在诸多史前文化研究中占据领先地位。经测定的山东龙山文化^{14}C年代数据已有四五十个，大多位于距今4600年至4000年之间。山东龙山文化的分期，目前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三种意见。山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划分是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而发展的，比较公认的是划分为六个类型，即鲁西北地区的城子崖类型，潍潍河流域的姚官庄类型，鲁中南地区的尹家城类型，鲁东南地区的尧王城类型，胶东半岛的杨家圈类型，鲁西南一带的王油坊类型。如前所述，山东龙山文化源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去向是岳石文化，这在地层学和年代学上都得到了证明。山东龙山文化继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强势，对辽东半岛产生巨大影响，而同中原地区比较早期为相互影响，到了晚期影响则退居次要地位。

山东龙山文化研究中，80年代以后提出了两个新的重要问题：城址问题和文字问题。1930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给考古学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即夯筑城墙的时代问题。1990、1991年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用确凿的层位关系证明，1931年确认的黑陶期城墙，为岳石文化人所筑，并且在岳石文化夯筑围墙之下新发现确有属于龙山文化中期的原始堆筑围墙，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六处山东龙山文化城址除景阳岗为弧边长条形外，均近正方。建筑方式不同、大小面积不一。城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的产物，越来越多的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资料。

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统计表

名　称	地　点	发掘时间	形　状	面积（平方米）	遗　迹
边线王	寿光市边线王村	1984/1986	方形圆角	内城1万 外城5.7万	城门、灰坑
城子崖	章丘市龙山镇	1989/1993	近方形	20多万	房址、水井、灰坑、墓葬
丁公	邹平县丁公村	1991/1993	近方形	10多万	房址、水井、陶窑、墓葬
桐林田旺	临淄区田旺村	1993	近方形	约5万	灰坑、窖穴
景阳岗	阳谷县景阳岗村	1994/1996	弧边长条形	约35万	台基、灰坑
丹土	五莲县丹土村	1996	近方形	约25万	房址、灰坑、墓葬

1992年1月，在整理丁公遗址第四次发掘资料时，发现了一件刻有5行11个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7]。有的学者认为，这11个字笔划流畅、排列有序，记载了一个特定的内容。关于文字系统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是甲骨文、金文系统，有的学者认是古彝文系统。以上问题有待新的材料面世佐证。

龙山文化时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占据主导地位。从目前发现的上千处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可以看出，遗址多位于水源丰富、利于农耕的山前冲积平原和河湖台地上，人们已进入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增多，种类齐全，说明农业生产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马牛羊、鸡犬豕”六畜禽均有发现，养猪业得到了空前发展。狩猎和捕捞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还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冶铸金属业是社会生产力飞跃的标志。山东龙山文化出土铜器地点有胶县三里河、栖霞杨家圈、长岛店子、日照尧王城、诸城呈子和临沂大范庄等六处，龙山文化时期大型墓葬资料可以观察到礼制的倪端。西朱封M202、M203和尹家城M15，墓室面积均为20多平方米，两椁一棺，随葬大量精美陶器和装饰品，是规格最高的等级。西朱封、两城镇和丹土等遗址出土的玉器，反映了墓主人显赫的贵族身分。桐林田旺出土的大型陶甗和城子崖出土的大型陶罍均显示出王者之气。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了“城邦林立”的早期文明社会。

七

岳石文化的遗物虽然早有发现，但一直到1960年平度东岳石遗址发掘时才开始注意“器形以尊、簋、器盖较为突出，具有独特的风格”。岳石文化的确立，得益于1973年泗水尹家城遗址的发掘，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结合上确立了岳石文化晚于龙山文化、早于商代文化的相对关系。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岳石文化发现、发掘和研究的繁荣时期。据统计现已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有二三百处。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泗水尹家城、牟平照格庄、青州郝家庄、章丘王推官庄、菏泽安邱堌堆、平度东岳石等处。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遍及山东全省和苏北、豫东地区，其文化影响达到皖北和辽东半岛。岳石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与历史上记载的夏代纪年基本吻合。

岳石文化的遗物主要是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陶器主要是作为生活用具。夹砂陶以红褐色为主，火候低，多手制。泥质陶以黑皮陶为主，多轮制。器表多素面，只有少量以塑拍、压印、刻划等工艺形成的纹饰。附加堆纹最具特色，施于甗的腰部和裆部。器类较少，流行凸棱和子母口。器形有鼎、罐、尊、豆、舟形器、甗和器盖等。岳石文化时期，青铜冶铸业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水平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数量和种类都在

增多。石器中以半月形双孔石刀、三面(或四面)有刃中间为长方形孔的石镢和扁平石铲独具特色。在城子崖遗址还发现岳石文化时期的版筑城墙，面积17万平方米。大规模的版筑城址和代表新生产力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出现，预示着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孕育之中。

岳石文化的分期、类型和源流问题都在探讨之中。

八

山东是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山东地区的商文化主要是由两种文化因素构成的：一种是中原地区商人文化不断向东推进，以及影响所至的商文化系统；一种是土生土长，具有浓厚地方传统文化特征的土著文化系统。山东地区商文化的科学考古工作始于1955年和1958年对济南大辛庄的两次发掘[48]。随后进行了平阴朱家桥商代聚落遗址(1959年)[49]和青州苏埠屯商代墓地（1965年)[50]的两次重要发掘。进入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山东地区商代考古工作进入高潮。据统计商代时期的遗址和墓地已发现四百余处。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51]、菏泽安邱堌堆[52]、济宁凤凰台[53]和潘庙[54]、滕县前掌大[55]、邹县南关[56]、泗水天齐庙[57]和尹家城[58]、济南大辛庄[59]、章丘宁家埠[60]和王推官庄[61]、邹平丁公[62]、桓台史家[63]、寿光古城[64]和呙宋台、青州苏埠屯[65]和赵铺[66]、昌乐邹家庄[67]、寒亭会泉庄[68]、烟台芝水[69]、长岛珍珠门[70]等二十余处，使我们对于山东地区商文化的分布、文化性质、分期类型和族属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山东商人系统文化的分布范围从早至晚，自西向东不断扩大。早商时期分布大体在现京沪铁路以西或略越过京沪铁路的鲁西和鲁西南地区；晚商时期商人系统文化已侵入潍淄河流域。在山东发现最早的商文化遗存为商代早期偏后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在泗水尹家城、菏泽安邱堌堆等遗址，发现这类遗存直接叠压或打破岳石文化地层。早商时期山东商人系统器物几乎与中原商式器物相同。如济南大辛庄出土的觚、斝、盉和戈等铜器；菏泽安邱堌堆出土的绳纹鬲、假腹豆、平沿簋、大口尊和圜腹罐等陶器。晚商时期，发现了一些规模很大的遗址和墓地。如大辛庄、史家、呙宋台、苏埠屯和前掌大等。从苏埠屯墓地提供的资料分析，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墓葬制度，或是随葬器物的组合与风格，其与河南安阳殷墟晚期墓都相似。

山东商代土著文化，无疑应包含岳石文化晚期延续到商文化波及之前的那一部分，只是由于我们目前工作和研究的局限，暂时还不能说清楚。山东商代土著文化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珍珠门文化。长岛县珍珠门遗址陶器大多为红色或褐色，素面。陶器内部发现泥条盘筑痕迹。器类较少，主要有素面鬲、素面甗、夹砂罐、圈足钵、平底碗和双耳盆等，保存了许多岳石文化遗风。

近年来，山东商文化的分期和类型研究也有了可喜的进展。“济南地区可以大辛庄

商文化遗存的发展序列为代表，分七期。1至3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文化后段，大约与目前所知小双桥商遗存的主要部分相始终；4至7期则与殷墟文化的四期相对应”[1]。说到类型问题，学者们已提到的有：大辛庄类型、安邱堌堆类型、潘庙类型、史家类型和苏埠屯类型等。

在山东商代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及其铭文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等级制度和族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65年发掘的苏埠屯墓地1号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出土有鼎、斝、爵、钺等铜器。引人注意的是两件大型铜钺，钺身饰镂空人面形纹，其中一件两面铸有“亚醜”铭文。1986年发掘的8号墓是一座甲字形中型墓，出土有鼎、簋、斝、觚、爵、卣、觯和尊等铜器三百余件。在十余件铜器上铸有“融”字铭文，发掘者以为是融氏族徽。1983年在寿光城北“益都侯城”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商代铜器，有鼎、甗、簋、爵、觚、提梁卣和尊等六十四件，一些铜器上铸有“已”字铭文，当属纪国之器。滕县前掌大是商代晚期薛国贵族墓地，排列有序。213号墓出土铜器有鼎、爵、觚、铙、斝、甗和簋等，铜器上铸有“史”、“史辛”铭文。该墓地发现的祭祀设施和水井，嵌蚌饰漆牌和牛头形铜面罩，都是极为难得的资料。

九

两周时期，山东地区诸侯林立，国家丛生。经调查和考证确认的诸国故城有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寿光纪国故城、龙口归城故城、滕州滕国故城、郯城郯国故城、莒县莒国故城、莒南向国故城、苍山鄫国故城、泗水卞城故城、邹县邾国故城、平邑颛臾故城和即墨即墨故城等二三十座。

山东两周考古中，临淄齐国故城及其周围地区的工作开始最早、用力最多、成果最丰。齐国故城的系统勘探和发掘是从1964年开始的，现已基本搞清了城址范围、城墙结构、城内布局、大小城关系及年代等问题[2]。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齐国南郊（现临淄区驻地）和田齐王陵区，获得了大批珍贵资料。1984年在齐鲁石化两醇厂，发掘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齐墓321座[3]。1984年至1986年在齐鲁石化厂区发掘东周大墓4座[4]。1990年在临淄齐陵镇淄河店村齐王陵区内发掘东周大墓3座，均为甲字形土坑竖穴墓。其中2号墓，墓口近方形，平面近270平方米，地面起冢。出土文物近400件，计有铜编钟3套、铜钮钟2套、石编磬3套和仿铜陶鼎、簋、敦、壶、盘等。二层台上有一个12具骨架的人殉坑和二十余辆轮、舆分置的马车。车分为“轻车”、“安车”、“栈车”或“役车”三类。墓室北有一大型殉马坑，69匹马东西排列，昂首仰卧。1992年至1993年，在临淄区齐陵镇田齐王陵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勘

探，勘探总面积达500万平方米，新发现有墓道的衬葬墓74座，形制分甲字形、中字形和曲尺形三种，排列大致有序。1996年在临淄区永流乡相家村发掘6座战国大墓，均为甲字形土坑墓，一椁一棺，椁室用大石块垒砌。M1至M4是一组同一封土下的异穴合葬墓，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50～80米。4座墓上部均有夯筑的方形或长方形陵台。M1至M3的陵台东西并列，其上又筑三个圆形丘顶。M1为起冢墓。5座墓中有殉人，出土一批精美随葬品。1990年还在齐国故城东墙外、淄河东岸的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发掘一座大型春秋时期的车马坑。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4米左右。坑内殉葬10辆车，32匹马。其中6辆车车前各摆放4匹马；另4辆车车前各摆放2匹马。车马配套，颇为壮观。车分战车和辎重车两类。车辆已朽，但舆、轮、轴、辕、轭等痕迹依稀可辨。同一辆车的马饰件基本一致，由海贝串连组成的辔头别致华丽。以上发现大大推动了齐文化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曲阜鲁国故城的考古工作自1977年、1978年进行系统钻探试掘以后[75]，1997年又从鲁故城内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中，清理出三百余枚包金铜贝。铜贝分大小两种，齿纹清晰，贝面光滑，金色灿然，为鲁城田野发掘中首见。滕州薛国故城的工作继1984年至1986年发掘之后[76]，于1993年至1994年又进行了复探和试掘，发现小城内还有两座更小的城垣，可能为宫城所在。

80年代以来还在山东其他地区发掘了一批两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1985年在济阳刘台子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77]，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中型墓。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室面积近26平方米。生土二层台，一椁一棺。随葬器物放置于北二层台、椁室北端和棺内。随葬器物近2000件。其中铜器21件，铸有“夆”字铭文的六件。四系瓷壶是山东发现最早的瓷质容器，对研究山东地区西周时期的物质文化和逄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88年在章丘市宁家埠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6300平方米，这是山东首次大面积发掘以两周遗存为主的遗址，也是第一处可划分晚商和两周时代的遗址[78]。1990年在章丘绣惠镇发掘女郎山1号战国大墓，外扩呈甲字形，二椁一棺。二层台上有五座女性陪葬墓。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尤以一套38件彩绘乐舞陶俑极为珍贵，有歌唱俑、舞俑、奏乐俑、祥鸟和乐器。这批陶俑朴素典雅，风格写实；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堪称战国时期的陶塑佳品[79]。1994年在海阳县嘴子前发掘一座春秋时期大墓。该墓土坑竖穴，二椁一棺，椁外用白膏泥填涂。出土铜器、陶器、玉器、石器和漆木器240余件。其中铜盂最大，口径69.5厘米，重36公斤，口沿上刻有7个铭文。最为珍贵的是在二层台上放置的墨漆朱绘木架及悬挂的9件铜编钟。铜编钟音质清悦、音色优美[80]。1995年在长清县仙人台遗址发掘6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邿国贵族墓葬。6号墓规模最大，葬制规格高，随葬器物丰厚，墓主可能为邿国国君。总计随葬铜器、玉器和陶器500余件（套），其中铜礼乐器达108件。有铭铜器7件，其中4件为邿器，为

研究邿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9]。1997 年在济南市段店镇王府庄发掘了一处两周时期的遗址。清理灰坑和窖穴 200 多个、陶窑 2 座、水井 2 口、房基 2 座、墓葬 1 座、灶址 1 座。多数窖穴直壁平底。有的有脚窝、台阶和斜坡式出口；有的用木板铺底；有的内壁平铺一层秸草作为防潮设施。两座陶窑大小相近，箅上分别挖有 6 个和 12 个圆形火眼。出土遗物中尤以三件卜骨较为重要[10]。

一〇

山东地区的汉代考古工作以发掘墓葬为主，比较重要的有：1972 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 4942 枚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出，解译了千年之疑。1970 年在曲阜九龙山发掘的四座西汉大型崖墓，气魄雄伟，是汉代鲁王陵墓。1978 年至 1980 年在临淄窝托发掘西汉齐王墓 5 个器物坑，出土文物丰富精美。其中一件铜方镜高 112 厘米，宽 56 厘米，背饰云龙纹，极为生动。1984 年在临淄区南境与青州市交界的稷山发现一座西汉墓，出土一组罕见的鎏金铜编镈明器，铸造精良。1984 年至 1985 年在齐鲁石化厂区发掘一座东汉大型砖室墓，墓由墓道，东、西耳室，前、后室和回廊组成，出土的陶楼和享堂极为难得。1985 年在齐鲁石化生活区发掘 1700 座汉代小型墓，对汉代墓葬分期具有重要价值。

90 年代以后山东又陆续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1989 年在寿光县孙集镇三元孙清理大、中、小汉墓 158 座。最大的一座（M1）墓葬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全长 43.76 米。1990 年在青州市口埠镇戴家楼发掘汉墓 109 座。1990 年在章丘市绣惠镇女郎山发掘汉墓 47 座。1994 年在沂南县北寨画像石 1 号墓南发掘 2 号墓。墓葬由墓道、墓门和前、中、后三主室及东三侧室（包括一个耳室）、西二侧室组成，是一座砖石混合砌筑的墓葬。墓室外壁南北长 9.1 米，东西宽 8.25 米。出土五龙戏珠三足砚和铜女俑，弥足珍贵。1995 年至 1996 年在长清县双乳山发掘 1 号汉济北国王墓[11]。甲字形墓室依山自上而下凿石而作，墓室、墓道面积近 1500 平方米，墓室深度 22 米，总凿石量近 9000 立方米。该墓为二椁三棺，内、外椁之间有四个边箱。墓内随葬有双辕或单辕，结构各不相同的马车 5 辆。该墓保存完好，出土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和金饼共计 2000 余件。出土玉器以玉覆面和玉枕最为精致。玉覆面由额、颐、腮、颊、颌、耳等部分组成，对称协调，独具特色；玉枕由 9 件玉片、3 件玉板、2 件玉虎头饰和竹板分三层组合而成，结构巧妙，造型新颖。金饼计 20 枚，总重 4200 余克，其中 19 枚个体较大，大多刻有文字，十分难得。1996 年在济南东郊发掘东汉时期砖石混合砌筑墓一座。墓由墓道，前、中、后三主室和东二侧室、西一侧室组成，砖砌拱券室顶。各室间以石门相通，墓室门及各室门石构筑，并雕刻有羊首、卧鹿、虎、鸟及花纹图案。

1997年在寒亭区朱里镇后埠下发掘汉墓108座，其中中型墓57座。墓葬多有斜坡墓道。依墓葬形制不同，可分土坑竖穴墓、砖椁墓、砖室墓和瓮棺葬四种类型。土坑墓填上经夯实，葬具为一椁一棺或单棺。砖椁墓可分为单椁墓、并列双椁墓、并列三椁墓和单椁加边箱等形式。砖室墓可分弧壁单室、直壁单室、前后双室、前后双室带耳室等形式。瓮棺葬则由一釜一盆对扣而成。此墓地对研究西汉时期埋葬制度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一一

山东地区汉代以后的考古工作主要是调查和发掘了临淄大武崔氏墓地，济南马家庄和八里洼北朝墓，临朐冶源5座北朝墓，鲁北地区铜造像，博兴、曲阜、泗水、磁窑、枣庄的瓷窑，山东汉代画像石，邹城明鲁荒王墓等。尤其是1995年在长清县万德镇灵岩寺内发掘了般舟殿和鲁班洞建筑遗址。般舟殿位于灵岩寺院北部，由三期建筑遗迹组成。一期建筑为唐代须弥座式石砌台基，仅作局部清理。二期建筑为宋代晚期至明代的殿堂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系共用一期建筑台基并略作扩大，四周用青砖砌出护墙，增设了阅台。三期建筑为清代早期殿堂建筑，面阔五间，带廊檐的硬山式建筑。鲁班洞位于寺院南部，系灵岩寺早期进寺的山门。建筑为石砌筑券门洞，沿门洞后部两侧的台阶登至洞顶，再由洞顶大门进入寺院。其建筑年代约在隋至唐初之际，后因坍塌时有修建，至清初已湮埋封堵。1996年10月在青州师范体育场清理了龙兴寺一处佛教造像窖藏。造像分三层陈放，东西向。这批造像计有佛像头144件、菩萨头46件、带头残像36件、其他头像10件、造像残躯200余件，以单体造像最多。造像材料分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彩绘泥塑、木等七种质地。造像多有贴金，部分造像彩绘有佛教故事。造像纪年，从北魏“永安二年”（529年）至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时间跨越500年。同出土的还有北宋崇宁重宝铜钱。

（执笔：佟佩华）

注 释

① 徐淑彬：《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6年4期；吕遵谔等：《山东沂源猿人化石》，《人类学学报》1989年4期。

② 徐淑彬等：《山东沂水县南洼洞发现旧石器》，《考古》1985年8期。

③ 《山东长岛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光明日报》1988年9月15日。

④ 戴尔俭、白云哲：《山东一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1期。

⑤ 黄蕴平：《沂源上崖洞石制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1期。

⑥ 尤玉柱等：《山东日照沿海发现的旧石器及其意义》，《人类学学报》1989年2期。

⑦ 李步青：《山东蓬莱县发现打制石器》，《考古》1983年1期。

⑧ 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考古》1983年5期。

⑨ 韩榕：《郯城县黑龙潭旧石器时代遗存》、《临沂市青峰岭细石器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泗流域发现的一批细石器》，《考古》1993年8期。

⑪ 济青公路文物工作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2期。

⑫ 关于文化命名问题，参加后李遗址发掘的同志于1991年8月提出以"后李文化"命名。有的同志鉴于西河遗址最具代表性，提出暂且以"西河类型"统之。还有的同志认为应直接称之为"西河文化"。

⑬ 佟佩华、魏成敏：《章丘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94年2月20日。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县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1期。

⑮ 伍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10期。

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1期。

⑰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6期。

⑱㉘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邹平苑城西南庄遗址勘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11期。

⑳ 济青公路文物工作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㉑ 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新石器遗址调查》，《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㉒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7期。

㉓㉔ 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韩榕：《胶东史前文化初探》，《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㉕㉖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3期。

㉗ 郑笑梅：《试谈北辛文化及其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㉙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㉚ 济青公路文物工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12期。

㉛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㉝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枣庄建新》，科学出版社，1996年。

㉞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与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㉟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2期。

㊱ 杜金鹏：《论临朐朱封龙山文化玉冠饰及相关问题》，《考古》1994年1期。

㊲ 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1934年。

㊳ 南京博物院：《日照两城镇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㊴㊽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㊵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勘探发掘资料。

㊶ 《山东发现四千年前的古城堡遗址》，《人民日报》1985年1月3日。

㊷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㊸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
㊹ 张华：《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㊺ 陈昆麟、孙淮生：《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
㊻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勘探资料。
㊼ 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文字》，《中国文物报》1993年1月3日。
㊽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4期；《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11期。
㊾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2期。
㊿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
51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茌平县南陈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
52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菏泽安邱堌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1期。
53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凤凰台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2期。
54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2期。
5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年3期。
56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3期。
57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泗水天齐庙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94年12期。
59 徐基：《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6期。
60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章丘宁家埠遗址发掘报告》，《济青高速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书社，1993年。
6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王推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1期。
62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5期；《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6期。
63 光明等：《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5月18日。
64 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3期。
6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66 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赵铺遗址的清理》，《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67 昌乐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昌乐县邹家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5期。
68 刘延常：《潍坊会泉庄遗址考古发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25日。
69 张江凯：《烟台芝水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
70 严文明：《山东长岛县史前遗址》，《史前研究》创刊号，1983年。
71 徐基：《山东商代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22日。
72 75 详见山东省博物馆：《三十年来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73 74 76 详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7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12期。
78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章丘宁家埠遗址发掘报告》，《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书社，1993年。

⑲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章丘绣惠女郎山一号战国大墓发掘报告》，《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书社，1993年。

⑳ 烟台市博物馆等：《山东海阳嘴子前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9期。

㉑ 任相宏等：《山东省长清县仙人台发现周代聚落与古邿国贵族墓地》，《中华文化画报》1996年5期。

㉒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德高速公路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1日。

㉓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3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为文物大省的河南，五十年的经济建设为文物考古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五十年来河南发掘出来的大量遗迹和遗物，已经为人民所享有和应用，以极其珍贵的科学资料，组成了一部形象的河南社会发展史。

一

1978年9月，在南召县云阳镇附近的杏花山下，发现了一颗猿人右下第二前臼齿化石。根据伴生的动物化石及地层等综合分析，云阳猿人化石的地层时代为更新世中期，大致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这是我国继在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云南元谋、湖北郧县和郧西等地发现猿人化石之后，又一重要发现①。

1973年秋，在淅川县收购13枚猿人牙齿化石，又一次证明古人类长期生活在豫、鄂、陕三省邻接的广大地区内。我们有理由期望今后在这里发现更多的猿人化石②。50年代曾在三门峡附近采集到1枚古人类的臼齿化石③，显示豫西一带确有古人类化石的存在。1979年，在豫西卢氏县横涧乡的锄钩峪，发现更新世晚期的智人化石，其中包括4块头骨残片和2枚牙齿，距今约10万年。这是河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④。

此外，在灵宝朱阳、东坡、营里，陕县侯家坡、张家湾、赵家湾、仙沟、三岔沟、三门峡水磨沟、会兴沟，渑池青山、任村，汝州张湾，伊川穆店，西峡赵营、莲花寺岗、冢岗、土门、小沟岭、西沟岗、龙头湾、大沟口，镇平叶湾、石羊岗，南召杏花山，确山打石山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⑤。在灵宝孟村、函谷关，三门峡工官沟，洛阳凯旋路，渑池南村，卢氏段家窑，内乡马山口，镇平八里庙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⑥。在南召小空山，灵宝邢家庄，巩义南河渡，荥阳织机洞、蝙蝠洞，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舞阳大岗，新蔡诸神庙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⑦。在上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中，出土有各类石器、石核、石片和动物化

石、扩大了我国旧石器分布的地域，成为认识和研究北方与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关系的重要环节。

在河南调查或发掘的上千处各类新石器时代遗址，展示了中原地区在原始社会晚期的繁荣景象。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1958年春，在漯河翟庄曾发现石磨棒、锯齿镰、红陶三足钵，这是首次发现的中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物。1959年，在偃师马涧沟发现有石磨盘和石磨棒。到了六七十年代，在新郑和密县等地发现更多的石磨盘及石磨棒。直到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才弄清了裴李岗文化的特殊面貌。

1977年春以来，在新郑县裴李岗村西的双洎河湾高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发掘出一批窖穴、墓葬和陶窑；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多是火候较低而又质松易碎的红陶，形制也较特殊，包括附有弯月形耳的球形壶、筒形罐、高足碗形鼎等；石器磨制精致，具有固定造型，如四足鞋底形石磨盘、圆柱形石磨棒、两端均磨有圆弧刃的石铲、锯齿状石镰、断面呈椭圆形的石斧等，也有少量的打制细石器；此外，遗址内还出有猪、羊骨骼和陶猪、陶羊等原始艺术品[8]。

密县莪沟北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又一重要发现。除了发掘出房基、窖穴、墓葬和陶器、石器之外，还出土有麻栎、枣、核桃等果核，以及猫骨、鹿角和其他一些兽骨。其中最难得的是一件陶塑老人头像，扁头方脸，前额较平，粗状的眉脊左右相连，宽鼻深目，下颏前突，口和眼是剔出来的，形象生动，是珍贵的艺术品[9]。

长葛石固遗址的发掘，找到了仰韶文化层和裴李岗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从出土陶器上看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从而可以推断仰韶文化溯源于裴李岗文化[10]。

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一批距今8千年左右的契刻符号，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其中有的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还出土一些7孔骨笛，已具备七声音阶结构，现仍可吹奏出旋律。这里还发现有当时人工栽培稻，显示了中原地区稻作的历史是多么悠久。这些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1]。

到目前为止，在河南中部的新郑、郑州、荥阳、密县、巩义、登封、中牟、杞县、尉氏、汝州、郏县、许昌、禹州、长葛、鄢陵、扶沟、西华，南部的叶县、舞阳、方城、漯河、郾城、驻马店、上蔡、正阳、新蔡、项城、信阳、潢川，西部的洛阳、偃师、孟津、渑池、嵩县、卢氏，北部的新乡、孟县、辉县、济源、淇县、浚县、安阳、汤阴、林州等县、市，调查发现120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其中以新郑、密县、长葛、许昌、汝州、鄢陵和舞阳等地较为集中。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以及豫中、豫南的黄淮平原地区。此外，在豫北太行山东麓和豫南大别山北麓也有少量发现[12]。从出土的细石器看，尽管还有某些缺环，但裴李岗文化可能来源于灵井

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它大大丰富了对我国原始文化的认识，为研究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陶器的起源和发展，纺织的起源和发展，建筑的起源和发展，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是在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上一次重要的突破。

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的研究是我国考古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仰韶文化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发展和当时不同族属文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解体甚至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门槛的时期。建国以来，河南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约800处[13]，分布地域遍及全省，尤以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最为集中。这些仰韶文化遗址，主体面貌相同，但又有时间先后和地域差异，考古学者把它们大致划分为豫西的庙底沟类型、豫中的大河村类型或秦王寨类型、豫北的后冈类型和大司空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14]。

著名的渑池仰韶村遗址，除1921年进行过发掘之外，在1951年和80年代初期，又两次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早中期的四层叠压，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其中包括精美的彩陶[15]。被人们称为考古圣地的仰韶村遗址，现已建立了遗址博物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2年春，在郑州市北郊大河村，发现了一处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一组4座相连的房基，部分墙壁还高达1米左右。房基内还出土有20多件陶器，其中以白衣彩陶钵和双连彩陶壶最为精致。大河村遗址还出土2000多件彩陶，纹饰达30多种，尤以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和日晕纹最引人注目，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非常珍贵的[16]。

在汝州阎村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陶器中有一件夹砂红陶缸，腹部一侧绘有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陶画——“鹳鱼石斧图”。在淡橙色的陶缸外壁上，用深浅不同的棕色和白色，绘出一只鹳鸟口衔一条大鱼，其旁立着一件带柄石斧，画面显得十分明快。这是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活画，也可能是一幅古老氏族的图腾图，又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画面最大、内容最丰富、技法最精湛的彩陶画，是迄今所发现同时代的其他绘画所不能比拟的。这不但给我国美术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而且也为研究原始社会的生活，探索当时氏族部落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新资料[17]。

在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龙身长达1.78米，昂首拱背，身子弯曲，前爪扒，后爪蹬，尾尖摇摆，动感很强。这不但要比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陶盘上彩绘龙的时代早，而且形制巨大，活龙活现，形象生动。这罕见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华夏第一龙”[18]。

近年在汝州洪山庙发掘出目前我国最大的一座仰韶文化瓮棺葬。墓坑东西长6.3米，南北宽3.5米，坑内置有136件瓮棺。除少量幼儿瓮棺外，多为成年人的大型瓮

棺。作为瓮棺的陶缸，不少有彩绘图案，包括人形纹，鹿、龟、鸟等动物形纹，勾叶等植物形纹，太阳、月亮等天象纹，各种几何纹，个别陶缸外壁还堆塑有壁虎的形象。这些均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9]。

1992~1995年，在郑州西山发掘出一座仰韶文化城址。包括夯土城墙、城门、道路、房基、墓葬，出土3000多件各类文物。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左右，这把我国已发现古城的年代提早了一千年，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中原地区在我国早期文明发展史的地位，都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价值[20]。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龙山文化以1928年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21]。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在30年代初首次发现于安阳后冈，迄今，河南各地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近千处[22]，可以说遍布全省。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地域辽阔，内涵有差别。主要可以划分为豫西伊洛地区的王湾类型，豫北的后冈类型，豫东的王油坊类型[23]。

龙山文化的分布比仰韶文化更为广泛，而且往往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在安阳后冈，汤阴白营，濮阳马庄，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24]，灵宝城东寨，洛阳王湾[25]，偃师灰嘴[26]，汝州煤山，禹州瓦店，荥阳河王，郑州旭旮王[27]、牛寨和二里岗，永城王油坊等不少地方，都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和瓦解，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76~1977年，在汤阴白营发掘了一座龙山文化的村落遗址，发现房基40多座，纵横排列成行，大致有序。房基形状多为圆形，供人居住用的白灰面地坪上下叠压有9层之多。在白灰面下的房基底部，还发现有许多清晰的夯印，说明在建筑房基过程中使用了夯打技术。这种在一处居住遗址内密布着许多小型房基的现象，可能是与当时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逐步确立相适应的。同时发现有井字形木框架的水井，这对当时人们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28]。

1977年，在永城王油坊发掘出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中10多座房基的地坪也采用了夯打技术，并有烧灶和用褐硬土或碎陶片筑成的巢状柱础；墙基大部分保存完好，有些墙的里侧部分，用长40、宽20、厚10厘米的褐色草泥土坯砌成。每层土坯都是相间压缝，缝间用黄泥粘合，这和现在用砖砌墙的方法相似。夯筑地坪和土坯砌墙都是建筑上出现的新技术，对我国后世的建筑，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遗址内还出土有精美的白陶器和黑色磨光蛋壳陶，反映了当时较高水平的制陶工艺[29]。

70年代和90年代，先后三次在汝州煤山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出数十座房基，多为2间或多间的连间房子，有些还成排分布。其附近还有一些陶窑、水井和窖穴。同时还发现墓葬20多座，有的墓内随葬10多件陶器。出土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附有铜液的坩埚残片，说明当时已经冶铸青铜器[30]。

1977年，在登封告成镇的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城址。西

城保存较好，其东墙亦即东城的西墙，东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水冲毁。在城内发现有夯土建筑遗存和填埋2～7具人骨架的多处夯筑奠基坑，还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城址的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之内；城址的地望近于“禹居阳城”、“禹都阳城”、“夏都阳城”的范围。因此，王城岗城址的考古发现，对探索夏王朝统治中心区域的文化，可算是一次突破[31]。

豫东偏南的淮阳县，是传说中的“太昊之墟”。近年来在淮阳东南的平粮台，发现了一处和登封王城岗同样古老的城址。古城呈方形，周长约740米，现存城墙高3米多。在南北城墙的正中各有一座城门，城门有10多座高台建筑，并出土有铜渣等冶铜遗物。更令人惊叹的是发现有多处陶排水管道，每节管道均为直筒形，细端有榫口，可以进行套装。管道城内部分较高，宜于向城外排水。在4000年前就能出现初具规模的城市排水系统，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平粮台古城位于夏王朝所控制的东部边陲地区，这里也是商部族活动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濮阳平粮台古城的发掘，对探索夏文化和先商文化是相当重要的[32]。

近年来，在郾城县郝家台又发现一座距今4000年前的古城址。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64米，四个城角保存较好。在城内发掘出成排的房基，有的还铺有木地板[33]。

1992～1994年，在辉县孟庄发掘出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16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城墙、护城河、城门、房基、窖穴等遗迹，同时还发掘出相重叠的二里头文化城垣和殷商文化城垣，反映了龙山文化以来这里长期的繁荣。这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历程有重要意义[34]。被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上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的演变上，显示了二者的承袭关系，即河南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过渡发展而来的，是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

大汶口文化是以1959年在山东泰安发掘大汶口遗址而得名[35]。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山东和苏北一带。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可追溯到50年代荥阳点军台、郑州林山寨、信阳阳山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而首次发现成组的大汶口文化器物，则是1962年在偃师滑城遗址清理的1号墓。此后，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分别在永城洪福，虞城营廓，夏邑三里堌堆，鹿邑栾台[36]，郸城段寨[37]、展庄户、丁寨、汲冢，沈邱黄花城、东冢，项城高寺，淮阳平粮台、范丹寺、蒋台寺、三里堂、磨旗店，太康方城、槐寺，扶沟梅桥，商水章华台[38]、大郜、宋王，周口水灌台、烟草公司仓库[39]，西华陆城、小白庄、瓦屋赵、前柳城，禹州谷水河、瓦店，鄢陵古城，新郑唐户，郑州大河村，平顶山寺岗[40]，汝州大张、北刘庄，洛阳矬李，偃师二里头、南寨，孟津寺河南，上蔡十里铺、段寨、钓鱼台、蟾虎寺、晒书台[41]，固始刘楼，潢川霸王台，淮滨沙冢、唐河湖阳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存，在上述遗存中，发掘出大汶

口文化的窖穴和墓葬，出土有白陶鬶、褐陶鬶、高柄镂孔杯、高柄杯、觚形杯、长颈壶、宽肩壶、背壶等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典型器物。其分布范围已达豫西、豫南地区，涵盖黄河以南的商邱、周口、许昌、平顶山、郑州、洛阳、南阳、信阳、驻马店等九个市、地，其中心地区则是颍、涡河流域的周口和商邱。在有些遗址内，除大汶口文化遗存之外，还发现相当数量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堆积。河南大汶口文化遗物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期，这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三者之间相对年代的发展序列找到了证据，也为研究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屈家岭文化是以1955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发掘而得名[42]。主要分布于长江和汉水流域。河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遗存是自5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的，至今已发现近140处之多。重要的有淅川黄楝树[43]、下王岗[44]、下集[45]、双河镇、李家庄，西峡杨岗，内乡茶庵、朱岗，邓州太子岗、八里岗，新野凤凰山，镇平赵湾、冢上寺，唐河寨茨岗[46]，社旗谭岗、茅草寺，方城平高台，南阳黄山，南召竹园，遂平杨台寺，正阳王家冢，桐柏陡坡嘴，泌阳三所楼，信阳阳山，光山徐畈，息县秦楼，上蔡十里铺，禹州谷水河，郑州大河村等。主要集中在南阳地区，在豫南和豫中也有发现。其分布范围由湖北到豫西南，并扩大到颍河、汝河和洪河上游，甚至到达黄河南岸。

在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出25座屈家岭文化的房基，都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地上建筑，有些为单间房子，也有些为双间房子，均有木骨泥墙和白灰面地坪。还发掘出许多各种形制的灰坑和多座土坑墓及瓮棺葬。出土了一大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装饰品等遗物。其中以折腹镂孔高足陶杯、蛋壳黑陶塔式高足杯、彩绘陶壶最为精美。而总数达263个的陶纺轮，有角边的、弧边的、折边的，有平面的、鼓面的，有红色的、灰色的、黑色的，不少还彩绘有各种图案，这在同类遗址中是罕见的。石杵和石臼是加工稻谷的工具，显然要比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石盘棒进了一步。在其他遗址如淅川下王岗遗址、南阳黄山遗址等也都有许多重要发现。河南境内诸多的屈家岭文化遗址，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文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邓州八里岗遗址的发掘，自1991～1997年在这里发掘出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包括有一批小型圆形房子和大型长方形联间“长屋”，以及灰坑和许多墓葬。其上层还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反映了这一系列文化在这里的消长、取代和变迁[47]。被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以山东为主体的大汶口文化和以湖北为主体的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在同一个省发现，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分布都深入到河南境内，并在河南中部地区交汇，对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三

从1956年开始，陆续在郑州、巩义、偃师、洛阳、三门峡、汝州、登封和禹州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重点发掘，对探索夏文化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除了前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等地发掘的龙山文化城址，以及30年代在安阳后岗[48]所发现的龙山文化古城与夏代早期有关之外，同时还找到了早于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一种新型文化——二里头文化，这是探索夏文化所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二里头文化源于1959年发掘的偃师二里头遗址[49]。整个遗址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寨后和辛庄5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曾发掘出宫殿基址、灰坑、墓葬，出土有一批青铜器和玉器。在豫西、豫东、豫南、陕西东部、晋南、湖北等地也有发现。河南境内著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登封王村、郑州洛达庙[50]、偃师灰嘴[51]、陕县七里铺[52]、渑池鹿寺[53]和郑窑[54]、洛阳矬李[55]及东干沟[56]、巩义稍柴[57]和小芝田、汝州煤山[58]、密县新寨[59]、济源庙街等。二里头文化延续较长，可分为一、二、三、四期。从其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形制变化看，上溯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下推发展为郑州二里岗文化，联系紧密，中间没有缺环。学术界对于夏文化上限和下限看法不一，但对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这一点上，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二里头文化对探索夏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商代考古的发现，历来是河南考古的重头戏。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的发掘，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考古的辉煌。如今河南商代考古的发现，比之过去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80年代初，在偃师县城西1公里处的尸乡沟一带，找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700米，东西宽约1200米，四面城墙尚基本完整，城墙外侧还有城壕，城南有宫城和府库基址。1997年夏，在偃师商城中部和南部，新发现了一座时代更早一点的小城，其南墙、西墙南段和东墙南段均与偃师商城（可称为大城）城墙重合，大城城墙是在小城城墙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夏商时代文化分界的界标，也很可能是汤都"西亳"。这大大开阔了夏商考古的视野，为我国古代文明和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60]。

1950年秋，在郑州东南郊二里岗发现商代文化遗存[61]，经过多次调查，证明商代遗址遍布整个郑州市区，面积达25平方公里。在多年的发掘中，发现有商代的房基、窖穴、壕沟、水井、墓葬和祭祀坑等遗迹，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原始瓷器、刁刻字骨和陶文符号等遗物[62]。1955年在遗址中部，又发现一座周长近7公里的

商代城垣。在郑州商代城南北城墙外，各发现一处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63]；西城墙外发现有一处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64]；在北墙外还发现了一处制作骨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65]。在西城墙外地面下近6米深处，出土了2件大型铜方鼎[66]；在东南城角外侧，出土了13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包括2件大型铜方鼎和1件大型铜圆鼎。造型浑厚，纹饰华美，气势磅礴，实为商代奴隶们的不朽杰作[67]。在西城墙中段外侧，出土了12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包括4件大型铜方鼎。上述三处青铜器窖藏坑可能是祭祀的遗存[68]。在城内北部和东北部，还发掘出三座大型宫殿遗址[69]。在宫殿区东部，还发掘出蓄水池和石砌输水管道等贮水设施。郑州商城很可能是"帝仲丁迁于隞"的隞都。1959年7月，郭沫若同志曾亲笔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题《颂郑州》一诗，诗中就写郑州商城可能是隞都[70]。

近年在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处的小双桥，发现有属于郑州商城晚期的王室祭祀遗址。出土有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建筑构件、多座牛头（角）祭祀坑等[71]。在郑州商城南墙外700～900米处，发现残断夯土墙约5000米，这是郑州商城的外城墙，反映了郑州商城的巨大规模[72]。郑州小双桥商代祭祀遗址的发掘，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安阳殷墟是闻名中外的商代晚期都城，建国后进行了多次发掘和研究。1950年春，在殷墟武官村发掘了一座大墓[73]；墓内出土有贝、玉、绿松石、骨器、虎纹石磬和大量的青铜器。墓内还殉葬79个奴隶。大墓南侧还有一大批祭祀坑[74]。1976年发掘了191个坑，清理出杀祭的人牲不下1200人。1976年夏天，在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了一座大墓。墓内殉葬有16个奴隶。出土青铜礼器有210件，大多成对成套。不少铜器上铸有"妇好"或"司母辛"的铭文。据甲骨文记载，妇好是武丁时的一员女将，武丁的配偶中有谥号"妣辛"的，墓主就可能是妇好本人。这是目前唯一能与文献联系推定墓主的一座殷王室墓葬。对探讨商代奴隶主阶级的礼制、订证殷墟大墓及青铜器的年代、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75]。安阳殷墟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甲骨文了。这些刻在龟甲牛骨上比较成熟的文字，记载了殷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1971年在殷墟发掘出3组21片作占卜用的完整牛胛骨，其中10片有刻辞，最多的1片达60个字，是关于殷代王室祭祀的记载；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4800多片甲骨文，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等。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1991年9月，在殷墟花园庄东100米处，发掘了一个甲骨坑，已经清理出甲骨856片，其中完整卜甲有300多版，上刻卜辞的整甲有90多版，上刻1～2字或数十字或200余字，内容涉及祭祀和田猎等，对研究甲骨文分期及殷商历史都有重大价值[76]。值得一提的是，在殷墟郭家庄发掘160号商代墓，出土青铜礼器40件，方形器数量较多，器表均有精美的纹饰和族徽文字，还有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

工具，220 件青铜兵器和 900 多枚铜镞，以及一批陶、玉、石、骨、牙、竹器。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武将。该墓被评为 1990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77]。1989 年，在殷墟宫殿东南，又发掘出一座平面呈凹字形有缺口向东的大型宫殿基址，由三排房基组成，其建筑结构十分罕见。这对殷墟建筑群的再认识和商代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这次发现也扩大了殷墟宫殿宗庙的范围。与郭家庄 160 号商墓一起，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78]。

1979 年和 1980 年，在罗山县后李村，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出土 200 多件青铜器，大多保存完好，甚至很少锈蚀，熠熠闪光。有些铜器上还铸有“息”字的族徽，这很可能是商代息国贵族的墓地。息国是商朝偏南的方国之一，而且还与商王室通婚，与长江流域的方国部落又有一定联系。从研究商文化的地域类型来说，后李商墓的发现无疑是十分难得的[79]。

1997 年 11 月，在鹿邑太清宫镇发掘一座商末周初之际的中字形大墓，出土各类遗物千余件。一些青铜器上铸有“长子”、“长子口”、“戈丁”等铭文，说明墓主应是“长子口”。太清宫一带商周时属厉，长子口可能是派往厉地驻扎的高级贵族。鹿邑位于豫东，是商末伐人（夷）方的必经之地，商周时期大墓还是首次发现。这对研究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关系及豫东古文化发展序列有重要价值[80]。

解放前，河南西周考古工作，只在浚县辛村做过一点。建国之后，在洛阳北郊、郑州董寨、信阳出山店和浉河港[81]、鲁山仓头[82]、上蔡田庄[83]、鹤壁庞庄[84]、淮阳泥河湾[85]、南阳北郊[86]、泌阳前梁河[87]、新郑端湾[88]、襄县霍庄[89]和平顶山滍阳[90]等地，发掘过西周的墓葬和遗址，出土了很多铜器和其他文物。

1964 年，在洛阳北郊庞家沟发掘了 300 多座西周墓葬，出土一批青铜器、瓷器和陶器。在 401 号墓内一件陶豆下面有嵌蚌泡漆器托，把我国漆器镶嵌工艺提前到西周早中期，要比信阳长台关 2 号楚墓所出的嵌玉木漆凭几还要早 3～5 世纪。1976 年，在洛阳老城北郊，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西周前期青铜器铸造遗址，面积约为 28 万平方米。已经发掘出多座房基、3 座烘范窑、窖穴、地下水管道、路土等遗迹；还有大量的红烧土块、木炭灰烬、陶泥范块、熔炉残壁、铜渣等遗物。在出土的范块中，有爵、鼎、簋、罍、尊、卣、觚等范块，还有一些车马器范和兵器范。从出土的熔炉残块中可以计算出熔炉的最大径为 1.8 米。在遗址中还出土数十块卜骨和卜甲，在不少大型窖穴中几乎都发现有乱葬在灰层中的奴隶尸骨。有的双手捆束在胸前，有的作跪状。这种现象表明，在浇铸青铜器过程中可能还要占卜和祭祀。洛阳是西周的陪都，周成王曾派召公和周公营造洛邑。这处遗址应是营造洛邑时迁殷代的“百工”奴隶所建的。从汉代以来，我国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很多，解放后又不断有重要器物出土。但像这样大型的西周青铜器铸造遗址却还是首次发现[91]。

平顶山发掘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应国墓群，时代由早及晚、自南向北分布在一条土岭上[30]。如偏南的84号墓，为西周中期的长方竖穴土坑墓，出土铜、陶、瓷、玉各类随葬器100多件。其中青铜礼器有鼎、甗、盨、卣、爵、觯等，都铸有5～28字的铭文，均有“应侯”字样。这当是西周中期应国某一代应侯之墓。位于土岭中段的38号墓，出有多件青铜礼器和多套青铜乐器，以及青铜铠甲、车马器、玉器和陶器等。铜器上有“应姚”作器字样。应姚所作之器，过去多有发现。表明这位姚姓妇人在西周晚期应国政治舞台上较为活跃。位于偏北的45号墓是春秋早期的应国贵族墓，出土有一大批青铜礼器，不少铸有铭文。如鼎铭为“应申姜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可知墓主人为嫁到应国的申国女子。过去这里出土有两件表明邓国女嫁于应国的铜簋。说明西周春秋之时，比较弱小的应国和与之相邻的申国、邓国由于唇齿相依的关系，为共同防御南面强大的楚国，用联姻的方式而结盟。这些发现对建立应国考古学编年有重要意义。平顶山应国墓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56～1957年，在三门峡上村岭发掘了一处虢国贵族墓地。共有200多座墓和3座车马坑、1座马坑。出土了一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乐器和杂器，以及陶器、玉器等。1052号墓规模最大，出土各种文物近千件。其中有两件戈铸有“虢大子元徒戈”的铭文，证明墓主人是虢国太子。有几座大墓内均发现有用鸡血石和玉石制作的串饰和项链，精美异常，鲜艳夺目[31]。近年来再次发掘的三门峡虢国王室贵族墓地，又是中国两周考古的重要收获。2001号大墓，出土各类珍贵文物3200多件，包括玉茎铜芯柄铁剑、金腰带饰、缀玉面罩和成组玉佩饰等，尤为珍贵。铜器铭文中均有“虢季”字样，当为一代虢国国君之墓[32]，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9号大墓，随葬遗物更为丰富，仅青铜礼器就有200多件，铭文多有“虢仲”字样。玉器有800多件（套），除缀玉面罩、成组玉佩外，还有罕见的墨书玉片，及一批玉象、虎、豹、鹿、龟、牛、鱼、鼠、蜻蜓和蜘蛛等。这也是一座虢国国君之墓[33]，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三门峡当为北虢所在。公元前655年，晋灭北虢。因此，三门峡虢国墓地有明确的年代下限，这对研究两周之际的虢国文化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也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期。当时列国分立，而作为防御工事的城郭也就日益普遍，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愈加扩大，各国的都邑更是如此。

新郑县境内的“郑韩故城”分为东西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1923年，城内李家楼发掘春秋大墓，出土一大批“新郑彝器”，其中包括著名的莲鹤方壶。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在这里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初步弄清了东城和西城的范围、城墙的建筑结构、宫殿区、墓葬区以及铸造铁器、冶铸铜器、烧制陶器、磨制

玉器、制作骨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情况，并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95]。应该提及的是，在东城白庙范村发现了一个战国兵器窖藏坑。出土戈、矛、剑等青铜兵器180多件，其中不少还有铭文，内容有地名、官名和纪年等，对研究战国时期韩国的地理、文字、冶铸、官职、兵器形制和铸造工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97]。近年来，在郑韩故城连续发掘出一批青铜器窖藏坑和乐器窖藏坑，出土属于春秋时期郑国各种青铜器达334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98]。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77～1978年，在登封告成北面的漫平高地上调查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城垣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700米，北墙保存完好，高达8米左右。城内发现有砖铺地面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贮水设施和输水管道。还有大量的板瓦、筒瓦、陶豆、陶盆、陶盂等，在一些陶器上印有“阳城”的戳记和其他陶文，这对确定古阳城的位置，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资料[99]。在阳城南墙外，发掘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铸铁遗址。出土了一些印有“阳城”戳记的陶量，还有残铁器、残炉壁以及大量的陶范。根据这些遗物可以复原五种类型的熔铁炉。在陶范中有一种卧式层叠铸范（带钩范），一合可铸20个，两合为一套，可铸40件。这就找到了汉代层叠铸造的渊源[100]。

1957～1958年，在信阳长台关先后发掘了两座楚国大墓[101]。以1号墓为例，这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大型木椁墓。全墓共分主室、前室、北侧室、南侧室、后中室、后北室、后南室等七部分，都是用方木扣合而成，是研究我国古代木构建筑难得的实物例证。该墓出土了800多件文物，其中有一套13枚完整的铜编钟，经测定音律相当准确。乐器中还有瑟和鼓。木漆器也很精致，数量多达200多种。还出有墨书竹简，一组置北侧室，有28根，共约1000余字，是记载随葬品的种类、名称和数量的“遣策”；另一组放在前室，已成残简断片，仅存500多字，可能是记载死者生平的竹书。这对研究我国历史和古文字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1976～1979年，在淅川下寺发掘出一处春秋楚国贵族墓群，包括26座墓葬和5座车马坑。出土大量的青铜礼器，不少还带有铭文[102]。其中有一件铜禁，为青铜器中之上品。其铸造使用了失蜡法溶模工艺，我国以前发现最早的失蜡法铸件为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淅川下寺的考古发现，又把我国使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的历史提早了一个多世纪。还出土有一批精美的乐器，包括铜甬钟、编钟、镈钟和石磬、石排箫等，其中铜甬钟一套26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

1991～1992年，在淅川丹江库区发掘出多座大型楚国贵族墓葬，出土有许多青铜礼器。其中有一对近似于夔的铜神兽，通高0.48米，为龙首、虎颈、虎尾、龟足。龙张口吐舌，头上有六条蛇形龙。神兽背上有座，座上又有另一奔驰状怪兽，为龙首并有双角，口中又衔一条蛇形龙。神兽通身镶嵌绿松石，组成龙、凤、涡纹等纹饰。从外观上看，可能是一对悬鼓用的鼓架。还出有一批玉器，也是精妙无双的珍品[103]。被评为

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78年在固始侯古堆发掘一座春秋晚期的大墓，墓主人系一女性，据墓内铜器铭文看，当为宋景公之妹季子（勾敔夫人）。墓内殉葬17人，亦多为女性。除常见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之外，还出土了3乘肩舆（即抬轿），制作极为精致。是东周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14]。

近年在淮阳马鞍冢，发掘出两座南北并列的楚国晚期大墓，早年虽被盗窃一空，但其西的两座车马坑却保存完好。靠南的一座，南北长40米，东西宽4.72米。埋有23辆车，20多匹泥马。车的位置不乱，铜、铁构件也很齐全，有的车箱上还镶着许多方形铜片，可谓最早的装甲车。还发现6面旌旗，其中一面用大量海贝镶成朵朵梅花装饰，非常罕见[15]。

1983年4月，在光山宝相寺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墓为双椁并列，出土文物丰富。一些青铜器上铭文，有“黄君孟”、“黄夫人孟姬”字样。说明墓主人是黄君孟和他的夫人孟姬。不少玉器也很精美。墓内随葬的竹排箫和绢类丝织品，在河南还是首次发现。这座黄国国君墓葬年代明确，为研究春秋早期江淮地区小国君主埋葬的棺椁制度、服饰和随葬物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88年6月，在光山城关镇砖瓦厂发掘春秋时期黄季佗父墓，这是一座黄国的贵族墓葬。出土一批比较精致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和俑器，铜戈上有铭“黄季佗父之戈”。还出有罕见的金属弹簧形器，应是目前国内最早的发现[16]。

1950～1952年，在辉县琉璃阁、赵固和固围村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铜器。其中有宴乐射猎纹铜鉴、云雷纹铜壶和马头形的错金车挽饰。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一件包金镶玉银带钩了，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首，两侧蟠绕着两条夔龙，倒向钩端，合为一首，口中衔一雕琢细致状若鸭头的白玉弯钩。与两侧夔龙相反方向，还饰有两只鹦鹉，脊背正中，嵌入三块白玉块。前后两块的中心，还各嵌一个色调复杂的料珠。这种纹饰繁缛、剔透玲珑、包金镶玉、五色相宜的带钩，确实可以代表当时工艺技巧的最高水平[17]。

1982年，在汤阴五里岗发现4000多座战国墓。死者多为男性青壮年，有的尸骨上穿有铜镞，有的带明显的刀砍痕迹，好像是一批战死者。公元前259年，魏相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这场战争激烈，延续时间较长，双方伤亡惨重。推测这批墓很可能是当时阵亡的军士墓[18]。

1980～1982年，在温县西张计村发掘了一处东周盟书遗址。出土书写盟辞石圭片和石简片达万余件。盟书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或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约束文书，温县盟书大致属于后者。盟书中不少有“十五年十二日乙未朔，辛酉”的纪年，据考证是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497年1月16日）。盟书的主盟者可能是韩简子。温

县盟书的发现，为研究东周时代的历史、盟誓制度、古文字和书法艺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9]。

扶沟古城村发现一处楚国金银币窖藏。其中银币18件，形如长方铲状，均为形制较大的布币；金饼197块，金版195块。金版上钤印有“郢爰”、“陈爰”和“鄗爰”等文字，均属楚国货贝。银布币在全国是首次发现，也是现存最早的银币；“鄗爰”金版也是第一次所见。这对研究中国古代货币史，研究楚国货贝制度是很有价值的[10]。

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虽然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但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其存在时间太短，所以在河南留下的遗迹遗物就相当少。近年来，在三门峡[11]、泌阳[12]发掘出一批秦墓，出土了很多秦代的铜器、陶器和漆器。在泌阳秦墓出土的铜器上有“平安邦”、“平安君”等铭文，漆器上有褐漆书写的“平安侯”三字，还分别有“廿八年”、“卅三年”、“卅五年”、“卅七年”等纪年，很可能是秦末的遗物。这在河南还是不可多得的发现[13]。

1958年，在巩县铁生沟发掘了一处西汉冶铁作坊遗址，出土了耐火砖、陶鼓风管、铁矿石、煤块、铸各种铁器的陶范和大量的铁器。这处冶铁作坊与原料产地相结合，冶炼工序集中，从开采矿石到锻打铁器已全部使用铁工具，还使用了鼓风装置，掌握了高温冶炼技术。这对西汉的农业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4]。出土铁铲上有“河三”铭文，应是河南郡铁官所辖第三冶铸作坊。

南阳是我国汉代重要冶铁中心之一。1959年在南阳北关外瓦房庄即汉宛城中部，发现一处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汉代冶铁遗址[15]。发现有一批炼炉、炒钢炉、熔铁炉，从陶鼓风管表层受热情况看，熔铁时可能已使用换热式热风装置。还出土许多耐火砖、坩埚片、磨石、泥范模、铁范，以及不少铁农具，铧模上有“阳一”铭文，应是南阳郡铁官所辖第一冶铸作坊。

1975年，在郑州古荥镇发掘了一处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时期的冶铁遗址。出土有炼铁炉、矿石堆、重达20余吨的大积铁块、炼铁用的煤、耐火砖、铸造铁范用的陶模和300多件铁器。这里的炼铁炉是迄今已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炼炉采用了椭圆形炉腔，这样更便于鼓风，在熔铸过程中也可能使用了热风技术。这说明早在汉代，我国的冶铁工艺，已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16]。出土铁器有“河一”铭文，应是河南郡铁官的第一冶铸作坊。

1974年5月，在温县招贤发掘出一座汉代烘范窑，窑内出土500多套陶范，其中

包括各种轴承范、车马器范等。陶范用淘洗过的细砂土制成，同类型的若干块（箱）叠垒起来，上面加一个浇口杯，下面置一块平板范，然后在外面敷一层掺合糠壳粘土，形成圆柱状的套范。经过入窑焙烘，陶器表面呈红色。采用这种一箱多器、多箱叠垒的套范，一次可以铸造几十个铸件。陶范结构合理，造型整齐，反映了我国汉代劳动人民在壳型铸造工艺上的卓越成就[19]。

墓葬的发掘是两汉考古的重要收获。河南永城芒砀山，是西汉梁国王室陵墓区。每座陵墓均为"斩山为郭，穿石为藏"，亦即是在山岩中开凿的大型石洞墓。曾在这里发掘出金缕玉衣、大型彩色壁画以及其他珍贵文物。近年在著名的梁孝王墓东侧，发掘出寝园建筑遗址，包括围墙、寝殿、堂、回廊、院落、石台阶和排水道等，是重要的汉代礼制建筑。其北发掘出保安山2号墓，由东西2个墓道、3个甬道、前庭、前室、后室、34个侧室，以及回廊、隧道、灯龛和排水设施等组成。这是目前发现西汉诸侯国中规划最大，结构最复杂的陵墓。其墓道、甬道、前庭及各侧室门道，均用巨型塞石封堵，总计6000块左右，每块重约1吨，上面多有刻字，包括塞石的尺度、干支记时，崖工姓名、宫室方位等。既有史料价值，又是罕见的文字宝库[20]。其中芒砀山柿园西汉壁画墓，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芒砀山梁孝王墓前的寝园建筑，被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整个芒砀山西汉陵墓的发掘，又被评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建国后在洛阳发掘过两座汉代壁画墓[21]，在偃师和新安发掘多座汉代壁画墓。画面上有天汉图像、墓主升仙图、车骑出行或历史故事；在宜阳发掘一座汉代彩色空心线刻画像砖墓，内容有骏马、猛虎和扶桑树等。这些壁画雄健浑厚，奔放有力，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22]。

近年在荥阳苌村发现一座多室汉代壁画墓，甬道两侧和前室四壁及顶部满绘彩色壁画，总面积达300平方米。内容有楼阙庭院、车骑出行、人物故事、舞乐百戏、珍禽异兽及莲花藻井等。壁画多有隶书题榜，如"功曹"、"骑吏"、"主簿"、"郎中时车"、"长水校尉时车"、"巴郡太守时车"、"济阴太守时车"、"齐相时车"等。构图巧妙，色彩鲜艳，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23]。

1972年，在灵宝张湾发掘了一批东汉时期弘农杨氏豪强地主的墓葬。墓内出土有十分罕见的陶桌和六博俑；还出有永元六年（94年）的铜弩机，铭文长达36字，这也是很少见的。过去所见的汉代陶楼，多是各层形体大小相近，上下基本垂直的形制。而这里出土的一座绿釉陶楼却是在一端起楼，亦颇不多见。墓内出土的建筑模型中，有四阿、悬山、硬山和盝顶等我国传统的部分木构建筑形式。这些建筑模型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同时在多层建筑中已使用了平座的结构和一斗三升的承托技术，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杰出的创造[24]。

1969年12月，在济源轵城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在一座西汉墓内，出土了一个陶风车和舂碓模型，为我国研究农业机械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在另一座汉墓中，发现一株通体施釉的陶树，即古代传说中的桃都树。树顶立一金鸟象征太阳，酱黄色的树干分九枝，枝端有绿叶，枝上有猴子，叶上有鸟和蝉，树座呈三角锥体，座上有人物、奔獐、飞蝉、山峦、花木等[12]。

1978年冬，在南乐宋耿洛村汉墓中，出土两件珍贵文物。一是通体金片、金丝、银片、银丝镶嵌的龙首形铜带钩；另一是高浮雕盘龙石砚，雕工精湛，独具匠心，砚面边沿阴刻一周隶书“延熹三年（160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君寿如金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二千”的题记。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珍品[13]。

1970年，在郑州新通桥附近发掘出一座用130多块空心砖砌成的汉墓。空心砖上有40多种模印图案，除常见的一些几何花纹外，还有乐舞、骑射、出行、械斗、驯牛、斗鸡、乘龙、刺虎、熊虎等，构图简练，栩栩如生，反映了这种独特艺术形式的成就[14]。

1981年，在新野发现一块反映汉代杂技艺术的戏车画像砖，这应该是当时的墓砖。画面上两辆马车前后飞奔，车内的高大木竿上，各有几个伎人进行表演。还有一个伎人在两辆飞车斜向的联索上向上举步。其难度远远超过平地上的走钢丝。这种无与伦比的杂技艺术，惊心动魄，令人拍案叫绝[15]。另外，在新野樊集还出有相当精美的拱桥杂技画像砖和“泗水捞鼎”画像砖。

闻名中外的汉代画像石，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豫南的南阳地区，其次较多的是豫中地区，再次是豫东地区，在豫北也有少量发现[16]。建国以来，发现的汉画像石数以千计，不少都出自墓葬。如南阳七里园[17]、赵寨[18]、杨官寺[19]、石桥[20]、军帐营[21]、王寨[22]、李相公庄[23]、英庄[24]、王庄[25]，唐河石灰窑村[26]、新店[27]、针织厂[28]、电厂[29]，邓县长冢店[30]，方城东关[31]和襄县茨沟[32]等地，都有重要发现。南阳汉画像石是衬地浅浮雕，题材广泛，有日蚀、月蚀、太阳黑子、牛郎星、织女星和北斗星等天文图像；有舞乐百戏等艺术画面；有豪强地主的生活写照；有祥瑞和辟邪的图像；还有远古神话和历史故事等。这些丰富多彩的画像内容，对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俗和天文观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形象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唐河新店汉画像石墓有“天凤五年”（18年）的题纪；襄县茨沟汉画像石墓有“永建七年”（132年）的题记；南阳李相公庄画像石有“建宁三年”（170年）的题记，都有明确的纪年，这对南阳汉画像石的断代分期，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在密县打虎亭发掘两座相连的东汉晚期大墓，形制和结构基本相同，均有墓道、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南耳室、东耳室和北耳室。西侧1号墓以画像石为主，各个墓室的门上和墓顶均刻有云纹、瑞禽神兽和其他装饰，甬道和前室是迎宾送客图，南耳室是车马牛羊和收租图，东耳室是庖厨图，北耳室是宴饮图；东侧2号墓以彩色壁画为

主，甬道和前室绘有迎宾图，南耳室是家畜饲养图，东耳室是庖厨图，中室南壁是长7米多的墓主人车骑出行图，北壁是长7米多的宴饮百戏图，后者画面上能看清的人物达78个之多，表演跳丸、盘舞、奏乐等场面，惟妙惟肖。两座墓壁画场面巨大。画像石为减地平面线刻，刀法娴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64]。

1958年，在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新发现1通东汉延熹二年（159年）《张景造土牛碑》。碑身已残，顶部尚存碑穿痕迹。该碑现存字11行，满行23字，全文可识者225字。记述当时为举行立春仪式就需"调发十四乡正"进行准备，弄得"吏正患苦"；张景"愿以家钱"包作为举行立春仪式所需一切用具，要求以此免除劳役，可见东汉徭役苛重。碑中所记"右丞"官名及官名统称为"列长"一词，汉书不见记载，由此可补其不足。此外，张景碑还是书法艺术珍品，碑文字体宽扁，点、画、波、尾显明，端正工细，秀丽多姿，代表成熟汉隶书体的一个流派[65]。

1973年，在偃师缑氏镇南家村，发现一块东汉建初二年（77年）《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石券略呈长方形，正面镌刻隶书12行，每行14～27字不等，总计212字。券文对研究东汉时期"僤"这种民间组织的性质、成员和作用，对研究当时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买卖的地价都提供了新的史料。石券字形方正，气势雄伟，风格古朴苍劲，笔画肥瘦也富变化，亦为汉代书法艺术中的瑰宝。由于汉代碑刻所剩无几，新发现者更是寥若晨星，石券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66]。

1961年5月，在正阳县东关外，发现当地群众称之为"望像台"的古代石砌建筑是一座汉代石阙。石阙仅存东阙，用青石条砌筑而成，有子阙。阙基3层筑成梯形，子阙阙身筑石8层，母阙阙身筑石11层，其上为雕有瓦垅的四阿式顶。阙身南侧和东侧可看出镌刻的人物、龙、牛、铺首及斜线、环形纹饰等。这些图像和纹饰与南阳汉画像石上的图像，以及河南常见东汉时期小砖侧面的几何纹饰基本相同。其建筑方法、形式和大小，均与登封中岳汉三阙非常近似。据此推断，这也应建于东汉时期[67]。

汉魏洛阳城在洛阳市东15公里处，自周、汉、魏、晋至北魏诸朝，先后在这里建都。从1962年起，在这里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工作。初步探明了城垣、门阙、街道、护城河、西北隅金墉城、宫殿区、衙署与仓廒的范围和布局[68]。在城内发掘出著名的永宁寺塔基[69]。在南郊还探出了汉魏时期的"三雍"遗址范围和一些殿台遗存[70]。1964年，发掘了城南的东汉刑徒墓地，共发现刑徒墓500多座。出土刑徒砖800多块，砖上的铭刻记录了刑徒的狱所名称、姓名、刑名和死亡日期等。据记载，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在洛阳兴建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范围极广。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了北魏洛阳城的内城。近年来依据航测影像图，进行北魏洛阳外郭城和水道的勘查，找到了外郭城北、西、东城垣的部分遗迹，西垣和东垣的3座城门，城内外的大道和若干水道。并在外郭城发掘出一批"西人"丛葬墓，其身份要高于刑徒。还发掘出土

一批北魏青瓷器和釉陶器[34]。

魏晋南北朝时期，原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南下，造成各民族的大融合，前后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样漫长的年代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较为曲折地发展了汉魏时期的封建制，共同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后世，尤其是对隋唐两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关于洛阳北魏墓葬的研究工作中，对拓跋宏（孝文帝）的长陵和其后高氏的文昭皇后陵位置的确定，是一项重要的收获。根据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考证，证明孟津官庄附近的两个土冢就是这两座陵墓。1991 年 6 月，发掘洛阳北郊邙山乡冢头村东的北魏宣武帝景陵。墓冢直径 105～110 米，高 24 米。墓葬由墓道（土壁、砖壁各一段）、第一道封门砖墙、前甬道、第二道封门砖墙、后甬道、石门、方形四角攒尖顶墓室组成，气势恢宏。该墓的发掘对北魏陵墓制度的研究很有意义[35]。

洛阳北郊北魏江阳王元乂墓，早年被盗，墓室四壁彩绘壁画亦遭破坏，但墓室穹窿顶部所绘一幅“星象图”保存比较完整。图中星辰约有 300 余颗，银河纵贯南北，经有关专家考证，画面反映的是正月晚上和七月凌晨前的星空，一些星宿的名称也已经辨认出来。这幅北魏星象图，幅度较大，星数较多，要比过去发现的《敦煌星图》、北宋《新仪象法要星图》、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等要早得多，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36]。

1979 年，在孟县发现北魏持节督豫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渔阳开国子豫州刺史司马悦墓，出有一批陶瓷器和墓志。其父琅玡王司马金龙的墓葬 1965 年发现于大同。司马悦墓虽出土文物不多，但其墓志内容丰富，为研究北魏的历史，提供了很有用的资料。墓志书法潇洒稳健，字形朴实大方，是魏体书法的上品[37]。

在邓州学庄，发掘出一座南朝时期的彩色画像砖墓。画像内容有墓主出行、历史故事和一些神禽怪兽。它们虽然出自无名工匠之手，但其造型艺术的高超水平，比起当时的名家来也毫不逊色[38]。

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 年）范粹墓[39]，濮阳北齐武平七年（576 年）李云墓[40]，都出有一批弥足珍贵的北朝青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登封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520～524 年），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密檐式砖塔。1988 年在维修嵩岳寺塔过程中，清理了地宫。地宫位于塔基中，由甬道、宫门、宫室三部分组成。宫室在塔基中部稍偏西，平面近弓形，边长为 2.04～2.08 米，残高 1.3～1.5 米。四壁绘有壁画，上部为云纹，下部有仿木结构建筑的柱枋斗拱及人物。地宫清理出造像、建筑构件、生活用品等遗物 70 余件。其中释迦像的背光后面刻有发愿文“大魏正光四年岁……四日丁未佛弟子向□□释迦像一躯愿名……养长生任官日□□……从心”等内容，所记年款正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 年），恰为嵩岳寺塔

创建之时，这无异是研究该塔创建年代最珍贵的实物资料[illegible]。

1984年，在新安县西沃乡东南约1公里的黄河岸边峭壁上，发现1座北魏石窟。窟门面向黄河，为并排两个洞窟。1号窟靠东，形制较大，平面呈长方形。开凿于北魏孝昌元年（525年），完工于建义元年（528年）。2号窟靠西，形制较小。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建成。这是黄河中下游岸边唯一的一处北魏石窟，与龙门石窟有相似之处。鉴于石窟处于黄河小浪底水库蓄水线以下，1997年将石窟整体搬迁到新安铁门“千唐志斋”博物馆院内[illegible]。

1974年夏，在安阳殷墟西区的孝民屯，发掘了一批晋墓[illegible]。出土了一套123件的鎏金铜马具，排列有序，尚可据以复原。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实物资料。而其中单马镫的发现尤为珍贵。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骑兵的发展和军事史，也具有一定价值。

1974年4月，在渑池县火车站附近发现一座铁器窖藏[illegible]。出土有从汉魏到北朝时期4000多件铁器，包括60多种器形，在一批铁器上还铸有铭文。经化验这些铁器包括了除合金铸铁以外的今天所有生产品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低硅灰口铁、铸铁脱碳钢以及类似现代球墨组织。这对总结古代冶金技术经验是很重要的。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留下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

洛阳含嘉仓城的发掘，是隋唐考古的重大收获。仓城位于隋唐东都宫城的东北，创建于隋大业年间，面积达42万平方米。已钻探出排列整齐的圆形粮窖200多座，口径8～18米，深6～12米。在发掘过的几座粮窖内，出土有刻字或墨书的铭砖，记载着粮窖在仓城内的位置、储粮的来源、粮食的品种、数量、入窖的年月以及管理人员的官职和姓名。含嘉仓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1000多年前我国大型粮仓的实例，反映了当时储粮的特殊措施、各种记录和管理制度。近些年来，洛阳隋唐东都城的考古发掘收获甚丰。1982～1986年以来，发掘著名的含元殿——明堂遗址，发掘九洲池范围内的亭台楼阁建筑，并勘察宫城、隔城、城垣及诸城门址。1988年10月，发掘宫城内的乾元门遗址。1989年11月，在宫城应天门内的房基中，发掘出土唐哀帝玉册多枚。更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10月，发掘了洛阳唐东都履道坊（今洛阳南郊安乐乡狮子桥村）的白居易故居。发现有道路、渠道、宅院等遗迹，出土一批陶器、瓷器、石经幢等遗物。一件经幢上刻“唐大和九年”铭，另一件刻“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等内容，均与白居易有关[illegible]。

1974年2月，在安阳北郊发现隋代相州窑址。发掘出瓷窑、各类窑具和大批青釉瓷器[illegible]，这与安阳发现的隋代卜仁墓[illegible]、张盛墓[illegible]和宋循墓[illegible]内出土的青瓷器相同；也和北齐时期安阳范粹墓和濮阳李云墓出土的青瓷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使我们可以推知豫北的制瓷手工业，在继承汉晋青瓷工艺技术之后，到北齐时期发展到新水平，到了隋代更

上一层楼，成为北方青瓷的典型代表。

隋开皇十五年（595 年）征虏将军张盛墓是 1959 年 5 月在安阳发掘的，随葬近 200 件陶瓷器，包括瓷侍吏俑、瓷镇墓兽、陶仪仗俑、陶伎乐俑、陶仆侍俑、陶家禽俑，还有瓷生活用具模型，如瓷壶、坛、瓶、罐、三足炉、三足带环盘、博山炉、围棋盘、柜、枕等，陶生活模型如井、灶、碓、磨、屋等，其中瓷围棋盘值得一书。围棋源于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流行，并在唐以前传到日本等地。最初围棋盘为纵横各 17 道，至迟到隋唐时期改为纵横各 19 道，一直沿用至今。张盛墓所出瓷围棋盘应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 19 道围棋盘。

三门峡一带自秦汉以来就是通向关中地区的漕运要道，东汉时候就修建了栈道，隋唐时期仍然使用，但运输还相当困难。在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又在人门北侧岩石中开凿了一条全长 280 米的运河，称为开元新河。在开元新河和栈道的两壁上，还保留了许多唐代题记。在考古调查中又找到了唐代的集津仓、盐仓和唐宋时期的禹庙、开化寺等遗址。这些题记和遗迹，对研究我国漕运史是很重要的[16]。

1992 年，在洛阳市南郊花园村，发掘出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该墓规模较大，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过洞、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内多有壁画。这是河南少见的唐代皇室墓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8]。

1981 年 4 月，在洛阳龙门发掘出唐安菩夫妇墓。从墓志中可知，安菩原为西域“昭武九姓”国之一的安国大首领，归唐后封为定远将军。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其中三彩和单色釉器 100 多件，还有陶器、瓷器、铜钱和铜镜等。引人注目的还出有一枚东罗马皇帝福克斯（602～610 年）的金币。它和 1955 年在洛阳北郊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一样，同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遗物。结合墓内三彩器中各种胡人形象，以及身负囊袋、肉食、水壶和丝绸的骆驼俑，可以看出唐代洛阳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一些学者认为洛阳应是古代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

1983～1992 年，在偃师杏园村即偃师商城西北郊一带，清理了一批唐代墓葬。几乎涵盖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墓内出土了不少诸如镶嵌紫水晶金戒指、鎏金银盒、银箔平脱方漆盒、金银平脱鸿雁衔花镜、雕镂精致的动物造型和作为生活器皿的玉石器以及一批精美的唐三彩器等，展示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尤其是不少墓内出有墓志，记录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墓志内提到这里为“西亳”、“亳邑乡”、“尸乡”等，这说明唐代仍沿袭汉人旧称，将偃师商城这一带地方视为西亳故地[20]

1991 年，在孟津西头村发掘武则天大足元年（701 年）的一座唐墓，出土一批非常珍贵的彩绘陶俑。为研究盛唐时期的服饰、化妆、音乐、舞蹈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21]。

1976 年 3 月，在荥阳东郊唐代大海寺遗址，发掘出一大批石刻造像，除一通北魏孝昌元年（525 年）造像碑和一尊北宋元丰四年（1081 年）释迦牟尼佛之外，其余均是

唐代的各种坐佛和菩萨像，都是唐代少见的艺术珍品[12]。

1982年5月，在登封嵩山峻极峰北侧石缝中，发现唐武则天金简1通[13]。为竖长方形，长36.3、宽8.2厘米，重200多克。这是武则天在久视元年（700年）七月到嵩山祈福，用小使臣胡超（宫廷太监）的名义向三官九府之神传达武则天的来意，进山门时投金简一通，相当于后世的名刺（名片），以显示至高无上的女皇身份。金简上有一些武则天新造的字，不久就被历史所淘汰。

唐宋考古中瓷器是常见的遗物。在汝州、巩义、宝丰、禹州、登封、密县、辉县、鹤壁、新安、内乡、宜阳和其他一些地方，都调查或发掘了唐宋甚至元代的瓷窑遗址。发现大量的瓷窑、窑具和各种各样的瓷器。其中如密县西关窑珍珠地刻花瓷[14]，巩县黄冶窑的三彩器[15]，釉色青绿莹润如堆脂的汝瓷[16]、灿如晚霞釉色窑变的钧瓷[17]，豫北诸窑的白地杂花器[18]，至今仍然使人们惊叹和倾倒。

特别要提及的是宋代汝官窑的发现。1962年在调查中发现了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当时只将其认作是一般的汝窑址，1987～1989年经过连续三次的发掘，找到了窑址、作坊、灰坑和水渠，出土了300多件瓷器，其中有20多件瓶、洗、盘、器盖为宫廷御用瓷器，还有一批白地黑花瓷和天目瓷，以及少量的钧瓷和三彩瓷。附近还发现有玛瑙矿呈白色、黑色、红色、绿色和棕色，这是汝官窑产品的重要原料之一，发掘表明，这里是宋、金、元窑址，若不是官窑场，至少也烧造官瓷[19]。过去传世的汝官窑产品仅70余件，且来源不明，这次新发现20多件，又有明确的烧造地点，可以说解决了一个千古之谜。宝丰清凉寺汝官窑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巩义宋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著名陵区之一，位于山青水秀的嵩山北麓和伊洛河以南的漫坡平原上，北宋的大部分皇帝皇后都葬在这里。每座帝陵、后陵都是坐北朝南，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神道石刻、陵园、陵台、下宫等。陵园四周有神墙，每边神墙正中有门阙，四角有角阙。近年来，对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进行调查与发掘，先后发掘出陵前最南端的鹊台基址、乳台基址、门阙阙台。在陵区发掘中，出土有大量的龙纹瓦当、龙首脊饰、万字护栏、莲纹方砖和带陵名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为研究和复原宋代陵寝制度，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资料[20]。

1984年在陵园范围内发掘了元德李后陵。地面上现存有陵台、石刻和阙台。地宫位于陵台之下，系单室砖砌，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石墓门上线刻高大武士立像，墓室北半部有石砌棺床，墓壁有砖砌门窗桌椅，其上部至墓顶绘有空中楼阁和银河天象图。出土有玉哀册和玉谥册，随葬有精美的越窑龙纹青瓷盘和定窑“官”字款白瓷盘、碗[21]。此外还发掘了魏王赵頵墓[22]和燕王赵颢墓[23]，并收集到一些宗室公主的墓志[24]。

此外，在全省各地还发掘了许多宋墓[25]。如密县宋枢密副使冯京墓[26]，伊川彰德军节度使王拱辰墓[27]，郏县“三苏坟”苏适墓[28]，郑州南关至和三年（1056年）胡进墓[29]，

安阳天禧镇熙宁十年（1077年）王用墓[80]，上蔡雕砖壁画墓[81]，禹县白沙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壁画墓[82]，新安李村宋宣和八年（即靖康元年，1126年）宋四郎壁画墓和宋村北宋雕砖壁画墓[83]，温县北宋雕砖墓[84]，三门峡土壁浮雕墓[85]，方城盐店附近绍圣元年（1094年）和宣和元年（1119年）两座石俑墓[86]，以及洛阳、南阳、滑县北宋晚期官办的“漏泽园”墓地等[87]。其中1958年在偃师酒流沟水库的一座宋墓里，曾发现三块杂剧雕砖。杂剧是当时北方流行的剧种，每块砖上表现一个演出场面[88]。第一块叫“艳断”，即杂剧的开场，刻划一个演员手拿一幅轴画，上身微俯，面向群众表演；第二块叫“正杂剧”，一人持笏，在和另一个捧包袱的演员对话；第三块叫“杂扮”，即杂剧的结尾，描绘一个小丑敞怀露腹，托一鸟笼，另一个小丑软巾诨裹，吹口哨逗鸟叫。这类杂剧雕砖，与洛宁介村杂剧雕砖墓[89]，禹县白沙宋墓杂剧雕砖[90]，温县杂剧雕砖和散乐图[91]，以及焦作金墓戏剧壁画[92]，同为研究我国古代戏剧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1993年在登封王上村发掘一座八角形宋代砖室壁画墓，除南壁为墓门之外，其余各壁均绘一幅壁画，高1.2、宽1.05米，内容相当丰富。壁画采用工笔与写意结合的手法，线条细腻流畅，色彩浓淡分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93]。

1996年，在禹州电厂发掘一座北宋墓葬，墓室平面呈六角形，墓壁除砖雕有仿木结构的门窗、桌椅、灯檠之外，还有60多个砖雕俑，有武士、力士、飞仙、侍者、伎乐等，制作精湛，形象逼真，为研究北宋时期的人物服饰、砖雕艺术和杂剧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94]。

1981年以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对北宋的都城进行调查、钻探和试掘。外城周长近30公里，一般埋在距今地面约4米深处，四个城角也已找到，其中位于高屯村和三间房村之间的西南城角保存最好，高出地面尚有1米左右。外城有14座城门和7座水门，已探明15座，其中包括著名的南熏门（南墙正门）、新郑门（西墙正门）、新曹门（东门）、汴河下水门等。在外城的城门处有5处瓮门，有的瓮圈可达1.3万平方米，面积之大，为历代都城所少见。在内城找到了南端正中的朱雀门和南北中轴线的御街，并发掘出御街上横跨汴河的州桥，这是明初在宋代基础上重修的，桥面东西宽30米，南北长约16米多，为砖石结构的拱形桥。在宫城找到了南门和北门，还钻探出皇宫的正殿——大庆殿，面积约5000平方米，台基残高6米多，四周还有廊庑。在宫城东半部（即今潘家湖底）发掘出在宋宫城基础上所建明代周王府的宫墙、殿基和庭院[95]。最近又勘探出著名的金明池[96]。使《东京梦华录》、《水浒》和《清明上河图》、《金明池夺标图》所描绘的北宋东京城的壮丽，市肆的繁华，更加令人心驰神往。上述发现和现存的相国寺旧址、开宝寺“铁塔”和天清寺“繁塔”，勾画出北宋东京城址的轮廓。

1991年10月至1992年5月，在洛阳老城中州路南侧，发掘出一座宋代衙署庭院

遗址。对研究和复原宋代官府建筑有重大价值[28]。

1997年4月，在鹿邑太清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里是老子故里，东汉桓帝时就在此建老子庙，唐天宝二年（743年）改名太清宫，又称前宫，是祭祀老子的地方。其北500米有后宫，是祭祀老子母亲的地方。遗址中分布有唐、宋、金等时代的建筑。前宫尚立有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御书镌刻《道德经注碑》，后宫也立有宋大中祥符七年（1024年）帝亲谒太清宫，御撰御书并篆额的《先天太后赞碑》，在后宫遗址中还发掘出金太和元年（1201年）《太清宫庙产碑》。这些表明，唐宋时期一些皇帝都曾亲来太清宫祭祀老子，一直把这里当作老子的诞生地[29]。

1966年，在密县法海寺旧址发掘了一座北宋塔基[30]，塔基内置上下重叠的两个方形石函，内有3座三彩琉璃方塔和一个三彩琉璃舍利匣，还有一些其他遗物。三彩琉璃塔上有北宋"咸平二年"题记，匣上有"咸平元年"的题记。这是目前我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琉璃制品。均用高岭土作胎，施褐、黄、绿三彩釉，比唐三彩更加细致多变，表明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和提高。这几座琉璃密檐方塔和方形琉璃舍利匣，显然是依据当时的砖、石塔建筑结构塑造出来的，很富有我国民族建筑形式的特征。其制作是建筑、绘画、雕塑、陶瓷、彩釉等多种工艺美术的结合，实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1977年，清理了郑州开元寺塔基，石砌仿木结构，内置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石棺，棺身两侧浮雕释迦牟尼涅槃十弟子送葬图，人物各具神态，形象生动。石棺下连雕的须弥座上，浮雕有伎乐和力士，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31]。

1988年，发掘邓州福胜寺塔基，地宫位于塔心室之下，地宫内有石质须弥座，上刻《地宫记》，署时"天圣十年"（1030年）。座上置方形石函，内有金棺、银椁、玻璃舍利瓶和鎏金双龙银壶等。这些遗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对古代科技史、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十分重要[32]。

1959年，在鹤壁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煤矿遗址。发掘出较大的采煤区域和巷道、井口、灯龛、排水井、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等。从而说明煤城鹤壁已有近千年的采煤历史了。1985年夏，在禹县神垕镇翟村，也发现一处北宋煤矿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发现十多处井口，井下有古巷道，出有宋代铁镢和瓷器等。今天的梨园煤矿仍在附近开采[33]。

近年来在荥阳楚村，发掘出一处元代铸造作坊遗址。出土炼渣、煤块、残炉壁、坩埚和一批铜模。铜模包括犁镜、犁铧、耧铧、犁底、耙齿等。这些铜模都是铸制而成的，都可以直接用来制范。铜模表面光滑而耐磨，远比泥模和木模更为经久耐用；使用时，青铜熔点低，流动性好，易于浇注，且化学性能稳定，不易生锈，也比铁模优越。这种永久性模型，在铸造工艺技术上使产品规格化，简化制范工艺，在我国铸造工艺史上是较大的改进和创造[34]。

1982年2月，在宁陵县华岗村东面的黄河故道（张弓河）西侧，发现了一艘明代

沉船。全船长约16、最宽处为4.8米。共分成9个船舱，包括1个首舱、1个尾舱、1个桅舱、4个货舱、2个卧舱。船底、舱梁、甲板、舷板、船桅和船舵尚存。船内遗物甚多，有陶器、铁器、木器、青花瓷器、中药材、象棋盘、腰刀、竹子和黄草纸等。从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这是一艘载重约22吨的内河航船。竹子和黄草纸多为南方产品，可能此船是从南向北行驶的商船，在华岗村附近的张弓河内遇大风浪而沉没。据明史记载，张弓河源于兰阳，流经赴皮寨、仪封、野鸡岗、地丘店、宁陵、张弓、柘城，由亳入淮。此河从元到明代前期是黄河干流之一，可以南北通航。宁陵明代沉船的发现，对研究豫东古河道的变迁、交通航运和造船工艺均有参考价值[69]。

五十年来河南如此众多的考古发现，通过国家、省和各市地博物馆的文物陈列，通过到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的对外文物展览，通过一篇篇发表的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通过一部部考古学术专著，介绍给了海内外炎黄子孙，介绍给了世界各国人民。在20世纪末叶的今天，使人们在看到一个经济腾飞现代化河南的同时，又看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河南。

（执笔：杨育彬）

注　释

① 未化：《南召县发现猿人化石》，《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2期；邱中郎等：《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1卷2期。

② 吴汝康等：《河南淅川的人类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20卷1期。

③ 王兵翔：《展望中原地区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河南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1980年，未刊稿）。

④ 李楠等：《河南省卢氏县发现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3年2卷4期。

⑤ 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黄慰文：《豫西三门峡地区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8卷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2期；张维华：《河南省新发现的旧石器和人类化石》，《中原文物》1986年2期。

⑥ 梁久淮等：《洛河岸边首次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3期；张森水等：《洛阳首次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2年1卷2期。

⑦ 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7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4期；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1期；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2期。

⑧ 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2期；开封地区文管会等：《裴李岗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1期。

⑨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

⑩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1期。
⑪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期。
⑫ 孙广清：《河南裴李岗文化的分布和地域类型》，《华夏考古》1992年4期。
⑬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34页，地图出版社，1991年。
⑭㉖ 孙广清：《试论河南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区域类型》，《中原文物》1995年1期。
⑮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仰韶村1980年～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3期。
⑯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3期。
⑰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⑱ 濮阳市文管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3期。
⑲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⑳ 张玉石等：《郑州西山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华夏最早城址重见天日》，《光明日报》1995年5月14日。
㉑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年。
㉒ 同⑬35页。
㉓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6年。
㉔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㉕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1期。
㉗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旭旮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
㉘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管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
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
㉚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4期。
㉛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㉜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㉝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3期。
㉞ 袁广阔等：《辉县市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河南日报》1992年12月15日。
㉟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㊱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1期。
㊲ 郸城县文化馆：《河南郸城段寨出土大汶口遗物》，《考古》1981年2期；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年3期。
㊳ 商水县文化馆：《河南商水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考古》1981年1期。
㊴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1期。
㊵ 张脱：《河南平顶山市发现一座大汶口类型墓葬》，《考古》1977年5期。
㊶ 尚景熙：《上蔡发现五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㊷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㊸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3期。
㊹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㊺ 长办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9年1期。
㊻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12期。

㊼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华夏考古》1994年2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邓州市八里岗遗址1992年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7年12期。

㊽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尹达：《另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㊾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㊿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4期。

(5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刘胡兰小队：《河南偃师灰嘴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61年2期。

(52) 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1期。

(5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渑池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9期。

(5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

(55) 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1期。

(5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

(5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烧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2期。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寨遗址试掘》，《考古》1981年5期。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偃师商城初步勘探与发掘》，《考 古》1984年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3年秋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偃师商城考古再获新突破》，《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1日；新华社北京（1998年）7月16日晚报专电：《偃师商城的新发现——解开夏商分界的疑团》，《大河报》1998年7月17日11版。

(6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

(62)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安金槐：《一年来郑州市的文物调查发掘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

(6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

(64) 安金槐：《郑州地区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8期。

(6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66)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6期。

(6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年3期。

(68) 宋国定等：《商代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1日。

(6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内宫殿遗址地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年4期。

(70) 郭沫若：《豫秦晋访古十八首》，《文物》1959年8期。

(7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3期。

(7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1期。

(73)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7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⑯ 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殷墟花园庄发现早期甲骨坑》，《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22日。

⑰ 《殷墟发掘一座商代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0日。

⑱ 王立早：《殷墟发掘一处大型宫殿基址》，《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22日。

⑲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4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2期。

⑳ 张志清等：《鹿邑太清宫遗址考古发掘又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3日1版。

㉑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的新发现》，《文物》1960年5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2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信阳县浉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考古》1989年1期。

㉒ 裴琪：《鲁山县发现一批重要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5期。

㉓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上蔡出土一批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

㉔ 周到等：《河南鹤壁庞村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1980年。

㉕ 刘东亚：《河南淮阳出土的西周铜器和陶器》，《考古》1964年3期。

㉖ 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4期。

㉗ 河南省博物馆：《泌阳县出土的两件西周铜壶》，《文物》1966年1期。

㉘ 杨宝顺：《新郑出土西周铜方壶》，《文物》1972年10期。

㉙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8期。

㉚ 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发现西周铜簋》，《考古》1981年4期；张肇武：《河南平顶山市又出土了一件邓公簋》，《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

㉛ 《洛阳发现西周前期青铜铸造遗址》，《文物特刊》（35），文物出版社，1977年8月；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7期；洛阳文物工作队：《1975年～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造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5期；贺官保：《洛阳市北窑庞家沟出土青铜器》，《文物》1964年9期；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10期。

㉜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平顶山北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年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3期；王龙正等：《平顶山应国墓地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1日。

㉝ 中国科学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㉞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3期。

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2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㊱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

㊲ 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掘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年10期。

㊳ 蔡全法等：《郑韩故城考古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3日。

㊴ 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一九九七年上半年告成遗址的调查试掘》，《河南文博通讯》1977年2期；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一九九七年下半年登封告成遗址的调查试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1期；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12期；河

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工作站：《登封战国阳城贮水输水设施的发掘》，《中原文物》1982 年 2 期。

⑩⑩ 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试掘》，《文物》1977 年 12 期。

⑩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 年。

⑩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⑩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 年 3 期；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发掘记》，《文物天地》1992 年 4 期。

⑩④ 赵青云：《固始侯古堆发掘一座大型陪葬坑》，《河南文博通讯》1978 年 3 期。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 1 期。

⑩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 10 期。

⑩⑥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 4 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 1 期。

⑩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 年。

⑩⑧ 河南省文物局：《汤阴发现战国阵亡军士墓》，《河南日报》1982 年 6 月 16 日。

⑩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 3 期。

⑪⑩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 年 10 期。

⑪① 黄士斌：《上村岭秦墓和汉墓》，《中原文物》特刊，1981 年。

⑪② 驻马店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 年 9 期。

⑪③ 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 年 9 期。

⑪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 年。

⑪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 年 1 期。

⑪⑥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 2 期。

⑪⑦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省温县汉代烘范窑发掘简报》，《文物》1976 年 9 期。

⑪⑧ 商博：《永城芒砀山发现汉代梁国王室墓葬》，《中国文物报》1986 年 10 月 31 日；阎道衡：《芒砀山又发现一座西汉梁王墓》，《光明日报》1988 年 11 月 13 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⑪⑨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 年 2 期；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 6 月。

⑫⑩ 洛阳地区文管会：《宜阳县牌窑西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 年 4 期。

⑫①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 年 3 期。

⑫② 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 年 11 期。

⑫③ 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 年 2 期。

⑫④ 安阳地区文管会等：《南乐宋耿洛一号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 年 2 期。

⑫⑤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1972 年 10 期。

⑫⑥ 魏忠策：《罕见的汉代戏车画像砖》，《中原文物》1981 年 3 期。

⑫⑦ 孙广清：《河南汉代画像石的分布与区域类型》，《华夏考古》1991 年 3 期。

⑫⑧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南阳汉代石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10 期。

⑫⑨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 年 1 期。

⑬⑩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3 年 1 期。

(131) 南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石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132) 南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军帐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133)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1期。

(134)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8期。

(135) 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年3期。

(136)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3期。

(137)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5期。

(138) 南阳地区文物队等：《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2期。

(139) 周到等：《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6期。

(140) 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1期。

(141) 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1期。

(142) 南阳市博物馆等：《河南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文物》1980年3期。

(14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1期。

(14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145) 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年11期。

(146) 黄士斌：《河南偃师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12期。

(147) 王润杰：《正阳县汉代石阙调查》，《文物》1962年1期。

(14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

(1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3期。

(1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1期。

(15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郭城和水道勘查》，《考古》1993年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外郭城内丛葬墓发掘》，《考古》1992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

(152) 郭建邦：《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9期。

(153)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

(154) 孟县文化馆：《河南省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年3期。

(15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156)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

(157) 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

(158)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登封嵩岳寺塔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1期。

(159) 温玉成：《河南省新安县西沃石窟》，《考古》1986年2期；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新安西沃石窟勘测报告》，《文物》1997年10期；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54～64页，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

(1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6期。

(161) 河南省博物馆等：《渑池县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8期。

(162) 河南省博物馆等：《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

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研究所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1987年隋唐东都城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乾元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洛阳宫城内出土哀帝玉册》，《考古》1990年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⑯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2期。

⑯ 宋伯胤：《卜仁墓中的隋代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8期。

⑯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10期。

⑯ 安阳文教局：《河南安阳隋墓清理记》，《考古》1973年4期。

⑯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⑯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8期。

⑯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3期。

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考古》1984年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5期；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县四座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12期。

⑰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文物》1992年3期。

⑰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3期。

⑰ 吕树芝：《武则天金简》，《历史教学》1983年3期。

⑰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密县、登封唐宋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64年2期。冯先铭：《河南密县、登封唐宋古窑址调查》，《文物》1964年3期。

⑰ 刘建洲：《巩县唐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3期。傅永魁：《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

⑰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汝窑址的调查与严和店的发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0期。冯先铭：《河南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

⑰ 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6期。

⑰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古代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8期。陈万里：《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

⑰ 赵青云等：《宝丰青凉寺汝窑址的钻探与试掘》，《文物》1989年1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3期。

⑱ 孙新民等：《巩义宋陵考古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14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⑱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

⑱ 周到：《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7期。

⑱ 傅永魁等：《巩县石窟寺·包拯墓·北宋皇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期。

⑱ 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学集刊》第2集。

⑱ 孙广清：《河南宋墓综述》，《中原文物》1990年4期。

18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4期。

187 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北宋王拱辰墓及墓志》，《中原文物》1985年4期。

188 李绍连：《宋苏适墓及其他》，《文物》1973年7期。

18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南关外北宋砖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5期。

190 《河南省文化局调查安阳天禧镇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8期。

191 杨育彬：《上蔡宋墓》，《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4期。

192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193 赵跟喜：《新安县发现宋代壁画墓》，《洛阳日报》1984年1月4日；叶万松等：《新安县石寺李村的两座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文物出版社。

194 张思青等：《温县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1期。

195 金仪：《三门峡发现上壁浮雕宋墓》，《中国文物报》1987年8月21日。

196 刘玉生：《河南省方城县出土宋代石俑》，《文物》1983年8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村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1期。

197 贺官保：《西京洛阳漏泽园墓砖》，《文物资料丛刊》第7集，1983年；魏仁华：《河南南阳发现宋墓》，《考古》1966年1期；宋采义等：《谈河南滑县发现的北宋漏泽园》，《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4期。

198 蕾祥：《偃师酒流沟水库宋墓》，《文物》1959年9期。

199 李献奇等：《洛宁县宋代杂剧雕砖试析》，《中原文物》1988年4期。

200 徐苹芳：《白沙宋墓中的杂剧雕砖》，《考古》1960年9期。

201 张思青等：《温县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1期；廖奔：《温县宋墓杂剧雕砖考》，《文物》1984年8期；张新斌等：《温县宋代人物雕砖考》，《考古与文物》1988年3期。

202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8期。

203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登封王上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10期。

20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7年4月《工作通报》。

205 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12期；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中原文物》1990年4期。

206 丘刚等：《开封宋城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29日。

20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6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现宋代门址》，《文物》1992年3期。

208 张志清等：《鹿邑发掘老子故里太清宫遗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0日。

209 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10期。

210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1期。

211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等：《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文物》1991年6期。

21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3期；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现》，《考古》1989年8期。

213 于晓兴等：《郑州荥阳楚村元代铜模》，《文物》1982年11期；郑州市博物馆等：《荥阳楚村元代铸造遗址的试掘与研究》，《中原文物》1984年1期。

214 商邱地区文化局、文管会：《宁陵县华岗出土的明代木船》，《中原文物》1983年2期。

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起步于50年代中期，经过近50年的发现与研究，湖北地区各时期古文化的面貌和年代系列已大致明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学术讨论和研究。

一

湖北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适合于原始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特别是鄂西地区屡次发现有高等灵长类和早期人类化石。建始和巴东曾发现有大量巨猿牙齿化石①，郧县龙骨洞、郧西白龙洞发现了猿人化石。1989、1990年郧县曲远河口遗址发现两具远古人类颅骨化石②，化石保存较完整，保留了一系列的原始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被称之为"郧县人"。遗址内与人类化石共存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包括6个目20余科，整个动物群的性质与蓝田公主岭一致，二者的时代也大体相当。经古地磁法测年，郧县人遗址的时代属早更新世晚期。

属于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有1956年在长阳下钟家湾发现的"长阳人"③，这是中国南方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1997年，武汉市汉南区（原属汉阳县）沙帽山发现"汉阳人"颅骨化石④，经初步鉴定属于晚期智人类型。

旧石器文化地点在郧县、郧西、丹江口、长阳、房县、武当山、神农架、襄阳、宜都、江陵、大冶、黄梅等全省范围都有发现，其中神农架犀牛洞海拔2102米⑤，是我国除西藏外海拔最高的旧石器地点。湖北地区所发现的人类化石地点也多共生石制品，郧县人遗址发现石制品291件⑥，以锤击法打片为主，多砾石石器，特征接近南方地区发现的石制品。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逐步向平原地区转移。1992年江陵鸡公山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活动遗址的空白⑦。鸡公山遗址上文化层出土石制品300余件，绝大部分是小石片石器；下文化层发现有打制石器的工场和其他一些遗迹现象，遗迹附近分布有大量砾石原料、半成品、石器和废料。这些都是研究当时生活方式不可多得的资料，同时这处遗址的发现还表明人类对江汉平原的开发历史可

提早到 4～5 万年前。

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比较清楚，除最早阶段文化面貌尚属空白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分别代表本地区新石器文化不同阶段，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各支文化还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类型。

城背溪文化属于距今约 7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使用工具仍以打制石器为主，陶器用泥片贴塑法成型，多夹砂、夹炭陶，绳纹较常见，釜、罐、钵、支座等类器发达，平底器和三足器极少。代表地点有枝城城背溪[8]、枝城北、枝江青龙山、秭归柳林溪、朝天嘴等遗址，分布范围集中于枝城以西至三峡的沿江一带。此外，1984 年在麻城后岗遗址也发现有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9]。

城背溪文化的发展去向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陶器以红衣红陶为主要特征，盛食器陶色常为外红内黑，有相当数量的夹炭陶，彩陶多黑彩，陶器多见釜、鼎、圈足盘、曲腹杯、豆、筒形瓶、器座、支座等。鄂西地区的大溪文化较为典型，其中三峡地区中堡岛类型文化面貌与川东的大溪遗址相同，打制石器发达，陶器中釜、罐、圈足盘、豆、支座等器类多见，彩陶数量不多。典型遗址有宜昌中堡岛[10]、伍相庙、清水滩、杨家湾，秭归龚家大沟、朝天嘴等。杨家湾遗址在 1981、1993、1994 年的数次发掘中，发现大量刻划符号，这些符号一般都刻在陶碗等类器的圈足上[11]，多数为单符，个别由多个符号组成，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发现刻划符号较多的一处遗址。江汉平原西部的关庙山类型石器多为磨制，陶器釜、圈足盘、曲腹杯、深腹豆常见，有少量的三足器。重要遗址有枝江关庙山[12]、松滋桂花树、枝城红花套、江陵荆南寺、朱家台等。1988～1992 年发掘的朱家台遗址揭露出丰富的大溪文化早期遗存[13]，分布密集的圆形和方形灰坑有一定规律性，可能用作祭祀坑，房基中发现有长方形台式建筑，台基的护坡经火烘烤成硬面，代表了大溪文化较高的建筑水平。

大溪文化在汉水以东地区形成油子岭类型，这一类型的主要遗存有京山油子岭[14]、天门谭家岭、钟祥六合、边畈、枣阳雕龙碑[15]等遗址。陶器以鼎、簋形器、深腹碗、曲腹杯、器座为代表性器类，薄胎斜壁彩陶碗极富特色。此类型文化有较多的北来文化因素影响，在雕龙碑遗址早期阶段，圆锥形足鼎与豫南仰韶文化同类器相似，中期阶段的釜形鼎、陶灶、部分彩陶纹饰则是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鉴于油子岭类型许多新的特点，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将汉东地区大溪文化时期遗存命名为新的文化类型。

湖北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进入繁荣阶段，屈家岭文化的分布遍及江汉地区，鼎盛时期向北发展到南阳盆地，向南进入洞庭湖地区，在湖北地区重要的地点有京山屈家岭[16]、天门石家河遗址群[17]、钟祥六合、随州西花园、宜城曹家楼、枝江关庙山等遗址。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泥质黑、灰陶，流行弦纹、镂孔，多见彩陶和磨光黑陶，陶器造型以双腹为特征，器类多见双腹碗、双腹鼎、双腹豆、高领罐、敞口薄胎

杯、高圈足杯、彩陶壶、深直腹甑等。典型的屈家岭文化中心范围主要在汉水中游的天门、京山、钟祥一带，彩陶纺轮、薄胎彩陶杯、凿形足深腹鼎是其特征性器类。在京山油子岭、屈家岭，天门谭家岭遗址发现的扁短足鼎、深腹碗、高领罐等与当地大溪文化有许多类似之处，可认为屈家岭文化的前身主要是由油子岭类型发展而来。

屈家岭文化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手工业等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发展。屈家岭文化的石制工具向小型、复合式演化，较多使用钻孔技术，石镰、镞等工具经常使用，并出现大型石犁。制陶技术进一步提高，轮制特别是快轮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陶器造型比较程式化。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大型祭祀活动，石家河遗址群邓家湾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泥质红陶筒形器，器形高大，上细下粗，壁上有齿轮形附加堆纹多周，这些筒形器集中分布于遗址东、南、西南部，附近有土台、火烬遗迹，这些可能是用于进行重要祭祀活动的遗存[18]。屈家岭文化在晚期阶段向西进入三峡地区，在中堡岛遗址中部约 80 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 23 个器物坑，坑内出土陶、石、玉器 1000 余件，陶器数量最多，多为高圈足杯[19]。这里也应是多次祭祀活动的场所。除此而外，屈家岭文化数量众多、制作精细的彩陶纺轮、陶响球也可能不全是有实用功能的器类。

屈家岭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聚落形态上。近年来长江中游发现一批属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的大型防护性建筑——城址，湖北省境内有城址 6 座[20]：天门石家河古城、石首走马岭古城、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古城、公安鸡鸣城、应城门板湾古城。这些城垣全部由夯土筑城，平地起建，护坡与主体部分一次筑成，在形制上有不很规则的方形、圆形等，这些特点反映出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原始性。从规模和布局上看，屈家岭文化古城明显可分为大小两类，石家河古城面积约 120 万平方米，据调查[21]，城址由城垣、护城环形壕和土台等大型工程构成，城址位于遗址群的中心位置，城内外均发现有相关时期遗址。除石家河古城外，其他城址规模小得多，面积均在 20 万平方米左右，城址之外直至城址附近一般都没有同时期遗存。屈家岭文化时期还出现了屈家岭遗址等大型中心聚落和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聚落群体。有观点认为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已经出现庞大的部落集团[22]。

鄂西北、鄂东地区相当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阶段的文化面貌有所不同。鄂西北的汉水中上游地区重要遗址有郧县青龙泉、丹江口（原名均县）朱家台遗址，陶器中红陶和灰陶均占较大比例，主要器形有红顶碗、大口深腹罐、高领罐、圆锥形足深腹鼎等，反映出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与江汉平原油子岭类型文化的交汇特征。鄂东地区近年来考古工作开展较多，经正式发掘的重要地点主要有黄冈螺蛳山[23]，麻城金罗家，武穴挂玉山、鼓山、尺山，黄梅陆墩[24]、塞墩和焦墩遗址。墓葬的发现较多，在挂玉山、鼓山、尺山和金罗家遗址发掘墓葬近 600 座，金罗家遗址中在一个探方 25 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墓葬 40 座，叠压与打破关系复杂。鄂东地处鄂、豫、皖、赣交汇之地，文化

面貌复杂，文化遗物中包含有西来的屈腹杯、簋形器、敛口豆、彩陶深腹碗等大溪文化因素和双腹鼎、高圈足豆、壶形器等屈家岭文化因素，也有北来于仰韶文化的因素如红顶碗、钵等，长江下游文化特别是薛家岗文化因素较多，如玉器有一定数量，钻孔石器如多孔石刀常见，陶器常见扁足釜形鼎、鸭嘴状足鼎、带把盉、碟形豆等。大体上说，大溪文化时期来自江汉平原的影响较大，而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薛家岗文化因素向西有强烈的扩张，分布于巴河以东的武穴、黄梅诸处遗存，可以归入薛家岗文化范畴。鄂东地区也发现带有原始宗教意义的遗存，1993 年在黄梅焦墩遗址发现龙、蛇、龟、角等卵石摆塑动物遗迹，所属时代自大溪文化时期起延续较长阶段，其中龙全长 4.46、高 2.28 米，昂首直身，曲颈卷尾，独角上扬[㉒]。中国早期龙的形象在辽河、黄河、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大约同一阶段开始出现，值得注意。

石家河文化是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在江汉地区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过去对这一文化曾经有“湖北龙山文化”、“季家湖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等诸多命名。石家河文化的某些因素如鼎、红陶杯、折腹壶形器、高领罐、高圈足豆都是承袭了屈家岭文化的特点，自身特征是以灰陶为主，方格纹、篮纹多见，典型器类还有盆形鼎、袋足鬶、厚胎红陶缸、鼓腹瓮、擂钵、圈足盘等。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向西进入三峡地区如秭归庙坪遗址，向东在鄂东麻城栗山岗、罗田庙山岗遗址有发现，鄂西北的郧县青龙泉、丹江口（原均县）乱石滩以及鄂东南通城尧家林遗址也属于这一文化范围。石家河文化面貌在当阳季家湖、随州西花园、房县七里河等不同区域地点表现出明显的共性，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是这一文化的中心区域。

经过 1987－1992 年的工作，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发现成为湖北省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收获。历年的工作表明，石家河遗址群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形成，经过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发展，至石家河文化时期成为由近 30 处遗址构成的大型聚落群[㉓]。不同的遗址在聚落群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谭家岭遗址位于遗址群中心位置，这里在大溪文化时期主要用作墓地，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存在大面积成片建筑遗存；在三房湾遗址的一处台地的堆积中，红陶杯的数量可能不下于数万乃至数十万件；邓家湾遗址中的某些灰坑集中出土陶塑小动物，常见的形象有鸡、狗、鸟、羊、象、猪、人等，有的灰坑出土陶塑动物上千件，这种灰坑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垃圾坑；邓家湾和肖家屋脊是石家河文化的两处重要墓地，随葬品反映出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肖家屋脊墓地 M7 墓坑较大，设有二层台，随葬品分组放置，数量多达 107 件，其中包括象征死者身份的石钺，同一墓地也有墓葬空无一物。这两处遗址也都发现了大量红陶缸遗迹，这些厚胎陶缸互相套接，延绵较长，缸底多不相通，有的陶缸上有刻划符号。石家河遗址群中还多次发现孔雀石块，夹砂厚胎缸也可用作冶铜，说明当时可能出现了冶铜手工业。这些现象体现了石家河文化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强

烈影响，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开始走向衰落。

二

随着中原地区王朝政权的建立，湖北地区古文化在中原文化冲击之下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当地文化传统因素在夏、商、周不同阶段还或强或弱地有所保留。

湖北地区与夏代相当的文化遗存可能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石家河文化的延续部分，包括钟祥六合、天门石家河、丹江口乱石滩、随州西花园、枝城石板巷子、宜昌白庙等遗址，有学者称为“后石家河文化”[27]，此类遗存中侧装足釜形鼎、高领鼓腹平底罐、敛口瓮、单把杯等典型器类都是在中原煤山二期文化中常见的器物，白庙遗址中常见的大口深腹罐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同类器相同[28]，它们在年代上应进入了夏代的纪年。稍晚的阶段，另一类即中原二里头文化由鄂东北地区进入湖北，并溯江而上到达江汉平原西部，这类遗址代表性地点是黄陂盘龙城[29]和江陵荆南寺遗址[30]，这两处遗址以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遗存为主，陶器器类有鬲、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浅盘高柄豆、花边口夹砂罐、大口尊等。

自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开始，商文化沿着二里头文化南进的线路进入湖北境内，其影响更大，向东更直至黄梅意生寺遗址，鄂东北地区基本都是商文化势力范围。盘龙城遗址这一时期仍然是商人重要的军事据点，并设有城址和宫殿等重要建筑设施，城址周围的杨家湾、李家嘴、杨家嘴等遗址都发现房基、手工业作坊、墓葬等遗迹，李家嘴 2 号墓长 3.7、宽 3.24 米，殉人 3 名，出土青铜礼器 23 件，是二里岗文化迄今所见最大墓葬。盘龙城遗址文化因素以商文化占绝对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土著的传统风格如红陶较多、红陶缸的大量存在、陶鬲裆部近平趋近于鼎等。

荆南寺遗址文化面貌更为复杂，陶器中鬲、甗、大口尊、假腹豆、深腹罐、爵、斝代表了中原文化因素，广肩小平底罐、高柄豆和豆形器、尖底杯以及泥质黑皮陶等因素是受到西来三星堆文化的影响，来自澧水流域的壶、碗和来自长江下游的印纹硬陶、原始瓷也占有一定比例，米粒纹釜、红陶缸、鬶等代表本地土著文化的器类较少，但数量较多。荆南寺遗址揭示出二里岗文化时期多种文化交汇地带独特的文化格局。

二里岗文化及稍晚的时期在商文化势力范围内多处发现青铜器。盘龙城是二里岗文化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地点之一，这里墓葬出土有鼎、鬲、甗、簋、觚、爵、斝、罍、盉、盘、卣等铜礼器数以百计，武器、工具的数量亦为数不少。盘龙城杨家湾 M11 出土圆鼎口径 60 厘米，是二里岗文化时期最大的圆鼎。此外，1977 年在随州淅河出土觚、爵、斝等铜器 13 件[31]，1987 年安陆姚河出土瓿、觚等铜器 4 件[32]，1992 年黄州下窑嘴商代墓葬中出土鬲、觚、爵、斝、瓿等铜器 16 件[33]，在应城盛滩、安陆程家

巷、黄陂官家寨和钟家岗、枝城王家渡也有铜器发现。这一时期青铜器在组合、器形、纹饰诸方面均与郑州所出商代铜器基本相同。

约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商文化势力开始在南方大范围退缩，湖北地区此后的商文化只发现于鄂东北如随州庙台子[34]、孝感聂家寨等不多的地点。庙台子发现5座可能属于商代的墓葬，均未见随葬品。该遗址陶器见鬲、甗、折肩罐、假腹豆、红陶缸，时代属于殷墟一、二期。商代末期遗存在鄂东北目前似仍属空白。

与此同时，土著文化势力在其他地区迅速抬头。在鄂东南地区有大冶上罗村、阳新大路铺[35]、黄梅焦墩等遗存，陶器多夹砂红陶，纹饰以间断条纹、绳纹为主，典型器类有长尖锥足鼎、尖锥状带刻槽足鼎形鬲、带护耳甗、条形镂孔豆等。这类遗存中常见有铜炼渣，并发现有铸铜石范。在江汉平原西部以沙市周梁玉桥[36]、官堤，江陵梅槐桥[37]为代表形成了周梁玉桥文化。周梁玉桥文化的陶器多夹砂红褐陶，纹饰多方格纹，典型器类有长锥足釜形鼎、釜、簋、红陶缸、折肩罐等，中原文化因素只发现鬲、簋等少量器类。在周梁玉桥和梅槐桥还发现不少的圆凿或长方形凿孔的卜用甲骨。在三峡和清江流域，商文化因素始终比较微弱，这一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打制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宜昌中堡岛、三斗坪、路家河及秭归朝天嘴[38]等遗存代表此类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陶器中广肩小平底罐、细长柄豆或豆形器、器盖、盉等三星堆文化因素占有优势；宜昌杨家嘴、长阳香炉石遗址[39]是较晚的发展阶段，陶器中以方格纹、错乱绳纹的釜居多，其他见杯、小口圜底罐、浅盘豆等，香炉石遗址发现有不少卜用甲骨，特点与周梁玉桥文化相近。上述地区的几支土著文化延续时间可能一直到西周早、中期，其族属分别与百越、百濮、早期巴人有关。

相当于殷墟晚期的青铜器，多属于窖藏性质。应城群力出土的鸮卣、汉阳沙帽山出土的“天兽御”觚形尊[40]、鄂城陈林寨出土的“冈父丁”爵特点与殷墟青铜器相同，有的可能就是从中原流入的。崇阳大市出土的兽面纹鼓、阳新白沙发现的铙、枣阳王城出土的兽面纹鼎[41]以及沙市东岳庙[42]的罍、江陵八姑台的尊[43]、枣阳新店发现的尊，都已出现了较多的南方地域特征。

武王灭商，周文化势力沿随枣走廊进入江汉地区，枣阳毛狗洞、黄陂鲁台山、大悟吕王城、蕲春毛家嘴、武昌放鹰台等西周早、中遗存揭示出周文化全新的面貌，青铜器也反映了周人或殷遗民南下的过程，1961年江陵万城出土“北子冈”族诸器[44]，冈族是商代晚期的一大显族；1977年黄陂鲁台山出土“长子”国铜器群[45]，“长子”之铭最近在河南鹿邑太清宫商墓中也有发现；1995年蕲春新屋垮窖藏出土方鼎、圆鼎、斗等青铜器7件[46]，其中“酉”族徽过去还见于附近的毛家嘴遗址，可能也来源于中原地区。

昭王南征的失败，周人对“南土”的控制力减弱，西周晚期以后地方文化又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鄂西可能主要是楚人的控制范围。鄂东地区随州庙台子、大悟吕王

城、罗田庙山岗、新洲香炉山、汉川乌龟山等遗存文化以瘪裆宽体鬲、敛口钵、浅盘豆为特征，也基本上脱离了中原周文化发展轨迹。两周之际方国青铜文化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大冶铜绿山冶矿遗址在西周以后采矿遗迹最为丰富，江陵江北农场出土的虎尊是西周时期为数不多的几件以虎为造型的牺尊[47]，武穴、大悟、武昌、大冶、江陵、秭归发现有为数不少的西周晚期青铜甬钟，襄阳、谷城、宜城、京山、钟祥、荆门、枝江等地发现蔡、鄀、黄、邓、徐、许、杞、𨟭息、塞诸国铜器。

曾国铜器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目前发现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曾国铜器已达20余批。范围涉及随州、枣阳、京山、襄阳和河南新野。重要的发现有京山苏家垅"曾侯中子斿父"器组、随州"曾侯乙墓"和"擂鼓墩二号墓"。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漆木竹器、玉器、金器等大量随葬器，失蜡法铸造的铜尊盘、一套65件编钟等乐器体现了曾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和音乐艺术水准[48]，该墓青铜器总重达1万公斤，是我国单墓所出青铜器最多的一次。近年在随州安居还发现可能为曾国都城的城址，并在随州擂鼓墩调查发现曾侯陵园。曾国的国族属性，有认为是文献记载中的随国、缯国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三

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是湖北地区最为重要的文物考古工作。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了楚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系。

城市的兴起是东周列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湖北地区发现的十几座楚城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东西两侧，在性质上包括有都城、陪都、县邑、军事城堡等不同类别[49]，江陵纪南城规模最大，面积达12平方公里，已发现城门5座，水门2座，城垣外还有护城河，城内发现多处建筑夯土台基、密集的水井、制陶作坊等遗迹[50]。宜城楚皇城、当阳季家湖古城也是规格较高的楚城，这几处古城何为楚郢都，目前学术界尚有较多的分歧。目前所知楚城的建造年代多属于春秋晚期以后，云梦楚皇城的始建年代晚至战国中期[51]，楚城的设置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一些楚城如襄阳邓城是楚灭亡其他诸侯国后改置的，铜矿资源产地如大冶铜绿山、阳新矿下等遗址附近也设有楚城，纪南城和楚皇城这类大型城市附近还分布有密集的村落遗址，纪南城东潜江龙湾遗址发现大型宫殿基址[52]，可能属于楚王离宫别馆性质。

湖北地区迄今发掘的楚墓数量不下4000座，楚墓的发现遍及全省，在鄂西北的房县、郧县，鄂西南的秭归、巴东，鄂东的鄂州、麻城县都有楚人墓地的发现。楚都纪南城周围的江陵、荆门、当阳、枝江一带分布着数以万计的不同类别的楚墓。通过对当阳赵家湖、江陵雨台山、九店墓地等小型墓葬的发掘，基本建立起东周时期楚墓年代学系

列，根据楚墓的主要随葬品——陶器分析可将楚墓分为七期，主要时代变化可分两大阶段：春秋时期陶器以实用器为主，基本组合为鬲、盂、豆、罐；战国时期以陶质明器为主，常使用鼎、敦、壶或鼎、簠、壶为基本组合的仿铜陶礼器，有的配以罍、盉、盘、匜等器类，战国晚期出现鼎、盒、壶组合。目前发掘的楚墓以战国早中期的数量最多，赵家湖墓地和九店墓地发现有少量西周晚期墓葬，器物组合与春秋楚墓相同，但文化特点比较接近中原周文化[53]。

江陵八陵山、枝江青山、荆门和江陵纪山等楚墓群分布有数量众多的大型楚墓。经过发掘的较大墓葬有江陵藤店1号墓，望山1、2号墓，天星观1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等，年代都属战国中期。天星观1号墓是湖北境内所发掘楚墓最大者，南北长41.2、东西宽37.2米，墓道长18.8米，墓主为楚封君番勅[54]。规模较大的楚墓一般都设有圆丘状封土。墓葬级别越高，封土规模越大，封土之间的距离越远，江陵樊妃冢、双冢封土周长超过300米，高度在13米以上[55]。荆门纪山墓地大薛家洼发现排列整齐的土冢组成陵园式墓地[56]，这里的一处南北向自然土岗的中、南部，分布着两个直径大于55米的大型土冢，中部土冢之北筑有两级矩形平台，平台东西两侧还筑有台阶，平台之北分布小型土冢44个，排列有序者4列10排，这些小冢可能属于陪葬墓的性质。因为有土冢的标志，大型楚墓多数被盗，出土物丰富者如包山2号墓见青铜礼器59件，漆木器100余件[57]。

鄂北地区襄阳邓城附近的山湾、余岗、团山，郧县城郊，鄂东孝感吴家坟，孝昌武家岗，麻城陈家湾，鄂城钢厂都发现数量较多的楚墓，鄂北地区楚墓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的影响。鄂东楚墓春秋晚期常见双耳罐，战国中晚期又多出壶形器，这两个地区楚墓陶礼器组合常见鼎、敦、壶而基本不见鼎、簠、壶，说明楚墓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别。

楚墓特别是战国时期楚墓的形制复杂。墓葬方向以南北向为主，其中又以南向居多。墓坑较宽大，多口大底小，口底尺寸差距较大，如包山2号墓墓口长34.4米，墓底长仅7米。木椁盖顶一般铺垫竹席或芦席，椁内常用隔板分成几个部分。棺多为长方盒形或悬底弧形，棺、椁各用榫、卯搭接而成。棺、椁之外多用膏泥封塞。大型楚墓大多为东西向特别是东向，除使用封土外还设有墓道和台阶，椁分多室，棺有数重，如天星观1号墓设台阶15级，椁分7室，棺为3重。少数楚墓还设有其他附属设施。当阳曹家岗5号墓东侧设有附葬坑，出土有“王孙雹”簠等铜礼器[58]。1989年宜城罗岗发现战国中期车马坑[59]，埋有7辆车、18匹马。这与九店楚墓车马坑是目前湖北境内仅见的两座楚车马坑。

湖北楚墓及其他遗存出土大批文物，是研究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物资料。由于楚墓密封的保存条件，漆竹木器、丝织品、皮革制品等有机物质的随葬品得以保存至今，这是先秦时期其他文化系统所不能比拟的。

青铜器仍然是楚墓中反映身份等级最重要的随葬品。大夫级以上高级贵族墓随葬礼、乐、车马器等多种多套组合的器类，包山2号墓出铜礼器59件，其中两套铜鼎19件。小型贵族墓铜礼器以鼎或鼎、敦、壶（或尊缶）为组合，有的配以盘、匜等水器。在用鼎制度上可能存在高级贵族用奇数鼎制、中下层贵族用偶数鼎制的区别[60]。制作精美的器盖、灯具、镜等生活用器是战国时期楚国铜器新兴的类别，包山、望山、九店楚墓出土的镶嵌樽、镂孔杯、人俑及人骑驼形灯、错金银龙首杖、圆形镂空凤纹双层镜等器代表了楚国青铜器较高的工艺水平。兵器是楚墓中最为常见的青铜器类，种类包括剑、匕首、戈、戟、矛、镞、弩机等，九店楚墓578座墓葬出兵器的墓有235座，足见楚人尚武之风。楚墓出土兵器有不少吴、越的产品，迄今在湖北江陵、襄阳、荆门、秭归等地发现吴王、越王剑、矛、戈多达11件。楚国青铜器在铸造上掌握了失蜡法、分铸焊接等先进技术，装饰上广泛用嵌错红铜、金银、绿松石工艺。青铜兵器的铸造采用不同合金成分铸出复合式铜剑，在剑、矛等类器上铸出暗纹增加抗朽蚀能力，说明楚国青铜铸造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楚国髹漆工艺十分发达。楚漆器在江陵一带楚墓中有大量出土，江陵拍马山、望山、雨台山、九店、天星观，荆门包山等墓地发现漆器较多，属于楚文化系统的曾侯乙墓也发现漆器200余件。1988年当阳赵巷M2、M4发现春秋中晚期漆方壶、簋、豆、俎、瓒等[61]，是研究楚国早期漆器制作的重要资料。楚国漆器的种类有60多种，按用途可分为饮食用品如耳杯、盒、卮、豆、酒具盒等，日常用器有几、案、俎、杖、梳篦等，乐器有鼓、瑟、琴、笙等，工艺品有座屏、飞鸟、鹿等，丧葬用品有棺、俑、笭床、镇墓兽、虎座飞鸟，兵器有剑、戈、矛、戟的盒、鞘及柲柄等。镇墓兽是楚文化的特有之物，目前已发现的数量在300件以上，其造型独特，结构复杂，一般在每座墓葬中只发现1件，对它的寓意学术界有土伯、镇墓神等许多种看法。楚漆器将实用性与艺术性完善地结合，彩绘木雕座屏、凤鸟双联杯、浮雕龙纹盖豆、彩绘车马人物奁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楚墓中竹木器的发现也很普遍，包山2号墓出土的木折叠床构思巧妙、设计合理，反映了古代匠人的超凡智慧。

江陵天星观1号墓，望山1、2号墓，藤店10号墓，秦家嘴三座楚墓，九店56号墓，鸡公山48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郭店1号墓以及老河口市，黄冈市几座楚墓都出土了较多竹简，迄今发现竹简字数总计在4万字以上，主要内容有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等。九店56号墓出的“日书”说明过去出土的秦简“日书”可能起源于楚简。包山2号墓简文涉及楚国司法、历法、地理、卜筮、器用和楚人先祖诸方面内容，是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郭店楚简内容丰富[62]，包含多部以道、儒两家学说为主的文献，其中《老子》简文与今本《老子》内容相似，但传本与今天所知的不同，采用的是短篇幅的对话体，另有简文与今本《礼记》某些篇章相似，证明《礼记》某些篇章成书

不晚于战国时期，郭店楚简13000字，是目前已发掘楚墓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

楚国的皮革制品主要是武器和生活用具，包山2号墓、曹家岗5号墓发现有皮革裁制的用具。丝织品在包山2号墓、江陵马山1号墓[63]有大量的发现，制品有锦袍、单衣、夹衣、被、帽等20余种，其中针织、刺绣制品的发现说明楚人已经掌握了很高的纺织水平。

1994年，荆门郭家岗楚墓因被盗掘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战国时期女尸，这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具古尸。

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早期楚文化的探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考古工作者对文献记载早期楚人可能活动的三峡、沮漳河流域、鄂北汉水中上游一带进行重点的工作，可以确定楚文化在三峡地区占统治地位迟至春秋早期以后，从而否认了所谓"秭归说"。在沮漳河流域发现当阳磨盘山、李木岗，江陵张家山、荆南寺、摩天岭、梅槐桥等一批西周晚期及春秋早期遗存，以鬲、盂、豆、罐为基本组合的陶器接近于相应时代赵家湖墓葬同类器，被许多学者认为属于早期楚文化。鄂北一带的襄樊真武山、宜城郭家岗、肖家岭等遗址西周中期以后文化特征与沮漳河流域相似，而且与晚期楚文化有着循序渐进的发展关系，也被认为是楚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楚文化早期遗存的确定及中心区域——早期楚都丹阳的定位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四

公元前278年，秦军拔郢进占江汉地区，因此秦人在湖北地区的遗存包含了战国晚期和秦代两个时期。1975年发掘的云梦睡虎地秦墓七号墓为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十一号墓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64]。在宜昌、江陵、宜城、郧县、襄阳、云梦、麻城等地都发现有秦人墓葬，其规模都较小。战国时期的秦墓多分布于鄂西地区。不过湖北地区秦统一前后两个时期的秦墓，墓葬习俗、规模、随葬品的组合、器物形制等都很相似，在文化上一脉相承。秦墓头向多向西向北，墓坑壁较陡直，不设台阶，葬具的椁室设置门板，棺为平底长方盒形。随葬品中陶、铜器以日用陶器居多，器类有鼎、盒、壶、罐、瓮、盂等，秦式的蒜头壶、鍪、甑釜、小口广肩罐等常见，礼器、乐器、兵器和丧葬用品数量大大减少。这些特点与战国时期的楚墓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楚文化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秦墓中填土多经夯筑，靠近椁室填塞青膏泥，椁内用隔梁分成椁室、以芦席裹尸等埋葬习俗仍是对楚文化传统的保留。

江陵、云梦秦墓保存较好，出有大量简牍和漆木器。云梦睡虎地秦简共1150余支[65]，近4万字，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杂抄》、《效律》、《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10种，简文反映了秦人在政

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简文保留的秦律的许多内容，是法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89年云梦龙岗6号墓出土竹简150余支[66]，年代较睡虎地简略晚，内容也是以律文为主，涉及禁苑、马道、田地、马牛羊管理等法律条文，有的简文与睡虎地简相同，有关驰道管理的律文则是目前了解秦汉驰道及相关问题的唯一实物资料。1993年，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日书》、《效律》、《易占》等类秦简[67]，《易占》类简文与前人所辑引的《归藏》大部分吻合，证实了《归藏》一书的存在与流传，其内容还说明了商末以前产生的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在其后的运用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江陵、云梦秦墓出土的漆器主要器类有圆盒、奁、卮、壶、扁壶、盂、耳杯、双耳长盒、樽等20种以上，其中具有典型特征的器物是扁壶、圆盒、盂及双耳长盒等，器类的主要用途与战国时期相同，但生活用具的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了，秦漆器上常用烙印、针刻、墨书文字，内容有反映制作漆器分工、工序的“包”、“素”、“上”、“告”，反映秦代“物勒工名”制度的“女里张”、“宜里□”，标明作坊性质的“咸亭”、“咸市”、“许市”等，对于研究秦漆器的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很有价值。

湖北西汉墓葬的发现遍及全省，较重要的有江陵凤凰山、张家山，云梦大汶头，襄阳擂鼓台，老河口（原名光化）五座坟，郧县城郊，丹江口肖川等墓地。这些汉墓在年代上可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汉初至文、景时期，汉武帝至宣元时期，汉成王至王莽时期。时代较早的汉墓仍延续有木椁外填塞膏泥的做法，采用夫妇异穴合葬，西汉晚期逐渐流行夫妇同穴合葬，并在湖北地区首次出现小砖室墓，随州安居汉墓由前堂和后室两部分组成[68]，平面呈“ꟷ”形，前堂为小砖券顶，后室为土坑竖穴。在随葬品方面，较早的汉墓使用铜质或陶质礼器较多，也有日用器如鍪、蒜头壶、缸、盆、甑及陶明器仓和灶，多出半两钱、弦纹铜镜和山字纹铜镜。在江陵地区，还保留有楚人或秦人的埋葬习俗。较晚的汉墓模型明器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常见井、家畜、家禽模型。多见五铢钱并兼出剪轮五铢及王莽钱，铜镜种类较多，流行规矩纹镜、四乳禽兽纹镜、蟠虺纹镜。湖北地区的大型西汉墓有的带有封土与墓道，随葬品种类较多。江陵凤凰山M168设斜坡墓道[69]，墓口长6.2米，葬具为一椁重棺，随葬品500多件，质料包括漆、竹、木、陶、铜、玉、丝麻织品及动植物等，特别重要的是墓主（男）尸体保存良好，墓主爵位为五大夫。江陵杨家山M135有封土[70]，墓葬规模与凤凰山M168相近，葬具也为一椁重棺，出土的鼎、钫、釜、甑、洗等铜器制作精巧，说明汉初的青铜制作仍保持了较高的工艺水平。中型墓葬一般没有封土和墓道，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多是一、两套陶礼器日用器和一定数量的漆木器，铜器的数量较少。江陵高台M18出鼎、盒、壶等陶礼器二套和耳杯、盘、俑等漆木器，墓主身份为拥有家奴的中小地主[71]。小型墓的墓坑较小，属单棺土圹墓，这类墓不见封土与墓道，随葬品一般为一套陶器，基

本不见漆器和铜容器，墓主生前的身份属于庶民阶层。

湖北地区出土汉代竹、木简牍数量较多，出土地点包括云梦大坟头，江陵张家山、毛家园、凤凰山、杨家山、高台，沙市王家台等。主要内容有记载随葬物品的遣策、记载墓主身份和地位的告地书以及法律、医学方面的文书等。凤凰山M168竹牍、高台M18木牍告地书中都有“江陵丞”的记载，说明西汉以来“江陵”这一地名并无变迁，这对于战国时期楚郢都的定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书类的竹简主要发现于张家山M247、249、258[22]和M327、336[23]，竹简数量达2000余支，涉及法律、军事、医学、算书、历法诸多方面，其中法律条文的内容最为丰富，有些律名如《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等与睡虎地简秦律相同，不同的律名有《杂律》、《均输律》、《史律》，《奏谳书》包含春秋至西汉时期案例20余件。军事方面《盖庐》表达了东周时期的军事思想，《功令》内容为西汉初期戍边战斗立功的具体记载方式和官序的递补序列。医学方面的《脉书》、《引书》等内容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一些相关的记载接近。《七年质日》等历谱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历谱。《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数学著作。以上简文涉及汉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研究西汉历史有重大价值。

西汉墓（主要是西汉早中期墓）出土大量的漆器。西汉漆器较多继承秦代漆器特点，器物品种和用途跟秦代相似，耳杯在这一时期最为常见，有的墓出土耳杯数量达100多件。汉漆器制作工艺亦与秦代相似，但胎骨较薄的漆器较多，纹饰风格亦较秦代纤细简洁。在江陵、云梦一些汉墓中的陶器中也有不少外表髹漆，这种漆衣陶器的经常使用，反映了西汉时期漆器在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西汉早期的漆器也常见烙印、针刻和墨书文字，内容也是反映制漆工序和地点。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的漆器受秦代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湖北地区东汉时期开始流行砖室墓。在云梦、宜昌、宜都、郧县、荆门、枣阳、襄阳、房县等地发现的砖室墓多为中小型长方形券顶单室或双室墓，有的带有墓道与甬道，墓壁都用几何纹砖错缝平砌，带耳室和穹窿顶结构的砖室墓在湖北地区少见。宜都陆城的东汉墓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属夫妻合葬墓[24]，墓室长10.45米，随葬品有数量较多的陶、青瓷、釉陶、铜器和金、银饰件，墓主身份为“偏将军”。在巴东、兴山、武汉等地还发现东汉晚期纪年砖室墓。湖北北部的襄阳、当阳、枣阳、随州等地发现一些汉画像石墓，这是由砖、石混合建造而成的多室墓，画像石内容、风格与河南南阳地区接近，但不如南阳画像石内容丰富，一般只有青龙、白虎等瑞禽兽图像。在枝江、当阳还发现有画像砖墓[25]，画像内容主要有车马出行、宴乐、百兽、羽人等，表现手法高超。东汉墓葬的随葬品以日用器罐、盆、钵、甑、釜和模型明器仓、灶、井为主，反映庄园经济的六畜俑、碓、磨等明器亦较常见，礼器之属如鼎、盒、壶少见并逐步消失，

铜器一般有铜镜和货币。规模较大的墓葬还随葬有较多的釉陶器和青瓷器，并有陶楼明器。身份较高的还出有金银饰件。

五

位于鄂州市的武昌城是六朝时期南方的重要城市[76]，也是南方现存六朝古城中最早的一座，城址北临长江，平面略作长方形，东、西、南三面夯筑城墙，外设城壕。在城的四角和南垣外侧发现有夯土台基，应是属于防卫设施的“角楼”和“马面”。城址北部发现有大量孙吴、两晋时期遗物，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武昌宫”。武昌城建城的政治、军事目的明显，城址的使用年代仅限于六朝时期，因此较完整地保留了六朝时期都城原始面貌，城址的布局特别是“角楼”和“马面”的设置等方面属于中国古城中较早的实例，因此武昌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朝时期墓葬以鄂州、武昌两地发现最多，仅鄂城一地墓葬总数即在500座以上。此外在襄阳、宜都、枝江、公安、宜昌、江陵、汉阳、汉川、蒲圻、新洲等地也有发现。已发现有纪年的六朝墓葬数量较多，近年发现的纪年墓有老河口李楼泰始九年西晋墓[77]，鄂州塘角头M2永安四年东吴墓[78]、蒲圻赤壁永兴二年西晋墓[79]、新洲旧街镇太康元年西晋墓[80]、枝江搜车庙永和元年东晋墓[81]、房县郭家庄永明十年南齐墓[82]、武昌三官殿普通元年梁墓[83]。这些纪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断代提供了新资料。

六朝砖室墓流行小砖砌筑，平面形状呈“凸”字形、“中”字形、“刀”字形单室墓和带甬道的前、后双室墓最为盛行。墓室多平砖顺砌和“三顺一丁”式墓壁砌法，墓底砌平砖铺缝平错和人字形铺地砖，墓砖的尺寸由大变小，砖上常饰几何纹、花卉、动物纹、人物和吉祥用语、纪年铭文。祭台、棺床、排水沟和灯龛等设施逐步出现，为了加固墓室，较晚阶段还流行设砖柱。鄂州鄂钢饮料厂M1墓室长14.5、宽5.68米[84]，墓中出有“将军孙邻弩一张”铜弩机，墓主可能为孙吴宗室，该墓是已发掘的长江流域六朝墓中规模最大、墓主身份最高的一座。在江陵黄山[85]、襄阳贾家冲[86]还发现有南朝时期画像砖墓，画像风格与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的画像风格接近。

青瓷器是六朝时期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手工业产品。湖北地区六朝青瓷器主要可分为日常生活用具和模型明器等，前类器主要有盘口壶、鸡首壶、盘、罐、碗、熏、果盒、唾盂、灯、虎子、水注等20余种，模型明器有房屋、井、仓、灶、磨、碓、案等10余种，器类的装饰纹样和造型特征都同早期越窑的产品基本类似，但青瓷器绝大部分应属于本地产品。鄂州塘角头M2出土的一件蛙形水注，造型生动、精美，是早期青瓷器的代表之作。鄂州东吴孙将军墓中“孙将军门楼”[87]、鄂钢饮料厂M1出土的青瓷坞堡模型反映了当时豪门大族府第的建筑情况。塘角头M4出土的釉陶佛像是目前所见

我国最早的独立出现的佛像，为研究早期佛教造像及佛教的南传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湖北地区隋唐考古资料，主要集中在今武昌周围发现的一批隋唐墓葬上，迄今在武昌周家大湾、何家垅、新村湾、石牌岭、马房山等地发掘的隋唐墓葬在300座以上。不过这些资料多未发表。此外在黄石、安陆、京山、郧县也有隋唐墓葬发现，如郧县发现的李泰家族墓地[88]（包括唐濮王李泰墓、泰妻阎婉墓、泰长子嗣濮王李欣墓、泰次子新安郡王李徽墓）、安陆发现的唐吴王妃杨氏墓[89]，都是南方地区发现为数不多的大型墓葬。湖北地区隋唐墓结构基本上沿袭了本地六朝墓葬传统，以竖穴土坑砖室墓为主，少量的竖穴土坑墓。砖室墓主要有券顶带甬道、墓道的单室墓和前后室带耳室穹窿顶墓，墓室常设棺床、祭台、排水沟、壁龛等附属结构。随葬品较为丰富，陶瓷生活用具常见盘口壶、带耳罐、双唇罐、碗、灯盏、砚等数十个品种，陶瓷镇墓兽、各类俑等模型明器也较流行，唐代前期的高级别墓葬还出有三彩器和工艺上乘的金、银、铜质器类，说明了湖北地区隋唐时期文化水平较为发达。

湖北地区宋代墓葬均属中小型墓，其特征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武汉、黄陂、麻城、英山、罗田等鄂东南地区主要流行长方形单室或双室并列墓，墓顶多为平顶，除砖室墓外，也见石室或砖石并用结构。在汉水中游的襄樊、荆门、枣阳、均县、郧县等地墓葬结构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多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室四壁用砖砌出仿木结构的柱、门、窗等构件。这种砖室墓在北宋时期平面结构流行圆形单室墓，其后墓室平面有方形、多边形、前后室等变化。襄樊油坊岗的七座仿木结构宋墓[90]，有的墓门处筑有仿木结构的牌楼，有的在墓室内壁嵌有砖拼及砖雕的桌、椅、门、窗、案、灶、灯台、剪刀、熨斗图案，以此暗喻现实生活中建筑的空间结构。湖北地区元代墓葬少见，1984年黄陂周家田发现的“韩门肖氏淑贞二小娘之墓”是一座三室并列的长方形砖石结构墓[91]，墓制仍较多地延用宋墓旧制。宋元墓葬的随葬器均不很丰富，常见种类有日用瓷器、铜镜、铜钱、金银首饰，随葬墓志和买地券的现象也较普遍，在武昌傅家坡[92]、黄州[93]还发现有反映抗金、元史实的墓志及墓碑。

武汉、鄂州等地分布着大量的两宋时期瓷窑遗址，仅武昌一带就有上百座窑址，近年来对武昌青山窑、湖泗窑的发掘首次揭示了武昌地区窑系面貌。青山瓷窑属于五代至北宋时期[94]，已发掘的两座南北并列的龙窑长度均在40米以上，窑址出土了大量窑具和瓷器，瓷器主要有青瓷、白瓷和影青瓷，其中影青瓷特性与德化窑同类产品接近。

宋元考古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发现。1993～1996年在对当阳玉泉寺铁塔解体修缮中，对塔基和地宫进行了发掘[95]，其出土文物为研究铁塔建造史、玉泉寺历史沿革以及唐宋时期地宫瘗藏制度提供了佐证。1993年发掘蕲春罗州城宋代城垣时发现大量陶质弹丸[96]，印证了文献中因战争废弃罗州城的记载。湖北各地还多次发现宋元时期金、银、铜器窖藏，出土大量金银首饰、银铤和铜钱。黄石西塞山的一座宋代钱窖内藏铜钱达

11 万余公斤[㊲]，包括西汉初期至南宋 1400 多年间各代铜钱，为我国货币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湖北各地明代墓葬数量众多，考古发现的明墓多见于以蕲春、武昌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和以江陵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部。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或椭圆形单室墓，墓室的筑构有砖墓、碗墓、"三合土"墓、石室墓、土坑墓诸种，随葬品最常见的有陶瓷生活用具、金银装饰用品以及丧葬专用的买地券、墓志。已发现较为重要的明墓有钟祥范氏一品夫人墓、沙市明首辅张居正墓、武穴冯家林一品夫人墓、江陵八岭山王妃曹氏墓、蕲春刘娘井明次妃刘氏墓、武昌龙泉山楚昭山妃墓。湖北地区还分布有明代皇陵和一批藩王墓，如钟祥松林山明世宗亲生父母兴献王朱佑杬和王妃合葬墓——显陵[㊳]，显陵依皇陵规模筑构，布局上主要由内外两城、神道、明楼、祭殿、前后宝城组成，陵园建筑、石刻风格与十三陵相同。明藩王墓经发掘的有武昌龙泉山楚昭王墓[㊴]、江陵八岭山辽简王墓[㊵]和江陵太晖观湘献王墓。武昌龙泉山是明朝历代楚王入葬之地，1991 年发掘的楚昭王朱桢墓为土圹砖室墓，墓室为长方形单室券顶，长 11.8 米，设有壁龛、棺床、墓道和排水沟，墓室外积炭。出土物 100 余件，多为明器，较重要的有金腰带、金封册、金谥册、翠青釉瓷碗等。辽简王朱植墓规模略大，砖室结构由前室、甬道、中室、后室、耳室组成，长 21.8 米。此墓多次被盗，随葬品较为简陋，大部分亦为明器。以上明王墓的发掘为研究明代亲王墓制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随葬品明器化的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

（执笔：张昌平）

注　释

① 许春华等：《鄂西巨猿化石及其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4 年 4 期。
② 李天元等：《湖北省郧县曲远河口化石地点调查与试掘》，《江汉考古》1991 年 2 期。
③ 贾兰坡：《长阳人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古脊椎动物学报》1957 年 3 期。
④ 李天元：《武汉市汉南区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江汉考古》1997 年 2 期。
⑤ 武仙竹：《神农架犀牛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8 年 2 期。
⑥ 李炎贤等：《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1998 年 2 期。
⑦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2 月 20 日。
⑧ 陈振裕、杨权喜：《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史前研究》1989 年。
⑨ 杨定爱：《麻城县谢家墩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⑩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 年 1 期。
⑪ 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 年 8 期。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 年 4 期。
⑬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江陵朱家台遗址 1991 年的发掘》，《考古学报》1996 年 4 期。

⑭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京山油子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考古》1994年10期。
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市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7期。
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京山屈家岭》，1956年。屈家岭考古发掘队：《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1期。
⑰ 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⑱ 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
⑲ 卢德佩：《湖北宜昌中堡岛发现原始社会群体器物坑》，《江汉考古》1994年4期。
⑳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7期；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6期；《应城门板湾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4日。
㉑㉖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5辑。
㉒ 同⑳张绪球文。
㉓ 湖北省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考古学报》1987年3期。
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1年6期。
㉕ 陈树祥：《黄梅发现新石器时代卵石摆塑巨龙》，《中国文物报》1993年33期。
㉗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㉘ 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白庙遗迹1993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1期。
㉙ 湖北省博物馆：《1963年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1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发掘纪要》，《文物》1976年2期。
㉚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8期。
㉛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1年8期。
㉜ 余从新：《湖北安陆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94年1期。
㉝ 黄冈地区博物馆等：《湖北省黄州市下窑嘴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6期。
㉞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大路铺遗址东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3期。
㊱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7年10辑。
㊲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9期。
㊳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2期。
㊴ 湖北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文物》1995年9期。
㊵ 湖北省博物馆：《汉阳东城垸纱帽山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3期。
㊶ 徐正国：《湖北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94年4期。
㊷ 彭锦华：《沙市近郊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江汉考古》1987年4期。
㊸ 王从礼：《记江陵岑河庙兴八姑台出土商代铜尊》，《文物》1993年8期。
㊹ 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63年4期。
㊺ 黄陂县文化馆等：《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2期。
㊻ 湖北黄冈市博物馆：《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塆西周铜器窖藏》，《文物》1997年12期。
㊼ 何驽：《湖北江陵江北农场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94年9期。
㊽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㊾ 陈振裕：《东周楚城的类型分析》，《江汉考古》1992年1期。

50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 年 3、4 期。

5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92 云梦楚王城发掘简报》，《文物》1994 年 4 期。

52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潜江龙湾发现楚国大型宫殿遗址》，《江汉考古》1987 年 3 期。

5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 年。

54 荆州博物馆：《江陵天星观 1 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 年 1 期。

55 江陵县文物工作组：《湖北江陵楚冢调查》，《考古学集刊》1984 年 4 集。

56 荆门市博物馆：《纪山楚冢调查》，《江汉考古》1992 年 1 期。

57 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58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 5 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 年 4 期。

5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宜城罗岗车马坑》，《文物》1993 年 12 期。

60 同57附录十五：《由包山二号楚墓看楚系贵族墓的用鼎制度》。

61 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当阳赵巷 4 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 10 期；《当阳赵巷楚墓第二次发掘》，《江汉考古》1991 年 1 期。

62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年。

63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 年。

64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

6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 年。

66 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 年。

67 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 年。

68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安居镇汉墓》，《江汉考古》1987 年 1 期。

6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 年 4 期。

70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扬家山 135 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 年第 8 期。此墓年代应属西汉早期。

71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高台 18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 8 期。

72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 年 1 期。

73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 年 9 期。

74 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宜都陆城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88 年 10 期。

75 黄道华：《枝江姚家港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江汉考古》1991 年第 1 期；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当阳半月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 12 期。

76 蒋赞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

77 老河口市博物馆：《湖北老河口李楼西晋纪年墓》，《考古》1998 年 2 期。

7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鄂城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 年 11 期。

79 蒲圻赤壁西晋墓考古发掘队：《蒲圻赤壁西晋纪年金氏墓》，《江汉考古》1992 年 4 期。

80 王善才、胡金豪：《湖北新洲旧街镇发现两座西晋墓》，《考古》1995 年 4 期。

81 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枝江县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墓》，《考古》1990 年 12 期。

82 房县博物馆：《房县郭家庄南昌纪年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 年 3 期。

83 武汉市博物馆：《武昌东湖三官殿南朝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 年 2 期。

84 鄂州博物馆等：《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 年 1 期。

⑮ 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黄山南朝墓》，《江汉考古》1986年2期
㊱ 襄樊市文物管理处：《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江汉考古》1986年1期。
㊲ 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期。
㊳ 高仲达：《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年2期；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8期。
㊴ 孝感地区博物馆：《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文物》1985年2期。
⑩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油坊岗七座宋墓》，《考古》1995年5期。
⑪ 武汉市博物馆：《黄陂县周家田元墓》，《文物》1989年5期。
⑫ 湖北省博物馆：《武昌傅家坡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3期。
⑬ 王善才：《宋武略大夫李椿墓碑》，《文物》1987年3期。
⑭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青山瓷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4期。
⑮ 湖北省玉泉铁塔考古队：《湖北当阳玉泉铁塔塔基及地宫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0期。
⑯ 黄冈市博物馆：《1993年蕲春罗州城宋代城垣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7年1期。
⑰ 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发现的宋代窖藏铜钱》，《考古》1973年4期。
⑱ 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县明显陵调查记》，《江汉考古》1984年4期。
⑲ 付守平：《明代楚昭王朱桢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1期。
⑳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8期。

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湖南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就辉煌，无论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均有令人震惊的成果。

一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长期处于落后状态，1987年以前在中国旧石器文化分布图上湖南省呈现着一块醒目的空白地区。1987年4月25日，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桥溪的网纹红土中发现了打击石片和石片砍斫器各1件[①]，首次确证了湖南旧石器的存在，并且导致人们将寻找旧石器的目光集中到网纹红土地层。之后，湖南大批旧石器地点被发现，截至目前为止，总数超过200处，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湖南旧石器绝大多数埋藏于河流阶地堆积中。根据湖南四水流域河流阶地的发育历史，这些旧石器属于不同的地质时代，可从中更新世早期延续至晚更新世晚期，说明湖南旧石器文化有一个从早期到晚期的完整过程。

湖南旧石器的风格，整体上表现为砾石石器工业传统。目前资料最丰富的沅水和澧水流域，虽同为砾石石器传统，但又存在着两个具有独立特点的区域性文化类群，即㵲水（沅水的一个支流）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㵲水文化类群经过正式发掘的有新晃大桥溪、长乐坪[②]，芷江小河口[③]，泸溪灰窑、岩坪、田溪口，怀化岩屋滩等处。石器以灰色、灰黄色条带状变质砂岩为主要原料，剥片与加工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间有锐棱砸击法剥片和碰钻法加工砾石石器，经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很少。石器以单面刃为主，由单向打击而成。石制品以大型为主，但与澧水流域旧石器比较，个体相对略小。石制品类型有石片、石核、碎片和石器。石器种类单调，主要为砍砸器，次为刮削器，而尖状器较少。富有特色的石制品是宽大薄石片、侧身长刃砍砸器、短身尖刃砍砸器、双边刃砍砸器等。澧水文化类群主要分布于澧水流域和洞庭湖西岸平原，包括沅水下游的丘陵平原区。已正式发掘的有津市虎爪山[④]，澧县鸡公垱[⑤]、乌鸦山[⑥]，石门燕儿洞[⑦]、大

圣庙[8]等处。澧水文化类群的石器均以河床砾石为原料，早、中期器体硕大浑厚，最大径通常达28厘米以上。岩性主要为红色石英岩和石英砂岩，少量燧石、石英和硅质岩。石器组合丰富，有砍砸器、大尖状器、似手斧、石球、石锤等。晚期石器明显小型化，岩性以硅质岩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和石英砂岩，少量石英、燧石。小型石制品急剧上升为主要地位，出现了长三角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等。澧水文化类群的打片与修理方法基本上只见锤击法，偶见砸击法。石器加工有单面打击、两面打击和错向打击，第二步加工的石器所占比例小，随着时间推移有增加的趋势。

湖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仅两处，其中石门县阳泉乡燕儿洞于1990年和1993年先后两次发掘。该遗址出土人类化石有左股骨残段、下颌骨残段、趾骨各1件，右下臼齿、右上臼齿、前臼齿各1枚，这批人类化石是湖南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出土石制品20余件，石料分两类：一类为石英砂岩和砂岩，没有摆脱澧水文化类群的砾石石器传统；一类为黑色燧石，系典型的细小石器，为湖南旧石器文化中新出现的石器工业传统，显示出与澧水平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中细小燧石器工业的渊源关系。洞穴中出土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20余种，其中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犀为绝灭种，现生种比例达77%。根据动物化石组合可判定燕儿洞遗存的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反映了澧水文化类群的另一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

二

1974年冬对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的发掘，是我省第一次较大面积对史前遗址的科学发掘[9]。之后20多年来，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澧县丁家岗[10]、彭头山[11]、八十垱[12]、孙家岗[13]、城头山[14]，安乡县汤家岗[15]、划城岗[16]、度家岗[17]，华容县车轱山[18]、刘卜台[19]，临澧县胡家屋场[20]，石门县皂市（下层）[21]，南县涂家台[22]，津市罗家台[23]、钱粮湖农场坟山堡[24]，汨罗市黄家园和附山园[25]，长沙县南托[26]，平江县献冲舵上坪[27]，湘乡市岱子坪[28]，湘潭县堆子岭[29]，茶陵县独岭坳[30]，株洲县磨山[31]，泸溪县浦市[32]，黔阳县高庙[33]，辰溪县征溪口和松溪口[34]，怀化县高坎垅[35]，靖州市斗篷坡[36]等数十处。通过对各个遗址文化内涵的分析，可以将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湘江和资江中下游、沅水中上游、湘江和资江上游四个区。其中洞庭湖西北岸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工作做得最多，考古学文化编年最清楚，从距今9000年开始，先后经历了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7800年）、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800～6800年）、汤家岗文化（距今6800～63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52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200～46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3800年）等几个阶段。湘江中下游也经历了相似的几个发展阶段。即黄家园下层遗存—南托大塘文化—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

遗存—石家河文化。黄家园下层略晚于彭头山文化，而南托大塘文化相当于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时期。沅水中上游目前发现最早的是高庙文化，距今超过7000年，它是以高庙遗址下层为代表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征溪口和松溪口遗存相当于洞庭湖区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早期，而高庙上层则与大溪文化面貌有诸多相似。怀化高坎垅遗址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屈家岭文化十分接近，虽有其地方特点，如无鼎、多带耳器，但仍可视为屈家岭文化的一个类型。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怀化市以北为石家河文化的地盘，而怀化以南以斗篷坡遗址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为代表，则表现与珠江流域诸多接近，当是反映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向北的扩展。

彭头山遗址正式发掘是在1988年冬，由于其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于长江中游过去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且明显表现出原始古老的面貌，因此被正式命名为彭头山文化。其^{14}C测年分别为距今7770±100、7815±100、7945±100、7945±170、8135±90、8200±120、8380±115、9100±120年，均已超出达曼校正表所列树轮校正范围，推定其年代上限为9000年，下限在7800年左右，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范围。彭头山遗址所出石器与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如澧县乌鸦山、石门燕儿洞所出有紧密的联系和承袭，除极少量磨制小型石锛、凿和装饰品棒、珠、管外，绝大多数为打制的砾石石器和黑色燧石小石器。砾石石器中出现了极少粗陋的盘状器，此后这些黑色燧石小石器和打制的盘状器，一直见之于大溪文化早期以前的各个文化中。彭头山遗址出土陶器表现出明显的早期性：类型简单，主要为钵、罐、釜和支架4类。除支架外，几全为圜底器。支架和小型器多为直接捏制，其他器则为模具上用泥片贴筑，少数罐肩或腹部有双耳。陶器多为红色或红褐色，胎多黑色，含碳。外表多施粗乱绳纹，晚期地层有少量锥刺纹和划纹。彭头山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在一些红烧土块和陶器胎质中发现有炭化了的稻谷谷壳，研究者认为羼和在红烧土和陶土中的稻谷谷壳属于栽培稻。这样把栽培稻开始年代提前了一二千年，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项重要发现。八十垱遗址的发掘从1993年起，连续进行了5个年头，聚落面积3.5万平方米，发掘了1100平方米。时代相当于彭头山遗址的中、晚期，距今约8000年左右。重要的发现有两项：一是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聚落壕沟和围墙，估计主要功能为排水和防护，300米的壕沟与古河道相连，使八十垱成为一个环壕聚落；二是在遗址附近的古河道距地表4.5～5米深处的黑色淤泥中出土了2万多粒稻谷和大米，数量超过了国内已有发现的总和，这些稻谷和米保存状况非常好，刚出土时有的甚至色泽如新。据初步观察与研究，它们的种类多，变异幅度大，是一种兼有籼、粳、野特征的正在分化的倾籼小粒型原始古栽培稻[⑦]。与稻谷稻米同时在古河道淤泥中出土的还有大量陶器，150余种植物籽实，数十种动物与家畜骨骼，大量竹、木器，其中木耒、木铲、骨铲等应为农具。八十垱出土稻谷保存完好、数量多、类型复杂，同时又伴出大量农具，无疑在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方面较之彭头山遗

址具有更高的价值。

1993年和1995年两次对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的发掘[39]，对探索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意义重大。玉蟾岩洞穴地层堆积保存完整，文化性质比较单纯，出土遗物主要为打制石器和骨、角、牙、蚌制品，同出大型食草类（鹿科）动物、小型食肉类动物和鸟类骨骼，时代超过了1万年。这里最重要的发现是两项：一是稻谷。两年共发掘出三粒完整的稻谷和1/4粒残片。1993年所出地层稍早，鉴定为普通野生稻，1995年发现的一粒鉴定为栽培稻，但尚保留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及水稻演化历史的难得的实物资料。二是最原始的陶器。两年均在接近基底的地层中发现了陶片。1995年发现的一个个体已修复，为深腹尖底罐，陶片胎厚近2厘米，夹碳、夹大颗石英颗粒，贴塑，内外均饰模糊的编织印纹，给人的感观是比彭头山文化所出原始古老得多，陶片所附烟炱经^{14}C年代测定，远超出1万年，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对探讨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价值。该项发掘被评为1995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黔阳高庙遗址，1991年冬发掘，是目前已揭露的沅水中上游时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4}C测定为距今7400～6800年。遗址位于怀化市黔阳县岔头乡沅水北岸一级台地上，是一处贝丘遗址，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文化堆积可分上、下两大层。下层出土物中有大量白陶和石制网坠、骨针。在很多陶器上用极细极工整的篦点组成怪兽纹、太阳纹、神鸟纹。怪兽长角獠牙，太阳光芒四射，而神鸟有的张翅欲飞，有的引颈长鸣，反映了先民的原始信仰，堪称中国史前艺术神器中的极品。

1991年在澧县大坪孙家岗发掘的一处石家河文化墓地，是我省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与遗址分离的史前墓地，出土了26件精美玉器，有玉瑗、玉璧、玉簪、玉玦、玉纺轮和玉佩，从形制和风格看，明显受良渚文化的影响。所出龙形玉佩和凤形玉佩整体用镂孔片状透雕技法琢成。雕琢之前，用细线描出主要部分的轮廓。各部位线条刚柔相济，技法娴熟。特别是玉凤，头顶羽冠，曲颈长鸣，展翅卷尾，形神兼备，其水平之高，在同时代及稍后以凤鸟为题材的艺术品中少有可以媲美的。

1991年开始进行了七年发掘的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古城址，曾于1992和1997年两次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现已发掘4000平方米，解剖了西南、南和东三个部位的城墙。最终确定该城始筑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已6000年，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一座城。之后在距今5600年、5200年和4600年又三次加修，增高增宽，并将原来的壕沟改建为宽阔的护城河。在解剖东城墙时，在第一次修筑的城墙下发现了时代更早的水稻田遗迹，根据地层和年代测定，均在6500～6300年前，为建城之前汤家岗文化时期聚落居民种植，这对于说明洞庭湖区在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另外还清理了500多座屈家岭文化和200多座大溪文化的墓葬，显示出等级

分化的明显迹象。清理了一个范围达数百平方米，包括有取土坑道、和泥坑、贮水坑、多座陶窑和大量工棚的大溪文化时期的完整陶器作坊区，这在史前遗址中是罕见的。发现清理了10多座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夯土台基式的房屋建筑以及城中用红烧土铺垫、两旁有排水沟、宽2米的宽大道路。部分揭示出了位于东门内、属于大溪文化一、二期时的祭台遗址，这一系列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国建城历史和文明起源，无疑是巨大的贡献。

三

湖南是南方出土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和珍品，如人面方鼎、四羊尊、象尊、豕尊、牛尊、“戈”卣、“癸𠬝卣”、虎食人卣、枭卣、兽面纹瓿以及众多的大铜铙。分布地点达23个县市。

近十年来，湖南又陆续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最重要的是1993年6月在宁乡县老粮仓乡双田村栗山坡发现12件大铜铙[39]。其中有10件同出一坑，此处距1959年出土5件铙的地点[40]仅20米。出土时分4层平置，下面每层3件，最上层1件，距地表仅45厘米。其中1件纹饰较特殊，以浮雕的龙纹和牛头纹组成大兽面，兽面左右和下方有13个圆饼形乳突，浮雕粗线上又阴刻细线云纹，花纹繁复精细，在商代铜铙中尚属首见，重28.5公斤。另外9件形式相同，纹饰以阴刻细线云纹为地纹，两面各有乳突18个，9件铙大小有序，最大的重31公斤，最小的9.5公斤，应为一组编铙。铙成编成组发现，这是第一次。同年8月，在附近山腰又出土2件铜铙，均为粗线阳纹组成大兽面，其中1件重102公斤。这样，湖南出土商和西周初年的铜铙达40余件，超过南方其他各省出土数的总和。

湖南商周青铜器中，一部分与中原所出别无二致，一部分有着极其鲜明的地方特色，特别是青铜乐器铙和镈。但这些青铜器多为零星、偶然出土，推测系窖藏，缺乏共存的其他器物。它们在湖南出土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其文化和民族的属性，始终是悬而未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因此，为了推进对湖南商周考古和历史的研究，我们加强了对这一时期古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发掘工作相对集中于澧水流域和湘江下游。澧水流域的发掘工作主要在80年代前期，经过重点发掘的有石门皂市[41]、宝塔[42]，澧县斑竹[43]、保宁桥[44]、文家山[45]等处，90年代配合慈利江垭水电站工程建设，在水库区又发掘了几处。这里的商时期文化是受商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地青铜时代文化，而西周前期则表现出与后来的楚文化有较直接的关系。8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把主要的力量集中于青铜器发现最多的湘江下游，先后发掘了岳阳市郊铜鼓山[46]，岳阳县对门山[47]、老鸹洲[48]、费家河[49]、温家山[50]、樟树潭[51]，汨罗市玉笥山[52]，望城县高沙脊[53]等近十处。其中对门山、老鸹洲、费家河主要是窑址，而温家山主要为墓地，高沙脊则既有居住址也有墓葬。通

过这些遗址的发掘，建立起了从商代二里岗下层至西周早期的编年，并初步明晰了其文化特征。可以分为前后两大段，每段又各可分为3～4期。前段以铜鼓山Ⅰ～Ⅲ期、樟树潭下层为代表，时代相当于中原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与殷墟一期之际，后段相当于中原殷墟二至四期，并延续至西周早期。前段文化面貌一脉相承，除偶见属于土著文化成分的小口高领罐、花边圈足碗外，其余器物均为中原常见器形，如陶鬲、斝、爵、甗、簋、大口缸、大口尊、夹砂罐等，且表现出与中原有着同步变化的现象，因此商文化因素在整个文化中起着支配地位，可以径直称之为商文化，有研究者认为应归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而从樟树潭上层开始，以后历经铜鼓山Ⅳ期、老鸹洲、对门山、温家山、玉笥山，直至费家河，属晚商阶段，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有研究者将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之为费家河类型文化，认为是商代晚期的一支地方类型文化。在陶器器类上表现极为复杂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群：一群是继承商代早中期的器物，这包括鬲、斝、甗、簋、尊、大口缸等，但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中原传入器物的异化形态。第二群为前段所不见的新型器类，它们成为费家河类型文化特征性的器物，包括高领釜、矮领釜、小釜、折沿釜、内环耳釜、内壁有一周箅托的甗形器以及圆锥足、扁平三角足、扉棱足和侧装长方形扁平足的鼎，重新回复到本地史前时期以釜、鼎为主要炊器组合的状态。第三群是硬陶，多出于老鸹洲、对门山、费家河三处窑址，仅见瓮和器盖两种。瓮为直口、折肩、球腹、高大外撇式圈足，肩与腹交接处有桥形耳。器盖为倒扣矮圈足盘状。硬陶器纹饰主要为刻划戳印指甲纹、曲尺纹、水波纹、方格纹、绳纹，部分个体施薄釉。在几处窑址中盖与瓮个体大体相当，表明两者是配套的。它们主要出自窑址，表明是本地烧造。同样的器形，无法从其他地方找到比较的材料，但却在殷墟二至四期的居住址和墓葬中发现了雷同的器物。例如武官村北地墓葬、苗圃北地文化层[54]等。因此可以推定殷墟所出，系湘江下游烧造，通过某种途径特别是贸易途径传入中原。晚商时期，虽然中原商势力和商文化在南方显示出后退态势，但相互联系特别是贸易联系仍然密切。近些年来在津市涔澹农场[55]、株洲南阳桥乡[56]、新宁县会仙桥[57]出土随葬典型商式铜器、甚或铭文铜器的墓葬说明仍有商人在湖南活动。从湘江下游入沩水转资江一直到资江上源夫夷江，沿线均出土商式青铜器，更是将联系中原与岭南的商路清楚地凸现出来了。故尔晚商时一方面本地土著文化重新抬头，另方面又同时接受中原青铜铸造技术，逐渐出现本地铸造的青铜容器和乐器应是合乎情理的事。1996年冬在望城县高沙脊发掘的西周早期遗址和墓地更加证实了这一推论。高沙脊距望城县城2公里，为沩水入湘江口边一长条形沙洲。共发掘70平方米，发现墓葬4座，灰坑1个，陶窑1座。地层中陶器可复原数十件，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它对于费家河类型文化的继承与沿袭，而且显示出与费家河类型文化最晚一期的费家河遗址时间上紧相衔接。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M1中出土11件铜鼎、1件铜尊以及多件铜兵器和工具。这11件铜鼎有

5件形制较大，完全与中原商末形式相同，1件上有“西”字族徽，无疑由中原制作。另6件鼎和1件铜尊器形很小，总体形态似商器但有变异，如出现了带盘口的鼎，与西周晚期以后越式鼎中的一种有渊源和演变关系。这后一类鼎，显然是本地铸造。

在春秋中期楚文化入主湘江下游并逐渐向南推进之前，湘江中上游的居民主要为越民族，西周中晚期其势力还有向湘江下游扩展的现象。至迟从西周晚期开始，在模仿商和西周青铜器的基础上制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青铜器。除在长沙金井干塘[58]、资兴旧市[59]，衡南胡家港[60]，祁东小米山[61]，耒阳水泥厂[62]，湘乡牛形山[63]、何家湾[64]、五里桥[65]，湘潭古塘桥[66]，桃江腰子岭[67]等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越人墓中出土的越式鼎、剑、匕首、斧、钺、削刀外，近些年来还出土了数件大型越式青铜器。最重要的有1988年株洲县黄龙乡兴隆村出土1件齿纹铙[68]，1986年岳阳县筻口镇凤形咀山出土1件人像动物纹提梁卣[69]，1986年湘潭县荆州乡金棋村出土1件水生动物纹提梁卣[70]，1988年衡阳赤石M315头龛内出土1件水生动物纹提梁卣[71]。这最后一件卣明确出于春秋中期偏早或早期的越人墓葬，而形式与纹饰风格均与另两件卣近似，从而间接地证明了另两件卣也属春秋中期偏早或春秋早期。

四

据粗略统计，五十年来我省发掘的楚汉及其以后的墓葬超过1万座，其中东周时期楚墓超过4000座，西汉墓葬近4000座。

湖南已发掘的楚墓中，较重要的有：澧县丁家岗3座小型楚墓[72]、岳阳筻口凤形咀山一号墓[73]、仰天湖二十五号墓[74]、左家公山十五号墓[75]、烈士公园三号墓[76]、杨家湾六号墓[77]、左家塘四十四号墓[78]、魏家大堆一号墓[79]、子弹库一号墓[80]、浏城桥一号墓[81]、荷花池一号墓[82]、湘乡牛形山一号和二号墓[83]、常德德山夕阳坡二号墓[84]、临澧九里一号墓和双峰包大墓[85]、桃源三元村一号墓[86]、慈利石板村三十六号墓[87]、沅陵木马岭一〇一六号墓[88]等。这些墓葬出土文物丰富，所出铁器、铜器、漆器、琉璃器、玉器、丝织品、帛书、帛画、竹简、天平砝码等在东周时期文物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为研究楚国历史与艺术，研究湖南楚墓的分期、分区、分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1978年澧县丁家岗遗址出土的3座春秋中期偏早的小型墓，是我省可确定年代的最早的楚墓。1986年岳阳县筻口凤形咀山发掘出一座出土10多件铜器的春秋中期墓葬，它是我省时代最早的楚国贵族墓。这两处墓葬，研究者认为是楚进入澧水流域和湘江下游的标志。

临澧九里墓地是战国早中期楚国在江南的一个封君家族墓，1980年发掘的临澧九里一号墓（又称黄家包）是湖南迄今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墓口东西长34.5米，

南北宽32.8米，墓口下11级台阶，葬具为长宽均为8.8米的硕大椁室和三层棺。如此大的规模和复杂的棺椁制度，充分显示了墓主高贵的身份。墓葬虽然早期被盗，青铜器全被盗光，但仍出土了300余件珍贵文物，特别是一批漆木器，如气势恢宏的双虎双凤鼓座、大型镇墓兽等反映了楚国艺术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多具木瑟和100多支竹简，一部分为遣策，一部分内容为占卜。1971年发掘的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是一座有二级台阶的战国早期中型墓，一椁一棺保存完好，出土文物280多件，重要的是出土了整套仿铜陶礼器，有镬鼎、升鼎、汤鼎、敦、壶、缶、钫、簠、簋、鐎壶、豆、匜、勺等。如此完整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只有在楚都江陵的贵族墓中才能见到，推断墓主为大夫一级的身份。墓中还出土了52件铜器，除鼎外，均为兵器，有长达3.1米木柄铜戟，长达2.8米的藤柄铜矛和“积竹柄”的戈与戟等用于车战的长兵器。出土漆木器67件，有24弦的瑟、几、案，面目狰狞的镇墓兽和形态温驯的木鹿，还有车马器和丝织品。浏城桥一号墓的发掘证明长沙在战国早期即已成为楚国南方的重镇。湖南战国楚墓曾有数座出土了竹简：五里牌406号墓出38支，仰天湖25号墓出43支，常德德山夕阳坡2号墓出2支，1980年临澧九里一号墓出100余支，总数约200支左右。除夕阳坡所出2支为记载楚王给臣下士尹赏赐岁禄的诏书，九里一号墓少部分为占卜之辞外，余均为遣策。而1987年夏在慈利石板发掘的三十六号墓中，一次出土了竹简1000支左右（残断成4371支），字数约2万，这是湖南先秦简牍的一次大发现。初步可以判断这是多本先秦时的书籍，可与传世文献对勘的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以及《管子·霸形》等。该墓是一座战国中期前段士一级贵族墓，它对于《国语》、《逸周书》的成书年代提供了旁证。墓中出土多件漆绘长柄兵器和漆绘柄铜铍，出土有漆瑟，另有两件方形漆绘铜镜，这种铜镜，也见之于河南信阳长台关一、二号墓，证明是楚镜的早期形态。

此外，楚墓发掘中还需提及的重要收获有：1990年在沅陵太常木马岭M1016战国晚期墓中出土一套青铜砝码共5件，重量分别为19.2、6.5、5.1、2.55、1克，最大一件上有错金铭文，经考释为“分细益”，意即称量黄金的衡器，这是继建国前在长沙出土的“均益”铭文的砝码之后第二套有铭文的砝码，为研究楚国衡制补充了新材料。1997年在益阳市郊黄泥湖五个山头清理了近千座战国楚墓，其中多数为晚期楚墓，随葬铜器几全为兵器，对研究战国晚期秦楚在湖南境内的军事对峙局面有一定价值。1986年发掘的长沙荷花池一号墓，棺椁保存完好，在椁室四边内壁均设置有通向棺室的门楣结构，这在目前已发掘的楚墓中十分罕见。在慈利官地、常德官山、临澧太山庙、益阳新桥山、保靖四方城、常德德山茅湾、常德二纺、沅陵窑头木马岭、辰溪米家滩、溆浦马田坪等地战国墓地中均出有一种在沅水、澧水和资水下游所特有的宽格青铜短剑，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可以活动的宽格，格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扁茎，与剑身一次铸成，茎脊贯通，茎正中有一个或呈一直线的两个乃至数个穿孔。它不同于越式剑或巴蜀式剑，

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在楚人入主湘西、湘西北后仍在当地生活的原濮系民族的遗物[89]。这些剑或出于楚墓，或单独出土，反映了楚濮文化因素的共存。1984 年古丈白鹤湾清理 64 座战国晚期楚墓，出土了巴式柳叶形剑、多环耳矛以及肖形“虎”印[90]。桃源三元村一号墓，主要随葬物均为楚器，特别是出土了“□十年中阳王鼎容二十五升”等铭文的楚式鼎，但同墓又出土了有虎纹和巴蜀图语的铜戈，表现了巴文化因素的继续存在。资兴旧市发掘的 80 座战国墓，与楚式仿铜陶礼器共存着越式铜鼎、剑和硬陶实用器[91]，表现出楚对越文化的吸收和相互融合。1984 年在永州市鹞子岭发掘 4 座战国晚期楚墓，随葬组合为鼎、罐、壶与鼎、罐、豆，而不出晚期楚墓中常见的敦和盒，所出米字纹陶罐、瓿和方格纹陶鼎，均具有强烈越文化因素，说明战国晚期越文化在湘南地区仍有相当大的影响[92]。

与墓葬发掘的同时，还配合基本建设试掘了沅陵太常窑头战国至汉代古城，城周围分布数以千计的楚汉墓葬，其中有不少仍有高大封土堆的大墓[93]。这座古城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认定是楚秦黔中郡治。试掘了慈利白公城，该城传为春秋时楚国白公胜所筑，试掘结果为战国至汉代的城[94]。试掘了保靖四方城，发现了战国时代的城墙、城壕和粮窖[95]，该城在汉代为迁陵县城。对桃源黄楚城[96]、汨罗古罗城[97]多次调查和试掘，确证了它们为春秋时代的古城。麻阳九曲湾发现了 14 处东周时代的古矿井[98]，这是我省发现的唯一一处先秦时期古铜矿遗址。

湖南汉代墓葬在 80 年代以前发掘的有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墓[99]，长沙河西象鼻咀一号墓[100]、陡壁山一号墓[101]、砂子塘一号墓[102]等。它们分别为西汉前期诸侯王室、列侯和高级贵族的墓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帛画、医书竹简、丝麻织品和服饰、漆木器、乐器以及一号墓中完整的女尸，陡壁山一号和象鼻咀一号这两座长沙王室墓中出土的数十件精美玉器、金箔贴花的漆器，几座墓中出土的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曹𡟰”、“妾𡟰”、“利仓”、“长沙丞相”、“轪侯之印”等铜、玉、玛瑙质印章和大量封泥均是值得永世珍藏的宝贵文化遗产和价值极高的研究资料。它们的棺椁和用鼎制度典型地体现了西汉早期的礼制。特别是陡壁山一号墓和象鼻咀一号墓的葬具对于认识古代文献中关于诸侯王一级“黄肠题凑”、“外藏椁”、“便房”、“梓宫”等棺椁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

在此之后发掘的汉墓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有 1993 年发掘的长沙望城坡“渔阳”墓[103]、1992～1993 年发掘的永州市鹞子岭一号墓[104]和 1995 年发掘的二号墓。

“渔阳”墓和象鼻咀、陡壁山、狮子山等长沙王室墓隔咸嘉湖相望，它由一座主墓和三座从葬坑组成。主墓为带墓道的岩坑竖穴木椁墓，含墓道长 37 米，现存墓口长 15.98 米，宽 13.10 米，封土堆至墓底深 16 米。墓道与墓室相接处发现一对木骨泥胎的“偶人”，身着彩绘，头插鹿角，跽坐于竹垫之上，两臂平伸。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最完整的“偶人”。内外椁室之间的回廊即为“外藏椁”，是放置器物的重要地方。被分隔成五室，除前室有门扉隔开相对独立外，其余各室之间仅设门框、门道。梓木做成的棺有内外两层，外棺为彩绘漆棺。外椁四周用长 70～74 厘米的短木枋层层环绕，垒叠 7 层，每层 60 块，共 400 余块，一直垒到高出椁顶 20 厘米，在外围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框壁。该墓虽早期两次被盗，但仍然保存了 2000 余件珍贵文物，特别是漆木器品类繁多，色泽绚丽，纹饰精细，做工考究。有一件漆盒砚台，盒内嵌有圆形砚石，盒两旁分置墨块和笔槽，装饰精美，构思奇巧，十分少见。墓中出土乐器磬、排箫、瑟、竽、鼓、筑等 19 件，其中大中小相配套的 3 件五弦筑是这种早已失传的乐器实物的第一次出土，是音乐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在内椁及棺盖板上发现玉璧、瑗等 23 件，其中一件玉璧通体经高温烤灼，璧体上发现鎏金，这一特殊的饰玉工艺尚属首次见到。该墓还发现一批刻划、钤印、书写在题凑木、棺椁、封泥和竹笥木牌上的文字，估计数千字。题凑上的“渔阳题凑……”字样、漆器上的“渔阳”二字和“长沙后府”封泥皆证明墓主为西汉早期吴氏（吴芮家族）长沙国某一代王后，渔阳极可能为其娘家的封地。

永州市鹞子岭一号和二号墓相距仅 19 米，为夫妻异穴合葬。一号墓大于二号墓，墓口长 18.2 米，宽 18.3 米，深 14.5 米，三层椁二层棺。二号墓为二层椁一层棺。两墓的椁每层均由竖立木枋以落槽框边形式套合而成，各层之间无空隙。这种外椁由竖立木枋逐层套合的椁，在考古发掘中是第一次见到，十分特殊，推测它除了主要为坚固墓室之外，可能还寓合了黄肠题凑的象征性意义。两墓均早年被盗，一号墓残留既少且残，所幸是在两件残漆器上有朱书“泉陵家官第三河平二年八月工张山彭兄缮”和“……鸿嘉二年……”，河平二年为公元前 27 年，鸿嘉二年为公元前 19 年，据此推定墓主应为《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表》所载第三代泉陵侯刘庆。二号墓器物保存较多较好，铜、玉、陶、金、琉璃和漆木器 100 余件。其中以漆器尤为珍贵，12 件中有 8 件为夹纻胎，1 件“承旋”（即三足盘）并施鎏金铜扣，规格甚高。有 7 件上有针刻铭文，长的达 60 多字，甚至 70 多字。上有“鸿嘉五年”（实应为永始元年，即公元前 16 年）、元延三年（前 10 年）、元延四年（前 9 年）、绥和元年（前 8 年）和建平五年（实应为元寿元年，即公元前 2 年）等 5 个年号。有产自“广汉郡工官”和“大官”（即少府工官）等针刻或朱书文字。墓主应为第三代泉陵侯刘庆之妻，葬于前 2 年之后若干年。一墓同出如此多件铭文漆器，且铭文既长内涵又极丰富，确属十分难得，无疑是研究汉代漆器生产的不可多见的材料。

湖南三国至魏晋时期有两项发掘分别被评为 1996 年和 1991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前者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后者为安乡县西晋刘弘墓。三国吴简出土于长沙市中心走马楼平和堂商厦建设工地第 22 号井窖[⑱]，共约 10 万枚，超过了全国各地已出土全部简牍总和。按形制可分为木简、竹简、木牍、封检、签牌等。木简长 50 厘米左右，完整

或基本完整的2000枚以上，每简100～160字。有少量木牍、封检、签牌，占95%以上的为长23～25厘米的竹简，字数估计不少于150万字，不仅超过《吴书》若干倍，也大大超过了《三国志》的总字数，因此极大地填补了三国历史、特别是孙吴历史史料的缺失。根据目前整理的内容可分五类：①券书类，包括租税券书和官属各机构之间物质调拨券书；②官府文书类，包括对司法案件审理，复查的具体内容及有关程序，官员的奏议、报告等；③长沙郡所属户籍；④名刺、信函类，涉及礼尚往来、购物荐举诸多日常事务；⑤账簿类，详细记录了长沙郡府所属部门经营管理的钱、布、粮、盐、器物、租税等方面的经济账目。另外还可见到长沙郡府文书、地方政府公文以及吴国大将屯兵长沙的记载。赤壁之战（208年）结束，曹操退守北方，长沙成为吴蜀争夺的首要之地。建安24年（219年）孙权擒杀关羽，占有荆州、湘境四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尽归孙吴。222年孙权称帝，年号黄武。这批竹简中最早的年号为建安25年，其后有黄武、黄龙、嘉禾等孙权的年号，因此，竹简对于孙吴这段时期长沙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内容中大量当时物价、租赋等经济类文书，为研究孙权时代吴国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无比真实、生动和丰富的资料。故尔学术界评论“长沙吴简完全有资格和甲骨文、西北屯戍简牍、敦煌藏经洞、清宫内阁档案相提并论”，认为“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一大喜事”，“是世纪性的大发现”。

安乡西晋刘弘墓[106]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为四壁微弧的正方形，砌法为四隅券进式，穹隆顶。棺椁和尸骨均无存。墓中出土2枚龟纽金印和1枚玉印。金印分别阴文篆刻“宣成公章”、“镇南将军章”。玉印双面篆体阴刻“刘弘”、“刘和季”。刘弘为墓主的姓名，和季为字，据《晋书·刘弘传》及《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刘弘，封宣成公，赠新城郡公，官历荆州刺史、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等。“少家洛阳，与晋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晋光熙元年（206年）卒于襄阳军中。地位十分显赫，是湖南迄今发现墓主身份最高的一座晋墓。墓中出土金器、玉器、青瓷器极多珍品，如嵌绿玉龙纹金带钩、金钗、白玉质夔龙卷云纹地浮雕羽人三足尊、浮雕谷纹地龙凤纹卮、谷纹璧、镂雕龙纹坠、镂雕双龙纹佩、青玉质浮雕虎纹珥、错金铜弩机、贴金铁匕首、青瓷堆塑灯等，均极为精美和珍贵。

从魏晋至宋元时期湖南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有出土100余件青瓷、陶俑的长沙金盆岭九号墓（永宁二年墓）[107]，出土大量湘阴窑青瓷器和陶瓷俑、我省唯一有隋纪年的湘阴城关镇隋大业六年砖室墓[108]，出土80余件青瓷器和瓷俑的长沙咸嘉湖初唐砖宲墓[109]，出土有金梳篦、银茶具、秘色瓷、玛瑙杯等珍贵文物的长沙晚唐—五代土坑石椁墓，常德北宋张颙夫妇合葬券顶石棺墓[110]，以及出土大量丝麻织物和服饰、纸钞，而且保存了完整尸体的沅陵双元桥元墓[111]和华容城关元墓[112]。因上述发现均已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和《文物考古工作十年》中作了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五

湖南在陶瓷考古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湘江下游的岳阳县对门山、老鸹州、费家河三处遗址中均发现了成群的商代晚期陶窑，所烧造的硬陶火候达1200℃，表面灰、灰白，胎质有绛紫、灰、灰白和白色。其中白胎硬陶质地极细腻，白洁纯净，吸水率低，常施有极薄的褐釉，但易于剥落，应属原始青瓷。费家河出土原始青瓷片取样测定成分 SiO_2 占 72.12%，AL_2O_3 占 10.95%，MgO 占 4.45%，K_2O 占 5.63%，另有极少量的 CaO、Na_2O 和 TiO_2。

经过1000多年演进变化，到东汉时期原始青瓷终于发展为成熟的青瓷。近年在常德市郊东江的几座东汉中期墓中出土了质地优良的青瓷罐、瓿等，说明青瓷烧造技术已经成熟。

通过文物普查，全省发现从东汉至明清时期的瓷窑400余处，烧造的产品可分为青瓷、彩瓷、青白瓷和青花瓷四大类。

1988年在湘阴安静乡青竹寺窑址出土的青瓷残片上刻有“汉安二年”即公元143年的纪年文字[⑩]，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青瓷窑址。其延续时间可到三国(吴)。烧成温度达1224℃，釉色为单一的青绿和酱釉，釉的配制采用草木灰引入，是我国最早的高钙灰釉、高硅质瓷胎青瓷。采用璧形垫圈和圆形垫饼叠烧。与其特点相似的青瓷器在长沙、湘阴、衡阳、益阳、常德、桃江、郴州等地东汉墓和三国墓中均有出土，极可能是由青竹寺窑烧造，说明青竹寺窑已有一定规模，它可以认作是岳州窑发展历史的肇始阶段。

临近湘江入洞庭湖口的湘阴县城是唐代长沙窑兴起之前烧造青瓷的中心。湘阴在唐代隶属岳州，因此古陶瓷专家推定分布在湘阴县城湘江岸边绵延10多公里的古窑址，即是唐代陆羽《茶经》中的岳州窑。岳州窑兴盛时期为西晋至初唐。1997年6月至9月，在湘阴县沿江马路马王坎清理了一座隋代龙窑和一座被隋代龙窑打破的南朝龙窑的窑头部分[⑪]。在隋代龙窑上压有零星的唐初堆积，出土了一件精致的底部刻有“官”字的匣钵。隋代龙窑下压南朝和东晋的窑场堆积，南朝堆积层中发现一件底内印有“太官”字样的托盏碗。似可证明从南朝（梁）至唐初，这里曾烧造过专供朝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隋代龙窑除窑尾伸入民房无法清理外，其余部分保存完好。已清理长度8米多，窑头部分保存三股火道。前头还有用砖砌成的贮柴坑，宽2.2米的窑床两边用砖砌墙，在窑床内原样摆放着数百个几种不同形式的匣钵，可以推断出多种装烧方式。在南朝的残窑和东晋堆积层里也出土了匣钵，从而改变了中国用匣钵装烧始于隋代的定论。东晋堆积层内出土的大量口沿和器底内有釉下点彩的碗、钵，为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找到

了源头。这次发掘出土青瓷器个体数千，基本完整的近700个。釉色有虾青、豆青、青褐等色。釉面莹润，光洁饱满，极少剥釉，显示出很高的水平。器形有钵、碗、盘、高足盏、多足砚、盏托、唾盂、虎子、莲花尊、龙柄壶、鸡首壶、盘口壶、四系罐、扣碗等40余种。这次发掘，为岳州窑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为中国青瓷烧造技术演进、变化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也证明了我省常德、湘阴、长沙、岳阳、浏阳、益阳等地晋至唐初墓葬和水井中出土的大量青瓷精品，包括有名的湘阴县城"大业六年"纪年墓和长沙咸嘉湖初唐砖室墓中所出基本上均是岳州窑的产品。从唐代早期开始，岳州窑走向衰落，虽在湘阴县铁官咀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但无论质地、造型和釉色均已无法和晋至初唐时相比。究其原因，可能是长沙窑釉下三彩瓷的异军突起，传统的青瓷产品失去了竞争能力。在其后的时代，湖南青瓷系窑址值得一提的仅有衡阳窑和益阳羊舞岭窑。

位于长沙市望城县书堂乡石渚湖附近兰岸咀、瓦渣坪、廖家坡、都司坡、谭家坡、尖子山等处，范围有十多平方公里的长沙窑又叫铜官窑[19]。它因首创釉下多彩而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了特殊重要的位置。1978年和1983年进行了两次较大面积的科学发掘，出土较完整的瓷器近万件，并且清理了一座长41米的完整龙窑。龙窑窑头分火门、火膛、储火段、防雨棚、挡土墙等几部分，窑床长30米，两侧用青砖砌成的窑壁保存较好，东壁有一个窑门，西壁有三个窑门。窑尾正处于山顶，长4米，最末端处为矩形烟囱。长沙窑是岳州窑基础上接受唐三彩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釉下彩绘成为独具特色的工艺。在以前清一色的青瓷系中，首先充分发挥铜绿和铜红釉及其窑变釉的特点，并在青、褐、黑、白诸釉的配合下，把新型的彩瓷工艺发挥得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釉下彩绘以线描为主，图案则采用点彩和多彩互渗等手法，有时兼用泼墨与渲染。釉下彩绘题材和纹样极为丰富，人物、走兽、花草、鸟类、风景、抽象式几何图案无不入画。书写的诗句、谚语和模印贴花也是重要的装饰手法。瓷器器形达70余种，而且极富变化，仅壶一种即可分解为20多种形式。各种实用器和瓷器鸟兽、人物等无不表现出了长沙窑鲜明的时代风貌、民间特色和地方特点。本世纪来，唐代重要的出海港口宁波和扬州出土了质量最好的长沙窑产品，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的古代遗址中也不断出土唐、五代的越窑青瓷、邢窑或定窑白瓷和长沙窑釉下彩瓷，说明长沙窑产品是当时重要的出口瓷。长沙窑产品中没有发现具有初唐特征的器物，而在长沙发掘的盛唐时期墓中已有典型的长沙窑釉下三彩瓷器出土，而至北宋墓中不再见长沙窑产品。长沙窑器物和模具上往往刻有纪年铭文。最早的为元和三年（808年），最晚的为天成四年（929年），印证了长沙窑兴于盛唐末，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的结论。

其后属于彩瓷窑系的窑址有宋至元代的衡山窑和清代的醴陵窑。衡山窑址位于衡山县贺家乡湘江村，采用龙窑烧造。由于胎质呈色较深，所以外壁往往涂上白色底粉，然后用深浅不同的绿、蓝、褐三色在白色底粉上绘花，不再罩釉，称为"粉上彩釉绘花"

装饰，高温一次烧成。常见的有褐绿牡丹花瓶、牡丹纹壶、缠枝菊花壶、牡丹纹三足炉等。醴陵窑釉下彩瓷烧造始于清雍正年间，嘉庆后，形成以沩山为中心，纵横数十里的瓷业产区，以后又成功地创造了五种高温釉下颜料，在传统青花的基础上，运用国画双勾填色的绘画技术，采取“三烧制”（两次素烧，一次釉烧）工艺，烧造出前所未有的釉下五彩瓷器。

湖南除了长沙窑烧数量很少的乳浊白瓷外，一直到宋、元时才开始在衡阳、耒阳、益阳等地出现烧造白瓷和青白瓷的瓷窑。而专烧或兼烧青花瓷的窑址则有益阳羊舞岭早禾村窑、早期醴陵窑和怀化龙井窑，其时代为明末至清初[48]。

湖南瓷器中最具艺术和研究价值的一为岳州窑青瓷，一为长沙窑釉下三彩瓷，一为醴陵窑釉下五彩瓷，它们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也为湖南陶瓷历史争得了光彩。

（执笔：何介钧）

注　释

①②③ 舒向今：《怀化地区原始文化综述》，《湖南考古辑刊》5集，《求索》增刊，1989年。

④⑤ 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性类型及其地位》，《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⑥ 袁家荣：《澧县乌鸦山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门博物馆：《石门县燕儿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湖南考古辑刊》6集，《求索》增刊，1994年。

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门县大圣庙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5集，《求索》增刊，1989年。

⑨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4期

⑩㉒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1集，岳麓书社，1982年。

⑪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⑫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2期。

⑬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孙家岗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待刊。

⑭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12期；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最早的城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

⑮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0年4期。

⑯ 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4期。

⑰㉑㉓㉕ 湖南省博物馆发掘资料。

⑱ 湖南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3集，岳麓书社，1986年。

⑲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华容县刘卜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5集，《求索》增刊，1989年。

⑳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2期。

㉑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1期。

㉒ 益阳地区博物馆：《南县涂家台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集，《求索》增刊，1994年。

㉓ 津市市文物管理所：《湖南津市古遗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1993年1期。

㉔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等：《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集，《求索》增刊，1994年；张春龙：《洞庭湖区新石器考古新收获——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的发掘》，《中国文物报》1992年6月14日。

㉕ 郭胜斌、罗仁林：《附山园——黄家园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初步研究》，《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㉖ 黄纲正：《长沙南托遗址文化类型试析》，《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㉘ 湖南省博物馆：《湘乡岱子坪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2集，岳麓书社，1984年。

㉙ 裴安平：《湘潭堆子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

㉚ 株洲市博物馆发掘资料。

㉛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株洲县磨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6集，《求索》增刊，1994年。

㉝ 贺刚：《黔阳县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年）》，文物出版社。

㉞ 贺刚：《辰溪县征溪口和松溪口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

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怀化高坎垅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2年3期。

㊱ 贺刚：《靖州斗篷坡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

㊲ 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1期。

㊳ 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㊴ 长沙市博物馆等：《湖南宁乡老粮仓出土商代铜编铙》，《文物》1997年12期。

㊵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几件铜器》，《文物》1966年4期。

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2期。

㊷ 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宝塔遗址和桅岗墓葬》，《湖南考古辑刊》4集，岳麓书社，1987年。

㊸㊹㊺ 何介钧、曹传松：《湖南澧县商周时期古遗址调查与探掘》，《湖南考古辑刊》4集，岳麓书社，1987年。

㊻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和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5集，《求索》增刊，1989年。

㊼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集，《求索》增刊，1994年。

㊽ 向桃初、易礼勤：《岳阳县老鸹洲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年）》，文物出版社。

㊾ 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探掘》，《考古》1985年1期。

㊿51 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发掘资料。

㊾ 郭胜斌、何捷：《汨罗玉笥山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
㊿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5) 谭远辉：《湖南湾渡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华夏考古》1993年4期。
(56) 曹敬庄：《株洲文物名胜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57) 邵阳市文物管理处等：《湖南省新宁县发现商至周初青铜器》，《文物》1997年10期。
(58)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县出土春秋时期越族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2集，岳麓书社，1984年。
(59) 湖南省博物馆等：《资兴旧市春秋墓》，《湖南考古辑刊》1集，岳麓书社，1982年。
(60)(6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衡南、湘潭发现春秋墓葬》，《考古》1978年5期。
(61) 衡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祁东小米山发现春秋铜器》，《湖南考古辑刊》2集，岳麓书社，1984年。
(63) 湘乡市博物馆发掘资料。
(64)(65) 湘乡县博物馆：《湘乡县五里桥、何家湾古墓葬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3集，岳麓书社，1986年。
(67) 《桃江县腰子岭东周墓葬》，《中国文物报》1990年1月8日。
(68) 熊建华：《湖南省博物馆新征集的西周齿纹铜铙》，《湖南省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
(69)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等：《岳阳县筻口出土春秋人像动物纹青铜卣》，《湖南省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
(70) 熊建华：《湘潭县出土周代青铜提梁卣》，《湖南考古辑刊》4集，岳麓书社，1987年。
(71) 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衡阳县赤石春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6期。
(73)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省岳阳县凤形咀山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1期。
(74)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仰天湖25号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2期。
(75)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2期。
(76) 高至喜：《长沙烈士公园3号木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10期。
(77)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杨家湾6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2期。
(78) 熊传薪：《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品》，《文物》1975年2期。
(79)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黄土岭魏家大堆战国墓》，《文物资料丛刊》3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80)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子弹库战国墓》，《文物》1974年2期；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年7期。
(81)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1期。
(82)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荷花池1号战国木椁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5集，《求索》增刊，1989年。
(83)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乡牛形山一、二号大型战国木椁墓》，《文物资料丛刊》3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84) 杨启乾：《常德德山夕阳坡二号楚墓竹简初探》，《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求索》杂志社，1987年。
(85) 湖南省博物馆：《临澧九里楚墓》，《湖南考古辑刊》3集，岳麓书社，1986年。
(86) 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湖南考古辑刊》4集，岳麓书社，1987年。
(8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慈利石板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5年2期。
(8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沅陵木马岭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89) 何介钧、郑元日：《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文物》1993年2期。
(90) 湖南省博物馆等：《古丈白鹤湾楚墓》，《考古学报》1986年3期。

91. 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1期。
92. 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永州市鹞子岭战国墓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4集，岳麓书社，1987年。
93. 郭伟民、胡建军：《沅陵县窑头东周城址及战国西汉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
94. 向桃初：《慈利白公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
95. 龙京沙：《保靖四方城战国至明清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
9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桃源县狮子山战国墓发掘》，《文物》1993年7期。
97. 欧继凡：《罗子国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
98. 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麻阳战国时期古铜矿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2期。
99.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7期；何介钧、张维明：《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100.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咀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1期。
101.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𡟰墓》，《文物》1979年3期。
102.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11期。
103.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发掘资料。
104. 贺刚：《湖南永州鹞子岭二号汉墓的墓主及相关问题》，《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05. 胡平生、宋少华：《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新华文摘》1997年3期。
106. 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11期。
107.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108. 熊传薪：《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4期。
109.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6期。
110.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常德北宋张颙墓》，《考古》1981年3期。
111. 熊传薪：《沅陵县双桥元代夫妇合葬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文物出版社。
112. 华容县文物管理所发掘资料。
113. 周世荣、刘永池、周晓赤：《湖南湘阴东汉青竹寺窑发掘简报》，《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4期（1993—1997）。
1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1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116. 周世荣：《湖南陶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广东省考古五十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前的广东考古工作，只有个别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些国内的考古学家先是在香港，后到广东境内进行过一些调查或试掘，发现了一些遗址和遗物[①]。建国后，于50年代和80年代组织过两次全省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对文物的分布及现状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在“两重两利”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发现、发掘和保护了大量文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广深、深汕等高速公路，京九、广梅汕、三茂铁路，广州地铁及城区建设等大型基建工地，都发现了许多文物。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遗址、墓葬、窑址等重要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大大丰富了广东考古研究的资料。特别是秦统一岭南之前的考古资料，为恢复岭南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1958年，在曲江马坝镇狮子岩发现1个属于早期智人的头骨化石，被定名为马坝人[②]，经测定为距今12.9万年，由此揭开了广东古人类研究的序幕。它的发现扩大了我国早期智人的分布范围，填补了地区上和我国华南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其后对马坝人动物群的研究确认属更新世晚期早一阶段。

70年代以来，在封开、罗定、曲江等地又有一些新发现。封开垌中岩发现1枚人的第二前臼齿和1枚第三臼齿，共存动物群有40多个属种，其性质与马坝人化石地点的动物群相近，判断亦为早期智人[③]。据共存动物化石测定，垌中岩人为距今14.8万年。与马坝人同为目前华南地区时代最早的人类化石。封开罗沙岩遗址第四层出土3枚人牙化石，该层年代测定为距今7.9万年，可归入早期智人阶段[④]。罗定草塘下山洞出土1段人的桡骨化石[⑤]；封开罗沙岩第二层[⑥]、曲江马坝狮子岩的水洞、银岩、大口岩、飞鼠洞[⑦]分别出土有人的牙齿和下颚骨化石，经研究均属晚期智人。这些发现对探讨广东地区早期人类活动、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很少，在马坝人化石地点曾经搬运过的堆积中，发现两件经人工单面打击的砾石制品，有专家认为它们与马坝人化石同期[8]；在北江中游英德县宝晶宫洞穴内的一处古河道堆积中，发现一批用砾石单面打击的石制品，有砍砸器、刮削器，制作原始简单，根据洞穴的高程及器物的形制，推测年代距今约10万年，大致与马坝人化石同期，属旧石器时代中期[9]。罗定金鸡饭甑山洞穴出土5件石制品，有砍砸器和刮削器，其中一件为石片石器，一件为两面加工的刮削器，刃部可见修理疤痕。这几件石器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10]。封开罗沙岩遗址第三层出土砾石打制石器7件，有单面加工、刃面陡直、加工修理较好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共存动物群经年代测定为距今4.8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11]。英德沙口北江东岸第二级阶地的小狗山发现一批砾石打制石器[12]，其形态特征与罗沙岩第三层出土石器有许多共同点，年代可能相近。这是广东地区河流阶地上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砾石打制石器，同类石器在东江流域阶地也有零星发现[13]。

二

广东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早期的洞穴遗址，晚期的山岗、沙丘、贝丘和河流阶地遗址的大量发现和发掘，丰富了广东考古学文化的内容。

西江、北江流域石灰岩地貌出露广阔，洞穴遗存较为丰富。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等是这类遗存中较重要的遗址。其遗物以大量打制石器、少量磨制石器和穿孔石器为特征，不含陶器。伴生动物群以现生种为多，也有个别绝灭种，还有大量螺蚌类软体动物遗骸。同类遗存还有螺髻岩、英德牛栏洞、青塘朱屋岩等。年代大约在距今14000～9000年左右，代表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有人认为属于华南地区的中石器时代[14]，其陡刃石器是石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这类遗存与南亚地区的“和平文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怀集大沙岩、英德牛栏洞三期文化及青塘仙佛岩等遗存[15]中，已出现局部磨制石器与陶器共存，显然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粤东的南澳岛象山，发现一种用燧石打制而成的石片石器[16]，多为凹刃刮削器，以人字形最具特色。其后在丰顺汤屋山、番禺飘峰山也发现数量很少的同类石器，发现者将其定名为“细小石器”，结合象山地层中发现的夹砂陶片，认为其年代在距今8000年左右[17]。这类石器在福建漳州地区有较多发现[18]，应该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遗存。但福建将这类石器定为距今14000～9000年之间。其准确年代仍需进一步研究。

与陶器共存的早期遗存发现不多，除洞穴遗存外，台地遗存有封开簕竹口与英德史老墩等[19]，遗存中有相当数量的夹砂陶和斧、刀等种类不多但仍保留许多打制疤痕的磨制石器，还有一些打制石器。粤东潮州陈桥村贝丘遗址的许多打制石器中，有一种为取

食贝类的工具—"蠔蛎啄"，磨制石器有长身梯形锛和磨盘。骨器数量多，种类丰富，且磨制精细。陶器为夹砂粗陶，表里磨光，局部地方绘有赭红色彩，饰贝划纹。该遗址发现有10个个体的人骨，当属墓葬，但葬式不明[20]。同类遗存还有海角山、石尾山遗址[21]，年代相当而略有先后。这类遗存要晚于台地遗址，年代约距今7000～6000年。山地与海滨两种不同地理环境的遗存所反映的生活形态显然有较大的差异。

在广东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还发现了一批有彩陶器共存的遗存，它们以深圳大黄沙、中山龙穴、珠海后沙湾、棠下环等沙丘遗址和以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肇庆蚬壳洲等贝丘遗址为代表。这类遗存的陶器组合有釜、罐、钵、盆、碗、圈足盘、支座等，纹饰以细绳纹和绳纹为主。在泥质陶器的口沿、圈足多绘红色或赭红色图案，并与刻划、镂孔等纹样组合，施彩的纹样有宽带、圈点、波浪、折线、S形等。其年代距今约6000～5000年。蚬壳洲遗址清理的24座墓葬中有29具屈肢葬骨架，其中有一座是三人合葬，一座是蹲葬，一座是双手反剪俯身葬，与广东同时期的墓葬都是仰身直肢的埋葬方式有别，而与西江上游广西发现同时期墓葬的埋葬方式相同。说明西江流域下游早期的文化遗存与上游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在深圳咸头岭遗址发现有全身施赭彩的陶器、还有白陶。在时间上应是较目前珠江三角洲发现有彩陶的文化遗存更早[22]。有人认为，这些含彩陶的遗存与大溪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

西樵山遗址共发现石器地点14处。发现了大量石器残次品和石片，陶片和生活遗迹却很少[23]。因此，西樵山是石器加工场，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西樵山生产的石器有两类：一是细石器，以燧石、玛瑙以及少量霏细岩为原料，包括有石核、石片（石叶）及用石片加工的刮削器、尖状器，还有雕刻器、石钻、琢背小刀、石镞等。其中楔形石核是最主要的类型，说明它与华北细石器传统是相同的。对与细石器共存的西樵山18地点出土贝壳的测定，其年代约在距今6500～6000年之间。1994年，配合西樵山环山公路建设发掘的佛子庙遗址，出土了大量双肩石斧的残次品、石片和一些细石器，还有少量的夹砂细绳纹陶片[24]。结合其他地点也有细石器与双肩石器共存的情况分析，细石器年代的下限可能在双肩石器出现后仍有一段共存的时间。二是双肩石器，主要以霏细岩和少量的燧石为原料。所见绝大多数为双肩石器的半成品或留有许多疤痕的磨制石器，但通体磨光的石器很少。西樵山石器的分布范围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而以珠江口的西部和北部为多，在粤北和粤东也有少量的发现。从伴出的陶器分析，西樵山双肩石器的年代大约出现于距今5500年左右，但这时多分布于西樵山的周围，到青铜时代，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有的学者将有西樵山石器共存的遗存称之为"西樵山文化"[25]。

位于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约3公里的狮子岩石峡遗址，发现于1972年，已发现面积300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108座。1976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与发掘者一起，对遗址特别是墓葬的出土遗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地层和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将

108座墓分为四期，将器物特征明显、且区别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前三期和遗址下层作为一个整体，命名为石峡文化。盘形鼎、釜形鼎、圈足盘、三足盘、圜底釜、深盘豆等陶器和弓背锛（䦆）、有段锛、钺、铲等石器是石峡文化的典型器物[26]。就目前所知，石峡文化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除石峡遗址外，还有乌石床板梓、始兴新村等。在珠江三角洲顶端的三水银洲遗址和东江流域的河源、龙川及粤东的梅县、揭阳等地同期遗存中也可见到石峡文化的因素。西江流域封开县杏花镇的乌骚岭、罗沙岗等地发现墓室小且浅的二次葬墓，其中乌骚岭的150平方米内就有111座墓，遗物与石峡文化大同小异，可将其作为石峡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27]。石峡文化与周邻地区的文化相比，与江西的樊城堆、浙江良渚等文化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说明在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石峡文化在沟通岭南与中原和华东地区之间的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普宁虎头埔是一处较为重要的史前窑场。清理的15座窑有三种类型：一是长方形与圆角方形竖穴窑，二为圆形竖穴窑，三为“8”字形横穴窑。出土陶器以垂腹矮圈足罐和鼓腹矮圈足罐为典型器物，纹饰多为方格、长方格、编织、曲折、圆圈及间断条纹、叶脉纹等，这类器物与广东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基本相同[28]。普宁后山遗址的年代约距今4000年前，遗物以折肩或折腹的鸡形壶、凹底或圜平底的方格纹罐为特色[29]；梅县畲江也发现了同类型的遗存。鸡形壶、凹或圜底罐与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的垂囊盉、鸭形壶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或许是东夷文化南传与粤东土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广东古代地理形势较为复杂，北部以山区和丘陵为主，南部沿海以低矮的岗丘和海岛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始，出现了两类经济文化遗存，一是沿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文化类型；一是山区和丘陵地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文化类型。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别。前者的石器生产工具和陶器生活用具都显得简单落后，且在较长的时期内变化不大；而后者却显得特别发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变化较快。自然环境不同对形成和产生这种差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结合广东古代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已成为广东考古的一个重点。

三

广东存在青铜时代的问题已在广东考古学界达成共识。这一问题的提出，是1962和1963年，在清远县三坑公社马头岗连续发现了两座春秋晚至战国初以青铜器为主要陪葬品的墓葬[30]。这一发现在广东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随后，又在19个市县发现了随葬青铜器的墓葬达120多座，出土青铜器1000多件。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古代岭南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山岗上。其中大墓较少，中小墓居多，都是长方形竖穴

土坑墓，有的墓底铺设河卵石或木炭，有的墓底分成高低级的前后室，还有的墓底有一腰坑，坑内有陶器，大墓使用棺椁，小墓不见葬具。在封开、惠来还发现有用夔纹、云雷纹陶瓮盛装骨殖二次埋葬的瓮棺墓。

青铜器组合有一定的规律，分炊器、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及杂器六类。兵器和工具数量最多，容器最少，但容器铸造相当精美。器物有鼎、卣、鉴、盉、壶、盘、缶、编钟、钲铎、剑、矛、镞、钺、斧、凿、篾刀、匕首、叉、镰、锯、削和人首柱形器等。

从器形和纹饰看，这些青铜器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青铜器完全相同。二是与长江流域的相似。三是与广西、贵州、云南有一定的联系。四是极富本地特色的青铜器[31]。

以往在珠江三角洲等地调查发现的不少史前遗址，一般都统称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80年代始，先秦遗址被大量发现和发掘。与此同时，同属于一个文化区域内的香港、澳门也对先秦遗址的分布、性质、内涵等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对这些遗址重新认识显得非常重要。

以珠海东澳湾为代表的沙丘遗址，包括后沙湾二期、棠下环、宝镜湾等遗址[32]，其年代已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东澳湾遗址的遗物较为单纯，基本不存在早晚的差别。其文化特征是陶器中夹砂陶占绝大多数，泥质陶所占比例很小，夹砂陶中灰陶的比例最大，器表一般拍印交错粗绳纹，或条纹及很少量的方格纹；泥质陶多饰曲折纹、复线方格乳丁纹、方格纹、弦纹、叶脉纹、云雷纹及云雷纹与曲折纹等组合纹样。陶器多圜底、圜凹底及圈足器；不见平底器。陶器有敞口或翻唇扁鼓腹圜底釜、敞口折肩凹底罐、豆、圆台形陶支脚、束腰筒形器座、敞口或敛口的钵、箅形器等。其中以釜、支脚、箅形器、器座等几种夹砂陶的器物最为常见。石器中以锛、镞、网坠为多。个体较小，均属中小型。在棠下环遗址出土了800多件石网坠，宝镜湾也出有100多件，可见其渔猎经济之发达。

南海灶岗、鱿鱼岗Ⅱ期、佛山河宕中层[33]等遗址是这时期分布于珠江三角洲青铜时代贝丘遗址的代表，还有增城金兰寺中层、东莞村头等遗址。河宕清理墓葬70多座，灶岗6座，鱿鱼岗36座。其埋葬方式都是单人葬，男性头向西，女性头向东，成年男女生前有人工拔牙的习俗。还有灰坑、房子等遗迹。这几处遗址出土的陶器与沿海青铜时代早期的沙丘遗址有明显的差别。贝丘遗址泥质陶的比例较夹砂陶为多，几何印纹陶特别发达，印纹清晰，种类繁多，组合纹盛行。石器以小型工具为多，有锛、斧、凿、三棱石镞、石矛等，此外，还有已轻度石化的骨锥、骨凿、三棱形和圆锥形骨镞及角锥。这些小型的工具还无法适应农耕的需要，仍处于捕捞、渔猎经济形态。陶器主要有釜、罐、豆，还有少量的盒、钵、鼎、支垫等。这类贝丘遗址与珠江口的海湾及岛湾的

沙丘遗址在时间上并无多大的差别，他们的经济形态都是渔猎、采集经济，但他们捕捞的对象和捕捞的方法及所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则有所不同，这就是贝丘遗址有很厚的贝壳堆积而不见网坠，沙丘遗址有较多的网坠而不见有贝壳堆积的原因。

分布于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山岗遗址，其居民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手段及生活方式与沿海地区显然不同。这些地区的农耕经济已较珠江三角洲地区发达。

平远石正清理4座西周时期的圆形竖穴陶窑，窑室上大下小，分窑床、窑箅、火膛三部分。陶器以小口鼓腹罐或大口弧腹的圜凹底罐为多，还有碗、碟、壶、盂、盆及少量的陶拍。纹饰以方格纹为主，次为云雷纹、云雷与方格组合及小圆圈纹等。除印纹外，在一些陶器上还有点彩或划彩[34]。始兴白石坪和增城西瓜岭发掘了2处窑址，均以米字纹、方格纹、篦点纹、篦划纹等为陶器的主要纹饰，其中增城西瓜岭还清理了一座残长9.8米的龙窑，在始兴白石坪出土了两件铁器[35]。1992年，在博罗县圆州镇清理了一座只生产以夔纹陶器为典型代表的龙窑，窑身残长15米，坡度12度。窑内出土了大量以夔纹、云雷纹、菱格凸块纹、曲折纹、方格纹等纹饰为主要装饰的陶器，还有许多动物模型[36]。在全省范围还发现了一批以米字纹或以夔纹、云雷纹为主要装饰特征的陶器，这两者之间谁早谁晚的问题争论了40多年，一种意见认为以夔纹为典型代表的陶器群应早于以米字纹为典型代表的陶器群[37]。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米字纹为代表的陶器群应早于以夔纹为代表的陶器群[38]。1987年，深圳叠石山遗址的发掘又引起了一番讨论，从出土遗物看，该遗址是夔纹陶时期的遗存，但该遗址出土了米字纹陶和铁器。据此，有的学者便认为夔纹陶早于米字纹陶的提法不对，而认为米字纹陶应早于夔纹陶，或者它们是同一时期[39]。

1996年，在博罗银岗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以米字纹、方格纹、方格斜线纹、篦点纹、篦梳纹为主要纹饰特征的陶器群叠压于以夔纹、云雷纹、方格凸块纹等为主要纹饰特征的陶器群的地层之上。1998年初的发掘又再次证明了这一发现。这一发现说明以夔纹陶为典型特征的地层要早于以米字纹陶为典型特征的地层。为解决广东先秦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40]。

上述两类文化遗存，其年代前者约为春秋至战国早期，后者约出现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早期仍有少量这类陶器。两类遗存曾有共存时期。深圳叠石山遗址应该是属于春秋晚期的遗存，因此它以夔纹陶时期的遗物为主，也有少量米字纹陶时期的遗物。

浮滨文化遗存由1974年在饶平县浮滨公社塔仔金山和联饶公社顶大埔山发掘21座土坑墓而认识。出土器物有较强的地方特征[41]。随后在揭阳、揭西、普宁、潮州、潮阳、南澳、丰顺、大埔以及福建的西南部也发现了这类墓葬。

浮滨文化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坑顺山势排列，墓向无一定规律。随葬品以戈

(矛)、锛(凿)等石器和尊、豆、壶、罐等陶器为组合。戈类多属原始型,形制多样,可以看到从无阑戈到有阑戈的发展过程。陶器中以大口尊最具特色,大敞口、长颈、小平底,花纹以直条纹为多。部分陶器施酱黄釉或酱黑釉,有不少陶器的腹部或圈足上有刻划符号。在揭阳地都油柑山8座墓葬出土的器物不见戈、矛类,陶器以夹砂陶为多,釉陶器较少,可能属这类文化的早期遗存[42]。大埔县枫朗区发掘的22座墓葬,随葬品以釉陶器为多,大口尊有长颈、短颈、盘口等多种形制[43]。普宁牛伯公山发现有房址柱洞、活动硬面、灰坑、水沟等遗迹,是浮滨文化遗存的一处遗址[44]。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和石器两大类,陶器中夹砂陶数量最多,器形有圜底釜、折肩或折腹罐、高领大口尊、深腹瓮、圜凹底钵、陶拍及器座、支脚、器盖、纺轮等;泥质陶有折肩凹底罐、浅腹豆、圈足壶、带流凹底壶、凹底钵、直身矮圈足杯等。纹饰以方格纹为主,还有云雷纹、梯格纹、篦纹、编织纹及曲折与云雷组合纹;釉陶的数量很少,釉多脱落,有大口尊、折腹豆。石器有戈、矛、锛、镞、凿,还有刀、锤、砺石及环、玦。同类遗存还有南澳岛东坑仔。浮滨文化的年代为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

在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商时期的文化层中先后出土了铸铜石范2件,两件石范均为红色砂岩,其中一件石质较粗,通长14.2、最宽5.6、厚2.3厘米,为双面合范的一半,一面和两端磨平,另一面呈弧形,顶端有浇铸口;另一件石质较细。两件均是铸造斧类的范[45]。此前,在珠海的亚婆湾、南芒湾、南沙湾、斗门乾务镇、中山龙穴遗址等地都发现有铸造铜器的石范,在乐昌县城北约2公里的山坡上也采集到鱼钩范和铜铃范各一。早在建国前,外籍人士曾在粤东地区采集到斧及铃范。香港发现的石范数量更多,计有完整的合范7对,半范10余件及泥范芯1件[46]。这些发现说明:(1)岭南地区在商周时期已普遍铸造青铜器;(2)目前所见,岭南早期所铸造的青铜器多是小型的工具类。

随着中原和楚地青铜文化输入广东,也促进了广东青铜文化的发展。在曲江、佛岗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铜铙;信宜出土1件西周时期的铜盉;连平发现錞于和甬钟各1件;佛岗石角科旺大庙峡出土了约为西周早期的铜铙;惠来、博罗分别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甬钟;博罗公庄出土的7件编钟,其中6件为一组,大小相递,形制一致,另一件形制、风格相异,可能是后配入的;兴宁县新圩大树乡也出土一组6件甬钟,时代属战国[47]。广东这时期出土的编钟,多以6件或7件配套,只见甬钟而不见纽钟,花纹很具地方特色,很可能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在本地铸造的。

珠海宝镜湾、下连湾一带发现多处摩崖岩刻画,宝镜湾最大的一幅长5、高2.9米。以直观写真、表意象形、神秘抽象等不同的表现手法,雕刻出人物、船、动物及云雷纹、波浪纹等图案。线条粗犷,风格古朴。有关专家认为,二种不同雕刻风格特点和技法的岩画,不太可能是同一时代,但从其花纹看,可能不晚于春秋时期[48]。

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五十万，于三十三年（前 214 年）统一岭南。考古发掘充分说明，此后岭南的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广州秦造船工场遗址是当时秦兵“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重要史证。经两次发掘，得知有 3 个呈东西向平行排列的造船台，南边是造船木料加工场。一号船台揭开长 29 米，东面已到尽头，经钻探长度在百米以上。三个船台都建在河滩的淤泥之上，由枕木（杉木）、滑板（樟木）和木墩（格木）三部分组成，其间无钉或榫卯，是可活动的。1、3 号两个船台同宽，为 1.8 米，2 号船台居中是定位台，宽 2.8 米。出土有铁锛、凿、挣凿、磨刀石和棰球等造船工具。遗址深埋在今地表下 5 米，被一层纯净的红黄土所覆盖，其上为南越国宫署遗址。证实造船工场是在营造南越国宫署遗址时被填埋。1 号船台的木料经^{14}C测定为距今 2190±90 年（公元前 204±90 年），这个数据恰与地层叠压的年代早晚关系相符[49]。

南越国宫署遗址是近年来配合城市经济建设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以石构方池和曲渠组成的宫苑遗址最为重要。方池呈仰斗状，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已清理 400 平方米，为石池西南的一角。池壁斜坡状，用砂岩石板呈密缝冰裂纹铺砌，石板上篆刻有“蕃”、“阅”等字。池底距地表 8 米，用碎石、河卵石平铺，池中有一条巨型叠石柱向西南倾倒。池内出有八棱柱、石栏杆、石门楣、绳纹的板瓦、筒瓦、“万岁”瓦当等。在池南壁的石板斜坡下，埋藏着一条木质的导水暗槽，向南延伸，与 1997 年发掘的石构曲渠相连接。石曲渠已揭出长 150 米，由东向西蜿蜒回转如蛇引。渠体两壁高约 0.7 米，渠口宽 1.40 米，渠中横卧 2 个“渠陂”和 3 个“斜口”，底铺石板，其上密排灰黑色河卵石。当方池的蓄水导入渠中，流水会出现粼粼碧波的人工水景。“斜口”可能是供龟鳖爬行进出的，因为石渠东头连接一座弯月形的龟鳖池，池宽 4.9 米，当中用两列大石板分隔成 3 间，左右两次间还竖立一根八棱石柱，出凸榫，池的上部还有建筑结构，已毁不明，池底发现几百个龟鳖残骸，叠压成厚约 0.5 米的一层。曲渠之西，有石板平桥和步石，出水闸口外接木质暗槽，把渠水导流西去。这是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宫苑石构水景实例。在石方池之西，发现一口砖井，砌作精工，尚存深 9 米，井下铺石板，有 5 个透水孔，石板之下铺一层细沙以滤水。在秦造船遗址南边的造船木料加工场之上，有一段长约 20 米的宫署走道，宽 2.55 米，当中平铺砂岩石板，两侧用印花大砖夹边。走道上还留有残瓦件[50]、“万岁”瓦当和成层的炭屑灰烬。可见南越国宫署是毁于大火的，与《史记》、《汉书》关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兵陷番禺，“纵火烧城”的记载正相符合。

在五华县发掘的“长乐台”遗址，是南越国时期“四台”中唯一经考古发掘证实的一处。主体建筑为回廊式。从残存的遗迹推算，面积约在 1400 平方米左右。出土的绳纹瓦、“定”字瓦当及其他遗迹，仍依稀可辨当年的风貌[51]。阳春古旧塘的一处建筑遗址出土有绳纹瓦和四叶纹铺地砖。遗址地理位置在汉代属临允县辖，推测该遗址是南越国时期赵佗所筑的“白鹿台”[52]。

城堡遗址有始兴罗围犁头嘴和乐昌洲仔 2 处[53]。前者在浈江与墨江交汇处，平面近三角形，尚有城墙和城门通道，总面积约 8000 多平方米，城内堆积有大量的绳纹瓦，年代为两汉时期。后者在武江岸边，仅存小部分墙体，从瓦类和陶器看，年代为西汉前期，与《水经注》有关秦汉时期任嚣与赵佗筑城的记载相符。

汉代建筑遗址还有澄海、惠阳、徐闻、英德、南雄等地。澄海龟山遗址位于韩江出海口之一的东溪河边上，已清理出多座房址，遗物有瓦当、铺地砖和大量陶器及少量铜铁器等，年代在西汉前期后段至东汉，下限或可至三国时期[54]，与汉揭阳县治有密切关系。惠阳潼湖蚬壳角遗址位于东江南岸，发现有绳纹瓦和戳印方格纹陶片，惜遗址被毁严重。徐闻汉代遗址位于滨临海边的二桥村与仕尾村，已找到部分建筑遗迹，但未能确认其基址形制，绳纹瓦分布范围很广，并出有“万岁”瓦当、铺地砖和刻有“臣固私印”四字龟纽铜印，估计与汉徐闻港、徐闻县治有关。英德连江口与北江交汇处，发现有绳纹瓦堆积，虽基址形制尚不明确，但其位置与秦时所置的“洭浦关”及其后赵佗筑“万人城”于浈水的记载相符。南雄甘埠山遗址也有绳纹瓦堆积，因未发掘，建筑形制不明。相传赵佗于南雄大庾岭一带筑“横浦关”，甘埠山遗址是否其故址有待进一步探查。

广东至今尚未发现有绝对纪年的秦墓，广州东郊一座木椁墓出土的铜戈内部刻“十四年属邦工□蕺丞□□□”12 字[55]；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戈，内部一面刻“王四年丞相张义……”等 19 字，据考证为秦惠王后元四年（前 321 年）秦丞相张仪所监造[56]。这是我省迄今仅见的 2 把刻有绝对纪年的秦国兵器。

汉代墓葬分布较广。广州、韶关、乐昌、徐闻、佛山、封开、番禺的发现较为集中，在揭阳、普宁、澄海、梅县也有发现，其中广州发现的最多，尤以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墓为著。该墓深埋于象岗山 20 米的腹心深处，是我省发现规模最大的竖穴与掏洞相结合的一座石室大墓。全墓仿前朝后寝布局，用 750 多块红砂岩大石构筑而成，前部 3 室，后部 4 室，墓门前有木构的外藏椁。南面接斜坡墓道。墓主棺椁位于后部主棺室，已朽，仅余少量遗骸，身穿丝缕玉衣，随葬大量玉佩饰，还有“文帝行玺”及“泰子”2 枚金印和“赵眜”玉石印等共 9 枚分置于玉衣之上。墓中发现 15 位殉人，其中“右夫人”等四位是墓主的姬妾。出土随葬器物 1000 多件（套）。其中玉器 200 多件，除我国首见的丝缕玉衣外，还有角形杯、承盘高足杯、盒、卮等 5 件玉容器，11 套组玉佩饰，58 件玉具剑佩等最具特色。青铜器中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等铭文 8

件大小相套的勾鑃、刻有“蕃禺”铭文的铜鼎、四艘战船纹的铜提筒、“王命＝车徒”错金铭文铜虎节等。还有4000多颗墨丸，是我国一次出土数量最多的汉墨[57]。

广州已清理的两汉墓近800座，西汉墓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东汉墓可分为前、后两期。乐昌对面山清理汉墓近200座，时间自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是广州以外最大的一处汉代墓群。对建立汉代广东地区的考古分期提供了重要的标尺。从全省的汉墓看，西汉的埋葬方式主要是木椁和土坑，东汉以砖室墓为主。西汉前期的陶器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瓮、罐、三足盒、提筒、瓿；另一类为鼎、盒、壶、钫组成的“礼器”。西汉中期起，汉式器物逐渐替代了地方特色的器物。乐昌对面山16号墓出土1件陶罐，器表刻有“初元五年十月甲申郴黄稚君……”等43个汉字，是广东古代陶器上刻文最多的器物，至为珍贵[58]。

汉墓中普遍出现铁器，是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随葬品中常见有陶牛作明器，广州沙河顶一座东汉墓随葬1件陶牛圈[59]，佛山澜石东汉墓出土一件陶水田模型器，生动显示了农业已得到重视[60]。南越王墓出土不少于200个个体的黄胸鹀（禾花雀），说明珠江三角洲在西汉初年已稻田连片。墓中残留的稻、黍、高粱、梅、酸枣、橄榄、乌榄、人面子、荔枝等粮食和果类，以及汉墓中常见贮粮的仓、囷模型器、各种家禽家畜动物陶塑等，展示着岭南地区农业生产丰收的场景[61]。

在距珠江南岸约400米的广州海幢寺西边，发现一处东汉窑场的废品堆积，范围颇大，发掘的240平方米内遗物堆积厚0.7～2.75米不等。出土大量瓮、缸、壶、碗、盒、钵、匜、魁、熏炉、灯及陶塑的禽畜和网坠、纺轮等，为东汉墓中最常见的器类。估计窑址就在近邻[62]。

广东滨临南海，水道纵横交错，水上交通发达。广州更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自秦汉以来一直处于岭南地区与海外水路交通的中枢位置。汉墓中出有多件陶船和木质楼船模型，其中广州就有20件各种船模，为全国之冠。其中彩画楼船2件，有一件附10桨1橹；一件陶船，内分3舱，船尾有后楼及厕所，船前系锚，船后设舵。是一艘设备完整的客货两用船；德庆官墟出土的陶船，有前舱及中舱，首尾上翘，尾部有舱室，附船舵，适于江海航行[63]；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铜提筒的腹部刻有四艘羽人船，船身自甲板以下，分隔有6个舱室，推进动力靠的是三桅一大橹，船的前后还刻有海鸟、海龟、海鱼。这是岭南汉代考古所见模型最大、设施完备的海船图形[64]。东汉墓中所见之陶俑座灯，人俑深目高鼻，裸体露胸，遍体划毛，当是外国人的形象，头顶灯盘，应是由海外贩运至广东沦落富贵人家为奴的生动写照。广州在当时是南方的一大都会，汉墓中见到的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等珠饰及银碗、非洲象牙，多从海外输入，再现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在不少汉墓中都随葬有建筑模型器。其中有多种形式的住宅，有的仍保留干栏式，

即上为人居，下作畜圈，具有岭南地区的特点；有形式各异的城堡、望楼、作坊、仓廪，更多地显示了地主庄园的特征。

随着汉帝国统治的加强和稳固，岭南土著与中原迁徙居民之间逐渐融合。但粤西南地区显然在这个方面要缓慢一些，使用铜鼓为特色的土著居民主要分布在罗定、云浮、信宜、茂名、化州、海康等地，这些地方出土铜鼓数量较多，说明这一带是他们的聚居地。

五

三国至南朝，由于北方战乱，岭南相对稳定，为逃避战祸纷纷南迁的人民为岭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这从墓葬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扩大，及许多颂扬岭南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砖铭上可以看到。广州西村晋墓中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的砖铭[65]。这时的埋葬习俗显著变化，薄葬盛行，多为长方形砖室小墓，仅随葬少而简单的青釉陶瓷器。但这时的墓葬较讲究墓内的装饰，汉代遗风在晋代仍然保存，还有一些墓室平面呈“凸”字形、“中”字形、“串”字形等较大型的墓葬，墓内还设有祭台、壁龛、灯台等。随葬器物主要有罐、钵、盂、壶、碗、杯、盒、砚等青瓷器，还有陶明器及盆、剑、刀、斧、剪刀、熨斗、灯盏、耳挖、顶针、镯、环、叉、簪、钱币等金、银、铜、铁器。在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中出土的一件水田犁耙模型[66]；广州黄埔姬堂西晋永嘉年间的 2、3 号墓共出土 3 件水田模型，每块水田上都塑有犁田、耙田、开水沟、修理农具的俑及耕畜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说明岭南农作技术得到显著提高[67]。

南朝至隋的墓葬与两晋的相比，只见随葬器物有简单的变化，其陶瓷的烧造技术有一定的提高。这些墓中许多带年号的墓砖为这时期墓葬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隋唐至宋代的墓葬仍以砖室墓为主，而这时的墓葬更趋简单。最为大型的要算在韶关发掘的唐代宰相张九龄和其弟张九皋的墓，这两座墓平面均呈“古”字形，墓顶呈攒尖顶，墓室涂抹一层石灰料后绘有壁画，惜大部分已脱落。其中墓内出土的一件呈正方形的墓志铭，记录了张九龄的生平事迹[68]。在电白县发掘的冼夫人第六代孙冯□思夫妇墓和第五代孙媳许夫人墓中也出土有墓志铭[69]。在梅县发掘的多座唐墓，出土一批精美的碗、罐、碟、壶等瓷器，这些瓷器均出自附近的水车窑[70]。在越秀山发现唐天祐二年王涣墓，墓志的志文 1704 字，经岑仲勉教授考证，解决了晚唐史上两个有关记载的错误；同年发掘的一座大中十二年（858 年）墓，在墓主遗牙中发现有金箔片，这是考古首次发现唐人镶金牙的实例，该墓出的一对邢窑白瓷碗，也为我省唐墓首见[71]。在广州动物园与淘金坑发掘的唐墓中，出土 3 件风字形端砚，这是唐代端砚首次正式从考古发掘中出土。广州东郊石马村发掘的“乾和十六年”南汉第三个皇帝刘晟的昭陵，出土了

近200件陶瓷器，其中青釉四耳罐、六耳罐和夹耳罐，制作精细，造型美观，釉色晶莹，堪称精品[22]。宋代的墓葬有砖石合构墓和石椁墓。在紫金县城郊发掘的一座北宋砖室墓中，出土有石雕人身头戴牛、龙、鼠、猴、虎等的生肖俑6件，仰头和伏地俑各1件，石狗1件，龙、虎、凤、鸡石雕各1件。还有2件北宋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23]。此时，民间纷纷效法僧人死后用火葬的方式，出现了较多的陶坛火葬墓。这种墓葬分布于全省，其中珠江三角洲最多，陶坛的装饰也最为突出。后来盛装骨灰的陶坛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南雄县出土的一件多角罐，盖上刻有“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铭文。海康县的火葬墓，葬具采用褐色釉下彩绘瓷棺和瓷罐，置于圆形或长方形的砖砌墓坑内，有铜钱伴出，瓷棺作长方形，后面有插板可开启，左右两壁绘十二生肖或青龙、白虎，前后壁绘朱雀、玄武，插板上写死者姓名，顶上写“天门”、“地户”。有的瓷棺座雕刻莲花纹，棺身透雕如意纹等图案或写“仙会蓝桥”、“长寿富贵”、“金玉满堂”、“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兴”等吉祥语。广州南郊发现四座南宋咸淳年间的火葬墓，四个骨灰坛，器形、釉色、附加堆纹均同。

1988年，为配合广州光孝寺钟鼓楼和回廊建设进行的发掘，发现了用红砂岩砌筑的钟鼓楼旧址。出土了大量南朝至清不同时期的建筑材料——瓦当，在一个寺庙中瓦当如此之多，跨越的时间如此之长是罕见的。其中南朝时期的瓦当花瓣最为饱满，到唐代后逐渐变薄，宋代以后的瓦当则形式多样。还有不同时期的陶瓷器等生活用具和佛教用品，这些陶瓷器有广东各地生产的，也有来自福建、浙江等地的，其中有一批瓷器是广州皇帝岗窑生产的。对研究光孝寺的历史、南方古代建筑史和陶瓷史都是一批重要的资料[24]。近年来，广州在配合城市建设方面发现了一些重要遗迹。1997年在中山五路地面下约1.5米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东汉、晋、南朝三个时期的城墙套叠在一起，东汉的夯土城墙居中，底宽11.2、残高1.75米，共19夯层。晋的砖城底宽8.8米，把东汉土城两面削去一部分，然后贴砖。南朝砖城墙贴砌在最外边，底宽16米。宋代广州先后筑有子城、东城、西城三城。近年在越华路、仓边路、中山五路等处发现了子城和东城的部分城墙遗址，城砖中有“广州修城砖”、“南海修城砖”、“景定元年（1260年）造御备（砖）”、“水军造”等砖文，对研究、确认子城的周边界址十分重要。对廉江县龙湖古城的勘探结果表明，该城平面呈曲尺形，城内分四个区，门启可以相通，门闭各被分割封闭。位于地势较高的北部建筑，防卫性能特别讲究，有居高临下之势，应是官署所在地。其南面的三个区应是居民区。纵观全城，以我国古代都城布局为标准，是龙湖古城规划的主要特点。规划者结合防卫、用水、交通运输等项需要而巧妙地运用深潭龙湖，颇具一番匠心。城址内发掘出土的陶瓷器印证了《广东通志》等方志有关唐代罗州城的记载是正确的[25]。

广州多次发现南汉时期的“乾亨重宝”铅钱，过去推测背面有“邕”字的是广西铸

造，背面无字的是广州铸造。阳春石望镇发现的铅钱铸造遗址，约5至7万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着厚达70～200厘米废弃的炉渣，出土的南汉“乾亨重宝”石范，中间排列两行钱模，正面阴刻“乾亨重宝”，背面无文[76]。说明这是一处大量铸造“乾亨重宝”铅钱的遗址。

广东唐宋陶瓷业的发展，与唐宋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有较大的关系。汕头、梅县、新会、鹤山、高明、佛山、遂溪等地发现的唐代陶瓷窑址可以看到，其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其中新会唐窑的规模较大，窑炉多为馒头窑；高明发掘的两座龙窑，用叠烧的方法烧造陶瓷；梅县水车发掘的两座馒头窑，用匣钵装烧的方法烧造陶瓷器，釉色晶莹，堪称唐代岭南陶瓷的精品[77]。宋代的窑址发现更多，分布更广，陶瓷器的品种更为丰富。潮洲笔架山窑场规模大，范围广，俗称“百窑川”。出土的日用瓷、美术瓷，数量多，品种全，质地精。出土的一件佛像座，四面有“潮州水车中窑甲弟子刘用同男刘扶”、“新妇陈氏十五娘共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乞保阖家人口平安扶荐亡妣李氏一娘乞超世界”、“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匠人周明”等铭文。证实潮州窑就是水车窑，也为笔架山窑的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潮州窑生产瓷器已普遍使用斜坡式阶级窑，其中10号窑长70多米，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大[78]。粤西的廉江、遂溪、海康在沿海大量建造龙窑烧造陶瓷器，亦有“百窑村”之称。受到磁州窑的影响，海康烧造的褐彩瓷种类颇多，很有特色，其生产年代主要是南宋至元代。粤西地区烧造的陶瓷器从胎质、釉色、品种等方面较粤东地区差，但粤西与东南亚相近，地理上的优势，使其生产和销售成本较低，受到中下层人士的欢迎，所以能长期大规模生产。宋代广州西村窑则介于粤东、粤西之间，该窑规模较大，尚存残长36.8米的龙窑一座，产品有精、粗两类，共40多种器形[79]。在珠江边的番禺沙边村，西江边的郁南、封开，东江边的惠州，梅江边的梅县等地亦有宋窑堆积。

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宋代设立市舶司。说明以广州为主的广东沿海港口在对外交通贸易中起着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的大量商品，特别是陶瓷器、丝绸等商品通过这些港口销往国外。在珠海伶仃岛附近海域打捞出唐代的罐、碗等共14件；在荷苞岛以南海域打捞到罐、壶、碗等21件，这些器物都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的；台山下川岛西南20公里80米深的海域拖网捞起了双耳罐、四耳罐、碗、瓶、壶等共10多件宋代瓷器；潮州窑出土的高鼻、卷发瓷人头像和短脸、垂耳、身矮的瓷西羊狗，无疑是为适应外国人的需要而生产的外销产品；广州西村窑生产的凤首壶和刻花加绘酱釉牡丹纹大盆，其产品主要供外销，国内罕见。在英德、曲江南朝墓和遂溪窖藏中出土的波斯银币[80]，表明我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波斯等国之间的交通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

六

元至清代的墓葬，多为土坑墓、石室墓或灰砂墓。海康县发掘了元至正九年颍川郡君李氏墓，后又在该县发掘了一座同期的墓葬，出土阴刻线砖29块，其中有十二辰（缺寅、戌）各1件；四神（缺白虎）各1件；勾陈、地轴、金鸡、玉伏各1件。还有墓门判官、张坚固、覆听、蒿里父老、左屈客、东叫、西应、唤婢、川山、伏尸等各1件和手中持笏人物坐像1件。该墓出土的阴线刻砖明器与《秘葬经》开列的明器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说明南北方的埋葬制度与习俗有相同，亦有差异[30]。在佛山澜石出土的元代火葬墓，是将火化后的骨灰装入黑色小陶罐内，后将小陶罐放入大罐，用石灰密封后再放进用麻石凿成的大石盒内，其中一件大陶罐盖内墨书"至正贰年十月二十□庚申吉日立"；另一座墓出土的黑釉大陶罐盖内墨书"至正九年己丑岁十一□□□□□□□□□□礼卿义卿生卿安措"等字，罐内且有三幅51×52厘米的淡黄色麻布，重重包着骨灰，出土时仍保存完好；1985年在广州清真先贤古墓旁出土一方黑石墓碑得知墓主为高丽穆斯林剌马丹，碑文九行古阿拉伯文，录自《古兰经》，左右两竖行为中文小楷，内容是墓主曾任广西陆川县"达鲁花赤"（相当县令），至元九年葬于此。这是广州首次发现元代阿拉伯文墓碑[32]。

明清墓葬发现较多。广州东山明工部尚书戴缙夫妇合葬墓内出土了大批保存完整的丝织品、服装和鞋袜等。大埔、揭西等地明墓中出土的花卉、山水、花鸟扇面，是研究岭南绘画的重要实物。揭阳明墓出土嘉靖年间手抄本《蔡伯喈》（即琵琶记）曲本两册、潮安明墓出土的一本明宣德七年手抄剧本《金钗记》[33]，是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和潮州戏剧渊源的珍贵资料。清初吴六奇墓出土陶俑和家具、炊具、赌具、案、轿等模型器135件，这套反映清初兼称将军总兵官吴六奇生前坐堂、出巡和内庭生活情景的陶塑，人物神态生动，器具逼真，是清初精美的工艺品[34]。明清两代废除火葬，复行以灰沙墓为主的土葬，墓葬夯筑牢固，密封性好，在广州、大埔、潮州、东莞等地都发现有明清时期完好的尸体。在许多地方都发现有用弓形砖或斜形砖两边对合成墓顶的砖室墓。清代道光年后盛行拣骨葬，因此出现了用陶坛盛装骨灰的二次葬。

揭西县出土一件元代"至元通行宝钞"钞版，钞版用白色合金范铸而成，质坚硬，平面作长方形，长26.3、宽19.9、厚1厘米，重2.75公斤。钞版上面自右至左横写"至元通行宝钞"六字，中间花纹栏内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中央横写"贰贯"两个大字，两边各有一行蒙文，蒙文之下右边横写"字料"，左边横写"字号"；下部有十一行竖写文字，头三行是"尚书省，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最后一行是"尚书省提举司"。此版保存尚好，从表面观察，其使用时间可能较

长[65]。

广东沿海水域发现的沉船和文物，是古代中外商舶往来的实录。珠海蚊洲岛沙滩中出土元代瓷器212件；汕头市郊的沙丘中出土明代的青花瓷碗、碟、杯、罐、器盖等共64件[66]；在上川岛附近水深20多米的海域打捞起90多件元代的瓷器，一条铜鎏金的腰带等[67]。

回顾广东考古五十年的历程，可以高兴地展望未来，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建立广东历史的编年、重建广东古代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几十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为抢救和保护祖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的甚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向前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承麦英豪、徐恒彬、朱非素等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和广州市考古所陈伟汉等同志对本文的编写和修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古运泉、邱立诚）

注释

① 参看《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叶祖康：《近五十年香港考古概况》，《香港考古学会》1957年2期；秦维廉：《香港考古》（英文版），1980年。

②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马坝人类及其他动物化石地点调查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1卷2期。

③ 宋方义等：《广东封开垌中岩动物群与人牙化石研究》，《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④⑥⑪ 张镇洪等：《广东封开县罗沙岩洞穴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94年2期。

⑤⑩ 宋方义等：《广东罗定饭甑山岩、下山洞穴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9年2期。

⑦ 宋方义等：《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岩新发现的人类化石》，《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⑧ 宋方义等：《马坝人化石地点新发现的打制石器》，《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⑨ 邱立诚等：《广东英德宝晶宫的旧石器》，《江汉考古》1998年1期。

⑫ 邱立诚等：《广东英德沙口狗子冲古文化遗存调查与试掘》，《江汉考古》1998年1期。

⑬ 曾祥旺在河源、龙川等地采集到零星的砾石石器标本。

⑭ 邱立诚：《广东洞穴石器文化考察》，《南方文物》1995年3期。

⑮ 邱立诚：《广东封开、怀集的几处洞穴人类文化遗存》，《考古与文物》1989年4期；金志伟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98年1期。

⑯ 南澳县海防博物馆等：《广东南澳县象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与文物》1995年5期。

⑰ 邱立诚等：《广东丰顺县先秦遗存调查》，《考古与文物》1998年3期；曾祥旺：《广东番禺飘峰山旧石器

遗存》图六：6，《南方文物》1997年4期。
⑱ 尤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⑲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封开簕竹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7期；又同⑮。
⑳㉑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11期。
㉒ 李岩：《浅谈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屈肢葬》，《广西文物》1期；彭全民等：《深圳市大鹏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㉓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西樵山出土的石器》，《考古学报》1959年4期；曾骐：《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㉔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㉕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1期。
㉖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简报》，《文物》1978年7期。
㉗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封开县乌骚岭新石器时代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1期。
㉘ 广东省博物馆等：《普宁虎头埔古窑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2期。
㉙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7期。
㉚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的东周墓葬》，《考古》1964年3期。
㉛ 参见《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考古开新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㉜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9期；李子文：《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发掘》，《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珠海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7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珠海市博物馆发掘资料。
㉝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县灶岗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3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南海市鱿鱼岗贝丘遗址发掘》，《考古》1997年7期；杨式挺等：《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1981年3期。
㉞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平远县西周陶窑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7期。
㉟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东增城、始兴的战国窑址》，《考古》1964年3期。
㊱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县圆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7期。
㊲ 徐恒彬：《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述》，《广东出土先秦文物》1984年香港出版。
㊳ 吴增德等：《论广东青铜时代的三个基本问题》，《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㊴ 文本亨等：《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㊵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7期。
㊶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饶平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
㊷ 广东省博物馆等：《揭阳地都蜈蚣山遗址与油柑山墓葬的发掘》，《考古》1988年5期。
㊸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大埔县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11期。
㊹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普宁牛伯公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7期。
㊺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7期。
㊻ 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艺术博物馆，1995年。
㊼ 徐恒彬：《广东信宜出土的西周铜盉》，《文物》1975年11期；朱非素：《连平县忠信公社彭山发现铎和甬钟》，《广东文博通讯》3期，1978年；邱立诚等：《广东博罗出土一组青铜编钟》，《考古与文物》1987

年5期；杨少祥：《兴宁县出土战国铜编钟》，《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

㊽ 徐恒彬等：《高栏岛宝镜湾石刻岩画与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珠海市博物馆等：《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㊾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4期；《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试掘获一批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4年43期。

㊿ 《广州发现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中国文物报》1996年6期。

5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五华县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年11期。

52 刘大强：《阳春汉代遗址及明清墓葬发掘简报》，《广东文博》1990年1期。

53 邱立诚等：《始兴罗围犁头嘴汉代城址》；刘建安等：《乐昌县河南村洲仔汉代建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文物出版社。

5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55 麦英豪：《广州东郊罗岗秦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8期。

56 57 61 6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58 邱立诚等：《乐昌对面山东周至唐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

59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沙河顶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86年12期。

60 徐恒彬：《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9期。

62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63 杨耀林、谭水业：《广东德庆汉墓出土一件陶船模型》，《文物》1983年10期。

65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西北郊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55年5期。

66 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3期。

67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68 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6期。

69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电白县霞洞唐墓简报》，《考古》1986年1期。

70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考古》1987年3期。

71 广州市文管会：《三年来广州市古墓葬的清理和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广州市文物志》125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72 商承祚：《广州番禺石马村南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6期；麦英豪：《关于广州石马村南汉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考古》1975年1期。

7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紫金县宋墓出土石雕》，《考古》1984年6期。

7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75 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广州市文物志》134页，岭南美术出版社；梁明燊：《粤西龙湖古城址勘探记》，《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1985年，香港。

7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阳春县发现南汉钱范》，《考古》1984年4期。

77 杨少祥：《广东梅县市唐宋窑址》，《考古》1994年3期；广东省博物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1985年。

78 黄玉质等：《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考古》1983年6期。

7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西村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1978年。

80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考古》1961年3期；遂溪县博物

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3期。

61 曹腾騑等：《广东海康元墓出土的阴线刻砖》，《考古学集刊》第二集，1982年。

62 曾广亿：《广东佛山古颖岗宋元明墓记略》，《考古》1964年10期

63 林壤：《广东揭西明墓发现"蔡伯喈"戏曲抄本》，《文物》1961年1期。

64 杨豪：《清初吴六奇墓及其殉葬遗物》，《文物》1982年2期。

65 曾广亿：《广东陵水、顺德、揭西出土的宋代瓷器、渔猎工具和元代钞版》，《考古》1980年1期

66 曾广亿：《广东珠海、汕头出土的元、明瓷器》，《文物》1974年10期。

67 中国、南海沉船文物な中心どする：《はるかなる陶瓷の海路展》，朝日新闻社，1993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五十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的考古工作，在解放前几乎是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人才，建立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对研究广西各民族的历史，研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对研究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

一 旧石器时代

广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是以柳江人为代表的一批晚期智人化石和以百色盆地为代表的一群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一）以柳江人为代表的古人类化石

广西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较多，这些人类化石一般都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等哺乳动物化石伴出，常见于岩溶洞穴中，主要有1958年发现的柳江人和在此之前（1956年）发现的来宾麒麟山人，自此之后陆续发现的人类化石有灵山人（1960年）、荔浦人（1961年）、都安干淹人（1972年）、柳州都乐人（1975年）、柳州九头山人（1975年）、都安九楞山人（1977年）、桂林宝积岩人（1979年）、田东定模洞人（1979年）、柳江甘前人（1980年）、柳州白莲洞人（1980年）、忻城古蓬人（1981年）、隆林那来洞人（1984年）、靖西宾山人（1985年）、隆林龙洞人（1988年）等。

其中柳江人是较丰富的一项晚期智人化石材料，在柳江县通天岩一个支洞的下层红色砂质粘土层中，与大熊猫、巨貘、中国犀、东方剑齿象等动物化石共存。人骨包括1具完整的头骨（缺下颌骨），4个胸椎连5段肋骨，5个腰椎及骶骨、右髋骨，左右股骨各1段，除股骨可能属另一女性外，其他同属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脑容量约为1480毫升。柳江人头骨明显有原始黄种人的特征，是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的代表①。

柳江人只发现了人类化石及其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没有发现当时人类制造和使用

的工具。桂林宝积岩不但发现了人牙化石及其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6目16种，而且还发现了人类制造和使用的打制石器12件[2]。柳州白莲洞不但发现了人牙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和众多的打制石器，而且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往后延续的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文化层[3]。这两处洞穴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广西古人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广西的古人类化石分布广泛，几乎凡是石灰岩岩溶地貌发育较好的地区都有人类化石的发现，尤以桂中地区最集中。这些众多晚期智人化石的发现，说明在更新世晚期，广西地区就已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踪迹。而此之前也应有人类在广西活动，他们的化石还有待进一步寻找[4]。

（二）以百色石器为代表的旧石器

自70年代以来，在百色盆地右江河谷的阶地上不断发现打制石器，特别是1982年在百色地区的文物普查，在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县，发现打制石器散布地点80多处，采集各种类型石器1100多件。随后10多年来，又不断有新的发现，到目前为止，已发现这类石器地点100多处，采集石器标本累计4000多件。

百色盆地发现的石器都是形体硕大、加工原始的砾石石器，石器原料是从附近阶地砾石层中采集的石英、石英岩和砂岩砾石，加工方法主要是锤击法，少数是碰砧法，以单向打击为主，只有小部分用交互打击，经第二步加工的很少，成品保留原石面大。从类型来说，以大型的砍砸器占多数，次为尖状器，还有一定数量的手斧。和旧石器晚期洞穴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相比，在原料选择、加工方法和主要器形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不同的地方仅在于百色石器比洞穴遗址的石器个体更大，制作更粗糙，因而也更原始，时代可能会更早[5]。

关于百色石器的年代，由于没有找到与石器共存的人类化石或哺乳动物化石，自发现之日起，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开始认为，在地质年代上，右江河谷三级阶地砖红色粘土层属晚更新世；石器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地已报道的石器有一定差别，有些和丁村的标本相似，可是两者材料不同，却和广西山洞中发现的打制石器有一定相似之处。因而把它们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6]。1986年春，对百色盆地中有代表性的10多处遗址的剖面进行了重点观察，依据地貌、新构造运动和岩性特征等方面的分析，重建右江河谷发育史。在观察的基础上，指出石器的层位是比红土阶地要晚得多的第三阶地（T3），同时，根据右江阶地序列的分析，将百色石器的时代放在同盐井沟动物群或周口店动物群相当的中更新世[7]。后来对田东檀河遗址和百色百谷遗址作多次发掘，从砖红壤中获得160多件石制品，为百色石器提供了最明确和最充分的层位证据。这种砖红壤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以及东南亚一些大河流域的河谷或盆地里，在第四纪地质和古环境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关学者认为，其年代至迟不会晚于北京人时代的早期（距今约60万至40万年），而更可能是比距今73万年还早的早更新世[8]。

二 中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如何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即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是史前考古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1935年，裴文中先生在武鸣苞桥、芭勋、腾翔和桂林市郊调查了一些洞穴遗址，推断它们属于中石器时代。根据是：1）所出动物和人类化石的石化程度很轻，动物的种类主要是猪獾、香狸、猕猴、鹿和牛等，都是现生种；2）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分为3类：一类是砾石石器，采用不同种类的砾石，由一面把边缘打成钝刃，作为刮削器和砍砸器；一类是石磨盘、石磨棒；一类是穿孔砾石。3）有用鹿角磨光制成的角器，但没有发现陶片和磨制石器。5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重新调查了这些地区的洞穴，发现有些类似的洞穴遗址出土磨制石器和陶片，认为从武鸣等洞穴出土的石磨盘和穿孔砾石具有进步特征，其时代可能较晚，主张把它们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文中在1965年出版的《柳城巨猿洞的发掘和广西其他山洞的探查》一书中，在专门探讨广西出产化石的山洞时认为："由广西各山洞里发现的砾石打制石器，不一定完全属于新石器时代，也可能有中石器时代及旧石器时代者。"

经过30多年的资料积累之后，一些学者于80年代初又将广西洞穴遗址中有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问题重新提出，认为广西发现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它们之间的过渡形态，即中石器时代，应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过渡形态表现为，在洞穴遗址的文化层中含有大量的软体动物介壳，文化遗物绝大部分为石片和制作简单的打制石器，部分遗址有小量磨刃石器和穿孔砾石。动物化石几乎全部是现生种类。它们同旧石器时代遗址相比，没有绝灭种动物化石；同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没有陶器。根据这些特征概括，他们认为裴文中调查发现的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仍应视为中石器时代，原来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桂林东岩洞、来宾盖头洞、柳江陈家岩、思多岩、崇左矮洞、柳州白莲洞等，也应属于中石器时代⑨。

柳州白莲洞经过几次发掘，发现它的文化堆积分为5组，代表3期文化：1组为第1期文化、黄色堆积，遗物有打制石器和晚期智人牙齿化石，以及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2组为第2期文化，灰黄色和棕黄色螺壳堆积，含大量的打制石器、小量的磨刃石器和穿孔砾石，打制石器中有不少具有类似细石器特色的燧石小石器，动物化石有野猪、水牛、鹿、豪猪、猕猴等，全属现生种，属中石器时代；3、4、5组为第3期文化，是含陶片的钙华板层，属新石器时代。据^{14}C和铀系年代测定，第1期文化距今28000±2000年和26680±625年；第2期文化距今19910±180年；第3期文化距今8000±800年左右⑩。

白莲洞第2期文化的石器以打制砾石器和燧石小石器为主。出现了石镞，燧石小石

器较多，反映了捕捞业的兴起。特别是出现了钻磨而成的穿孔砾石和磨刃石器，意味着新石器时代即将到来。白莲洞第2期文化的发现，为岭南地区确立中石器时代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三 新石器时代

在广西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0多处，但大部分还没有作正式发掘。60年代初，对海滨贝丘遗址（东兴亚菩山）作过试掘，60年代中期对南宁附近的一些河旁贝丘遗址，如扶绥江西岸、武鸣芭勋、南宁青山、邕宁长塘、横县西津等；对山坡遗址，如扶绥那淋屯等，都作过小规模试掘，70年代又对一些遗址作过试掘，但大部分资料都没有认真整理和研究，对广西原始文化的分类仍停留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区分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弄清它们的文化序列。

（一）洞穴遗址

洞穴遗址主要分布于岩溶发育的石灰岩地区，桂北、桂中、桂南都有。大部分是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延续。代表性的遗址是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平南石脚山和那坡感驮岩等。

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南麓，总面积约300平方米。在主洞中心区发现经过长期烧烤的圆形火塘和储放杂物的椭圆形灰坑，在主洞后壁附近发现石料贮放点。文化层中出土密集埋葬的人骨架，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包括石器、骨器、陶片和动物骨骼、牙齿。墓葬是单身丛葬，没有明显墓圹，没有发现葬具，葬式多采用屈肢蹲葬，也有侧身屈肢葬，其中一具侧身屈肢葬的中年女性人骨旁紧挨着一具二次葬的小孩骨架，可能是母子合葬。至少有4具头骨上留有明显的人工伤痕[11]。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利用花岗岩打制成砍砸器、砍劈器和盘状器。打击方法比较简单，石器种类较少。磨制石器所占比例小，多用板岩、页岩和千枚岩琢磨而成，其中许多仅磨刃口，通体精磨的极少。有用动物长骨磨制的骨镞、骨锥、骨鱼叉、骨簪和骨针，用蚌壳制作的蚌刀、蚌铲、蚌勺和装饰品。陶器均手制，夹砂，厚重，火候较低，色泽不匀。陶器品种主要是敞口、直口或敛口的罐、釜、钵、瓮，器表饰绳纹或篮纹、划纹和席纹。伴出大量动物骨骼，包括猪、羊、牛、苏门羚、鹿、獾、豪猪、食蟹獴、山灵猫、猴、竹鼠、鱼、龟等。其中猪骨经过鉴定，证明甑皮岩人已经能够驯养动物[12]。甑皮岩遗址的文化层中有一层钙华板，将堆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年代在距今9000年以上，晚期年代在距今7500年以上，是我国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3]。

鲤鱼嘴遗址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上层为灰褐色土，贝壳堆积坚硬，部分胶结，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片和动物遗骸。下层有两个较大的灰坑，有大量灰白

色灰烬及比较集中的烧骨和红烧土。下层的上部发现墓葬，有人骨，但无明显墓圹。上层陶器有夹砂陶，也有泥质陶，出现蚌质工具，与甑皮岩上层相当。下层陶片数量少，主要是夹砂绳纹陶，火候低，质地粗疏，时代与甑皮岩下层相当⑭。

石脚山遗址的陶器有红陶、灰褐陶、黑陶、灰陶、浅灰陶、白皮陶、白陶等多种陶色。器物种类较多，以鼎、豆、圈足盘、高领罐类最具特色。器表纹饰致密规整，除素面和磨光外，有细篮纹、细绳纹、刻划纹、压划纹、曲折纹、水波形贝纹、方格纹、弦纹等，代表了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圈足盘、器座、器表所饰的细绳纹、水波形贝划纹与珠江三角洲和环珠江口诸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白陶与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和珠江三角洲的同类器相同。它是受大溪文化南渐的影响，还是受珠江三角洲诸文化西渐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⑮。

感驮岩遗址出有大量石器、骨器和陶片。石器均为磨制，大部分通体磨光，主要器形有双肩石斧、常型石锛、有段石锛和凿、镞、戈等，制作精美。骨器多用破碎的兽骨加工而成，有铲、锥、匕、簪等。陶器以夹砂灰陶和黑陶为主，也有红陶，主要器形是釜、罐、杯和众多的纺轮。陶器纹饰有绳纹、弦纹、水波纹、曲折纹、锯齿状附加堆纹、乳钉纹等，除了拍印、刻划之外，还有穿孔、镂空、堆贴等装饰手段。整个文化面貌表明，它已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已步入青铜时代。

（二）贝丘遗址

广西的河旁贝丘遗址主要集中在南宁附近的邕江两岸，以邕宁、横县最密集，往上溯左江流域的扶绥、崇左、宁明、龙州，右江流域的武鸣、平果等县，往下延至郁江流域的贵港、桂平，以及柳江流域的象州县。这类遗址最初是1963年在南宁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到目前为止，已发现34处。这些遗址都很有规律地分布在河流转弯处，或在大小河流汇合的三角嘴上。自60年代起，先后对横县西津遗址、南宁豹子头遗址、邕宁顶蛳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基本上弄清了它们的文化内涵。

西津遗址位于横县附城乡，1965～1966年发掘。发现了居住地和墓葬区，出土大批人骨架和文化遗物。其埋葬习俗以高度卷屈、头顶向上的蹲式为特色，墓圹不明，是否有随葬品尚不清楚。文化层中有大量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石器除打制的以外，还有打磨兼施和全磨的。其中的有肩石器代表了岭南地区有肩石器的早期类型。蚌器和骨角器相当多，而且切割、琢磨得比较精细，以勺形蚌匕和弓形骨鱼钩最具特色，用鳖甲切割成形而磨制的梯形单面刃刀，也是罕见之物。陶器以夹砂粗陶居多，羼和料为石英砂和蚌壳粉末，胎坯厚薄不匀，器底最厚者达3.6厘米。器形多直口或敞口的圜底器。陶器纹饰以从口沿往下垂直拍印的绳纹为主，个别器口内也有纹饰，口沿之下（颈部）穿孔的现象比较多见⑯。

豹子头遗址位于南宁市郊柳沙园艺场那坝村西南的邕江北岸，1973年发掘，发现

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动物遗骸。文化面貌和西津遗址差不多，部分石器也仅磨刃口，陶片也是夹砂粗陶居多，而且也是直口或敞口的圜底器，胎很厚重。所不同的是，豹子头几乎不见双肩石器，没有骨鱼钩和勺形的蚌匕及梯形单面刃的鳖甲刀，却有大量的穿孔蚌刀、穿孔蚌网坠。1978 年用该遗址的蚌壳作^{14}C 测年，是距今 10720±260 年；1979 年重新采样，从距地表 0.5 米以下至距地表 2.0 米，分别测得 4 个数据，在距今 9355～10430 年之间，剔除石灰岩地区水生动物测年偏老程度，实际年代是距今 8000 年以上。

顶蛳山遗址位于邕宁县蒲庙镇九碗坡村东北，现存面积约 5000 平方米，1997 年 4～7月发掘 500 平方米。发现墓葬 149 座、灰坑 6 个、柱洞 22 个，获得陶、石、骨、蚌等类遗物 1000 余件。遗址堆积可分 3 层：第 1 层为灰褐色粘土堆积，不含螺壳，发现柱洞等遗迹，出土石器、骨器、陶器等文化遗物和大量的破碎兽骨。石器多为通体磨光的小型石锛，骨器种类多，有锥、铲、凿、锛等，陶器以夹砂陶片为主，也有泥质陶和部分夹炭陶，器类包括直领圜底罐、杯、深腹釜等，遗物的面貌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咸头岭一类文化相近，年代距今约 6000～5000 年。第二层是以螺壳为主要包含物的堆积，厚 0.1～2.3 米，出土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发现大量墓葬和水、陆生动物遗骸。石器以石灰岩质的斧最多；骨器以锥、凿为主，少见锛；蚌器大量，多为刀，有穿孔的，也有不穿孔的，均呈鱼头形；陶器均为夹砂陶，器类单调，只见直口、敛口和敞口的圜底深腹釜。文化面貌与南宁豹子头、横县西津等遗址相似。第 3 层为棕红色粘土堆积，不含螺壳，出土较多的玻璃陨石质细小石片石器、石核及少量陶片。小石片多以直接打击法打下，石核上少见加工台面现象。陶器仅见直口、沿上施花边、沿下附一周附加堆纹、器表施粗绳纹的釜。这种细小石器及陶器，在广西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此遗址的墓葬人骨保存状况较好，葬式为屈肢葬和肢解葬。其中肢解葬为前所未见。顶蛳山遗址的发掘，对认识广西地区史前文化的特征和内涵，构建广西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探讨广西在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

海滨贝丘遗址在东兴、防城、钦州等县市都有发现，这些遗址均处在临海地带的山岗上，有的就在海潮浸泡的小岛上。这类遗址以海生的斧足类和腹足类软体动物的硬壳堆积为特征。其中有 2 处遗址作过试掘，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打制石器都是石核石器，形体厚重，以尖状和厚刃的蚝蛎啄、手斧状石器最典型。陶器都是夹砂粗陶，当时人类的经济生活以采蚝捕鱼为主，也上山打猎和兼营农业，时代属新石器早期[18]。

（三）山坡遗址

这类遗址情况比较复杂，经过试掘的有灌阳五马山、钦州独料和隆安大龙潭等遗址。

五马山遗址位于灌阳县水车乡夏云村附近的五马山西麓，灌江东岸。1977年发掘，发现有圆形灰坑和布局凌乱而又密集的柱洞，出土石器原料多为灰岩，有的通体磨光，有的仅磨刃部，有石斧、石锛、石凿、石杵、石镞、石球、石环。陶器大部分手制，极少数有慢轮痕迹，陶质以夹砂红陶占绝大多数，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都很少，有纹饰的陶片也少，只有细绳纹，绝大多数是素面。可辨器形有釜、罐之类，都是侈口溜肩的圜底器，偶见极个别袋足，可能是鬲。有7件饰竹节纹的泥质灰陶豆把，几件扁平如饼的陶纺轮。

独料遗址位于钦州市那丽镇独料村西侧的禾塘岭上。1978年发掘，发现有灰沟、灰坑、柱洞等遗迹和石器、陶片、果核等大量遗物。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锤、刀、锄、镰、矛、铲、犁、杵、磨棒、磨盘、镞等。陶片都是夹砂的，大部分是红陶，小部分是褐灰陶和黑陶。器胎厚薄不匀，内壁不平。多数有纹饰，最常见的是绳纹，次为篮纹、曲折纹和网纹。在篮纹和绳纹内常常夹有指甲纹。可辨器形有直口或微敛口的圜底釜、罐之类。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反映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已处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阶段。该遗址出土的几件残石铲与桂南地区以后大量出现的大石铲形制相同，可能与大石铲文化有一定的联系[19]。

大龙潭遗址位于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1978年春和1979年夏发掘。清理灰坑20个，其中圆形竖坑15个，袋状坑2个，椭圆形坑2个，不规则形坑1个。坑壁一般修治光滑，有便于上下的斜坡式通道，坑内填土中杂有少许红烧土块、碎炭和一些石铲。有的用石铲和石片嵌砌在坑的周围砌成护壁，坑内则密集地竖放完整的石铲。除了灰坑内出土石铲以外，在灰坑之外的地层中也出土大量的石铲，而这些石铲都以一定的组合形式排列，以刃部朝上，直立或斜立的为主。每组石铲少则2件，多则20件。有的排成队列，铲与铲之间相互紧贴；有的排成“U”形；有的团团竖立，围成一个圆圈，圈底铺垫一块石片；也有的几件石铲呈水平叠压在一起。遗址内出土的人工遗物全是石器和石料，几乎全无陶片和其他质料的文化遗物共存。石铲多是完整的，很少有开光使用痕迹，同时还有许多未加工成型的石片或半成品。此外还有小量斧、镞、锄、犁、凿等石器。双肩石斧（锛）与桂南丘陵地区其他山坡遗址所出完全相同[20]。

这类以大石铲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遗址已发现60余处，遍及桂南19个县市，大部分分布在靠近江河湖泊的坡岗上，而以隆安县东南、扶绥县北部、邕宁县西北，即以右江、左江向南宁方向合流而成邕江的三角地带最密集，出土遗物也最典型。零星出土这类石铲的地方，最北到河池、柳州、贺州，东到容县、北流、兴业，西到德保、靖西，南到合浦、宁明。广东的封开、德庆、兴宁和越南的广宁，也有零星发现。

关于这类遗址的性质，有人根据大量未开光使用的石铲及其半成品，认为可能是石器制作工场。1985年试掘崇左县吞云岭遗址，发现在文化层中的遗物几乎全是石铲半

成品、毛坯、残片及板岩块，并且都是侧置或竖放的，每隔一段距离就存放一堆，有的还用石灰石间隔。这种现象更增加了石器制作场地说的依据[21]。但从大龙潭遗址来看，周围可供开采制作石铲的石料产地最近也有5～6公里，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选择大龙潭作为专门生产石铲的场地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遗址中没有发现用来加工石铲的手工工具。因此有人把遗址中那些奇特的石铲放置现象解释为与原始氏族社会某种农业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关于石铲的用途，有人认为大部分是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但也有人指出这些石铲在形制、大小、轻重、硬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长仅数厘米，重不及20克，有的则长达70余厘米，重数公斤；有的形体扁薄，一碰即破，有的刃缘厚钝，甚至平刃，表明它们大多无实际使用价值，因而认为，除很少一部分可用于农业生产之外，绝大多数应是礼器。

关于这类遗址的年代，因其文化内涵比较单纯，与石铲共存的其他类器物太少，分析对比相当困难。崇左吞云岭遗址和靖西那耀遗址都在大石铲文化层中伴出绳纹夹砂陶器，为这类遗址的断代带来了希望，但毕竟材料过于单薄[22]。如果从与石铲共存的有肩石器来看，同类有肩石器偶尔见于同一地区贝丘遗址的上层，因而可以推断它们比南宁地区贝丘遗址要晚。以前从广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出发，把这类遗址列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应该是可信的。在合浦县清水江曾发现大石铲与残铜器共存，因此有人推断大石铲遗址的时代为新石器时期末期，或可能属铜石并用时代。从大龙潭遗址文化层中收集的炭屑作^{14}C测定，第一次采集的测得结果是距今5910±105年，树轮校正是6570±130年，比一般推断的年代要早得多，后来再作测定，得出两个数据，一个是距今4750±100年，一个是距今4735±120年，可能比较接近实际。

四 西周春秋时期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时有出土，包括商末周初的铜卣，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铜戈、铜甬钟，春秋时期的铜罍等零星发现[23]，而最重要的是武鸣马头乡元龙坡西周春秋墓群的发现和发掘。

武鸣马头乡的勉岭在1974年初出土过商代晚期的铜卣和铜戈，后来在附近的那堤敢猪岩发现无胡铜戈。1985年夏，在离勉岭仅1.5公里的元龙坡出土1件西周铜盘。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这里是一处先秦墓地。同年10月至1986年3月，对这个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350座。这些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墓的填土经夯实。流水将周围的原生土冲走后，留下一个个夯土台，暴露于地表。墓室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两端有二层台，有的把墓圹挖成船形，个别墓有半圆形耳室。随葬品较少，一般每墓只有3～4件，主要是陶器，其次是铜器、玉石器。青铜器有盘、卣、刀、矛、斧、钺、

匕首、镞等。铜盘、铜卣是典型的西周风格，刀、钺、匕首、镞等形制特殊，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陶器火候较低，胎质疏松易碎，表面磨光，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有釜、罐、瓮、壶、碗、杯、纺轮等。玉石器有玦、环、串珠，还有石凿、砺石、石范等。石范的发现，特别是有的铜钺、铜刀、铜斧、铜镞可放入相应的石范内，说明是利用这种石范浇铸的，证明当时已有青铜冶铸业。这批墓葬有一种将随葬器物打破分散埋葬的特殊习俗，还有随葬石块的现象，可能有某种宗教含义。

元龙坡墓群的时代，从出土的典型青铜器来看，初步推断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用墓地采集的木炭作^{14}C测试，结果与此推断基本吻合，如151号墓是一座有二层台的陶器墓，^{14}C测定的年代是距今2850±70年，相当于西周中期；46号墓是一座在填土中发现有陶片的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4}C测定是距今2625±70年，相当于春秋中期。这是迄今在广西发现的最早的一批青铜时代墓葬，对探讨广西青铜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23]。

春秋时期墓葬还在恭城县嘉会乡秧家金堆桥发现1座，出土青铜器33件，计有鼎、尊、罍、钟、戈、钺、剑、镞、斧、凿、柱形器等，按用途可分为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棺具和生产工具6类。墓主人应是生前拥有兵器、礼器和乐器，过着钟鸣鼎食生活的奴隶主贵族。所出铜鼎5件，其中1件较大，通高55.5、口径57.0厘米，圆口，附耳，深腹，圜底，马蹄足，外形浑厚凝重，耳内外、口沿下、腹部各饰蟠虺纹一道，腹部间以绳索纹两道，腹下饰三角纹，蹄足膝面饰兽面纹，显系楚式鼎。另4件都是唇缘外撇，直耳，浅腹，圜底，细长足的典型“越式鼎”。所出铜尊形制与中原内地相似，但纹饰有浓厚地方色彩，其中1件作蛇斗蛙的连续图案，充满南方生活气息。铜罍、铜钟、铜戈、铜斧、铜凿，与中原内地春秋时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而铜钺、短剑、柱形器等，有鲜明地方色彩，代表了当时的土著文化。同一座墓，两种不同风格的铜器共存，说明当时南北文化的某些交流与融合[25]。

1993年和1994年，先后两次在田东县发现春秋晚期墓葬，所出原始形态铜鼓与铜罍、铜钟、玉玦、玉镯伴出，填补了广西铜鼓分类中的空白[26]。

五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生活在广西的先民主要是百越族的西瓯、骆越两大部族。经过考古研究，对探寻他们各自的活动地域及文化面貌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4年在平乐县张家乡燕水村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中晚期的墓葬。这批墓葬都是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位集中，形制简单，很有地方特色：

（一）墓底设腰坑。墓设腰坑是中原地区商周时代十分普遍的现象，进入春秋时期已大大减少，以至完全消失，腰坑内一般埋狗。银山岭战国墓群设腰坑的墓数比例较

大，占总墓数79%强，在时间上与中原地区流行腰坑的时间距离很大，在内容上未见埋狗痕迹，而放置一件陶器。

（二）随葬品组合很有规律。以实用器为主，基本上没有礼器。其基本组合是：铜兵器（或陶纺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有铜兵器的墓不见陶纺轮，有陶纺轮的墓不见铜兵器。铜兵器是剑、矛、镞相结合；生产工具是锄、刮刀相结合；生活用具是鼎、盒、杯相结合。相当整齐划一。

（三）随葬器物地方色彩浓。如铜扁茎短剑、铜双肩铲形钺、铜靴形钺、铜竹叶形刮刀、铜盘口鼎、铜禽首柱形器、铁刮刀、硬陶三足盒、陶罐形鼎、陶米字纹瓮等等[27]。

类似这样的战国墓，在广西贺州铺门、岑溪糯垌花果山、象州罗秀下那槽、平南赤马金村、北流白马隆安、容县六王龙井坪也有发现，在广东广宁铜鼓岗、罗定南门洞、四会鸟旦山、德庆凤村、肇庆松山等地发现的战国墓也多与此相似。

1985年冬，在武鸣县马头乡安等秧山发掘一批战国墓葬。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填土经夯打，较坚硬。随葬品简单，最多的一墓14件，最少的一墓一二件，其中有30%的墓没有发现随葬品。随葬器物一般为实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小量佩饰品，没有明显的器物组合规律。青铜器有剑、矛、钺、斧、刮刀、镞等，陶器有釜、罐、杯、钵、纺轮，玉石器有玦、璜，还有1件铁臿。陶器以硬陶为主，饰刻划水波纹和弦纹，拍印米字纹，有的有刻划符号[28]。

在武鸣县东的宾阳县也曾发现2座战国墓，出土青铜器有甬钟、鼎、剑、矛、斧、刮刀、叉形器等[29]。在桂西的田东县，也多次发现战国墓，出土铜鼓、铜剑、矛、戈、斧、叉形器及玉玦、玉环等[30]。

多年来，通过对这些墓葬的研究，已基本弄清了它们的族属。以平乐银山岭为代表的战国墓葬是历史上西瓯人的墓葬。桂东地区的贺州、岑溪、平南、北流、容县、象州等地的战国墓葬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葬相似，可能同属西瓯[31]。桂西地区的田东、宾阳、武鸣等地的战国墓葬彼此互相接近，与桂东地区相比，也有相同之处，如墓坑规模较小，随葬品的组合都是铜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铜兵器都包括相同的扁茎短剑、柳叶形矛、三棱形镞；陶器都以硬陶为主，火候较高，器种都是罐、杯、盒、纺轮等，陶器饰水波纹、篦纹和米字纹，有的陶器有刻划符号，符号也相同；玉石器都有玦。但两地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如桂东地区墓底设腰坑，桂西地区至今尚未发现腰坑；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中多铁器，桂西地区战国墓几乎没有铁器；桂东地区有的墓随葬楚式剑，桂西地区仅在武鸣安等秧出土一件楚式剑；桂东地区陶器较普遍，桂西地区陶器很少；桂东地区的硬陶三足盒、铜柱形器，桂西地区不见；桂西地区的铜鼓、一字格剑、叉形器，桂东地区不见。这些情况表明，这两地虽同属百越民族的活动地盘，但应分属不同的支系。如果认为桂东地区属西瓯的话，桂西地区就应属骆越[32]。西瓯接近

楚，受楚文化影响较深，有楚文化色彩；骆越接近滇，受滇文化影响较深，有滇文化色彩。

六 秦汉时期

秦汉考古是广西考古的重要方面。秦代，广西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设立了郡县，但统治时间短暂，留下的遗迹遗物不多；汉代则是广西经济文化大发展时期，历年配合基建发掘的汉墓近2000座，出土大批文物，丰富了广西汉代物质文化的研究内容。

在兴安县城西南20公里的溶江镇境内有一座古城址，自宋以来被称为“秦城”。经60年代调查，得知在秦城遗址范围内有4处古城址：1. 在马家渡南岸至大园村东北的“城墙埂子”；2. 在七里圩村南端的“王城”；3. 在通济村与太和堡之间的城址；4. 在水街北端大溶江与灵渠汇合处北面的城址。自1990年开始对七里圩“王城”进行勘探和发掘。经钻探，探明了“王城”的城墙、城门、护城濠、楼橹建筑及城内建筑基址。已发掘331平方米，初步弄清城墙堆积状况、城内地层堆积和建筑遗迹。推测“王城”不是一般的民用建筑，而是一座军事性质的古城，其时代当属两汉时期[⑮]。

与秦城遗址类似的城址在广西还发现多处，包括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帛书地图所标示的洮阳县城和观阳县城，都保留着城墙基址。

广西的汉墓主要集中于贵港、合浦、梧州及桂北各县、市，从发掘的情况看，西汉前期保留战国时期的习俗较多，盛行土坑木椁墓，随葬品为实用器。1976年和1979年发掘的贵港罗泊湾1、2号墓，是西汉初期南越国郡守尉的高级官吏和王侯官吏配偶的墓葬[㉞]。两墓东西并列，墓坑平面呈凸字形。1号墓椁室内有漆棺3具；椁室底下有2个器物坑和7个殉葬坑，其中4个殉葬坑内各埋圆木棺1具，3个殉葬坑内各埋方木棺1具，殉葬者是13岁至26岁的男女青少年。随葬器物中一部分与黄河、长江流域的相同，有的还有“析”、“犛”等铭刻地名，可能是从内地传入的。另一部分如铜鼓、羊角钮钟、直筒形钟、铜桶、盘口鼎富有地方色彩，应是当地所造。不少漆器有“布山”烙印，说明是当地产品。有一批刻有容量、重量铭文的铜器，是研究度量衡制度的重要资料。2号墓椁底也有殉葬人，出有“夫人”玉印和“家啬夫印”封泥。1980年发掘的贵港风流岭31号墓，也是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椁室分前后两部分，后室有两具棺，应为夫妇合葬墓。墓道左侧有车马坑，出土大铜马及铜驭手俑。铜马自足至耳高115.5、长109.0厘米，分头、耳、身躯、四肢、尾等9段铸造，用子母口、榫卯套接，反映了很高的铸造技巧[㉟]。贺州金钟1号墓是西汉前期稍后的大型土坑木椁墓，椁内分隔成前后两室，后室有两具木棺东西并列，东棺附近有“左夫人印”玉印、玉饰、铜镜等，西棺附近有龟钮铜印、铁剑、玉璧等。随葬陶器除实用器外，还有鼎、盒、壶、钫等礼器。墓主人可能是南越王派驻当地相当于侯王一级的官吏[㊱]。

西汉后期墓葬，随葬品中陶器有鼎、壶、钫、提桶、四耳罐和灶、仓、井等模型明器，玛瑙、琉璃、琥珀等佩饰品也较多。1971 年发掘的合浦望牛岭 1 号墓是一座有代表性的西汉后期墓。椁室分棺室和左右耳室，出土铜器、铁器、陶器、漆器和玉石器 240 多件。铜器品种多，凤灯、博山炉、鼎、钫、壶、魁、匜、鐎壶、卮、盘等都成对。其中凤灯、提梁壶、长颈壶、三足盘、龙首魁等錾刻精细的锯齿纹、菱形纹、羽纹、锦纹，是铜器装饰工艺的新发展，有两件陶提桶内有朱书"九真府"等字，墓主人或可能生前是九真郡太守[37]。1969 年和 1972 年在西林普驮发现用铜棺、铜鼓作葬具的汉墓。铜鼓墓用 4 面互相套合的铜鼓作葬具，随葬品主要是铜器和玉石玛瑙器，一部分散布在铜鼓周围，一部分放置在铜鼓之内，最内层置放用玉管、玛瑙串珠、绿松石珠等穿缀成的"珠襦"包裹的尸骨。墓主人可能是汉代句町族的首领[38]。

七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

三国时期广西属吴。贵港、梧州、贺州、兴安都曾发现过东吴文物。1982 年 3 月，贺县贺城镇寿峰乡石壁湾清理一座石室墓，出土 5 枚"大泉五百"铜钱。墓用石灰石砌筑，顶部用石块起券，与汉晋时代砖室墓的砌筑方法相同[39]。1984 年 10 月这里又发掘 11 座墓，其中有的从形制到随葬品都与这座墓相似，也可能是东吴墓。

两晋、南朝墓葬在广西分布很广。广西晋墓多是带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规模较小，随葬器物与汉墓相比，数量和种类都减少了。模型明器日渐消失，但青瓷日用器皿占的比重却日益增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青瓷唾壶、四耳罐、六耳罐。青瓷器胎骨细白，釉色晶莹，烧造水平很高。1957 年在兴安县界首镇百里村附近清理一座晋墓，墓室呈长方凸字形，分甬道和正室两部分，二者之间砌有一道横砖作门槛，墓砖有的有铭文，如"永和十一年太岁乙卯文"、"升平四年七月三日文"，随葬品仅有陶壶、银手镯。南朝墓的结构也较简单，随葬器物以青瓷器、滑石器为主。青瓷器新出现的品种有三足炉、三足砚、印花碟等。滑石器有猪、俑、砚、杯、钱等。滑石猪一般每墓一对或两对。流行滑石买地券。1962 年在桂林东郊尧山清理一座南齐墓，出土一方永明五年（487 年）滑石买地券[40]。1964 年在贺县铺门清理一座刘宋墓，墓砖侧边印有"大明六年（462 年）作"铭文。1987 年 6 月在鹿寨县江口区水碾六岭坡清理一座萧梁墓，出土一块中大通五年（533 年）滑石买地券。这些墓都可以作为广西南朝墓断代的标尺。1980 年 6 月，在苍梧倒水清理的一座南朝墓，随葬青瓷器、陶器、铜器、铁器等近 50 件。其中驾牛耙田、牛圈、禽舍、谷仓等陶制模型，留下了当时生产的真实图像。青瓷骑俑、陶牛车、陶侍俑、执刀持盾部曲家兵俑等，造型特点与长沙永宁二年墓陶俑极相近似，联系出土的铜铁兵器，再现了当地豪强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情况[41]。1981 年 10

月在永福寿城清理的一座南朝墓，也随葬大批陶瓷模型明器和仪仗俑，生活用品只有青瓷高足盘、青瓷钵等，由骑马俑、步辇俑、扛旗俑、击鼓俑、武士俑组合而成的仪仗俑群，在广西南朝墓中也属首次发现[52]。

南朝滑石买地券，桂林观音阁出土一块刘宋泰始五年（470年）的欧阳景熙买地券，1962年桂林尧山出土的是秦僧猛买地券，1980年3月又在融安安宁2号墓出土了覃华买地券，鹿寨江口出土的是周当界买地券。这些地券的券文都直行刻写，内容包括墓主姓名和丧葬年、月、日，所在地郡、县、乡、里，墓地价值钱两、面积或四至，证人姓名等。由此可见，南朝买地券流行到广西已具固定格式，从而可以考定下葬的确切时间和当地的地理沿革。

八 隋唐宋时期

隋唐时期考古，以钦州久隆宁氏家族墓的发掘和桂林桂州窑的发掘最为重要。

宁氏是南朝以来岭南少数民族中的豪族。族人在钦州地区世代为官，死葬钦州。宁氏墓葬分布于久隆乡的新圩、青草、新明、高营、平吉乡的古龙等地，在大墓岭东麓，北起久隆平心，南到新明石狗坪，绵延10公里。清道光六年（1826年）新明石狗坪出土隋大业五年宁赟墓碑。民国九年（1920年）平心圩山麓掘出唐开元二十年宁道务墓碑，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76～1977年间，在久隆、平吉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钻探，1977年6月发掘了位于青草附近的6座，1981年3月发掘了石狗坪的1座，初步揭开了这个墓群的主要内涵。这几座墓是中小型的券顶砖室墓，结构并不复杂。一般分墓室、甬道几个部分，从平面看，有“凸”字、“中”字、“干”字形几种形制，也有的是双室并列、同坟异穴的夫妇合葬墓。随葬品以青瓷器和陶器为主，也有铜镜、铜钱和其他金属器。墓葬形制、随葬品的配置以及器物风格等方面，带有较浓厚的南朝特征。但设置壁龛、灯龛和边沟等，又是隋代和初唐时期的特色。5号墓出土隋代五铢钱和十二生肖纹铜镜，7号墓用莲花纹砖、叶脉纹砖，随葬开元通宝钱，这些墓又正好处在隋大业五年宁赟墓和唐开元二十年宁道务墓之间。因此可以推断这些墓的年代属隋和初唐，墓主是当时的宁氏家族成员[53]。这群墓葬的发掘，对研究南朝至唐代岭南俚僚地区的经济、文化及其民族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1984年冬，在灌阳新街车头村画眉井清理了7座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其中1座的墓砖侧边印有“大业七年六月黄元墓”铭文，出土青瓷盘口壶、青瓷碗、青瓷三足砚和铜鐎壶等，可以作为隋墓断代的标尺。1985年2月，在全州凤凰乡湘江西岸大毕头村麻子冲清理了一座唐墓。部分墓砖印有纪年铭文，侧边的铭文或是“赵司仓参军息云骑尉”，或是“赵司参军息云骑尉等造”；也有的侧面印叶脉纹，正面印“太岁戊戌贞观十

二年六月廿日永州赵司仓参军墓息云骑尉造，留传后世子孙知"。可见墓主人是唐贞观时永州赵司仓参军[44]。1987年6月在兴安县护城乡红卫村明竹发现一座唐墓，墓砖有"贞观十五年辛丑七月庚日"、"唐家墓"铭文[45]。这两座墓为广西唐墓断代树立了标尺。

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曾于1965年在桂林市郊上窑村发现1处。1988年清理了3座。其中1号窑是青瓷窑，烧造技术采用匣钵装烧和垫托装烧，大量使用三足支钉作为坯件叠装的间隔具。匣钵内采用大小搭配套烧，底层和中层匣钵往往不用盖，只在上层匣钵加盖，部分匣钵盖以垫托代替，并在垫托四周放4～8件器物。这种做法在别处窑址中少见。主要产品是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器物胎厚，呈灰白色，内外施釉。以青釉为主，间以少量酱褐色釉。造型朴实，素面居多，杯、碗、高圈足杯和器盖上有莲花、莲瓣纹。2号、3号窑为露胎叠烧或单烧。2号窑的主要产品为日用器具，陶质灰胎，釉以青色为主。3号窑产日用陶瓷器、供寺院用器具和建筑陶瓷构件，莲瓣纹形式多样，有的突出器表，有一层至数层。从整体来看，这是一处与桂林佛教的兴衰密切相关的青瓷窑场，其年代创烧于南朝晚期，盛于隋唐，衰于北宋[46]。

宋代是广西陶瓷工艺大发展时期。1963年在兴安严关发现宋代瓷窑遗址以来，陆续在藤县、容县、北流、岑溪、桂林、全州、永福、柳城、钟山、合浦等地发现宋代窑址。这些瓷窑，有的规模很大，产品丰富，烧造技术很高，但文献上未见记载。它们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陶瓷工艺上的地区空白，对研究广西宋代手工业经济和对外贸易，有重要意义。

广西古代瓷器属青瓷系统，可分为青瓷和青白瓷两大类。这两大类窑在广西形成两个不同的分布带：一类以湘江—漓江—洛清江一线为主，包括全州、兴安、桂林、永福、柳城等县市，属青瓷类型；另一类以北流河一线为主，包括北流、容县、藤县、桂平等县，属青白瓷类型。70年代以前曾多次发掘藤县中和窑址。近20年来又发掘了永福窑田岭窑、兴安严关窑、桂平西山窑、容县城关窑和北流岭峒窑。

永福窑田岭窑于1979年7月发掘了4座。窑炉依山而建，是宋代常见的斜坡式龙窑。烧造方法全部采用装匣钵叠烧，器坯间用支钉间隔。主要产品是青瓷印花碗、盏、盘、碟、罐、瓶、壶、高足杯、灯等民用生活器皿，还有花腔腰鼓、瓷枕等。多用轮制，器形规整，胎壁厚薄均匀。施釉方法有浸、浇两种，釉色有青黄、青、翠青、青灰、酱色等，以明彻莹润的翠青釉最佳。纹饰以印花为主，刻、绘花纹次之，贴花最少。印花技法受耀州窑影响，主要花纹为缠枝菊、团菊、海水游鱼等。由于采用模印，花纹清晰，施釉后浓淡相映，美观大方。3号窑出土大量花腔腰鼓残片，可能是一座以烧花腔腰鼓为主的瓷窑。这种腰鼓瓷胎色青灰，褐彩在青釉上绘花纹。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油画红花纹以为饰。"永福与临桂为邻，窑田岭窑的发现，印证了范成大的记载，出土花

腔腰鼓本身也为判断此窑的存在年代提供了旁证[47]。

兴安严关窑主要产品是碗、盏、盘、碟、壶、罐等生活日用品，胎质较粗厚，呈紫色或灰色。釉色变化较大，以青黄为主，有灰青、姜黄、酱黄、玳瑁、天蓝等色泽。其中以点彩、挂彩月白釉器，八棱青黄釉器及印花器较有特色。装饰手法以印花为主，亦有刻花、划花。图案多以双鱼海水、婴戏荷花为题材，有牡丹、菊、莲等植物纹样，有的印有“福海寿山”吉祥语或书写“太平”、“府学”、“吉”、“鱼戏新荷”等字款。花纹的布局和线条都较粗疏。从烧造工艺来看，采用的是明火叠烧法，不用匣钵，由于受热不匀，往往造成整串烧件烧结，并旁及周围件柱，出现粘釉搭烧现象，因此废品甚多，成品率不高[48]。

藤县中和窑制坯普遍用轮制，兼用模制，装烧技术普遍使用匣钵，早期采用一钵一器仰烧法，晚期采用一钵多器叠烧法。产品有碗、盏、盘、碟、杯、壶、盒、罐、瓶、钵、灯、枕、腰鼓等，以碗、盏、碟为大宗。胎质洁白细腻轻薄，有较好的半透明度，釉以青白色的影青釉为主，有小量米黄、灰褐釉。器物造型多取材于植物的瓜、果、葵瓣、莲瓣之形，也有仅作葵瓣、莲瓣口的。装饰艺术以印花为主，兼用刻花、划花和贴花，题材有动植物、海水、人物，以缠枝花卉最流行。是一处以生产外销瓷器为主的民间瓷窑遗址[49]。

容县城关窑位于容县容城的绣江两岸，主要产品是碗、盘、杯、盏、碟、壶、瓶、罐、尊、腰鼓等。器形变化多样，胎质坚薄，白而细腻。施影青釉，釉色晶莹碧绿；有少量施青黄、玳瑁、翠绿等色釉，特别难得的还有绿釉、红釉和窑变。装饰艺术方面运用了刻、划、印、堆、贴等手法，有菊瓣、荷花、团菊、缠枝花卉、卷草、戏婴、水波游鱼等纹样。窑具有匣钵、支钉、垫饼、垫圈、垫座等。一些匣钵上印或刻有文字，有的是姓氏，有的是数字，也有“官”、“本”等字款。这些字款对研究当时的瓷业组织和生产规模有重要参考价值。红釉最早见载于苏东坡的《试院煎茶》诗，其中有“定州花瓷琢红玉”句，但无实物可印证。容县城关窑红釉瓷的发现，对认识红釉提供了实物资料[50]。

桂平西山窑于1973年和1980年各清理1座。这两座瓷窑也是依山而建的龙窑。窑的后半部有两堵挡火墙，用以控制火温向后扩建。窑具有匣钵、垫饼、垫圈、支钉，采用一钵一器仰烧法。部分匣钵壁刻有姓名等文字。产品有碗、盏、盅、盘、碟、杯、钵、罐、壶、盒、香炉等。施影青釉，有少许翠青釉，有的饰以莲花、葵瓣等刻划纹，但以素瓷为主。由于出土的都是民间日常用品，精品很少，推知可能均是民窑[51]。

此外，对左江流域的古代崖壁画和各地出土的古代铜鼓进行了许多专题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也有专集出版[52]。

（执笔：蒋廷瑜）

注 释

① 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3期。

② 王令红、彭书琳、陈远璋：《桂林宝积岩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石器》，《人类学学报》1982年1期。

③⑬ 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等：《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1辑

④ 蒋廷瑜、彭书琳：《广西古人类的发现与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2期。

⑤ 曾祥旺：《广西百色地区新发现的旧石器》，《史前研究》1983年2期；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新州打制石器地点的调查》，《考古》1983年10期；何乃汉、邱中郎：《百色旧石器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87年4期。

⑥ 李炎贤、尤玉柱：《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4期。

⑦ 黄慰文等：《百色石器的时代问题》，《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11月。

⑧ 黄慰文等：《对百色石器层位和时代的新认识》，《人类学学报》1992年2期。

⑨ 何乃汉、覃圣敏：《试论岭南中石器时代》，《人类学学报》1985年4期。

⑩ 张银运、王令红、董兴仁：《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1期。

⑫ 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4期。

⑬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4}C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14}C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2期。

⑭ 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9期。

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1996年广西石器时代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7年10期。

⑯ 彭书琳、蒋廷瑜：《广西西津贝丘遗址及其有肩石器》，《东南文化》1991年3、4期。

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7年11期。

⑱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12期

⑲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1期。

⑳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1期。

㉑ 何乃汉：《崇左县吞云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

㉒ 梁旭达：《靖西县那耀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

㉓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1984年9期。

㉔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2期。

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93年1期。

㉖ 韦江：《田东县联福村战国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

㉗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2期。

㉘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2期。

㉙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宾阳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2期。

㉚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79年6期。

㉛ 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㉜ 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年12期。

㉝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兴安县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98年11期。

㉞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

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西汉墓》，《考古》1984年1期。

㊱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贺县金钟1号墓》，《考古》1986年3期。

㊲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5期。

㊳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9期。

㊴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贺县两座东吴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

㊵ 黄增庆、周安民：《桂林发现南齐墓》，《考古》1964年6期。

㊶ 广西梧州市博物馆：《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12期。

㊷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1983年7期。

㊸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隋唐墓》，《考古》1984年3期。

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广西全州发现纪年唐墓》，《考古》1987年3期。

㊺ 李珍、彭鹏程：《广西兴安县红卫村发现纪年唐墓》，《考古》1996年8期。

㊻ 桂林博物馆：《广西桂州窑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4期。

㊼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永福窑田岭宋代窑址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㊽ 韦仁义：《兴安县严关宋瓷窑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

㊾ 韦仁义：《广西藤县宋代中和窑》，《中国古代窑址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

㊿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容县城关宋代瓷窑》，《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5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桂平宋瓷窑》，《考古学报》1983年4期。

(52)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左江岩画》，文物出版社，198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铜鼓图录》，文物出版社，1991年。

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南岛位于中国的南端，临南海，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汉、黎、苗等民族的先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拓这片南疆沃土，创造了属于我们伟大祖国一部分的灿烂文化。

海南建省前隶属广东省管辖[1]。建省前广东省文博部门就已在海南开展了许多文物考古工作，较重要的有：1957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进行的文物普查[2]，1984年各市、县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开展的规模较大的文物普查[3]；两次普查期间，均进行了小规模试掘清理。海南建省后，为配合基本建设和编辑《中国文物地图集·海南分册》等工作，我们又进行文物复查、专题考古调查及抢救性发掘[4]。通过这些考古工作及所发现的文物，丰富了我们对海南古代文化的认识，并为研究海南历史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一

80年代初，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三亚市东北的落笔洞内发现含有螺壳、蚌壳及小哺乳动物化石的灰色胶结层堆积，认为这是一处时代较早的人类活动遗存[5]。海南建省后，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与海南省博物馆于1992～1993年发掘了这处较重要的洞穴遗存。洞内三层堆积中，以第2层灰色砂质土为主要的文化层堆积，其中除发现人牙化石及较多哺乳动物在内的动物化石外，还出土了一批石、骨、角制品等遗物及用火遗迹。石制品多用火山岩和黑曜石为原料，以单面打击为主，多采用直接锤击法加工，分为砾石石器和石片制品两大类。器形有砍砸器、敲砸器、锤、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片等。加磨石器仅见穿孔石器一种，未见刃部加磨或通体磨光的石器。骨、角制品基本利用切割、打击和刮磨相结合的加工方法，器类主要有铲、锤、矛形器、锥、镞、尖状器等。少量骨锥为通体磨光。

发现的13枚人牙化石分别代表了老年、中年和青年各个阶段的个体，属晚期智人。

出土动物化石中，除部分爬行类、鸟类外，哺乳动物主要有华南虎、亚洲象、豹、熊、鹿、麂、水牛、羚羊、豪猪、猕猴、野猪、果子狸等8目45种。发现的螺、蚌类水生动物数量极多，堆积十分密集，计7目24种。经^{14}C测定年代为距今10890±100年和10642±270年[6]。

落笔洞洞穴遗址内涵特征主要是：

1. 堆积物含大量螺、蚌、蚌壳。

2. 人类牙齿属晚期智人，与其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几乎全是现生种。

3. 文化遗物有石、骨、角制品，无陶器。

4. 石制品用锤击法加工，多为单向打击。

5. 经济生活以狩猎、捕捞和采集为主。

从总体面貌上考察，落笔洞遗址与岭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广东封开黄岩洞[7]、阳春独石仔[8]，广西柳州白莲洞Ⅱ期文化[9]等洞穴遗存在文化内涵上十分相近，之间存在较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这表明落笔洞遗址的文化性质与岭南同类洞穴遗存有着直接的联系，应同属岭南砾石石器文化系统。同时也应看到，它们在一些文化内涵上也有着一定的差别，落笔洞遗址存在着某些自己的文化特点和地方风格，或许代表了不同地域的洞穴文化。在年代发展时序上，落笔洞遗址当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衔接阶段，凸现出较明显的文化过渡特征和性质。落笔洞遗址是我国目前分布最南的一处石器时代遗存，它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洞穴遗存文化分布区的认识，而且为探讨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及其发展变化提供了一定的实物资料[10]。

二

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直是我省较重要的田野工作，经过较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和复查，迄今为止，已发现近300处遗址和遗物点。从其地理环境考察，江河两岸的台地遗址、山坡遗址分布很广，数量较多；海滨、部分岛屿及河流入海口则分布有沙丘遗址、贝丘遗址。上述遗址分布偏重在海南南半部地区，北半部除个别市县有少数遗址外，多仅见遗物点分布。遗址一般分布范围不大，地表遗物较少，文化层堆积较薄且内容简单。这可能反映了海南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岛屿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表现出比较缓慢且滞后的特点。初步分析，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大致可分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晚期遗址较多，中期遗址次之，早期遗址甚少[11]。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贝丘遗址仅在东方、乐东等市县有少量发现，其中东方市新街遗址是较重要的文化遗存[12]。遗址在东方市北黎河入海口右岸较高的沙地上。文化层厚约0.5～1.0米，内含大量螺壳、兽骨及陶器、石器等遗物。发现的陶器均为手制夹砂粗

陶，灰褐色为主，未见泥质陶；器类单一，见到的器形仅有圜底罐和圜底釜，均敞口、鼓腹，除素面外，有的饰绳纹。石器多用砾石为材料，采用交互打击法制成，磨制石器很少；器形甚少，仅有砍砸器、斧状器，前者器身略呈椭圆形，后者略似梯形。说明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渔猎、采集等经济活动。新街贝丘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存有一定的区别，在时间上要晚些。与广东潮安石尾山、陈桥村[13]，广西防城亚菩山、马兰嘴[14]等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的文化内涵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石器以打制为主，少见磨制石器；陶器均为夹砂粗褐陶，不见泥质陶，仅见绳纹和篮纹，多为圜底器，平底器甚少；堆积中出大量螺、贝壳等。这表明它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较为接近。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与早期相比，分布范围有所扩大，遗址面积也较大，文化层堆积增厚，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磨制石器开始流行，除夹砂粗陶外，已有泥质陶，器类明显增加。沙丘遗址较多，贝丘遗址和山坡遗址少些。其中陵水石贡遗址[15]、陵水大港村遗址[16]、定安佳笼坡遗址[17]、通什毛道遗址[18]为代表性遗存。

陵水县石贡遗址1992年发掘，遗址堆积厚约0.6～1.5米，分为3层，中层为主要文化层，出土遗物十分丰富。石器以磨制居多，打制的较少，梯形斧、锛多见，且通体磨光，少见凿、砺石和打击石片等。陶器数量增加，粗砂红褐陶最多，次为粗砂灰褐陶，有少量细砂陶，未见几何印纹陶；常见器形有罐、釜、钵、碗、盆及纺轮、网坠等；较流行圜底器，平底器、圈足器次之，不见三足器；素面磨光为主，多见于罐、釜、碗，个别饰绳纹、划纹、镂孔，磨光红衣陶是该遗址的文化特征之一。还发现房址、柱洞、灰坑等遗迹。

陵水县大港村沙丘遗址在近邻港湾的坡状沙堤上，文化层堆积较单纯。石器以磨制为主，通体磨光，梯形斧、锛较多见，均弧形刃，有肩石器少见。陶器均为夹砂粗陶，红褐色多见，手制，未见泥质软陶和几何印纹陶；器形主要有敞口或盘口圜底罐、釜和圈足碗、平底钵，少见算珠式纺轮、网坠；器表一般经打磨，除素面较多外，有的施红陶衣，少量饰绳纹和划纹。

定安县佳笼坡遗址经过试掘，这是一处山坡遗址，堆积不厚。出土的石器有磨光梯形斧、锛和半磨的棒状石器。发现大量夹砂红褐陶片，另有少许灰褐色或黑褐色粗砂陶，均为手制，器形仅见罐、釜、碗等；素面较多，其他纹饰少见，未见磨光红衣陶。

通什毛道1～5号五处遗址散布在通什河左岸的低台地上，均属面积不大的台地遗址。发现的石器有灰色砂岩磨制而成的梯形斧、锛和砺石，另见用天然的灰石条简单加磨而成的杵、磨盘、锤等。陶器多为夹砂粗褐陶，以红褐色为主，另有灰褐色、黄褐色和黑褐色等，手制，火候较高；因多为陶器残片，经初步辨认，器形有大口器、圜底器、平底器、方足器等，当多属罐、碗、钵一类的器物；除个别饰划纹外，素面陶居多。

这一时期的贝丘（沙丘）遗址多分布在南部滨海沙丘地带，台地（山坡）遗址则主

要在中部及北部江河沿岸及丘岗地区。它们在文化面貌上较趋向一致，也有着某些差别，在时间上石贡、大港村遗址当较早些，佳笼坡、毛道遗址或稍晚于前者。海南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与两广地区同类遗址关系已十分密切，以石贡、大港村为代表的这类遗址，与广东增城金兰寺下层、新会罗山嘴、东莞万福庵下层[19]，广西左、右江平果城关、宁明花山和邕江流域的武鸣、扶绥、横县、桂平、南宁等市县的部分贝丘（沙丘）遗址[20]，在文化面貌上比较近同，但也有某些区别，如海南有磨光红衣陶，广东出土泥质陶和彩陶，广西均未见；两广地区皆出骨器和蚌器，海南则没有。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大都属于台地和山坡类型，广布于全省江河及其支流的阶地或附近的坡地、山岗上，数量明显增加，但遗址面积一般不大。沙丘遗址较为少见。发现的遗址主要有陵水县古田岽、老包村、古楼坡，白沙什才、新村、保家、道拉，保亭老山村、毛枝，乐东旧塘园村、抱湾河床，三亚河头村、下马岭、高村，东方大广坝，文昌西边坡、昌田坡，儋州求水岭、那大及琼山、琼中、通什等。经初步分析，这类遗址的文化特征有：

1. 磨制石器增加，多为通体磨光，器类很多，常见的有斧、锛、铲、凿、镞，另有少量犁、矛、戈和网坠、砺石、纺轮、杵等。斧、锛流行长身和有肩两种，部分锛为有段或有肩有段式。典型器物主要有长身斧、双肩斧、有肩锛、有段锛、大铲、长身铲等。

2. 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砂粗陶为主，手制，器形多见釜、罐、盆、碗，另有纺轮、网坠、陶拍、陶饼等。釜、罐流行敞口和盘口，多为圜底，碗、盆为圈足，少见平底器、三足器。盛行素面陶。器耳有环状、桥状和乳钉之分。盘口釜、板沿口釜、敞口罐、圈足盆是代表性器物。泥质陶陶色有红褐、灰褐、黄褐之分，手制或轮制，器表磨光。除篮纹、划纹和素面外，出现简单的几何印纹，如方格纹、水波纹、米字纹、菱形纹、篦纹等，未见曲尺纹、云雷纹、夔纹、复线长方格纹等典型的几何印纹。器形仅有罐、钵、鼎、碗、杯等。

3. 部分遗址发现骨、角器，器形有锥、针、凿、匕、纺轮、梭等，其中以锥居多，有的通体磨光。

4. 发现的装饰品只有石珠、石环、陶珠、陶坠饰、骨管等。

5. 从近邻江河的台地、山坡遗址出土的大型石器工具看，当时人们已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生产；石镞、石戈及兽骨的发现，又表明狩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的比重。沙丘遗址较少发现大型石器，说明原始农业生产的发展较滞后，仍以渔猎经济为主。

初步分析，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文化内涵同两广地区基本相近。如部分遗址与广东珠江三角洲同类遗存相比[21]，石器多为通体磨光，器形主要为锛和斧，两地的锛均比斧多，其中有肩锛、双肩斧、有肩有段锛等似一脉相承。陶器都为夹砂陶和泥质陶，流行圜底器、圈足器，多见罐、釜，板沿口陶釜是典型器物。海南出土大石铲的遗

址与两广地区以大石铲为特征的新石器晚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大致近同，都属台地、山坡类型的遗址。这类遗址主要分布在广西南部地区的扶绥、钦州、隆安、邕宁、合浦、北流、玉林、贺县、德保、靖西等地[22]和海南部分市县，广东封开、德庆、兴宁也有少量发现。其中广西邕江的三角地区遗址最密集，出土遗物也最典型；海南则发现了大石铲及平肩长身石铲、双肩斜柄石铲等；其他地点的石铲种类单调，器形多发生变异。此外，还伴出石斧、锛、凿、镞、犁和砺石等。这说明当时原始农业在生产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

海南与岭南地区虽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但因其孤悬海外，与中原及岭南的文化交流受到一定限制，其文化发展明显滞后。在中原及岭南地区已相继进入青铜时代的奴隶社会时（约相当于中原的殷周之际），海南仍处于原始社会晚期。但这时，已有某些青铜文化因素传入海南。1994 年，昌江县燕窝岭出土 9 件战国青铜绳纹环形器[23]。铜环外径 8.7～11.4、环宽 1～2、厚 0.2～0.3 厘米，外缘为齿状，齿长 0.25～0.7 厘米，环面有 6～8 圈绳纹，器重 50～125 克（同样器物 80 年代中期在东方市曾出土 1 件）。该类器物用途不明，在海南乃至国内尚属首次发现，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因我省青铜文化遗存发现甚少，又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为此，除青铜绳纹环形器可以定为战国器物外，目前还少见相当于中原殷周之际的遗迹和遗物。

汉代是海南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平定南越，元封元年（前 110 年）在海南岛北部置珠崖、儋耳二郡，实现了中央封建政权对海南岛的直接统治。

两汉时期较多发现的遗存是瓮棺葬，以岛的西部和南部见多，中部山区也发现一些。70 年代，在陵水县和三亚市交界的福湾沿海沙滩发现了面积很大的瓮棺墓群[24]。从已发掘的 12 座墓的结构（即葬具的组合）分析，有 4 种不同的形式：即分别用 2 件、3 件、4 件、5 件陶器相套而成，中间的陶器器底凿穿。葬具有夹砂粗陶釜、甑，刻划纹四耳陶罐（其中 2 件施酱褐釉）。夹砂粗陶釜均为敞口、圆腹、圜底，外壁均有一层很厚的烟炱，多素面。甑器形与釜近同，只是底部镂孔。四耳陶罐都是高身平底，肩部或上腹一般饰刻划水波纹、弦纹、镞首纹和斜方格纹等。多数瓮棺内尚存小孩牙齿和碎骨。随葬品有棺内的琉璃珠、琥珀珠和棺外的小陶釜，有两座瓮棺上各放置两块烧裂的大石块。这批瓮棺均侧置于沙土中，距地表 0.2～0.71 米，瓮棺通长 0.5～1.8 米不等，主要埋葬小孩，也有个别为成年人。从葬具和随葬品的特点看，均属于东汉。

1998 年试掘了东方四更镇荣村遗址[25]。发现有灰坑、灶、柱洞及瓮棺墓等遗迹。遗

址发掘出的炭灰堆积坑（沟）结构较为特殊。该类坑（沟）多呈长条状，长0.9～2、宽0.2～0.6、深0.06～0.15米，直壁，平底，壁及底部用火烧过，较硬；坑内堆积物为草木灰、泥炭、木炭及碎陶片。此遗迹用途待考。发掘的许多探方中有不少排列不规则的近似柱洞的遗迹，可能与房屋建筑有关。遗址发现石器甚少，仅有斧、锛、敲砸器、磨制石片和打制石片。陶器以夹砂陶和几何印纹陶为主。夹砂陶陶色有灰褐、红褐、黑褐，器形为釜、钵、罐、瓮及陶拍、陶箅子等，手制，多素面。印纹陶中刻划纹多于拍印纹，主要为刻划水波纹、弦纹、篦点纹、锥刺纹、菱形纹和方格纹等，器形有罐、钵、盆及陶饼，多为轮制。出土骨器较多，有锥、针、匕、凿、纺轮和管形器等，反映了当时的渔猎经济仍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遗址还出土个别残铁器和红铜环。初步分析，遗址的年代当在汉代。

与岭南地区相比，海南也发现不少含磨制石器、夹砂陶器，并伴出几何印纹陶的遗存[26]。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海南西部和南部。一些遗址以印纹陶为主，纹饰主要有拍印方格纹、方格纹底加小戳印、米字纹、刻划水波纹、弦纹、篦纹等。对照岭南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分期看，拍印米字纹、方格纹多属于印纹陶已逐渐衰落的战国中晚期，刻划水波纹、弦纹则又晚些。据研究，几何印纹陶是由北向南向西传播的[27]。在广州地区的西汉墓葬出土的几何印纹陶纹饰主要是方格纹和刻划纹、弦纹，米字纹甚至延续到西汉中期[28]。而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合浦、广东湛江地区（如徐闻县的华丰村、槟榔埚村等）的东汉遗址和墓葬中，方格纹加小戳印是最普遍的陶器装饰花纹[29]。从海南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和墓葬看，既不见几何印纹陶的早期纹饰，也不见鼎盛时期的夔纹、雷纹和组合纹饰，而仅见印纹陶衰落期的米字纹、方格纹等。此外，儋州马劳地、临高昌拱村等几何印纹陶遗址还伴出两汉五铢钱。看来，海南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的年代大多当在两汉或稍晚[30]。

汉代青铜器在海南也有一定发现，主要有铜锅（釜）、铜鼓，散见于岛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区。大型青铜锅（釜）较有特色，已出土7件，其中临高3件[31]、东方2件、儋州和陵水各1件。釜造型奇特，体形硕大，有的外表附一层烟炱，当属炊器。均为盘口，直身，平底或圜底，口沿上附二、四或六只绹纹耳。其中临高调楼乡抱才村出土的一件为平底、六耳，每只耳上端均铸有一对人、畜像，共三组，间有牛、骑马武士和戴冠着短裤人像等，锅（釜）口沿上并铸有一个骑马武士和两头牛，器腹中部铸箍状纹（或称弦纹）三匝。此器为同类器中最大者，通高74、口径93、腹径81、厚0.2厘米，合范铸成，外壁留有二道明显的合范痕迹。海南出土的青铜锅（釜），其总体造型与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木椁墓中所出铜锅（釜）相近[32]，只是体形较硕大，附加的饰件多且复杂。此外，它们与广州东汉墓出土铜釜和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铜釜[33]也很接近。

解放以来，在临高、昌江、东方、陵水、乐东等地相继出土了9面铜鼓[34]，多为两

广地区汉代北流型，少数为东汉～唐代的灵山型，昌江县出土的一件北流型铜鼓较完整[36]，其面径94.5、高55厘米，鼓面大于鼓身，有突出唇边，胸、腰、足三部分不明显，下胸部有两对绳纹小圜耳，腰曲不甚。鼓面有4个立体蛙饰，无主晕，腰部无划分方格，遍体饰以细晕，三弦分晕，多而密。鼓面饰云雷纹，腰部饰重菱形纹。鼓中央的光体小，八芒，其中对称的四芒有二道分岔。

1984年5月，乐东县志仲镇潭培村出土1枚篆体白文"朱庐执刲"银印[36]。印面呈正方形，通高1.9、边长2.4厘米。印纽类似兽首蛇身，高1.1厘米，通体饰鳞，尾部作须纹，呈曲身爬行状，无穿。据《汉书·贾捐之传》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中央政府决定撤销珠崖郡（此前，儋耳郡已并入珠崖郡），仅设一个朱庐县管理海南，该县归海北合浦郡遥领[37]。而"执刲"或作"执圭"，也作"执珪"，是楚国爵名。西汉沿袭古制，曾封功臣曹参、夏侯婴、灌婴等为"执刲"。"执刲"印目前能见到的只有2枚，另一枚是1975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环城公社堂排大队西汉晚期墓的"劳邑执刲"[38]。其墓主据考为郡守一类的高级官吏。该印为蛇纽琥珀印，边长2.3、高2.1厘米，刻工粗糙，属明器。印文原释作"劳新刲印"，今释为"劳邑执刲"（"邑"暂释作"阜"字）[39]。经初步分析，"朱庐执刲"银印当是西汉晚期中央政府颁给有功的朱庐县守官的赐印，它是研究汉代海南的历史地理和政权设置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

两汉以后，历三国吴、晋及南朝宋、齐等朝代，封建中央政府对海南的统治持续不断。加之东汉末年以来，北方连年战乱，很多中原的汉人和岭南百越人迁居海南，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推动了海南封建社会的发展。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年），高凉郡冼夫人"请命于朝"，在废儋耳郡之地设置崖州[40]。此后，中央封建王朝对海南的统治逐步巩固。唐、宋时期，由于当时对外贸易的频繁，使自古以来地处南海丝绸之路要冲的海南岛，日益受到中原王朝的重视，海南的社会经济比以往得到更迅速的发展。

1978、1994和1995年，在陵水县英州镇军屯坡到古楼坡一带清理了5座珊瑚石板墓[41]。墓葬形制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一长方形土坑内，沿四壁直立大小不一的珊瑚石板，上覆以珊瑚石板为盖，未置底板。石板均未加工，很不规整。墓室一般长3、宽0.6～0.8、高0.7米。墓内仅出夹砂陶片和铁器残件。另一种则用打磨规整的珊瑚石板，采用全榫卯和半榫卯套合而成长方形"金"字顶的墓室。石板厚11～14厘米，石板连接处填以石灰勾缝加固，结构严密。墓室一般长2.2～3.5、宽1～1.5、高1～1.2米。有的墓室内及棺底各铺有一层厚约10厘米的炭灰。随葬品主要有青釉、酱黑

釉四耳罐、六耳罐，彩绘花卉罐，平底碗，圈足碗，刻花碗等，以青釉为主，还出土铁剑和石雕人头像。墓葬年代应为唐代。

唐宋以来，我国与东亚、中亚、东南亚及东非、北非、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处于这一航运要冲的海南岛也受到了直接影响。近年在三亚市、陵水县沿海一带发现的伊斯兰教徒墓葬群和唐宋陶瓷器证明了这一史实。

伊斯兰教徒墓葬群主要有5处[42]：三亚市梅山、回新村、番岭坡，陵水县干教坡、福湾。墓葬形制，从干教坡发掘的几座来看，均为竖穴土坑墓，长1.8～2.0、宽0.8～1.0、深1.0～1.2米，无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西北，脚东南，面朝西。每座墓葬的前后两端各竖碑石1块，朝外的一面均雕刻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和花纹图案，内容为死者名字和死亡日期或《古兰经》经文。碑以珊瑚石雕刻而成，形状不一，碑文字体和花纹图案也略有不同，石碑一般高40～67、宽35～58、厚10～14厘米，按形制分为四式。其中Ⅰ、Ⅱ式碑年代应在唐宋时期，Ⅲ、Ⅳ式碑定为宋元时期。梅山、番岭坡、福湾的墓葬与干教坡的基本相同，年代为唐～元。而最近发现的回新村伊斯兰教徒墓群则见有石棺板和清代墓碑，这种石棺板与海南其他地区明代石棺墓板相近，初步分析，该墓群（或部分墓葬）的年代为明清时期。以上发现，为研究中外交通、海南岛伊斯兰教流传和回族居民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50年代至70年代，三亚、陵水一带出土了数批唐宋时期产自大陆的陶瓷器。其中，三亚的崖城镇出土唐代青釉六耳陶罐和青釉陶碗[43]；陵水的味号镇、里陵村等地出土唐宋窖藏瓷器[44]，在出土的青黄釉大瓷罐、大缸、大釉陶瓮等几件器物内，分别装有宋代瓷器和铁器，瓷器约400件，有白、青、黄、黑、灰釉瓷碗、碟和船形水注等，铁器仅为7把铁刀；光坡镇移辇村东部约1公里长的海滩沙堤东侧坡面发现许多唐宋遗物[45]，如唐代青釉罐和碗，有些碗是10件一捆地叠在一起，北宋陶瓷器有定窑、建窑、龙泉窑以及江西和福建其他窑的产品，器形为碗、盏、洗、壶、瓶和罐等，还发现北宋铜钱和铁器残件。唐宋陶瓷器在海南各市、县几乎都有发现，尤以陵水、三亚为多，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与大陆东南沿海港口在商品贸易方面的密切关系。

宋代以后的墓葬在全省各地均有发现，以沿海地区为多。墓葬形制有土坑墓、砖室墓和石棺墓等几种。经发掘的有三亚和陵水交界处福湾海滩的宋代土坑墓，琼山府城镇宋代砖室墓，海口龙舌坡石棺墓[46]，琼山府城镇、灵山镇明代砖室墓[47]，灵山镇大明孙宅慈母林大娘碑墓[48]及儋州光坡镇沿海的石棺墓[49]等。土坑墓材料未经发表，形制不明。砖室墓则多为券顶单室，长方形墓室，内置木棺。府城宋墓的随葬品有魂坛、陶仓、陶亭和买地砖券，买地砖记载了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的一桩土地买卖情况，反映了当时封建经济发展的情况。府城、灵山明墓的随葬品有陶俑（人和动物）、珠饰和墓

志等。石棺墓有两种：一种如海口龙舌坡石棺墓，仅以几块石板搭成长方形棺室，墓底铺青砖而成。另一种如灵山镇明代林大娘碑墓，全部由石料建成，地下置石棺，其上铺10厘米厚的填土，再上为房屋式石构筑物（由基座、束腰须弥座、石墙、盖顶组成，须弥座以上露出地表）。还有一种明代石棺墓，如灵山镇永禄村边的一座夫妻合葬墓，地下置石棺，地表堆封土，封土外围砌石板，下部砌成向上收分的八角形，上为圆顶，这种形制与我省明代丘浚墓[50]、海瑞墓[51]和唐胄墓[52]等名人墓较相似。

此外，在琼山府城镇发现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立的"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53]，由宋徽宗赵佶撰文并以瘦金书镌刻而成。碑高2.5、宽1.3、厚0.29米，连石赑屃共重7吨，碑文阴刻，16行，392字，每字4厘米见方。东方、乐东尖峰岭和琼中五指山腹地陆续发现一些摩崖石刻。如东方市东方河沿岸虎山摩崖石刻"大元军马到此"[54]、尖峰岭下一块大石上摩刻"大元军马下营"，落款为"甲午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日立"、"十一日到黎婺山"[55]。五指山腹地发现明代的"水会平黎善后碑记"和清代石刻"手辟南荒"、"一手撑天"、"百越锁钥"、"刘宝林统兵到此"[56]等。这些石刻反映了元明清以来历朝中央政府平定黎族人民起义的情况。

五

海南的海洋国土面积约210万平方公里，包括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及其海域。自60年代以来，在上述岛礁及海域陆续发现我国古代文物，其中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文物较多。

西沙群岛位于南海西部，包括23座岛、7座沙洲、5座暗礁和6座暗滩。早在古代，西沙海域就为传统的南海航道上的必经之地。1974年和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对西沙部分岛礁进行了文物调查，发现了自南朝至清代的文物遗存。有甘泉岛唐宋时期居住遗址、明清孤魂庙遗迹、水下沉船遗迹，并在岛礁上采集了大批遗物[57]。1996年，国家文物局和我省共同开展了南海诸岛考古项目之一的'96西沙群岛文物普查工作。这次普查除了进行岛屿踏勘外，还进行了科学的水下考古调查，发现8处水下沉船遗物点，除采集大量宋～清代陶瓷器外，还在珊瑚岛东北海域发现一批石雕器物[58]。此后不久，在北礁礁盘外侧又打捞上一批铜锭、铜钱，铜钱以明代"洪武通宝"和"永乐通宝"占绝大多数，其他为王莽新朝至元代的铜钱[59]。此外，1987年，渔民曾在珊瑚岛东北礁盘打捞起10尊石雕人像[60]。

西沙群岛及其海域的文物，主要有陶瓷器、铜器和石雕器物三大类。陶瓷器按质地不同，可分为瓷器、釉陶和陶器三种。以瓷器最多，时代自南朝起，历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都有。陶瓷器均产于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湖南和广西等地的

瓷场，其中多数产品是我国传统的外销瓷器。

西沙群岛的瓷器主要有青花、青釉、青白釉、白釉和酱釉等，常见器形为碗、罐、壶、盘、盆、瓶、洗、盒、碟、杯等种。青花瓷，以碗、盘、碟为多，罐、杯、盒等少见；纹饰有花卉、植物、动物、山水、人物及字款等；多属明、清两代，元代极少；产地主要有江西民窑，部分出自广东和福建等地。青釉瓷，胎多为灰白色，另有灰色和灰黄色；釉色以青绿、青黄、青灰多见，另有少量梅子青和粉青色釉；不少青釉瓷器外壁施有各种花卉纹、瓜棱纹、鱼鳞纹、云纹、篦梳纹、弦纹、斜线纹等，内壁多饰莲花纹、菊花纹、鱼纹、云纹等，花纹采用印模压印和刻划技法；器形有碗、罐、壶、盘、盆、盂、洗等；多为宋代和元代，五代甚少；产地主要为福建、浙江和广东。青白釉瓷器，有碗、盘、盒、壶、瓶、洗、器盖等种，器身外壁施有花卉纹、叶纹、瓜棱纹、云水纹、水波纹、弦纹等，内壁仅见菊瓣纹、缠枝花卉、花朵、水波纹等纹饰。该类器多为宋代，五代和明代的很少；产地为福建、江西和广东。白釉瓷器数量甚少，仅见明代江西景德镇出产的浅腹盘、深腹碗和福建德化窑的敛口深腹小杯。青釉陶器数量很少，器形仅见罐、碗、壶、盘、坛、杯等，时代为南朝、隋、唐、宋和明代。此外，还采集到唐代黑釉陶罐和长沙铜官窑釉陶壶。

西沙采集的铜器大都出自北礁礁盘上，以铜钱数量最多，另有少许锭、器座、盘、杯、镜、剑鞘和熨斗等。铜钱按年款统计达 13 万枚之多，其中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各近 2 万枚和 7 万枚之多，几乎全是新币，有的成串相连在一起。其余为秦、新莽、东汉、西魏、唐、前蜀、南唐、后周、北齐、南宋、辽、金、元等历代钱币。

西沙群岛的珊瑚岛和金银岛附近海域的礁盘上发现了石雕器物，种类主要有人像、狮、斗拱、柱础、飞檐、柱、研钵和条、磨、棒等。雕刻工艺粗放简练，一般采用全雕或浮雕技术制作加工。从石材和雕刻技法看，可能是清代福建石匠的作品。

南沙群岛是我国最南的群岛。1992 和 1995 年，在南沙群岛永登暗沙、道明群礁、福禄寺礁、郑和群礁、太平岛礁滩、大现礁、皇路礁、南通礁等岛、礁、滩上采集到一批古代遗物[9]。主要有残陶瓷器、钱币和铁锚。陶器有秦汉时期的几何印纹陶、唐代四系陶罐、明清时期的灰陶瓮；瓷器有宋代龙泉窑青釉碗、宋元青瓷和青白瓷片、明清青花罐、碗（有“大明年造”、“成化年制”、“德裕”、“永保长春”、“福”、“荣合”等款识）、盘（“尚美”款）；钱币有汉代五铢、唐开元通宝、宋熙宁重宝和元祐通宝、元大德元宝及清嘉庆、道光、咸丰通宝；锚为清代单叶铁锚。

南海诸岛发现秦汉以来的文物史迹，反映出早在 2000 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那里生产、生活和航行，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中国政府一直对其进行有效的管辖。这些考古发现，无可争辩地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

（执笔：郝思德、王大新）

注　释

① 海南1950年5月1日解放，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1988年4月13日，海南撤区建省。

②㉖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2期。

③㉚㉝ 杨式挺：《海南自治州文物普查散记》，《广东文博》1983年2期。

④ 郝思德、王大新：《海南建省以来的主要考古发现》，未刊稿。

⑤ 王克荣：《海南岛的主要考古发现及其重要价值》，《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87年。

⑥ 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6月。

⑦ 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1期

⑧ 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试掘》，《考古》1982年5期。

⑨ 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⑩ 郝思德：《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文化初探》，《南方文物》1997年1期。

⑪ 郝思德：《海南史前文化初探》，《东亚玉器·庆祝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创立二十周年论集》，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

⑫ 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物志》（待刊）。

⑬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11期。

⑭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12期。

⑮ 冯永驱：《陵水县石贡沙丘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⑯ 见注②、③。

⑰ 定安县博物馆：《定安县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⑱ 曾广亿：《海南黎苗族自治州发现古代文化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

⑲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中部低地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2期；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12期。

⑳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5期。

㉑ 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1984年。

㉒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文物》1978年9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㉓ 该器物于1994年11月经全国馆藏一级历史文物确认专家组杜迺松、王海文、郝本性、高至喜鉴定确认。

㉔ 曾广亿：《海南岛东汉瓮棺葬发掘考略》，广东《文博通讯》第10期，1979年。

㉕ 参见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记录。

㉗㉘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

㉙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4期。

㉛ 梁明燊：《广东临高县出土汉代青铜釜》，《考古》1964年9期；杨耀林：《海南岛发现汉代铜釜》，《文物》1979年4期。

㉜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5期。

㉝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2年8期。

㉞ 王克荣：《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㉟ 参见海南省民族博物馆藏品资料。

㊱ 陈高卫：《西汉朱庐执刲银印小考》，《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87年。

㊲ 海南省档案局编：《海南省况大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

㊳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

㊴ 杨式挺：《"朱庐执刲"银印考释——兼说朱卢朱崖问题》，《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第1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㊵ 《琼州府志》。

㊶ 曾广亿：《陵水县出土一批古代文物》，广东《文博通讯》第2期，1978年；郝思德、王静：《陵水县军屯坡唐代珊瑚石椁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王大新：《海南年鉴·社会事业·文化·文物（1996）》卷二，海南年鉴社。

㊷ 李居礼、王克荣：《从陵水三亚发现的穆斯林墓葬看古代穆斯林在海南岛的活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87年。

㊸ 曾广亿：《广东陵水、顺德、揭西出土的宋代瓷器、渔猎工具和元代钞版》，《考古》1980年1期；另见注㉝。

㊺ 何纪生、李居礼：《陵水县移辇村海滩发现唐宋时代陶瓷器》，广东《文博通讯》8期，1979年。

㊻㊼ 郝思德、王大新：《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

㊽㊾(59) 王大新：《海南年鉴·社会事业·文化·文物（1997）》卷二，海南年鉴社。

㊿(51)(53) 海口市博物馆编《海口文物志》。

(52) 郭克辉主编：《琼山县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54) 郑瑶新：《东方县"大元军马到此"摩崖石刻考》，《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87年。

(55) 《黎族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

(56) 参见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拓片资料。

(57) 广东省博物馆：《西沙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6年9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北礁发现的古代陶瓷器》，《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1982年；何纪生：《谈西沙群岛古庙遗址》，《文物》1976年9期。

(58) 郝思德：《'96西沙群岛文物普查的新收获》，《岭峤春秋——海洋文化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60) 琼海县文化局：《琼海县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61) 王恒杰：《南沙群岛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9期。

重庆市考古工作五十年

重庆市博物馆

重庆市位于我国西南内陆，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东部。远古以来，人类便繁衍生息在这个地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

新中国建立的五十年来，重庆和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们一道，以配合大中型基本建设为主的方式，抢救发掘祖先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尤其是围绕三峡水库建设而展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为本地区历史文化面貌的复原，勾勒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

一　旧石器时代

位于重庆东部形成于上新世晚期的三峡河谷地区，河流阶地和洞穴比较发育，其第四纪堆积层中盛产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结合三峡地区及其南北许多重要的古人类遗迹的发现，古人类学家们认为，三峡地区是我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寻找早期猿人化石和巨猿化石的理想之地，有可能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①]。

历史上，重庆地区史前考古调查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探险考古队的纳尔逊（N.C.Nelson）以及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H.Edgar）等人均先后于三峡地区采集到一些石器。但直到本世纪70年代以前，重庆境内尚没有可以确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从70年代中期铜梁文化的发掘命名到90年代围绕三峡库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使过去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目前，重庆境内的旧石器地点约有50余处，其跨度涉及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各个阶段。

巫山猿人遗址1984年发现于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洞坡标高830米的山原期夷平面下，系洞穴堆积，1985～1988年进行了四次发掘[②]。重要的发现是一块人的左侧下颌骨（带有P4—M1）和一枚人的上门齿，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用磁性地层和氨基酸法测定的出土人化石的地层年代距今204～201万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巫山猿人的材料问世以后，其牙齿化石反映的体质特征的进步性与地质年代之间

的矛盾以及两件石制品的性质和数量，是引起人们广为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1997年秋，遗址再次发掘，出土了数量较大的石制品，多以石灰岩打制，形状不一，大小不等，多粗加工，亦有直接使用的情况，表现出相当的原始性[3]。这次发掘可望对前述关注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巫山猿人地点的发现，为在我国青藏高原东部的广大地区寻找更古老的人类化石（距今400～200万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阶段的丰都县高家镇遗址是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罕见的旷野类遗址。1995年、1997年两度发掘[4]。石制品非常丰富，以大中型砍砸器为主，有少量刮削器，打制方法以锤击、碰砧技术为主，亦有投击技术的应用。其文化面貌基本上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南方主工业系统。地质时代大致在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还有丰都井水湾、冉家路口等6个地点[5]。

丰都烟墩堡遗址1994年发现以来多次发掘[6]。出土标本10000余件，石制品1215件。石制品以石片石器为主，大、中、小型并存。打制方法主要用锤击法，亦有锐棱砸击法。有石核刮削器、凹缺器、石锥、钝背刀、端刮器、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似盘状器和复合工具等。烟墩堡以石片石器为主的特点及复杂的石器类型与中国南方石器以砾石石器为主的文化不同，可能代表一种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依据长江河流阶地的结构、地层对比及石制品特点推测，遗址的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中期，属于这一阶段的地点还有奉节藕塘、万州区大地坪、忠县乌杨[7]。

1985年，黔江县红土湾老屋基洞发现的800多件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8]，据称属更新世中晚期，这也是目前重庆所知分布最南的旧石器地点。

铜梁文化是重庆地区广为分布的一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铜梁遗址1976年发现，1978年发掘，1981年命名[9]。遗址出土大量动、植物化石和300多件石制品标本。^{14}C测年距今25000年左右。石制品主要以石英岩砾石为原料，有部分燧石砾石。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次为碰砧法，还有少量使用投击法。石器类型简单，以刮削器为主，次为尖状器、砍砸器。石器加工粗糙，多复刃，陡向加工为主，大、中型石器所占比例大，反映了一种原始粗笨的特征。这种情况，在四川资阳人地点[10]、重庆九龙坡区桃花溪[11]、重庆大渡口区马王场[12]、重庆合川铜溪桥角村[13]、重庆合川小河乡小河村[14]、遂宁县郪口[15]亦有发现。因此铜梁文化被认为是代表了涪江、沱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黔西观音洞、大冶石龙头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通过近年三峡库区高家镇等遗址的发掘，亦有可能从中找到直接的渊源。

奉节县鱼腹浦遗址1993年发现，1997年正式发掘[16]。发现石、骨标本1000余件。石制品有石核、各种类型的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等。此外，还发现有规律排列的十二个烧土堆及烧石、烧骨，已经发现的石、骨标本亦多呈条带状分布在烧土堆周围。根据地貌、地层及过去采集碳标本的年代测定分析，遗址年代在距今8000～7000

年之间。这个时间段的发现，在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及其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问题上极具价值。属于晚更新世末或全新世初的地点还有10余处，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第二级阶地上[17]。

二 新石器时代

90年代以前，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大溪遗址外，多限于调查阶段的认识，缺乏地层学依据，故文化内涵及时代判断常较含混。1992年以来，配合三峡工程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大规模展开，使这一状况开始改变。根据最近的资料统计，重庆地区含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遗址共计31处，均分布在长江两岸及其支流的以二级阶地为主的阶地上。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这些遗存表明重庆境内沿长江及其支流分布着两支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瞿塘峡以东，是江汉平原大溪文化的西界；巫峡以西到江津王爷庙，向北到合川沙梁子，广泛分布着"哨棚嘴文化"。

大溪遗址1958年发现、命名[18]，已历三次发掘[19]。历次发掘主要在墓地进行，共清理了209座墓葬。小型土坑、葬式复杂、以屈肢葬为主是其墓葬特色。随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及装饰品、鱼等，颇能反映大溪居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形态。大溪出土的高圈足深腹豆、曲腹杯、筒形瓶是其代表性器物。70年代以来，大溪文化的遗址广泛发现于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大溪遗址是其分布的西界，亦是属于大溪文化最晚期的遗存[20]。重庆地区大溪文化系统的遗存发现较少，目前所知还有巫山大宁河流域的欧家老屋遗址。

至于哨棚嘴文化，尽管曾经有不同的命名，但人们对其文化内涵、分布地域、时代范围以及与周邻原始文化的关系却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近年来已有发掘和研究者提出暂以遗址位置居中、堆积深厚、文化延续时间长的哨棚嘴遗址为代表，称其为哨棚嘴文化。这似可以成为认识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个新的出发点。过去所谓的"魏家梁子文化"[21]、"老关庙下层文化"[22]，可为哨棚嘴文化所涵盖，它们之间的关系今后也许会从类型和时代上作出更深入的阐释。

哨棚嘴遗址是忠县㽏井沟遗址群中的一处，发现于50年代[23]。1957年、1989年分别对遗址群中的哨棚嘴、瓦渣地、中坝遗址进行了试掘，并据此有过"长江沿岸区㽏井沟类型"的提法[24]。1993、1994年再度试掘，提出了"哨棚嘴一期类型"[25]。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又对㽏井沟口的哨棚嘴、瓦渣地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正式发掘[26]。经过初步整理认为，可以分为三期，一期即最下层堆积，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褐陶次之；纹饰以绳纹或绳纹组成的菱格纹为主，有较发达的箍带纹和少许水波纹；器类以侈口深腹盆、宽平沿直腹或鼓腹盆、小底花边深腹缸为主，另有小侈口鼓腹罐、侈口深腹簋、浅盘豆等。

经试掘或正式发掘的哨棚嘴文化较为重要的地点还有：

魏家梁子遗址[27]。发现残居住址、灶坑、柱洞、墓葬等遗迹，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等遗物。打制石器以石片刮削器和砍伐器最有代表性，磨制石器以精磨的小石锛和小石凿、大小不一的石球最具特色。陶器以夹碳、夹细砂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红褐陶为主；多侈口罐和圈足等，有钵、盆、罐、豆、盘等，罐类器口沿常见压印成齿状的花边。

1997年在巫山县锁龙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中发现残房址1座，出土大量文化遗物[28]。陶器多平底，有圈足器，以深腹罐、侈口罐、翻沿罐、钵、盆、盘口圈足罐等为组合特征，其文化面貌与附近的魏家梁子遗址相似。

老关庙遗址自1993年发现以来，经三次发掘[29]。1996～1997年在老关庙遗址区夔门古象馆基建中，相继清理时代大致相当的墓葬3座[30]。老关庙下层陶器多直口或敞口的平底或尖底器。圈足器很少。主要的器形为罐类和尖底缸，次为壶、盆、钵、碗、豆、器盖等。

江津王爷庙遗址1980年试掘[31]，出土石器有打制、琢制、磨制三种，有耜、锄、铲、斧、锛、凿、网坠、球等种类。陶器有泥质、夹砂两类，以夹砂陶为主，有羼合粗石英砂的情况。纹饰有绳纹、划纹、篮纹、戳刺纹、堆纹、水波纹等。流行在器口沿作按压水波状花纹。器形有平底、圈足二种，可辨盆、钵、杯、碟、釜、罐、瓮等，亦见陶纺轮、管形穿孔珠。

在嘉陵江流域的合川沙溪沙梁子遗址，1987年调查采集了一些早期遗物[32]。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陶片多为夹粗砂褐陶，纹饰主要为绳纹、划纹及其组成的斜方格纹。器类以侈折沿深腹罐、盆为主，亦见敛口钵、环形管状器、网坠等，与王爷庙遗物相似。

总体来说，哨棚嘴文化的陶器有泥质、夹砂及少量夹碳陶，以夹砂陶为大宗，存在一种羼合粗石英砂的习惯。褐色陶为主，亦有少量的红陶、灰陶和黑皮陶。纹饰多施于夹砂陶器。泥质陶素面比例较大，以绳纹为主，堆纹发达，亦有网格纹、戳印纹、划纹、篮纹和弦纹等。流行按压花边纹唇。夹砂陶多手制，部分口沿轮修，泥质陶则多轮制。器物形态以平底、圈足为主，亦见尖底器。主要的器类有敞口深腹罐、高领罐、花边罐、折沿盆、敛口钵、盘口器、高圈足器等。石器以打制和磨制为主，亦有琢制和自然砾石直接使用的情况。石器种类较多，有耜、锄、镰、砍伐器、斧、凿、锛、石杵、磨棒、磨盘、网坠、矛、匕、刀、镞、石球等。从功用上简单分类，包括了农业、粮食加工、木工、捕渔、狩猎几个方面，反映了一种农业与渔猎兼事的经济类型。可以认为，哨棚嘴文化是一支有自身源流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其时代范围大致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就目前的观察而言，哨

棚嘴文化与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青龙泉三期文化的区别是明显的，与川北边堆山[33]为代表的遗址和川西宝墩文化[34]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哨棚嘴文化自身的源流、类型，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当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三 夏商西周时期

对相当于中原夏商至西周时期的早期巴文化遗存，有一个漫长的识别过程。随着70年代以来鄂西夏商时期及成都平原三星堆、十二桥文化的梳理，早期巴文化作为一种比较资料开始被认识。90年代以来，发现了近70处含此期堆积的遗存，主要分布于长江干流及大宁河、澎溪河、滑井沟等主要支流两岸开阔地段。

夏商时期重庆地区巴文化的陶器多为夹砂陶，其中夹粗砂陶占有一定的比例，亦有一定的泥质陶，夹砂陶多褐色陶。泥质陶以褐陶、灰陶为主，亦有少量黑皮陶。素面陶比例较大，尤以泥质陶为甚。夹砂陶以绳纹为主，多细绳纹，亦有方格、剔刺、堆纹、太阳和菱形印纹，有较浅的花边口装饰。泥质陶流行弦纹、波折纹、短线纹、网纹及云雷纹、圆圈纹等仿铜器纹饰。夹砂陶多手制、轮修口沿；泥质陶多轮制。流行平底、圈足、尖圜底器，少量的三足器。器类有釜、罐、缸、瓮、壶、盆、钵、豆、碗、杯、灯形器、鬶、尊、器盖、器座、尖底杯等，以釜、小平底罐、高领壶、高柄豆、灯形器、器盖为常见组合。西周时期，泥质陶比例增加，灰陶比例上升，轮制技术运用更普遍，按压花边口装饰更为突出和流行。器类上的变化是尖底器比例大大上升，高把豆亦更流行。夏、商、周时期石器有打制、磨制两种。磨制石器多为小型、规整、精心磨制的斧、凿、锛等。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了残铜渣、铜矿石等冶、铸铜遗迹，铜器有少量的钫、尊等容器，更多的是镞、钩、管等小型渔猎工具和小饰件。重庆地区早期巴文化渔猎经济仍占相当的比重，但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从目前的材料分析，重庆、鄂西地区早期巴文化与川西早期蜀文化，虽同属一个大的文化圈，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早期蜀文化陶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筒状高圈足豆、圈足盘为基本组合，晚期出现了尖底器[35]。

1993年以来，发掘的此期遗址近20处，比较重要的地点有：

万州糖房坪遗址，1998年发掘[36]。堆积以夏、商时期地层和灰坑为主，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铜器及装饰品。石器以打制为主，有刮削器、斧形器、网坠等。磨制石器多为磨制较精的小型斧、锛、凿，亦有仅磨一端的杵。铜器为镞、锥形器及铜渣残块。装饰器有石串珠、小铜圈。根据地层和陶器的排比可分两期。主要的器类为鼓肩罐、釜、器盖、盆、钵、瓮、缸等，亦有少量的尊、杯、豆。陶器流行平底、圜底，有少量的圈足和凹底，尖底器罕见。晚期始出现尖底杯、高柄豆。其早期年代相当于夏，晚期

年代在夏、商之际或商早期。

万州中坝子遗址1997年至1998年发掘[37]，发现了商周时期重要的遗迹现象，有耕作遗迹、灰坑、墓葬，墓葬反映了比较普遍的二次葬现象。以小平底罐、侈沿深腹罐、灯形器、尖底杯、豆、碗为主的陶器可以分出较清楚的发展序列。

奉节新铺遗址1994、1997年两次发掘[38]。新铺遗址下层陶器主要以夹砂罐类、高领壶、尖底杯、高柄豆以及盆、钵、器盖等为基本组合，多尖圜底器，不见三足器，年代在夏商时期。上层出土少量磨制石器，青铜镞、簋、铜块及陶器，陶器多见鬲（鼎）、折沿盆、细把豆等，含峡江地区楚文化因素，时代大约在两周时期。

哨棚嘴遗址[39]第二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夹砂陶有红、灰、橙黄色之分。泥质陶有红、灰、黑陶。纹饰有弦纹、堆纹、篦纹、绳纹、按压花边等。主要器类有小平底盆、豆、豆形器、罍、大口罐、器盖。时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至二里岗下层。第三期陶器泥质陶比例上升，但仍以夹砂为主。陶色主要有红、灰、褐、黑等类。纹饰有细绳纹、弦纹、方格纹等。主要器物有尖底杯、圜底罐、器盖、深腹钵、器座等。尖底杯数量占全部陶器80%以上。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

涪陵镇安遗址1983年发现，1992年、1994年试掘[40]。文化堆积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陶器组合为小平底钵、小平底罐、高领罐、豆形器、豆、圈足钵等；第二阶段器物组合有角状杯、小平底罐、豆形器、大口罐、高领罐等；第三阶段主要器物有角状杯、尖底钵、盆、大口罐等。三个阶段器物的演变规律较清楚，可建立一段商周文化序列。

巫山双堰塘遗址位于大宁河中游大昌盆地，发现于50年代，被称为“大昌坝遗址”、“大昌西坝遗址”[41]。过去曾有石磬、石范等重要文物发现，附近还出土过商代铜尊、战国铜甬钟等青铜重器。双堰塘遗址与大昌盆地及其周围遗址，构成一处规模较大的商周时期中心聚落遗址。1997年至1998年发掘[42]。发现柱洞、沟槽、砾石堆积、红烧土堆积等重要的遗迹现象。出土陶、铜、骨、石、玉五类遗物。其中夹砂陶容器的花边口沿、长珠形网坠、多形式纺轮流行。多圜底器，亦见平底、三足、带流器。泥质陶多见尖底、平底、圜足器，少量凹底器、带钮器，并出现较多的细泥磨光黑皮陶。铜器多小件，有镞、鱼钩、刻刀、戈形兵器、锥、针、珠形饰、鎏金铜饰等，亦有方口壶、铜渣、铜矿石等。石器有磨制的锛、斧、刀、珠形饰、镞、环、研磨器、打制石片、石坯等。另有骨锥、玉璜等出土。通过这次发掘的陶器特点分析，以花边口罐、盆、壶等和尖底杯、盏、罐为主的器物群，带有极浓的西周时期巴文化色彩，鼎、豆、鬲等引进器亦有较浓的巴文化色彩。

此外，70年代在海拔高达800米的垫江县高滩河流域东山林场亦发现过形体扁薄、磨制精美的石矛、穿孔石斧、穿孔石钺。1997年又发现了35颗穿孔绿松石珠[43]。由于

这两次发现皆为配合基建而进行的小范围清理，没能找到文化层或墓圹等遗迹。从石器形态观察，应属商至西周时期。这一发现，对于我们认识此期的山地类型遗址，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四 春秋战国时期

重庆地区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被习称为“巴蜀文化”或“巴文化”，亦即所谓“晚期巴文化”。90年代以前，主要是战国晚期墓葬方面的收获。90年代以后，发掘工作较多，除墓葬外，在聚落考古、制陶业等方面亦有一些较大的收获。有助于我们对重庆地区东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1954～1955年，巴南区冬笋坝发现战国晚期的巴人墓葬12座[44]。多为船棺葬，亦有以船为椁、内置木棺的情况。随葬铜器以兵器为主，柳叶剑、圆刃折腰钺、短骹弓耳矛为基本组合。陶器多为灰褐色粗陶，火候较低。流行绳纹釜、罐类圜底器以及矮把豆、盂等。据考证，冬笋坝一带即《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巴人立市的新市里[45]。

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70年代以来，共清理9座[46]。据1994年物探结果分析，尚有墓群分布[47]。墓葬为土坑竖穴墓，有髹漆的木棺椁痕迹，出土少量玉石类饰物、陶器及大量铜器。玉石类饰物有环、玉玦、璜、龙形饰、绿松石管、琉璃珠等。陶器一般为绳纹釜、圜底罐，亦有矮把豆。铜器包括生活类、生产工具类、兵器类、礼乐器类等。数量多，有精美的错金银装饰，出土编钟、錞于、“王”字钲等规格较高的礼乐器，显示了其特殊的地位。结合《华阳国志·巴志》“巴子虽都江州，……其先王陵墓皆在枳”的记载，小田溪墓群很可能即巴人王族墓地。其时代下限已经进入秦并巴蜀以后。

1994～1995年云阳李家坝Ⅱ区清理一批土坑墓，其中以罐、盂为基本组合的墓葬，时代在春秋至战国初期[48]。1997年又清理40余座战国中晚期墓葬，随葬陶器为罐、豆、壶、鼎、敦、甗等；铜器以兵器为主，基本组合为剑、矛、钺；一些大型墓中有殉人现象[49]。这批墓葬在巴文化的主体因素之外，亦见一定的楚文化影响。

1997年忠县中坝遗址发掘20余座春秋、战国小型土坑墓和瓮棺葬[50]。除少量墓随葬铜镞、磨光石斧或卜甲外，皆入葬陶器。陶器为绳纹圜底罐、尖底和圜底盏。瓦渣地遗址发现春秋巴文化墓葬一座，出土三角援戈、柳叶形剑[51]。忠县崖脚墓地发现典型的战国楚墓并被战国晚期巴族墓打破[52]。墓中随葬仿铜陶礼器、漆器、铜器。铜器有鼎、戈、矛、带格的中原式剑等。陶礼器有成对出土的附耳高足鼎、球形敦、细柄浅盘豆等。重庆地区楚墓不多，这也是本地区目前所知分布最西的楚墓。

属于聚落考古方面的收获主要是1997年发掘取得的。李家坝遗址Ⅰ区堆积深厚，包括商周至明清各个时期，其中又以东周、汉晋时期堆积为主。东周地层中发现房址、

灰坑、水沟、陶窑，为生产、生活居住区。Ⅱ区发现密集的墓群，为墓葬区。Ⅰ、Ⅱ两区构成一个较完整的聚落[53]。中坝遗址[54]北部地势高、相对平缓的片区发现数十座东周时期房址，门向基本一致，房址之间的露天地面亦作过处理。地势略低的东南片区发现了20余座小型土坑墓。中坝房址、墓群相对独立的情况，亦具有按聚落功能分区的特征。此外，在巫山跳石[55]、万州区麻柳沱遗址[56]亦有此期居住址的发现，在房屋结构、建造方法上，不同地区的发现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瓦渣地遗址是一个以尖底杯、圜底罐两类陶器为主，堆积厚达数米的罕见遗址，其成因从50年代发现以来一直处于研讨中。通过1997年发掘认为，这是一种与窑业有关的现象[57]。尽管目前尚未发现窑炉，但瓦渣地堆积本身就能反映出许多东周窑业的重要信息。

五　两汉六朝时期

西汉前期的墓葬材料，在冬笋坝[58]、南岸区马鞍山[59]、巴南区干溪沟[60]、涪陵点易大队[61]、奉节风箱峡[62]、巫山麦沱[63]皆有发现。除风箱峡为崖棺葬、干溪沟有瓮棺葬的发现外，余均为土坑墓。墓坑长宽比约为1.5：1，出土遗物中仍多战国晚期即流行的器物，但铁器更普遍。剑有中原式、巴蜀柳叶剑与中原剑结合等形式，平底陶器流行。

西汉中期到新莽时期的材料，在重庆—巫山长江两岸各个地区皆有一些发现。墓葬种类有崖棺葬、岩坑墓、土坑木椁墓三种。以后者为主，较重要的是临江支路西汉墓群[64]。

1982年，重庆渝中区临江支路清理竖穴土坑墓5座。M3为一带斜坡墓道和排水沟的大型墓，有椁无盖，形制较为特殊。出土器物100余件，另有大量五铢钱。按质地可分陶、铜、铁、漆、角器几大类。以铜器为主，其时代大致为西汉中期，推测属巴郡郡一级官吏的家族墓地。墓内遗物的巴文化遗痕已很微弱，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器物基本相同。通过对临江支路材料的分析，亦不难看出重庆地区为中原文化同化的进程。

西汉时期遗址发掘少，仅在1994年春，对云阳旧县坪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65]，发现房址、火塘、灰坑、沟、排水管道等遗迹。堆积时代大体包括汉初、新莽、东汉三个时期。旧县坪遗址相传为汉朐忍县治。朐忍，《汉书·地理志》有载，属巴郡。通过本次发掘和相关调查，佐以云阳李家坝出土“朐忍丞印”封泥，可以认定，旧县坪即朐忍故治，是重庆境内保存非常好的一个古县城遗址。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重庆地区的考古发现主要包括了城址和聚落址、窑址、墓葬几个方面。

城址的发掘，除了云阳旧县坪朐忍县址、1997年度亦对巫山古城作了大范围的勘探和小规模的城墙解剖[66]。证实了巫山古城始建于魏晋，与《水经注》记载“吴孙休分

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情况相合。在山区、丘陵地带筑城，因地势起伏而为，是区别于平原地区的颇具特色的手法。

李家坝遗址通过两次发掘[67]，有了较清楚的认识。除了前述早期堆积，I区还有较厚的汉晋文化层堆积，发现了大量的灰坑、火塘、窖穴、房屋。房屋分地面和半地穴式两种，有大型基址的存在。该地还采集过“半两”石范等重要文物，是一处汉晋时期较繁盛的聚居生活区。该遗址位当重要的水道澎溪河中游，地近汉朐忍县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与周围的石板梁、乌龟堡、寨子堡（Ⅳ区）以及隔河相望的走马岭汉晋墓群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聚落。

窑址调查发掘有三个地点：1997年忠县中坝遗址发现汉代平焰龙窑3座[68]，长约10米，与龙窑发达的浙江上虞帐子山龙窑的规模相当[69]。1998年5月，在江北区嘉陵江左岸小岩头汉墓群的抢救清理中，发现一座被东汉墓打破、保存相对完整的马蹄形半倒焰窑[70]。1987年，在合川市七间乡孙家坝调查发现可能自南北朝时期延至隋唐的青瓷窑址，采集有青瓷器、垫烧窑具等[71]。

此期墓葬的发现，在数量和分布地域上，皆超过了此期之前的所有时期。类型亦较复杂，有土坑墓、瓮棺葬、悬棺葬、石室墓、砖室墓、崖墓数种。土坑墓不晚于东汉早期，数量极少，应是西汉土坑墓的遗绪。瓮棺葬数量亦少，与婴幼儿葬和二次葬有关。悬棺葬延续时间较长，是与南方近水民族有关的一种葬俗。崖墓和砖室墓的数量占有非常高的比例，东汉以来最为流行。石室墓的数量亦少，有画像石墓与画像石棺墓两种。

江北区刘家台—石马河一带，汉晋墓葬广泛分布，历年多有发现。民国时期郭沫若、卫聚贤等人曾在此进行过调查和试掘，发现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铭文砖[72]。1954年，清理相国寺砖室墓[73]。1982年，聚贤岩发现一级文物“编将军印章”金印[74]。1991年，发掘渝州大学附中汉砖室墓[75]，M1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铜质长方形长钮“李□□”私印、麒麟饰、二龙衔胜镜、银质手镯、指环以及数量较多的琥珀、玛瑙、水晶、料器，有山形、琮形、人头形、鸟形、鸡形、鱼尾形、兔形等。1995年，清理渝州大学附中砖室墓[76]，发现了钤印的花边砖、熹平年刻款陶俑。1988年，清理石马河小岩头砖室墓[77]，出土文物100余件。

丰都汇南汉墓群，1992年调查发现，在长江南岸相互紧连的23座山梁上均有较密集的分布，主要是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小型凸字形、刀把形砖室墓。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一定规律，当为万民聚族而葬的“邦墓”。目前已经发表了1993年发掘的16座墓材料[78]。报告所分第二期为东汉早期至三国时期，第三期属西晋至南朝晚期。汇南汉墓出土的陶俑数量多、质量高，胡人吹箫俑、骑马俑、顶罐俑、哺乳俑、披衣俑等细腻传神，极具地方特色。

画像石室墓材料不多。1975年，在合川清理过一座东汉晚期券顶石室墓[59]，发现画像石14幅，包括伏羲女娲、仙人、青龙白虎等神怪传说，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历史典故，乐俑、水鸟、羊等生活题材。1998年丰都汇南新城建设中，清理一座六朝时期的画像石墓[60]，出阙、白虎、力士、鱼鹰、持便面人像等画像石。相对汉代画像石而言，六朝画像石规格更小，技法和构图亦趋简单。画像石棺、石室墓的材料以璧山比较集中[61]，80年代末发现画像石棺15具。棺体多头大尾小，略呈长方形。部分棺盖保存完好，皆有转角圆弧的坡脊。雕刻多见于棺体四面，与画像石室墓的雕刻相似，多用剔地平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技法，但画面更集中，雕工更细致。

1997年发掘巫山麦沱墓地西汉至东汉墓葬18座[62]，其中东汉时期墓葬有砖室、石室以及砖石混合垒砌的洞穴墓（崖墓），出土陶器演变序列清楚，可为渝东峡江地区东汉墓序列的建立提供年代标尺。该墓地曾数次出土青铜棺饰，上以阴线刻出西王母、四神等并鎏金，为十分珍贵的汉代文物。

重庆浅丘地貌为主的地区，沟谷坡崖发育，裸露和半裸露的基岩多为砂岩，易于开凿，崖墓极为盛行。崖墓的形制以单室带甬道、墓道的为主，亦有不见甬道、墓道的横长方形（似崖棺葬）、竖长方形（似岩坑墓）。墓室中常有凿于基岩上的葬具、壁龛、灶、案、台、池等。1987年文物普查中，在綦江、江津、江北区发现数十条有题记的材料。有年号者十余条[63]，内容涉及墓主、造墓人、工匠姓名、工价等。这些材料为崖墓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准确依据，亦曲折反映了一些社会情况，十分珍贵。1991年为配合成渝高等级公路建设，在永川大安、茶店清理汉晋小型崖墓60余座[64]。墓葬结构可分三型，墓室内发现了较复杂的地纹装饰，出土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六朝手制陶俑。出土遗物较丰富的有开县红华村崖墓[65]和忠县涂井蜀汉墓[66]。1981年涂井发掘崖墓15座。墓葬结构有单室、双室、多室三种，皆带甬道、墓道，有较粗大的排水沟。出土遗物3600余件。涂井崖墓可能为蜀汉时期涂井盐商的家族墓。大量出土的货币、明器等遗物，为蜀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六　隋唐以后

隋唐以后考古工作以调查为主。

1987年文物普查时，曾发现一些废弃的隋唐时期城址，如潼南崇龛县址、合川赤水县址、永川汉东城万寿县址、大足曲水铺昌州城址、荣昌昌州城址等[67]。合川钓鱼城、渝北多功城、万州天生城、云阳盘石城等南宋抗元遗址在文物普查中，亦作了更细的调查测绘和局部清理工作。1994年云阳明月坝的发掘，揭露了一些唐代的灰坑、房址等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和生产、生活用品，为重庆地区唐代小型市镇聚

落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难得的资料[88]。

窑址的考古工作，以南岸区涂山宋代瓷窑的发掘为主[89]。涂山窑发现了较多的窑炉及一些相关的遗迹，如作坊残址、淘洗池等。窑炉基本上为马蹄形半倒焰窑，多用砂岩石作炉栅，其窑炉结构十分合理[90]；窑具有垫烧器、装烧器及测温锥；装烧工艺有仰烧、覆烧、叠烧、套烧四种，主要流行仰烧和覆烧；烧造产品以实用器为主，多碗、盘、盏；釉色以黑釉、黑褐釉为主；主要的纹饰是兔毫纹、玳瑁纹、油滴、鹧鸪斑纹及富于变化的“窑变”纹，尚有少数印花、绘花纹。除涂山窑群外，重庆地区的黑釉窑系，在北碚、合川、巴南区姜家、清溪场等地有较多的发现[91]。巴南区姜家，发现了可能为一家一户作为家庭手工业而存在的窑址，是极好的宋代经济史研究资料[92]。

较为重要的窖藏发现了三处。1984 年荣昌县发现宋代瓷器窖藏[93]，包括宋代江西吉州窑、四川广元窑、福建水吉窑、浙江龙泉窑、河北定窑、陕西铜川窑产品。这批瓷器造型端庄，胎质细腻，花纹精美，釉面光润，为各名窑的上乘之作。1997 年，开县温家镇发现瓷器窖藏，出土一批精美的宋代龙泉窑瓷器，有凤耳瓶、印花童戏瓶等。1981 年，长寿县出土一批明代窖藏[94]，出土金箔、银锭、银板及鎏金银、铜器等，主要有鼎、杯、盘、碗等，形体甚小，工艺精美。据考证为崇祯年间官至兵部尚书的陈新甲家族避明末张献忠乱所藏。

1997 年云阳李家坝 1 区发掘中，清出中唐、宋、明、清水稻田遗迹[95]，1998 年万州龙宝麻柳沱遗址[96]、合川沙梁子遗址[97]发掘中，清理出明清旱作遗迹。这些发现，是本地区农业经济史方面的重要史料。

重庆境内少有唐墓发现，目前经发掘的只有 2 座。1978 年在万州发掘的初唐刺史冉仁才及夫人汉南王女的合葬墓[98]为带耳室的砖室券顶墓，早年被盗。墓内残存石灰抹平的壁顶绘星相及青龙、白虎，出土文物 100 余件。湖南湘阴窑出土器物以青瓷器为主，包括少量实用器及 80 余件俑类、灶、案、房屋、围棋盘等明器。1994 年云阳明月坝发掘唐代墓 1 座[99]。墓近圆形，以卵石和瓦块堆砌而成，直径约 0.5、深 0.15 米，无葬具、随葬品。从骨架放置情况看，为二次葬。

宋代墓葬以石室墓为主，多为并穴合葬墓，墓葬结构一般有前、后室及壁龛。墓内多有柱、梁、普柏枋、斗拱、驼峰、雀替、窗棂等仿木结构，部分内容取法《营造法式》，亦有一定的地方手法。流行武士、方位神、侍者、花卉等雕刻。重庆西北片区的荣昌、大足、永川、合川、江津等地发现的宋墓结构和雕刻尤为精美[100]。1958 年发掘的北碚井口宋墓[101]、1980 年发掘的荣昌沙坝子宋墓[102]可为其代表。从出土不多的遗物观察，宋墓中常简单地随葬一些实用粗瓷，以地方窑口和涂山窑系的产品居多。

元末红巾军起义领导人明玉珍墓的清理是本时段十分重要的工作。明玉珍，1363 年以重庆为都，建立“大夏”政权，统治重庆、四川十一年。《明史·明玉珍传》称其

"葬于江水之北"。1982年，发现于江北区上横街洗布塘[103]。墓为长方形竖穴石坑墓，长5.4、宽3.5米，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遗物简单，主要有三类：1. 太祖铭旗、彩绘幡画、黄绸棺帷；2. 褥被、衣物、缎料等丝织品；3. 金盏1件、银锭2枚。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一通详载明玉珍生平的"玄宫之碑"。碑文1004字，涉及明玉珍生平、大夏政体、职官及红巾军抗元等重要问题，可补史之阙。

铜梁明墓较为引人注目。1973年清理李三溪夫妇等墓[104]，墓前有一随葬坑，随葬墓志、仪仗俑、侍从俑及供桌、书桌、椅子、床、谷仓等石雕明器。1982年，铜梁又发现张文锦夫妇并穴合葬墓[105]，为双室券顶石室墓。出土成套的石质仪杖俑、侍从俑、明器家具、银器、铜器等随葬品和墓志2盒。墓内出土的两套数十件的仪仗俑，可能反映了明代四品、六品官的仪仗规格。1973年，铜梁还发现了张文锦之孙、张佳胤之子张叔佩夫妇合葬墓[106]。出土张叔佩生前收藏文物数件，有商代竖耳方鼎、战国扁球状附耳兽面蹄足鼎、唐海马葡萄镜、宋狻猊熏炉等。随葬墓志3477字，较详细地记录了本人生平及其父张佳胤（万历朝官至太子太保）告老还乡的生活。1997年，铜梁县施工中又发现数座明代合葬石室墓，出土一批雕刻精美的石俑[107]。铜梁明代石室墓的这些材料，涉及了明代葬制、民间风俗、官场仪礼、地方士家等多方面的情况，是一批不可多见的实物史料。

重庆地区的清代墓葬在1987年文物普查中作过一次全面的调查[108]。多为条石包砌封土的砖室或石室券顶、平顶墓。有单人葬、夫妻并穴合葬、夫妻妾多人合葬、家族合葬多种形式。较大型的清墓比较重视墓表建筑，多为石质牌坊式墓表，外接如意云纹、象鼻形等富于变化的八字挡墙。坊前设拜台、置香炉。亦有拜台外设"望柱"、"旗杆"等标志的墓。墓坊多刻姓氏、吉语或用卦向表示风水的匾。柱上刻楹联。封门石上的碑文内容简约。梁柱及八字墙上常有戏曲故事、人物、花草、八宝等精美复杂的雕刻。

七　水文与石窟寺考古

建国以来，重庆地区水文考古、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两个专题的工作开展较多。

由于大规模的治理长江和开发水力资源的需要，掌握长江水文规律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从50年代开始，重庆地区长江河段进行了大量水文石刻调查。60年代初，重庆市博物馆对白鹤梁进行全面勘测，捶拓、统计编号并汇编《四川涪陵石鱼铭刻图集》[109]。1968～1972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持进行了枯水调查[110]。1993年，为配合三峡水库建设，再次对海拔177米以下石刻进行了全面的复核，并提出了综合性的价值评估报告[111]。据报告提供，枯水石刻在唐代为定型时期，以白鹤梁枯水标记石鱼的出现为标志，其起止从东晋义熙三年（407年）下延至民国。枯水石刻有江津莲花石、巴县迎春

石、涪陵白鹤梁、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石等处计374段文字题刻，内容除大量的枯水题记外，尚有题名、诗文、格言、吉语、题榜、图象等。洪水题刻在三峡水库淹没线177米以下的有90段。忠县“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水此”为其最早者。随着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展开，1997年以来，文物部门对重庆长江河段的水文石刻保护加大了力度，尤其是枯水题刻，如白鹤梁、龙脊石等处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主持下已开展了利用现代科技而进行的水下考古调查，取得了一些最新的资料。随着工作的深入，必有许多新的发现来丰富历史记载以及川江水文资料。

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在我市有200余处，始见于隋，兴于唐，盛于宋，衰落于明清，至民国又复见全国最大的马龙山涅槃佛造像[⑩]。重庆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隋代造像位于潼南大佛寺，造像龛外阴线刻供养人及题名图反映了流行于南北朝的义邑的造像活动[⑪]。据1987年文物调查，唐代的造像14处，集中在重庆西部潼南、合川、铜梁、大足等地唐代州、县治附近，共有13处。东部三峡地区仅见忠县临江崖初唐造像1处[⑫]。大足以北山、宝顶为代表的唐、宋摩崖造像群是我国后期石窟寺艺术的代表。1987年文物普查中，新发现许多造像地点，尤其是初唐尖山子造像的发现[⑬]，将大足本区域内造像传统延伸了240年。民国时期杨家骆等人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的工作，为大足石刻的研究打下了基础[⑭]。1985年，《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出版，收列了大量已知的造像资料[⑮]。近十年来大足石刻在石窟寺考古调查方面又有不少新的报告问世[⑯]，可以说这也是大足石刻基础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有重要收获的十年。最近，围绕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关部门又作了大量的石刻保护工作。

（执笔：刘豫川、邹后曦）

注释

① 贾兰坡：《四川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四川文物》1984年4期。

② 黄万波、方其仁等：《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

③ 徐自强：《巫山龙骨坡遗址发掘研究综述》，《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15日。

④ 《三峡淹没区旧石器时代考古训练班结业、丰都桂花村遗址发掘获得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三峡考古队：《丰都高家镇遗址1997年发掘工作简报》（内部资料）。

⑤⑦⑰ 卫奇、林圣龙等：《三峡库区的旧石器遗存及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化石》，宜昌《三峡年鉴》出版社，1996年。

⑥ 林圣龙：《丰都烟墩堡旧石器遗址发掘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日。

⑧ 张兴永、孙智彬、陈祖军：《四川黔江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及打制石器》，《长江流域第四纪地质及流域综合开发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1986年。

⑨ 李宣民、张森水：《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4期；张森水等：《铜梁旧石器遗址自然环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2期。

⑩ 李宣民、张森水：《资阳人及地点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3期。

⑪ 李宣民：《桃花溪旧石器》，《人类学报》1992年2期。

⑫ 董其祥：《重庆地区的远古文化》，《重庆市博物馆历史考古文集》，重庆市博物馆内部资料。

⑬⑰ 袁钧：《三江流域的石器采集地点》，《三江考古调查纪要》（内部资料），重庆市文化局文物处、重庆市博物馆编，1987年。

⑮ 张森水：《四川省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研究》，《巴渝文化》第3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三峡旧石器考古队：《奉节鱼腹浦旧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抢救发掘工作简报》（内部资料）。

⑱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91961年11期。

⑲ 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4期。

⑳ 何介钧：《试论大溪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㉑ 吴耀利、丛德新：《论魏家梁子文化》，《考古》1996年8期。

㉒ 赵宾福、王鲁茂：《老关庙下层文化初论》，《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㉓㊶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㉔ 赵殿增：《四川原始文化类型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㉕㊴ 王鑫：《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分析——兼论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早期青铜文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㉖㊿㊾㊼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峡考古队一九九七年度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内部资料）。

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工作队：《四川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8期。

㉘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重庆巫山县锁龙遗址一九九七年发掘简报》（待刊）。

㉙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奉节老关庙遗址第三次发掘》，《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㉚ 奉节白帝城文管所清理，重庆市博物馆参加了最后一座墓的清理工作。

㉛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长江河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2年12期。

㉜ 冯庆豪、陈丽琼：《合川沙溪沙梁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三江考古调查纪要》（内部资料），重庆市文化局文物处、重庆市博物馆编，1987年。

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㉞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等：《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1期。

㉟ 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㊱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重庆万县市糖房坪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待刊）。

㊲ 西北大学考古队：《1997年度万县中坝子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报告》（内部资料）。

㊳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1997年重庆市奉节县新浦遗址发掘报告》（待刊）。

㊶ 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四川省涪陵市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1995年10月。

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97年度重庆巫山大昌双堰塘遗址第二阶段发掘工作简报》，1998年5月（内部资料）。

㊸ 垫江文管所东山林场出土文物档案资料。

㊹㊿ 前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和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1期。

㊺ 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㊻ 《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5期；《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1期；《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㊼ 钱复业等：《地面电探CT技术及其在三峡考古中的试用试验》，《考古》1997年3期。

㊽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4—1995年四川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发掘》，《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㊾53 58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7年云阳李家坝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报告》（内部资料）。

50 54 6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坝工作队：《97年度中坝遗址发掘工作报告》（内部资料）。

55 南京博物院三峡考古队：《巫山县跳石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内部资料）。

56 96 重庆市博物馆、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1997年度重庆市万县麻柳沱遗址发掘报告》（待刊）。

59 龚廷万、庄燕和：《重庆市南岸区的两座西汉土坑墓》，《文物》1982年7期。

60 重庆市博物馆、巴南区文管所：《1989年巴县干溪沟发掘简报》（待刊）。

6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4期。

62 李莉：《四川奉节县风峡崖棺葬》，《文物》1978年7期。

63 8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巫山县麦沱汉墓群考古勘探及发掘报告》（待刊）。

64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1986年3期。

65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四川省云阳县旧县坪遗址试掘简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97年度重庆巫山遗址勘探发掘》（工作简报，1998年5月）。

67 同㊽、㊾。

69 90 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70 重庆市博物馆发掘资料。

71 林必忠：《合川七间青瓷窑址的调查》，《三江考古调查纪要》（内部资料），重庆市文化局文物处、重庆市博物馆编，1987年。

72 郭沫若：《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说文月刊》1941年10月3卷4期。

73 沈仲常：《重庆江北相国寺的东汉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

74 王川平：《偏将军金印与偏将军小考》，《四川文物》1988年3期。

75 重庆市博物馆、江北区文管所：《重庆渝大附中汉墓清理报告》（待刊）。

76 重庆市博物馆1995年发掘资料。

77 重庆市博物馆1998年发掘资料。

7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县汇南两汉—六朝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研究论文

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

(79) 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县文管所：《合川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77年2期。

(80) 丰都县文管所1998年发掘资料。

(81)(83)(87)(91)(100)(108)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重庆文物总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84) 重庆市博物馆、永川市文管所：《成渝高等级公路永川段崖墓清理简报》（待刊）。

(8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县图书馆：《四川开县红华村崖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1期

(8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

(88)(90)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云阳县明月坝遗址试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89)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涂山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3期；《四川重庆涂山锯木湾宋代瓷窑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3期；《重庆涂山窑小湾瓷窑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92) 陈丽琼：《巴县姜家窑址》，《四川古陶瓷研究》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

(93)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荣昌县宋代窖藏瓷器》，《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94) 王豫：《重庆长寿县出土的明代窖藏金银器》，《东南文化》1994年5期。

(97) 重庆市1998年发掘资料。

(98)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4期。

(101) 重庆市博物馆历史组：《重庆井口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1年11期。

(102) 四川省博物馆、荣昌县博物馆：《四川荣昌县沙坝子宋墓》，《文物》1984年7期。

(103)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重庆明玉珍墓》，《考古》1986年9期。

(104)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铜梁县明代石椁墓》，《文物》1983年2期。

(105) 铜梁县文管所：《四川铜梁张文锦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9期。

(106) 叶作富：《四川铜梁明张叔佩夫妇墓》，《文物》1989年7期。

(107) 铜梁县文管所资料。

(109) 龚廷万：《四川涪陵"石鱼"题刻文字的调查》，《文物》1963年7期。

(110)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重庆市博物馆长江上游宜渝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一》，《文物》1974年8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从石刻题记看长江上游的历史洪水——水文考古专题之二》，《文物》1975年5期。

(111) 重庆市博物馆：《三峡库区川江水文石刻价值评估报告》（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课题）。

(112) 丁艾：《潼南马龙山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5年3期。

(113) 邹后曦：《重庆地区隋至宋佛教造像》，《巴渝文化》，重庆出版社，1991年。

(114) 方文华：《四川忠县临江崖发现唐代摩崖石刻》，《文物》1986年5期。

(115)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尖山子、圣水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1994年2期。

(116) 吴显齐：《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新中华》复刊3卷7期（罗斯福纪念号），1945年7月。

(117) 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85年。

(118)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尖山子、圣水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法身经目塔勘查报告》、《大足宝顶山小佛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文物》1994年2期。

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成立，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执着追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和极大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的道路。四川的考古工作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一部分，五十年来，四川考古取得不少重大发现，时代包括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在科研工作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　旧石器时代

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先后发现了“资阳人”①、富林文化②、铜梁旧石器时代遗存③、攀枝花回龙湾洞穴遗址④和巫山大庙龙骨坡“巫山人”⑤遗址，出土了许多石器和更新世早期与中晚期的动物群化石。其中以近年来“巫山人”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该遗址先后四次发掘，出土化石标本数千件。其中发现的巨猿动物群化石属早更新世，为我省首次发现，填补了四川早更新世动物群的空白，亦是我国6个巨猿产地地理位置最北的一个化石点。1986年10月，在该遗址发现2件人类化石，一为左侧的下颌骨（残），另一为上门齿，均出自早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又根据古地磁资料的测试，含人类化石的原层位距今为201～204万年⑥。正说明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之一，进一步证明四川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二　新石器时代

自50年代以来，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全省范围内，多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在成都地区、广汉、广元、绵阳、南充、阆中、巴中、雅安、天全、汉源、汶川、理县、西昌、丹巴、巫山、巫溪、忠县、万县、云阳、奉节等地，发现新石器遗址与遗迹300余处，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与较大规模的发掘。如先后三次对大

溪遗址与西昌礼州遗址等的发掘，揭露出崭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近年来，又在成都平原、川北、川南和川东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考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与收获。

广汉三星堆遗址是成都平原面积最大的、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之一，主要分布在广汉的南兴镇、三星村、真武村、回龙村以及三星乡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根据考古发掘而知，三星堆遗址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陶器主要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以泥质青灰陶与灰白陶最多；以手制为主，轮制仍占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主要器形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和敞口镂空圈足豆等；纹饰有细绳纹、篮纹、网格纹、齿纹等。石器器形小，以磨制的斧、锛、凿为主。房屋建筑采用地面挖沟槽，立木骨泥墙，墙两面抹泥并经火烧烤；房基中发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人牲[7]。这种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流行器物口沿唇饰纹与制成花边或波浪状风格口沿的文化遗存，不仅在成都平原有，而且川北、川南、川东均有发现，但亦有一定的差别。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邻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为确立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津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揭露面积435平方米，发现房址1座、灰坑32个、墓葬5座，并对宝墩古城城垣范围及走向基本确认。房址的平面可能为方形或长方形，东西宽410、南北暴露长232厘米。墙为木骨泥墙，即先挖基槽、立木骨后填土，墙上抹泥后经火烘烤。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长条形、不规则形等，其中以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居多，有的灰坑中发现制作陶器的陶土，有的坑内出大量陶片等。五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M4、M6、M7墓坑小，可能为小孩墓，M3、M8坑较大，为成人墓。城墙叠压在早期地层之上，筑墙时破坏了早期地层，其筑城年代不会早于早期，城址的废弃年代与遗址的废弃年代相一致。城墙采用“堆筑法”构筑，即边堆土，边拍打或夯打，每次堆筑一大层。拍打又分水平、斜面拍打两种。整个城垣略成长方形，方向45°，北墙、南墙各长约600米，东墙、西墙各长约1000米，城址面积达6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的范围尚待进一步勘查。宝墩遗址的陶器有夹砂与泥质两种，主要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以花边口绳纹平底罐、宽平沿平底尊形器、喇叭口平底高领罐、镂孔圈足豆等为典型器物，纹饰以绳纹为主。石器以磨制斧、锛、凿为主，另有少量的穿孔刀、铲、矛、镞等，器物小型化是其特点。宝墩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一期基本相同，年代相当，距今4500年左右。发掘者正式提出“宝墩文化”的命名[8]。

另外，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和崇州双河城[9]。其中在郫县古城发现的巨型建筑遗迹，长50、宽约11米，建筑遗迹内还有间距大致相等的五堆卵石面台基[10]。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上述城址的发现，对认定成都平原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发展演变过程，建立成都

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又进了一步。

在川北的广元、绵阳和川东及长江流域的巴中、通江、忠县、奉节、云阳等地，发掘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

广元中子铺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是一处细石器加工场。先后两次发掘，出土和采集了1万多件细石器标本。石料多黑色隧石，有少量石英石；多使用间接打制法；石核有锥形、漏斗形、柱形等，石片和石叶较多；器形有弧刃刮削器、条形尖刮器、直刃长刮削器、石核式刮削器和尖状器等。该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距今7000～6000年[11]。

绵阳边堆山遗址于1952年修宝成线时发现，1989年发掘。遗址在南山腰缓坡地带。陶器有泥质陶与夹砂陶，以灰陶为多，纹饰有绳纹、划纹、线纹、凹弦纹等；以平底器为主，几乎不见圜底器和三足器；口沿有的捏成波浪形，施绳纹或齿状花边装饰。打制石器有盘状器、砍砸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以及铲、刀、矛等，还发现少量细石器[12]。

通江擂鼓寨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多灰黑，次为橙黄、褐、红、黑色，灰色较少；纹饰有划纹、方格纹、绳纹、波浪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戳印纹、篦点纹和镂孔等；有的器口呈锯齿状或波浪状花边作风；以罐、尊形器、瓶、盆、钵、杯、碗、器盖为基本组合，平底器多，少见圈足器和圜底器，不见三足器和豆类；陶器制法多用手制加慢轮修整，多数陶器火候不高。陶器分为三段，连续发展，无明显缺环。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三类。打制石器较少，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有肩锄、有肩斧等；磨制石器较多，有斧、锛、凿、镞、矛、球、盘状器等；细石器仅4件，均为刮削器。年代据^{14}C测定为距今4480±12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4995±159年[13]。该遗址文化内涵更接近忠县中坝遗址一期及奉节老关庙下层文化。

巴中月亮岩遗址的陶器亦为夹砂和泥质两类，以夹砂陶居多。陶器火候较高，陶色有褐、黑、灰、红，以褐色和黑色为主。纹饰有篮纹、绳纹、网格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等。陶器多宽沿器，口沿、唇流行锯齿状纹和波状纹，呈花边状，多平底器[14]。

忠县中坝遗址于90年代初试掘。该遗址堆积一般厚8～9米，主要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褐陶为主，夹砂陶仍占一定比例。器形主要有喇叭形器、钵、小平底罐。纹饰有凸棱纹、戳印纹、波浪纹、方格纹等，也有少量绳纹。发现土坑墓葬2座，均为仰身曲肢葬，无随葬品。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15]。我们现在正在中坝做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哨棚嘴遗址位于忠县㽏井沟口右侧山坡上，面临长江，文化堆积5～6米，计13层，主要遗物有陶器和石器。该遗址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之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为辅，有少量的褐胎黑皮陶。以绳压菱

格纹、绳纹最普遍，盛行平底器，有少量圈足器，以折沿盆器为代表[6]。

奉节老关庙遗址分为上下两层。其中下层年代可能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最迟不晚于夏商时期。其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红褐色居多，灰褐或黑褐色较少；绳纹占98%；制法以手制为主，许多陶器口沿加厚，唇部压出花边、短线或凹槽；器形以直口或敞口为主，侈口较少，多平底器或尖底器，圈足器较少，主要有粗砂罐、细砂罐和尖底缸，其次为壶、盆、钵、碗、豆和器盖。另外，发现墓葬1座（编号95M1），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式为仰身屈肢一次葬，头南足北。随葬石铲1件，置于头骨西侧；陶豆1件，置于足部。该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川东瞿塘峡以西地段这一时期土坑竖穴墓研究的空白[7]。

绵阳边堆山、广元张家坡、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忠县哨棚嘴以及奉节老关庙遗址，主要发现于川北和川东的山地和丘陵地区，海拔相差无几，一般分布于河流附近的小山或山坡上；地势不算开阔，但较平坦、向阳、背风；遗址面积不大，未形成成都平原那样大的聚落遗址（可能为地理环境制约所致）。

在川西大渡河流域、雅砻江流域和岷江流域都有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的遗址延续到商周时期，较重要的有丹巴罕格依遗址、汉源狮子山、理县建山寨等。

1989年10月～1990年12月，对丹巴罕格依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文化堆积厚达8米，发现房屋、灰坑和墓葬等遗迹。遗址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据^{14}C测定在距今5000～4500年之间，陶器以饰细绳纹的夹砂红褐陶居多，纹饰还有附加堆纹、戳印纹、刻划纹、刷划纹，抹平绳纹的作法别具特色，且陶器火候较高、胎质较厚并含大量云母片，均手制。器形以罐、瓶居多且形态较大，钵较少，均平底器，带耳器较少。第二、三期陶器增加了双大耳罐、壶、杯、单耳罐、纺轮等，瓶减少，仍以平底器为主。第一、二期石器较少，第三期石器数量和种类均大有增加。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类，打制石器有细石器，石料多为水晶或石英，有石核、石片、石叶、尖状器、雕刻器和各种刮削器。骨器较多，制作精美，且从第一期到第三期呈递增趋势。以骨锥、骨针居多，另有少量的刀、管、梳、矛及装饰器。无论陶器、石器还是骨器，都广泛运用了钻孔技术。该遗址出土的一块彩陶片，红陶红衣，单线黑彩，其风格与马家窑文化的相似。该遗址三期文化遗存既有着先后承继的关系又存在着发展和变化，初步展示了大渡河上游地区距今5000年～2000年间的古代文化面貌。该遗址出土的遗物特别是陶器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周边地区同时期古代文化遗址的崭新的文化面貌，对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将有助于建立川西高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18]。

在川西高原岷江上游的理县试掘了建山寨遗址，获文化遗物409件。其中石器有斧、锛、凿和环。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火候较高，器形有碗、杯、盆、瓶、罐等。同时还发现有彩陶片[19]。

在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县，90年代对狮子山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321平方米，发现灰坑16个，房屋基址9座。石器除发现磨制的斧、锛、凿、穿孔刀及两端刃器外，还发现几百件细石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红陶与灰陶次之；纹饰有绳纹、划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器形有高领罐、大口花边罐、盆、钵、碗、甑等。另外还发现10多片红底黑彩的彩陶片，纹样为平行或交错条纹⑱。狮子山遗址的文化特征明显，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对研究四川及其周围原始文化的面貌和相互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 商周时期

四川商周时期考古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如新繁水观音、竹瓦街铜器窖藏、羊子山土台遗址。80年代以来有重大的突破，如三星堆2～4期文化遗存、十二桥遗址、抚琴小区遗址、雅安沙溪遗址、新都桂林遗址等。

三星堆2～4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先后发现房屋居址、“祭祀坑”、灰坑、墓葬、城垣、濠沟等遗迹，出土陶、铜、玉石、金器等文化遗物数万件。第二期陶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圈足盘、鸟头柄勺为典型器物，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次之，纹饰以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为主；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第三期陶器除第二期常见器形外，新出现了尊形器、觚形器、尖底器和器座，素面陶增多；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二期至殷墟早期。第四期遗存泥质陶比例大增，器形基本沿用第三期的，但有所变化，以素面陶为主，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最多；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⑳。房屋建筑有地面式的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多为木骨泥墙。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座“祭祀坑”，出土上千件铜、玉石、金、骨器及象牙，器形有大型青铜立人像、人面具、兽面具、人头像、眼形器和太阳形器、神树、蛇、鸟、尊、罍；金杖、面具；玉璋、瑗、璧、戈等。这对研究此期文化的社会性质、意识形态及“祭祀坑”的性质作用，都有很重要的价值㉑。近来对一号坑作了^{14}C年代测定，为距今3450±90年。

根据发掘资料，三星堆古城始建于第二期一直延用至第四期。古城东、西、南三面有夯筑的城垣遗迹，墙外有20～30米宽的濠沟环绕，城之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古城东西长1600～2000、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3.6平方公里。如此宏大的城址，结合出土众多的神器、礼器、权杖等遗物，足以说明三星堆古城是当时的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是早期蜀国的都城，已步入中国文明三部曲的方国阶段㉒。

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出土玉瑗、玉凿、石璧和铜牌饰等数十件遗物。铜牌饰3件，近似长方形，一端略宽，一端稍窄，转圆角，平面微拱如瓦状，有的还嵌有绿松

石，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基本相同。这又为研究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㉔。

最近，我们又在三星堆城址外的仁胜村发现墓地一处，墓地距三星堆城址东城墙约600米。清理的22座墓葬，墓向一致，均土坑竖穴墓。墓中随葬品不丰，主要为玉石器，有玉锥形器、玉矛、玉“璇玑”形器及猫眼石球和象牙等，还出土几件陶器。墓内人骨架多朽腐，能辨认清楚的有仰身直肢葬；有的墓坑内侧埋有动物遗骸。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墓的壁及底经反复夯打或拍打，内埋藏的人骨和动物遗骸亦似经夯打或拍打，底有黑色腐质层等等。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件玉锥形器，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惊人的相似，反映出三星堆文化的先民与良渚文化的先民在文化方面存在着某种联系与交往。墓地的年代初步推定距今4000年㉕。

另外，对三星堆遗址周边的调查，发现广汉金鱼乡石佛寺、兴隆乡烟堆子和毗卢寺遗址；在什邡市人民乡、新安乡以及彭县境内，都发现相当于三星堆2～4期遗存的文化内涵相同的古遗址。广汉兴隆乡毗卢寺遗址采集的陶器、石器和铜器，其中有铜戈4件、铜矛2件、铜钺2件，其形制较彭县竹瓦街窖藏原始，与新繁水观音墓葬和汉源富林镇出土的相类，均为实用器㉖。在新都桂林亦发掘了相当于商代的遗址，面积达75000平方米以上。从该遗址出土的陶、石器分析，其整个下文化层的时代相当于三星堆二、三期之间，文化内涵与三星堆2～4期相同，属同一文化系统㉗。

在成都市区，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周围有新一村、方池街、抚琴小区、君平街、指挥街等时代与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形成6～7平方公里的遗址群。十二桥为商周时期木结构建筑遗址，发现有成片的“干栏式”建筑和大型宫殿类建筑的基础；文化遗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小平底罐、高领罐、高柄豆、盉、小圈足杯、鸟头柄勺、鸡冠钮盖、尖底罐、尖底杯、尖底盏等典型器物。十二桥遗址商周时期的文化可分为三期：早期相当于商代早期，^{14}C年代测定距今3680±80年，树轮校正4010±100年；中期相当于商代中期；晚期相当于商末周初之际㉘。结合50年代在成都羊子山发现大型祭祀土台㉙，与十二桥遗址一南一北，祭祀场所与宫殿遗迹相对应，进一步说明成都在商代时期已形成一个都邑，亦进入了方国阶段。

在青衣江流域的雅安沙溪遗址，其早期的文化内涵及时代，大致与十二桥商代时期文化遗存相当，^{14}C测定年代在距今3100±70年㉚。发现房址、灶、沟槽、灰坑等遗迹及陶器、石器等遗物。其陶器群有敛口尖底盏、尖底杯、器座、器盖、高杯豆和小平底罐等，不见鸟头柄勺，尖底杯多敛口且个体较大。这里出土的双肩斧、锄等石器，在青衣江流域有较多的发现，成都地区同时期遗址中则不见，应是地方性文化因素㉛。

在川东地区，也发现以小平底器、尖底器等陶器为代表的遗存，如忠县哨棚嘴第二期遗存和第三期遗存就是以小平底器和尖底杯陶器群为代表，与四川盆地许多遗址和鄂

西地区一些遗址有着相同的文化因素，文化内涵极其相似。哨棚嘴第二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至二里岗下层之间，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32]。

以三星堆2～4期文化为代表的同一系统的古遗址，其分布范围广阔，东出三峡直至鄂西地区，西达汉源，北抵汉中地区。这些同一系统的文化遗存又存在着一些差异，可能反映出同一文化中存在着几个不同的文化类型。另外，三星堆2～4期文化遗存，其上接三星堆一期文化和“宝墩文化”，上下两千年左右，是研究与建立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序列的重要环节，并对研究成都平原古文化、古城、古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春秋战国至秦汉

30年代提出的巴蜀文化，是四川地区最早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以柳叶形剑、短骹式矛、烟荷包式钺、三角援戈等典型巴蜀铜器为代表的地方性考古学文化，反映的是这一地区青铜文化晚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并约定俗成，沿用至今。此时期的考古发现除少数遗址外，主要以墓葬为主。过去的重要发现有：50年代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发现的数十座土坑竖穴墓，其中以船棺（有的为独木棺）为葬具的墓葬，名之为“船棺葬”，是春秋战国时期四川地区主要的墓葬形式之一，后编辑出版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33]；其后在成都、什邡、彭县、广汉、蒲江、大邑、峨嵋、犍为、荥经、芦山等地又发现大量船棺葬。木椁墓与土坑墓有羊子山172号墓[34]、新都马家蜀王墓[35]、青川郝家坪木椁墓群（出土了先秦“为田律”木牍）[36]、荥经曾家沟墓群[37]及70年代发现的涪陵小田溪“巴王墓”[38]等等，这些发现促进了巴蜀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近年来，在什邡市城头[39]、涪陵小田溪[40]、广元昭化宝轮院[41]、荥经同心村[42]又发掘一批巴蜀文化的墓葬。

什邡市城头墓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我们配合基建清理了其中64座墓，其中船棺墓36座、土坑墓24座、木椁墓4座。墓葬出土陶器354件、铜器276件、铁器12件以及一批玛瑙料器和漆木器等[43]。这批墓葬均属于中、小型墓葬，延续时间较长，自战国早期至西汉中期偏晚；墓葬形制复杂，随葬品丰富；文化因素多样，整体上属巴蜀文化系统，但又有楚文化、秦文化及滇文化的因素，反映出这里自战国至西汉中晚期一直存在几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是一批研究巴蜀文化难得的资料。

涪陵小田溪93FXM9是一长方形土坑墓，与70、80年代出土的墓葬在同一墓地。该墓出土器物52件，以铜器为主，计46件，多具典型的巴蜀式特征。墓主仰身直肢葬，葬具用一朱漆棺。青铜兵器置于头部及胸部，铜、陶质生活用具置于脚部，玉器等装饰品置于腰部[44]。根据出土器物、墓葬规模以及器物上铸的“王”，推定墓主是巴族

内部一个部落的“王”，也进一步印证了巴人先王陵在枳（今涪陵），涪陵为巴人较早的政治中心之一。

1995年配合宝成复线工程，在昭化火车站南清理船棺墓8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座。9座墓距1954年发掘的墓葬约3～5米，属同一墓地。墓葬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无打破叠压关系。出土陶器137件，以圜底罐、釜、豆、平底罐、钵为基本组合；铜器48件，其中兵器以柳叶形剑、戈、矛、钺等组合，生活用器以釜、鍪常见；另有铁器以及漆器等。据调查，该墓地东西长约300、南北宽约150米，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该墓地可能为“苴人”的墓地[45]。

近年在荥经同心村又发掘巴蜀墓葬26座[46]。其中有土坑墓、船棺墓和木椁墓，以船棺墓为主。出土文物丰富，计730件，有陶、铜、铁、玉石器及漆器等类。有一些新的发现，如在M1内出土的铜矛上阴刻“成都”二铭文，为研究成都得名以及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M21－A和M21－B两墓的两棺整齐重叠，还有部分墓葬在近墓口处随葬陶瓮和其他陶器，这些资料丰富了我们对此期巴蜀墓葬葬制的认识。这一墓地可能是秦举巴蜀后，戍守边徼重镇的部队的一处公共墓地[47]。

上述近年发掘的巴蜀文化的墓葬，出土遗物多陶、铜、玉石器，陶器以圜底罐、釜、豆等为基本组合；兵器以巴蜀柳叶剑、矛、戈、钺等为组合，许多兵器上铸有“巴蜀符号”；铜容器以釜、鍪、甑等为基本组合，并出土巴蜀图语印章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批墓葬以船棺葬为主，内容远远超过了50年代船棺葬的发现。其中还包括木椁墓和土坑墓。墓葬形制复杂，随葬品丰富，文化因素多样，时间跨度长，这对于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内涵及其发展、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巴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十分重要。这批墓出土的巴蜀符号类型多样，有些为过去未见的符号和纹饰，这对于巴蜀符号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秦汉时期“船棺葬”几乎不再出现，盛行木椁墓和土坑墓，到了东汉，主要盛行砖室墓和崖墓。

绵阳永兴双包山一[48]、二号木椁墓，以二号墓最重要。双包山二号墓早年被盗，墓圹残长24.2、宽6.56－11.2、深2.7～4.4米，分前后两室，形成“前堂后寝”的结构，前室长11、宽9.72、深1.72米，可分中厢和东、西各二厢，有门相通。墓内出土器物1000余件，以漆器为主，还有陶、铜、铁、玉、银器。漆器中有100余匹栩栩如生的高头大马，身长、身高均70厘米左右，厚木胎，圆雕，通体髹黑漆，五官涂朱。经脉漆雕木人是这次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该木人像残高28.1厘米，光头男性裸体，直立，通体髹黑漆，体表朱绘经脉正面8条、背面5条，头部纵线5条、横线1条，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有关经脉学的人体模型，它为经脉学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直观的实物资料[49]。

广汉罗家包汉墓群于 1996 年 11 月开始发掘，清理砖室墓葬 7 座，均呈东西向排列。墓葬平面以“凸”字形为主，余为“中”字形和长方形，葬具有砖棺和陶棺两种。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铜器较少。重要收获是 M3 墓壁发现 50 余块画像砖和数层画像花边砖，画像内容丰富新颖，主要有辎车、轺车、沽酒、市集、收租、乐舞、渔塘、渔猎、骑吏、六博、仙人追鹿等。M1 和 M2 则发现近千块“永元八年”（96 年）纪年砖，边上还有鹳鹰图和几何形图案等等。同时首次发现长 73、宽 28、厚 10 厘米的巨型墓砖[53]。

另外，在广汉二龙岗[54]，辜家包[55]，南充东客站[56]，成都 611 所[57]，以及丰都三峡淹没区汇南乡[58]、龙花乡[59]、镇江乡[60]等清理发掘一批东汉时期的墓葬。在德阳黄许清理了汉代窑址等[58]。

在有“西南夷”之称的民族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石棺葬、石板墓和大石墓，历经秦汉仍沿袭使用，直至东汉时期。

石棺葬分布范围较广，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与岷江流域都有发现。主要发掘地点有茂汶城关[59]、撮箕山[60]、营盘山[61]，理县佳山寨[62]，雅江县呷拉[63]，甘孜县吉里龙[64]，炉霍县卡莎湖[65]，宝兴陇东[66]，汉源县大瑶，盐边县温门等等。典型器物有陶大双耳罐、单耳罐、圜底罐和三岔形或“山”字形铜剑及铜柄铁剑。1992 年 3 月，茂汶县牟托发现的一座战国时期的石棺葬（M1）和 3 个埋藏坑，是近期最重要的发现。墓中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在岷江上游石棺葬中尚属首次。M1 内长 2.74 米，头宽足窄，有三层头箱，出土 170 余件随葬品，有陶、铜、铜铁合制、玉石、琉璃、漆器、竹器及玛瑙、绿松石、丝毛织物等。陶器大多置于头箱内，石器大多在棺室北，青铜礼乐器置于棺室北部左右侧，兵器置于棺室北中部左右侧，丝、毛、麻织物与玛瑙珠、绿松石串缀的“珠襦”置于棺中木板上。陶器 48 件皆黑衣磨光泥质灰陶，火候较高，有簋、乳头罐、双面牛头纽盖漆绘罐、杯、器座等。铜器 69 件，有鼎、罍、敦、甬钟、纽钟和戈、矛、剑、戟、盾等，还有一些装饰品。一号和二号埋藏坑各出土器物 33 件，三号埋藏坑因被毁，仅征集遗物 6 件。坑内主要为铜器，有敦、甬钟、纽钟、钲、戈、剑、戟、矛；次为玉石器，有斧、锛、凿。M1 与三个埋藏坑的年代属同一时期，当在战国中晚期之际。据出土器物分析，除石棺葬本身的地方性文化因素外，青铜器和玉石器又与川西平原蜀文化遗址同类器物相似；一批铜礼乐器则具有中原文化的风格，如“与子鼎”及其铭文等；另外一些铜牌饰、铜铃等又具滇文化因素。这些无疑为研究岷江上游石棺葬与川西平原的蜀文化、中原青铜文化和滇西的青铜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提供了资料[67]。

另外，在马尔康孔龙村发现石棺葬墓十余座，方向一致，顺山势分三层排列分布于脚木河东岸二级台地上。墓葬结构简单，仅用四块石板镶成，随葬品仅有陶器，有双耳

罐、单耳罐、平底罐、长颈瓶。年代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68]。

五　魏晋南北朝至明

此段的考古工作近几年的考古发现相对较少。蜀汉时期的墓葬原来混同于东汉时期的古墓中很难明确的区别开来。自发掘了忠县涂井崖墓群后，对蜀汉时期的墓葬和文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90年代前后在大邑县董家场乡[69]和巴县白市驿[70]发掘了这一时期的砖室墓。

大邑董家场乡发现的一座砖室墓，坐南朝北，方向200°，由墓门、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凸”字形。墓壁错缝平砌，底铺两层地砖。墓砖略较东汉砖薄小，砖边花纹亦简单，墓室结构与崇庆五道渠蜀汉墓[71]相同。该墓被盗，但出土五铢钱币10枚，均系三国时期的魏五铢。出土的28块画像砖是此墓的重要发现。画像砖内容有“神荼郁垒”、“六博舞乐”、“西王母”、“建木”、“轺车出行”、“天仓”、“天阙”、“方相氏”等，画像砖的浅浮雕图案与东汉时期的比较，线条变细变浅[72]。

巴县白市驿蜀汉墓全长420、宽245、墓室高208厘米，亦呈“凸”字形。墓内出土陶俑、鸡、猪、镇墓俑，铜釜、洗和“直百五铢”、大小两种“定平百钱”[73]。

两晋南朝时期的墓葬，1993年发现丰都汇南墓群并清理了一批墓葬[74]。两晋墓均为单室砖室墓，平面呈刀型。南朝时期的墓不仅有单室墓，还出现双室墓；单室墓平面呈刀型，双室墓呈不规则“十”字型；有的墓还有斜坡墓道。出土有青瓷四系罐、碗、盘口壶、鸡首壶、深腹饼足碗、莲瓣纹深腹碗、瓶、四系罐、六系盘口壶及铜鐎斗等[75]。另外，在绵阳北郊龟山亦发现六朝墓[76]。西昌市西郊乡发现2座成汉墓[77]，东西向排列，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墓门外有一条排水沟，残长2.35米，其上部用长约39厘米的细绳纹筒瓦扣连覆盖。墓内出土陶武士俑、陶猪、陶罐、陶钵等随葬品，武士俑与成都发现的成汉墓内所出的完全相同。东晋时期，賨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304～347年），墓中出土遗物是賨人民族文化的典型器物，对研究这一历史短暂的地方政权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隋唐时期墓葬，四川发现不多，较重要的发现有万县唐冉仁才墓。该墓系拱形券顶砖室墓，室内残存彩绘星像图及造型生动、神态逼真的陶俑和青瓷器，艺术价值较高[78]。1993年在松潘县松林坡一工地，抢救性发掘了3座唐代时期的墓葬。其中2座为垒石墓，1座为土坑墓，三墓并列成排，头向南。所谓垒石墓，即挖一土坑，四壁垒石为室，底铺石块或石板，置尸与随葬品于内，然后填土，上用石块堆积成坟丘。出土遗物有绳纹双耳罐、绳纹小口罐、小碟、细颈盘口壶、四系盘口壶、细颈壶等陶器，还出土铁钗、铁带扣、铜扣饰、铜边饰、玛瑙珠与“开元通宝”钱币等。松潘地处岷江上

游，此批墓葬以垒石墓为主，似承袭了当地早期盛行的石棺葬遗风，随葬品中明显反映出土著民族的文化因素，可以说这些土著民族与石棺葬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墓中出土的釉陶罐、盘口壶和“开元通宝”钱币，又反映出土著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并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垒石为坟丘又与吐蕃墓特别是早期的石丘墓比较接近。总之，这批土著民族的墓葬文化因素多样[79]。

四川宋墓在各地均有发现，多为砖室墓和石室墓。有的大型宋墓内还发现有雕刻、壁画和仿木建筑石雕。1995年发掘的华蓥安丙家族墓[80]是此期最重要的发现。

安丙（1148～1221年），字子文，曾任四川宣抚使和制置使。此次发掘安丙及家族墓共5座，皆券顶石室墓，坐东向西，由北至南依次编号为M1～M5。M1为安丙夫人福国夫人李氏墓，M2为安丙墓。安丙夫妇墓前有祭台、碑座、水沟、柱础等遗迹和8个石翁仲等。M3和M4大致并列，M5早年被盗，三座墓前亦有石构建筑遗迹。安丙墓后龛正中有安丙及夫人像，两侧有浮雕持笏吏及武士和训兽图案。5座墓均有斗拱、屋面及飞檐等仿木结构；室内还雕刻有许多精美的图案，内容有：力士、侍女、青龙、白虎、乐伎、花卉、童子、双狮戏球及各种人物、动物图案；还有彩绘壁画，惜残蚀过甚，内容不详。出土遗物也很丰富，计有三彩青龙、白虎、朱雀和神态各异的文俑、武俑数十尊，及陶、瓷、铜、银器等；另有“天下太平”、“宝庆元宝”金币及银币和“嘉定元宝”、“折十”钱等铜币；还发现有玉围棋子和饰件等。M4腰坑中发现以金、银、铜等钱币分别组成震、离、兑、坎和巽、坤、乾、艮八卦。另外还发现陵园建筑遗存。安丙墓及其相关遗迹的发现，特别是其精湛高超的雕刻技法和精美绝伦的浮雕图案以及规模宏大的陵园建筑遗存，无不显示其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并为研究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90年代初在成都市外南人民路135号发现城门遗址，编号为1号门址和2号门址。均单门道，木质门扉。1号门址门扉宽6.2、厚0.12～0.14、残高0.16～0.67米；2号门址门道宽6.7～6.9、进深残长8.1～9米。还发现有门框石、门砧石、门柱石等遗迹。城墙门址用土夯筑，外表用砖包砌。2号门址上部为过梁式建筑。1号门址建于唐代晚期，沿用至北宋初期，因被火焚废弃。2号门建于北宋初年，其下限可能到南宋或更晚。该城门遗址可能为晚唐成都罗城笮桥门。它的发现为成都城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81]。

魏晋以来，四川地区制陶业逐渐发展起来，青瓷生产较为普遍。成都青羊宫，邛崃什邡堂和固驿，江油青莲，灌县金马、金堂、金销桥，新津白云寺、玉皇观等，都是以烧造青瓷为主；广元瓷窑铺、重庆涂山窑、巴县姜家窑和达川等地，则主烧黑釉瓷；唐宋时期还出现了专烧白瓷的彭县磁峰窑等窑址。

1984年以来，我们对邛窑进行了多次发掘，计发掘龙窑6座，马蹄形窑3座，出

上遗物2万多件。同时发现2组唐代房屋建筑基址，是唐代民居建筑的重要遗存[42]。1988年9～11月，又对邛崃固驿窑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清理龙窑1座，解剖窑包2个，采集瓷器、窑具等标本2000余件。该龙窑由火膛、火厢、窑床、烟道等部分组成，长46.2、宽2～2.1、残高0.20～0.85米。窑炉前低后高，高差14.65米，顺坡而上，形似长龙。固驿窑生产的瓷器多为生活用器，瓷土欠佳，胎体厚重，器形简朴，实用性强。器形主要有碗、豆、盘、杯、盏、钵、罐、壶、砚等。根据出土器物分析，固驿窑创始于南北朝时期，产量不大，器形单调；兴盛于隋朝，规模扩大，产品种类增多，产量上升；至隋末唐初，固驿窑走向衰败，质量不佳，器类单一，规模缩小，大致到了唐代早、中期便废弃了。固驿窑对什邡堂邛窑的产品、工艺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成都青羊宫窑、灌县金马窑、江油青莲窑等与固驿窑在造型、胎质、釉色、装饰、装烧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互有影响，关系密切。而固驿窑出现的釉下彩，表明固驿窑生产釉下彩器早于长沙窑，它的发现丰富了四川陶瓷研究的内容[43]。

另外，四川地区宋代窖藏较多发现，如江油[44]、绵阳[45]、三台[46]、岳池[47]、石棉[48]、彭山[49]、遂宁[50]等地发现宋代铜器、瓷器、银器窖藏。如彭山县的一瓷器窖藏，出土99件瓷器，多为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的产品，同时还有浙江龙泉窑、四川彭县磁峰窑和广元窑的产品[51]。绵阳黄家巷发现的银器窖藏，有银器35件和"崇宁通宝"22.5千克，银器有茶托、盘、碗、盏、瓶、壶、盆、盒、耳杯、盒盖和鼎等。这批银器采用模制成形，有的还采用焊接和钣接等工艺。修饰主要用线刻、刀錾、浅凸几种方法，有的碗内团花还鎏金，有团花、莲瓣纹、蟠虺纹、三角云雷纹、草叶卷云纹、菊瓣纹、缠枝花卉纹等。银瓶底錾刻"□□十八日记"和碗底刀刻"楫甫"铭文，可能为银号押记或收藏者押记[52]。

近年发现的明代墓葬数量虽不多，但有较重大的发现。如在龙泉驿区洪河乡百鹤村的明蜀昭王陵。其墓为砖室结构，由前庭、中庭和后殿三部分组成，后殿又分为东西室和东西厅几部分。男女墓主人分别置于东西厅，东西室及中庭设有祭案，前庭置仪仗俑、彩俑、仆侍俑及各种瓷器。四进殿门为朱漆双扇石门，并有抵门榫，墓门雕梁画栋，雕刻以龙凤纹为主，极显皇族气派。从发现的两块墓志来看，墓主人为蜀昭王朱宾瀚及其妃刘氏。另从墓门外面的阶梯式和斜坡式主侧两墓道分析，男女墓主人是先后两次入葬的。墓门前有大面积红砂石板铺成的地面，当为建筑设施的遗迹[53]。

（执笔：张肖马、李昭和）

注 释

① 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②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卷1期，1977年；杨玲：《四川汉源县富林镇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3卷4期，1961年。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53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④ 晏德忠：《攀枝花市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四川文物》1988年1期。

⑤⑥ 黄万波、方其仁等：《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

⑦㉑㉓㉕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待刊。

⑧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1期。

⑨ 《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

⑩ 《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成果》，《成都晚报》1998年2月5日；《郫县古城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18日。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存》，《考古》1991年4期。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绵阳市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⑬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江县文物管理所：《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⑭ 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1年6期。

⑮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期晚期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272页，文物出版社。

⑯㉜ 王鑫：《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分析》，《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⑰ 吉林大学考古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奉节县老关庙遗址第三次发掘》，《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⑱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⑲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12期。

⑳ 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270～271页，文物出版社。

㉒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市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简报》，《文物》1989年5期。

㉔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四川广汉市文管所、什邡县文管科：《四川广汉、什邡商周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第5辑。

㉗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县桂林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3期。

㉘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㉙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

㉚㉛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雅安地区文物管理所：《雅安沙溪遗址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90年第1辑。

㉝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㉞ 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4期。

㉟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6期。

㊱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1期。

㊲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陈显双：《四川荥经曾家沟出土一批战国时期重要文物》，《四川文物》1984年1期；荥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荥经水井坎沟崖墓》，《文物》1985年5期。

㊳ 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5期。

㊴㊸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㊵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地区博物馆、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㊶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广元昭化宝轮院船棺葬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㊷㊻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㊽ 绵阳博物馆、绵阳市文化局：《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一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0期。

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0期。

㊿(51)(52) 资料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文管所。

(53) 资料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南充文管科。

(54) 资料存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55)(56)(5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三峡工程淹没区调查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58) 资料尚未公布。

(59) 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

(60) 该墓地资料尚未发表。

(61) 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石棺葬》，《考古》1981年5期。

(62) 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四川理县佳山寨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1辑。

(63)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等：《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

(6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1期。

(6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葬》，《考古学报》1991年2期。

(6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文物》1987年10期。

(67) 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葬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3期。

(68) 陈志学：《马尔康孔龙村发现石棺葬墓群》，《四川文物》1994年1期。

(69)(72) 大邑县文化局：《大邑县董家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71)(73) 李国良：《巴县白市驿发现蜀汉砖室墓》，《四川文物》1994年5期。

(70) 陈显双：《四川省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年8期。

(74)(7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县汇南两汉～六朝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

(76) 邓世红：《绵阳北郊龟山发现六朝墓》，《四川文物》1991年5期。

(77) 刘世旭、刘弘：《西昌市西郊乡发现成汉墓》，《四川文物》1991年3期。

(78)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4期。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松潘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松潘县松林坡唐代墓葬的清理》，《考古》1998年1期。

(80) 陈祖军：《安丙墓发掘的重要收获》，《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

(81)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罗城1、2号门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1990年第3辑。

(82)(8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邛崃县文物管理所：《四川邛崃县固驿瓦窑山窑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1990年第3辑。

(84) 曾吕林：《江油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6年3期。

(85)(92) 绵阳市博物馆：《绵阳市出土宋代窖藏银器、钱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86) 景竹友：《三台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4期。

(87) 张道远：《岳池县双鄢乡出土井司器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4期。

(88) 及康生：《石棉县宰羊乡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1年2期。

(89)(91) 帅希彭、方明：《彭山发现南宋窖藏》，《四川文物》1991年2期。

(90) 资料存遂宁文物管理所。

(93)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1991年成都市田野考古工作纪要》，《成都文物》1992年1期。

贵州省考古五十年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省考古工作在人员少、条件差、交通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两代人的艰苦奋斗，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　旧石器时代考古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省就相继发现了几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196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首先发掘了黔西县观音洞遗址，拉开了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帷幕。自此以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我省考古部门合作，先后发掘了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目前，我省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与地点有：黔西县观音洞，盘县大洞，桐梓县岩灰洞、马鞍山，水城特区硝灰洞，毕节市扁扁洞、老鸦洞、吴家大洞、大岩洞、猴洞，兴义市猫猫洞、张口洞，六枝特区桃花洞，普定县穿洞、白岩脚洞、红土洞、洞口洞，开阳县85001号洞，长顺县青龙洞、神仙洞，织金县大洞、猫猫洞、小岩山，平坝县飞虎山，清镇市观音洞、大园洞、猫猫洞，安龙县观音洞、菩萨洞、七星洞、四棱碑，望谟县黄岩洞，兴仁县蚩脚洞，威宁县草海王家院子及遵义市风帽山等40余处，其中重要遗址达20多处，伴出人类化石的遗址10处。出土大量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其中石制品3万余件、骨器1000余件、角器20多件、人类化石数十件、哺乳动物化石54个种属[①]。

旧石器时代文化虽仍有不少薄弱环节，但就已经发现的资料，其文化特征大体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贵州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地点之多，文化遗物之丰富，在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名列前茅”[②]。

贵州旧石器时代遗址与地点已发现40多处，如果加上动物化石地点，可达50多处，已发掘的重要遗址也有20多处。这20多处遗址主要分布在贵阳及其以西的安顺、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地（州）市的近20个县市。出土石制品总数已逾3万件，另

外还出土有骨、角器。石制品出土数量最多者首推普定穿洞遗址，总数已达 1 万件左右；其次是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普定白岩脚洞，兴义猫猫洞，安龙观音洞、菩萨洞等遗址，其数量在 1000 至 6000 件之间；再次是兴义张口洞、平坝飞虎山、桐梓马鞍山、毕节老鸦洞、六枝桃花洞等遗址，数量在 100 件至 700 件之间。出土的骨、角器，在国内更是首屈一指。目前，贵州出土骨、角器的遗址有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平坝飞虎山、六枝桃花洞、安龙观音洞、普定红土洞、桐梓马鞍山等遗址。骨器总数约 1000 件左右，种类有铲、锥、叉、刀、镞、针等。角器总数 20 余件，种类只铲一种。骨器出土地点多、数量多、种类繁，在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堪称首屈一指，而角器目前不见于我国其他省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地点。

（二）贵州旧石器时代文化地区性特点突出，已构成地域性文化，同时，早、中、晚三期文化序列齐全，且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

贵州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文化遗物中的石制品在打制技术、加工方法、石器组合与种类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已构成了多种区域性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仅黔西观音洞和盘县大洞 2 处。其中观音洞遗址代表的观音洞文化，不但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并且，认为它是我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在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上，与北京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观音洞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大部分石核未经加工即行打片，主要采用锤击法打制石片，多数石核与石片的形状不规则；第二步加工采用锤击法，且以单向加工为主，加工方向垂直或近似垂直，刃角多偏大，而以 75°以上者居多，修整痕迹多层重叠；石制品中成品率较高，并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与石块石器较少，复刃石器较多，单刃石器较少，中、小型石器居多，大型石器较少；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次之，凹缺刮器、雕刻器极少；由于原料和加工方向多样性，石器均不太整齐、均匀，以致式样繁多[③]。正因为此，张森水教授认为“观音洞早期文化与中国猿人文化同少异多，故此称其为别具一格的文化。由于两者都存在大量小工具，所以反映了在我国境内可能存在特殊的文化传统，而观音洞早期文化和中国猿人文化又分别代表这个特殊的、以小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传统的我国南北的主枝，它们对其后的文化发生着很大影响。”[④]

贵州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3 处，为岩灰洞、硝灰洞与扁扁洞遗址。其文化遗物特征与早期的观音洞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并更加多样化。硝灰洞的石制品说明，其打制石片技术已采用一种新的技术，张森水、曹泽田先生称它为“锐棱砸击法”，此种打制石片技术在国内其他地区少见。但因三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仅 100 余件，其他文化特征并不十分明显。

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目前已发现 30 余处，尽管还有不少重要遗址的资料

尚未整理发表，但经初步研究，至少存在三种文化类型，并且，它们分别与早期的观音洞文化、中期的硝灰洞遗址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 以草海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　属于这一文化类型的遗址多分布在黔北、黔西北地区，其中有桐梓马鞍山，毕节老鸦洞、大洞、猴洞、大岩洞、吴家大洞等遗址。这种类型的文化与观音洞文化关系极为密切，不管打制技术、第二步加工方法，还是石制品组合、石器种类等方面，都继承了观音洞文化的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比如，其打制石片技术主要采用锤击法，第二步加工方法皆以复向加工或向背面加工为主，刃角多在70°以上；石器组合以复刃石器为主，石片石器与中、小石器居多，单刃石器与大型石器较少，石器种类以刮削器为主等特点，均与观音洞文化一致。同时，草海遗址发现的石片和石核都很规整，利用材料更加充分，成品率和复刃石器所占比例也相当，石器加工精细，形制规整等特点，又表现了这种文化类型在继承观音洞文化传统的同时，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所以，有人认为草海遗址是“与观音洞文化同一文化传统，或者说是观音洞文化的继承者”[⑤]；更有人提出它“是观音洞文化的近亲”，“与观音洞晚期文化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它继承和发展了观音洞文化，又是观音洞晚期文化的一个变体”[⑥]。

2. 以兴义猫猫洞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　这种文化类型的遗址多分布在黔西南地区，主要遗址还有兴义张口洞、安龙菩萨洞、观音洞等。这种文化类型的特点是：石制品多选用粉砂岩、泥质岩等为原料，石材主要是砾石；打制石片技术主要采用“锐棱砸击法”，其次是锤击法，石器的第二步加工方法以向破裂面加工为主；石器中以石片石器与大型石器居多，石核石器与中、小型石器较少。这些特征尤其是砾石两面有对称盆形坑疤的石锤或石砧和类型稳定、制作精良的尖状器、单凸刃刮削器，以及单刃刮削器斜刃多于直刃等特点，颇具地方特色。可见这种文化类型虽然保持了观音洞文化的一些影响，但是，在更多的文化特征上却与硝灰洞遗址一脉相承。所以，学术界不少人认为这种文化类型有可能从硝灰洞遗址的文化发展而来[⑦]。

3. 以白岩脚洞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　白岩脚洞文化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黔中地区，如普定穿洞、洞口洞，六枝桃花洞，平坝飞虎山2号洞，长顺神仙洞等遗址。这种文化类型既包含了观音洞文化的一些特征，又具有猫猫洞文化的一些特点，所以，有人又称它为“兼顾型”。例如：在使用石制品原料上，白岩脚洞文化既选用观音洞文化中常见的块状或结核状硅质灰岩、燧石等，又选用猫猫洞文化中多用的泥质灰岩砾石；在打制石片方法上，白岩脚洞文化主要使用观音洞文化常用的锤击法，其次才使用猫猫洞文化多见的“锐棱砸击法”，与此相反，第二步加工技术它又以猫猫洞文化使用较多的向破裂面加工为其主要加工方法，同时，也较多使用观音洞文化向背面加工的技术；在石器大小方面，观音洞文化以中、小型石器为主，大型石器很少，猫猫洞文化以大型

石器居多，中、小型石器较少，白岩脚洞文化却大、中、小型石器数量基本相当，各占1/3左右；在石器种类上，二者均以刮削器为主，白岩脚洞文化的砍砸器所占比例与猫猫洞文化接近，比观音洞文化高，尖状器又与观音洞文化相当，而比猫猫洞文化低得多等等。以上特征表明，白岩脚洞文化类型确系一种介乎于观音洞文化与猫猫洞文化之间的文化类型[⑧]。

综上所述，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继承和发展早、中期文化传统上，形成了各具特征的三种文化类型。这无疑为研究贵州乃至全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渊源关系和文化类型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三）贵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与数量之多，在我国各省市中是不多见的，它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贵州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至少有10处之多，其中桐梓岩灰洞发现人牙化石7枚，盘县大洞发现人牙化石2枚，水城硝灰洞发现人牙化石1枚，长顺青龙洞在洞外堆积中出土头骨1具，兴义猫猫洞出土下颌骨4个、股骨3段，普定白岩脚洞发现人牙化石2枚，六枝桃花洞发现股骨1段，开阳85001号洞发现人牙化石3枚[⑨]，安龙观音洞发现头骨、肱骨、股骨和牙齿等13件[⑩]，普定穿洞发现头骨、上颌骨残部、下颌骨、桡骨、胫骨、单个牙齿等数十件[⑪]。这些发现为研究我国人类的起源、发展、种属和体质特征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迄今为止，贵州没有发现中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很少，其文化特征尚不清楚。

二　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考古

贵州夜郎地区青铜文化遗物的发现，可追溯到50年代中期。当时，我们在贵阳、盘县、清镇、赫章等市县征集和发掘出长条形锄、尖叶形镢、靴形钺、一字格曲刃剑和“石寨山式”鼓等青铜器6件。70年代初，我们又在赫章、兴义、兴仁等市县征集无胡戈、尖叶形镢、铧口、钺等青铜器6件[⑫]。1977～1980年，我所在赫章可乐柳家沟、祖家老包、锅落包、罗德成地，威宁中水梨园、独立树、张狗儿包和普安青山铜鼓山等地，发掘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2处、墓葬226座。发掘出土石、陶、铜、铁等各类器物1200多件，残碎陶片1000多片[⑬]，从而，揭开了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考古的序幕。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贵州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我们又发现了不少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地点和遗址：1982年，我们在兴义市巴结镇征集到铸有“㒸”符号的铜钺和帆船形铜斧各1件，在该市顶效镇和下纳灰乡征集铜钺4件，其中1件铸有“㒸”符号；在安龙县五台乡簸箕寨征集单耳铜矛1件[⑭]；在兴义市土产公司安顺转运站拣选到铸有

“㊉”符号的铜钺2件、斧形钺1件[15]。1984年，安龙县化力区木科丫口岩缝中出土羊角钮钟1件，该县烈士纪念碑后的山洞中出土一字格曲刃剑1件[16]；同年，我们在安龙县龙广镇扳拉寨营盘山调查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1处，采集到不少陶片、铜镞和残铜器。1986年，兴义市威舍镇光辉村农民在老祖碑开山取石中，发现无胡铜戈3件，残铁刀2件[17]。1987年，我所在普安县青山镇进行考古调查时，在距铜鼓山遗址不远的金矿乡大营山、小营山、大院子，海马村狮子山，新田乡歹苏村望上，德依乡大寨村铜壶山发现这一时期遗址6处，采集一批骨、石、陶片等遗物[18]。1991年，兴义市马岭镇龙井村农民在老黑洞耕地时，出土曲刃铜矛1件。1996年，兴义市郑屯镇团结村农民在当地开山采石中，出土铜犁1件。除此而外，笔者在黔西南州文物科、兴义市文管所见到一字格曲刃铜剑、铜镯各2件。这些铜器均从兴义市境内征集。1997年以来，我所根据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制定的《夜郎考古安排意见》，在兴义、安龙进行了三次夜郎考古调查工作，先后在兴义市万屯镇彭家湾营盘山、七舍乡革上、郑屯镇右里，以及安龙县龙广镇柘仑村上头营、纳万村营盘、佳皂村小子营、大子营、老场坝村坡院等地，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9处，为夜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综上所述，贵州境内已发现的夜郎时期青铜文化遗址、墓葬与遗物的地区有贵阳、清镇、盘县、威宁、赫章、普安、兴义、兴仁、安龙等市县，其中发现文物较多的地区是普安、兴义、安龙、赫章和威宁。

根据目前贵州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墓葬和遗物情况，其文化特征可概括以下五点：

第一，贵州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发掘太少，发掘面积也不大，遗迹现象零散，尚难作出合理推断与解释。这种文化的墓葬已发掘200余座，其特点是：地面均无封土堆，墓坑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无墓道，不见砖、石墓。墓葬规模较小，一般长2、宽1、深0.5米左右。墓坑内不见棺椁痕迹，多系软埋，少数墓葬发现部分朽木或漆皮，可能是棺木葬具。人骨多数朽坏不存，见人骨者，葬式以仰身葬居多，也有排葬、乱葬和“套头葬”。这种用釜或鼓套头而葬的葬式，在赫章可乐发现20座墓葬，占这类墓葬总数的1/8左右；在国内其他地区罕见。

第二，这种文化的陶器特点是火候较低，质地松软，触之易碎，多系夹砂陶，少见泥质陶。陶色多红、灰两种，不见黑陶。均系手制，器形多不规整。器物有单耳罐、瓶、豆、碗、罐等，其中以束腰形单耳罐、喇叭口瓶、粗柄豆为典型。纹饰多刻划纹，其次是绳纹、镂孔、叶脉纹等。在陶器口沿、腹部发现刻划符号40余种，目前虽无法识读，但应是文字雏形。

第三，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墓葬共出土各类器物1200余件，铜器达400余件之多，居各类器物之首，说明这种文化已广泛使用青铜器。目前发现的青铜器物中，

大型铜器较少，多系小型装饰品，其次是生活用具，再次是兵器和生产工具。在出土的439件铜器中，装饰品多达263件、生活用具56件、兵器39件、生产工具14件、其他67件，小件装饰品占了铜器总数的60%以上。究其原因，可能与这些墓葬均为小型墓葬，而非奴隶主贵族的墓葬有关。尽管如此，目前我们发掘和征集的青铜器却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不管是生产工具锄、钁、铧口、犁，兵器戈、矛、剑、钺，还是生活用具釜、鍪、刀，乐器鼓、钟、镯，贮贝器，装饰品带钩、发钗、手镯，以及臂甲、铠甲片等。有的虽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同类器物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部分铜器少见于其他地区，少数器物的形制尚属国内首次发现。典型的器物有赫章可乐出土的Ⅲ型戈，威宁中水征集的Ⅱ型2式戈，兴义威舍出土的心形纹戈，威宁中水出土的Ⅳ型剑[10]，普安铜鼓山和兴义发现的“[illegible]”符号的钺，以及赫章可乐出土的鼓形铜釜、鼓改装的釜、鎏金铜鍪，威宁中水出土的束腰式贮贝器及牛头形、鲵鱼形、飞鸟形、镂狮形铜带钩、各式扣饰与普安铜鼓山出土的铜刀。

第四，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青铜器的工具，其中有石范34件、陶模7件、泥心2件、坩埚3件。这个遗址发掘面积不足1600平方米就出土了如此之多的铸造铜器的生产工具，这不但说明该遗址有可能是一处铜器加工工场，同时，也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已经拥有青铜冶铸业。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石范中，有剑范4件、剑身范1件、戈范2件、钺范1件、钺形器范1件、刀范1件、凿范2件、鱼钩范1件、铃范2件、宽刃器范4件、残范12件、浇口范7件。出土的陶模有剑茎模5件、乳钉纹模1件、心形纹模1件。这些范模的种类多系兵器，也有少数生产工具与装饰品，未发现生活用具。显而易见，这个遗址生产制造的青铜器主要是小型铜器——兵器，其次是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据此，我们推测，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青铜冶铸业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普安铜鼓山遗址是一处生产兵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等小型铜器的加工作坊。

第五，这种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还出土了铁器180余件，种类有锸、钁、铧口、刀、剑、釜、削、钎、带钩等，这些铁器的形制大多与中原汉式器物无殊，具有地方特色的典型器物有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曲棒式铁带钩，除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在云南境内有个别发现外，国内其他地区尚未见过。

三　两汉魏晋南北朝考古

据文献记载：西汉初期，贵州东部属武陵郡，西部属包括夜郎及旁小邑的南夷地区。此时，汉王朝集中力量解决北部匈奴问题，无暇顾及南夷地区。西汉中期，汉武帝

为了解决南越问题，采纳了番阳令唐蒙的建议，开始了经营南夷地区的活动。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出使南夷，通夜郎，“约为置吏”，分巴蜀两郡，并南夷地区设犍为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又“平南夷为牂柯郡”[20]，从此，南夷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目前，贵州发现的考古资料证实了上述文献记载，西汉中期以前的遗物，多系当地夜郎民族文化的风格（见前述）；西汉武帝以后的遗物，又以汉文化风格为主。50年来，贵州发现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只有6处，其中赫章可乐、安顺宁谷、沿河洪渡、贞丰者相等4处经钻探与试掘，但由于试掘面积均太小，遗迹现象均太少，发现的遗物也多系残碎的绳纹瓦片、瓦当、残砖、陶片等。已发掘的这一时期墓葬有230余座，其中西汉后期与东汉墓葬170多座，魏晋南北朝墓葬40余座。汉墓分布地区主要在赫章、威宁、毕节、黔西、金沙、安顺、平坝、清镇、兴义、兴仁、道真、务川、沿河等县，魏晋南北朝墓葬只在安顺、平坝两县境内发现。

两汉魏晋南北朝墓葬的特点与中原地区同期墓葬大体相似，地面均有高大的圆形封土堆，除少数地面因多年耕种封土不太明显，一般高约2米左右，直径10～30米不等。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三类，按墓坑形状又可分成长方形、正方形、铲形、刀形等，还有多室墓。墓葬规模有大中小三类，小者长3、宽2米左右；中者长5、宽3米左右；大者以多室墓居多，面积均超过20平方米。如赫章8号墓，系一带墓道双室墓，其前后室总长13.2米，前室宽4.35米，后室宽4.75米，墓道长3.45、宽1.5米。这一时期墓葬的葬具大多朽坏不存，能见到者多系朽木、漆皮、鎏金泡钉等，少数竖穴土坑墓中还发现残木椁（或痕迹）。从各类墓葬资料看，其墓葬形制的演变大体如下[21]：

第一，西汉武帝在贵州设置郡县以后，随着大量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贵州，汉文化也传入了贵州，反映在墓葬形制方面是中原地区流行的竖穴土坑墓在我省开始出现。这类墓葬盛行时代是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从东汉中期便开始衰落，这与砖室墓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我省已发掘的竖穴土坑墓共93座，属于西汉晚期者44座，属于东汉初期者34座，属于东汉中、晚期者6座，属魏晋南北朝时期者9座。

第二，贵州已发掘的砖室墓31座，其中时代属西汉晚期者仅2座，属东汉早、中期者15座，属东汉中晚期者5座，属东汉但早晚期不明者6座，属魏晋南北朝者3座。这一资料告诉我们，贵州的砖室墓大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开始出现，东汉中期尤其盛行，到了东汉晚期开始衰落，魏晋南北朝时期便逐渐被石室墓所取代。

第三，我省发掘了石室墓66座，这种墓不见于东汉早期以前，属于东汉中期前后者有14座，属于东汉晚期者23座，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29座。显而易见，石室墓大约在贵州出现于东汉中期前后，盛行于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室墓成了主要的墓葬形制。已发掘的41座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石室墓达29座，

竖穴土坑墓只有9座，砖室墓仅3座，石室墓占这一时期墓葬总数的70%以上。究其原因，可能与贵州地处山区盛产石料有关。

贵州两汉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随葬品一般都较多，少者10余件，多者100多件。主要是陶、铜、铁等质地的器物，魏晋南北朝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青瓷器以及金、银、铜、玛瑙、琉璃等装饰品[②]。各时期随葬品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西汉后期的陶器中虽仍有部分当地民族的夹砂软陶，但火候高，质地坚硬的泥质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泥质陶器以灰色居多，兼有红、黄二色，同时，开始出现釉陶。制法以轮制为主，尚有少数手制。器形主要是形状圆矮的罐，当地民族常用的带状单耳罐明显减少，不见觚；另有壶、甑、釜、钵、盆、熏炉、灯、盂、盘、豆、碗等，还有模型器屋、井，这些器物与中原汉文化同类陶器相同。陶器上的纹饰以绳纹、刻划方格纹为主，还有附加堆纹，新出现拍印或模印方格纹中加几何图案戳印，少见篮纹，不见前期的叶脉纹和刻划符号。

东汉时期的陶器主要以质地坚硬、表面施釉的泥质陶为主。1957年，清镇、平坝两县发掘了47座汉墓，属东汉时期的墓葬41座，其所出69件陶器中，施釉硬陶就占了49件，占陶器总数70%左右。这一时期的陶器除附件与模型器系手捏外，全系轮制。器物种类以罐为主，另有壶、钵、豆、瓶、碗、量等，模型器种类较前期明显增加，除屋、井外，新出现了灶、水塘稻田模型、各种人物俑及动物俑羊、猪、鸡等，还有镇墓兽。纹饰中以拍印或模印方格纹中加几何图案戳印为主，刻划纹以弦纹、波浪纹为多，绳纹减少，不见篮纹与附加堆纹。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仍有少数釉陶，但表面涂黑的红、灰软陶居多。器物种类明显减少，以罐为大宗，占所有陶器的90%，只有少数双唇坛、釜等。这一时期的陶器纹饰趋于简化，大多数陶器表面涂黑作为装饰，有纹饰者多刻划弦纹、波浪纹和小方格纹。陶器的减少与衰落，恐怕与青瓷器的兴起有关，已发掘的41座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青瓷器46件，陶器仅37件。

第二，西汉后期的铜器以中原地区常见的器形为主，如矛、弩机、镞、蒺藜、壶、釜、甑、洗、碗、瓶、盉、温炉、熨斗、耳杯、灯、各式镜、带钩等，尽管也出土了一字格曲刃剑、靴形钺、立耳釜、手镯、铃等夜郎青铜文化风格的器物，但数量甚少。东汉墓葬所出铜器几乎全系中原汉文化的器形，如壶、釜、洗、碗、盉、盘、灯、豆、耳杯、各式镜等，同时，新出现了车马模型、摇钱树、人物俑、动物俑马、鸡、鸽等模型器。铜镜由西汉后期的“日光镜”、“昭明镜”演变为“四乳四乌纹镜”、“尚方镜”等。魏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的铜器数量和种类显著减少，仅发现少数釜、壶、洗、鐎斗、鐎壶、杯、豆、镜等，其中带盖托杯是新出现的器物，鐎斗和洗的底部均增加了三蹄形足，铜镜不见前期的“四乳四乌纹镜”、“尚方镜”，新出现了“长宜子孙镜”、“四螭纹

镜"、"神兽镜"等。

第三，两汉魏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的铁器不如陶、铜器特点突出。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铁器多为汉文化风格，如兵器中的铁剑、直柄或环首铁刀、矛等，生产工具锸、斧、斤、凿、锤等，生活用具釜、交股剪、脚架、削、钎等，均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无殊。魏晋南北朝墓葬中未发现铁剑，只有为数不多的铁刀，但出土了汉代墓葬中不见的铁鼎和棺钉。

第四，西汉后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金、银、玛瑙等装饰品数量不多，70多座西汉后期墓葬只发现60余件装饰品。东汉墓葬虽然大多被盗扰，但仍然出土了近百件装饰品。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发现的装饰品数量更多，41座墓葬中共出各类装饰品470多件，包括金、银、玉、玛瑙、琥珀等，还有大量琉璃佩饰，占所有随葬品总数的60%左右。

四 宋明考古

隋唐时期文物发现甚少，仅在平坝马场发掘盗扰严重的唐墓3座，故其文化内涵不明。据文献记载，宋明时期贵州居住着苗、侗、布依、水、彝、仡佬等众多少数民族。由于各民族埋葬习俗不同，所以，墓葬形制各异。目前，贵州宋明墓葬在清镇、平坝、贵阳、开阳、安顺、遵义、桐梓、习水、赤水、凤岗、湄潭、道真、正安、务川、盘县、黔西、毕节、惠水、长顺、望谟、罗甸、麻江、德江、思南、岑巩、玉屏、桃松等县市发掘200余座，其中有大型石室墓、小型石室墓、小型土坑墓、岩墓，同时，还有悬棺葬、岩棺葬、洞棺葬。现综述如下：

（一）大型石室墓　当地人称"皇坟"或"官坟"。在遵义、凤岗、湄潭、务川、道真、正安、赤水、德江、思南、贵阳、安顺等县市发掘20余座。这种墓葬一般封土堆尚存，呈圆形，直径10米以上，高2米左右；一般有2～4个墓室，墓室由多块条石砌成，分甬道、墓门、墓室，有的还有前后室；一般墓门与墓壁上有雕刻。这类墓葬规模较大，每个墓室的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发掘较多的是遵义播州杨氏的墓葬，共清理了8座，能确认墓主人者有杨粲（13世）、杨文（15世）、杨昇（22世）、杨纲（23世）、杨辉（24世）、杨爱（25世）、杨烈（28世）等墓葬，另有一座墓主人待考。这里，我们选择杨粲墓作一简介。

杨粲墓位于遵义市南约10公里处的皇坟咀。该墓封土呈圆阜状，直径14.2、高1.25米，系男女合葬冢。男女两室又可分前、后室，前室前及前、后室间各设墓门一座，共有墓门4座，两后室间有过道相通。墓室通长8.42、前室通宽8.04、后室通宽7.53、后室最高处5.02米。全墓由496块白砂岩条石砌筑而成，除两前室外，其余部分均有雕刻，共190幅，包括人物雕像28尊，动物、花卉、几何图案、器物用具与仿

木构建筑等162幅。全墓雕刻技法多样，有高浮雕、浅浮雕，也有线刻、减地雕，还有圆雕，多种雕刻技术混合使用。杨粲墓与贵州省其他宋明大型石墓一样，早年即被盗掘，出土随葬品极少，除在棺床下的腰坑发现2面铜鼓外，仅出土少量陶瓶、影青瓷碗、铜镜、钱币等。据文献记载：播州杨氏始祖杨端系山西太原人，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南诏陷播州，杨端应募入播，收复其地，世袭为官。至明代万历年间，其廿九世杨应龙叛亡，先后统治播州达725年之久。杨粲系播州杨氏十三世孙，南宋末播州沿边安抚使，"官终武翼大夫，累赠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右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㉒]。

（二）小型石室墓　当地人称"苗罐坟"，亦称"仡佬坟"。其中一种由四块长条石和两块近似方形的条石竖砌而成，条石加工平整，一般长2、宽0.8、高1米左右。此种墓发现不少，发掘的却不多，且因严重扰乱，不见随葬品。另一种大多数是四壁由4～10层天然条石叠砌，然后用4～6块天然条石盖顶，墓底为生土，也有用石块或石板铺垫者。一般长2、宽0.8～0.9、高不足1米。还有个别墓用薄石板竖砌而成，估计是小孩墓。这类墓葬在清镇干河坝、平坝马场发掘100余座，随葬品均不太多，一般只几件器物，并多系装饰品，且有着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如长铜发钗、弹簧形条脱、手镯、戒指、铃等。清镇干河坝发掘了84座这类墓葬，出土器物210多件，装饰品就有190多件，还有数百枚琉璃珠，而罐、釜等陶器仅10件，刀、矛、镞等也只4件。这类墓的族属有两种意见，有人推断为仡佬族，还有人认为应为苗族。

（三）小型竖穴土坑墓　这种墓在清镇、麻江发掘了数十座。其地面多有圆形封土，直径6～11、高1米左右；只有墓室，无墓道，墓室长2～3、宽0.6～1.3、深0.5米左右。出土随葬品也不多，一般只1～2件，最多者也只10件，而且主要是装饰品铜手镯、项饰、发钗及琉璃珠等，另有少量刀、矛、釜、三（或四）脚器等铁器，麻江这类墓还曾出土过铜鼓一面。有人推测清镇这类墓系仡佬族，麻江发掘的这类墓系苗族。

（四）岩墓　当地人称"蛮子洞"，主要分布在黔北地区的赤水、桐梓、遵义、习水、道真等市县，发现30多座，但因早年盗扰严重，随葬品荡然无存，故清理者不多。这种墓一般在砂岩壁上凿一长方形岩洞作为墓室，墓底距地表2～3米高。目前，发现最早的岩墓是习水县三岔2号墓，其墓门左侧有阴刻"章武三年七月十日"等铭文[㉓]。"章武"系蜀汉刘备年号，三年即公元222年。最晚的岩墓是桐梓县夜郎坝七孔石清理的一座岩墓，时代为明代。

（五）"悬棺葬"、"岩棺葬"、"洞棺葬"均是不入土的葬俗，它们分别是将棺木或置于悬岩峭壁之上，或搁放在岩坎之上，或堆放在洞穴之中[㉔]。其发现地区主要在黔东南、黔南、铜仁、安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目前已清理者不足20具，而且在《贵州考古十年》已详细介绍[㉕]，在此不赘述。

（执笔：宋世坤）

注 释

①⑨ 曹泽田：《名列前茅的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贵州省博物馆开馆卅周年纪念专集》，1988年；曹泽田：《贵州重要古人类遗址年代学研究新进展》，《贵州文物工作通讯》，1995年3期。

② 1979年冬，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赴贵州考察，在贵州省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笔者曾请裴老谈谈"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国内的地位如何?"裴老作了"名列前茅"的评价。紧接又以"名列前茅的贵州旧石器"为题，在贵州师范大学作了学术报告。

③ 李炎贤、文本亨：《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古人类文集——纪念恩格斯〈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论文汇编》，科学出版社，1978年；李炎贤：《观音洞文化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史前考古》1983年2期；李炎贤、文本亨：《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曹泽田：《观音洞文化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贵州文物》1982年1期。

④⑥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技出版社，1987年。

⑤⑦⑧ 蔡回阳、王新金：《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第一乐章——黔西观音洞文化》，《贵州省博物馆开馆卅周年纪念专集》，1988年。

⑩ 贵州省博物馆自然部：《安龙观音洞遗址第二次发掘工作汇报》，《贵州文物工作通讯》1996年3期。

⑪ 吴汝康等：《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⑫ 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⑬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赫章可乐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10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⑭ 何凤桐：《贵州境盘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存》，《贵阳师院学报》1983年3期。

⑮ 万光云：《来自废品中的珍贵文物》，《贵州文博》1992年1期。

⑯ 胡维屏：《安龙发现古铜剑》，《贵州文物》1983年3、4合期。

⑰ 万光云：《兴义出土青铜戈》，《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⑱ 张定福：《贵州普安考古调查》，《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⑲ 宋世坤：《贵州青铜戈、剑的类型及其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⑳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㉑ 宋世坤：《贵州两汉魏晋南北朝墓葬形制的演变》，《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6年3期。

㉒ 宋世坤：《贵州两汉魏晋南北朝随葬器物的演变》，《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7年4期。

㉓ 《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1《杨氏家传》、《万历武功录》（五）《播酋杨应龙传》、《遵义府志·土官》等文献，以及1972年遵义高坪杨文墓出土的《杨文神道碑》均有记载。

㉔ 黄泗亭：《贵州习水发现的蜀汉岩墓和摩岩题记及岩画》，《四川文物》1986年1期。

㉕ 以前我们将岩棺葬和洞棺葬统称岩洞葬，笔者经过对比研究，认为两种葬俗有较大区别，故将棺木搁放在岩坎上者称岩棺葬，将棺木堆置于洞穴者称洞棺葬。

㉖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考古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云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云南省文物考古事业走过了从初创到发展、成熟的五十个春秋。五十年来，由逐渐成长、壮大的专业队伍调查、勘探、发掘、维修、保护、研究各族先民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使云南的考古事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949年以前云南仅发现10处古代文化遗存。新中国成立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在云南的128个县（市）发现了各时期埋藏于地下的人类文化及其相关遗存995处。其中古猿遗存7处，旧石器时代（包括细石器）遗存57处，新石器时代遗存380处，青铜时代遗存333处，东汉至唐初遗存83处，南诏、大理（唐、宋）时期遗存36处，元、明时期遗存99处。并对其中的208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9780平方米。出土各时代文物、标本61000件。

一　古　　猿

古猿化石标本是研究人类从猿进化为人的科学依据。云南自1956年在开远市小龙潭褐煤层中发现古猿牙齿化石以来，相继于同一地点以及禄丰县石灰坝，元谋县竹棚村豹子洞箐、小河村、雷老村，保山市羊邑煤矿等地采集和发掘出古猿化石标本，总计2156件。其中头骨、颅骨、上下颌骨、上下齿列、指骨、肩胛骨、锁骨等计116件，单个牙齿2040余枚。它们分属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的多个个体。

开远古猿　从1956年2月首次发现以来，至今已出土腊玛古猿牙齿8枚和1件带12枚牙齿的上颌骨，分属3个个体；西瓦古猿牙齿5枚，属1个个体。地质时代为晚中新世，估计距今1400万年。近年云南省地质科研所用古地磁断代法测定，为距今830±10万年，认为属晚中新世。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古猿化石点，也是世界上时代较早的腊玛古猿、西瓦古猿化石点[①]。

禄丰古猿　1975年5月发现于禄丰县石灰坝庙山坡褐煤层中，已进行过9次发掘。所获古猿标本有：腊玛古猿颅骨、上下颌骨、上下齿列、指骨等55件，牙齿329枚；

西瓦古猿颅骨、上下颌骨、上下齿列、肩胛骨、锁骨等40件，牙齿321枚。估计时代为晚中新世，距今约800万年。古地磁断代法测定为距今400±10万年，属早上新世。这批古猿标本，无论从量和质上，都大大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古猿标本。其中一具颅骨，也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具较完整的腊玛古猿颅骨，这一发现曾被评为世界十大新闻之一。禄丰古猿以宽眶间隔和方眼眶为特征，而区别于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古猿类型，代表向人和非洲猿类方向发展的一支[②]。

元谋古猿　1986年10月发现于元谋县物茂乡竹棚村豹子洞箐，继后在同一地点及小河村蝴蝶梁子、房背梁子，雷老村大树梁子等地，又发现古猿化石。并在前三地点共进行了6次发掘，所获古猿化石标本计：头骨1具、上颌骨8件、下颌骨13件、牙齿1380枚。时代为晚中新世，估计距今800～600万年[③]。元谋古猿头骨是迄今世界上时代最晚的腊玛古猿头骨。美国加洲人类起源研究所副所长威廉·肯波在1988年访问云南时参观了元谋出土的古猿标本，他认为：这个头骨是迄今为止人类起源缺环上最重要的发现，肯定是亚洲大陆与非洲人类系统最为接近的一类古猿。这个头骨的发现，无疑是几十年来古人类研究的最大成就，对人类起源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元谋一次发掘获得的化石，就可以同非洲一些著名地点十多年的发掘成果相比。

保山古猿　1992年1月发现于保山市羊邑煤矿清水沟煤层中，有左侧下颌骨1件、臼齿1枚。这一发现填补了距今800～400万年间从猿到人进化的缺环，它有力地增强了我国第三纪古猿化石在人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④]。

综合云南古猿发现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云南地处青藏高原南缘，从中新世以来，其地质地理环境的持续演变，以及由此引起的气候垂直分带和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还有天文因素引起的全球气候等变化，促使这块土地上的生物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以求得自身生存、繁衍而产生变化。这也是当时云南古猿演化的客观推动力。第二，从云南古猿发现地点之多，分布面之广，及同一地点发现的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目前世界上罕见的。第三，从距今1400万年的开远古猿—距今800万年的禄丰古猿—距今800～600万年的元谋古猿—距今800～400万年的保山古猿，云南古猿在年代上早、晚相继。第四，云南古猿有自己的形态特征，如宽眶间隔、方眼眶等，区别于土耳其、巴基斯坦发现的窄眶间隔、圆眼眶的腊玛古猿、西瓦古猿。因此有研究者主张将它们分开，建立人猿超科·人科·禄丰古猿属，并认为禄丰古猿属代表向人和非洲猿类方向发展的一支[⑤]。许多研究者认为云南古猿自成演化系统，有的提出："开远古猿的一支演化为元谋古猿，另一支演化为禄丰古猿和保山古猿"[⑥]；有的则认为是开远古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⑦]。第五，研究与云南古猿伴出的动物群化石，亦可见从开远至禄丰到元谋动物群的逐渐进步趋势，可作为古猿承袭发展关系的旁证。据上述发现、研究成果可以认为，云南古猿向人方向发展轨迹明显，加之云南发现了距今170万

年的元谋猿人——直立人及众多古人类、旧石器时代遗存，因此贾兰坡院士指出：“云南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8]。

二 旧石器时代

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直立人及其旧石器，揭开了云南人类的历史篇章。自元谋人时代起至距今7000年[9]，是目前所知云南旧石器时代的年限范围。50年来，在云南的昆明、呈贡、安宁、嵩明、晋宁、江川、宜良、路南、元谋、禄丰、罗平、马关、西畴、峨山、蒙自、河口、景洪、沧源、施甸、保山、丽江、昭通计22个县（市），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57处。其中洞穴遗存22处、岩厦遗存2处、旷野遗存33处。出土人类化石130件，石制品约18000件，骨、角、牙器200余件，另有大量动物化石，并发现火塘、炭屑、红烧土等用火遗存及柱洞等。

57处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属早期者7处、中期4处、晚期38处，已确定为遗址者18处。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有：属早期的元谋猿人（直立人）遗址[10]、江川县甘棠箐遗址[11]，属晚期的保山塘子沟遗址[12]、保山龙王塘遗址[13]和昆明呈贡龙潭山洞穴[14]、宜良九乡张口洞[15]、蒙自黄家山马鹿洞[16]、峨山塔甸老龙洞[17]、景洪景哈檀米妈囡洞[18]等洞穴遗址。发掘面积合计约2000平方米。

57处遗存中，有的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属直立人阶段的有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元谋人；属早期智人的有昭通过山洞的昭通人；属晚期智人的有丽江木家桥的丽江人，昆明呈贡龙潭山的昆明人，峨山老龙洞的峨山人，蒙自马鹿洞的蒙自人，西畴仙人洞的西畴人，保山蒲缥塘子沟的蒲缥人，施甸姚关万仞岗的姚关人。

石器在用料、制法及器类等方面从早到晚可看到明显的变化。早期选用石英与石英质砾石为主要原料。用锤击法打制，不预制石核台面；第二步加工以单面加工为主，双面加工较少。石工具以石片制品为主，器类简单，主要是刮削器，有少量敲砸器、盘状器[19]。中期的石器许多方面与早期相似，但技术上略有进步，表现在砸击法开始运用，石核利用率高，对片坯的第二步加工主要是单面，亦能双面修制，还出现交互打击法。器类略增，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盘状器[20]。晚期表现出种类繁多，制作技术进步。如更多地选择砾石作原料，有用火使岩石裂开，取其结核的方法；石质的选用多达20余种硬质石料。其制作技术也以锤击法为主，兼用砸击法、锐棱砸击法、碰砧法；第二步加工单面、双面、复向均有。石制品种类大大增加，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砧、敲砸器、普通石锤、单平面砾石手锤、石弹丸、盘状器、琢孔盘状器、有坑石器、砺石、石球、石饰品等。石工具由模式普适型演化为功能单一型，趋向于专门化、精细化、复合化。云南与外地旧石器文化存在着较广泛的联系，这里既有

我国南方常见的砾石—石片传统，又可看到与河北东谷坨遗址所出石器的相似性，一种"石球"又反映出与华北丁村、许家窑旧石器文化中"石球"的联系[21]，甚至有的地点"或多或少带有欧洲莫斯特同期石器的风格"[22]。

旧石器晚期，在部分遗址中骨、角、牙器大量使用，器类繁杂。有骨铲、锥、针、镞、饰品；角铲、锥、矛头、棒及牙饰品等。已形成了成熟的制作工艺，在工具的功能、适用范围、使用效率上甚至可超过石器，这可以说是云南旧石器文化特点之一。

中石器时代遗存在云南也有发现，元谋县有8个地点出土了一批长度仅2至3厘米的细石器，器形有锥状石柱、窄长小石叶、扇形石核刮器、靴形刮器等，这是继这类遗存在西藏聂拉木地区发现之后西南地区的又一重大发现[23]。

三 新石器时代

云南新石器时代，约在距今7000～3300年间[24]。据不完全统计，50年来在云南128个县（市）中的83个县（市），发现了380余处这时期遗存。其中居住遗址170处，墓地7处，采集点200余处。在遗址中，浅丘、江河旁台地、湖滨遗址119处，贝丘遗址21处，洞穴遗址23处，崖厦遗址7处；墓地中土坑墓地1处，石棺墓地6处。出土遗物总数4500件以上，包括石器3000余件，陶器800余件，骨、角、牙、蚌器700余件。另有陶片数万片及7处炭化稻米发现点。遗迹有房屋、火塘、窖穴、灰坑等。经科学发掘的有遗址22处，墓地7处。发掘面积8928平方米。

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划分为11个类型：1. 闸心场类型，以昭通市闸心场遗址为代表[25]，分布在云南东北部。石器多梯形斧，有少量长方形和半月形穿孔石刀及有肩锛、有肩有段锛。典型陶器是长颈单耳小平底瓶、板耳瓶、侈口平底罐、侈口单耳罐、单耳小罐、曲腹钵、葫芦形勺。2. 石寨山类型，以晋宁县石寨山遗址部分为代表[26]，分布于云南东部和中部偏东地区。流行有肩有段石锛和有段石锛。典型陶器为高领鼓腹平底罐、底部有同心圆纹的凸底浅盘、内折沿小碗。3. 海东村类型，以通海县海东村贝丘遗址为代表[27]，分布在通海杞麓湖周围。石器以梯形斧、锛为主，有肩有段锛和有段锛不多，石环常见。典型陶器是短颈球腹圜底罐、长颈扁圆腹圈足罐、长腹圈足壶、折腹平底杯、带流长颈鼓腹圈足杯，带流器多见，且有三流、四流者。4. 小河洞类型，以麻栗坡县小河洞遗址为代表[28]，分布于云南东南部。石器以平肩或斜肩双肩斧、锛为主，有少量不对称刃斧、锛（靴形斧、锛）。5. 曼蚌囡类型，以景洪市曼蚌囡遗址为代表[29]。石器以梯形斧、锛和打制网坠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平肩双肩斧、锛。陶器见敞口平底碗和管状网坠。6. 大墩子类型，以元谋县大墩子遗址为代表[30]，分布在云南中北部。石器以断面椭圆、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或长条形的斧为主，亦有梯形斧，镞均

无铤，柳叶形者较多，长方形和新月形石刀较少，蚌刀多见。陶器一般高瘦、平底，以罐类为多，另有瓮、长颈壶、长颈瓶、侈口圜底杯、双凸截尖圆锥体纺轮。7. 白羊村类型，以宾川县白羊村遗址为代表[31]，分布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石器以磨制梯形和高梯形斧为主，流行新月形双孔石刀。典型陶器是大口圜底和平底罐、匜、敞口盆、圜底钵、小平底缸、折腹瓶、截尖锥体纺轮。8. 石佛洞类型，以耿马县石佛洞遗址为代表[32]，分布于云南西部的澜沧、耿马县境。石器以梯形斧为主，不少斧形体小巧，石铲、狼牙棒很有特色。9. 忙怀类型，以云县忙怀遗址为代表[33]，分布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石器大多用江河边砾石打制成，器形主要有弧肩双肩斧，其中常见弧刃、半圆刃者，少量新月形刃和不对称刃，次为打制梯形斧、单平面砾石手锤、椭圆刮削器、束腰形网坠。10. 大花石早期类型，以龙陵县大花石遗址早期为代表[34]，分布在云南西部。石器以磨制梯形斧为主，有的形体很小，长方形单孔石刀和梯形双刃石刀、刻刀形器很有特色。陶器有敛口折沿罐、敛口钵、敞口折沿盆。11. 戈登村类型，仅发现维西县戈登村遗址[35]，在云南西北部。石器仅磨刃沿，以圆柱体和高梯形的斧、单孔长方形和无孔半圆形石刀为主。陶器中多见大板耳罐。

关于新石器文化的年代，从现在所知数据看，约在公元前5000～前1350年间，各阶段的划分：早期为公元前5000～前3500年；中期为公元前3500～前2500年；晚期在公元前2500～前1350年[36]。

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房屋建筑遗迹较多，形式多样，有长方形地面建筑、长方形半地下式建筑、圆形半地下式建筑、干栏式建筑，且分布较广，说明当时人们已主要过着定居生活。遗址或发现点中，有7处出土炭化稻米，多处发现稻谷痕迹，证明云南当时已属稻作农业区。

这一时代是民族起源时期，一般认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各类型，分别属于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系的遗存。

崖画亦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从1965年至今，在沧源、耿马、怒江、元江、路南、文山、麻栗坡、西畴、邱北、宜良、弥勒、德钦、永德、漾濞、丽江、中甸等16个县，发现崖画点近40处，图像1600余幅。这些崖画均用朱色颜料，一般用剪影式画法，仅绘轮廓，不画细部。人物多正面像，身体绘成倒三角形。动物呈侧面。题材广泛，如狩猎、放牧、采摘果实、战争、舞蹈、房屋、太阳、野兽、家畜等。对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原始信仰、艺术、自然环境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青铜时代

云南青铜时代的年限范围，约在距今3300～200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在91个县

(市)发现青铜时代遗存333处，其中遗址5处，墓地78处，采集点250处。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遗址4处，墓地49处，墓葬2186座。发掘面积23800平方米以上。遗址分布在河旁台地、湖滨和盆地边缘，墓地多处于盆地边缘的浅丘缓坡上，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在滇西北及滇中北部多有石棺墓、大石墓，个别地点发现有封土的墓和石堆墓。出土遗物计26200余件，其中青铜器19600余件，陶器2100件，还有铁、金、银、锡、铅、石、玉、玛瑙等器。

1955年至1996年间五次发掘的晋宁县石寨山墓地，是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之一。共在石寨山清理墓葬86座，出土随葬品5000余件，其中一枚"滇王之印"金印，证实了古代滇国存在的史实[37]。

1972年至1994年间，三次发掘江川县李家山墓群。其第二次发掘，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38]。

云南青铜时代的333处遗存，目前可划分作五个类型[39]：1. 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简称滇文化），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为代表[40]，分布于云南东部和中部偏东地区的东至罗平，西迄禄丰、楚雄，南达通海，北止东川的地域内。其青铜器有尖叶形镬、长条形锄、蛇头形茎首无格剑、一字格剑、无胡举手人纹戈、细长柳叶形刃矛、阔叶刃矛、半圆銎斧、四方銎斧、扣饰、贮贝器、铜鼓。陶器有浅鼓腹圜底釜、高领深腹圜底罐、侈口高领鼓腹罐、长颈平底壶、底部有同心圆线的凸底浅盘、内折沿小碗、算珠形纺轮。2. 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分布于云南南部和东南部的通海县以南，墨江—李仙江以东，越南以北地区，以元江县打篙陡墓地为代表[41]。青铜器有形式多样的不对称形钺（靴形钺）、细长銎椭圆刃钺、弧刃和凹刃的有肩长条形锄、尖叶形和凹字形镬、刃平面作不对称菱形的矛、刻刀形器、体形修长的斧、锛及斧銎形器。陶器有球腹圜底罐、折腹圜底罐、圈足罐、敛口圜底钵、敞口平底盘、折腹圜底盘、扁平圆形纺轮。3. 洱海区域青铜文化，分布在云南北部及中部偏西地区的禄丰、楚雄以西，洱海以东，金沙江以南，哀牢山以北范围内。以祥云大波那墓葬为代表[42]。青铜器有心形镬、凹銎长条形锄、曲刃矛、圆刃钺、三叉格剑、铜鼓、禽鸟杖头。陶器有侈口深腹罐、双耳罐（耳较小）、敞口平底碗、高圈足豆。4.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及西部的部分地区，包括洱海西、北，昌宁大田坝以北地区，以德钦县纳古石棺墓[43]、剑川沙溪鳌凤山墓地为代表[44]。青铜器有三叉格剑、双髻扁茎无格剑、圆刃钺、实心梯形斧、椭圆形弧刃斧、圆形饰牌、柳叶形圆骹柱脊矛。陶器有大板耳平底双耳罐和单耳罐。5. 澜沧江、怒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分布于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包括墨江—李仙江以西，昌宁大田坝以南及以西地区，以昌宁县出土青铜器为代表[45]。青铜器是中腰收束的半圆弧刃斧、圆刃椭圆銎斧、新月刃钺、刃部细长的不对称形钺（靴形钺）。

青铜时代各阶段年代划分：早期为公元前14～前8世纪；鼎盛期为公元前7～前2

世纪；向铁器时代过渡期为公元前 1 世纪。至于各类型的分期，目前仅滇文化进行了较细的分期，划分为四期[46]。

云南青铜时代的铜器，以其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生动、形象的写实风格，表现广阔的社会内容及精湛的艺术技巧，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些青铜器可分为 100 余类。

青铜贮贝器是古代滇国的重要礼器，均出于王族和贵族墓中。器内多贮货币——海贝。尤为珍贵的是器盖或器身铸、刻有各种人物活动场面者，其表现内容皆国之大事，如“结盟祭祀”、“战争”、“贡纳”场面，“祈年”、“播种”、“孕育”、“报祭”等重要农事祭仪，“上仓”、“纺织”、“放牧”等生产活动。冯汉骥先生首先对贮贝器上的人物活动场面进行研究、解释，指出这是当时“滇人”重要活动的最真实写照，是中国考古学上少见的重要发现[47]。

铜鼓这类乐器，亦为重要礼器，被作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它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及东南亚各国被长期、广泛使用。云南青铜时代出土铜鼓不下 60 余件，可分作万家坝型（先黑格尔 I 型）和石寨山型（黑格尔 I 型），后者是从前者发展演变而来。万家坝型铜鼓即以 1976 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墓地出土铜鼓为标准器而定名。万家坝 23 号墓出 4 件铜鼓，经对与其同墓出的垫木进行^{14}C年代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690 ± 90 年，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年代明确的铜鼓。与之相似的铜鼓在云南各地出土 20 余件，被国内学术界和国外许多学者公认为最早的铜鼓类型，加之此类型铜鼓器形、纹饰、铸造技术上表现出的早期原始性，许多研究者认为云南是铜鼓的起源地。

广泛使用青铜农具，是云南青铜时代的特点之一。用于挖土的铜䦆、中耕除草的铜锄、收获谷穗的铜爪镰等，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许多是实用农具。据此推知，当时的农田耕作已有翻挖土地、中耕除草、收获谷穗等工序，还处于锄耕农业阶段[48]。从发现的稻谷痕迹等推断，农作物以稻为主。

出土青铜器上铸造和镌刻的马、牛、羊、猪、狗、鸡形象不胜枚举，并有成群放牧的诸多图像，说明家畜、家禽饲养较为发达[49]。牛在家畜中占有特殊地位，不仅是重要肉食来源，亦为各种祭祀的重要牺牲和财富的标志[50]。

出土的成套青铜纺织工具，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也很少见。这些纺织工具包括用于纺纱的纺轮、络纱的管，而尤以织布机的部件：卷布轴、卷经轴、分经棍、打纬刀、撑布弓等最为重要。据此并结合青铜器上的纺织图像，复原了当时使用的“踞织机”（腰机），及纺织生产中纺纱、络纱、上机织布、上光等几个主要工艺流程。并推测青铜时代所织之布，幅宽约 24 厘米，每人日产量约 2 市尺。从发现的纺织品看，织布的主要原料是麻[51]。

青铜扣饰是云南青铜器中的一朵奇葩，其中浮雕扣饰最引人注目。这类扣饰内容丰

富多彩，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以深山旷野里野兽间殊死搏斗为题材的动物纹扣饰，反映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如二豹噬猪扣饰、两豹夹攻一猪的纹饰等。这类扣饰采用动态线等手法加强了造型的运动感，取得了完美的艺术效果[52]。

青铜器的铸造，初期采用石范，直至青铜时代中、晚期，石范仍被沿用[53]；约在青铜时代中期，陶范被用于铸造较复杂铸件；春秋晚期产生的失蜡法，用于各种精密铸件的铸造，如动物浮雕扣饰等；西汉中期金属范开始应用。一些器物铸成后，表面还进行鎏金、鎏锡（或说镀锡），既能使色泽美观，又增强防腐性能。此外还采用了镶嵌、线刻、错金等工艺，具有不同的艺术效果。青铜合金的配比，至迟在西汉时已接近中原地区“六齐”合金规范[54]。

关于青铜文化的族属，冯汉骥先生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一文，为这一领域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他首次在青铜人物图像中，按发式、衣着等不同，区分出椎髻的“滇族”和编发的“昆明族”，并结合文献作了族系推测[55]。继后的学者进一步将滇文化青铜图像中的人物分为：椎髻者——百濮系统的靡莫之属；辫发者——氐羌系统的昆明之属；结发者——南中之越；螺髻者——盘瓠之裔[56]。

云南青铜文化与外界有广泛的联系。与周边各省、区青铜文化之联系自不待言。这里出土的编钟、鼎、戈等，明显地表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河南殷墟妇好墓所出铜器中有4件为铅同位素比值非常低的异常铅，与云南东北部矿山所出异常铅同位素特征一致，说明远在3000多年前云南生产的金属已运往中原[57]。滇西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中流行的大板耳双耳罐等器物，与川西高原、西北、内蒙古、东北的青铜文化的器物有不少相似之处[58]。云南青铜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也存在着文化交流[59]。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可能来自伊拉克或印度[60]。

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就主体而言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1]，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滇王降汉，云南统一于西汉版图，先进的冶铁技术传来，铁器逐渐取代青铜器，经过一个世纪的过渡，东汉初云南便跨入了铁器时代。

五　东汉至唐初

五十年来，在云南21个县（市）的83个地点发现了这一时期地下遗存、其中遗址3处、竖穴土坑墓地2处、崖墓群8处、“梁堆”墓分布点71处、包括“梁堆”墓400余座。经过发掘、清理的遗址1处、竖穴土坑墓地1处、崖墓群4处、梁堆墓60余座。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以上。出土文物4820余件。

“梁堆”墓是云南这时期有高大封土堆墓葬之俗称。分布于云南东北部、中部及滇

西大理、保山等地。其墓主系中央委派的外来官吏和任命地方豪族充任的官吏以及他们的亲属。这类墓封土堆高3～10、直径10～20米。少数有墓碑。封土下的墓室随时代早晚而形制不同：东汉初期仍沿袭青铜时代的主要墓制，为竖穴土坑；东汉中、晚期演变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券顶砖室墓，一般单室，少数有前、后室，亦见前室、双后室及带耳室者，均有墓道；西晋时期流行石块砌筑的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的券顶石室墓，亦有单室和前、后室墓之分，均有墓道；东晋、南北朝则盛行石块砌筑的平面呈四方形，顶作覆斗形的石室墓，亦有墓道；唐初沿袭东晋、南北朝墓制，惟建材用砖。随葬器物，一般有陶俑，陶制家畜、家禽、水塘水田、房屋、仓、灶、井模型及陶釜、甑、铁刀、剑，铜洗、壶、货币等。随葬品的组合形式，自然也随时代不同略有变化[62]。

墓砖流行菱形花纹砖，亦见钱纹、星芒纹等。发现少量纪年文字砖，如"熹平年(172～177年)十二月造"、"延熙年(238～255年)造"、"咸宁四年(278年)大中大夫李"等。覆斗顶石室墓中有的有墨书铭记[63]，1993年发掘的安宁县小石庄唐代河东州刺史王仁求墓中，有墓志砖铭[64]。这些为确定墓葬年代、墓主身份提供了依据。

崖墓目前仅见于滇东北的6个县（市）。皆属东汉时期。墓室都是在岩石山陡坡上开凿的券顶洞室，有单室，前、后室，多室墓之分。墓门用石块封堵。墓道为明槽。随葬品与"梁堆"墓大体相同，惟陶俑少见，没有摇钱树和水塘水池模型。昭通小湾子崖墓群，是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清理崖墓21座[65]。

1989、1994、1995年三次发掘的个旧市黑蚂井东汉早期墓地，是这时期重要的竖穴土坑墓地，计清理墓葬13座，有的大墓带斜坡墓道，有木棺、椁。出随葬品300余件，其中胡人俑铜灯为珍品，挂酱黄釉的陶器系云南最早的釉陶[66]。

由于汉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农田水利事业有较大发展。水田水塘模型较多发现，其中有水塘通过涵洞与水田间的沟渠相通者，说明当时部分地区已结束了完全靠天降雨栽种的历史，开始筑坝、修塘灌溉农田，并已种植水稻[67]。

六　南诏、大理

南诏、大理国是748～1254年间，唐中叶至宋代云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五十年来，在12个县（市）的36个地点发现了这时期的考古遗存。包括城址、房屋建筑遗址、古塔、窑址、灰坑、火葬墓群和碑刻、佛教造像、经卷、纺织品等。发掘、勘探面积4239平方米，发现和出土文物3200余件。

据唐代樊绰《云南志》（又称《蛮书》）记载统计，当时云南城镇约70余座，但经考古调查可确认者不多，有大理市境内的太和城、阳苴咩城、大厘城、龙口城、龙尾城、三阳城；巍山县境内的𡸣𡺸山城、古城村城；洱源县境的德源城、三营古城；弥渡

县境的白崖城；腾冲县的西山坝城址。其中经勘探、实测者仅2座：太和城为南诏初期王都，1964、1997、1998年三次实测、勘察，为夯筑土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腾冲西山坝城址，1994年～1996年三次勘察，位于西山脚下缓坡地带，已探明小城近正方形，周长860米，面积4.6万平方米。小城外套一大城，面积25万余平方米。城中有道路，最宽者20米，路面铺火山石。城墙系夯筑土墙，现存最高者近3米，可见32层夯层，用圆形手夯夯筑。另外，城内、外还发现建筑遗址10处。此城规模宏大，当为南诏、大理国边陲重镇，也是云南保存最完好的唐、宋城址。

房屋建筑遗址，经过发掘者有巍山县巄屽山大平地[68]和南诏头天门1、2号遗址[69]，大理市白王洞遗址[70]。其中最重要的是1991～1993年发掘的巄屽山南诏头天门1号遗址，系一座寺庙建筑，平面呈正方形，壁用石块、砖混合砌成。基址前半铺地砖，后半筑一砖台，作供奉神像之用。遗址内出土红砂石雕刻的神像残骸100余件，有佛、菩萨、天王等头像及残断躯体，其造型具唐代风格。此为云南佛教造像重要发现之一。

70年代以来，在维修南诏、大理时期古塔——大理市三塔、弘圣寺塔、佛图塔及昆明市西寺塔时，都发现一些文物，以1978年、1979年维修大理三塔主塔——千寻塔时出土文物最多、最重要[71]。在这些古塔中，还出土了有纪年文字的器物及塔砖，为确定建塔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在调查、发掘这时期城址、房屋建筑遗址时，都发现了大量筒瓦、板瓦、瓦当、滴水、砖等建筑材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模印着文字的瓦——有字瓦，其文字如“政安二年（1055年）岁次乙未”、“官瓦”、“五年易酉造寺”等，对于研究白族古代文字，判定考古遗址的性质，补证南诏、大理纪年等均有重要价值。

南诏、大理时期大量的砖、瓦等建材在何处生产？怎样制造？史无明载。发现的三处砖瓦窑址，弥补了历史记载之遗缺。这三处窑址是：楚雄市车坪村窑，大理市下关天井村窑、苗圃山窑，尤以1996年发掘的下关苗圃山窑群最重要，计清理砖瓦窑18座。系在土山坡上挖洞为窑室，分烟孔、烟道、窑膛、火膛、挡火墙几部分，窑室外有排水沟。出土的烧制产品有砖、瓦。不少瓦上模印有文字，与南诏、大理时期城址、房屋建筑遗址中出土者同。如“官门肙”等字样，说明此窑可能是官窑。

南诏、大理时期盛行火葬。樊绰《云南志》曰：“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但目前考古发现，上限可确定为这一时期的火葬墓不多，仅10余处。其中经过发掘的有：曲靖珠街八塔台、大理大丰乐、昆明拓东路、晋宁兴隆庙、澄江小关庄火葬墓群。曲靖珠街八塔台出土火葬墓304座。墓坑均竖穴土坑，多圆形，亦有椭圆形、长方形者。葬具一般用陶火葬罐。其中Ⅰ型火葬罐敛口、双腹，罐盖有塔刹形钮，罐下置须弥座形器座，整体像一座“喇嘛塔”。Ⅱ型与Ⅰ型基本相同，惟腹外凸，下部饰半浮雕莲瓣纹，一般无座。Ⅰ、Ⅱ型火葬罐（外罐）里多置一

小罐（内罐）。未烧化的人骨大部分放内罐中，人骨上多点朱，或有朱书梵文，骨骸上下置海贝、料珠、铜片、纺织品等。外罐内则放长方铁片、稻谷及少量骨骸。出Ⅰ、Ⅱ型火葬罐的墓属南诏、大理时期[22]。

七　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的地下文化遗存，在42个县（市）发现99处，包括火葬墓、土葬墓（竖穴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城址、窑址、采冶遗址、水利灌溉渠道以及出土当时埋藏的印章、银锭、铜钱等。其中经发掘、清理者43处。发掘面积4718平方米。出土和收集文物1790余件，另有瓷片数万片。

火葬墓是主要遗存。元、明时期云南的居民，特别是白族和彝族，多沿袭南诏、大理的葬俗，行火葬。迄今在36个县（市），发现近50处这时期的火葬墓地，发现火葬墓数千座。滇西地区元代火葬墓，地表多立石质墓幢或冢石；明代盛行普通墓碑。碑、幢上一般刻有梵文和墓主称谓。墓坑有圆形和方形竖穴土坑，后者多用石板镶砌四壁，顶盖石板。滇东的火葬墓少见碑、幢。火葬墓的葬具多为陶火葬罐。元末至明代者发现不少青釉、青釉青花瓷火葬罐。随葬器物有陶俑、瓷瓶、贝币、金属片、钱币、铜镜、铜环、纺织品等。

明代从内地进入云南军屯、民屯、商屯的汉族不下数十万，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边疆的发展，同时引起了丧葬制度的变化，土葬开始与火葬并行。明代的土葬墓墓室分竖穴土坑、砖室、石室三种，后两种多有墓志。一般都有葬具——木棺。随葬品有金、银、铜、锡、陶、瓷器等。

烧制瓷器窑址的发现，标志着陶器生产技术的重大进展。目前发现有玉溪市元末明初的因冈山窑[23]、建水县元至清代的碗窑村窑[24]、禄丰县元末明初的白龙井窑和元至清代的罗川窑[25]。这些瓷窑均为半地下式龙窑，长25～40米不等。烧造的瓷器以青釉和青釉青花为主，亦见灰白釉、酱釉、绿釉。器形以碗、盘居多。玉溪、建水窑生产的青花玉壶春瓶曾流行云南。

近年来冶金考古也取得进展，发现有：东川市杨家尖子硐、月亮硐等明清时期采矿遗址[26]；个旧市冲子皮坡明末清初冶炼遗址，其炼炉用土坯筑成[27]；昌宁毕家大田宋末元初的冶铁炉系在陡坡上挖小洞，敷耐火泥构筑，非常原始。

80年代文物普查中，调查确定的几处少数民族土城，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城镇建筑、经济发展规模等都十分重要。主要有瑞丽县的广贺罕城址、潞西的果朗王城、陇川县的近允城址等，均为夯筑土城，绕城的护城壕、城门、道路、部分房屋建筑基址，均清晰可辨，时代均为明代。

大理五华楼出土的60余通元碑，是云南碑刻的重大发现。对补证元史和南诏、大理国史都有重要意义[23]。

云南最早的确凿的历史记载，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以后的史实。该传中追述之云南历史，可上溯至战国楚威王时遣将庄蹻入滇，并留王滇池之时，为公元前339～前329年间，此可作为云南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线。云南史前时代的历史，1949年前几乎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五十年的调查、发掘、研究，最主要的收获应当是：勾画出了从170万年至公元前339年，这样长达169万多年的云南人类史前历史的轮廓，使我们可以为祖国边疆有这样悠久的史前文化而自豪。

（执笔：王大道）

注 释

① 张兴永：《云南开远古猿的发现与研究》，《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②⑤ 吴汝康、徐庆华、陆庆五：《禄丰西瓦古猿和拉玛古猿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人类学学报》第5卷第1期，1986年2月。

③⑥⑧ 和志强主编、贾兰坡顾问：《元谋古猿》，云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5月。

④ 徐庆华：《云南早期人类祖先化石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12日第3版。

⑦ 张兴永、郑良、高峰：《中国古猿新属的建立及其人类学意义》，《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⑨ 保山塘子沟旧石器时代遗址，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的^{14}C年代测定为距今8000年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室1989年的^{14}C年代测定为距今6250±210年（公元前4300±215年），树轮较正年代为距今6895±225年。

⑩ 张兴永、周国兴：《元谋人及其文化》，《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⑪ 郑良：《江川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及意义》，《玉溪文博》第1期，1990年10月；张兴永、高峰、马波、侯丽萍：《云南江川百万年前旧石器遗存的初步研究》，《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⑫ 云南省博物馆、保山地区文管所、保山市博物馆联合发掘队：《塘子沟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保山史前考古》，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1月。

⑬ 耿德铭、刘晖、罗睿：《龙王塘旧石器遗址》，《保山史前考古》，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1月。

⑭㉒ 邱中郎、张银运、胡绍锦：《昆明呈贡龙潭山第2地点的人化石和旧石器》，《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⑮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90年9～11月发掘，出土标本3468件，其中人类牙齿39枚，旧石器1826件及动物化石1000余件。

⑯ 张兴永、郑良、杨烈昌、包震德：《蒙自人类化石及其文化》，《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⑰ 王洪甜：《玉溪地区文物概论》，《江川李家山青铜器》第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

⑱ 高峰：《景洪檀米妈囡洞穴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⑲㉓ 周国兴：《元谋盆地人类文化遗存研究》，《元谋古猿》，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5月。

⑳ 胡绍锦：《云南旧石器》，《元谋人发现三十周年纪念暨古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1月。

㉑ 卫奇、黄慰文、张兴永：《丽江木家桥新发现的旧石器》，《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㉔㉖ 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㉕ 葛季芳：《云南昭通闸心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60年5期。

㉖ 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1期。

㉗ 何金龙：《通海海东村贝丘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

㉘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麻栗坡小河洞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12期。

㉙ 宋兆麟：《云南景洪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11期。

㉚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1期。

㉛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㉜ 吴学明：《石佛洞新石器文化与沧源崖画关系探讨》，《云南文物》第25期，1989年6月。

㉝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3期。

㉞ 王大道：《大花石遗址墓地硕果累累——滇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19日。

㉟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维西戈登村新石器》，《云南文物》第18期，1985年12月。

㊲ 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1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9月；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9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9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管会、晋宁县文物管理所：《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6期。

㊳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张兴宁、王桂容、戴宗品、杨帆、康利宏：《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云南文物》第35期，1993年6月。

㊴㊾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年6期。

㊵ 同㊲、㊳。

㊶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元江洼垤打篙陡青铜时代墓地》，《文物》1992年7期。

㊷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期；大理州文管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云南文物》第15期，1984年6月。

㊸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3期。

㊹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

㊺ 云南省博物馆、昌宁县文化馆：《近年来云南昌宁出土青铜器》，《考古》1990年3期。

㊻ 王大道：《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

㊼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考古》1963年6期。

㊽ 王大道：《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金属农业生产工具》，《考古》1977年2期。

㊾ 肖明华：《青铜时代滇人的农牧业》，《农业考古》1997年1期。

50 汪宁生：《滇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晋宁石寨山文物研究之一》，《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

51 王大道、朱宝田：《云南青铜时代纺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

52 李伟卿：《云南古代的铜铸艺术》，《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

53 王大道：《云南出土青铜时代铸范及其铸造技术初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54 曹献民：《云南青铜器铸造技术》，《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何堂坤：《滇池地区几件青铜器的科学分析》，《文物》1985年4期。

55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9期。

56 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古学报》1979年4期。

57 李晓岑：《滇东北：中国冶金之发源地》，《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3期。

58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60 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2期。

61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关系》，《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代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

62 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编，1981年8月

63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

6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管会、安宁县文化局：《云南安宁县小石庄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6期。

6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博物馆、昭通地区文管所：《昭通小湾子崖墓发掘简报》，《云南文物》第33期，1992年9月。

66 朱云生：《个旧黑蚂井古墓群》，《云南文物》第42期，1996年1期。

67 肖明华：《陂池水田模型与东汉时期云南的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1期。

68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巍山县巄屽山南诏遗址的发掘》，《考古》1959年3期。

69 云南省博物馆巍山考古队：《巍山巄屽山南诏遗址91～93年度发掘综述》，《云南文物》第36期，1993年12月。

70 王大道：《大理市白王洞南诏、大理时期建筑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

71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2期。

72 王大道：《云南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发掘简报》，《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73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1986年1～3月发掘玉溪市囫囵山窑址，发现龙窑3座及窑具和大量瓷器残片。

74 张建农：《云南省建水县碗窑村古窑址调查》，《考古》1991年8期。

75 李康颖：《禄丰发现两处古代瓷窑》，《云南文物》第25期，1989年6月。

76 李天祐：《东川发现的古代采铜遗址调查》，《云南文物》第36期，1993年12月。

77 王大道、孙淑云、李延祥：《云南冲子皮坡冶炼遗址及炉渣分析》，《中原文物》1997年2期。

78 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史料价值初探》，《云南文物》第15期，1984年6月。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成果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48周年。在此之际，简要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西藏考古工作成果。

一 旧石器时代

迄今为止，西藏境内发现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点有8处。即：定日县的苏热[①]、申扎县的珠洛勒[②]、日土县的扎布[③]、藏北的多格则[④]和各听[⑤]地点、日土县的夏达错东北岸地点[⑥]、吉隆县的宗嘎乡哈东淌和却得淌地点[⑦]。这些全部是60年代以来发现的，其中一部分是地质工作者发现的，下面重点介绍二处地点。

（一）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旧石器地点位于阿里地区日土县夏达错（湖）东北岸，与湖距离约300米，高出湖面5～10米，海拔高度4400米。地表为粗砂土质，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有一定坡度，生长着稀疏的“甲鞭草”丛。该地貌属山脚湖滨坡地，其北侧100米处即为山体，通往县城方向的简易公路由西向东横穿坡地。

所获打制石器均为地表采集，采集范围约5000平方米。标本共92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废料（片）等。除1件标本为棕色硅质岩外，其余标本均为黑色或灰色的硅质岩原料。部分标本表面风化较甚，有水流冲磨痕迹。该地点石制品不仅数量较多，工具类型丰富，而且形制稳定，技术特征十分明显。从石核特征以及石片角普遍偏大的情况看，推测其技术主要采用的是斜向的直接锤击法，台面多为打击台面；石片有长、短之分，以长石片为多，第二步加工采用了多种修理技术；石器以单面修理为主、而砾石或石核石器则多见两面修理的交互加工及错向加工；石器中的刮削器、手斧、砍斫器、切割器等都较有特色。

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是一处以石片工具为主、砾石及石核工具占相当比例的打制石器遗存。其显著的石器工艺特征有别于迄今为止发现的西藏地区其他地点的旧石器遗存，也与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遗存不同，有较强的地域特征。尤其是该地点中手斧与

分布在南亚西北部的“索安文化”中的某些标本相似，这可能暗示着西藏西部地区与南亚西北部的某些石器时代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因而它们在年代上也可能较为接近。由此推测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代表西藏西部高原一种具有地域特征的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大致可早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二）宗嘎乡哈东淌旧石器地点位于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城之南哈东沟北侧，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条形平坎，属吉隆藏布河东岸的二级阶地，阶面高出河床 40 米。

采集的标本器形有砍砸器、砍斫器、刮削器，不见尖状器，其中砍砸器、砍斫器数量较多。石器中以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较少。加工方法，主要是直接打击法中的锤击法产生石片，半数石片有二次加工痕迹。另外，许多石器是利用扁平砾石直接打击边缘形成刃部而成。

吉隆盆地是沿中新世南北断裂的构造带形成的南宽北窄山间盆地，这里沉积了以河湖相为主的第三纪及第四纪地层，总厚度可达几百米。哈东淌旧石器地点位于吉隆盆地北部的二级阶地上，而这一阶地是由中更新世湖相沉积构成，从上至下是由土状亚砂土（厚 1 米）以及砾石（厚 4 米）、夹砾石的亚砂土组成，这与调查时所挖探沟剖面的叠压关系是基本吻合的。根据旧石器地点的地面特征及地层时代等因素综合分析，这批标本的大致年代可能属于地质时代的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新世，即相当于加布拉间冰期到珠穆朗玛冰期这个阶段。旧石器发现地点当时是一片湖滨平原。工具类型可以反映出这里当时气候较为温湿，树木茂密，原料所选的扁平砾石则是典型湖滨、湖相沉积的标志。所以可以推测早在距今数万年前便有人类生活在这里。

（三）宗嘎乡却得淌旧石器地点位于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北烈士墓地北侧，距县城 1 公里，属宗嘎乡。亦处于吉隆藏布河上游二级阶地，阶面高出现河床约 60 米，海拔约 4120 米左右。标本采集范围 1000 平方米。地表为砂砾地面，有稀疏的蒿草类植被。地面特征与哈东淌旧石器地点相同，属古湖滨平原，由于河流的下蚀而成为阶地。

共采集标本 11 件，包括石器、石片及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砾石、青灰色花岗岩及水成岩。标本种类包括砍砸器、切割器、刮削器、石片及有打制痕迹的砾石片，不见石核。石器多用砾石直接打制而成，不见石片石器。加工方法与哈东淌地点标本相同。所有标本均表面风化严重，无水流磨蚀及搬运痕迹，当为原生地点。

却得淌的标本与哈东淌地点的标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发现地貌形态亦与哈东淌一致，因而可以推测却得淌地点的旧石器年代范围也应属中、晚更新世。

二　新石器时代

在西藏，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有着广泛的分布，大体可分划分为三个

区域：

（一）西藏西部　这一区域大体指日喀则地区西部、阿里地区全部及那曲地区大部分地区。从1956年那曲发现第一个细石器采集点[9]开始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达数十处之多。分布在日喀则地区的吉隆、仲巴县，阿里地区的普兰、札达、噶尔、革吉县及那曲地区的申扎、双湖（办事处）、那曲、班戈县境内。

这些地点均为采集点，无地层发现。按采集的标本种类可分为：（1）单纯磨制石器地点一处，即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古格王国遗址"地点，仅发现1件磨制石斧[9]；（2）有陶片的细石器地点一处，为阿里地区的噶尔县丁仲珠孜地点[10]。该地点发现陶片共30片，均碎小，为夹砂、泥质陶，分红和黄褐两色，火候较高。部分陶片有几何花纹，还发现彩陶，其余为素面陶。仅能认出一件为带孔纺轮；（3）其余均为不含陶片、不含磨制石器的细石器地点。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不含陶片、不含磨制石器的细石器采集点，除细石器外，有些地点还含大型打制石器。这些地点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一处有陶片的细石器地点统称为"西藏西部细石器地点"。

西藏西部细石器地点中的大型打制石器占有一定数量。其中有石核、石片、石器。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器形有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等。细石器，属典型细石器。原料有燧石、火石、凝灰岩、碧玉和玉髓等。细石核有楔形石核、锥形石核、柱形石核、铅笔头形石核等。细石叶也很典型。细石器器形有刮削器、切割器、雕刻器等。

关于西藏西部细石器的年代，一般认为属新石器时代[11]。但根据标本制作技术的不同，遗存本身有着早、晚差别。其中，以日喀则仲巴县城北地点[12]为代表，细石核以短锥状石核和楔形石核为主，基本属于扁体石核范畴。而扁体石核代表着细石器工艺技术的原始类型，其时代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另外阿里地区日土县下曲垄地点[13]和日土县扎那曲加地点[14]等，也属细石器工艺技术的原始类型。另外以那曲地区申扎、双湖地点[15]为代表的细石器石核，包括扁体石核和圆体石核两种，其中以圆体石核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说明比仲巴县城北等地点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石叶的制造技术更趋成熟，因此时代也较晚。

西藏西部细石器遗存，特点十分明显。首先，除一处地点发现有陶片外，其余地点均无陶片，属"无陶片新石器遗存"。有人认为，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游猎或游牧活动，流动性大，陶器等大型用具不易携带。其次。分布的海拔高度平均在4500米以上，最高处可达5200米。在西藏如此海拔高度只能从事游牧，而不适合农业。第三，所有地点均无地层，标本全部暴露在地表。

西藏西部细石器遗存和西藏其他地区细石器一样均属于学者们划分的"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该传统起源于中国华北的旧石器晚期，因此认为其受了华北细石器的影响。还有人认为，西藏细石器是从西藏旧石器晚期发展而来的。

（二）西藏中部 主要指拉萨市及山南地区和林芝地区。

1. 曲贡遗址及曲贡文化[16] 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市北郊5公里的曲贡村附近，海拔3685米。1984年发现并试掘，1990年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主要遗迹为灰坑，个别灰坑内还出土人头骨。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为石器、骨器、陶器和铜器。石器为大型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磨制石器，大型打制石器数量较多，在许多石器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铜器仅1件，为青铜镞。陶器为夹砂、泥质两种，分黑、褐等色，大部分器表磨光，其中磨光黑陶十分精美；纹饰有刻划纹、压印纹、锥刺纹、附加堆纹、镂空等，纹样以几何形为主，其中重菱纹最具特色；器形以罐、钵、豆为主，多单耳、双耳器，器底多圜底，亦有圈足，还发现猴首、鸟首陶塑。该遗址年代经^{14}C测定，校正年代为B.C.1750～B.C.1500年之间。

和曲贡遗址相同的遗存，还有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德龙查遗址[17]、山南地区琼结县邦嘎遗址[18]和贡嘎县昌果沟遗址[19]。其中昌果沟遗址在1996年还出土过1000多粒青稞。上述遗存，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部，因文化面貌独特，特命名为曲贡文化。

曲贡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为青稞，饲养的家禽有牦牛、羊、狗等。狩猎业也很发达。发掘者认为曲贡遗址的灰坑中有人头骨，为“人祭坑”与“祈求丰产或报祭地母有关”。曲贡文化的人们有在石头上“涂红”的习惯，对猴、鸟等崇拜。青铜镞经鉴定为冶铸，表明曲贡文化已跨进青铜时代的门坎。

2. 林芝地区新石器遗存 主要分布在林芝地区的林芝、墨脱两县境内。林芝县的遗址和地点有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20]，墨脱县的遗址和地点有马尼翁[21]、卡布村、墨脱村、格林村、地东村、西让村[22]。上述遗存主要是70年代发现的，到了9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又在墨脱县征集到一批磨制石器[23]。

采集的标本有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片。其中磨制石器多为长条形斧、锛、凿等，制作精美。陶片以夹砂为主，多红色，亦有磨光黑陶；纹饰有刻划纹、绳纹等；器形有罐、钵、盖（盘）等，均平底，多有器耳，还发现1件陶片似鬶流。

林芝地区新石器遗存，同属一种文化遗存。磨光黑陶和鬶流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中亦有发现。齐家文化^{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下限更晚。因此上述遗存年代约晚于齐家文化。

林芝地区新石器考古遗存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和雅鲁藏布江中游曲贡文化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夹砂陶、磨光黑陶、刻划纹等。和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卡若文化相比亦有一定相似之处，如：磨制石器的条形石斧等，夹砂陶、刻划纹以及平底器等。上述三个地区的新石器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和研究。

（三）西藏东部 主要是位于昌都地区澜沧江上游的卡若遗址及卡若文化。

卡若遗址及卡若文化 卡若遗址[24]位于昌都地区昌都县城东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

西，海拔约3200米。1977年发现，1978年、1979年进行两次发掘。这是西藏境内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收获丰富，对研究西藏高原原始文化意义重大。

发掘得知，房屋为红烧土和石墙房屋，分圜底、半地穴、地面三种类型，可能出现半地穴楼屋。面积一般在10～30平方米之间，最大一间双室房屋近70平方米。出土遗物有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器等，以大型打制石器数量最多。细石器属典型“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磨制石器制作精制，其中以条形石斧、石锛等最具特色。骨器有锥、镶嵌细石叶的刀梗，以及精制的骨针等。陶质为夹砂，纹饰以刻划纹、锥刺纹、附加堆纹为主，发现少量黑色彩绘，花纹多几何形；器形以罐、盆、碗为组合，均小平底，流、耳不发达。还出土了许多炭化粟米及大量动物骨骼。

年代经^{14}C测定，校正年代约为B.C.3000～B.C.2000年左右，分早晚两期。早期，红烧土房屋，分圜底、半地穴、地面房屋三种。磨制石器和晚期相比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其中陶器的刻划纹和黑色彩绘以及单耳罐、带流罐等均不见于晚期。晚期，石墙房屋，为半地穴一种类型，可能出现半地穴楼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早期相比明显增多。

卡若遗址的发掘反映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农作物为粟米。家畜只发现猪一种，狩猎业也很发达。遗址附近鱼类资源丰富，但未发现捕鱼工具及鱼骨等，表明当时的卡若人可能不食鱼。

和卡若遗址相同的还有昌都县的烟多遗址[⑤]和小恩达遗址[⑥]，可以命名为卡若文化。

卡若文化分布于澜沧江上游、青藏高原的东部——横断山脉中。北面与黄河中上游甘肃地区、南面与云南澜沧江中下游相连。多数研究者认为：卡若文化与上述两地区原始文化虽有较大的区别，但仍可看出其千丝万缕的关系，如红烧土房屋、条形石斧彩陶等，特别是农作物粟米和人工饲养的猪等。

三　吐蕃时期

吐蕃时期大体分为吐蕃王朝以前和吐蕃王朝两个阶段。吐蕃王朝以前阶段，大体从传说中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开始，到第三十一代赞普朗日松赞为止，时代当约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29年，历时700余年。这一阶段的吐蕃社会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

吐蕃王朝阶段，即从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开始，到第四十一代赞普朗达玛灭亡为止，时间从公元629年到公元842年，历时214年。这一阶段当属奴隶制阶段。

西藏境内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十分丰富，其中主要为两部分：（一）大石遗迹；（二）墓葬。

（一）大石遗迹　泛指用巨大的柱石或石块构筑成的各种遗存，其中有平面呈圆形或其他图形的石围圈、独立的柱石、成排的列石等。其分布主要在西藏西部和中部广大

地区。

大石遗迹在建国以前就有发现，发现者主要是外国藏学家及旅游者等。建国以后，特别是近些年亦有发现。其中主要遗迹有：昂仁县石圈遗迹[27]、措美县“拉萨朵仁”祭祀遗迹[28]、双湖帕度湖石坛遗迹[29]、浪卡子县列石遗迹[30]、普兰县列石遗迹[31]等。昂仁县石圈遗迹和措美县“拉萨朵仁”祭祀遗迹，都是以石块和巨大的柱石构成石圈。昂仁县石圈面积宏大，南北长850、东西宽450米，平面呈不规则形，在遗迹西北角有一“凸”字形祭坛，残高0.2～1米，最长边35米。“拉萨朵仁”祭祀遗迹由内外两个同心圆石圈组成。外圈直径36米。内圈中心有一柱石，高1.9、直径0.2米，在柱石附近还有一长方形平台和两个圆形石堆。浪卡子县列石遗迹和普兰县列石遗迹，前者位于羊卓雍湖南岸，后者位于孔雀河西岸。浪卡子列石由大小不等的大石构成，共排成两排，其中体积最大者边长约2、高1～2米，附近放置有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等。普兰县列石共一排三块，为天然条形柱石，高半人左右。

大石遗迹的性质，有人认为“可能包括两种性质不同的建筑遗存，一种是与高原古代游牧民族的墓葬有关，另一种则主要是与宗教祭祀有关”，还有人则进一步认为与苯教信仰有关。

大石遗迹的年代，目前还很难做出较准确的判断。有人认为“其时代可能为吐蕃（王朝）时期之前，它们代表着公元7世纪之前活动于西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原始文化”[32]。还有人认为“其时代可能早于吐蕃时期，而下限已进入吐蕃时期”[33]。另外，有传说措美县“拉萨朵仁”祭祀遗迹是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准备在此建都时的奠基遗址。如果此种传说可信，应为吐蕃王朝初期。还有大石遗迹中的石围圈在朗县列山墓地中亦有发现，该墓地的年代为吐蕃王朝时期[34]。

（二）墓葬　吐蕃时期墓葬的大量发现是建国以来西藏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共计260多处墓地，数千座墓葬。可分五种类型。

1. 香皮类型　分布在西藏东部。目前仅发现1处墓地，即贡觉县香皮墓地[35]。从发掘得知，墓穴为土坑竖穴，葬具为石板棺和积石棺（以石块筑）两种，长度1米左右，仅能容身。其中石板棺有棺盖无底板，有的有头箱。葬式只发现仰身屈肢一种。随葬品陶器以罐为主，有单耳、双耳、“安佛拉式”罐等，个别罐口部俯视呈菱形，多小平底，亦发现有高圈足；陶质为夹砂、泥质两种，器表磨光，颜色为灰色。还出土青铜小刀。墓内还发现鸡、马骨骼。

2. 杜布类型　分布在西藏中部林芝地区。典型墓地有杜布墓地[36]，另外红光二队墓地和林芝五处墓地[37]可能也属于这一类型。

该类型墓地有的有封土，有的无封土，封土形状为梯形和圆形。墓穴为土坑竖穴，葬具为石板棺和积石棺两种，均有盖板无底板，长度一般2米以上，最小的亦1.55米。

葬式为仰身直肢。还发现夫妻合葬。随葬品有陶器、磨制石器。磨制石器为条形斧、锛。陶器器形为罐、钵、壶，器耳不发达，底为接近圜底的小平底，陶质为夹砂灰陶。还出土动物骨骼。

3. 涅荣—夏拉木类型　这一类型主要发现于山南地区隆子县境内列表乡和斗玉乡夏拉木等地的几处石棺葬墓地[38]。属于此类型的可能还包括山南地区扎囊县结色沟墓群[39]。

特点是封土为梯形，葬具为石板棺和积石棺。结色沟一积室墓还分主室、后室、耳室。石板棺长度仅能容身，约1米许。一座积石棺（亦可称石室）长度在2米以上。葬式有二次葬，还发现一例不见人头的遗骨[40]。随葬品有磨制石器、陶器。磨制石器为条形石斧等。陶器器形有罐、壶、豆等，其中细颈双口球形壶和豆形杯、豆形罐等最具特色，器底为圜底、高足两种，纹饰中重菱纹引人注目。

4. 曲贡类型　分布在西藏中部，以拉萨北郊曲贡墓地[41]为代表。

墓地未见封土，墓穴均为土坑竖穴，葬具为积石棺（有报告称“石室”），分长方条形和方形两种，长度1.2～2.02米，有的还有墓道、甬道。葬具有的以石块封顶，个别为穹窿顶，未见人工铺底。葬式为侧身屈肢，有二次葬。还发现主墓前有祭祀台。随葬品不多，为陶器、铜器、铁器。陶器器形有罐、钵、杯等，多器耳，底部以圜底为主。出土1面带柄青铜镜，素面，柄为铁质。

5. 普努沟类型　在西藏境内有广泛分布，其中主要以拉萨市和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最为集中。

墓地分大、中、小型三种，多为封土墓。封土形状有梯形、方形、圆形、塔形、亚字形（朗县列山墓地[42]）、三角形、平形四边形（安多芒森墓地[43]）等，其中梯形封土墓最多，也最有特点。大中型墓封土多在表面有夯土围墙，中型墓封土多为石头堆成，有的用石头砌成方框，即为封土。墓穴为土坑竖穴。葬具为石板棺或积石棺（也可称“石室”），均以石板或石块封顶，除少数底部铺垫阿嘎土外（朗县列山墓地[44]），很少处理底部。葬具一般长度在1米左右。葬式主要是屈肢葬和火化后的二次葬。除单人葬外，还发现双人、三人合葬。在昂仁县布玛村发现一座七人合葬墓[45]。

随葬品不丰富，主要有磨制石器、陶器、铜器、铁器、木器（漆器）以及青稞、荞麦等，还有各种动物骨骼。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以罐为主，球形腹（鼓腹）、圜底最具特色。大型墓前有祭祀坑和殉马坑。祭祀动物为牛、羊、犬、马等。在措美县“拉萨朵仁”祭祀坛遗址西侧墓地发现两个人祭坑[46]。在朗县列山墓地[47]和措美县“拉萨朵仁”遗址[48]还发现大型石围圈祭祀遗迹。此外还在许多大、中型墓地中发现房屋遗迹。在琼结县藏王墓地[49]和昂仁县布玛村墓地[50]中还遗有石狮及藏文石碑。

吐蕃时期五种类型墓葬的年代：香皮类型、杜布类型、涅荣—夏拉木类型和曲贡类

型可能有早晚差别，但大体为吐蕃王朝以前的吐蕃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29年之间。普努沟类型为吐蕃王朝时期，即公元629年到公元842年之间。

四 古格王国时期

古格王国是公元10～17世纪西藏西部的一个方国，首都札布兰。古格王国的大体位置在现今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噶尔县、日土县等地。据藏文史料记载：公元9世纪西藏吐蕃王朝灭亡，吐蕃赞普的后裔吉得尼玛衮因内部之争被迫逃往阿里，与当地土王女儿结婚。吉得尼玛衮有三个儿子，其中幼子德尊衮封为古格王，此时为公元10世纪中叶。

又根据西方早期传教士的文献，到了公元17世纪，也就是古格王国末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人安东里奥德·安得拉德，翻越喜玛拉雅山脉到达古格首都札布兰。安德拉德通过极大的努力取得国王和王室支持，传教义、建教堂、发展教徒，引起佛教僧侣和民众的强烈不满。1630年，国王得病，安德拉德又奉命离开札布兰。此时，古格佛教集团借此发起暴动，当时一些地方官和老百姓也投入了战斗，并请求邻国拉达克支持。拉达克王立即派兵，包围古格王宫于山下。国王率军固守月余，最后暴动的僧侣和拉达克军队将国王诱骗出来，俘虏了他，后押解他到拉达克首府。至此古格王国灭亡，札布兰被拉达克占领，至少到了1682年前，拉达克军队才被西藏军队驱逐出境。

50年代，我国电影工作者首次对古格都城札布兰遗址进行过拍摄。1961年，国务院将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古格王国遗址。古格王国的考古工作应该是从70年代开始，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有：1978年，西藏文管会和新疆博物馆派出专门人员对古格王国都城进行调查。1985年，西藏文管会又组织专门人员对古格都城，以及托林寺、多乡城堡等一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了考古学调查。获得了丰富的资料。此次是迄今为止对古格遗存收获最大，科学性最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学调查。并出版了《古格故城》一书。1992～1998年，西藏文管会等单位又多次组织人员，对阿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和复查。并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大批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东嘎—皮央遗址了。除此之外还对部分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

已经发现的古格王国遗存有古格王国都城遗址、托林寺及托林遗址、多乡城堡遗址、玛那寺及玛那寺遗址、卡尔普遗址、达巴遗址、麦龙沟庙遗址、东嘎遗址、皮央遗址、香孜遗址、江当遗址及桑丹达吉林寺等，全部分布在今札达县境内。

下面我们就近年来发现的东嘎遗址和皮央遗址进行介绍。

东嘎遗址，分布在东嘎村北面断崖上，现存洞窟约200座，其中几座洞窟绘有精美壁画。在遗址南面的台地坡麓上，还坐落着一大片佛寺与塔林废墟。可见这里是一处石窟与寺院合为一体的庞大遗址群。

皮央遗址，位于东嘎遗址以北约2公里处。也是一处由石窟、寺院、城堡与塔林组成的大型遗址群。其中石窟分布在山前与山后。当地传说这里石窟的数量是“前山一千，后山一千”，实际调查统计的数字约近1000座。由于年代久远，许多石窟早已坍毁无存，没有统计在内。如果加上这一部分石窟，与传说中的石窟规模相差无几。总体规模超过东嘎。

东嘎石窟、皮央石窟，是西藏迄今为止发现的两处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据初步观察分析，石窟的类型包括供佛礼拜的礼佛窟、修行起居的僧房窟、堆放杂物的仓库窟以及安置高僧遗骨的精美灵塔窟等。其中，礼佛窟中残存着大量精美的壁画。壁画中供养人的形象最吸引人们注意。供养人，即出资开凿石窟以宣扬佛法、同时也为自己留记功德的人物。由于他们是俗人，都身穿俗装，所以当画师们将他们画在壁画中时，也就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活生生的人物“写真”。供养人被画在窟内门道两侧或窟壁的下方不太显眼的位置上，通常是高僧正在说法，供养人正在听法礼佛，面向高僧侧坐，表情庄重而虔诚。如在东嘎第1地点第1、2号窟，皮央第79、第351窟中，都可见到这样的场面。这些供养人的服装，有非常明显的特点。无论男女，都穿着一种带有三角形大翻领，袖长过手，衣领及衣边、袖边上镶宽边或者饰有图案的长袍。男子头上常戴一顶宽沿帽或扎头巾；而女子则多梳发辫，分为数股盘绕在头顶，上面再佩以头饰。

东嘎、皮央遗址中规模最大、壁画最为精美的东嘎第一地点第1、2号窟内的壁画，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世界。在各佛教题材中，除了表情庄严的各类佛像外，出现最多的是各种菩萨像，有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各种供养菩萨。还有各种女神像，一类为供养天女，包括供香天女、供花天女、散花天女、善舞天女等；还有一类为各种度母、佛母。这几类女神像造型生动、变化丰富，是西部石窟壁画中精美的部分，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她们的服饰特点基本相似，通常都是头戴花冠或宝冠，耳饰大环，佩带有项饰、臂钏、手镯、足镯等饰物，肩披条帛，天衣飘飞，上身或全身赤裸，手结各式手印或持法器。在画法上，画匠们采用富有弹性的线条勾勒其轮廓，用具有明暗变化的晕染法突出其丰富的女性体态，塑造出一个个艳丽照人的“壁上美人”。飞天是东嘎石窟壁画中最为生动活泼的“小天使”。壁画中还描绘了大量的动物与植物，其中动物有龙、凤、狮、羊、牛、马、鸭、鹿、象等不同的种类。有些动物并不是阿里高原物种，还有一些动物则属于佛教中的神话动物，如孔雀、摩羯鱼、龙鱼等，形象夸张多变，显然是来自其他文化。动物图案流行“对兽”构图形式，如双龙、四龙缠绕、双鹿对鸣、双凤对立等；此外还有复合式的五鹿相环绕、八凤相环绕、一虎逐三羊、一狮逐二羊等。这些图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植物图案中以树木为主，其他有花草、果物等。花草中除了具有佛教特殊意义的莲花之外，在装饰性的图案中比较多见忍冬纹、卷草纹以及缠枝莲等。这些千变万化的花草树木，几乎把石窟的每一个空白都装点得流光溢彩。

今天传存下来的汉藏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关于东嘎、皮央的任何记载，几百年来，它们静静地坐落在荒漠土林之中。幸好我们找到一部流传在印度的藏文手抄本《古格、普兰王国史》，其中记载皮央寺是古格仁钦桑布时期所建的早期八大寺之一，始建于公元 10 世纪，70 年后又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建。而东嘎在古格国王意希沃时代也开始有了建寺的历史。据说最早由意希沃的妹妹在这里建过一座僧尼院，大约在公元 12 世纪，由于古格王国内部的一次分裂斗争，这里曾经一度成为与札布兰相对峙的另一个王宫所在地，直到后来古格王国复归统一，才丧失了其作为宫廷的地位，但却仍然是古格王国所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公元 15 世纪以后，格鲁派宗喀巴的弟于阿旺札巴曾在东嘎寺作过住持，古格王室的婚礼也曾在此举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东嘎、皮央具有与札布兰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些记载和传说可信程度有多大，需要进一步考证。

五 岩 画

西藏境内，大批岩画地点的发现是近十几年文物普查和有关人员发现的成果。主要地点有：阿里地区日土、革吉、改则、札达县多处地点[51]；那曲地区文部、申札、班戈、那曲、索县多处地点[52]，日喀则地区定日县的两处地点[53]；拉萨市当雄县纳木错湖几处地点[54]，山南地区贡嘎县一处地点[55]，林芝地区墨脱县多处地点和昌都地区八宿县一处地点[56]等，共计近 60 处地点。

岩画分布：(1)岩壁上，即在野外岩壁上，距地面高度 1～10 余米不等，最高 20 米；(2)大石上，即在旷野巨大的石头上；(3)崖荫内，也称岩厦内，即指山体或岩石垂直面向内凹进形成一个“顶部”的自然形态；(4)洞穴内。

岩画的制作方法有：(1)敲琢法，即用尖硬的金属工具或石质工具在岩石上反复敲琢形成点状或条状的凹坑，形似“麻点”。这些麻点多在 0.2～0.5 厘米之间，深 0.1～0.2 厘米。敲琢的图形有两种，一种是“以线造形”，一种“以面造形”，即通体敲琢；(2)线刻法，就是用金属工具在岩石上凿刻出深浅不同的线条，线条横断面呈“V”形沟状，并由线条组成图案；(3)磨刻法，先在岩石上凿刻出物体的线条轮廓，然后在表现轮廓的线条内用石质工具或金属工具反复磨刻，使线条更加准确、印痕更深；(4)磨砺法，这种方法十分少见，可能是在通体敲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先在岩石上敲琢出整体轮廓，然后在轮廓内反复磨砺，使之与岩面形成凹凸相衬的图象；(5)平涂法，在岩石上用颜料均匀地涂绘出物体整体形象；(6)线涂法，用单色线条描绘图象，类似“白描”。前面四种应为岩刻，后面两种可称为标准岩画。平涂法和线涂法所用的工具，可能是牛羊的毛等，也可能使用了某种“硬笔”。颜料仍以矿物颜料为主。

西藏岩画的题材和内容主要是：(1)狩猎。有猎人和弓、弩、长杆、长刀、套索等狩猎工

具,同时还有猎鹰、猎狗、马等。猎物有:野牦牛、羚羊、岩羊、野山羊、野驴、鹿以及鸟类。岩画表现狩猎的形式有骑马追猎、围猎、徒手擒获猎物等场面;(2)畜牧。家禽除马、狗、鹰等外,主要的是牦牛、羊等,可能还有鹿。反映放牧形式的岩画很多,如日土县塔康巴地点,人们牵赶着牲畜随部落迁徙;加林山地点,骑马牧人对牦牛实行“领牧”;革吉县盐湖地点,骑马牧人在牛群间的“散牧”;日土县那布龙地点中的“赶牧”等。还有的地点有牧人住的帐篷、圈养牲畜的栅栏等;(3)战争及演武。岩画中多武士形象,如两两相对,骑马相峙,手持盾牌、刀、长矛等,有的对刺。武士有的头戴头盔、身着铠甲、身穿长袍等;(4)神灵、宗教崇拜。崇拜的对象很多如,日、月、星及植物等,“雍仲”(卐)、神鱼、性器官等,还有巫师、佛塔、法器等。反映神灵、宗教崇拜的场面也很多,如祭祀、拜佛等;(5)动物。除前面提到的猎物或家畜外还有许多的动物岩画。如虎(或豹)、鹰、骆驼、野猪、驴、鱼等。(6)其他内容。如舞蹈、部族迁徙等场面,还有居所、土地、道路、建筑物等设施,以及“田”、“口”、圆圈等图形。西藏岩画的年代有人主张分为早、中、晚三期[32]。

早期:“大体相当于西藏青铜时代的前期,即主要属于公元前的遗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吐蕃以前的时期。这一时期岩画,属形成期。主要分布在西藏西部(即藏西、藏北等)大半个区域。也是西藏岩画的主要分布区。

中期:“大致相当于西藏的青铜时代晚期至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相当于吐蕃早期。属发展期。分布地域,仍以西部为主,但开始向中部、东部和藏南谷地扩展。

晚期:“其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7世纪至近代”。即吐蕃王朝至以后时期。这时佛教已进入西藏高原。

以上是建国以来半个世纪西藏考古工作的成果,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建国以来,西藏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西藏自己做的——因为西藏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讲,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西藏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西藏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西藏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同在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探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所有这些,西藏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最后我还要说明:本文的写作,还得到了我的汉族兄弟,与我们共同在西藏并肩战斗过14年的侯石柱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执笔:更堆)

注释

①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 第四纪地质》105~109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

②⑮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6期。

③④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考古》1986年4期。

⑤黄慰文等:《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第7卷第1期,1988年2月。

⑥⑩⑬⑭西藏自治区文管会:《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⑦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⑧邱中郎:《青藏高原细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卷第2、3期合刊157~163页,1958年。

⑨1981年,《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卢小飞提供资料。

⑪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⑫李永宪:《仲巴县细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285页,文物出版社。

⑯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5年9期;1988年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曲贡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91年10期。

⑰达嘎、仵君魁:《堆龙德庆县德龙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302页,文物出版社。

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琼结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6年。

⑲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⑳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5期。

㉑新安:《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器》,《考古》1978年5期。

㉒姚兆麟等:《西藏墨脱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2期。

㉓陈建彬:《墨脱县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299页,文物出版社。

㉔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㉕㉖㉝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

㉗李永宪、霍巍、尼玛:《昂仁县文物志》28~3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㉘何强:《"拉萨朵仁"吐蕃祭坛与墓葬的调查及分析》,《文物》1995年1期。

㉙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㉚何强:《西藏浪卡子县大石遗迹简报》(待刊)。

㉛1996年赴阿里调查资料,侯石柱提供。

㉜李永宪:《西藏原始文化艺术》259~26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㉞㊷㊸㊼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调查和试掘》,《文物》1985年9期。

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皮石棺葬》,《文物与考古》1989年6期。

㊱旺堆次仁:《杜布石棺葬试掘》,《西藏科技报》1988年12月16日;丹扎:《林芝都普(杜布)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西藏研究》1990年4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林芝县多布(杜布)石棺墓清理简报》,《考古》1994年7期。

㊲同㉙,第四章第二节。

㊳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94年7期。

㊴㊵ 西藏山南地区文管会：《西藏扎囊县结色沟墓葬调查简报》，《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1991年10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5年9期；1988年西藏文管会调查资料。

㊸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藏北石棺葬调查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

㊺㊿ 霍巍：《昂仁县布玛村古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297～298页，文物出版社。

㊻㊽ 索朗旺堆、何强：《措美县"拉萨朵仁"祭坛遗址及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304页，文物出版社。

㊾ 同㉕，第四章第四节。

51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2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4年李永宪等人在札达县调查资料。

52 53 56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岩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54 郭周虎、次旦格列：《当雄县纳木错湖札西岛岩画》，《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310页，文物出版社。

55 索朗旺堆、何强：《贡嘎县昌果乡多吉札岩画》，《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309页，文物出版社。

57 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229～2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地处长江与长城、中原与西北的枢纽地带，同时又是欧亚大陆草原文化东进南下的重要通道。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她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在这里实现了周乃至秦的统一。长期的历史积淀，给陕西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因此，这块土地也一直备受史学界及考古界关注。

陕西境内的考古活动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期，早在1906～1910年间，日本人足立喜六即对西安秦汉隋唐城址和皇帝陵进行过调查；1914年，法国人色伽兰（V.Seglrn）对陕西等地的古建筑及崖墓进行过调查；1923年，对中国考古界最有影响的考古学家、瑞典人安特生（J.G.Andensson）调查了西安附近的古遗址；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也于1924年来西安讲学，当时他也曾计划“去陕西做点考古调查工作”，后因“河南和陕西遍地不靖”而未能成行。

进入本世纪30年代，由于殷墟发掘中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动摇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夷夏东西说”，并多将夏周看成一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日益危急，知识界更加重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夏、周、秦三族的起源与关系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北平研究院于1933年派徐炳昶、常惠到陕西从事周秦二族史迹的调査，苏秉琦最终选定宝鸡斗鸡台作进一步的发掘，这是陕西境内现代田野考古工作的开端。陕西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她从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陕西作为西北经济建设的重点，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也如同当时的经济建设一样，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考古训练班等先后往陕西派遣考古队站，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实习。

五十年来，我省的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学术研究水平逐年提高，目前正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已发现旧石器时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古代遗存、遗址有3万多处。经试掘或发掘，出土遗物数以万件。在加强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我们一直注意资料的研究与出版工作，累计已出版的考古报告与专著

多达20余部，论文集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与考古简报近千余篇，《考古与文物》已出版110期、《文博》已出版88期。大量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的发表，提出并解决了不少重要学术问题，推动了陕西考古工作的发展，其中一些工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陕西区域考古的范围，为全国乃至世界所瞩目。

陕西史前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经过多年的努力，不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为陕西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我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与研究工作起步虽晚，但成绩却很显著。80年代初，在对梁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其石器中既有“匼河—丁村系”的特征，又有华南一些文化的特征，梁山文化这种南北混合的特点，使人们第一次对地处南北自然地理交汇地带的远古文化有了认识。大荔人是我国古人类化石中保存最完好的头骨化石之一，发现于1978年，据研究，其特征与北京猿人接近，基本上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铀系法测年约在距今23～18万年间，应属中更新世晚期。1986～1987年，在大荔人化石点进行了大量考古工作，获得了大批以小型石片器为主的实物资料，将这一研究引向了深人。大荔人文化，在时间上填补了我国中更新世旧石器文化的空白，空间上又是东西小石器文化的中间地带，对研究小石器文化有重要意义，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乃至东亚古人类研究的空白。

1977年发现洛南人牙齿化石，与和县人、郧县人或爪哇人相近，属直立人的范畴，这是秦岭南麓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1995～1997年，在陕西东南秦岭山区的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和龙牙洞遗址进行的调查和发掘，共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地点43处，石制品35000余件，遗址中无论是石器，还是动物化石，都有明显的南、北特征，是旧石器时代文化交汇点的又一佐证。这项成果填补了秦岭山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项发现已荣列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陕西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成绩尤为突出，目前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为周边地区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参照体系。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50年代末发现的老官台文化、白家文化，还发掘了渭南北刘、商县紫荆等遗址。北刘类型中发现我国最早的彩陶。这一类型的^{14}C年代测定数据经树轮校正后为距今8000～7300年。老官台文化的晚期以北首岭下层为代表，称为北首岭类型，^{14}C测定年代为距今7000年左右。这一类型中孕育着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许多因素，是新石器早期文化向仰韶文化的过渡。1960～1961年，对李家村遗址的两次发掘，得到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高度评价；进入8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建的汉水、安康两个考古发掘队又先后在何家湾、龙岗寺、白马石、马家营、阮家坝等遗址发现了“李家村类型”的文化遗存，马家营遗址还第一次发现这类遗存的彩陶，阮家坝遗址发

现了这类遗存的早晚地层依据，龙岗寺发现了它的最晚期单位。这些发现使李家村类型遗存的研究走向深入，为探索汉水上游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宝贵线索。1995～1996年，在配合临渭高速公路建设中发现的“零口遗存”更加推进了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引起了专家们的普遍关注。该遗存以环形口小平底瓶、直口假圈足钵、敛口深腹钵等为代表，在层位上处于半坡前类型之下。目前可以确定该遗存是处于前仰韶到仰韶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遗存，与晋西南地区的同类遗存遥相呼应，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陕西仰韶文化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就有长武下孟村、西乡何家湾、南郑龙岗寺、宝鸡福临堡、铜川瓦窑沟、临潼姜寨、渭南史家、岐山王家嘴等遗址。仰韶文化的时空构架得以确立。1997年，在配合渭潼公路建设的考古项目中，对著名的泉护村遗址进行了自5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成排分布的地穴，延续数百米，个别地穴底部发现有灶坑。这给目前认识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输入了新的“血液”。另外，在这一遗址灰坑中还发现了炭化稻米，第一次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稻米实物的发现推广到了黄河流域，这对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龙山时代陕西诸考古文化的研究，虽然没有仰韶文化研究深刻、广泛，但也揭示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康家遗址有规则的聚落布局和成排成列的房子，反映了当时家族生活的缩影，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聚族而居到分族（家）而居的活生生的印证，对探讨国家的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96年在神木新华遗址发现了龙山晚期—夏代的文化遗存，其陶器特征上不仅显示出北方长城沿线的风格，还表现出了与关中、晋西等地同期遗存的关系，为陕西特别是陕北晋西地区龙山晚期及夏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进入夏商周时代，陕西的青铜文化以其雄浑凝重、古奥神秘的风采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陕西境内的夏文化遗址较少，一直是陕西考古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可喜的是，1997年在商洛东龙山发现了一处面积可达30万平方米的夏商文化遗址。经过1997～1998年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灰坑与墓葬，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器。其陶器面貌总体上与二里头遗址大体一致，但也呈现出一些地方特点。这一发现为研究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及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该遗址还包含有商代二里岗时期的遗存，陶器面貌与郑州二里岗遗址相同或相近。这反映出商文化占据伊洛平原后迅速西进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发掘的耀县北村商代遗址，揭示出商文化在渭河北岸的西进过程。到目前为止，已知陕西境内的商文化往西可以到达周原一线，在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洋东、西安老牛坡、周至豆村、礼泉朱马嘴、扶风益家堡、白家

窑、岐山王家嘴等地点，还发现了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商文化遗存，其地方性特点已较二里岗时期更为明显。陕西境内商文化的分布、时代、西进与东退的过程，到目前已大体勾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与商文化同时并存于关中西部的乳状袋足鬲遗存是一支陕西土著文化，它向西可以达到渭水上游，在泾水流域也有广泛的分布。刘家墓地的发现，对这支文化的研究曾经带来一个高涨的时期。

与此相关连的是先周文化重大课题的研究。在沣东、扶风北吕、凤翔西村、长武碾子坡、扶风益家堡、武功岸底、麟游蔡家河等地进行发掘，不断地将先周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1996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第六课题——武王伐纣年代研究，其中，在岐山王家嘴与武功郑家坡的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先周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家嘴的发掘显示出商文化的消退、先周文化的出现与壮大过程；郑家坡的发现对这一类遗存的分期及年代研究起到了深化的作用。发掘中采集到一批^{14}C样品，相信会为“断代工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继60年代、70年代在周原的发掘，不但为先周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给西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合作在周原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大批青铜器特别是带长篇铭文的青铜器的出土、甲骨文的发现、大型建筑基址的揭露等等，将西周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镐京遗址五号宫殿遗址的发掘，弥补了沣镐建筑方面的不足。

在陕北地区，李家崖文化的发现为这一片黄土地的古文化增添了新的篇章。李家崖城址的发现揭示出商代晚期到西周时代陕北古文化面貌，从而为在这里屡屡发现的青铜器找到了“主人”。这对于全面认识陕西青铜文化、研究北方文化与关中文化的交流均具有积极意义。

周王朝东迁之后，秦人入主关中，最终统一中国并建立起第一个封建制国家。与周人历史相似，秦人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国家，研究其历史进程无疑对于研究国家起源这一重大课题能起到促进作用，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实例。然而，首要是揭示其具体的历史进程。

春秋战国秦的考古，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凤翔县的春秋秦都雍城进行了全面钻探与测绘，了解到宗庙、朝寝等大型建筑群，居于雍城中心部位。对马家庄的宗庙遗址、朝寝遗址和棉纺厂的市场遗址清理发掘或钻探，大体上知道与文献记载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布局相近。并分别把宗庙内几个部分定名为祖庙、昭庙、穆庙、亡国之社、都宫、都宫门，考证了它们的不同功能。同时，指明朝寝建筑是周秦时代五门三朝制度的实证。

在凤翔长青乡孙家南头千河东岸还发现一处2万平方米的秦代宫殿遗址，出土“蕲

年宫当"、"竹泉宫当"、"橐泉宫当"、"来谷宫当"等瓦当，应是战国乃至统一秦的蕲年宫等四个宫殿所在。据研究，这里可能是《史记》所指的千渭之会，所出文字瓦当全在秦代地层之内，将文字瓦当的出现时间提前了。在雍水河发现棫阳宫等瓦当，在东距雍都10公里的横水凹里村，也发现秦汉宫殿遗址，出土鱼鸟纹、双獾纹瓦当。

在凤翔南郊的三畤原上，探明了14座秦公陵园。按照不同的隍壕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双隍型——以双马蹄形内隍围绕中字形主墓室，再以中隍环围东西墓道在内的主墓、附葬墓及车马坑；单隍型——主墓墓室之地面上无内隍，仅以中隍环围主墓和车马坑；组合型——几座陵园共用中隍或陵中套陵。

从1976～1986年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大墓平面呈中字形，墓室东西长59.4、南北宽38.45～38.8、深24、全长300米，面积5334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先秦木椁土圹墓中最大的一座。木椁使用了周秦时代的黄肠题凑制度，墓室上层填土中发现人牲20具，墓内有箱殉72具、匣殉94具。墓内出土300号石磬上，有"天子郾喜，龚桓是嗣"篆文，墓内器物亦具备春秋晚期特征，因此推断墓主为秦景公（前577～前537年）。这是春秋秦第一座有明确墓主的陵墓，对建立考古标型学有重要意义。

在临潼芷阳韩峪乡发现了秦东陵。始建时间应从献公迁栎阳起，至庄襄王，前后相继137年。已发现亚字形墓3座，中字形墓2座，甲字形墓3座，陪葬坑3座，陪葬墓4座，地面建筑1处。以自然沟壑为界线，个别陵园有隍壕。亚字形墓在东陵出现，把墓提高到陵的地位，具有开拓秦陵体系新阶段的意义。

秦都雍城及宗庙、朝寝、凤翔秦公陵园、临潼秦王陵园的发现或发掘，使秦国考古走在六国考古前列。在春秋战国秦考古中，比较重要的还有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宝鸡县杨家沟三座春秋秦墓及西高泉村、宝鸡益门镇的一批春秋墓，铜川铝厂工地的26座春秋、战国墓，清涧李家崖古城周围的东周墓等。

秦汉考古始终是陕西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重点。秦都咸阳宫殿调查与发掘持续了30多年，发掘了1号、2号、3号建筑遗址，发现了回廊、宫殿等遗址，出土筒瓦、板瓦、瓦当、铺地砖、长方形空心砖，以及烧残的丝绸等。还发现大批壁画，内容有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神怪和边饰。色彩有红、黑、白、朱、紫红、石黄、石青、石绿等，表现了秦人的独特文化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对秦栎阳遗址进行了试掘、调查。

近十多年，对始皇陵的地宫进行了勘探，发现地宫周围有一道未经焙烧的砖坯宫墙。南北长460、东西宽392米，墙体高厚各约4米，顶部距现地表2.7～4米。宫墙东边有斜坡门道5个，北边、西边各1门。宫墙内面积180320平方米。中国地质科学院物探研究所两次测试，发现始皇陵封土的中心部位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面积达12000平方米，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记载相符。

1979～1982 年，在封土北侧发现 1 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内外城西垣之间钻探出 5 座基址。基址内出土大量板瓦、筒瓦、陶水管、井圈、方砖、条砖、金属工具及兵器。陶器刻有“丽山飤官左”、“丽邑二斗半、八厨”等陶文，这组建筑应是供奉陵寝膳食的“食官”遗址。

陪葬坑已发掘或正在发掘的有 3 座（1、2、3 号坑）；在封土西侧 20 米处探出铜车马坑 1 处，发掘出 1 号车（高车、戎车）、2 号车（安车），均为皇帝法驾卤簿内的车种，是秦始皇车马仪仗的象征。1979～1996 年在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不断发现修陵人墓地，从 18 件志文瓦片中，得知这些人的服役性质、爵位、姓名，表明这些人原系从山东六国地区征调来修建始皇陵的。1996～1997 年，在始皇陵正西新兴村钻探 400 平方米的修陵人墓地，共计 200 多座墓。

在配合公路建设的随工清理中，1995 年 3 月至 9 月，在秦始皇陵封土以北 130 米处发现和清理了一组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积 4800 平方米。遗址西端与西内城垣相连。整个建筑由六组形制不同的大型建筑构成，1 号与 4 号是坐南朝北的廊院四合院式建筑。5 号为 1000 平方米的大建筑。在遗址南端发现一条长 50 余米的片石散水。该遗址中心还发现几块彩绘俑头残片和箭头，表明陵寝建筑中可能放置武士俑。

在始皇陵园外城垣东北角以北 750 米处，发现一甲字形殉葬坑，面积 300 平方米，经大火焚烧，坑底残留不少动物残骨，有属鹤、鸡等禽类，有豕、羊、犬等畜类，有鱼、鳖等水族类，因此，专家推断可能是秦始皇食品瘗埋库，这是秦代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

1997 年 4～6 月，在始皇陵东的内外城垣之间，钻探发现面积约 14000 平方米的一座大型陪葬坑，平面为长方形，南北两壁均有斜坡门道，未经试掘，内涵不明，但面积稍大于 1 号兵马俑坑，值得引起注意。

汉代考古收获主要是景帝阳陵的发掘与钻探。目前已探明景帝陵为亚字形，四条斜坡墓道两侧，各有 10 多座丛葬坑，现已探明陵城内有 78 座丛葬坑。景帝与王皇后同穴不同茔，各有自已陵园，共同使用庙、寝，又共同拥有大型陪葬区等等，尤其是帝陵南阙门的发掘，表明它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级别最高的一处三出阙，为汉代帝陵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珍贵资料。

在已探明的景帝陵东南与西北方位，各有 24 座丛葬坑。通过试掘知道，各坑内容性质不同，有仪仗、男女骑兵、各种战车、步兵、粮食、府库等，已出土陶俑或器具 4000 多件。

景帝陵园四周发现 12 处建筑遗址，总面积达 20 多万平方米。有的遗址外有城墙，墙外有壕沟，规整宏大，保存完好，内涵丰富。2 号高台建筑遗址上，有直径 2.5 米的罗盘石，上面有阴刻的十字经纬线，正指磁北方向，为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测量标

石。

在景帝陵园的东司马门外，是阳陵的陪葬墓园，占地3.5平方公里，似应为史书上所称的“郡国”墓园。它们均以兆沟分割，分布在司马门之两侧，每个墓园面积70米×70米或90米×90米或120米×120米不等，距帝陵近的为西汉早期墓，远的则可到东汉中期，兆沟总长达10多公里。墓园内已出土各类文物5000多件。

1990年曾对汉武帝茂陵的丛葬坑进行过试掘与钻探，发现有竖穴坑道窑洞式丛葬坑。坑内或殉车马、或禽兽、或陶俑，数量达到惊人程度。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开展了对汉宣帝杜陵的勘查、发掘，重点发掘了杜陵5号、6号遗址和孝宣王皇后陵园东门遗址。

两汉墓葬集中发现在汉长安城的郊区，据统计1995～1998年已发掘近2000座。形制有竖穴土圹、竖穴洞室、斜坡道天井洞室、斜坡道砖室等。华阴、潼关一带的杨氏家族墓地，几乎都是砖室墓，有十字形、长方形、双室墓三种，均为夫妇合葬。西安交通大学内的壁画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好的二十八宿天象图的西汉壁画墓。在绥德延家岔、黄家塔、子洲淮宁湾先后清理多座东汉画像石墓，尤其是1997年发掘了神木大保当24座东汉中期画像石墓，发现50多块施彩画像石，极为罕见。另外，在扶风中颜村还发现大约是西汉平帝之前的麻纸。这些两汉墓葬、窖藏的发掘，对了解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汉代家庭结构有一定意义。

80年代前期，在华阴县发掘了建于汉武帝时期的京师仓，面积达78万平方米，发掘出仓城一座，粮仓6座，是秦汉时期最大的一处粮仓遗址。80年代后期，在位于咸阳西南的古河道上发现了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木构木梁桥遗址。该遗址还出土大型的金属构件，反映了秦汉时代桥梁建造的高度水平。从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勘探了汉未央宫的天禄阁、石渠阁遗址，发掘了未央宫前殿2号宫殿（可能是椒房殿），又勘测了南北司马门。在横门探出一组大型建筑遗址，应是汉长安市的重要部分。在六堡村东南发现大面积陶俑作坊。在未央宫内探出主要道路5条，并探知未央宫东、北门的位置。在长乐宫中部探出一条东西横贯的干道，干道之南有大型建筑3组，最东部由阶、庭、朝、寝组成，可能是长安宫重要建筑之一。在发掘未央宫3号建筑遗址时，出土数以万计的骨签，内容为物品名称、规格、编号，或为纪年、工官名称、工官令、丞、啬夫、令史等各级官吏和工匠名字，是各地工官向中央“供进之器”的记录。

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在陕西发现不多。三国时期以蜀墓为主，多分布于汉中地区，主要有砖室与土洞两种结构。勉县老道寺和城固宝山发掘的几座砖室墓分单室与前后室两种，器物以陂池、模型与蜀币为特色。三国时期曹魏墓仅在关中、安康有零星发现，形制与东汉相同而不易辨别。

长安县南里王村的一座斜坡道带天井洞室墓，是迄今发现的惟一有天井的西晋墓。

西安灞桥路家湾发掘了五座西晋墓，分单室、双室两种，均为斜坡道土洞墓。其中一座绘有北斗七星，并书“元康四年地下北斗”字样。

近年来发掘北朝墓30多座。分为竖穴土坑墓、斜坡洞室墓和砖室墓三类。个别土洞墓带天井或绘壁画。咸阳底张湾一带曾出土一批等级较高且有墓志的北周墓葬。华阴市杨氏墓群，汉中崔家营西魏大统十年侯义墓，商州市区北周墓等都具有家族或地域特点。南朝墓多集中于安康地区，以中小型单室砖墓为主，砖多模印花纹或人物图案。安康长岭一座墓内出土各类乐舞俑65件，反映了西域乐舞流行情况。这些墓葬对研究北朝墓分型、分期，门阀制度，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

陕西是全国隋唐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西安及其附近，隋唐陵墓分布密度大、等级高，类型序列最全。因此，帝陵制度和墓葬分型分期又是陕西隋唐考古研究的重点。

孝陵位于咸阳陈马村，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与武德皇后合葬墓。地面无封土及建筑痕迹，为斜坡道五天井单室土洞墓。出土陵志、皇太后金玺、十三环玉带、大型玉璧等。它的发现为寻找北周其他帝陵，研究隋唐帝陵与其渊源关系，提供了有益线索。

进入90年代以来，对唐十八陵的勘测有了通盘的规划。出于保护目的，首先对乾陵地面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两套三出阙的发现，可能是高宗、武则天两个朝代不同时期建造的产物，尤其在司马道两侧大型石刻的设置，是超越献陵、昭陵制度的，也可能是武周朝的创造。这种设置大型石刻的制度对乾陵以后的唐代帝陵乃至明清皇陵影响巨大。通过中外学者的合作，对桥陵、泰陵等几个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测绘，而第一次准确测定了唐昭陵、建陵内各类陪冢及遗存，无疑会深化对唐陵建筑形制、陵寝制度的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唐僖宗靖陵是唐陵中第一座经过抢救性发掘的帝王陵。陵内粗劣的十二生肖壁画，用则天朝杨再思等权要墓碑筑成的帝后棺床，简陋的土洞墓室，都给人以强烈的启示：如果政治腐败，兵连祸结，社会动荡，即便是贵为天子其下场也必然是悲惨的。

隋唐墓在陕西近年来已发掘300余座，其中隋墓近30座。有相当一批隋唐墓墓主清楚，纪年明确，研究工作进行得亦较充分。近年来，皇室贵戚墓有较多发掘，如惠昭太子、新城长公主、贺若氏、节愍太子、李晦、惠庄太子，以及长安南里王村韦氏家族墓等，其中石刻线画、壁画、三彩、白瓷、哀册以及陶俑，都有惊人发现。隋唐墓在300多年时间中，变化明显，且有鲜明的阶段性，故对唐墓分期研究是学术界热门课题，有三期、四期甚或七期说法。

50年代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城勘察、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对大明宫的部分殿堂遗址、皇城的含光门以及坊内个别寺院进行了发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以来，纠正含光殿“龙尾道”的发掘误判，使中国的朝堂制度从周秦得

以贯通宋元，这是近年唐长安城考古的重大收获。

另外，临潼华清池唐代汤池遗址的发掘，高陵耿镇白家嘴唐代东渭桥遗址的清理，均属这个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

建国以来，曾有过三次唐代金银器的重大发现，两次是在陕西。1970 年 10 月，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发掘各类文物 1000 多件，而金银器物就达 270 件，其中有饮器、食器、首饰、药具、容具、炼丹器和货币等。据考证，器物时代分初、盛唐两期，其下限不会晚于天宝十五载（公元 755 年）。1987 年 2 月至 1988 年 6 月，对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的发掘，获得了供奉四枚佛指舍利的 121 件（组）金银器物。除饮食器外，主要有舍利供养器、法器、盥洗器、熏香器、茶具、首饰等，许多器形为首次发现，扩大了对金银器在唐代使用范围的认识；器物上的錾文，对制作年代、器名、重量、制作官署、职官都有明确记载，拓展了对金银器研究的内容。尤其是首次阐明 45 尊造像宝函为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之图像，揭开了失传千年的唐密之谜，在唐密研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地宫中还出土大量丝绸衣物、琉璃器、秘色瓷，因此，被评为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 10 次最重大发现之一。另外，对白水宋妙觉寺舍利塔基的清理，获得八棱金塔、银函及尊胜陀罗尼经幢，揭示了宋代密教流行状况。对周至仙游寺法王塔进行了拆除、搬迁，证实该塔应为唐代所建。

陕西是我国石窟艺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以晚期石窟的大量遗存著称于世。目前共发现北魏到明清各代石窟 350 余处。北朝重要石窟有 9 处，隋唐五代有 32 处，宋金元有 73 处。陕西石窟特点是大型窟少，小型窟多；群体窟少，单体窟多；大体量造像少，小体量造像多；北朝隋唐石窟少，宋代较多；长期连续造凿的窑少，时代单一的窟多；关中及关中以南的少，陕北窟多；组合复杂的少，题材简单的多。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陕西境内重要石窟都作过调查，中德专家合作，还对麟游慈善寺进行了详尽的测绘。陕北宋金时代石窟，是在两京地区石窟艺术衰落时，造像重心转而南下北上的结果。正是在造像艺术北上时，找到了陕北这块政治、军事、文化及自然环境均具充分凿窟造像条件的沃土，形成了宋金石窟的兴起与繁盛。这里是四川大足石窟以外，中国晚期石窟艺术得到充分发育并集大成之所在，是一座潜力很大的艺术宝库，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北方地区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综合性窑场——铜川耀州窑进行了长期发掘。发掘面积之大、学术收获之巨，为目前国内瓷窑考古所仅见。清理出一大批唐、五代、宋、元等时代的制瓷作坊、试釉小炉、窑炉、石灰窑、贮藏洞、原料加工场、堆料场、晾坯场等遗址，出土大批瓷片及各种制瓷工具和窑具。发掘表明，唐代黄堡窑已能生产十几种高温釉瓷、唐三彩和低温釉单彩陶器，种类丰富，装饰技巧和手法多样，在当时国内唐代窑场中十分少见。宋代耀州窑达到鼎盛期，烧制“官”字款

瓷，说明耀州窑地位空前提高。元代白地黑花瓷得到迅速发展。研究耀瓷演化脉络，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古代陶瓷的认识。

199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还对著名的隋唐灞桥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并获得当年十大发现的殊荣。华阴西岳庙的发掘成果，为我们了解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构成，有着十分积极意义。

陕西虽然建立起一个大体上连续一贯的、自7000多年以来的文化序列，但这一系列尚不完全。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缺环，龙山时代与先周文化之间的缺环，陕北地区区系类型的不足，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除了弥补上述缺环外，还要加强聚落方面的研究。除了对具体某个遗址作尽量透彻的认识的同时，还要从客观的角度对某一区域（如某一河流沿岸）作综合考察，并进而对渭水流域作全面的分析与研究；除了研究其日常器用，还要加强对物质文化背后所包含的内容作更多的揭示——不但要知道某一文化、某一种器物的时间、空间、功用，还要加强对其中的“怎么样”与“为什么”的研究；要加强对国外史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与学习、吸收，逐渐将史前研究引向深入。

商周考古方面，先周文化的研究仍是一个主要课题，这不仅对于建立更加系统的关中文化序列，而且对于研究周人的历史进程乃至国家起源与演进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所突破，在先周文化的渊源、发展壮大、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关系等方面有所建树；寻找周王陵是又一大的课题；与此同时，还要对陕西夏商文化作进一步的研究；在陕北地区要开展更多的工作；在陕南尤其是东南部的商洛地区，试图探索楚文化的渊源。

我们虽然在秦人迁居雍城以后的文化遗存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对秦人早期如迁居“汧渭之会”的遗址却所知不多，今后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秦汉与隋唐时期的考古，将继续帝王陵的研究，以汉阳陵的调查、发掘为契机，对汉代皇帝陵园作较为全面的探讨。随着汉唐墓葬发掘数量的日益增加，应当加强报告的编写与综合研究，力争使零散的资料获得新的意义。

在今后的工作中，仍将坚持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原则，将配合基建与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力争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执笔：韩伟）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地处中国内陆西北部，是中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1949 年以后甘肃的文物考古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着重介绍 1989 年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的新成就。

一 旧石器时代

建国以来，在陇原大地上发现了不少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存。60～70 年代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陇东地区，如巨家塬、楼房子、姜家湾、寺沟口、黑土梁、泾川郝白村、牛角沟、合志沟、镇峪沟、桃山嘴等。80 年代后，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现知旧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最西可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肃北。

在泾川牛角沟、武山鸳鸯镇骨头沟、庄浪长尾沟都发现有古人类化石，前二者均属晚期智人，泾川牛角沟的人类头盖骨化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认。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地点在甘肃境内尚未发现。1976 年泾川大岭上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为在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寻找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提供了新的线索。旧石器中期的地点目前均发现在陇东黄土高原。庄浪双尾沟、双堡子、东乡王家山、肃北霍勒扎德盖[①]等旧石器晚期地点的发现，大大扩展了旧石器文化在甘肃的分布范围。其中庄浪双堡子采集到石器 10 余件，以刮削器最多。双尾沟采集到石器约 20 余件，以白色石英岩制成的凹刃刮削器加工最精。这两个遗址的石器加工方法和形状与刘家岔遗址接近，东乡王家山遗址发现的石片以锤击法生产，长宽大致相等，材料为白色石英岩和角页岩。石器有加工相当精致的刮削器。霍勒扎德盖遗址共发现石器 3 件、石片 2 片、石叶 1 件。以锤击法打片，台面经修理。

甘肃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地理分布上有很大的不平衡性，主要集中在陇东黄土高原，中、西部地区也有少量的遗址发现。有人提出将甘肃东部泾渭上游地区和陕西关中西部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命名为“泾渭文化”，以区别于以丁村为代表的“汾

河文化"。"泾渭文化"导源于水洞沟文化[②]。甘肃是古代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孔道。甘肃中、东部地区又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附近有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因而，甘肃中、东部地区又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场所[③]。

二 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

这一时期是甘肃史前文化最为繁荣和发达的时期。通过50年的工作，已对这一时期各文化的区系、渊源、社会性质及其结构等方面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④]和西山坪[⑤]等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甘肃境内的前仰韶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天水西山坪遗址发现有北首岭下层叠压大地湾一期的地层叠压关系。相当于北首岭下层的地层出土陶器有红褐及灰褐两个陶系，器形主要有左斜或基本垂直的竖绳纹鼓腹三足罐、三足筒形罐、平底钵和鹅蛋形扁足罐；相当于大地湾一期的地层出土陶器亦有红褐及灰褐两个陶系。主要器形为饰交错绳纹的圜底钵、圈足碗、三足钵、平底筒形罐、三足筒形罐、小口鼓腹罐。彩陶钵仅在口部绘一周红彩宽带纹。素面陶外表经打磨刮光。

师赵一期发现的遗迹仅有窖穴一种，有圆形、椭圆形及长方形者。陶器为红褐及灰褐色。纹饰以绳纹和附加堆纹为主，堆纹多捏塑成三角、月牙、乳丁、波浪或绳索状。绳纹多交错绳纹。典型陶器有直口圜底钵、敞口平底碗、侈口深腹盆、圈足或假圈足碗、鹅蛋形三足罐、侈口圆腹罐、小口鼓腹罐等。其文化面貌与西山坪二期为代表的北首岭下层基本相同。

这些遗址的发掘充实了泾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找到了该地区仰韶文化渊源。泾渭上游的仰韶文化是由大地湾一期经由师赵一期发展而来。这一地区的前仰韶文化的面貌与关中地区相同，均属老官台文化的范畴。通过第二次文物普查，在西汉水和嘉陵江上游的西和、礼县、徽县等地区发现了前仰韶文化的遗存。

前仰韶文化的制陶原料取自当地粘性较强的红土和附近的河沙。采用模具敷泥法制成。陶片有分层现象。具体做法是先在模上敷泥制成胎心，再在胎心内、外敷泥制成陶器[⑥]。

仰韶文化的遗存在近十余年内主要发掘了平凉侯家台[⑦]、武都大李家坪[⑧]、庆阳南佐[⑨]、天水师赵和武山傅家门[⑩]等遗址。

天水师赵二期发现有半地穴房屋和圆形窖穴。陶器主要有红顶钵、卷沿盆、葫芦口尖底瓶、蒜头细颈壶、垂腹罐等，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武都大李家坪遗址也发现有半

坡类型的遗迹和遗物。这类遗存也广泛分布于白龙江及其支流北峪河流域。陶器有直口圜底钵、红顶钵、弦纹口沿夹砂罐、敛口罐等。二者的总体面貌与关中和西汉水流域的半坡类型遗存相同，在甘肃境内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和陇南地区。

师赵三期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屋、横穴窑址和圆形灰坑。房址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陶器主要有曲腹盆、双唇沿尖底瓶、铁轨口沿瓮、甑、灶、带鋬敛口钵。文化面貌与庙底沟类型基本相同。大李家坪遗址也发现有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遗存。典型陶器有敛口钵、卷沿曲腹彩陶盆、凹凸唇口沿夹砂罐、环形口尖底瓶等，属庙底沟类型的晚期。自庙底沟类型中后期开始，甘肃境内的庙底沟类型自身因素逐渐增强。同时，泾渭流域和白龙江流域的庙底沟类型间也出现了差异。

在西和县宁家庄发现的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权杖头，证明至少在庙底沟类型时期，社会已产生了分化，已经有了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的权力产生[1]。

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境内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类型，其分布地域也波及河湟地区。天水师赵四期发现有该类型的半地穴式房屋，横穴窑址、圆形窖穴。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单人葬。彩陶有施红、白陶衣者；以黑彩为主，出现白色彩绘。纹样有竖平行线、弧线纹、涡形三角纹、草叶纹、网格纹、变体鸟纹、鲵鱼纹等。典型器类有双腹盆、双唇口尖底瓶、细颈彩陶瓶、彩陶罐、壶、侈口高领圆腹壶、大口深腹瓮、缸等。

武山傅家门石岭下类型的遗存中在一座长方形半地穴房屋内发现有刻划符号的卜骨。卜骨无钻凿，符号简单，有灼痕，符号有“二”、“S”、“1”等。该房屋地面摆放有石斧、锛、刀及陶环。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二次葬，骨架周围放置大小不等的卵石5块。祭祀坑内有猪骨、石球、石环、彩陶盆，周围放置鹅卵石数块。陶器以砖红陶数量最多，橙黄陶和灰陶次之，彩陶约占16%。以变体鸟纹为主要图案，另外有波浪、曲线及弧线三角纹等。器形主要有直口钵、宽折沿盆、平底瓶、双鋬钵、彩陶瓮和粗陶缸等。

大李家坪遗址的石岭下类型遗存中，泥质陶、灰陶占绝大多数，夹砂陶中灰陶也占有很大比例。纹饰以绳纹和附加堆纹为主。附加堆纹颇发达。彩陶占有一定的比例，皆为黑彩，图案主要有圆点、弧线、水波、平行线、变体鸟纹、网格、同心圆等。常见器形有窄卷沿灰陶盆、宽平折沿彩陶盆、侈口彩陶罐、双耳彩陶瓶、敛口双鋬灰陶钵、卷沿或平沿深腹罐、瓮、钵等。其总体特征与泾渭地区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地方特征，如灰陶占优势及尖底瓶的退化、重唇口等现象。

平凉侯家台遗址发现有该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出土遗物的特征与武山傅家门、秦安大地湾等地的同时代遗存相同。庆阳南佐遗址发现面积630平方米左右、有夯筑墙体、四周有散水的白灰面大房址。这座大房址是继大地湾F901之后发现的又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房屋。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已出现有篮纹，部分器形也接近于“常山下

层”类型，为我们探索甘肃东部地区齐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线索。在该遗址中发现有已炭化的水稻，经鉴定为栽培稻，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栽培水稻的北界。

大地湾F901出土的一批量器证明了在仰韶文化晚期，物质生产的水平已得到了很大提高，对剩余产品已进行了分配，产生了初步的产品分配制度[12]。

甘肃境内还发掘了一批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和墓地，通过对这些发掘资料的研究，马家窑文化是由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后者在西渐过程中与当地已有的土著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在天水师赵、罗家沟、武山傅家门都发现有马家窑类型叠压石岭下类型的地层关系，从陶器的演变上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递变关系。

马家窑类型的分布以河湟地区为中心，东抵宁夏海原一线。大李家坪遗址的发掘，又将马家窑类型南推至白龙江域，甚至在四川北部的岷江流域也发现有受其影响的文化遗存。西界抵河西走廊的东端。

武山傅家门遗址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存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面积16平方米左右。在窖穴内坑底埋葬有人头盖骨、下颌骨、陶器和兽骨。陶器以橙黄色为主，砖红色和灰色次之。纹饰以绳纹为主。彩陶占13%，以线组成流畅繁缛的几何形图案。主要器形有钵、卷沿盆、盘、甑、带嘴锅、瓮、瓶等。

师赵四期的马家窑类型遗存房屋为半地穴式，形状有圆形、方形和“吕”字形者。有横穴式陶窑。陶器以橙黄陶为主，纹饰主要为绳纹和附加堆纹。器形主要有敛口圆腹平底盆、大口宽沿高足盆、折沿曲腹彩陶盆、侈口平底浅腹碗、盘、喇叭口尖底瓶、侈口彩陶罐、带嘴锅、喇叭口平底尊、内彩蛙纹钵等。彩陶花纹主要有圆点、平行线、弧线、水波、垂弧、涡形三角及蛙纹。

大李家坪遗址的马家窑类型陶器中，灰陶占有较大的比例。纹饰以绳纹为主，附加堆纹次之，彩陶占7%左右。彩陶纹样有波浪纹、旋涡纹等。器形以敞口钵、侈口夹砂罐、侈口束颈彩陶罐、喇叭口退化重唇口尖底瓶、平底瓶、曲腹盆、瓮、缸等。时代为马家窑类型中、晚期。

从它们的陶器特征上看，这两个地区的马家窑类型与河湟地区的面貌大体相同，但也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如彩陶在整个陶器群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存在有一定数量的尖底瓶，白龙江流域的马家窑类型灰陶占优势等。

在武威塔儿湾、五坝山[13]等地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存中有残破的房屋1座，陶器有卷沿曲腹盆、卷沿绳纹大瓮等。彩陶纹样为波浪纹及同心圆纹。其时代属马家窑文化中、晚期，亦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

西坡呱和雁儿湾[13]遗址的发掘，为兰州盆地马家窑类型的分期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佐证。在兰州盆地，马家窑类型可分为西坡呱—雁儿湾—王保保城三期。康乐边家林墓

地[15]和张寨遗址[16]的试掘与调查，为研究马家窑类型向半山类型的过渡提供了重要资料。

边家林墓地的墓葬流为竖穴土坑墓，口大于底。多为单人葬，埋葬方式有捡骨葬、扰乱葬和侧身屈肢葬。早期墓葬流行捡骨葬。彩陶均为黑彩，器形主要有饰以葫芦网格纹、宽窄带状纹、锯齿纹的腹耳壶，葫芦网格纹和锯齿纹的单耳罐，葫芦网格纹、同心半弧纹的单耳壶、彩陶盆和夹砂罐等物，时代当属马家窑类型晚期。但其腹耳壶、葫芦网格纹和锯齿纹已有半山类型的风格。中期墓葬流行扰乱葬。彩陶多施以黑、红两色复彩，亦有饰黑色单彩者。器形主要有饰锯齿旋涡纹的腹耳壶，宽窄带状纹和锯齿纹单耳罐，锯齿旋涡纹单耳壶，锯齿纹和葫芦纹双耳罐，间断细附加堆纹夹砂罐，壶颈较细直，穿孔的鸡冠状小附耳普遍出现，应属半山类型早期，其旋涡纹等风格与马家窑类型晚期相同。晚期墓葬均为侧身屈肢葬。出土陶器中，红、黑两色复彩普遍，器形和纹饰与中期基本相同。该墓地马家窑类型的遗存中孕育着半山类型的风格，半山类型遗存又继承了马家窑类型的某些风格。说明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是一脉相承的一支文化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半山类型的分布地域从目前已知的资料看，主要分布在河湟地区，北至景泰一带，西达河西走廊东端。虽然在甘肃东部地区也有少量的半山类型的器物出土，但在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齐家文化，而不是半山类型，而且半山类型器物往往与齐家文化遗存共存。

马厂类型近年来比较重要的发现有永登乐山坪[17]、兰州徐家山东大梁[18]、天水师赵等。

乐山坪遗址的时代属马厂类型早、中期，出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部分陶器涂以朱红色陶衣。钵多饰内彩。彩陶纹样主要有网格纹、锯齿纹、蛙纹、回形纹、折线纹和菱形纹。主要器形有陶鼓、双腹耳壶、双耳曲颈罐、双腹耳罐、单耳壶、双耳罐、双耳盆、单耳盆、钵、夹砂双耳罐、夹砂单耳罐等。其中单、双耳夹砂罐耳上的口沿向外翘起，使双耳罐的口类似马鞍口。陶鼓作为原始社会的打击乐器在乐山坪出土有7件，前端口呈喇叭状，外沿有乳丁状倒钩。后端呈罐形或盆形。前后端两侧各有一环形耳。这些陶鼓为研究我国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东大梁遗址时代属马厂类型晚期。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木棺。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黑、红二色相间者。主体图案以平行带纹和细线纹组成，主要有菱形、方格、波折、圆圈、锯齿、回形纹等纹样，也有在平行带纹间画二至三道竖行短线或三至四条细线纹画上、下交错的三角纹者。器形多为单、双耳罐，另外有盆、钵、杯、盂等。彩陶口内侧多饰锯齿纹及连弧纹。与以往发现的马厂类型墓地比较，该墓地与它们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它的罐类器物器形较小，而其他诸墓地出土的瓮、罐、壶均为大型器；该墓地彩陶纹样主要为平行带纹、平行细线、折线三角、菱格纹、回形纹，少见以

往常见的虹纹、四大圆圈纹、螺旋纹和方格纹，其特征更接近于皇娘娘台齐家文化。

马厂类型的分布也以河湟地区为主，西界可抵河西走廊中段。虽然在大水师赵遗址发现有半山—马厂类型的遗物，但其面貌与河湟地区的有所区别，而且这一时期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齐家文化。河西走廊发现的半山、马厂类型遗存与河湟地区的同类遗存文化面貌上也不尽相同。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陶器上所施的陶衣以白垩或红土调制成泥浆后涂施，有的在泥浆中调入了一定的颜料，如赭石、高岭土和锰铁矿。绘制彩陶所使用的颜料一般不随烧成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红色颜料主要为含 Fe_2O_3 的矿物质颜料；黑色主要显色元素是铁和锰，主要成分为锰铁矿；白色为 $CaCO_3$。另外，红色颜料还有朱砂，白色有方解石和硬石膏的混合物及高岭土。在马家窑文化时期，陶工开始使用瓷土和高岭土[19]。

齐家文化是甘肃境内分布最为广泛的一支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也有人将其划归青铜时代的范畴）。在甘肃全境基本都有分布。其分布范围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至黄河，西达河西走廊中段，北到庆阳。目前对其起源有二说，一种认为是起源于马家窑文化，一说认为是常山下层的继续和发展。我们认为，齐家文化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经常山下层发展而来的，常山下层是齐家文化早期阶段的遗存。齐家文化存在着一个由东向西的西渐过程。东部、中西部和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都各自有其地方特色。甘肃东部的齐家文化受到客省庄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客省庄文化。甘肃中西部地区的齐家文化更多受到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影响。

师赵遗址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存房屋为半地穴式，白灰面或硬土面，中有火塘。出土有石、陶、骨、玉器。陶色以红色为主，呈砖红或橙黄色，纹饰以麦粒状或索状粗绳纹为主，其次为篮纹、附加堆纹。器形以侈口罐、小双耳罐、高领罐、双大耳罐、敛口带盖罐、盆、盉、鬲、斝为主。属齐家文化早期阶段。

傅家门遗址的齐家文化遗存发现有半地穴式圆形、方形或长方形房屋，地面早期为草拌泥，晚期为白灰面。墓葬为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陶器纹饰主要为绳纹和篮纹，器形有折沿盆、双耳罐、双大耳罐、侈口罐等。

卓尼苞儿遗址[20]的试掘和纳浪乡[21]的调查提供了一批齐家文化晚期的新资料。苞儿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杂有羼和料的粗陶为主，灰色居多，手制，制作粗糙，陶质疏松，火候不高。器形有罐、瓮、钵等，以罐类为主，双耳罐占主导地位，有的已具马鞍口的雏形。纳浪乡调查中发现的陶器亦以杂有羼和料的粗陶为主，羼和料有页岩碎屑、料礓石粉末和碎陶片。制作粗糙，质地疏松，器形笨重。器类有碗、杯、单耳罐、双耳罐、侈口罐、高领双耳罐。有器耳穿入器壁，器底由内基入的做法。这类遗存既具有齐家文化的特征，同时又孕育了大量寺洼文化的因素，应是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过渡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

平凉侯家台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齐家文化窑洞式建筑模式。共发现有窑洞式房屋5座。建筑方法为先在山坡挖一箕形坑，再在其后部掏出窑洞，有长约4米的过道，居室为圆角方形，4米见方，地面抹以白灰面。这种建筑在常山下层遗存中就有发现，是陇东黄土高原地区齐家文化因地制宜的一种建筑方式。

玉器在齐家文化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在武威海藏寺公园发现齐家文化的玉器和石器近200件，可能是一处齐家文化的玉、石器作坊。玉、石器种类繁多，既有生产、生活用品，也有礼器和装饰品；既有成品，也有边角料。玉料使用了白玉、青玉和碧玉[22]。

齐家文化的人们以占卜问事。卜骨主要使用羊肩胛骨，也使用牛、猪、鹿的肩胛骨。仅有灼痕，也有经修治而未见灼痕者。大何庄遗址发现的石圆圈旁有卜骨和完整的牛、羊骨架，可能是一处用牛、羊牲祭以占卜问事的场所[23]。

另外，对环境变迁和古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有了进展。通过对葫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该地区古文化的编年为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周文化）—春秋战国土著文化—汉文化。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上自大地湾一期开始上升，至常山下层达到顶峰，其后开始下降。离河高度自仰韶文化早期开始上升，至齐家文化达到顶峰。人类活动的规模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齐家文化时期最大，之后开始下降，在此之前，人们较长地在一个地点生产、生活，其后则频繁移居，形成遗址个数较多，而面积厚度较小的状况。植被由森林过渡到草原，引起了建筑方式和经济生活的变化，齐家文化之前为定居的农业生活，至寺洼时期游牧和畜牧成分由南向北逐渐增强，表现为居无常所，陶器少而粗糙，家畜骨骼多见[24]。

综上所述，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既有其共同的特征，又有其地域性的差别。这为青铜时代甘肃青铜文化的同源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积淀。

三　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除在甘肃东部有两周、秦文化外，在甘肃境内还有四坝、辛店、寺洼、沙井等四支带有较浓重的地方游牧色彩的青铜文化。它们的分布地域各不相同，呈现出独立分散、多样化的特点。它们的起源均与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的形成一是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分布有地域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在齐家文化后，气候有一个变干和变冷的过程，降水相对减少，土地有的开始沙化，游牧成分的比重增大，造成了地理单元的相对隔绝，因而也形成了文化分布单元的相对独立，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青铜文化。

四坝文化分布于永昌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东达山丹，西至安西，南抵祁连山北

麓，北到巴丹吉林沙漠西南缘。酒泉下河清发现有四坝文化叠压马厂类型的地层叠压关系，可以说马厂类型是四坝文化的主要渊源之一，它还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14}C年代测定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左右。现已发掘的四坝文化的遗址和墓地当中，火烧沟墓地的年代最早，干骨崖墓地的年代较晚，民乐东灰山在二者之间，四坝滩与干骨崖晚期相当。四坝文化的经济类型为半农半牧式，养殖有羊、牛、马、猪、狗。农作物在火烧沟墓地发现有粟，民乐东灰山发现有炭化的小麦[25]。其族属应为活动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古羌族。对四坝文化人骨的人种成分的研究表明，其体质特征与步达生所测的殷墟中小墓组和甘肃史前组接近，在现代蒙古人种中，与东亚亚种关系最密切。说明在甘肃境内，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居民，在体质形态上没有发生明显变化[26]。

辛店文化是一支主要分布于河湟地区的青铜文化。建国以来，在黄河上游的洮河、大夏河流域发掘了不少该文化的遗址和墓地。辛店文化是受齐家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地方色彩相当浓厚的青铜文化。它可分为互相联系和发展的山家头类型—姬家川类型—张家嘴类型三个阶段。“唐汪式”只是辛店文化张家嘴类型中的一部分。它向西影响到卡约文化[27]。

寺洼文化是一支分布于西起洮河流域，东至庆阳地区，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到泾、渭流域的一支青铜文化。卓尼苍儿遗址和纳浪乡的调查表明，寺洼文化与齐家文化有直接渊源关系。如二者的陶器中均以有羼和料的粗陶为主，陶器制作粗糙，烧制火候低，陶质疏松。陶色以灰陶为主。器类以各类罐为主，纹饰单纯，多为附加堆纹，器物口有圆形、椭圆形、菱形、马鞍口者[28]。

沙井文化是分布在民勤、金昌、永昌地区，自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的一支青铜文化。50年来的工作主要在永昌三角城，包括三角城遗址，蛤蟆墩、柴湾岗和西岗三处墓地。可分为以民勤沙井子和永昌三角城为代表的早、晚两期。它是河西走廊东侧的一支土著文化，其文化因素主要来源于当地的原始文化，董家台类型当是它的另一个源头。沙井文化的人们主要经营畜牧业。发现有大量的青铜装饰品和生产工具，具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文化的色彩。陶器数量较少，几乎全部为夹砂陶，羼和料较粗。陶色以红、褐、橙黄为主。陶器制作较粗糙，器类简单，以素面陶为主，流行使用紫红色陶衣。彩陶皆红彩，花纹图案有几何形图案和动物纹。器类主要有单耳杯、双耳杯、圜底罐、单耳圜底钵、平底罐、鬲、豆、壶、碗等。对于其族属有月氏和羌戎系二说[29]。

在甘肃东部的平凉、庆阳地区还存在有以青铜牌饰、青铜短剑及装饰品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的遗存。在张掖龙渠乡也发现有类似的遗存，发现有铜鹿饰品及其他遗物。

四 秦汉时期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祖居西陲犬天丘。解放前在天水即出土有秦公簋。秦人的祖先长期活动在甘肃东南部一带，这一地区是探索秦文化起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1994年及1998年对礼县大堡子山及周围墓葬的发掘，为我们研究秦文化的起源及特征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大堡子山墓地位于礼县东9公里的大堡子山山坡上，南临西汉水，西为永坪河。1994年在该墓地发掘大型墓葬3座，中小型墓葬9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型墓均被盗，遭严重扰乱。

三座大型墓顺山体南北排列，间距35米，墓向均80°左右。M1为刀把形，全长36.5米，仅发现有残存的12乘车马痕及大量车马饰残片，应为一殉葬之车马坑。M2为"中"字形墓，全长88米，M3为"目"字形墓，全长115米。二墓均有殉人。这两座墓劫余的文物有玉器、料器、石器、漆器和少量的青铜器残片，可辨器类极为丰富，但大器、重器等珍贵文物均被盗。从盗掘者手中收缴的铜鼎及流散海外被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铜簋上有"秦公铸作宝鼎"、"秦公铸作宝簋"的铭文，证明这些墓是秦公陵墓无疑。其中M2是主墓，M3应为其夫人之墓。

九座中小型墓分别为2.5×5.0～1.4×1.9平方米不等。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盆、豆、罐。有些墓还随葬有三鼎一簋的青铜礼器。从这批墓葬的陶器形制分析，其年代在西周晚至春秋早。M2应为襄公之墓[39]。

1998年，在大堡子山东南约6公里左右的永兴乡赵坪村发掘了3座墓葬和1座车马坑。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75°，长4.8～6.25、宽2.8～3.05、深6～7米，均有殉人。2号墓系贵族墓，使用了七鼎六簋的列鼎列簋，殉9人。墓葬均曾被盗。车马坑葬入车马5乘。其中1、3、4为驷车。形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东西长18.8、南北宽3.15、深4米，方向86°，位于2、3号墓之间。出土物有铜器、玉器、石器、骨器和贝类、铁器、陶器。青铜器有方壶、圆壶、簋、鼎、镳盉、簠、四轮方盒、尊、盘、匜、戈、剑等；铁器有铜柄铁剑、鎏金铜柄铁剑；玉器有玉玦、玉饼、玉环、玉圭；石器有剑、凿、圭等，另有部分青铜车马饰件。青铜器种类丰富，铸造工艺略显粗糙，鼎、鬲类器物底部有明显合范痕，应为当地所铸。在壶、盉、鼎、簋等类器物的耳、座、盖等部位以立体之动物或鸟装饰，其中四轮方盒、镳盉、方壶造型独特，结构精美。

大堡山大型墓中殉人的骨骼经鉴定其体质特征与甘肃史前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相同。史载秦人是从东迁徙而来的，这个结果也证明，秦人上层统治者与下层平民可能不

是一个民族，为研究秦文化的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这两次发掘中都发现有铁器，也为研究中国冶铁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天水西山坪和秦安上袁家[31]发现的秦墓资料也已公布。上袁家的秦墓分别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和凹字形竖穴土坑墓，为夫妇异穴合葬，均仰身直肢，有棺椁。后者为单室，前者为双室，均殉有车马及狗、牛、羊。随葬陶器有鼎、甑、甗、折肩罐、侈口罐、瓮等；铜器有错金银扈底座、灯、戈、镦、镞、鎏金带钩、衔、軏饰、镜、半两、印等；铁器有锸、锛、匕、剑、戟、钺、刀等；玉器有玉料片、璜等；另外有骨角器及长条状铝片。西山坪的秦墓一座为凸字形土洞墓，一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均单人，蹲坐式屈肢葬。随葬陶器有蒜头壶、罐和双耳罐。

汉简是研究汉代历史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解放前，汉简在河西走廊即有大量出土。70年代在甘肃境内发现汉简7000余枚。1990～1992年三个年度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发现汉简25000余枚，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32]。

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安西之间安敦公路南1.5公里的山前砂砾冲积扇上。由坞和厩两部分组成。以土坯砌筑，外敷草泥。文化堆积分为6层，自西汉中期至魏晋，延续时间长达400年。出土物除汉简外，尚有其他各类文物2650余件。质地有麻、丝、绢、缅、罽、毛、皮、铁、铜、木、漆、竹、瓷、陶等，种类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另外，还发现有大量小麦、大麦、青稞、谷、糜、豌豆、扁豆、黑豆、苜蓿、大麻、杏、桃等植物种子。

大量的西汉宣、元时期的麻纤维纸，尤其是4件有墨书文字的纸的发现，不仅大大提前了纸的发明时间，而且证明早在西汉时期纸已成为书写用具。王莽至东汉早期书写在墙壁上的墨书诏书和医药方，以赭石界栏，直行隶书，在甘肃是首次发现。为研究汉代文书制度和医药水平提供了新的资料。

简牍的质地以红柳为主。完整或较完整成册的约40册，种类有简、牍、觚、封检、楬、削衣等。纪年最早者为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最晚者为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内容有诏书、律令、料品、檄文、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医书、相马经及古佚书。大量的邮驿文书、簿籍简牍的出土，为我们探索汉代邮驿制度提供了极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大量的宜禾都尉下属乡、亭、里名称的出现，又为探索汉代效谷县城的确切位置及效谷县行政建置准备了丰富的资料。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酒泉至敦煌的路线、驿置、里程，提供了敦煌至冥安的具体交通路线。簿籍详细记录了接待过往官员和使节的过程，支付的食品、粮谷、车马、草料的数额和价值。刑徒、官奴婢的名籍为深入研究罪徒、奴婢的使用和管理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总之，悬泉置遗址发现的汉简数量大、内容丰富，突破了以往敦煌、居延简的内涵。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田制

度、水利建设等各方面。

西汉墓葬仅在秦安上袁家和天水西山坪有零星发现。其中上袁家四座墓南北并列，均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内积炭。有的有耳室。墓室为长方形，残存有木棺。随葬品有陶质生活用具、铜车马饰、镞、五铢、铁工具及玉器等。其中 M5 出土有“桥沂之印”，当为一处家族墓地。西山坪的西汉墓葬为竖穴墓道土洞墓，一棺一椁。

东汉墓葬近十年在河西走廊和甘肃东部都有零星发现[㉝]。

1991 年侯家台遗址发掘的三座东汉墓中，一座为前后双室、双耳室砖墓，另两座为单室券顶墓。出土物有陶罐、甑、盆、灶、井、钵、盒、陶鸡和猪等。

武威旱滩坡清理的一座东汉墓为单室长方形土洞墓，随葬品有鸠杖 1 件、木简 1 束，陶器有罐、壶、灶、井、盘、豆，另有铜镜和钱币等。木简的内容为受王杖之制书，关于王杖授受之律令和刑律。纪年为建武十九年（43 年）。

1989 年，在武威磨嘴子发现一座壁画墓。该墓为横前室双后室土洞墓，斜坡墓道。壁画绘制在前室后部的墓壁和墓壁的白垩上。内容主要为太阳金乌、天象、月亮蟾蜍、杂技、羽人、羊、飞象等。甘谷发现的画像砖上有射猎、青龙、飞燕、朱雀、羚羊、车、青蛙、鹿等图案。

天水贾家寺发现的东汉墓为长方形砖室券顶墓，有木棺。随葬有罐、盆、井、灶、规矩镜等物。

对秦、汉长城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庆阳地区和河西走廊。庆阳地区的秦长城分布于镇原、华池、环县三县境内。自宁夏彭阳入镇原境，东北行而入环县，自西南向东北纵贯环县全境而入华池，华池境内基本由东向西行，全长 242 公里。长城由黄土版筑而成，平地起建，充分利用自然地理形势，据险设防，因险致塞，沿线附筑城障及烽火台[㉞]。

河西走廊的汉长城在近十年内曾历数次调查。它是随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和河西四郡的建置于公元前 111 年至前 67 年分五次修筑而成的，自敦煌经酒泉、张掖、武威至永登、景泰境内。由堑壕、天田、土垄、塞墙、山川险阻、障、坞、燧、关等一系列设施构成。因地形、地貌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修筑方式，黄土地带以黄土筑成，沙漠地带则由砂砾夹杂芨芨草和红柳枝等筑成[㉟]。

五 魏晋十六国时期

魏晋时期的墓葬近十年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除 1993 年在酒泉西沟发现 7 座、1995 年在敦煌佛爷庙湾发掘 600 余座外，在武威、安西和高台也有零星发现[㊱]。绝大多数为斜坡墓道覆斗顶或券顶土洞墓，多单室，少量为画像砖墓。墓葬形制和出土物与前已发掘的敦煌齐家湾的墓葬相同。安西五道沟墓地均为砖室墓，有单室、多室和

竖穴砖券墓三种，前二者均为穹窿顶。

佛爷庙湾发掘的魏晋画像砖墓有茔圈，单甬道、覆斗顶、后壁下往往设供台。葬具有棺床和尸罩。画像砖主要砌于照壁、墓室的前壁、墓室四角及藻井部位。以单砖小幅画像砖为主，也有在墓室砖壁某一部分壁面上作画的。多在砖面上涂白垩，也有直接在砖面上作画的。有彩绘和墨绘两大类。多一砖一画，一画一个独立内容。

画像砖内容除辅助性的烘托图案和雕绘外，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以神禽灵兽为代表的祥端和神话传说，如四神、河图、洛书、天禄、九尾狐、凤、羽人、双头鱼及双头神兽等。二是历史人物故事，如李广射虎、伯牙弹琴、子期听琴等。三是具有佛教文化因素的动植物，如白象、莲花等。四是世俗生活的场面，第四种内容均绘于墓室内的砖上。墓葬的年代在西晋早期。

这些画像砖的内容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原始崇拜、神话传说的沉淀。另一方面，汉代开始，推崇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黄老学说盛行，上层统治者都希望长生不老，死后升天成仙，佛教也在此时传入我国，画像砖墓的题材也与上述大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第一类画像砖题材是西汉以来驱邪升仙观念的区域性体现。第四类题材则是东汉以来人们热衷于驱邪升仙的同时追逐尘世享乐的新社会趋向的反映。

佛爷庙湾画像砖墓所体现的佛教文化气息及其绘画艺术，为孕育产生博大、精深、荟萃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壁画奠定了民族艺术的坚实基础。有些绘画题材和技术在莫高窟早期洞窟中被运用。该墓地的发掘对研究莫高窟壁画艺术的产生及两者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93 年在酒泉西沟发现的魏晋墓有竖穴土坑墓、单室土洞墓和多室砖墓。其中两座为彩绘画像砖墓，覆斗顶，照壁以砖砌出仿木结构，有砖雕力士。画像砖主要位于前室和中室，一砖一画。主要表现世俗生活的画面，如表现家居生活的宴饮、炊厨、奏乐、弹唱、宴乐、婢女；表现农事畜牧生活的牛耕、晒粮、杀羊、屠猪、赶羊、持叉农夫、扛锨农夫、锥牛、狩猎、扬场、滤醋。另外有房舍、树林、人物、鼓吏、骑士、牛车等画面。在 M5 西壁上有些人物画像旁有榜题，如“童吏”、“都伯吴才”、“鼓吏”、“兵胡大年”等。

高台骆驼城发现的一座画像砖墓为三室砖墓。墓室为长方形穹窿顶。画像砖均位于墓室内，一砖一画。砖上涂白垩，以丹砂饰边，墨线、丹砂作画。内容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农耕、放牧、双辕牛车、双辕马车、牵马图、家居生活图和屠宰图等，以表现世俗生活的画面为主。

以敦煌为中心的画像砖墓和以酒泉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段画像砖墓均以单砖作画为主。嘉峪关壁画墓有在墓室内大面积作画的风格。二者有各自明显的特征，前者以照墙为主要施画区域，后者以墓室内壁为主要施画区域。前者的内容以神禽灵兽等神怪形象

和历史人物故事占主要地位，后者则侧重于表现世俗现实生活。

酒泉、嘉峪关等地画像砖墓和壁画墓所使用的颜料，红色为红土和铁棕，黑色为碳黑，蓝色为石青，黄色为磷氯铅矿，白色颜料则比较复杂，成分有白垩、石英、高岭石、伊利石、白云石、滑石、重晶石、方解石、石膏等。重晶石作为壁画颜料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墓葬内的泛碱样中均有硫酸镁和石膏存在。这些认识为今后的壁画防治泛碱提供了科学依据[37]。

六　唐宋元时期

唐代墓葬在敦煌、武威、天水等地都有零星发现[38]。1995年在敦煌佛爷庙湾发掘了30余座唐墓。其中绝大多数为斜坡墓道土洞墓，仅有5座为砖室墓。均为单室墓，少数土洞墓呈刀把形。砖室墓由于早期被盗均坍塌，有的墓室有单个或二个由砖砌成的棺床，随葬品多无存，仅有少量写有道教和佛教符箓的陶罐及一件兽面镇墓兽。墓室和甬道均铺以模印花纹砖，有莲花、缠枝葡萄、缠枝莲花、玄武、神兽等纹样。其中一座砖室墓在照墙和封门砖中嵌入“四神”模印砖，在墓门两侧、甬道内和墓室四壁砌以“胡人牵驼”和“骑士出行”模印花纹砖。这两种砖又都可分为两类，“骑士出行”砖骑士所执之旗或竖立或倒下。“胡人牵驼”砖中一类为胡人戴尖顶帽，留须，面向前，驼囊干瘪，上立一小鸟；另一类为胡人回首眺望，驼囊鼓胀，上立一小兽。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繁忙的贸易景象。这两类砖分别砌于墓门两侧、甬道、墓室墙壁的上、下两层，以莲花柱间隔，以拼砌的水波纹砖分隔上、下层。

酒泉西沟发现的唐墓为双室砖墓。墓室四壁及地面有仿木结构模印砖，有砖砌之棺床。模印砖的内容有伎乐、仪仗骑士、力士、守门武士、十二生肖、八瓣莲花等。乐伎所持有笛、箫、古筝和箜篌等。男乐伎着幞头，穿窄袖长袍；女乐伎梳高髻，着大领长衣，腰系裙。

1982年在天水市发现的一座带有屏风石棺床的唐代墓葬也具有重要意义。该墓系竖井单室砖墓。石棺床由17方画像石和8方素条石组成。画像石反映的内容主要有男乐伎、神兽，墓主人狩猎、宴饮、出行、泛舟等场面，亭台楼阁、水榭花园等建筑以及一些自然景物。男乐伎所持乐器有笙、铜钹、半梨形曲颈琵琶、洞箫、腰鼓和竖箜篌，皆戴冠束发，身着圆领紧袖左衽绯衣。画像石采用平地减地雕刻技法，浮雕饰以金彩和红彩，有的贴金，十分华丽。棺床前置石雕坐部伎乐队，着圆领紧袖左衽长袍，束腰带，深目高鼻。乐器有横笛、贝蠡、排箫、笙、琵琶。该墓出土的遗物还有黄釉鸡首瓶、烛台、金钗、石枕、铜镜和墓志。

这类石棺床实物发现极少。该墓的发现，为研究唐代的家具陈设和生活习俗提供了

难得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唐代服饰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中国音乐史，尤其是唐代龟兹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980年在武威青咀喇嘛湾清理7座吐谷浑王族残墓[39]。其中两座遭严重破坏，其他五座中三座有明确纪年，墓主身份清楚。墓葬均为南北向单室砖券墓。出土物中以木器为主，尤以各类彩绘木俑为多，有武士、男侍、女侍及骆驼、马、狗、阮咸、琵琶等。其中人物形象各异，形态生动。漆器有碟、碗、盘。另外还有象牙筷子、丝织物残片、白瓷樽和墓志。

武威地区前后共出土吐谷浑王族墓志9方。这些墓志的出土弥补了史籍的漏载，为研究唐代吐谷浑的历史增加了不少新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吐谷浑的丧葬仪式、艺术、纺织工艺及其与唐代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墓志中涉及的地名为考证唐代凉州武威郡辖县的名称，补正史书记载不足及误记提供了可靠证据。

宋、金时期的墓葬在清水、天水一带也有零星发现[40]。1990年在天水耤口发掘的一座宋代单室砖墓，墓内有彩绘砖雕仿木结构建筑及桌、椅、男侍、女侍及吹笙和执响板的伎乐等。1995年在会宁发现的一座宋代单室砖墓，随葬有锡壶、杯、铜灯、瓷碗及砖墓志，墓室在仿木结构屋檐上部有壁画，壁画内容主要为二十四孝。这类墓葬以往在甘肃东部多有发现。临夏市发掘的金代墓葬也为单室砖墓，墓门为仿木结构单檐歇山式砖雕门楼，在甬道、墓室四壁和墓顶均有砖雕，内容为二十四孝、仕女、牡丹、荷花、持荷童子、狮子戏球等。时代为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

1992～1993年武威塔儿湾西夏至元代遗址的发掘为我们了解西夏的制瓷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41]。武威是西夏的辅都，以前即有数量较多的西夏文物出土。这次发掘发现的房屋多依山修建，有的甚至呈半地穴式。因遗址遭破坏，房屋的结构和门向不清。房屋内多有灶和铺以石板的烘干台，用以烘干瓷坯。灶有平地起建、挖地穴和以石头垒砌的简易灶三种，在有些房屋的上层堆积中发现大量经烧烤炭化的木椽。

塔儿湾遗址发现的瓷器以白胎为主，少量为灰胎，瓷土未经严格淘洗。釉色又多为白釉，釉色不纯，一般泛黄或青，釉色繁复多样，有绿、酱、黄褐、黄绿、青等釉色。一般施釉较厚，釉色不匀。敞口类器物多采用叠烧法，小口类器物多采用垫烧法。窑具发现有“工”字形垫钉。

主要器类有碟、碗、大口瓮、罐、高领四系壶、双耳小口瓶、单耳带流罐、双耳罐、扁壶、花插、玉壶春瓶等。碟、碗类器物在内壁底部有明显的沙圈或涩圈，有挖足过肩的作风。高领四系壶在肩部发现有烧结的垫钉残迹，口和颈部一圈露胎。碗、碟类外壁施釉不到底，罐、壶类口沿和圈足均露胎。以斜平沿大碗、折腹碟、曲腹碟、斗笠碗、曲腹碗、大口瓮、高领四系壶、单耳带流罐、双耳罐、扁壶等最具特色。瓮、罐、壶类器物有的在腹部剔刻缠枝牡丹、开光折枝牡丹、莲花、忍冬等图案。部分器物为釉

下黑彩，墨绘缠枝莲花、树枝、鸟鹊衔枝、流云等纹样。壶、罐类肩、腹下部露胎处及碗、碟内圈足内有的有墨书文字，有汉文、藏文、西夏文。

该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为残次品，并有窑具出土，说明这些瓷器应为当地烧造。武威博物馆藏一件该遗址出土的瓮上墨书有"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钱币中有汉文"乾祐元宝"、"光定元宝"，该遗址的年代当为西夏中、晚期至元代早期。瓷器的烧制技法受到磁州窑的影响，与灵武窑所出的瓷器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灵武窑的经瓶和棱足钵不见于塔儿湾遗址，而后者为数较多的瓮、大型罐、四系高领壶、大碗等则少见或不见于后者。

武威地区近年发现的西夏文物还有1987年和1989年在武威亥母洞寺发现的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和《音同》残页[42]。佛经为《维摩诘所说经》，是国内最早的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这些发现对研究我国印刷术、版本学及西夏文化、佛教都具有重要价值。

七 石窟寺考古

陇原大地自西而东均有石窟分布。甘肃的石窟寺以其开凿年代早，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艺术形式多样，雕塑、壁画精美而著称于世。联系起来看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近年开展的主要工作有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43]，武山水帘洞勘测，榆林窟、马蹄寺、东千佛洞、炳灵寺等石窟寺的维修和加固。

莫高窟北区发现过去鲜为人知的大量僧房窟。这种窟面积大小不一，以人字坡顶者居多，内设有灶和炕。大量的禅窟和瘗窟也在此次发掘中发现，填补了莫高窟石窟研究的空白。禅窟一般有禅床，前、中、后三室，中室左右两侧又有1～5个不等的侧室。瘗窟一般较小，平面方形或长方形，窟顶较低，窟门较矮，内设棺床，以土坯、石块封门。

遗物发现有波斯萨珊卑路斯王朝的银币、西夏文钱币、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墨书佛经、藏文泥金泥银字相间佛经、藏文墨书佛经、回鹘文泥金字佛经、回鹘文墨书佛经、蒙文墨书佛经。另外还有汉至宋代钱币、铜器、木器、陶瓷器、丝织品、铁器、影塑佛像及菩萨、唐卡、漆器等。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发掘，丰富了莫高窟的内涵，填补了莫高窟、敦煌以至全国某些考古领域的空白。

水帘洞石窟群位于武山县鲁班峡内，在相距不足2.5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许多窟龛。保存较好的有水帘洞、千佛洞、拉稍寺和显圣池。199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窟群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原有未编号的一些窟龛进行了补充与调整，使洞窟的数目增加到一百有余。

千佛洞为一不规则的天然洞窟，现存窟龛30处，依山崖分三层布局。洞窟崖壁上

的壁画多为北周所绘，内容为说法图、佛、菩萨、供养人等。

拉稍寺在险峻的崖壁上石胎泥塑一佛二菩萨。佛通高42米，结跏趺坐，二菩萨侍立。崖面上有大面积的宋元以来重绘的壁画。始凿年代应为北周，在大佛北侧菩萨身旁有12行楷书阴刻铭文“维大周明皇帝三年岁次已卯二月十四日……”，即公元559年。崖壁上还发现有晚唐和金代壁画两方，内容分别为“西方净土变”和“说法图”。

水帘洞亦为一天然洞窟，洞壁原满绘壁画，现仅存的西壁壁画亦已残缺，共分六组，内容多为佛说法图、佛、菩萨、供养人等。时代为北周至宋。

（执笔：王辉）

注　释

①③　谢骏义：《甘肃西部和中部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及其展望》，《人类学学报》第10卷1期，1992年。

②　盖培等：《陕西长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人类学学报》第1卷1期，1982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1990年7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省西山坪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5期。

⑥　李文杰等：《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制陶工艺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

⑦　王辉：《平凉侯家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

⑧　张强禄：《白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初步研究》（待刊）。

⑨　赵雪野：《西峰市南佐疙瘩渠仰韶文化大型建筑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4期。

⑪　王彦俊：《甘肃西和县宁家庄发现彩陶权杖头》，《考古》1995年2期。

⑫　赵建龙：《大地湾古量器及分配制度初探》，《考古与文物》1992年6期。

⑬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塔儿湾、五坝山发掘简报》（待刊）。

⑭　严文明、张万仓：《雁儿湾和西坡瓜》，《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⑮　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康乐县边家林新石器时代墓地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4期。

⑯　石龙：《甘肃康乐县张寨出土新石器时代陶器》，《文物》1992年4期。

⑰　马德璞等：《永登乐山坪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

⑱　蒲朝绂：《兰州市徐家山东大梁马厂类型墓葬》，《考古与文物》1995年3期。

⑲　马清林等：《甘肃古代各文化时期制陶工艺研究》，《考古》1991年3期。

⑳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卓尼崖儿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4年1期。

㉑　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甘南卓尼纳浪乡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7期。

㉒　梁晓英等：《武威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器作坊遗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30日。

㉓　木易：《齐家文化卜俗探讨》，《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9日。

㉔　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葫芦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11期；李非等：

《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9期。

㉕ 李璠等：《甘肃民乐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1期。

㉖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㉗ 张学正等：《辛店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㉘ 樊维华：《董儿遗址文化性质初探》，《考古》1994年1期。

㉙ 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二卷；《论董家台类型及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三），文物出版社，1992年。

㉚ 柴生芳：《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公墓制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

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天水西山坪秦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88年5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上袁家秦汉墓葬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1期。

㉜ 甘肃省考古所悬泉置遗址发掘队：《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5日

㉝ 吴先筹：《平凉市侯家台汉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1997年2期；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皇湖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10期；党寿山：《甘肃武威磨嘴子发现一座东汉壁画墓》，《考古》1995年11期；张卉英：《甘肃甘谷发现三方汉代画像砖》，《考古》1994年2期；天水市博物馆：《甘肃天水贾家寺发现东汉墓葬》，《考古》1991年1期。

㉞ 李红雄：《甘肃庆阳境内长城调查与探索》，《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

㉟ 吴礽骧：《河西汉长城》，《文博》1991年1期。

㊱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7期；赵雪野：《安西五道沟汉-晋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

㊲ 薛俊彦等：《甘肃酒泉、嘉峪关壁画墓颜料分析》，《考古》1995年3期。

㊳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1期；董秀荣：《酒泉发现一座唐代模印画像砖墓》，《陇右文博》1997年2期。

㊴ 黎大祥：《武威青咀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陇右文博》1996年1期

㊵ 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临夏金代砖雕墓》，《文物》1994年12期。

㊶ 王辉：《武威塔儿湾西夏至元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孙寿岭：《武威发现大批西夏瓷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11月1日。

㊷ 孙寿岭：《武威新发现的西夏文〈音同〉残页》，《陇右文博》1996年2期；《武威发现国内最早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陇右文博》1997年1期。

㊸ 彭金章：《敦煌莫高窟考古新发现》，《丝绸之路》1996年1期。

青海省考古五十年述要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省地处祖国西陲，我国的两条母亲河黄河和长江均发源于此。其地理位置东越兰州通中原，西越新疆通中亚，南越西藏通印度。自古以来，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新中国建立50年以来，在青海已发现旧石器时代至清代的遗址和遗迹3480余处。其中经正式发掘的遗址共40处，墓葬数千座，出土文物10万多件。这些文物古迹，对于研究青海各民族的历史，青海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关系，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 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

早在50年代，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以南的三叉口和长江发源地霍霍西里等地曾发现过一些零星的打制石器[①]。但由于均系采集而不是从地层中出土，其年代也引起了一些争议[②]。

经正式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是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镇东南小柴旦盆地内的小柴达木湖遗址。这个遗址是在1982年被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与地貌系等单位组成的盐湖与风成沉积联合考察队发现的。并在1983年和1984年进行了范围较大的调查。

1998年夏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察和发掘。经考察，小柴达木湖遗址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共采集人工石制品700余件。经初步研究，这批石制品可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其中石器工具又可进一步分为古人类用来打制石核、生产石片的石锤，用来刮净兽皮制成简单衣服的刮削器；用于从骨、角上切割适当大小的原材料加工骨锥、骨针和鱼叉的雕刻器，用于在兽皮上穿孔的配合骨针缝制皮衣及在骨针上钻眼的石钻，还有用来

砍伐树木、肢解动物和敲骨吸髓的砍砸器等。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以往未曾发现过的细石核和细小石器的新材料。根据小柴达木湖遗址附近地点采样所做^{14}C年代测定以及对所发现的古人类遗址性质的分析，可知这是一处距今3万年左右的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场。这是青海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当时的石器制造工艺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这说明小柴达木湖遗址的石器是由比它更早的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③。这些石制工具不仅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人类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对研究当时人类生存的气候环境及环境的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海境内曾经发现过大量第四纪早期的哺乳动物化石。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谋生手段除了采集就是打猎，动物是人类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青海，应该有更早的、与哺乳动物化石伴生的古人类遗迹发现。这方面的调查还需进一步开展。

今天的柴达木盆地是典型的大陆性高原气候，其特点是多风少雨，低温干燥，气温日差较大，植被稀疏。小柴达木湖为咸水湖，该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很难想象古人类曾在这里劳动和生息。根据地质学家的考察，小柴达木湖区由于气候的变化，在晚更新世时期，出现过多次的咸水与淡水的交替。当气候转暖、湖水淡化时，古人类就由它处迁入此地，依山傍湖，采集野生植物、猎取山上和草原中的动物为食。

直到目前，我国中石器时代的考古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甚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也还在探索之中。我省1980年发掘的贵南县拉乙亥遗址为中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拉乙亥遗址位于共和盆地的中部。在这里共发掘了7个地点，揭露面积1300平方米。发现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的灶、坑50余座，有平底和锅底形两种。所出遗物以石器为主，有石核（分楔状石核、舌状石核、柱状石核、锥状石核等）、刮削器、圆头刮削器、尖状器、石锤、石片、石叶、砥石等。骨器有骨锥、骨针等3000余件。石器以细石片居多，占石器总数的90.4%以上，均为打制石器。在某些石骨上可以见到琢修痕迹。琢修技术出现于中石器时代，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④。

在我国，目前认为属于这一时期的材料有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内蒙古海拉尔、扎赉诺尔，黑龙江顾乡屯，新疆七角井子，西藏聂拉木等。其中有些遗址由于地层混乱或资料不足，其时代属性尚存争议。因此，拉乙亥遗址就显得极为重要。拉乙亥遗址在地层、古生物、文化遗物遗迹等各方面都将为探讨中石器文化的性质、特点、经济形态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各方面提供宝贵资料。

实物研究表明拉乙亥遗址属中石器时代全新世早期人类遗址，并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遗址出土木炭进行^{14}C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6784年。这个数据的获得，填补了我省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间2000年的空白，是我省考古研究上的重大收获。

二 新石器时代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因1923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而得名。文物普查结果表明，马家窑文化的地理分布相当广泛，东起泾、渭水上游，西至黄河上游的共和、同德县，北入宁夏的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省汶川县。由于地域性的差异与时间早晚的不同，一般认为可区分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在我省境内，这四种类型均有分布。其分布范围东接甘肃，西至海南州同德县，北至大通县，南达黄南州隆务河流域。共调查登记遗址917处。

1980年民和县阳洼坡遗址的发掘，填补了我省马家窑文化序列上的缺环。遗址中发掘房址6处、灶9个、灰坑2个，是一处居住遗址。文化层中出土有大量陶片、陶器和石器。从文化内涵分析，不同于庙底沟类型的器物，而明显要比庙底沟类型进步。有的器形、纹饰接近于马家窑类型，与甘肃东部的石岭下类型更为接近，应属介于庙底沟与马家窑类型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⑤。有人认为应归属于石岭下类型⑥，也有人认为其文化内涵没有超出仰韶文化，应属仰韶文化分布的最西端⑦。

同样类型的遗址仅见于民和县的中川地区和循化县的东界（民和县2处、循化县1处）。关于这支文化的来龙去脉及与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关系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的遗址经发掘的有大通上孙家寨、贵南尕马台、民和核桃庄、民和新民阳山、乐都柳湾、民和马排、互助总寨、同德宗日等处。多为墓葬。

马家窑类型墓葬一般比较规整，大多为竖穴木框墓。具有二层台，整个平面呈“回”字形。待放置尸体及随葬品后，再覆盖圆木、树枝和杂草、填土。大通上孙家寨墓葬多为单人葬，少见男女合葬，但都没有完整的骨架，是一种二次扰乱的葬俗⑧。尕马台多见瓮棺葬⑨，宗日则多见二次扰乱葬、俯身葬、石棺葬等。随葬品中多见精美彩陶。民和县核桃庄一座墓中出土的彩陶，堪称精品⑩。大通上孙家寨、同德宗日均出土了舞蹈纹图案的彩陶盆，宗日还出土一件两人抬物图案的彩陶盆。所绘图案生动形象地反映了5000年前原始社会的生活⑪。

半山类型墓葬在乐都柳湾发掘了150余座。这些墓葬多为规整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墓内有略呈梯形的木棺葬具，随葬陶器二三件，与甘肃广河等地的半山墓葬有明显区别。这类墓葬，男性墓多见石刀、石斧，女性墓常出纺轮，反映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⑫。

马厂类型墓葬的发掘以乐都柳湾、民和阳山两地规模最大。柳湾马厂墓葬的显著特

点是，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墓带有长方形或梯形的墓道，均为洞室墓。墓室多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和椭圆形。在墓室和墓道之间，用一排至三排木棍和树枝封门。墓中多数有成形的木棺和垫板，木棺的结构和半山类型不同，棺底板下和棺盖板上各横放三块对应的木板，木棺两端凿有圆孔，圆孔中插上木柱，用以固定棺板。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俯身葬和二次葬[13]。

民和阳山马厂墓与柳湾墓在葬俗上有较大差别，没有发现木棺葬具。葬式除少量屈肢葬外，普遍采用俯身葬。作为一个大型的氏族墓地，主体葬式采用俯身葬，肯定是一个氏族部落特有的风俗。柳湾墓葬中还发现了殉人墓。阳山墓葬中同性合葬、成人与小孩的合葬墓占有一定比例，从葬人数 2～5 人不等，反映了相当复杂的社会情况。

马厂类型墓葬随葬品中彩陶甚多，但墓中随葬品的数量差别明显，反映出贫富的分化。生产工具中石斧、石锛较多，充分说明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但少量的骨器与动物骨骼表明家畜和狩猎在当时人们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纺轮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纺织技术的普及程度。而彩陶纹饰中大量的变形人形纹饰（蛙纹）、人头形彩陶罐、泥塑人体器及彩陶壶等珍贵文物，生动地反映了先民们的宗教生活和精神世界[14]。

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依据地层关系及^{14}C 测定，综合出马家窑早于半山，而半山又早于马厂的继承关系。总的年代约占 1000 年，即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要比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大约年代公元前 5000 年至前 3000 年为晚[15]。

总的来说，马家窑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有着亲密的源流关系，是一个地方变种。这一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宗日文化

青海地区另一个与马家窑文化并立的新的文化是宗日文化。这是因 1994～1995 年同德县宗日遗址的发掘和发现而命名的。目前认定的同类遗址有 51 处。主要分布于黄河两岸以及各支流接近入河口处的岸边，上游起自同德、兴海两县交界处的巴曲入河口，下至贵德县的松巴峡，分布区域为青海湖南面的共和盆地。这一区域在自然环境上也恰巧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单元。

宗日文化的葬俗，墓坑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和长方形，有二层台和侧室，葬具为木椁与棺等。同新石器时代以后一个时期内其他地区墓葬相同。葬式普遍存在二次扰乱葬、俯身葬和石棺葬。二次扰乱葬时对葬具甚至人骨的焚烧、墓地祭祀坑与墓上祭祀以及地表列石标志等，都不见于其他地区，这是宗日文化遗址特有的现象和墓葬特征。

宗日文化陶器器类有壶、罐、碗、杯等[16]。夹粗砂乳白色陶占绝大多数，有极少量泥质乳白色陶。绳纹、附加堆纹较普遍。彩陶占一定比例，为单一紫红色，图案主要是变形鸟纹和多道连续折线纹（俯视呈多角星纹），还有折尖长三角纹、竖线折尖纹、网格纹、条线纹等。大型小口器物彩绘多在颈、肩部及口沿内侧，小型敞口器物则多为内彩。

宗日遗址中包含有大量马家窑类型文化的陶器，说明其早期受到了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也许两者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民族群体。但从陶器和葬俗等方面考察，均有较大差异，并且遗址延续年代较长，文化内涵丰富，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遗址。因此，我们根据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一般准则，将这一新的文化命名为宗日文化。

宗日遗址的年代始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结束于齐家文化时期。据^{14}C测定，该遗址的时间大致在距今5600～4000年之间，延续了大约1600年。

齐家文化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青海，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齐家文化集中分布在东部农业区河湟谷地及支流的台地上。分布范围与马家窑文化大体相同，在湟水流域稍有扩大，西至青海湖北岸的沙柳河边。目前调查登记的齐家文化遗存有430处。以乐都、民和、循化、化隆等县分布较为密集。经考古发掘的遗址有：乐都柳湾、互助总寨、大通上孙家寨、贵南尕马台、民和清泉、西宁沈那等。

齐家文化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和农业生产活动，在这一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

齐家文化墓葬多采用长方形土坑，有单人葬和合葬。墓葬中反映出来的男女分工较为明显，男性多随葬斧、锛、凿等生产工具，而女性墓中极少见，反映出女子在生产中的地位更为削弱。随葬品的数量和类别差别较大，证明财富的增长与聚集的不平衡性日益显著。乐都柳湾保存完整的40座齐家墓中，无任何随葬品的4座，仅葬1件器物的7座。贫者所占的比例较马家窑文化有显著扩大。齐家文化墓中还发现殉葬，如柳湾M314棺外有一侧身屈肢的青年女子，一条腿压在棺下。此外，还大量发现有头无身、有身无头和四肢不全的骨架，均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实际上是二次扰乱葬，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宗教观念和埋葬习俗⑰。

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发掘了40多座，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均排列整齐，墓与墓之间有一定距离。其中发现了30余座俯身葬墓。这种葬俗尚属首次发现。这些墓葬可分四种情况：1．葬在墓地中央，全身骨骼完整，随葬品较多，反映了死者在氏族中地位较高。2．葬在墓地东部边缘，多为无头骨架，随葬品仅随身的几件装饰品。3．二次扰乱葬。4．迁葬墓。

尕马台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细石器、石球、骨针等，装饰品有铜指环、铜泡等。

齐家文化手工业技术较先进，尤其是冶炼青铜的金属手工业的出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尕马台M25出土一面铜镜，经快中子放射性分析法鉴定，其铜和锡的比例是1:0.096，属青铜质⑱。

齐家文化的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255±140年，和马厂中、晚期相当，晚期相当于夏代或早商。

三 青铜时代

卡约文化

卡约文化是青海地区青铜时代主要的文化遗存，分布地域东接甘肃西境，西至海南州兴海县、同德县境内，北至海北州大通河流域，南达黄南州泽库、河南蒙族自治县。河湟谷地及支流以及青海湖周围是卡约文化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调查登记达1766处，分布之密集、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青海省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遗存。经过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大通上孙家寨、循化阿哈特拉山、循化苏只、湟中下西河、贵南山坪台、湟源大华中庄等几处，共发掘墓葬2000余座[19]。

卡约文化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上孙家寨类型和阿哈特拉类型[20]。

根据陶器分期可知，唐汪式陶器与卡约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文化的继承性表现在：

从组合上看，上孙卡约文化期与唐汪期基本上差别不大，都以小口双耳罐、大口双耳罐、粗陶双耳罐为基本组合。阿山陶器组合中，卡约期与唐汪期有一定差别。前者有大口双耳罐、小口双耳罐、堆纹口沿罐、腹耳壶等，后者有大口双耳罐、腹耳壶等。

从纹饰上看，唐汪期存在大量的卡约文化的传统纹饰，如复线回纹、斜三角纹、多线波折纹以及相同的彩绘符号。但唐汪式陶器有一种典型的勾连涡纹不能从卡约文化中探寻其发展线索，可能系某种外来因素或偶然因素形成。

在埋葬习俗方面，唐汪期同卡约期的墓葬形制、葬式、葬具的使用情况都比较一致。上孙墓地唐汪期墓打破卡约期墓的地层关系有七组，这在层位上表明了唐汪晚于卡约，其发展脉络在陶器分期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两者一脉相承的持续发展关系大体可以确定[21]。

卡约文化青铜器种类较多，有小件铜戈、铜凿、铜斧、铜刀、铜镜、铜矛、铜钺、铜铃、铜泡等。据测试，有青铜器也有红铜器。从器形上看，反映出中原文化和北方草原系统文化的影响。

关于卡约文化年代，根据^{14}C测定数据，表明相当于夏代末至西周初期，阿哈特拉第四期相当于西周中期前后，唐汪和上孙期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左右[22]。

同齐家文化相比，卡约文化的经济类型发生了较大变化。齐家文化以农业为主，卡约文化则以畜牧业为主，或半农半牧。由齐家文化发展到卡约文化，甘青地区亦由锄耕农业转变为畜牧业。

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西至贵德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地区。在青海地区共调查统

计了97处，经考古发掘的有民和核桃庄、乐都柳湾、民和山家头、互助总寨、大通上孙家寨等。

核桃庄辛店文化的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分有偏洞和无偏洞两种，有的竖穴墓有熟土二层台或多层台，均有木棺葬具。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和二次扰乱葬。

辛店文化自1923年安特生发现以来，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已命名了几个类型和组别，主要是姬家川和张家嘴两类型（即甲组和乙组）。辛店文化的期别与类型的划分比较复杂，需要继续深入研究。1980年在民和核桃庄村东的山家头台地上发掘了33座墓葬，出土了69件陶器。这是一群有独特风格的器物。同类遗存还有柳湾[23]，民和簸箕掌的石棺葬[24]，临夏孔家寺遗址的几件陶器[25]，临夏莲花台[26]，洮沙四时定[27]的遗存等。这些遗存有自己的分布区域——湟水、洮河流域及其间的黄河沿岸，又有一定的时间阶段——上承齐家，下启辛店甲组，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以典型遗存地点山家头命名，可称之为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

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的367座墓，绝大多数分属于姬家川和张家嘴两类型，但在类型学和地层学分析上还难以得出孰早孰晚的结论。其文化内涵、彩陶纹饰、器形及其与山家头、唐汪、卡约文化的相互关系，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兴趣[28]。

根据 ^{14}C 测定和类型学分析，辛店文化早期相当于夏代末期，晚期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与卡约文化的终始年代大体一致。

诺木洪文化

1959年在海西州都兰县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据其内涵命名为诺木洪文化。目前已调查发现40处，主要分布在青海西部柴达木盆地一带，较典型的遗址还有巴隆的搭温他里哈和香日德的下柴克等地。

在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中，发现有土坯围墙建筑9处。方形和圆形的房子均采用木结构建筑。土坯砌成的窖可能是贮物用的。饲养家畜用的围栏内有羊粪堆积，还有牛、马、驼等粪便。遗址堆积的文化层厚达八九米以上，表明当时过着相当稳定的定居生活。生产工具有翻土用的骨耜和收割用的石刀，另有骨、石制的箭头、笛哨等，说明这时的居民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手工业生产是代表当时生产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该遗址发现有炼铜用具的残片和铜渣。铜器有斧、钺、刀、镞等。毛纺织品有布、带、绳。另有牛皮鞋等。

从诺木洪文化的陶器、石器和铜器分析，其早期与卡约文化联系紧密，年代上也接近。据测定，诺木洪文化早期为距今2905±140年，这个数据在西周年代之内。但其文化下限较晚，可以到汉代以后[29]。

四 汉晋时期

两汉至魏晋时期，青海主要是羌人居住的地区，也有一部分匈奴人、月氏人杂居其间。武帝时，汉的势力进入湟中，在今永登县西、大通河左岸建筑令居塞，并在湟水流域设立了许多县，隶属陇西郡；又置护羌校尉，驻临羌县，统领羌中事务。昭帝时分置金城郡。宣帝时又在西宁一带设立西平亭，并设金城属国管理诸羌。后来还在乐都设破羌县，在湟源设临羌县，在贵德设榆中县等。王莽时在青海湖以东的三角城设立西海郡。后废，东汉永元复置。

50年来，在青海共调查发现236处汉代至魏晋时期的遗址、墓地和城址。其中发掘过的地点有大通上孙家寨、互助总寨、互助高寨、互助汪家庄等地。在乐都、西宁、湟中、平安等地零星清理了数十座墓葬。

上孙墓地所发掘的182座墓葬是甘青地区已发掘的汉晋墓葬中延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一处墓地。其年代大约从西汉昭帝前后至魏晋初期，时间先后衔接，没有明显缺环，从而建立了青海地区汉晋墓葬标型分期和基本序列[30]。

这批墓葬文化面貌的基本特点是，既含有汉文化因素，又因时代早晚不同程度保留着固有的地方文化传统。其墓葬形制、陶器组合和釉色、铜器、车马明器、弩机、带钩、铜镜等均与中原地区酷似。但杀动物随葬、截体葬和二次扰乱葬等均与青海卡约、辛店文化相类，应属地方文化传统。墓葬没有像中原汉晋墓那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在一座东汉末年的砖室墓中出土了一枚驼纽铜印，文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31]，为这一时期墓主的族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据前、后《汉书》所记，这一带乃是匈奴的别部“卢水胡”的活动范围。这部分匈奴人应是东汉时所说的“义从胡”。这枚铜印很可能就是“卢水胡”首领的一枚官印。若此推论成立，墓地的族属还应包括与羌人杂处的湟中“义从胡”或“卢水胡”[32]。

墓群中乙区M3出土一件西方银壶，是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珍品[33]。M115中出土一批木简，共400片。内容主要有部曲（军队编制）、操典（操练法规）、军队标志和军队爵级、赏赐制度及行杀、处罚等规定。《孙子兵法》简文中的有些内容为前所未见，是新发现的孙子佚文。这批简为研究西汉时期的军事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34]。在平安县画像砖墓中还发现了珍贵的佛教图像[35]。

公元3世纪末，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西迁，4世纪就居住在青海。有人认为海南州共和县铁卜卡古城是吐谷浑于6世纪修建的都城——伏俟城。该城南依石乃亥北山，北临布哈河，东距青海湖7公里。城外郭长方形。郭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西部有长约200米的方形夯筑内城[36]。

此外，我们对新发现的天峻县的加木格尔滩古城进行了试掘。这座古城东西长7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基宽8、高1.8米，人工夯筑而成。城内有三个小区。我们对其中1号小区内的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的粗绳纹板瓦、筒瓦和瓦当。其中一种瓦当铭文为“长乐万亿”。中部探方内有大型铺地砖，并在该处南80米处清理出长方形房址两座。该城址东距天峻县13公里，位于布哈河南岸台地，根据出土文物判断其年代约在北朝时期，应系吐谷浑人所建。该城与铁卜卡城同处于布哈河南岸，相距数十公里。这两座古城与吐谷浑王都究竟是何关系？该城的试掘为我们研究和判定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视点。

伏俟城西通鄯善（今新疆若羌），东连西宁、金城（今甘肃兰州）。五六世纪，吐谷浑开发今新疆境内“丝绸之路”的南道，中西交通线兴盛一时。1956年在西宁市内城隍庙街发现盛贮货币的陶罐1件，其中银币约在百枚以上。后来收集到的76枚银币，都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6～484年）在位时所铸，是当时中西交通频繁的证物[㉒]。

五　隋唐至清代

吐蕃是以藏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在鼎盛时期，曾辖有青藏高原诸部，势力达到西域河陇地区。统一强盛的吐蕃经历了200多年时间，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公元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其妻弘化公主被迫逃往凉州，请求内徙。吐谷浑“故地皆入吐蕃”。据文献记载，这部分吐谷浑人虽然被吐蕃所统治，但仍保存自己的“可汗”和自身的政治建制，有着自己活动的特定区域，并以部落为单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组织结构。他们作为吐蕃的邦国存在。这部分吐谷浑人，文献上虽有记载，但其遗迹却未被发现，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都兰县吐蕃墓群的发掘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柴达木盆地，而其国的政治中心应在都兰县。

首先，从空间上看，都兰墓葬的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吐谷浑活动区域在地望上相合。据目前调查和发掘，数千座墓葬主要分布在都兰县，部分已达果洛州的玛多县，而这一带正是吐谷浑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从时间上看，墓葬中出土文物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与吐谷浑活动的时代亦相合。墓中不仅出有北朝晚期至初唐时期的丝绸（此时柴达木盆地尚在吐谷浑国的有效控制下），还出土了盛唐至晚唐的丝织品以及古藏文木简牍（表明当时已属吐蕃统治），墓葬形制亦与西藏山南和藏北的吐蕃墓存在着许多文化因素上的一致。因此，我们认为都兰这部分灭国后的吐谷浑人墓葬还是应归属于吐蕃文化系统。

在都兰吐蕃墓葬中，集中发现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物。“开元通宝”

铜钱、宝花纹铜镜、漆杯、漆碗、漆盘等纯属中原汉地输入。丝织品中绝大多数亦为中原汉地所织造，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品种，有锦、绫、罗、绢、纱、絁、缂丝等[38]。其中织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花绫、素绫、绊锦等均属首次发现。西方文物有粟特金银器[39]、玛瑙、珠、玻璃珠、红色蚀花珠、铜盘、铜香水瓶等。西方丝绸织锦有粟特锦和波斯锦等，数量之多居新中国历次发掘之首。其中的一件钵罗婆文字锦（该文字为中古波斯人所使用），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证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40]。这批文物对研究藏汉关系以及青海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宋代文物，自1979年以来，先后在互助、湟中、大通等地征集到一些瓷器。胎质多为浅黄色，釉色有白、黑、酱等。有的一器施两种釉，如内施白釉，外施黑釉等。装饰技法以剔刻釉为主。器形有高足碗、斜壁碗、高足灯、浅盘、扁水壶、罐、双耳罐、多耳罐、瓮、经瓶（牛腿瓶）等。釉色与器形大多与西夏瓷相似，应归于西夏。但部分器物，尤其是饰黑釉和酱色釉的器物体壁较厚；剔花瓷罐多为敛口无颈，体形矮胖，花叶硕厚；扁水壶带圈足，无剔刻花，有瓦棱纹，均具有地方特色。剔花瓷罐上的白菜图案和阴剔花技法更为其他西夏瓷器所未见。这些情况说明青海发现的西夏瓷是当地窑口的产品。

从已发现的典型西夏遗迹看，几乎没有多耳瓷壶，但这种瓷器在湟中下马申以及海东、海南、黄南州各县均有发现。有研究者认为，多耳瓷器是青海土著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应归属于唃厮罗政权[41]。

元代文物，1956年在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县诺木洪发现一具元代武将的干尸，外用羊毛毡包裹，身穿黄织锦缎面羊皮袍、护身软甲，腰系带，足穿皮靴，头戴缎面羊皮帽，帽顶插一支红缨。随葬有鞍蹬、弓箭、马尾、羊腿等物[42]。1955年在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出土了用毛毡包裹的一大包元代纸币，是中统、至元、至正年间印行的，面额有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种，均盖有中书省、尚书省的朱红印[43]。

明代的墓葬，解放后共发掘了5座。1957年在西宁南滩发掘了明代太子少保援辽总兵左都督祁秉忠砖室墓1座[44]。1976年8月，在大通黄家寨大哈门发掘明代墓葬4座。其中M1系晚明总兵柴国柱之墓，其余则为其母赵氏和其子柴时秀、柴时亨之墓。

柴氏墓室用黄褐色石条砌成，外用掺石灰的砂土夯填。石室四壁用长方形条砖错缝平砌，顶部用石条覆盖。室内有棺。尸体用26层丝服包裹。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铜器、锡器、木器和玉器。铜钱有万历通宝和天启通宝。出土的四合墓志铭，详细叙述了柴氏家世源流及历代边民流徙和明末边境军事防御情况，为地方史志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45]。

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乐都瞿坛寺、明代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五年建成的湟中塔尔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驰名中外的古代建筑，由国家拨款进行了测绘、研究和

维修[46]。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乐都西来寺，其主体建筑虽然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但其遗留下来的二十四轴工笔水陆画，是我省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47]。

在文物普查中，共发现古城295座，主要分布在湟水谷地及交通要隘上，从汉代至明清时期均有，但经过发掘的较少，有待于今后加强工作[48]。此外，在青海西部的广大牧区共发现岩画地点17处，图像数百幅。其年代从青铜时代延续至隋唐时期，反映了游牧文化的特征[49]。

50年来文物考古的收获，可以充分说明，位于我们伟大祖国西部边陲的青海省，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这里，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这些物质文化遗存，不仅可以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为我们研究古代西北方的羌、月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吐谷浑、吐蕃、党项等族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填补了史籍记载的空白。

青海省发现的大量古代文物，富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古代各民族的文化遗物，和中原地区的文化遗物或多或少地同时并存，反映了古代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密切交往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都足以说明各民族人民间的交往、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文化上的学习交流，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

（执笔：许新国）

注　释

① 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2卷2、3期，科学出版社。

② 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年7期。

③ 刘景芝、王国道：《青海小柴达木湖遗址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8日。

④ 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人类学学报》1983年2卷1期。

⑤ 李恒年：《民和县阳洼坡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文物》1959年2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⑥ 赵生琛、谢端琚、赵信：《青海古代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⑦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10期。

⑧⑨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⑩ 青海省考古队：《民和核桃庄发现距今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墓葬》，《文物》1979年9期。

⑪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3期；汤池：《谈舞蹈彩陶盆纹饰》，《美术研究》1979年2期；孙景琛：《试读彩陶盆上的舞蹈图》，《舞蹈艺术丛刊》1981年1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5期；陈洪海、格桑本、李国林：《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1998年5期。

⑫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6期。

⑬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⑭ 李仰松：《柳湾出土人像彩陶壶新解》，《文物》1978年4期。

⑮ 夏鼐：《碳一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4期。

⑯ 陈洪海、格桑本、李国林：《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1998年5期。

⑰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⑱ 李虎侯：《齐家文化铜镜的非破坏鉴定——快中子放射化分析法》，《考古》1980年4期。

⑲ 和正雅：《从潘家梁墓地的发掘试谈对卡约文化的认识》，《青海考古学会会刊》3期，1981年；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室：《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海南藏族自治州群艺馆：《青海贵德山坪台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7年2期。

⑳ 许新国：《试论卡约文化的类型和分期》，《青海文物》总1、2期。

㉑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3期。

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十），《考古》1983年7期。

㉓ 同⑰；洪海、格桑本：《试论山家头类型》，《青海文物》总5期。

㉔ 高东陆、吴平：《青海境内的石棺葬》，《青海考古学会会刊》6期，1984年10月。

㉕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黄河上游盐锅峡与八盘峡考古调查记》，《考古》1965年7期。

㉖ 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临夏莲花台辛店文化墓葬》，《文物》1988年3期。

㉘ 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南玉泉文，文物出版社，1989年；许永杰：《河曲青铜文化的谱系研究》（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印稿）；陈洪海：《墓葬材料整理与类型学应用——从核桃庄墓地的整理谈起》，《青海文物》总4期等。

㉙ 青海省文管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63年1期；青海省文管会：《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巴隆、香日德三处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0年6期。

㉚㉝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㉛ 刘万云：《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4期。

㉜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索》，《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期，1980年。

㉞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2期；朱国炤：《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文物》1981年2期。

㉟ 卢耀光等：《我省发现画像砖墓》，《青海日报》1982年8月24日；许新国：《平安县出土汉画像砖图像考》，《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1期。

㊱ 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8期。

㊲ 王丕考：《青海西宁波斯萨珊朝银币出土情况》，《考古》1962年9期；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1期。

㊳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5～16期。

㊴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4期；《青海都兰热水血渭大

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1期。

㊵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1期

㊶ 李智信:《浅谈青海宋代时期瓷器的文化归属》,《青海文物》总5期;陈荣:《大通新城乡出土的宋代瓷器》,《青海文物》总4期;贾洪键:《青海湟中下马申出土一批文物》,《青海考古学会会刊》7期,1985年12月。

㊷ 《柴达木盆地发现一批文物》,《青海日报》1959年1月4日。

㊸ 许新国:《格尔木出土元代纸币考说》,《青海金融》1987年6期。

㊹ 青海省文管会:《西宁南滩明祁秉忠墓清理情况》,《文物》1959年11期。

㊺ 卢耀光:《大哈门明墓发掘报告》,《青海文物》总3期,1987年

㊻ 张驭寰、杜仙洲:《青海乐都瞿坛寺调查报告》,《文物》1964年5期;魏新民:《试论塔尔寺建筑的形式及其发展》,《学术论文汇编》,青海省土木建筑学会,1963年。

㊼ 许新国、白万荣:《青海乐都西来寺水陆画初探》,《青海文物》总4期,1990年。

㊽ 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㊾ 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卢山、野牛沟、怀头他拉、舍布其岩画调查及研究》,《青海文物》总2期,1989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成就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局

宁夏文物考古事业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建国三十年以来的基础工作时期，重点对学术界已知的遗址，如水洞沟、西夏陵进行调查发掘。第二个时期是全面恢复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考古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展开，范围广泛，遍及全区；时间跨度大，自远古至宋元；内容丰富，包括遗址、墓葬、窑址、城址、古建筑、石窟、长城、岩画等，宁夏考古工作呈现出崭新面貌。第三个时期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系统发展时期，较为深入地研究与调查了宁夏地区富有特色的文化，专题考古初具规模，如“青铜文化”、“丝路文化”以及“西夏文化”等。专题考古将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一

宁夏古人类及古生物化石地点，以同心和石嘴山—惠农一带最为集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尤其在同心地区中中新世（相当于通古斯早期）地层中发现的一颗上猿左下第二臼齿最为引人注目，这是我国第一颗比较可靠的上猿牙齿①。

灵武水洞沟遗址现已确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它曾与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合称“河套文化”。研究表明，两个遗址的石器与形成环境均有差异，各自的文化性质并不相同②。灵武水洞沟长城以外地区、中卫长流水及青铜峡鸽子山诸遗址反映出北方细石器文化总体上的某种共性③。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宁夏分布广泛。宁夏境内黄河两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约有30余处。遗址主要特点为细小石器和陶器并存④。这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属于同一类型。近年来对海原菜园村遗址及墓葬群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出土各类器物4000余件，清理房址13座、灰坑56座、墓葬121座、窑址1处，并系统调查了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得宁夏南部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逐渐清晰。

菜园村马樱子梁遗址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菜园村西沟儿洼遗址相当于

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菜园遗存是宁夏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存。以泾河和清水河上游为中心，主要分布于陇东高原和宁南山区、丘陵地区[5]。经正式发掘的有林子梁遗址及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二林子湾墓地。林子梁遗址中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和兽骨等。陶器以小口罐居多。陶质以夹砂陶为多，泥质陶次之。器表多饰篮纹。彩陶皆为泥质红陶，表面磨光，无陶衣，多施黑彩。纹饰有宽带纹、网格纹、锯齿纹等十余种，往往几种图案并用于一件器物上。遗址中的房址有窑洞式和半地穴式两种。规模最大的窑洞式房址 F13，经^{14}C 测年距今 4585±155 年。

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二林子湾墓地墓葬形制多样，有竖穴侧龛墓、土洞侧龛墓等 5 种。各墓均无葬具，多屈肢葬。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常见篮纹。多手制平底器。陶器按用途分为炊器、水器、贮藏器和食器，墓中陶器组合一般四类兼备。

这种普遍使用窑洞式及半地穴式房屋，流行竖穴、侧龛墓，多单人仰身屈肢葬的原始文化遗存，在西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其与马家窑文化有明显区别，从时间上看晚于半山类型，与马厂类型大致并行。齐家文化（宁南、陇东地区）中包含许多菜园遗存的文化要素，菜园遗存很可能即为齐家文化（宁南、陇东地区）的直系前身，是一支农畜并重、崇尚简朴、盛行篮纹陶的土著文化。

二

80 年代以来在固原地区清理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墓地，将北方系青铜文化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固原彭堡乡撒门村于家庄发掘墓葬 28 座，出土随葬品 1400 余件，固原杨郎乡马庄清理墓葬 49 座，出土各类器物近 3000 件。墓葬形制分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土洞墓两类。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无葬具。殉牲种类有羊、马、牛三种，皆以牲畜的头颅和蹄子代替全牲。随葬品中有大量的具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车马器、服饰品。兵器除独特的青铜短剑外，还有矛、刀、管銎斧、镞、镦等；马具有衔、环、当卢等；服饰品有铜镜、珠饰、动物牌饰等，其中骨质车马器尤其精美。该类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与相邻地区的典型匈奴文化遗存比较，虽然很相似，同属北方系青铜文化，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今宁夏南部丘陵和甘肃东部高原一带属于古文献记载的戎人聚居区，固原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可能是戎人，不属于该时期的“匈奴文化”范畴，这为区分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不同支系提供了依据[6]。另外，在银川平原黄河两岸的中宁、中卫县亦发现青铜文化墓葬，其文化内涵似乎与宁夏南部山区略有差异[7]。

1985 年发掘的同心倒墩子村匈奴墓葬群，共有墓葬 27 座，出土遗物千余件。墓葬分布稀疏，排列有序，没有打破关系，绝大部分为土坑墓，流行单人葬，仰身直肢、头

向北，骨架大多足高头低。有木棺，一般置于墓穴的左侧或洞室内。随葬器物有一定的组合关系，除陶罐外，还有动物铜带饰、铜环、铜带扣等青铜文化遗物，其中卷缘圆唇、高领溜肩、深腹、颈肩处饰刻划波折纹或凹弦纹加波折纹的陶罐，与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县补洞沟匈奴墓所出陶罐类似。此类陶罐在蒙古、前苏联外贝加尔匈奴墓中也有出土，是汉代匈奴墓具有特征性的器物之一。墓内普遍发现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主要是陶器、漆器、铁器及五铢钱反映了与汉族之间的紧密关系。五铢钱几乎每墓必出，数量可观。钱文款式与满城汉墓出土的相吻合，均为西汉铸造，推断墓葬年代可能在西汉中晚期。文献记载，西汉中晚期匈汉之间连年战争，不少匈奴人降汉，汉置属国都尉管理安置匈奴降人，同心一带在属国都尉管辖的范围内，该批墓葬的发掘可与史料相印证。对于探究匈奴文化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8]。

岩画主要分布在宁夏北部的贺兰山与贺兰山南端北山一带，北自石嘴山地区麦汝井，南到中卫县北山大通沟。在绵延250公里的十多个山口，发现岩画群20多处，画面总数约在万幅以上。这是自远古以来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羌戎、月氏、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党项等民族的杰作，时间大致从春秋战国到西夏时期。岩画所表现的内容不尽相同。北部图像以森林草原动物为主，如北山羊、马、盘羊、岩羊、虎、狼、豹，也有放牧、狩猎的场面；中部多类人首题材；南部北山岩画以放牧及草原动物北山羊和马为主。磨刻、敲击和线刻几种手法并用[9]。1995年在贺兰山白芨沟一处岩洞中，首次发现了用赭石颜料彩绘的岩画，计有图案31组，约100多个单体图像，有乘骑征战人物形象及北山羊、马、蛇、狗等动物形象。岩画采用剪影式大轮廓描绘技法，展示了处理复杂构图的能力和艺术技巧[10]。

宁夏境内的秦长城由甘肃静宁县进入宁夏西吉县境后，经固原县城北十里，从彭阳县孟源进入甘肃镇原县境，全长200余公里。墙身分层夯筑，残高2～15、基宽6～8米，内缓外陡，连接在长城上的敌台，高3～20米、间距200米左右。长城经过的交通要道和险要山口一般建置较大的城址。此外，在长城内侧沿线设有城障及烽火台。这段长城经秦、汉、隋、明数朝的修筑，总长度已达1500多公里[11]。

两汉时期的墓葬遍布宁夏各地，迄今为止，先后在银川、贺兰、灵武、中卫、吴忠、盐池、固原等地发掘汉墓100多座，出土各种器物1000余件。汉墓群大多从西汉晚期延续到东汉，以砖室墓为主，墓道多斜坡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合葬墓。随葬品中陶器有壶、博山炉、灶、灯、仓等；铜器有釜、车马具、铜镜等；铁器有剑、刀、镞等；漆器多已朽坏，仅可辨耳杯、盘等器形。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具有中原汉代墓葬的一般特征，反映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汉文化的影响力和分布范围；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亦农亦牧的经济形态，如汉墓普遍出土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扁壶，为旅途用饮水器，是畜牧经济的代表性器物，反映了宁夏地区畜牧经济占有重要地位[12]。

三

北朝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固原地区，共发掘墓葬6座。彭阳县新集两座北魏土洞墓，封土内有土筑房屋模型，为单层庑殿式顶，正面刻有门和直棂窗，这在中国古代墓葬中尚属首例。出土遗物以陶俑为大宗，有武士俑、文官俑、乐俑、具装甲骑俑等，深目高鼻，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13]。1981年在固原发掘一座北魏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中合葬夫妇二人，随葬品计70多件，有铜、铁、陶、金、银器及波斯银币、珠饰等。女棺未髹漆；男棺髹漆并绘精美的漆画，在棺盖、前档及左、右侧板上保留有天河图、墓主人饮宴图及孝子故事画。该墓年代约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年）前后，墓主人可能是鲜卑族人[14]。

1983年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的发掘、清理，为北朝晚期墓葬的编年研究提供了一个墓主明确、纪年清楚的标尺。墓葬由封土堆、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墓道斜坡式，在42米长的墓道上有三个天井。土洞墓室，平面长方形。墓主人头南脚北，男东女西。该墓曾被盗，但仍出土了7000余件随葬品，有陶俑、陶容器、陶模型及铜、铁、金、银、玉、玻璃器和料珠、琥珀等。墓志2合，一为李贤"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一为其妻吴辉"魏故李氏吴郡之铭"，分别详细记载了李贤夫妇的身世及主要事迹。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等处都绘有壁画[15]。北周时期，关中及其以西地区较大墓葬墓道顶上所开天井数日益增多，如李贤墓、咸阳建德元年（572年）步六孤氏墓都开三天井。其后隋唐时期关中陇右地区大中型墓中天井愈来愈多的做法，当是渊源于这个地区的北朝晚期墓制，而非传统上认为的渊源于东魏、北齐。李贤墓壁画的出土，是北周画迹的首次重大发现。壁画分三部分，以墓室门为界，第一、二部分在门外，第三部分在墓室内。第一部分绘于墓道、过洞、天井东西两壁，是两列侍卫武士，为北魏旧制；第二部分绘于过洞上方的门楼，这是关西地区甚为流行的做法；第三部分即墓室四壁的侍女、伎乐女工像。西安附近唐墓墓室壁画布局与李贤墓颇相近，反映出唐墓墓室壁画源于关西地区的成分较关东地区多些。墓室前部与甬道后部连成一体，墓志和大部分随葬器物布置于此，特别是陶俑置于甬道后部的做法，不见于同时的东魏、北齐墓葬。其制上承北魏。西安附近部分较大唐墓的镇墓兽、天王俑和武卫俑置于甬道内，当是沿袭魏周之制。随葬品中，鎏金银壶、玻璃碗和金戒指为西方工艺品，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珍贵遗物，表明了固原在古代中西交通上的重要地位[16]。

1993和1996年分别发掘了北周宇文猛墓和田弘夫妇合葬墓。两墓形制与李贤墓接近，规模更为宏大，天井数增加到5个。两墓均有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北周重臣，曾任原州（今固原）刺史。宇文猛墓中的陶俑与壁画风格近似李贤墓，在墓道、过洞、天

井、甬道、墓室处绘制壁画，惜已遭严重破坏，仅存一幅。出土遗物150余件，以彩绘陶俑居多。田弘墓仅在甬道和墓室内绘制壁画，墓中出土的4枚东罗马金币及玻璃器十分珍贵[17]。

在固原、同心、盐池、青铜峡发现的近30座隋唐墓，为进一步梳理当时活动于宁夏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物证。1974年同心韦州吐谷浑慕容威墓中出土的一方墓志，完整地记述了唐代吐谷浑世系，反映出吐谷浑和唐朝的密切关系[18]。1985年在盐池苏步井乡发掘6座唐墓。墓地依山为穴，墓道和墓室循着一个隆起的山坡依次开凿。墓室方形，穹窿顶，有单室、双室和多室之分，流行壁龛，龛内葬尸或置随葬品。这批墓葬早年被盗，发现遗物不多，主要有木俑、陶罐、石鼎、货币、玻璃球和墓志。其中M6石门扇上各雕男舞伎一人，深目高鼻，上着窄袖衫，下著短裙，登高筒靴，旋身扬臂舞蹈于一圆形小毯上，表现的是隋唐间流行于中国的中亚胡旋舞。据M3墓志铭文得知，墓主人为月氏人，何姓。据墓葬形制推断，该墓群可能为一家族墓地[19]。

1982～1995年在固原南郊共发掘9座隋唐墓葬。其中7座墓葬出土有墓志铭，除1座为梁姓墓外，6座均为史姓墓。另外2座虽没有墓志，但也极有可能同史姓有关。9座墓中仅1座属隋代。据6座史姓墓志记载，墓主均为"昭武九姓"中史国人后裔，其中隋史射勿与唐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之间互为子孙关系，史索岩与史道德之间有叔侄关系。史氏墓葬均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几部分组成。史射勿、史索岩及史道洛墓在墓道、天井、过洞、墓室等处绘有壁画，惜已脱落不存，仅史射勿墓中壁画保存较为完整，色彩鲜艳，形态生动各异，或为身着战袍、双手执刀的武士，或为白袍束带、手执笏板的文官。墓室内绘侍女，或手执如意，或袖手胸前，上身着紧身窄袖衣，下着齐腰条纹长裙，为关中地区唐墓壁画上妇女最常见的装束。各墓均曾被盗，出土遗物较少，约200余件，但仍很有价值，主要有瓷器、陶器、陶俑、金饰件、外国金银币、铜镜、鎏金铜器、"开元通宝"钱币、玻璃器。外国金银币分别为萨珊金银币、东罗马金币仿制品。为数不少的"开元通宝"钱币在初唐纪年墓葬中较为稀有。史道德墓中出土的一套由护额、护眉、护眼、护鼻、护唇、护颌、护鬓饰11件组成的完整金覆面，别具特色，较为罕见。史道洛墓中出土的一对镇墓武士和镇墓兽俑，个体较大，彩绘描金，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堪称上品。梁元珍墓墓葬形制结构及壁画布局等与史氏墓地并无二致。南郊隋唐墓地显示了隋唐墓葬形制上承周制的因素[20]。

1991年在青铜峡邵岗发掘14座铁勒家族墓地。墓葬分布密集，皆为单室砖券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葬均曾被盗，所存随葬器物极少，约140件，主要有陶器、铜器、"开元通宝"钱币、陶俑和墓志。据M14"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所载，该墓主人浑公夫人父家乃铁勒契苾姓，夫家为铁勒浑姓[21]。

宁夏境内的石窟分布约有十几处，主要集中在宁夏南部一带[22]。目前，综合测绘考察了最大的石窟群——须弥山石窟，对现存的155个洞窟进行了编号。通过对窟群的考古调查，对石窟寺沿革历史已有了基本认识。须弥山石窟所处之地宁夏南部，与陇东、陕北同属黄土高原西部，这一带的石窟大多开凿在红砂岩断面上，须弥山石窟因其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可称为红砂岩石窟类型的典型。须弥山石窟始凿于北魏末年，历经西魏、北周、隋、唐诸朝，颇具特色：洞窟分区开凿，各区时代有所侧重，为国内石窟所鲜见；僧禅窟与礼拜窟组合开凿；洞窟上方有“人”字形排水系统；洞窟内有仿木结构；体现中亚风格的穹窿顶；反映“黄土高原”雕刻风格的密集平行线阴刻；其他诸如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未完成窟多等特点，都显示了须弥山石窟的价值[23]。

四

西夏考古一直是宁夏文物考古工作比较主要的方面。60年代曾对西夏省嵬城遗址进行过调查和发掘，这是西夏考古工作的开端[24]。自70年代以来，先后数次调查、测绘与发掘西夏王陵。调查、发掘银川市西郊、灵武磁窑堡、回民巷西夏窑址，高台寺、中卫香山四眼井西夏遗址[25]及西夏时期小型平民火葬墓[26]，清理西夏窖藏货币[27]、银器和瓷器[28]，征集西夏官印。

特别是80年代以来抢救维修西夏古塔出土一批珍贵西夏文物，填补了西夏文物与考古的许多空白。

西夏陵的考古工作，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重点是考古发掘，后一阶段以调查测绘为主，同时也进行了部分发掘工作。目前已知西夏陵陵墓与建筑遗址分布范围东西宽4.5、南北长10余公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帝陵是西夏陵的主要部分，保存最好，陵园建筑由角台、鹊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陵台几部分组成。6号陵经正式发掘[29]，为多室土洞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中室、东侧室、西侧室组成。墓室曾被盗，出土文物极少，有铜丝、铜泡饰、铜甲片、瓷片、竹雕、盔形铁器和鎏金银饰等。陪葬墓有一定的墓园建筑，墓葬等级不同，建筑内容和规模也不同，最复杂的包括了外城、碑亭、月城、墓城、门址、照壁和墓冢几部分，最简单的则只有一座墓冢。1975年发掘的M182，是一座带阶梯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出土遗物有石狗、石马、瓷器、唐宋货币及少量丝织品残片，大量的随葬品为家禽、家畜[30]。丝织品有罗、绫、锦三个品种，其中异向绫和茂花闪色锦为其他地区出土织物所少见[31]。1977年发掘的单室土洞墓M177，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鎏金铜牛和石马[32]。1986年、1987年两次对陵区北端一处建筑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揭露面积4400平方米。遗址平面布局呈长方形，现存各类建筑遗址10余处，围墙、院落、道路、殿堂、水井等布局清晰

可辨，出土建筑构件、瓷器、陶器、泥塑、石刻及铜器、铁器、钱币诸遗物千余件。这处遗址为了解西夏建筑的基本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33]。西夏陵历次调查、发掘中，采集和出土文物数以千计，内容包括建筑材料、生活用具、随葬品等多种品类，石、陶、瓷、铁、金、骨等多种材质。其中以建筑材料数量最多，以西夏文残碑最为珍贵，是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34]。

在银川市西郊和灵武磁窑堡、回民巷发掘清理数座西夏时期烧制建筑材料及瓷器的窑址。银川市西郊缸瓷井窑址由窑门、窑室、火膛、烟囱四部分组成，窑址残留有兽面纹瓦当、白瓷板瓦、琉璃脊兽、槽心瓦残块等[35]。1984～1986 年灵武磁窑堡窑址的发掘，揭示了西夏窑址的特点及西夏瓷器的工艺水平。共发现窑址 4 座、作坊遗迹 9 处，出土瓷器、工具、窑具等 3000 余件。窑为南北向，平面呈马蹄形，除窑门不存外，也由窑室、火膛、烟囱组成，与缸瓷井窑址相同。出土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大类，除青釉瓷只有素面和刻花两种外，其他三类均有素面、刻花、剔刻花和点彩四种。器形有碗、盘、扁壶、罐、瓶、盆等，以碗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白釉或黑釉的瓷质建筑材料以及窑具匣钵、垫圈等。该窑产品以挖足深、底薄、外壁施釉不到底、白瓷施化妆土为特点，产品中以剔花瓷和白瓷最为精致，多面圈足扁壶及"挖足过肩"的器物颇具特色。出土的大量瓷器及建筑材料表明，磁窑堡曾是一个重要的瓷器生产中心，深受北宋定窑和磁州窑两窑系的影响[36]。1987 年调查南距磁窑堡约 4 公里的回民巷瓷窑址，采集到大量姜黄釉瓷片，与陕西耀州窑系的同类产品极为相似[37]。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在抢救清理一批西夏佛塔时，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世纪曾有过两次西夏考古的重大发现，一是 1909 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的西夏绘画及文献，二是灵武县知事余鼎铭在宁夏灵武县发现的西夏文佛经，比之前两者，这次发现当属又一次西夏考古的主要成果。其中宏佛塔出土文物内容丰富，尤为令人关注，被列为 1990 年度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拜寺沟方塔位于贺兰山腹地，为砖砌十三级密檐式塔，1990 年被炸毁，1991 年进行清理发掘。从方塔的形体结构和建筑风格分析，始建于西夏。其特点为不设基座，塔身直接起于地面，第一层塔身高耸；墨书西夏文塔心柱贯通全塔。方塔的木材样品碳测年代距今 895±90 年，树轮校正年代 855±100 年，正当西夏时期。由此纠正了方塔为"明代所建，高十一层"的说法。方塔废墟中出土文物数十种，计有西夏文佛经、西夏文文书、汉文诗集、佛画、丝织品、舍利子及铭文塔心柱等。其中 9 册约 10 余万字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译自藏文，是藏传佛教经典。从其版式、墨色、字体以及题款文字等方面深入分析，推定为活字版印本，也即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比传统所认为的木活字由元代王祯发明提早了一个朝代[38]。1996 年 11 月 6 日，经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鉴定被作为印刷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载入史册。

宏佛塔位于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东面一处废寺内，由于年久失修，塔体已经倾斜，残毁极为严重，1991年始进行修缮。塔由夯筑地基、楼阁式塔身和覆钵式塔刹组成，残高28.34米。通过勘查与清理，确定宏佛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塔上的砌砖绝大部分为手掌印纹砖，这种砖在西夏陵等西夏建筑中大量发现。塔身砖砌层中发现的钱币，全部为宋代货币，年代最晚的为公元1111年铸造的政和通宝；塔内横梁木碳测年代距今1050±90年，树轮校正年代995±95年，与西夏时期相吻合。在覆钵式塔上部的天宫内发现大批珍贵西夏文物，计有绢质彩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40余件、西夏文木雕板2000余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另有朽书、残页、发愿幡带、建筑构件等物。其中彩画既有中原风格的卷轴画，又有藏密风格的唐卡[39]。

拜寺口双塔位于贺兰县金山乡境内，双塔东西对峙，布列在一条直线上，相距80米，皆为十三层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塔，由塔身和塔刹两部分构成，不设基座。西塔残高35.96、东塔残高34.01米。双塔上的藏密遗迹十分丰富。塔刹相轮粗短壮实。西塔天宫壁面上有西夏文字"上师"两字。"上师"这一尊称最早见于西夏仁宗时期。西塔天宫中心柱木上有两处西夏文题记。西塔中心柱木碳测年代距今875±60年，树轮校正年代835±70年。东塔角梁碳测年代距今810±60年，树轮校正年代815±70年。双塔测定年代都为西夏中晚期。综上所述确定双塔始建于西夏。所出文物主要在西塔塔刹的穹室内，有绢质彩画、彩绘木雕花瓶、彩绘木雕上乐金刚像、彩绘木桌、彩绘木椅、绢纸花、印花绸等。此外还出有蒙元时期的"大朝通宝"银币及元代中统元宝交钞。其中彩画为藏传佛教绘画形式——唐卡[40]。

108塔位于青铜峡市南面20余公里处黄河西岸的峡口山东坡上，是由108座覆钵塔组成的大型塔群。出土文物有砖雕佛像、彩绘泥塑像、泥塔模、陶质塔刹等。另外，在塔群以外的三座小塔中出有西夏文经书、泥塔模及两幅唐卡，其中一幅唐卡的背面右下角墨书几行西夏文字，已漫漶不清，仅存痕迹。始建时的土坯塔，其十字折角形基座、圆肚式塔身，均为藏传佛教中覆钵塔的形制，塔群内出土的文物，具有西夏文物的明显特征。又据文献旁证断定108塔始建于西夏时期[41]。

康济寺塔坐落在同心县韦州乡韦州古城东南隅的康济禅寺废址内，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八角形密檐式十三层空心砖塔，残高39.20米，在加固和修缮时，发现第九层以下塔身所用手掌印痕砖与西夏陵及前述西夏佛塔建筑用砖相同，故推知其始建于西夏[42]。明代曾大规模修葺。塔内发现的明代佛道造像、佛道经卷等文物，十分重要。

西夏佛塔按其发展序列可分三个阶段，上述宁夏境内的西夏佛塔大多属于第三阶段（仁孝—西夏灭亡），数量不多，但特点突出，综合了唐宋、辽金藏传佛教塔的形制，对研究西夏佛塔的变化意义巨大[43]。

（执笔：陈悦新）

注　释

① 邱占祥、关键：《宁夏同心发现的一颗上狼牙齿》，《人类学学报》第5卷第3期，1986年8月；马振福、关键：《对同心东部地区"中中新世"地层及哺乳动物化石初探》，《宁夏文物》1992年总第6期；董居安、陈伟：《惠农西河桥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汪宇平：《水洞沟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62年11期；贾兰坡、盖培、李炎贤：《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8卷第1期，1964年2月；裴文中、李有恒：《萨拉乌苏河系的初步探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8卷第2期，1964年5月；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4期；周昆叔、胡继兰：《水洞沟遗址的环境与地层》，《人类学学报》第7卷第3期，1988年8月。

③ 钟侃：《宁夏考古发现和研究》，《宁夏文物》1986年总第1期（试刊号）；王惠民、余军：《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调查报告》，《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 宁笃学：《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古遗址及墓葬调查》，《考古》1959年7期；钟侃：《宁夏陶乐县细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5期。

⑤ 许成、李进增：《菜园遗存的多维剖析》，《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6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4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 钟侃、韩孔乐：《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1990年8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1期；许成、李进增：《东周时期的戎狄青铜文化》，《考古学报》1993年1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1期。

⑦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宁夏中宁县青铜短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9期；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考古》1989年11期。

⑧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3期。

⑨ 周兴华：《中卫岩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许成、卫忠：《贺兰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⑩ 李祥石、朱存世：《贺兰山与北山岩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祥石、沈自龙：《贺兰山洞窟彩绘岩画》，《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⑪ 宁夏博物馆：《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许成：《宁夏古长城》，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⑫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8期；宁夏博物馆关马湖汉墓发掘组：《宁夏吴忠关马湖汉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文物》1988年9期。

⑬ 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9期。

⑭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⑮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11期。

⑯ 宿白：《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札记》，《宁夏文物》1989年总第3期。

⑰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见宁夏文物局"中日联合考古发掘情况汇报"资料。

⑱ 钟侃：《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

⑲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

⑳ 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原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11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10期；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㉑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青铜峡市文管所：《青铜峡市邵岗唐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㉒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管会编印：《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6年。

㉓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须弥山石窟》，文物出版社，1988年；陈悦新：《须弥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华夏考古》1995年4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系：《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7年。

㉔ 钟侃：《宁夏考古发现和研究》，《宁夏文物》1986年总第1期

㉕ 杜玉冰、麦玉华：《香山四眼井遗址调查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㉖ 许成：《银川市新市区西夏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㉗ 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中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2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㉘ 宁夏博物馆：《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8年12期；钟侃：《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瓷器》，《文物》1986年1期。

㉙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该陵现编号为6号）。

㉚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该墓现编号M182）。

㉛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108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1978年8期。

㉜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1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该墓现编号M177）。

㉝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

㉞ 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韩小忙著：《西夏王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㉟ 宁夏博物馆：《银川市缸瓷井西夏窑址》，《文物》1978年8期。

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5年。

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窑回民巷窑址调查》，《考古》1991年3期。

㊳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9期；牛达生、于存海：《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国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文物》1994年9期。

㊴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8期；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宏佛塔》，《中国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㊵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宁夏拜寺口双塔勘测维修简报》，《文物》1991年8期；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中国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㊶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宁夏青铜峡市108塔维修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8期；雷润泽、于存海：《青铜峡市108塔》，《中国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㊷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宁夏同心康济寺塔及出土文物》，《文物》1992年8期；雷润泽、于存海、马振福：《同心县康济寺塔》，《中国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㊸ 宿白：《西夏佛塔的类型》；雷润泽：《宁夏佛塔的构造特征及其传承关系》，均载《中国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

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古称西域。新疆的考古工作肇始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国内外学者、探险家的一系列考察活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文物考古事业开始走向正轨，50年来，新疆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发现古文化遗址和墓葬4000多处，出土了大量精美珍奇的罕见文物，其中不少是蜚声海外的丝绸织物、干尸和各时代民族文书文物等。这些重大考古发现及相关考古科研成果，已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新疆古代历史文化准确、科学的研究考察，向人们系统地阐明了新疆自西汉起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史实，展现了古代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西域古代文化的实质内涵及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新疆考古工作为国家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壮大，为国家统一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新疆境内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遗存。1993年为配合兰新铁路复线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飞跃东池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动物化石地点进行了清理发掘。化石产于桃树园组上部棕红色泥岩石层中，地质年代为晚渐新世至早中新世，绝对年代为距今大约2400万年前后，是第三纪大型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在飞跃站发现一具大肢骨化石，在东池站采集一大巨犀属动物前臼齿。这一发现是自在鄯善十三间房附近发现哺乳动物化石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对于新疆新生代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研究，对于东疆地区数千万年来古地理、古环境和古气候变迁研究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疆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的调查，一直是工作的重点。1983年，原新疆博物馆文物队与北京自然博物馆合作，在塔什库尔干县东南34公里的吉日尕勒地点发现了一处古文化遗存。遗址位于海拔3700米塔什库尔干河流右岸三级阶地，在原生堆积中发现了人工用火的遗迹，在灰烬中发现了少量烧骨；在堆积前的堆土中发现了一件打制石

器和若干石片。遗存地层年代为晚更新世，距今至少10000年。发现的石器具有旧石器的特征。1987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干旱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考察组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和田地区哈烟达克以南玉龙喀什河右岸采集到1件打制砍砸器，在洛浦县与羊达克勒克之间第三级洪积扇上采集到打制石核和石片各1件，时代属晚更新世。采集1件打制斧状砍斫器，具有旧石器的特征。

1993年，为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河故城保护与维修工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交河故城沟西台地采集到大批打制石器，为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带来了新的突破。

交河沟西台地的石制品中除1件手镐和1件石片采自剖面上第Ⅰ层底部外，其余均为地表采集。依打制技术和类型学特征，石制品可分为石叶—端刮器为代表的第一类文化遗存（“石叶—端刮器工业类型”）和以细石核为代表的第二类文化遗存。第一类遗存石器多使用自由锤击法，类型有柱状石核、锥状石核、圆盘状石核、砍砸器及组合工具（雕刻器—端刮器、锯齿状器—边刮器、凹缺器—端边刃刮削器）等，其年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类文化遗存即旧石器遗存的石器使用间接打击法打片，类型有细石核，包括锥状细石核、柱状细石核、半锥—薄板状细石核、楔形石核、无定形石核等；此类遗存与第一类遗存是否为同期遗存，尚有待今后考古发掘和进一步研究来确定。其中两件采自晚更新世地层剖面的人工石制品，虽然还不能确定它们同地表采集的文化遗存的关系，但它们为本地区更新世地层中人类文化遗存（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在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分布较广，在帕米尔高原的山前地带、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的罗布泊地区、吐鲁番盆地、哈密绿洲、北疆地区均有发现，如哈密七角井、乌鲁木齐市柴窝堡、吐鲁番、阿斯塔那、木垒、疏附乌帕尔霍加阔那、辛格尔、罗布泊楼兰地区、阿尔金山野牛泉、克拉玛依、哈巴河齐德哈仁、150团场、交河故城沟西等。较为重要的有柴窝堡细石器遗存地点，采集的石器达600余件，有石核（船底形、楔形、圆锥形等）、石叶、石片、刮削器、雕刻器、石镞等。在同地域还采集到少量打制的粗大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矩形砍砸器等。其时代可能距今10000年至7000千年左右。由于新疆境内细石器基本上是地表采集，因此很难对其进行准确断代。有学者曾就新疆细石器从事过分期研究和讨论。

二

迄今，新疆境内已发现一大批早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或遗址，其中有相当一批的时代较早，如距今约3800年前后的罗布泊地区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塔城卫校墓地、托里萨孜村墓地、石河子水泥厂墓地、和硕新塔拉遗址。遗存和出土文物显示

出了不同地区不同的风格特征。

古墓沟墓地共发掘墓葬42座，分两种类型。属第一种类型的有36座，地表无环形列木。属第二种类型的墓葬6座，墓葬地表围绕墓穴有7圈规整的环列桩木，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向展开的列木，极为壮观，为别处所未见。墓葬均为竖穴沙室。木质葬具是在墓穴两壁紧贴两块稍有弧度的长木板，两端各竖立一块小板作为挡板构成，无底，上盖多块木板。在盖木上覆羊皮或簸箕状的草编物。个别墓中有2男或3男合葬，大部分为单人葬。死者仰身直肢，头戴毡帽，其上还插有禽鸟翎羽，全身包裹毛织物，脚穿兽皮制作的鞋。墓中出土木器、骨器、角器、石器、草编器。在其中的两个墓中还各发现1件小红铜卷。木器有盆、碗、杯和锯齿形刻木。5件木雕半身人像均头戴尖帽，脸型瘦长，梳辫于脑后。除1件外，其他4件都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双乳卡隆，臀部肥大。骨角器有锥、珠、杯。石器比较多见的是石串珠，有1枚细石镞，另还发现一石雕人像，只雕出上半身，面部用黑线划道象征眼鼻。草编织物几乎每个墓中都有发现，草编小提篓有的置于头侧，有的放在胸前。小篓内有的装有小包麻黄碎枝，有的盛有小麦粒。毛织物均为平纹。草编织物都较为精巧，有的还编出“之”字纹、波纹、几何形曲折纹饰。这批墓葬标本，经^{14}C测定，其年代为距今3800年左右。

与孔雀河古墓沟墓葬类同的古墓在罗布泊北端铁板河地区也曾发现。铁板河1号古墓地有两座墓葬，墓穴都已遭到不同程度的风蚀破坏。其中1号墓经过清理，出土1具保存很完整的女尸。死者头戴毡帽，帽上插两根雁翎，脸部盖1个草编的长扁筐，头侧放1个草编小提篓。裸体裹毛织粗布毯。毯的两端在胸前交裹用削尖的小树枝别住。下身裹1块兽皮。脚穿翻毛鞋子。在已被破坏的2号墓中清理出3个草编筐和小篓、2捆香蒲草把、2根草绳、1件木刀等。在这批墓葬中不见陶器，曾发现两小卷红铜片，不见大型铜器或铜制工具。从出土文物分析似应属青铜时代早期。

塔城市卫校西古墓群和遗址位于塔城市西北角乌拉斯台河东西两岸的台地上，墓葬在东岸，遗址在西岸。共清理墓葬16座，其中石棺墓5座，卵石砌成的石室墓7座，片石或石块砌成的石室墓3座，填石土圹墓1座。石棺墓可分为单棺和双棺两种，墓口均有盖板石。卵石石室墓可分为熨斗形墓室、椭圆形墓室、圆形墓室三种。有的有盖板石。片石一块石平砌的石室墓可分为东西两端有挡板石墓和仅西端有挡板石的两种。葬法有两种：一种是火葬，在墓室底部撒上一层骨灰，墓室中无任何随葬品和葬具。这样的墓共两座：一座是石棺墓，另一座是片石平砌的石室墓。随葬品有陶器和铜器。陶器以各种直口、斜腹或折肩、无耳平底罐为多，也有极个别的圜底小钵，为火候很低的夹砂灰褐陶，纹饰有三角形划纹、篦纹、指甲纹等。铜器有铜项珠2粒，铜耳环1对。

遗址区与墓葬区隔河相对，相距约100米。文化层厚0.5米，发现一个居住面，呈扇面状；中间下凹，为一个火坑；一个由卵石铺成的“散水”状条带，长2、宽1米；

一堆聚成塔状的羊骨头，最上层为一个羊头，第二、三层为肢骨，中间填着肋骨，可能同祭祀有关。出土物有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四类。陶器以各种大小不等的缸形器居多，也有一部分折肩平底罐。陶质为火候不高的夹砂灰褐陶，纹饰以各图案的指甲纹最多，还有篦纹、三角形划纹、麦粒纹。石器有石砧、石磨盘、石磨棒、石杵、三角形有孔磨光石锄、“丁”字系石锤、三系石斧、环刃石器、砺石、石纺轮、石球。骨制品仅有一件两侧磨光的羊距骨。铜器1件，为陶塑中镶嵌的一根小铜条；另外还有一块铜炼渣。

从出土遗物来看，墓葬区和遗址区所出的陶器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文化面貌既不同于伊犁河谷的塞—乌孙文化，也不同于准噶尔盆地东缘的古代文化，而和阿勒泰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及卡拉苏克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年代大约距今4000～3000年前后。

1993年在石河子市区北约5公里发现了3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室呈圆角矩形或椭圆形，有一座呈梯形。单人葬，侧身屈肢，随葬品置于头部近处。出土随葬品一般仅一、二件陶器，有罐、碗。出土陶器上的纹饰丰富，以阴刻的连续三角纹为主；从器壁内向外压出的乳丁纹也很有特色。陶器的器形和纹饰，同阿尔泰、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器形、纹饰较为相似。另外还出土一把残铜镰。

与上述相近的还有以大量磨制石器为特征的考古文化遗存。除原发现的阿克苏和疏附阿克塔拉等处遗址外，1979～1984年在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出土和在附近采集到大量磨制石器，通体磨制相当精致。还有少量打制石刀、刮削器，同时发现陶釜等。成型陶器都为素面，体积较大；彩陶则均为残片。还发现小铜刀、小铜锥。

新疆距今3000～2500年左右甚或至西汉前后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在东疆的哈密巴里坤、木垒、阜康、奇台、吐鲁番、托克逊、且末、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乌拉泊水库、和静和轮台、阿合奇及北疆的昭苏和新源、阿勒泰、乌苏等地都有发现。按地区分布和文化特征，目前大致可分成如下若干区域。

（一）哈密地区

1976年至1991年间，在哈密五堡墓地三次发掘清理墓葬共113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近墓室底部有生土二层台和土坯二层台，二层台上铺有弧形盖木。墓穴内大都埋葬一人，侧身屈肢。出土随葬品除墓主人随身衣物外，大多是日常用品和生产工具。随葬器物有陶罐、木桶、木勺、木梳、石杵、青铜小刀、锥、带把小镜、镞、牌饰及装饰物。部分陶罐上及木桶上饰有红衣黑彩和红彩，主体纹饰均为倒三角形图案。生产工具有石磨、木耜、木质三角形掘土器、木柄铜锛、骨针等。另外还有狩猎、驯服牲畜的石球、笼头、马蹬、鞭及木质实心圆辐车轮及马、牛、羊骨和小米饼、青稞穗等。由于墓地所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尸体大多保存良好，是一批极为宝贵的

人类学标本。皮帽、皮靴、皮大衣及各式平、斜纹毛织物部分还相当完好。皮革的鞣制、脱脂水平较高，至今仍非常柔软。毛织物纺织精细、质地细密，着色美观大方，图案种类繁多。时代约为公元前1300～前1000年左右。

哈密市林雅墓地暨天山北路墓地是80年代末发现新疆青铜时代遗存中较早的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

墓地位于哈密市区火车站之南、西河坝上游小河沟西侧居民区及天山北路路段内。1988至1997年间又连续多次进行了发掘，计发掘墓葬70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墓葬平面分布密集，打破、叠压关系复杂。墓葬形制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和土坑竖穴土坯墓两种。随葬品一般较少，仍能反映出较悬殊的差异，个别女性墓随葬品数量、种类明显丰富。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铜器、骨器、银器、珠、贝等，另还随葬羊骨、牛骨，其中以羊骨为多。陶器分素面陶和彩陶两种，均为夹砂陶。陶色分红陶和灰陶（或褐胎灰皮）两类，器形有双耳罐、单耳罐、杯、壶、钵等。铜器主要为装饰品，如耳环、手镯、圆形牌饰、扣形饰、珠、管、簪等。另有少量镜、刀、镞、锥等。银器均为簪，骨器多为长方形骨牌饰。石器器形有珠、簪、石杵，其中以珠为多。石杵为选取自然石块未经加工直接使用，顶端遗留敲砸痕迹。迄今为止还未见有铁器出土。

由陶器器形、葬俗、墓葬结构等分析，该墓地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殷，下限约相当于春秋。墓葬出土的部分陶器器形、彩陶纹饰与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并与玉门火烧沟类型文化关系密切。可以确定这处墓地是目前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处与甘肃等地区考古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墓地。

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90座。墓葬用土坯砌成，多呈长方形，亦有椭圆形和方形有竖穴坑墓，竖穴土坑二层台墓及地面上的土坯墓。有多人合葬、单人葬、多人侧身屈肢葬。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木器、铁器、石器等。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少数是夹砂灰陶和黑陶，手制。彩陶较多，基本上是红衣黑彩，花纹主要有曲线纹、锯齿纹、水波纹、S形纹、倒三角纹、十字双钩纹、竖线纹等。器形主要有单耳罐、单耳钵、单耳杯、单耳豆、腹耳壶。钵和杯底一般都穿有小孔，口部往往被切割后又重新打磨光平。铜器有刀、镞、锥、镜、牌、耳、环、扣等。铁器有刀、剑和戒指。木器有俑、盘、碗、勺、桶、锥等。石器有杵、铲、磨石等。时代约为公元前1300～前500年左右。

（二）吐鲁番盆地及乌鲁木齐地区

1981年在吐鲁番发掘艾丁湖鄯善苏贝希古墓。1986年在南山矿区发掘东风厂古墓、在乌鲁木齐发掘乌拉泊水库古墓，出土文物基本类同。如东风厂古墓地面为积石垒砌，竖穴石室，口小底大，有单人葬和多人葬。随葬物除墓主人身上的毛、皮、毡等残片外，有陶器、木器、铜器，还有小铁刀；陶器有素面罐、碗，多见单耳彩陶罐，少量单

耳带流彩陶罐，还有个别单耳高足彩陶豆。彩陶花纹较多见的仍为三角纹、倒三角纹、网状纹，也有针叶纹、棋盘格纹、菱纹、波纹等。

在阿拉沟东口及鱼儿沟发掘清理了古代墓葬80座，其中73座为石室竖穴。石室以砾石砌成，上部盖木，实行“丛葬”，人骨骨架有数具、十数具、数十具不等，重重叠压，或至三、四层。仰身直肢。肢体不全者，均见一些头骨肢骨上有明显刀砍痕迹。随葬品中除大量陶器外，主要有木器，包括盘、盆、木勺、杯等，腿绊、鼻栓等牧业用具，还有纺轮、木簪、钻木取火器等。此外还有石杵、砺石、石锥等。海贝、骨雕、石骨串珠及小件铜器（小刀圆铜片、铜耳环）等，都有所见。陶器均手制，有盆、钵、罐、壶、小杯、豆等。彩陶占很大比例。器物外表及器口内沿大多见彩绘，有红衣黑彩，少数为红衣红彩，图案有三角纹、三角形网状纹、涡卷纹或通体饰平行竖线及不同方向的平行短斜线纹构成的几何纹等。墓主人长发梳辫，上罩丝质网状发套，深目高鼻。着装主要为各色毛织物及毛皮。墓内殉有马、羊骨。墓葬中见有漆器、丝织物，个别墓中见小件铁刀。时代为春秋至战国时期。

7座竖穴木椁墓的地表上有封堆，长方形竖穴地坑墓室，东西向，规模比较宏大。墓室内填石积沙，沙石下为木椁，椁室以纵横叠置的圆形松木构成。入葬一或二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个别骨架保存较好，头骨见十分锐利的小钻孔，孔径5毫米。随葬品有陶器、金器、银器、漆器、丝织物、货贝、珍珠、小铁刀、铁镞、羊骨等。陶器都是细泥红陶，压磨光洁，饰红陶衣。器形有钵杯、筒形带流杯、浅腹盘等。漆器残朽过甚，大都形制不明，其中一件胎朽皮存的漆盘，黑漆朱纹，盘边绘有弦纹四道，盘底为流云纹。各墓内普遍出土金器。有配饰金叶、金泡、串珠状金饰等。具有特征的是各种野兽纹金牌饰，如虎纹圆金牌、对虎纹金箔带、狮形金箔饰、虎形方金箔饰等，另外还有六角花形金饰。银牌的主体图案也是各种兽纹。铜器主要为承兽方座铜盘，喇叭形方座，座上承方盘，盘中伫立二异兽。在一方形泥饼上有一十分清晰的绫纹罗的印痕。小铁刀与马、羊骨放在一起（或置于木盘上），可以判断日常饮食以肉类为主食。墓葬的规模及丰富的随葬品有力表明，此处是一批统治阶级上层贵族的墓葬。其时代大致为战国至汉代。

乌鲁木齐市区东南约50公里柴窝堡湖的东岸地带地处天山山脉的凹地中部，依山傍水，遗留有较丰富的文化遗存。墓葬大致南北排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分布着70多座墓葬。乌喀公路以南分布着45座墓葬。封堆的直径一般在30米以上，最大的为50米，小型的一般在10米以下。大型封堆7座，大致呈南北向排列。1991年共清理发掘20座。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竖穴偏洞两种，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一次葬为仰身直肢。葬具以木椁为主，随葬品较贫乏，尤其是陶器，仅在个别墓葬的填土中有极少发现。在墓室底部没见一件陶器随葬。铜铁器有带柄镜、箭头；石器有石环

和砺石等；骨器有骨锥；另外还有一些装饰品如珠子、饰件等。铁器残损严重，多是一些锈块，许多墓内都有发现。1994 年配合高等级公路建设又清理墓葬 15 座，出土彩陶、铜器等文物，年代约在西周至汉代。

1980、1988、1992 年在鄯善苏贝希墓葬遗址先后发掘Ⅰ号墓地 5 座墓葬、Ⅲ号墓地 27 座墓葬。大部分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为竖穴偏室墓。Ⅰ号墓地葬式均仰身直肢，有成年男女和婴儿合葬、成年男性或女性和婴儿的合葬等现象。随葬器物有石器、陶器、铁器、骨器、木器、角质器、皮革制品、毛织物等。因气候干燥的原因，服饰保存完好。男性身着皮大衣，内套毛织衣、毛织裤，足蹬长靿皮靴。女性身穿皮大衣，内套黑色毛织衣、彩色毛织裙，足蹬短靿皮毡靴。女性头饰极富特点，双辫梳于脑后，盘绕在头上，用网状发罩固定，并有黑色发套装饰。头戴羊角状黑色毡帽。依据^{14}C数据和出土文物标本判断，墓地时代为战国至西汉。Ⅲ号墓地葬式多仰身屈肢，也有俯身葬和二次葬。并发现多例上下层叠葬的，中间由土层隔开。尸体下有圆木或苇草铺垫的葬具。半数尸体以干尸形态保存下来，服饰、皮肉、毛发犹存。毛布的衣、裙、裤和毛皮裤以及大块毛毡及其制品，均为畜兽皮毛制品。妇女头上的装饰尤其奇异，或伪装发髻高耸于头顶，或以毡为骨，头发缠绕其上，盘于额前。个别尸体上还发现有纹面和缝合的手术刀口。随葬品除自身穿戴的衣物外，以陶器和木器为大宗。陶器多夹砂陶，手制，有少量彩陶。纹饰以带装饰的涡纹为主，器形多深腹罐、平底碗和单耳直腹杯。木器以盘（俎）为主。还有装在箭箙内的成套弓、箭及钻木取火的钻杆。另有各种植物种籽和食物。年代与Ⅰ号墓地相同。

苏贝希遗址位于火焰山腹地吐峪沟西坡台地上，遗址东距Ⅲ号墓地 150 米、北距Ⅰ号墓地 600 米。南北和东西长近 100 米，面积 4000 余平方米。遗址表面坑坑洼洼，布满陶片、石器。有些房屋基址高出地面。1992 年发掘 300 平方米。表层下即为遗迹，共清理出房址 3 座、灰坑 18 个。其中 F1 比较完整，长方形，两间半。西间似马圈或库房；中间住人，有灶、坑；东间似敞篷作坊，有陶窑、泥地、柱洞和其他设施。各间均有一门，朝南。营建方式是在地上挖出半地穴，留出墙基，然后向上砌土坯。房前有平坦的长方形广场，两侧有灰坑。出土有石器、木器、毛织品、陶器和陶片。其时代与苏贝希Ⅲ号墓地相同。

1988 年清理发掘了鄯善县洋海墓地 82 座墓葬。墓地地处沙砾戈壁，无封土标记。墓葬形制多为竖穴土坑墓，矩形，个别有生土二层台。另外有 3 座较大的墓，以墓口为中心，在其外围用土坯砌一圆形圈子。尸床为框架式榫卯结构，床面顺铺一层细长的木棍。葬式多为仰身屈肢单人葬，也有二次葬的。随葬品以木器、陶器为多，还有毛织品、铜器、角器、铁器等。木器有圆木桶、木盘、木梳等。陶器中彩陶占相当数量，多黑彩。器形有罐、杯、豆、瓶等。铜器多为小饰件，还有圆形素面带纽镜、三翼带铤镞

等。铁器有马衔和少量锈块。墓中有一些弓、箭，还有一定数量的畜骨，以羊骨为主，农作物有粟、麦（待鉴定）、秆穗。时代早不过西周，晚不过汉代。

（二）和静—轮台地区

1983年在和静沿天山南麓坡下北哈拉莫墩乡北的察吾乎沟发现大片古墓群，分布在四个台地上。1983～1988年连续在此发掘古墓500多座（其中100多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发掘）。墓葬从地表大体可分为石圈和石堆墓两种。石圈有方形和圆形，中间积石，积石下为竖穴石墓室。墓口用长条形石块封盖，也有的以盖木排列封口，上面再压砾石板。墓中尸体大部分为仰身屈肢，有二次葬。侧身屈肢和坐姿葬极少、合葬墓多，单人葬少。在墓底置放卵石，石上放捆扎的木棍和细树枝，上面再放1张芨芨草编的席，席上置尸体。部分墓葬在石圈附近有儿童附葬坑，还有殉马坑，一般内葬1～3个马头。随葬物似多为实用器，有陶器、铜器、石器、木器、骨器、金器，个别墓地有铁器以及毛麻织物。陶器为夹砂红陶，有素面陶和彩陶，器形以平底器为主，很少圜底器，不见带足器。器种以单耳带流罐为主（素面和彩陶都有），约占出土陶器的一半。彩陶为红色陶衣绘红、黑彩，有通体彩绘和部分彩绘之分。纹饰仍有上述地区常见的三角纹和网状纹，又较多见到山形纹、菱纹、棋盘格纹、虚实相间的方纹、回形纹（云雷纹），这是察吾乎沟彩陶的主题纹饰；此外，还见有变形鸟纹、卷草纹、井字纹、田地纹、垂幛纹、曲波纹。铜器有刀锥、马衔、镜、斧、铃铛、耳环。石器有锥、砺石和少量纺轮。骨器有纺轮、锥、马镳、串珠等。金器主要是小装饰片。铁器有小刀。察吾乎沟古墓文化经^{14}C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目前学术界已将察吾乎沟墓地文化遗存命名为察吾乎沟文化。

与察吾乎沟墓地墓葬性质及文化内涵相同的还有轮台县群巴克墓地。1985～1987年度清理发掘的50余座墓葬。墓葬表面有圆丘形砂砾土堆，其下有一至数个墓室，有的墓室周围又有儿童墓和马头、骆驼头及狗头坑。墓室有竖穴土坑，有的有短浅墓道。墓室中往往立有木柱，口部棚架盖木，多有焚烧现象。个别墓葬没有地下墓穴，而是用木头在地面上建成墓室和墓道。流行多人二次合葬，每墓室最多达数十人。骨架较完整者或侧身屈肢，或仰身直肢或屈肢。头向无定。随葬品基本上与上述察吾乎沟墓葬一致，惟器形稍大，彩陶花纹比较简单，主要是内填平行斜线的正、倒三角纹和网格纹。另外还有铜镞、铜戈、带柄铜镜、铜牌、透雕饰品、铜带扣、铜马衔、铁刀、铁镰、铁短剑、磨石、石锥、骨锥、骨镞、骨镳、木盘、木杯、钻木取火器、木纺轮以及毛织物和小麦粒等，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00～前500年。

1993年，在和静拜勒其尔古墓地发掘了8座相当于察吾乎沟文化晚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铜器、包金铜饰件。同年，对和静哈尔哈提沟古墓群Ⅰ号42座墓葬、Ⅱ号墓地6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墓葬性质与察吾乎沟文化基本相同，但有迹象显示，一些宽扁

带状耳涡纹彩陶壶，似乎与阿拉沟及吐鲁番地区古代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

（四）拜城克孜尔墓地

位于天山南麓拜城盆地东南，墓葬分布集中，共发掘160座，出土陶、石、骨、琉璃、铜质各类文物约1000余件。墓葬地表封土呈圆丘状，顶部中间有凹陷，封土下墓口的周缘有呈圆环状的卵石围圈或埋有幼儿的附葬墓。葬俗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二次葬中有合葬和多个体的从葬。随葬品中成组合式的陶器，大都置于墓室的西壁，即头部。男性普遍随葬小铜刀、砺石，女性随葬有纺轮、饰珠等。随葬品中陶器数量最多，均为手制的夹砂红陶、红褐色陶，灰陶极少。器形有单耳釜、双耳釜、双耳罐、单耳带流罐、单耳盆、单耳钵、杯、壶等，多彩陶。陶器的普遍特征是：敞口、鼓腹、圜底，彩陶纹饰以连续重叠的三角纹、水波纹、网格纹为主体，多绘在陶器的腹、肩、颈部。铜器有斧、镜、刀、锥、扣、纺轮和饰件。骨器有纺轮、珠饰；石器有砺石、石锥、石镰，琉璃器有珠饰。其时代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五）托什罕河流域—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

墓地位于库兰萨日克乡西南5公里左右的托什罕河北岸台地上，共有墓葬44座。墓葬地表皆有封石或石围封石标志。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10座。墓葬形制多为单室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东壁有二层台，M6、M8墓室东壁有龛。有的封石堆下无墓室，有的封石堆内有呈丁字形排列的3座墓室，无葬具，有些墓室填土中有朽木痕。墓向南北，迁葬，骨骼零乱不全，少数集中堆放。有单人葬也有多人葬。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金器和装饰料珠等。陶器出土数量较少，多放置于龛内和二层台上，均两件。器形有钵、瓮、罐、瓶等。红陶器表施红褐色陶衣。多素面，仅一件陶瓶腹部连续刻划10组“ᔕ”纹，手制，经过打磨。铜器均为小件装饰品。铁器有小刀、矛等。金器有圆马牌饰、鹰鹿饰、变形树纹牌饰和耳环戒指等。少数墓随葬鹰骨、羊骨等。从这批墓葬的随葬品和葬俗来看，墓葬的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

（六）北疆沿天山地区东段

木垒县四道沟遗址进行过小规模发掘，揭露面积约200平方米，发现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形制不清，仅见有柱洞和灶坑，柱洞内填以卵石，有的底部垫以柱础石。灶坑多用卵石围砌，个别为灰坑。灰坑均较小，形状不一，有直壁圆形、直壁半圆形、锅底形、袋形和不规则形。墓葬有4座，其中3座是竖穴土坑，每墓葬1人，仰身直肢或仰身屈肢，头向西南或西北，均无随葬品。另一座是竖穴洞室墓，内葬一老年妇女和两个儿童，共随葬5件小铜环和1件铜饰件。出土遗物中陶器均为夹砂红陶，手制，素面，有的口沿处戳一圈小孔，器形有双耳罐、双耳盆、单耳罐、单耳筒形杯、钵、盘、釜、器盖、纺轮、刀范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在红色陶衣上绘黑色或红色彩绘，花纹有多格纹、菱形纹、涡纹、内填曲线的圆圈纹、竖条纹、水波纹和竖、横、斜、短线纹

等。石器有细石器、石片石器和磨制石器。细石器主要是圆柱形、长方体形和不规则形石核。石片石器多有锐利的锋刃，但无第二步加工痕迹。磨制石器较多，主要有球、杵、磨盘、磨棒、锄、锛、钻、臼、纺轮等。骨器有镞、锥、针、纺轮、梳等。铜器有小刀、环、饰件等。时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前100年左右。

吉木萨尔县大龙口石堆墓，位于县城南。这里北倚天山山脉博格达山冲大龙沟山口。源于博格达山的东大龙口河顺沟北下从村东穿过。循大龙沟山谷越博格达山是一古道，山南即吐鲁番盆地。现存有墓葬9座（均已发掘），其中大型石堆墓3座，这3座封堆均因取石被扰乱。封堆残高0.5～1.5米、直径22～54米；另外6座皆为小型封堆，石堆微隆起地表，也大多被扰乱，直径3～5米。小型封堆下皆为土圹竖穴，东西向，墓口呈椭圆形，死者或二次葬，或仰身直肢葬。头朝西，皆单人葬。随葬品很少，置于墓室西北角或北侧，有陶器、铜耳饰、玛瑙珠、残铁器、羊骨等。陶器皆夹砂红陶，手制，有单耳罐、钵、双耳釜等。个别为彩陶，饰竖条纹、网纹。在M9内还出土有一长1.9米的鹿石。墓葬的年代可能为战国到汉代前后。

1993年在阜康阜北农场、1994年在阜康市甘河子等地也陆续发现了与四道沟期相同的文化遗存。北疆沿天山地区东段的古文化遗存与乌鲁木齐地区发现的大致接近。

（八）伊犁地区

新源县铁木里克墓地发掘了墓葬15座。其表面有圆形封土堆，有的在封土堆周围又有圆形石圈或在封土堆下墓室口周围有圆形石圈。封土堆下有一二个墓室，或为竖穴土坑，或为竖穴洞室。每墓室葬一二人，即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骨架完整者仰身直肢，头向西。随葬陶器均夹砂红陶，手制或轮制，器形有壶、罐、盆、钵。另外还有带柄铜镜、铜簪、铜锥、铜镞、圈足球形包金铁器等。时代约公元前650～前250年。

新源县七十一团一连驻地的一处遗址经过发掘，发现有房址、灶坑、灰坑和墓葬。房址为半地穴式，呈长方形或圆形，中心和边缘有柱洞，有的有斜坡门道。灶坑和灰坑有长方形、圆形、袋形等。墓葬有竖穴土坑和竖穴洞室两种，每墓葬一人，或一次葬，或二次葬。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陶器多夹砂红陶，手制。有少量彩陶片花纹不清，器形有罐、杯和碗。石器有磨石、杵、球和砍砸器。骨器有镞和刀。铜器有簪和残饰件。铁器有刀和带扣等。另外在这里还发现过几件罕见的大型铜器，计有跪姿武士俑、高足承兽方盘、兽足四耳大釜、对虎圆环、双对兽圆环和铃等。

土墩墓与哈拉图拜、夏台、波马、萨尔霍布墓葬基本相同，应该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哈拉图拜发掘了3座，其地表有大型封土堆，南北向排列，土堆之下有一二个墓室，竖穴土坑。每室外葬一人，或一次葬，或二次葬。一次葬者为仰身直肢，头向西。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夹砂红陶，手制，器形有碗、盆、钵、壶和盘。另外还有铜斧、铜珠、铁剑、金箔饰件等。昭苏县、夏台、波马和萨尔霍布墓葬共发掘了19座，其表面

有大型或巨型封土堆，呈南北向排列，封堆下有一至四个墓室不等。墓室均为竖穴土坑，内有不同规模的木椁、木棺或木框架葬具。每室葬一二人，一次葬和二次葬并行。较完整的骨架均为仰身直肢，头西足东。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金器、毛丝织物和漆器残片等。陶器有壶、罐、盆、钵、盘、碟、烛台、单耳杯、双耳杯等；有个别彩陶，橙黄色陶衣，红色彩绘，花纹繁缛，图案有倒三角纹、棋盘纹、多层折线、网络和同心半圆等。铜器有碗、锥和饰件。铁器有刀、锥、钉、剑、铧等。金器有戒指、耳环和金箔片等。时代约为公元前450～前350年。

索墩布拉克古墓群位于察布查尔县西南琼博拉乡，有石堆、石圈墓约120余座墓葬，大多呈南北向排列。因部分墓葬的封堆已遭破坏，清理发掘了其中的31座。以单室墓为主（28座），双室墓只有3座。墓室形制和结构可分三种：1. 土圹竖穴，西端略大于东端，竖穴内填黄土夹卵石，人架和随葬品在底层。2. 竖穴木椁墓，所谓木椁只是在墓口用原木覆盖（仅2座）。3. 竖穴墓道偏室墓，竖穴底部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大多铺一层原木。偏室在竖穴北侧。紧贴竖穴北壁大多竖置一排原木，同二层台上横铺的原木相接，似起封闭偏室口的作用。竖穴墓道内也填黄土和卵石，人架大多在偏室内。二次葬者，人骨在墓道和偏室内均见。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头西，面上。骨架完整，皮肉不存。少量为二次葬。出土文物50余件，随葬品均置于死者头部。其中陶器约30件，手制，夹砂红陶，外涂红色陶衣。器形有单耳罐、无耳罐、盆、钵、壶、碗等。均为圜底器，不见平底器。彩陶饰红彩。纹饰以植物纹和折线纹为主。还见少量的铁器（已锈蚀，器形不清）、铜器和陶纺轮；部分墓中随葬有牛、羊、猪骨，多置于盆、钵内，同锈铁残片共存。

这批墓葬中，竖穴墓道偏室墓占一定比重（共13座），这在伊犁河谷古墓葬的发掘中还不多见。所出陶器的形制和纹饰有些同昭苏乌孙墓所见相似，也有一些同特克斯县和前苏联境内的塞克墓葬所出相同。其时代似在战国至西汉时期。

（九）塔什库尔干地区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墓地发掘了40座墓葬。地面上有圆形石堆和圆形、方形、长方形石围，其下有一二个竖穴墓室，有的口部棚盖木头，有的有木框架葬具。葬式有火葬和土葬两种，前者一般仅见骨灰，后者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之分。多为单人葬，骨架完整者多为侧身屈肢，亦有仰身直肢和俯身屈肢者，头向无定。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铁器和铜器。陶器均夹砂红陶或灰褐陶，手制，少数饰有凸弦纹和指甲纹，器形有釜、罐、碗、钵等。铜器有镞、牌、泡、镯、指环、羊角形饰件等。铁器有环首小刀、镯、指环、管等。时代约为公元前900～前500年左右。

（十）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克尔木齐墓葬共发掘了82座。墓葬表面或有石堆封土，或无封土，有数座

墓周围绕以长方形石围或土围，在部分石围或土围和石堆封土前立有石刻人像或长条石。墓葬有竖穴土坑和竖穴石棺两种，有的在土坑或石棺中又有小石棺，每墓一般葬1～2具较完整骨架，姿式与头向无定。同时还有大量零乱骨骼。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骨器和铁器。陶器多为青灰色，手制或磨制，饰有篦纹、划纹、点纹、压印纹、波带纹，器形有罐、橄榄形罐、豆形器、壶等。石器有罐、杯、钵、灯、杵、桂叶形石镞，骨器有镞、带扣、饰件，铜器有刀、矛、镞、镜，铁器有刀、锛、带扣、钉等。

（十一）且末地区

1985年共发掘了36座扎洪鲁克墓葬，墓室为竖穴土坑，口部用木头棚盖，其上又铺有马皮、草席和芦苇。多人合葬，即有一次葬和二次合葬。多为干尸，保存完整者为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脸部和肢体上有纹身花纹。随葬品有陶器、木器、毛皮和毛织衣物等。陶器为夹砂红褐陶，手制，器形有钵、带流罐和单耳罐，有的敷黑灰色陶衣。少量彩陶，红衣赭色彩，倒三角纹。木器有弓、箭、盘、桶、杯、勺等。1996年抢救性发掘了100余座墓葬。出土了数千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这批文物以各种色泽的毛织物为主，显示出当地居民高超的毛纺织工艺水平。出土的1枚铁质绣花针保存相当完好，其形状、色泽与现代钢针几无二致。还有2件战国时代的乐器—竖箜篌，这在新疆考古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土。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木器、漆器以及面点、化妆器具、干尸、汉文文书等，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且末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发掘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看，时代为战国至东晋。

1995年发掘的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位于且末县城北、车尔臣河西岸。残存部分面积为4000余平方米。清理的12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形状可分方形、长方形、椭圆形和刀把形四种。多数墓葬的墓口设有苇席和木棍构成的棚架，并有被焚烧的痕迹。所有墓都是合葬墓。死者较多的墓中骨架可分几层。一次葬较多，二次葬也有。一次葬的葬式为仰身屈肢。葬具有柳席、木质尸床、裹尸布或垫尸布等。随葬品出土近200件，其中以木器、陶器和纺织物为主，还有少量的铜刀、铁刀、铁镞、金箔片等。木器种类较多，有盘、案、碗、盒、纺轮、梳子等，显示出较高的木工技术。陶器均为素面灰砂陶，圜底器占多数，器形有单把带流罐、单把罐、钵、高领罐等。毛织品出土也较多，丝织品较少，但很精美。汉晋时期墓葬出土的织锦上还有“延年益寿”的字样。据分析，这一墓地是一处族葬地，年代约从战国时期延续至东汉。

三

汉晋—唐代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集中在以下几个项目，且较为引人注目。

1979～1980年先后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四次以楼兰古城为重点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工作，基本摸清了考察沿线的文物古迹分布情况，并发现了新的文物点。重点调查了米兰城堡、吐蕃古城、米兰佛寺塔庙遗址、米兰古代灌溉渠道、墩里克烽燧遗址、海头古城、LL古城、LK遗址。楼兰古城及周围都发现和采集到细石器，发掘了楼兰古城城郊的平台墓地、孤台墓地。

楼兰古城周围地区采集的文物标本有石器、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铅器、玻璃器、金器、骨器、料珠、纺织品、钱币等。细石器有石核、石叶、琢背小刀、刮削器、石镞、矛等。磨制石器有砺石、石杵、马鞍形石磨盘、石棒、石花押、石斧等。陶器有纺轮、罐、壶、钵、甑瓮、杯等。木器有木梁垫、门、木雕、木饰件、纺轮、栓、梳、梳、臼、桶、罐、盘、勺、木筷、木匕、漆耳杯、奶搅拌器、人形木件、梭形木件等。铜器有镞、釜、镜、镊、戒指、扣饰、钉、环、发钗、小铃等。铁器有镞、钉。铅器主要有纺轮。玻璃器均为残件。金银器有金戒指、银戒指。骨器有梳、鞘、雕刻饰件。料珠质地有骨、玻璃、玉髓等。纺织品有丝、毛、棉、麻四大类，丝织品主要有锦、绢；毛织品主要有布、绳、毯、辫带及毡制品；棉制品有布和纱布；麻织品有麻鞋、绳等。钱币主要有五铢、榆荚半两、小五铢、小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贵霜铜币等。另外还有海贝、珊瑚和蚌饰件。

平台墓地发掘墓葬5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一座为带斜坡墓道的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单人葬和多人丛葬，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随葬品计有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骨器、绢、钱币、石杯等。陶器有杯、罐、豆形灯；木器为长方形木案；铜器有铜镜（连弧柿蒂纹镜、家常富贵镜、星云纹镜）、耳饰、五铢钱；铁器有镞、残器件、耳饰；骨器有弧形器、耳饰。

孤台墓地发掘墓葬1座，竖穴土坑墓。墓口盖木和苇帘，墓底有苇床，为丛葬墓。有人骨架8具，均仰身直肢。随葬品陶器中有陶杯2件。木器有盘、杯、梳、篦、弓、箭等。漆器有漆杯、漆盖、漆碗等。铁器仅铁环1件。骨器有刀形器、弓形器。皮革制品有皮革、皮条。丝织品有锦、绮、绢、刺绣。锦上织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长乐明光”、“长寿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文字。毛织品有毛布、缂毛、毯、毡。棉织品均为素色棉布。时代为西汉至东汉。

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在1995年获得重大考古收获，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是考古队在对尼雅遗址的一处聚落遗址的勘测途中偶然发现的，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首次发现佛殿并揭取了佛教壁画。佛殿平面呈“回”字形，中部有方形基础，从回廊的东北清理揭取出佛、菩萨等壁画残片，对研究佛教文化在丝绸之路南道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偶然发现的近100平方米汉晋时期尼雅绿洲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墓地抢救性地发掘清理墓葬8座，有夫妻合葬、单人葬等葬式。棺盖上盖有绣花毛

毡或地毯。其中用胡杨木等树干刳挖成的船形棺墓5座，均单葬。随葬物多寡不一，木棺外侧一般置有陶罐、木器座、木碗等物；M1、M2、M7墓主系男性，随殉有弓矢等物品；M5、M6有女性各一，随葬有纺轮及丝毛织品。M5棺内横陈一木叉上绕系有线轴、纺轮一套，色彩艳丽的晕染毛织袋、蜻蜓眼料珠及小皮囊等，晕染织袋内装有铜镜等物。M3、M4、M8均为矩形箱式木棺，一般葬2～3人，随葬文物丰富，保存状况良好。3号墓男女主人身盖彩色斑斓的锦被，穿锦袍、锦裤、锦袄、绸衣、红呢绣花靴、皮底色花凉鞋，均覆盖锦质面衣。男主人头戴白绸风帽，女主人额部扎一条色彩艳丽的几何纹丝质组带，耳垂带一组珍珠、金叶耳饰，佩带红绢珠形项链。男主人生前所用过的弓、弓袋、箭、箭箙、皮腰带上配置漆皮压花刀鞘、束发锦带及女主人的裙均挂在各自的木叉上。女主人生前用的铜镜放在一锦袋中，镜袋、梳篦、化妆品、针线、头发置于漆奁盒内。其他随葬品有木盆里的羊腿，上插有木柄铁刀。木碗内可见干缩的葡萄、梨、糜谷饼等。综观整个1号墓地的随葬品，最为珍贵的是结构复杂、色彩绚丽、花纹繁缛、保存完好的丝织品。尼雅出土的织锦类有十余种，图案丰富多样，有虎、龙、狮、豹、马、鹿、骆驼、孔雀、鸟、舞人、辟邪、骑马武士、猎人狩猎、游鱼、大雁、云气纹、茱萸纹等。间织小篆的吉祥语是尼雅95墓地出土织锦的一大特色，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世毋极锦传二亲”、“世极锦宜二亲传子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千秋万岁宜子孙”、“登高明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恩泽万岁大孰常葆二亲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广山”、“文大绣”、“讨南羌”、“金池凤”、“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

1995年尼雅的考古发现，是新疆考古学上一次重大发现，对尼雅考古学以及汉晋西域考古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古代中西文化、经济、政治交流史，丝绸之路史，民族史，古代科技史，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此项调查与研究的学术报告第一卷已正式出版，第二卷在编辑中。

1995年抢救性清理发掘了尉犁县营盘墓地。共清理发掘墓葬100余座，有木桩标志的墓葬32座，获得重要文物200余件。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坑墓和竖穴土坑二层台墓两种。葬具一种是四足矩形箱式木棺，另一种将胡杨树干截去两端刻为半圆木，有的凿空中部，有的则利用原有的自然空槽，或将尸体敛入其中，或将半圆木棺倒扣在尸体上。木棺两端多嵌有木板，棺口盖木板。仰身直肢，头向东或东北。仅见一例男女合葬。由于气候极端干燥，随葬品及随身衣物保存良好。尸体用毛毯、毛毡或素绢包裹，脸部盖有丝织或毛织物，鼻孔内塞织物鼻塞。羊绒或毛布缠绕头部，下颌部至头顶用绢带扎系。长发在脑后挽结。额前、下颌都系有贴金的绢带。从服饰看，有绢披风、淡黄色绢夹袍、纱绮夹衣、蓝绢半绒袄裙、双面罽袍、毛绣长裤、编织履皮靴、毡袜等近

20种，为研究西域古代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除随身衣物外，随葬品还有木器、铜器、金器、陶器、漆器、玻璃器等，以木器和衣物所用纺织品为大宗。木器主要有罐、碗、四足方几、三足圆几、圆盘、方盘、钵、小粉盒、纺轮、梳、弓箭等。纺织品有绢、缣、绮、锦、毛绣、染缬、毛毯、毡、罽、褐等。其他随葬器数量很少，陶器、漆器、玻璃器仅有一二件。随葬品的摆放有一定的规律，死者前端置木几或木盘，上盛放羊腿、羊肋，旁置一木碗或木罐。男性一般在身体一侧放置弓箭，腰间置铜刀或铁刀；女性一般在头一侧放置奁盒、木梳、铜镜（铁镜）、铜剪（铁剪）及纺轮、碎布片。

营盘墓葬最引人瞩目的发现是1997年5月初开启的15号墓木棺。该棺为四足箱式，棺外覆盖狮纹栽绒毯，棺四壁及棺盖满绘圆圈卷草、花卉图案。棺内葬一男性，仰身直肢，身材高大。身盖素绢衾，面覆麻质人面形面具，表情温厚安详，栩栩如生。身着红地对人兽树纹双面罽袍，素绢贴金内袍，菱纹四瓣花毛绣长裤，绢面贴金毡靴。这些服饰的织绣图案精美富丽，构思新颖奇妙，令人称绝。头枕鸡鸣枕，地为菱形对兽纹绮，绮上加绣蔓草纹图案，枕角各缀四瓣红绢，下垂四珍珠；腰间系绢带，上挂绮面香囊及丝制小饰件；左臂缚一长方形蓝绢地刺绣品，胸前及左腕处各置一绢质冥衣。此墓所出规格甚高的葬具、衣物、殉品，在新疆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其中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面料采用精纺双面罽，通幅织出以石榴树为轴两两相对的男性裸体人物、动物纹样，风格融希腊文化及早期波斯艺术于一体，表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罽袍下襟接缝的一片卷藤树纹纬二重罽，花心部分采用了独特的“挖花”技法，是研究毛纺织技艺弥足珍贵的资料，被专家认定为“奇品”。这一发现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多次抢救性清理发掘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墓葬结构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和方形竖穴土坑棚架墓，分单人葬、合葬。山普拉从墓葬特指埋葬个体达百人以上的墓，葬具有的有棺，有的无棺，有的有尸床，木棺形式分圆棺、木盆棺、梯形和长方形木棺。清理发掘墓葬19座，殉马坑2座。墓葬中有2座较大，呈方形，在一角侧有墓道，口部棚盖木，内有木框架和用细树枝捆扎而成的葬具。每墓葬100多人，一次葬和二次葬并存，其余均较小。随葬品有陶器、木器、铜器、铁器和毛、毡、皮衣物及毛、丝、棉织品等。陶器为夹砂红陶或黑陶，手制，少数饰有刻划水波纹、弦纹和倒三角纹，还有少量绘有红泥彩绘。花纹有竖条纹、水波纹和圆点纹。器形有双系罐、双耳罐、无耳罐和钵。木器有杯、碗、钵、罐、盘、盆、梳、篦、弓箭等。铜器有镜和饰件。铁器有刀、镰和针。皮毛毡衣物有帽、衣、裤、靴、鞋、袜、袋等。毛、丝、棉织物很多，有褐、纱、绦、毯、缂毛带、毛罗、绢、缣、绮、锦、棉布等，色彩绚丽，花纹图案丰富多样。有各种动物纹、植物花卉纹、人物纹、几何纹等。食物见有大麦、大麦饼、黍米饼和粥等。此外，还出土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带汉字铭文的铜镜等。另外，缂毛织物中有一小部分织造工艺精，组织结构特殊，如带翼动物、对称花卉

和昆虫的图案花纹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毛织物中的多形态鹿纹、山形纹和植物图案则有可能是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据^{14}C年代数据，其时代约在公元前350年～公元250年前后。

中法克里雅河流域的联合考古自1991年开始，1993年、1994年和1996年相继进行了四次联合考察，获取了关于这一地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迁的许多重要信息，取得一些重大收获。1993、1994年以喀拉墩古城遗址区为中心，清理发掘了古城周围两座已遭严重破坏的佛寺、一座佛塔、两处民居建筑，调查了古城周围的古代灌溉渠道遗址。通过调查发现各类遗存60多处。

1994年在喀拉墩古城西北41公里处，发现一座古城，维吾尔语称"尤木拉克库姆"，意为"园沙"，命名为"园沙古城"。古城南距于田县直线距离230公里，深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古城呈不规则四边形，周长995米，南北城垣有城门，门框与门板尚存，城内基本被流沙掩埋。见有六处建筑遗迹，其建筑形制与楼兰、尼雅遗址房屋建筑形制是一致的。古城周围地表散布有陶器残片、石器、铜饰件、铁饰件及料珠饰等。还有大量的各种家养和野生动物及鱼类的骨骼，可见畜牧和渔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房址内见有陶片、麦、粟等谷物，说明有种植农业。古城的上限应不晚于西汉时期。结合文献的记载推断，这里应是古代扜弥国所在地。在园沙古城周围及以北地区14公里发现6处古代墓葬，除个别较好外，其余均因自然力的侵蚀而发生位移和风化。墓葬有胡杨树棺葬（掏空的胡杨树为棺）、竖穴土坑树棺墓葬、竖穴土坑墓、木椁墓等。人骨大多已风化，个别保存较好者，体质特征明显，深目高鼻、棕色长发，多辫。身着粗、细毛布内衣（纹饰为几何图案），外着皮衣。有的还戴有帽、系有腰带。随葬品见少量的陶器、石纺轮、木质纺轮、梳、碗等及铜、铁小饰件和料珠。在古城周围分布有较为密集的渠道，纵横成网，排列有序。园沙古城及周围的墓地年代上限可能早于西汉，下限可能在东汉或其后。

90年代初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交河故城工程启动。为配合保护维修，对古城内的寺院、民居、城门以及沟北墓地、沟西旧石器地点等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交河故城的建筑广泛使用"减地法"，即墙体基础部分是由地表向下挖出生土墙，然后在生土墙之上用泥团垛筑。建筑方法与夯土为墙的方法相同，只是一是夯土为墙，一是垛泥为墙。观察整个交河故城的建筑方法，"减地法"是运用最广泛、最基础的建筑方法，因此交河故城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城市，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十分罕见。交河故城利用所在台地高数十米的断崖为天然防护，不见一般意义上的城墙。对南城门和东城门也进行了发掘。东门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用"减地法"向下挖出一半圆形的空间，直径35米，周壁四立，高8～10米，有用土坯垒砌的主门和侧门。经发掘，发现有六眼水井及一个装满圆形卵石的擂石坑，东南侧壁上还清理出

两间居高临下的龛状岗楼。另还发掘了两处保存较好的民居遗址。一号民居位于故城中心大街南侧，是一处高台立壁上掏出的两间窑洞式房屋，两房互通。另一处民居位于故城北部，为一长方形院落式住宅，是利用“减地法”从生土台中挖出。院门在两侧，南部有一个小的庭院，北部有东、西两排各五间大体对称的房屋，均为独立居室。西排最北一间正中残存有方形塔基，院内有一口水井。故城西北小寺是一庭院式佛寺，殿堂居中，僧房等设施对称分布在两侧。这种布局在吐鲁番盆地地区十分常见。对西北小寺地面上的建筑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发掘佛寺的两间地下室，出土了大量泥塑残件，佛寺内出土了保存较好的面部敷金的佛头，1 件回鹘文文书。

交河故城内西北是一片墓地，墓地的西北处有暴露出口部的地下建筑。经发掘，意外地发现一处挖于地下的小型佛教寺院。寺院面积 70 多平方米，由一间佛堂、二间僧房、二间小型龛室及十级踏步的阶梯组成。佛堂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在其东、西、南三壁下方都用土坯砌出通壁长的两层条形像台，南像台后侧挖有长方形坑，内存放大量模制脱佛、脱塔，上印有梵文和古藏文。在佛堂壁上绘有 7 尊千佛像、身着蒙古服装的供养人像和回鹘文、汉文题记。在佛堂中还发现一个小型铜银相套的舍利容器，内装舍利子和海珠。舍利子的发现在新疆尚属首次。交河故城之北相距约百米左右有一台地，台地上分布有石堆墓 20 多座。发掘了两座（组）完整的石堆墓。在探沟内发现墓葬 27 座，连同两座石堆墓封堆下主墓室外的附葬墓及殉马（驼）坑，共发掘墓葬 55 座、殉（驼）马坑 55 座。两座石堆墓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地表有直径 15～40 米左右的圆形石堆，石堆下从中部挖中心墓室，中心墓室外用土坯垒成高 0.8～1.6 米、直径 10 米左右的围墙，环围墙周围分布十至十余座不等的附葬墓和殉马坑（个别为殉驼坑）。殉驼坑、殉马坑成排布列，每一坑中有 1～4 匹马（驼），每一座墓总计有数十匹马（驼）。

自 1994 年到 1996 年，对交河故城沟西墓地进行了三次联合考古调查和发掘，共清理墓葬 45 座，其中斜坡墓道洞室墓 22 座、竖穴墓 23 座。斜坡墓道洞穴墓的随葬品均以陶器为主，其次是少量的金器、铜器、铁器等。从出土的整块墓志看，其时代为麹氏高昌王国延昌至唐西州初期。竖穴土坑墓是 1996 年进行考古发掘的，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和竖穴土坑偏室。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金器、五铢钱、铜器、骨器、蚌壳等。陶器一般为夹砂红陶，手制，素面，圜底。内外壁通施红色陶衣。器形有钵、盆、杯、釜等。金器有牛头包金饰件、金戒指、金冠饰、金牌饰，金器表面多有压制而成的动物纹饰。铜器为一残星云纹铜镜、五铢钱。铁器有刀、箭、镞等。骨器有扣、针。这批墓出土文物时代为汉至晋代，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深受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已正式出版。

阿斯塔那、喀喇和卓古墓群的考古发掘自 50 年代至今已进行了 13 次，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这批墓葬最早为晋泰始九年（273 年），最晚为唐大历七年（772 年）。墓葬形

制早期有两种，一种是竖穴土坑偏室墓，另一种为斜坡墓道洞室墓。葬具一般用木棺。壁画墓6座，画于后壁，内容有狩猎、牛耕及庄园主生活情景。出土文物有木器、陶器、扣类织物、漆器、铁器、干果、面食及纸鞋、纸人（以各种文书剪裁制成）等。木器占很大比例，种类繁多，有木案、罐、盒、豆、碗、耳杯、勺、铲、尺、梳、鸠杖、衣架等，还有马、牛、牛车、怪兽、猪、鸟、刀以及“代人”木牌、木桶等明器。陶器多素面，少量红陶或绘黑白彩。织物有麻、丝棉等。个别大墓出土较多丝织物，有锦制的袍裤、被、褥等。出土的丝履面上织有“富且昌宜侯王”吉祥语。随葬的纸鞋中，拆出用汉文书写的文书140多件，主要为郡县文书，大部分属西凉、北凉时期。纪年资料有前凉“升平十一年”（367年）和前秦建元，西凉建初、嘉兴，北凉玄始、义和、缘禾以及至今尚未确认的建平、龙兴等。内容涉及到高昌郡职官建置、隶属、公文制度、科举、兵制及征发赋税、劳役的情况。

中期墓葬为北魏—初唐—高昌王朝时期，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墓后壁或墓室顶挂麻、绢质伏羲女娲画像。普遍于墓口埋置墓志，说明死者姓名、身份、入葬年月。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木器、纸制明器、各类织物、眼罩及各类面食。钱币有“五铢当千”、“五铢”、“高昌吉利”和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等。陶器在出土文物中所占比例略大，彩绘纹饰为仰莲或覆莲纹。木器较早期少，木鸭为新见，较普遍。此外又有各种仪仗木俑，正面朱书“代人木牌”，背面似粟特文。出土柔然郁久闾予成（即受罗部真可汗）“永康十七年”（480年）残文书。丝、麻、棉等丝织物较前期增多，锦纹图案有夔纹、对狮对鹿、对鸭、对鸡对兽同字、狮牛象、对羊鸡树、戴胜鸾鸟、棋纹、联珠鹿纹、联珠对鸟纹、联珠对孔雀纹等。从纸鞋、纸帽、帽圈等纸制品中拆出的文书有400余件，内容包括契卷、启状、薄籍、条纸、账单、公文、寺院文书、随葬衣物疏、谱牒等。

晚期墓葬为唐西州时期，除普遍出土一般砖志外，大墓出土有庞大的青石墓志，墓志书法隽秀，内容丰富。出土的各类泥塑俑，是十分宝贵的彩塑艺术品。有镇墓兽、天王、武士、歌舞俑、宦者俑、百戏俑、马球俑、各类劳动女俑。在百戏俑中见“昆仑奴”、“狮子舞”及顶竿等形象。另外还出土一批十分珍贵的绢画资料。绢画细致描绘了贵族妇女下围棋、游乐的情景。在一组“六骏图”上工笔描绘出不同形态、颜色的马，或伫立、或行走，驭者旁立，画面和谐统一，是难得的唐代绘画珍品。出土的各类织物中，除麻、毛织物外，还出土大量的花色品种繁多的绢锦。有联珠天马骑士纹、鹿纹、双人、猴头、猪头、小联珠对鸭纹、红地团花纹、彩条纹、龟背“王”字纹、对鸡对兽“同”字纹、棋纹等织锦。文书中也见有波斯锦、提婆锦等记录，可见这些多彩的织锦不仅大量来自中原也有西域地区和中亚地区的产品。麻布，少见有墨书题款交纳麻布的年月、州县、纳布人姓名等。可看出输纳麻布的地区有唐代的河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等，包括今天的江、浙、豫、陕、川、湘、鄂七个

省区。对了解唐代租庸调制度的实施情况是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出土文书1000多件，多拆自纸鞋、纸帽、纸带、纸棺等。内容大多数属于西州都督府所辖各级军政机构的公文档案。有籍账的田亩籍、给田欠田文书、职田文书、佃人文书、点籍样、户口、丁口、户等籍、奴婢部曲名籍等。为研究唐代均田制及其在西域地区实施的情况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还有许多有关交通、驿站、车坊、马政方面的资料，许多有关租庸调、府兵、屯田、司法、市易、过所等方面的资料，对唐史研究、西域边政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还出土有古籍抄本，如《毛诗》、《郑玄注论语》、《伪孔传尚书》、《孝经》、《急救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晋史》、《唐律疏义》、《针经》和《佛经》等。多系佚书或异本，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出土的陶器多为素面灰陶，器形有罐、盘、杯、盂、碗；木器有木建筑明器，如殿堂、亭、尾、假山等。其他有盘、罐、碗、梳、假髻、鸭、猪等。个别罐、盘绘有黑底白花纹饰。出土的钱币有“开元通宝”、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等。这一时期的墓葬为斜坡墓道洞室墓，规模庞大，墓道内出现天井、甬道、耳室。少数见壁画。在墓室后壁绘四条幅或六条幅描绘游憩的人物及各类飞禽。有一壁画人物身上署名“金人”、“土人”、“石人”等。有一座墓室顶部绘天文图。

四

新疆考古工作者对宋、元时期及之后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如对巴楚县的脱库孜萨来古城、昌吉古城、乌拉泊古城、霍城的阿里麻里古城、察布查尔的海努克古城、乌鲁木齐的盐湖古墓等进行调查清理，也发现大量的珍贵文物。

在新疆的文物考古成就中，对古代佛教寺院、石窟遗址的考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疆大型佛教群目前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集中在库车、吐鲁番两个地区。在吉木萨尔、哈密、和田、喀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也分布有佛教文化遗迹。这批遗存不仅对研究佛教思想、艺术及佛教东渐，而且对研究当时新疆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现状都有着重要价值。在新疆除佛教、原始宗教、道教外，还发现有属于摩尼教、景教、祆教的文化遗迹。元代以后，伊斯兰教、喇嘛教等宗教建筑在新疆各地开始出现。

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北庭西大寺的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收获。清理出北庭故城西门处的一座佛教寺院遗址（寺院俗称“北庭西大寺”）。该寺创建于回鹘时期，保存多幅西州回鹘时期的壁画。佛寺遗址只发掘了寺庙的东部和南部。佛寺平面呈长方形，夯土台基，上下土坯砌筑。整个遗址分南、北两部分，南部为配殿、僧房、库房等，北部是正殿，其四周环筑洞窟。寺院都有塑像，大部分残毁，有佛、菩萨、罗汉、天王、狮子等。壁画色调以红、赭、黄等色为主，蓝、绿、黑、白色为辅。

壁画内容有经变画、供养画等。有些像和壁画贴金，富丽堂皇。遗址中有大量的回鹘文题记和回鹘装束的供养人像。该寺庙当为高昌回鹘的王室寺院，而非一般佛教建筑。寺院最后毁弃的年代不晚于1383年。这些壁画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同时期的壁画风格相同，数量虽不及后者多，但保存很好，其内容、色泽和艺术手法与后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文物瑰宝。这座寺院的发掘，为我们研究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及与之相关诸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对研究规模宏伟的北庭故城遗址及附近的若干古城遗址的位置、形制、性质、年代及历史地理等有重要学术价值。

始于1979年的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联合进行的克孜尔千佛洞考古调查，也取得重大成果。联合调查组在宿白先生的带领下，对克孜尔千佛洞窟区内的236个洞窟进行了调查、实测、分区、编号。历时15年的《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终于出版，标志着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将对克孜尔千佛洞今后的研究、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准确、翔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实测的数字依据，也进一步促使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五

近年，在岩画、石人、钱币、人类学、古代语言等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收获。

近20年间，新疆早期考古文化中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岩刻画，在主要山系如阿尔泰山、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天山等高山峡谷中都有发现。主要见于高山牧场、中低山区以及牧民转场附近的黑砂岩、花岗岩和板岩的岩壁上，大多朝东向阳。岩画主要采用粗线条阴刻，有少量彩绘岩画发现于洞穴中。1983年在阿尔泰山山区进行调查，发现岩画的主题都与草原游牧经济生活有关。主要有：（1）动物画，常见有羊、牛、马、鹿，也有狗、熊、骆驼。如霍城县于沟岩画，在一块岩石上刻有形状不同的17只大头羊和山羊。（2）狩猎画，常见猎人手持弓箭向猎物射击。（3）放牧画，在北疆裕民、富蕴、哈巴河等地都有发现。如哈巴河一幅岩画，画面有众多岩山羊、鹿、骆驼等，还有两名放牧者。（4）车辆图，画面显示一御者徒步驾一车，车以两个圆轮与长辔表示。此类车辆图在巴里坤境内天山北麓也有发现。岩画近年来在天山山区等地又有大量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1987年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发现的大幅生殖崇拜岩画。呼图壁县雀儿沟乡康家石门子海拔高1500米，是天山深处一条少见人烟的小山沟，位于县城西南约78公里，普查中，在这里一处新第三纪粉砂岩岩壁上，发现一大型雕刻画。它高于目前地表3～12米，人手不能触及。画面东西长14米、上下高9米多，面积120平方米左右。其上满布姿态各异的舞蹈人物，共有三四百人。这样大型的舞蹈人物画面，为新疆地区所仅见。画面人物，大者过2米，小者仅2厘米左右。不论男、女，均头戴高

帽，帽上插两支翎毛，面部形象用浅浮雕手法造就，特征细致而清楚；狭面长脸、高鼻、大眼、小嘴，明显具有雅利安人特征。男性或有小髦。形体动作一般右臂平伸、右手上翘，左臂平伸、左手下垂，手指伸张，作上下腾舞状。女性两腿修长，作轻微蹬踏状，男性则作前俯后仰姿势。大多作单人立姿，但也有双头同体、齐头并卧的形象。女像大多裸体，极少数着裙。男像均裸，生殖器长度或过于人高，且无一例外均指向女性。更有两组人物，作交媾形状。又一画面，一男性手持极粗大的生殖器指向对面站立的女性，其下，则是两列小人，每列达 30 人左右，十分整齐地作前俯后仰姿势，情绪热烈。整个画面十分明显地显示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祈求人的繁衍、种系繁荣的愿望。画面上方一列巨大女性裸像中，夹两组对兽图案，其中一组，同样显示了雄性生殖器。两个正进行交媾的人物，作猴面人身状。除两只立虎同样显示了阳具外，整个画面中，再不见任何一点动物形象，而后者是新疆大量岩刻中的重要题材。雕刻技法，人面部，均作浅浮雕；身体部分，用减地阴刻。线条流利，人体比例准确，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结合准噶尔盆地南缘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绝对年代初步分析，这一岩刻画的创作年代，当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半期。

近十年来对石人文化作了较为集中的考察。石人文化是新疆文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石刻人像天山以北伊犁地区的昭苏、特克斯、霍城，博尔塔拉自治州的博乐、温泉，阿勒泰地区的富蕴、青河、吉木乃等地，天山以东的哈密、巴里坤、伊吾、奇台、木垒、吉木萨尔等地都有发现。近年来在天山以南温宿、阿合奇也发现有石人。其形状有男女之分，大小不一，或立或卧。雕刻技法有浮雕、圆雕、浅刻和线刻等，有的只是阴刻几条线表示人形。据已发表的材料，有的石人武士像较高大，凿刻全身，面部神色庄重，有的戴头盔，有的披铠甲，一手持杯状物（也有持一小圆罐的），一手持剑，腰带还挂有飞去来器、匕首、砺石等，全然是一个屹立于草原上的将领或武士。女石人像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地区较多见。在昭苏县种马场发现的 1 尊石人，著冠，长发扎辫 5 至 7 根，垂在身后直至腰下，通身着长袍。身下刻有粟特题记，由于年代久远，剥蚀严重，铭文经解读见有突厥木扦、泥利可汗王名。一般在石人后面还可发现石围墓或石堆墓，可能是古代突厥人的遗存。如 1985 年在温宿县发现包孜东古墓区，其中的 1 号墓为石人石堆墓，地表封石层层平铺，垒砌整齐，平面呈圆形，直径 22 米、高 2 米。周围地面还铺砾石和片石，局部边缘铺红色砂石板。在石堆墓东 81 米处竖立高 1.25 米的石人，用细砂质岩雕刻制成。另在墓葬上层堆石中的东端又发现一长方形墓室，四边以砾石和石板垒砌，内葬一男性成年个体。室顶部盖石上刻有突厥字母。故认为此类石人墓应属古突厥文化遗存。

80 年代末，在楼兰考察中发现一批汉晋时期的钱币，并在安迪尔地区发现一枚汉佉二体钱。1980 年在南疆阿图什东南 10 公里的牙尔干地区发现一袋古代新疆喀喇汗朝

时的铜钱，总重达138公斤，约17000余枚。钱圆形无孔，打制。据初步研究，钱文绝大部分是古代科斐体阿拉伯文，只有1枚上发现用回鹘文。这批钱币大约有三类：第一类是穆罕默德阿斯兰汗所造，约占总数的90%以上。第二类在钱文中有"真主的崇拜者和依托者纳斯尔之子"的字样。第三类钱中有"桃花石可汗"的字样。喀喇汗王朝钱币在中亚地区曾多次发现，而在我国新疆境内这样集中地大量发现还是第一次。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曾出土了不少反映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钱币文物。

新疆自古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由于古代各民族文献记载材料很少，这就更突出了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近年来，在吐鲁番、鄯善、哈密、罗布泊地区和塔克拉玛沙漠南缘民丰、洛浦、尉犁、和田、且末等地相继发现了完整的古尸，在昭苏、新源、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鄯善、温宿、洛浦、哈密和楼兰等地区搜集了大量的古人骨骼资料，为开展新疆古人类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古人类学方面研究的成果，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古代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既有蒙古人种的活动，又有相当数量的古代欧洲人种生存。

长期以来，新疆出土的木简、文书、题铭等为研究和再现西域古代文明和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自50年代以来，汉文木简和纸文书有大量发现，新发现的佉卢文书已逾百件，同时还有于阗文、婆罗谜文、吐蕃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遗物，其中部分为双语文书。经整理出的吐鲁番古代文书，目前已在国际上成为一门显学，而尼雅出土的鄯善王童格罗伽王纪年木简的首次发现、研究和确认，则是近来佉卢文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执笔：岳峰、于志勇、张铁男）

参 考 文 献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3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工作的新发展（1979—198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⑥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1996年。

香港澳门五十年来的考古收获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

香港和澳门地处珠江口东西两侧，背靠大陆，面向南海，辖区内大小岛屿星罗棋布，从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已有人类居住。它的历史文化是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流域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部分；它的考古也是华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地区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几乎与北方黄河地区的考古同时兴起。澳门地区的考古工作不但稍迟一步，规模也略逊于香港，从70年代起，至今只做了一些规模较小的调查与试掘。

一　港澳考古工作的发展

经过本地区中外学者、专业考古和业余考古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共同辛勤耕耘，港澳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已占有一席地位。1997年，香港马湾东湾仔北遗址的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更是本区考古工作达到一个新水平的具体体现。

香港地区的考古活动，早在20年代已开始。当时从事考古活动的，主要是几位旅居香港的外籍人士，包括韩义理医生（Dr. C. M. Heanley）、萧思雅教授（Prof. J. Shellshear）、芬戴礼神父（Fr. D. Finn）和施戈斐侣（W. Schofield）等。他们都是业余的考古爱好者，每利用公余时间，在香港各区进行考古调查，采集到不少史前和历史时期的文物，证明香港历史可上溯至史前时代。芬戴礼神父更受政府襄助，于1932至1933年在南丫岛大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石器、陶器和青铜器，芬神父努力不懈地进行研究，并发表一系列有关香港史前时代的文章，可惜芬神父在1936年便逝世。后来，香港大学利马窦堂于1958年把芬神父的文章辑成《舶寮洲考古》（英文）一书[①]，是香港早期考古活动的重要研究成果。此外，地质学家施戈斐侣于1937年发掘大屿山石壁东湾遗址，亦出土了大量史前遗物，并发现多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进行期间，施戈斐侣一直按地层学把出土遗物进行纪录，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亦曾到现场指导，因此，这次东湾发掘，是战前时期香港最高水平的发掘工

作，可惜所有文物都在大战期间散失，只剩下一些手稿，至70年代，香港考古学会把手稿整理后出版了《大屿山石壁遗址考古勘察》一书[②]。

战前活跃于香港的考古人士，还有陈公哲，他花了大部分积蓄，雇船在香港沿岸和各小岛进行调查，采集了大量文物，并于1957年的《考古学报》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考古活动停顿了颇长的一段时期，直到1955年深水埗李郑屋村发现东汉砖室墓，考古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当时政府委托香港大学中文系林仰山教授（Professor F. S. Drake），组织了一支由大学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对东汉墓进行了发掘。之后，大学考古队并没有解散，反而加强组织，在香港境内进行系统性的调查与发掘，其中以发掘大屿山万角咀青铜时代遗址最重要。至1967年，大学考古队改组为香港考古学会，凡考古学爱好者皆可参加，由是会员人数增加到二百多人。香港考古学会虽然是对考古感兴趣者的业余组织，但他们对香港考古发展贡献良多，70年代发掘南丫岛深湾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历史时代不同时期叠压的文化层，因而建立了香港考古年代的标尺，学会更于1978年出版了《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④]，是研究香港考古的重要报告。此外，考古学会亦自1968年起出版年刊，至今已出版了14期，把香港的考古资料不断发表，推动了香港考古研究的发展。90年代以来，香港考古学会更配合香港的基建工程，协助政府进行大量的抢救发掘工作，其中配合新机场的建设，于1990年至1991年间在赤鱲角岛进行了十个月的发掘工作，更于1994年出版了《赤鱲角考古发掘报告》[⑤]（英文）。

1976年，香港政府颁布和实施《古物古迹条例》，是香港文物考古工作的最大转捩点。条例规定，香港境内所出土的文物，都属于政府所有，不能私藏；任何人士如发现文物，都有责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及向政府报告。所有在考古遗址内进行的工程，皆需征得有关部门同意方可进行。任何人士如欲在香港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必先向政府申请牌照方可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完成后，持牌人必须把所有出土遗物，连同完整的田野记录和发掘报告交回政府，集中存放在中央考古收藏库内，以方便市民和学者查阅有关的考古资料。同年，政府成立古物古迹办事处，以执行《古物古迹条例》内各项规定。从此，香港考古工作朝着专业方向发展，政府对文物考古工作和考古资源日益重视；从事考古的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多，除香港考古学会外，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历史博物馆、区域市政局博物馆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机构纷纷设立了考古工作和研究部门；同时考古专业人员不断增多，很多都是中青年的专业人员，其中绝大部分人拥有或正在攻读硕士及以上学位。在上述机构和独立考古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内外有关学术机构的合作和支持下，香港地区的考古，在发掘、调查、研究和出版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已初露端倪。现就过去二

十年来香港考古各方面的发展，分述如下：

1. 立法

1976年实施的《古物古迹条例》是香港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基本法，在香港的任何人士都必须遵守，自觉保护好本土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该条例成立的古物古迹办事处，除了承担日常的地区文物保护、监督执行有关的法律之外，更是香港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力量。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更加重视本地的珍贵的历史文化和文物。1998年4月，政府又实施《环境影响评估条例》，条例中规定大中型基建工程，在立项阶段所做的对环境影响的评估，须将工程对历史文物的影响包括在内。这样，基建工程对历史文物的影响和破坏，在立项阶段即已得到了有效的预防及控制，其影响和破坏的程度已减至最低。《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的实施，大大补充了《古物古迹条例》的不足，使香港的文物保护工作迈进了一大步。

2. 考古发掘和调查

历年来，香港已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有百多项之多。其中不乏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发掘，较为著名的有大屿山石壁东湾、万角咀、南丫岛大湾、九龙李郑屋汉墓等。近十年来，本地区考古更是蓬勃发展，在本地乃至区域性较为有影响的考古发掘工作有：马湾东湾仔和东湾仔北、九龙寨城、屯门涌浪、龙鼓滩和龙鼓上滩、大埔碗窑、元朗下白泥、赤鱲角诸遗址、大屿山扒头鼓、石壁东湾和东涌沙咀头、南丫岛大湾、榕树湾等遗址。详见附表。

1982～1985年，古物古迹办事处委任蒲国杰（B. A. V. Peacock）负责对香港全境作了第一次考古普查，其目的是评估香港当时所存的所有考古资源。1997～1998年，古物古迹办事处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全港性的考古普查。普查将香港全境分为十一个调查区，由古物古迹办事处统筹，除邀请本港有兴趣参与的机构和个人外，更邀请了来自陕西省、湖南省、广东省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深圳博物馆等，以及英国伦敦大学的考古专家共同参与。

3. 学术交流活动

香港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不仅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关系密切，与东南亚地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为了研究本地的考古，促进学科的进步，本地各考古机构都十分注意学习和吸收邻近地区和世界考古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共同考古发掘和调查，是一种极有效的学习和交流的方法。早在1988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就邀请了深圳博物馆和广州中山大学的考古学家共同发掘了石壁东湾遗址。此后，该中心多项考古发掘和调查都邀请有关机构合作，先后参与工作的除上述机构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珠海博物馆等。

古物古迹办事处早于1991年初，已邀请了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田野考古队的两位专家来港主持两星期的田野考古训练班；又于1995年邀请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深圳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共同发掘了东涌沙咀头唐代遗址；1997年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合作发掘了马湾东湾仔北遗址，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学术讨论会是本地举办得较多的另一类学术活动。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召开了“环珠江口史前文化学术研讨会”；1994年，该中心又召开了“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学术研讨会”；1993年，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岭南古越族文化研讨会”；1995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在古物古迹办事处协助下举办了“东南亚考古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港澳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

考古与公众的关系是世界各地考古学关注的新热点。古物古迹办事处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把1997年定为香港文物年，有关的活动如展览会、研讨会、古迹音乐会、古迹旅游团等都非常成功。其中，“文物与教育国际学术讨论会”更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五十多位学者参加，互相交流经验和研究成果，成绩美满。

澳门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直到70年代才有正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1972年香港考古学会应澳门当局邀请，在路环岛进行调查，共发现了五处遗物点。1973、1977和1985年，香港考古学会应贾梅士博物馆邀请，对黑沙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和陶器，下文化层遗物可上溯至六千年前。1995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澳门大学合作，并得到澳门基金会支持，再在黑沙遗址进行发掘，并出版《澳门黑沙》[6]一书，是澳门地区的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书。上述几次对黑沙遗址的发掘，成功地树立了澳门史前文化发展的标尺。

此外，为配合澳门圣保禄教堂遗址（俗称大三巴牌坊遗址）的整治工程，澳门当局曾在1990年至1992年间对教堂内部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教堂墙基遗迹，以及一些墓葬和大量陶瓷片，对研究澳门的早期教堂建筑、耶稣会在澳门的传教和澳门的海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很多实物证据。

澳门当局虽至今未有设立专责机构负责澳门境内考古遗址和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工作，但在热心的人士和机构如澳门市政厅、澳门旅游司、贾梅士博物馆、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等推动和支持下，澳门的考古工作已有一定的成绩。随着澳门于1999年底回归祖国，澳门的考古工作应有更大的发展。

二　新石器时代

史前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港澳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目标，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更是其中最重要的项目。香港面积仅有1092平方公里，

但考古遗存却遍及整个港九、新界和所有大小岛屿之上，现已发现一百余处遗址，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史前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十年前，对于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还不甚清晰，有关的分期简单地停留在早、晚两期上。随着考古工作的深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已日渐清楚。根据邹兴华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文化的分期[⑦]，这些遗址主要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存，它们的年代跨度由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前后约三千余年。

1. 早期遗存的线索

珠江口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地区，考古文化的面貌是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当公元前4500年）开始才较为清晰的。对此之前的考古文化，近年来各考古机构都在积极探索，并有了一些有意义的线索，如1988年在石壁东湾下文化层发现的一些打制石器，其石器以尖突单边砍砸和双边砍砸技术制作[⑧]。1994年，香港考古学会在西贡滘西洲的山岗上发现了一些打制石片，并采样进行了^{14}C测年，所得数据为距今7000年左右。1997～199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香港西贡南区考古普查中，在蠔涌遗址的地层中，发现一些小石片，上有明显的人工剥片和打制痕迹，共出的还有一些火候低而原始的夹砂陶片；并在相思湾采集到一件大型的砍砸器[⑨]。学术界虽对上述三批打制石器的实际年代仍有争议，但对探索香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却提供了一些线索。

2. 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

本地区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是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阶段开始的，这时期的文化遗存在香港和澳门都有发现，经过考古发掘的主要遗存有：香港舂坎湾、蟹地湾、涌浪下层、大湾Ⅱ期、深湾村、龙鼓滩下层和澳门黑沙下层等遗址。其年代介乎公元前4500年至前3700年之间。

澳门黑沙遗址，为香港考古学会1972年在澳门调查时所发现。1973年、1977年和1985年该会曾数次前往发掘，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地层堆积和文化面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和澳门大学于1995年12月，对澳门黑沙遗址进行了再次的发掘。以澳门黑沙下层和香港舂坎湾为代表的这类考古学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在泥质陶上彩绘，主要用赭红彩在红陶的器物表面绘制各种不同的图案，如以直线、曲线、弧线、波浪、宽带为多，还有点状、三角、多角形等，而且圈足上一般都有刻划、镂孔装饰。主要器类有圈足盘、碗和高足杯等。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彩陶的风格明显与长江流域中游的汤家岗下层文化和珠江支流之一的西江两岸的古文化中的彩陶有明显的文化交流迹象[⑩]。

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除典型的彩陶外，最大宗的是夹砂粗陶，并且流行绳纹。绳纹有粗细之分。如涌浪下层出土的绳纹陶，细绳纹约占四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少量压印几何纹样的白陶。石器则以小件的磨制石器和一些砾石工具为主，出土数量不多。如在

涌浪南2B层中仅发现3件小型的磨制梯形石锛，2件砾石石锤及1件石英环芯。

同时期的居住遗迹和墓葬等遗存，港澳地区目前尚未发现，而邻近的深圳咸头岭、大黄沙等遗址都发现有居住遗存，高要蚬壳洲贝丘遗址的彩陶层中，亦发现了24座墓葬。

除了这一时期的分期和文化面貌的研究外，对于遗址形态、成因的研究和认识也不断加深。其中特别是对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埋藏条件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过去认为在早晚阶段文化层之中，有一层全无文化遗物的自然堆积，俗称“间歇层”。其实，在上下文化层之中的这种不直接叠压的现象，只是遗址堆积中的一种局部现象。港澳和邻近的珠江口地区，数量最多的是沙丘类遗址，又称上升沙堤遗址。沙堤的形成，与海浪冲力、海平面升降、山坡冲积等自然力量有关。1992年，涌浪遗址发掘时就注意到遗址中的早期遗存顺着山体向下倾斜堆积，当海水上升时，海沙覆盖了遗址的下半部，后来的居民又在上面活动，形成了新的堆积。于是，遗址的上半部（海拔较高处），如果不被破坏的话，就会清楚地发现上下遗存的直接叠压关系；而遗址的下半部，在上、下遗存之间就有一层全无文化遗物的“间歇层”。如东湾仔北就有一个典型的这种既有直接叠压又有间歇层的标准局部剖面。

3．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

因为受香港新机场建设的影响，香港考古学会于1990年至1991年发掘了赤鱲角岛上的诸遗址，包括虎地、虎地湾、蝦螺湾、过路湾上下区和深湾村等处。其中特别是虎地和过路湾上区的考古发现极为丰富，对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的认识[11]，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层和出土遗物推测，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还有：香港石壁东湾、东湾仔北下层、深湾F层、长洲西湾、龙鼓洲下层、沙洲第四层、芦须城下层和澳门黑沙上层等遗址。^{14}C测定年代介乎公元前3700年至前2900年之间。

这一期的文化面貌已较为清楚。其陶器的最大特征，就是以刻划纹和戳印纹为主要的装饰手法。无论是夹砂陶还是泥质陶，多在器身上部和口沿刻划凹弦纹、条纹、波浪纹等，尤其喜欢在印有绳纹的夹砂陶釜和罐的器身上及口沿内侧加刻弧形纹。除刻划纹外，泥质陶则出现了戳印圆圈纹的装饰手法；泥质陶的镂孔装饰依然存在，只是所镂的孔较早一期的镂孔略大。

打制和经初步加工的砾石石器十分发达。打制石器主要有用砾石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和一种被称作“牡蛎啄”的三角形尖状器，如虎地湾和过路湾就各出土了数十件。砾石石器，主要包括石锤、砧、杵和网坠等。这些打制的砾石石器，无论从器形、种类，还是从功能上讲，都是继承早一阶段的风格，基本没有太大变化。磨制石器仍以小件石器为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双肩石锛的出现。龙鼓洲下层曾出土3件双肩石锛[12]，

虎地湾出土了2件；在长洲西湾同期的文化层中，亦发现了1件有段石锛[13]。这批石器是珠江三角洲目前已知最早的有肩及有段石锛。此外，虎地湾还出土了表面上有刻划的几何形图案的小石块，应是1件装饰物。这也是目前已知香港最早的石刻艺术品。

遗迹方面，在虎地湾和过路湾，发现了各种洞坑几十个，有些洞坑内发现灰屑，可能是灶坑；有些在坑底铺上一层陶片，推测是窖穴，但多数洞坑用途不详。

墓葬方面，在过路湾上区发现了6座，虎地则发现了10座，墓坑一般都很小，骸骨已全部腐朽，大部分随葬陶器1～2件，个别墓多至3件，多数为粗绳纹小罐，且罐口内有弧形刻划纹；另外还有泥质陶圈足豆。有些墓还随葬石锛等石器，如虎地M6出土了10件石器，1件泥质红陶高圈足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镂孔泥质红陶高圈足豆的风格，与崧泽中文化层[14]、北阴阳营第二期[15]的陶豆，在制作风格上有类似之处。这说明，此时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可能已经有了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改变了早期那种与内陆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既说明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又表明本地区面向海洋经济的真正确立。从此以后，珠江口的文化都与其他沿海地区的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此外，在深湾F层，发现有曾经被火烧至800℃的人类遗骨，分属12～15个个体，发掘者认为是火葬遗迹。另外还发现了两具葬式不明的人骨架[16]。

4. 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

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是以涌浪上文化层为代表的考古学遗存。从1992年4月至1993年3月，古物古迹办事处和考古学会发掘了涌浪遗址南北两区（又称涌浪和涌浪南），发掘总面积接近两千平方米，是目前港澳地区发掘面积最大、文化堆积最丰富的遗址之一[17]。其中已发表的九个来自涌浪南上层的^{14}C数据，经年轮校正后，集中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18]，为这一阶段的考古文化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属于这一期的遗址，还有沙螺湾岬角等遗址。

这期陶系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从沙螺湾岬角探方的统计资料来看，夹砂陶约占75%至80%[19]，泥质陶占20%至25%；涌浪遗址的陶系，据抽样统计数据，夹砂陶约占90%左右，泥质陶仅占10%左右。这期陶器的最大特色，就是低温的泥质红、白陶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印纹陶的出现，有大量的拍印叶脉纹和曲折纹的泥质陶器。器形以罐、釜、壶和器座为大宗，造型复杂化和种类有所增加，最典型的是在圜底罐或壶下加矮圈足，但圈足通常过矮，以至圜底着地。在器身饰以数圈附加堆纹也很普遍。在夹砂陶器中，流行的仍是绳纹，釜是主要器形，而且多在器物口沿外侧加刻划图案，其装饰设计较上一阶段更为规整和复杂。

石器方面，单是涌浪遗址就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此期的器形也较前期显著增多，有石斧、锛、有肩器、钺、铲、凿、镞、网坠、环、玦和锚等。石英环和玦等装饰品抛光极为精美。石器中最有意义的是石钺的出现，在涌浪遗址上文化层内，出土多件

完整的穿孔石钺，以及大批制作石钺的石料、半成品和废品。这批石钺从选料到制作工艺都非常精美，刃端皆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最大的一件钺，长达 30 厘米，推测不是实用器，而是一种象征权力的礼器。这类磨制精美的石钺，在岭南地区考古中，仅在香港涌浪和粤北的石峡遗址出土，而石钺的形制跟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石钺和玉钺相似，推测 4500 年前岭南地区的先民，可能曾受良渚文化影响。

遗迹方面，在涌浪遗址发现大量印有席纹的红烧土块、器座、炉箅、灰烬和灰屑等炉灶遗迹。亦发现不少柱洞，可惜找不到柱洞分布规律，不能复原建筑布局。同样，在沙螺湾岬角遗址也发现了不少柱洞，同样找不到柱洞分布规律，无法复原建筑物原貌。涌浪遗址还发现和清理了十几座墓，多为长方形土坑墓，人骨无存，葬式不明，随葬器物简单，仅有陶器 1～2 件，玦、环或锛 1～3 件不等。根据涌浪和沙螺湾岬角遗址的资料推测，珠江三角洲至迟到此文化时期，已有规模较大和组织较严密的聚落出现。

5．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

以东湾仔北遗址为代表的这一期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各期文化中分布最广泛的。同时期的遗址，较著名的还有龙鼓滩、石壁东湾、鲥鱼湾、扒头鼓下层、芦须城中层、沙埔村下层、沙柳塘湾等。^{14}C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 2200 年至前 1500 年之间。

马湾岛东海岸的遗址分布密集，由北至南，沿海岸依次分布有东湾仔北史前遗址、东湾仔汉代遗址、东湾仔南唐代遗址和沙柳塘湾新石器时代遗址[20]。东湾仔北遗址面积约有 2000 平方米，1997 年 6 月古物古迹办事处考古队开始对遗址进行发掘，至 9 月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加入，合作进行发掘，至 11 月结束。发掘总面积超过 1500 平方米，共发现六个时期的堆积，包括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清代的，其中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堆积为主。出土遗物包括各类陶器、石器、蚌器和骨器，遗迹则有墓葬、柱洞和一些刻意放置的蚌壳和石块[21]。

这期文化在陶系方面，仍以夹砂陶为主，如东湾仔北遗址夹砂陶占 92%，泥质陶占 8%。夹砂陶多饰拍印绳纹，泥质陶则以几何印纹陶为主。上一期最流行的拍印叶脉纹，到这时期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式几何纹，如重圈纹、云雷纹、乳钉纹、复线方格纹、云雷曲尺纹、重圈菱格纹等，且以网格或菱格为主，少于变化。

石器与早段相比，没有大的变化，仍以磨光石器为主，打制和砾石石器次之，器类包括斧、镞、锛、矛、网坠等工具，以及瑗（又名有肩石环）、玦、管、镯和唇饰等装饰品。其中瑗的出现特别值得注意。

除陶石器外，这一期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蚌器。东湾仔北遗址出土了 11 件边沿经过打制的蚌刀；鲥鱼湾除了蚌刀外，还出土了骨镞和锥等[22]。

这期文化发现的建筑遗存方面，主要有龙鼓滩遗址，在 1994 年、1997 年度发掘时，发现有规律的柱洞。在 1994 年发掘的龙鼓滩 B 区，发现了 3 排东西向的柱洞，最

长的一排有5个柱洞，每个洞的间隔约2米，排与排之间的距离，也在2米左右。由此推算，该建筑物的面积应在50平方米以上。由于柱子痕迹不清晰，仅见到柱坑的遗存，坑的直径为25～40厘米。根据柱洞分布来推断，应为干栏式的架空建筑[23]。东湾仔北的居住遗迹有零星的几个柱洞，由于柱洞分散，看不出原来房子的模样。不过，这些居住遗存集中在沙丘与山坡交界之处发现，可以推断东湾仔北的先民的居住区位于山脚下的狭长缓坡地带。

1997年，古物古迹办事处进行普查时发现元朗下白泥吴家园遗址，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1997年冬香港考古学会对吴家园遗址进行试掘，发现遗址中层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并发现大型建筑遗迹，有51个柱洞，分3排整齐排列，宽12米多，深8米多，面积107.5平方米，房基经夯实处理[24]。推测可能是一座首领的居所或公共会堂。在建筑遗迹周围钻探，还有同类房基发现，可能有一个建筑群存在。

同时期的建筑遗存亦有在山岗上发现的。1992年及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两度合作发掘的扒头鼓遗址[25]，位于一处三面环水的小山坡上，海拔高约30米。山顶上发现了一处村落遗址，在一千余平方米的山顶上，发现二十多座形状、大小不同的房屋，既有方形、长方形，也有圆形、椭圆形等，有利用天然石块作明础的，还有有规律的柱洞，是目前华南已知最早的明础建筑群。

墓葬方面，东湾仔北共发现20座这一时期的墓葬，分布在沙堤的顶部和内侧，可分为8排，由南至北每排2～3座，排与排之间的间距为3～5米。其中有14座墓向为南北向，6座东西向。更有15座保存有人骨，当中7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均为单人一次葬，其中6座头向南，为仰身直肢葬。二次葬墓有3座。其余的葬式不明。随葬品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少者2～3件，多者达10件。

经鉴定，墓主人男性7人，女性2人；未成年的有7人。性别不明者中，多数为儿童。死亡年龄在40岁以上的仅有4人，25岁至40岁的有3人，15岁至17岁的7人，其余均为10岁以下的儿童，最小的仅为出生才6个月的婴儿。在已鉴定的15具人骨中，发现门齿多呈崩裂现象，说明当时的食物粗糙，儿童死亡率极高[26]。

东湾仔北人的种族特征为：长狭型头颅，低眼眶，短面颊，阔鼻、铲形上门齿。平均身高约163厘米。成年人都有拔去上门齿的现象。这些体形特征和拔牙风俗，与佛山河宕遗址出土的人骨相似，显示东湾仔先民属亚洲蒙古人种，且呈现热带地区种族特征，可能同珠江流域的先民属同一种族。

东湾仔北墓葬区，排列规整，埋葬方向一致，更有二次葬，显示居民应是长期栖居于马湾岛上，而不是短期流动性、季节性地来岛上生活。

三 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在本地区延续的时间较长，最大特色当然是青铜器的出现。这期文化的年代从商至战国时代，^{14}C 测定数据来自大湾、过路湾、沙埔村和龙鼓上滩上层等遗址，所得的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年之间。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还有深湾Ca层、芦须城上层、鲰鱼湾上层、蟹地湾上层、东湾第二文化层、大浪、万角咀、沙螺湾、扒头鼓、东湾仔下层和龙鼓滩上层等。

香港最有名的青铜时代遗址要算南丫岛大湾。早在30年代初，芬戴礼神父已在大湾主持发掘，并出土青铜斧、戈、矛、剑、镞和篾刀等器类十多件[27]。到1990年，区家发再次在大湾主持发掘，亦出土了4件青铜器残件[28]。1989年，秦维廉在南丫岛沙埔村发现青铜时代的遗存，并出土了4件铸造青铜斧的石范，其中两件可合成一对，另发现一些铜渣，经化验，铜渣含铜、锡、铅三种铸造青铜器的主要原料，应是铸造青铜器时留下的铜渣，说明沙埔村是一处铸造青铜器的工场[29]，这是本地青铜时代考古的一大突破。之后，1991年，秦维廉又在过路湾下区青铜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三对完整的青铜斧石铸范[30]；而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考古队亦在沙螺湾发现几件青铜器和一对铜斧铸范[31]。这些证据证明珠江三角洲的先民，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已经在本地铸造青铜器，解决了学术界一直争论青铜器究竟是本地制造，抑或外地输入的疑题。

这期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几何印纹泥质硬陶的出现。几何印纹硬陶胎质细密，多为轮制，纹饰拍印工整，烧成温度较高，火候介于摄氏1020度至1150度之间。成品坚硬，扣之铿锵有声。器形包括釜、罐、瓮、盘、簋和豆等；器身多拍印各种几何纹，如夔纹、菱纹、云雷纹、方格纹、重圈纹和凸点纹等，布局工整，线条清晰，富于变化，很少出现印纹重叠现象。这些制作精美、装饰纯熟的硬陶，应出自专职陶工之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硬陶器在口沿内侧或圈足内侧都刻有符号，可能是陶工的标记，由此推测，当时已有较为先进的制陶手工业。除了拍印几何纹饰之外，一些硬陶器的表面还挂上一层青釉，有学者称这些青釉陶器为“原始青瓷”。青釉陶器的出现，显示先民在制陶技术上又跨进一步。除硬陶外，夹砂陶仍占有主导地位，器类还是以釜、罐为主，但纹饰方面却起了极大的变化，也是拍印几何纹，如曲折纹、方格纹、云雷纹等，几乎不见绳纹。

石器方面，仍以磨制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石器的磨制和抛光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石英环磨得既圆且薄，抛光得晶莹生辉，常常成套出土，如蟹地湾[32]就发现两套石英环，一套8件，另一套6件；过路湾[33]也发现一套10件的石英环。这些石英环都

是本地制造，不仅其所需的石料可以在本地区内找到，而且在万角咀[39]、大浪湾[40]、龙鼓上滩和澳门黑沙等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石英环半成品和废品，都是在制作石环过程中的不同工序时产生的。这些证据表明，在这个时期香港和澳门，是珠江三角洲的石器制作中心。

综观香港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上都是武器和生产用的渔猎工具，种类只有釜、镞、剑、戈、矛、篾刀和鱼钩等少数几种，缺乏食器和礼器等器种。这种情况不仅香港如此，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亦是一样。从这些出土的数量不多的生产实用器来看，本地区在青铜时代阶段的居民仍以渔猎为主，生活水平较为低下，社会组织也应依旧处在一种部落阶段。

四 秦、汉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兵统一岭南之后，珠江三角洲历史也就由史前时期进入历史时期。始皇把岭南分为南海、桂林、象三郡；南海郡治在番禺，当时番禺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港澳地区。公元前 206 年，秦朝覆亡，南海尉赵佗乘机派兵统一岭南，于前 204 年建立南越国。当时的港澳地区，自然受南越国管治。南越国共传五帝，长 93 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才被汉军所灭，岭南复归汉朝统治。武帝把南越国地分为九郡，港澳仍属南海郡番禺县管治。

港澳地区至今未曾发现秦代遗物。发现南越国和汉代遗存的遗址亦属少数。虽然早在 1955 年，已在九龙深水埗李郑屋村发现了一座东汉砖室墓，但此后的四十年，香港在汉代考古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直至最近数年，才发现了几处汉代的文化遗存，如 1992 年发掘的白芒和竹篙湾遗址；1993 年发掘的滘西遗址，1994 年发掘的东湾仔遗址；以及 1997 年发掘的下白泥吴家园遗址，出土了不少汉代的遗物，对研究香港地区汉代时的历史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其中尤以东湾仔遗址的汉代文物最为丰富，填补了香港考古学上的缺环。

1992 年初，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考古队在白芒[41]进行发掘，共发现 4 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第三期属西汉初期，即南越国时期，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并有少量戳印纹泥质硬陶，其中瓮、三足罐和盒是西汉初期较典型的陶器，另出土铁锸和铁斧各 1 件。这些遗物和广州西汉早期墓出土的器物相似。

1994 年，古物古迹办事处委托罗美娜（P. R. Rogers）在马湾东湾仔[42]进行抢救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汉代文化遗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东湾仔沙堤南部，发掘面积约 400 平方米，最深至 2 米。共发现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即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时代和汉代。汉文化层离地表深约 20 厘米，厚 10 至 50 厘米。汉文化层出土陶器主要分

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约占40%，泥质陶约占60%，夹砂陶表面多饰绳纹和拍印几何纹，泥质陶亦以拍印方格纹加戳印纹为主，次为绳纹和素面，并发现两件青釉陶，器形方面有釜、罐、碗、钵等，皆为平底器。石器方面有砺石、石砧、石锤、石锛、牡蛎啄、石刀、石环芯和青铜斧石范等，另发现铁器残件58块，锈蚀严重，器形可辨者有：斧或铲4件、铺3件、凿2件、鱼钩5件、锯1件、钉11件、针5件、刀11件、矛头2件，青铜器有三翼镞1件、鱼钩1件、青铜残片2件、铜钱5枚，其中3枚为五铢钱，1枚为大泉五十。此外，又发现琉璃珠7颗、直径1.8~7毫米、厚1.3~3.4毫米。其中5颗圆饼状，黑色；另1颗五角形，1颗长管形，皆深蓝色。

东湾仔的青铜时代和汉代文化层内，亦发现大量贝壳，堆积成层，但这种含贝文化层，有别于史前时期岭南的贝丘堆积形态。据分析，贝壳品种绝大部分属海生潮间带岩石种，罗美娜认为汉文化层所发现的贝壳，绝大部分是人类食用贝肉后把壳废弃的产物。此外，在汉文化层亦发现少量鱼骨和小型哺乳类动物的骨骼，因保存不好，种属已难确定，但这些骨骼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应该是人类食用后丢弃的东西。

1993年至1994年，香港考古学会在西贡滘西洲[38]进行调查和发掘，亦发现了汉代遗存。遗存主要在滘西洲北西一处近海的山坡上发现，海拔高45~55米，遗物散布面积约800平方米。滘西洲汉代遗址的特点是文化层十分浅和薄，除去10~15厘米的表土，即发现汉代陶片；掘深至20厘米，则达生土层。另一特点是除陶片以外，并无其他遗迹。大部分陶片都可复原成完整器，但所代表的器类却不多。陶器以泥质陶为最多，表面多饰方格纹和戳印纹，亦有少量刻划纹和素面器。其他器物，包括3件网坠、1件未刻文字的石印章和1件铁器残件。根据滘西洲遗址出土的戳印纹陶分析，对比广州汉墓出土的同类型陶器，可知遗址的年代属于东汉晚期。推测遗址出土的汉代遗物，可能只属于一个渔民家庭的东西，而这个家庭，只在东汉晚期在滘西洲作短暂居住，所盖搭的房子是属于临时性的，因此未能找到柱洞和其他生活的遗迹。

1992年3月，香港考古学会在大屿山竹篙湾[39]进行抢救发掘时，亦发现了汉代文化堆积，出土汉代陶片90片，包括米字纹陶、方格纹加戳印纹陶和素面陶等；其中1片戳印纹陶表面有青釉。另复原了1件直身、平底、网格加戳印三角纹罐，高33、腹径33厘米。竹篙湾虽出土了不少汉代陶片，却未发现其他的汉代遗迹。

香港境内最重要的汉代遗迹，当然是李郑屋村发现的东汉砖室墓[40]。汉墓位于九龙半岛西北岸深水埗区的一处海蚀台地的边缘，台地海拔高程约13米，后有斜坡与九龙山脉相接。1955年，政府为兴建李郑屋公共房屋村，需要把山坡削平时，即发现这座古墓，工人立即向政府报告，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教授（Prof. F. S. Drake）率领一群港大师生和工务局人员进行发掘清理。古墓用砖砌筑，平面呈“十”字形，分羡道、前室、后室和左右两耳室。羡道至后室残长约10.5米，两耳室长11.5米。前室

为穹窿顶，耳室和后室为单券顶。后室后壁当中有一券形小龛，龛底无铺砖。构筑古墓的墓砖平均长40、宽20、厚4厘米，大部分素面，其余侧面有模印花纹和文字，花纹十余种，以菱形和轮形图案为主，亦有简化动物形象；文字则包括“薛师”、“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古墓出土遗物共58件，分陶器和青铜器两类。其中陶器50件，包括罐、釜、鼎、尊、卮、豆、盒、壶、奁等完整生活器皿27件，以及井、灶、屋等陶制模型明器7件。器皿表面多有一层青黄色釉，明器模型则无釉。陶器纹饰有方格印纹、刻划弦纹和莲瓣纹等。青铜器8件，有镜、洗和铃等。对比广州汉墓出土的资料，推断李郑屋砖室墓的年代应为东汉中期，即公元前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

过去几十年，在广州发掘清理的南越国和汉代墓葬超过1000座。相反，香港只发现1座东汉砖室墓，毗邻的深圳，亦只在南头红花园[41]发现1座西汉墓和8座东汉墓。由此可知，汉代时期，南迁的汉人，或汉化的越人，很少到香港一带活动，故这里能找到的汉代遗址就十分少。而东湾仔遗址出土的铁锸、白芒遗址出土的铁锸、锄和半月形石刀，都是农耕的工具，锸和锄用来翻土，半月形石刀用来收割。这些器具的出土，表示在白芒和东湾仔的汉代居民，已受汉文化影响，农耕已为主要的经济活动。

汉代时期香港最主要的商品，可能是海盐。香港位于南海之滨，海岸线长数百里，对盐业生产十分有利。盐是民生必需品，为防止商人谋取暴利，汉朝实行盐铁专卖的政策，盐业由官方专营，于重要盐场设置盐官，以加强盐业的生产和调运。西汉时期全国设有盐官的共36处，其中两处在岭南的番禺和高要，香港由番禺县管辖，政府当然在这里聚众煮盐。而史籍记载，三国吴甘露二年（266年），设置司盐都尉，督管珠江口东部盐场，名东官场[42]。宋代时九龙有盐场名南栅和官富场，可知生产海盐一直是香港的重要工业。有学者认为，李郑屋汉墓的墓主，可能是当时管理香港煮盐业的一位盐官，是否属实，仍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支持。

五　六朝至五代

三国时期（220～256年），香港属东吴南海郡。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把南海郡东南部划出来，新置东官郡，下辖宝安等六县，由是香港改属宝安县。至南朝梁武帝（502～549年）时改东官郡为东莞郡，宝安仍属东莞管辖。及至唐代中叶（757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于是属于东莞县管辖。

六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混乱，南方则相对稳定，于是中原大族向南迁移，使南方有较大的发展，但香港境内发现的六朝遗物不多，只在大屿山的白芒、贝澳、沙咀头；南丫岛的深湾、沙埔村等遗址零星出土。这些零星的考古证据显示，从北方南迁的汉人，并未移入南海之滨的香港地区活动。

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白芒遗址调查时发现了一座晋代土坑墓[43]，长142、宽71厘米。随葬8件青瓷器，其中有2件四系耳罐，6件碗；另有1件铁剪。这是香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晋代墓葬。

1983年香港考古学会在大屿山贝澳[44]沙堤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两座南朝墓，人骨已腐，葬式不明，共出了青瓷8件，包括六系罐1件、长身小罐1件、碗6件。1989年，香港考古学会在南丫岛沙埔村[45]沙堤遗址亦清理了一座南朝墓，此墓墓坑不明显，人骨保存完好，没有随葬品，只发现铜发簪1件、银耳环1对。1997年，古物古迹办事处在沙埔村进行抢救发掘时又发现了一座南朝墓，大部分人骨已腐，随葬品只有1件青瓷碗。此外，在南丫岛深湾、赤鱲角虎地湾和东涌沙咀头亦曾发现过青釉六系罐，是典型的南朝至隋代器物。上述在香港境内零星发现的六朝墓葬和器物，说明当时香港人口稀少。

唐代（618～907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鼎盛的时期，由于海上贸易的关系，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当时的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港，来自南洋诸国及阿拉伯的商人，在广州的“蕃坊”聚居，朝廷亦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由于香港位于珠江口的东岸，是进出广州的商船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保护海上贸易路线的畅通，朝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屯门设立军镇，驻军二千。由于驻军的关系，唐代的香港得以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因此，香港境内发现了不少唐代遗址，包括屯门小榄、石角咀、铜鼓洲；赤鱲角深湾村、虎地湾；大屿山沙咀头、狗虱湾、东湾、二浪；马湾东湾仔；南丫岛沙埔村、芦须城；长洲大鬼湾；港岛春坎湾、西贡沙下等，遗址遍布香港境内各处海湾。

香港唐代遗址内发现最多的，是那种通常被称之为“壳灰窑”的遗迹，每每是成群出现。而规模最大的，要算是赤鱲角深湾村遗址。深湾村位于赤鱲角岛北部，属沙堤堆积，由于兴建新机场关系，香港考古学会分别于1979～1983年[46]和1990～1991年[47]在深湾村遗址进行发掘，在沙堤顶部共发现12座唐代壳灰窑，基本上排成两排，排与排之间的间距约为15米，每排有窑4至5座。它的制造方法，一般都是在沙堤上挖一个直径约2米的坑，在坑边抹上泥，底铺石块。发现有清楚的火道。火道一般较窑底高出约1.2米。另有清楚的出气孔。窑壁周边的硬度由内硬而至外松。窑边还用石铺砌。有些窑还有打破关系，证明窑的使用时间较长。共出的器物有唐代早期至晚期的各种青瓷器，其中以罐和碗为大宗，还有香炉等。窑内和周围有大量的残窑具和红烧土堆积，这些窑具主要是些柱状、乳钉状和砖状物体。

1995年古物古迹办事处发掘东涌沙咀头遗址[48]，亦发现大量残窑具堆积，却不见窑上部的砖石结构，从地层中遗留的迹象看，底部的沙都烧成红色。同样在其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柱、乳钉和砖状体，其中砖状体的火候都不及柱状和乳钉状的高。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砖上有2～3个凹槽，正好可以放置柱状窑具，发掘者将它们命名为“支架”、“架条”，而将乳丁状的称作“支钉”，表示其在窑内的放置状况和功能。对于这些窑的功用，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由于在这些窑的底部，多有一层厚厚的壳灰发现，有学者认为窑是作为生产石灰之用，以贝壳和珊瑚为原料，“壳灰窑”也是因此得名的。他们认为是将贝壳烧成石灰，可作建筑材料、补船、中和酸性耕土之用；有学者认为不是烧灰的窑，而是煮盐的炉灶遗迹；也有学者认为是烧制陶器的民窑；还有学者认为窑可以是多用途的。

六　宋、元

香港与邻近地区在宋代被称为“大奚山”，隶属广州府东莞县。宋朝的经济收入，大部分依靠南海贸易，当时广州仍然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朝廷亦在香港地区的屯门设巡检司，佛堂门设税关，以征收商船之关税。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从外地移居香港的人士不断增加；至北宋末年，中原混乱，仕族相继南迁。宋朝年间移入本区较著名的有邓氏、侯氏、文氏和彭氏，子孙繁衍，散居于锦田、元朗、大埔一带，成为香港今天的大姓族。

香港发现的宋代遗址不多，只曾在沙咀头和深湾村发现几座宋代墓葬；稔树湾和龙鼓上滩发现宋代瓷片，以及在米埔、深湾、奇力岛等发现大量宋钱窖藏。考古学会在深湾村的发掘中，曾发现3座宋墓[49]，葬式不明；共出土11件随葬陶瓷器，包括罐3件，碗7件和水注1件。1995年发掘的沙咀头遗址，亦清理南宋土坑墓1座，人骨已腐，随葬四系小口罐一对，上盖瓷碗一对。这种葬式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宋墓常见的葬式，小口罐内常存放食物和酒。此外，古物古迹办事处在1997～1998年的第二次考古遗址普查中，在吉澳岛、乌溪沙、屯门新庆村等地亦发现了宋代遗存。其中对新庆村进行初步发掘，出土不少宋代瓷片。这些瓷片，大部分产自广东沿海的窑场如广州西村窑和潮洲笔架山窑。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推测，在宋代年间移入香港的姓族，不断繁衍和分支，村庄不断扩大，因而宋代的遗存，多压在现代村落之下，故未被发现，从而形成宋代遗存少见的现象。

元朝香港仍属广州府东莞县管辖，由于本区盛产珍珠、海盐，朝廷仍设屯门巡检司管理民政。此时中土为蒙古人所管治，汉人相继南迁至深圳和香港一带。原籍福建的廖氏亦于元末迁至新界，定居上水，建村立业。元代国祚短暂，因此香港发现的元代遗存甚少，只在赤鱲角虾螺湾[50]有发现。1990年香港考古学会在虾螺湾发掘中，发现了12座窑炉遗迹，沿山坡呈环状分布，整个窑场面积约二千多平方米。大部分窑的顶部已塌陷。每座窑直径约2米，有清楚的火道，窑后部和顶部有排气孔。窑内和周围发现铁渣

和炭碎，故推测这组是炼铁的窑炉遗迹。

七　明、清

明初香港本地区属广州府东莞县，由官富巡检司管治。至万历元年（1573年），从东莞县划出南部地区，成立新安县，香港改隶新安县。明代香港本区经济日渐发达，加上中原经历多次变化，南迁人数日多，使本区人口不断增加。当时本地的经济仍以生产海盐、培植香树和采珠为生，但均为官办。民间则以务农、捕鱼及烧灰等为业。明代中叶以后，部分南迁的窑工，开始在大埔碗窑烧制青花瓷器，碗窑的制瓷工业延续数百年，直至1920年代才停止生产。因此，大埔碗窑遗址成为香港早期的工业重镇。

1995年秋，香港区域市政署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在碗窑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51]，在碗窑村背后的山岗上发现了开采瓷土矿的矿洞遗迹，在山坡上发现16所水碓作坊遗迹，每所作坊建筑形式相同，均为面阔二间，进深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作坊内安装水碓3～6个，靠水力推动水轮，把瓷土瓷石舂成粉末。另在村后山脚发现牛碾遗迹，碾盘是用整块花岗岩凿出沟槽拼合而成，直径3.93米，沟槽宽33厘米；石辘子直径85厘米，用牛力拉动，可碾碎瓷土瓷石。此外，还发现淘洗瓷土的洗泥池，以及制作器坯的作坊。调查时亦发现了两座残龙窑，一座残长11.5米，沿山坡倾斜35度；另一座残长5.5米，宽5.2米，山坡斜20度，有窑门、窑室、烟道和排气孔等，窑室内见垫饼和匣钵。根据出土的瓷片推测，碗窑可能在明代中叶已开始生产青花瓷器，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才停止生产。碗窑的产品，除运往珠江三角洲一带销售外，部分更远销至南洋各国。

明代的海外贸易，仍然是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明初，郑和曾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加速了南海贸易的发展。明中叶以后虽有海禁，广州仍然是全国最大的商港。适值欧洲各国向东拓展，寻求新的贸易市场，率先东来的是葡萄牙人，于正德九年（1514年）抵达屯门，占据该区，引致中国官民不满，终于1521年在大屿山北部对开海面爆发中葡战争，最后葡人败走，转而经营澳门。可知当时的香港，仍然是南海贸易上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大屿山竹篙湾明代遗址的发掘，更证明香港与当时的海上贸易有关连。

竹篙湾是位于大屿山东北角一处袋形海湾，是船舶避风的良港。竹篙湾东岸有一小河从东向西流入海，文化遗存就在河口发现。香港考古学会在1986年[52]和1992年[53]，以及古物古迹办事处在1990年，共进行了三次抢救发掘。在河口阶地发现数万片陶瓷碎片，其中大部分属明代中叶，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青花瓷，品种以碗、碟为主；亦发现了少量泰国陶瓷片。1990年的发掘之中，更发现一个直径约2米、深约0.60厘米的圆

坑，坑内填满瓷器碎片，说明当时的人特意掘一大坑把部分瓷片埋藏。此外，还有很多碎片丢弃在当时的河岸边。除这大坑之外，并未发现其他的生活遗迹，因此，碎片不可能是村民用后丢弃堆积而成；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竹篙湾是明代进出广州商船的一处休息、维修和补给的地方，商船在停泊补给期间，就把在运送途中打破的一些外销青花瓷抛弃在河岸边，以减轻船载货的重量。当时的商船，还可能补充了一些大埔碗窑生产的青花瓷，以致碗窑产品在东南亚一带亦有发现。如推测无误，明代的香港是南海贸易的补给站。

葡萄牙人在1521年的第一次中葡海战战败之后，即转移到福建沿海活动。不久又回到珠江口一带，转而经营澳门，终于在1557年占据了澳门，成为葡人在华的贸易根据地。此后数百年，澳门不仅是中西贸易的商港，亦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1990至1992年，澳门当局配合圣保禄教堂遗址（俗称大三巴牌坊）的修缮和整治工程而进行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遗物亦印证了澳门在中西贸易和文化发展上的重要性。

据文献记载，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一世于1596年，批准耶稣会教士在澳门圣保禄教堂遗址原址兴建一所教堂和修道院；1601年，一场大火焚毁了新建的修道院和教堂；1603年，圣保禄教堂重建；1835年，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再次被大火烧毁，仅剩下教堂的正立面和部分墙体以及修道院的部分校舍；之后，教堂废墟更一度改为临时墓地。过去数十年，虽有各种重建教堂的提议，但直至80年代中后期，澳门当局才决定对圣保禄教堂遗址进行整治。1990年至1992年对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59]，由葡萄牙的文物部门的考古专家负责，配合澳门市政厅和澳门民用工程实验室的人员而进行。发掘主要在教堂内部进行，发现了属于不同时期的教堂建筑墙基遗迹，基本上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另发现一些墓葬、钱币和大量陶瓷碎片，对研究当时澳门和其他亚洲地区的贸易，和耶稣会在东方发展贸易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香港和澳门因地处珠江口，为海上交通和军事要塞，香港境内有不少明、清年间的军事防御设施，军事考古便成为香港清代考古的重点之一。明代初年，为防御沿海的倭寇和海盗，即在广东沿海要冲设置卫所，派兵驻守，以保沿海居民平安。至万历年间，在沿海增设水寨6处，各率巡海师船，以巡防各寨所属汛地。其中设于新安县的南头寨，统辖六汛，巡防香港一带海域。清初，朝廷为防沿海居民与退居台湾的明室勾结，曾下迁海令，沿海居民需内迁50华里，沿海汛地亦被废置。康熙八年（1669年）朝廷允许展界，并于沿海广设汛营和炮台，香港境内即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大屿山建分流炮台，在东龙岛上建佛堂门炮台。至清中叶以后，西人东来的威胁日增，朝廷即锐意加强海疆防卫。于是在大屿山东涌建石狮炮台（1817年建）和东涌寨城（1832年建），在九龙湾畔建九龙炮台（1811年建）和九龙寨城（1847年建），并在九龙半岛南端建尖沙咀炮台和官涌炮台（1840年建）。古物古迹办事处为增加对清代炮台的了

解，曾在佛门堂炮台和九龙寨城进行发掘。

佛堂门炮台，位于东龙岛的北端，扼守着进入香港东面海域的要道。据《新安县志》记载，炮台建于康熙年间（1662～1772年），有营房15间和大炮8门。建成后一直驻有守军，后因补给支援困难，终于1811年被新建的九龙炮台所取代，佛堂门炮台从此废弃。1979年古物古迹办事处对炮台进行修缮，并于1981年至1984年间，在炮台内部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1997年又在炮台内部进行一次发掘[55]，发现15间营房的残墙和墙基，与文献记载相符。炮台外墙用石块砌筑，营房墙身则用泥土夯打而成。炮台内出土大量陶瓷碎片，部分青花瓷器属大埔碗窑产品；金属器物有千多件，其中炮弹只几个；另有鱼兽碎骨和数以千计的贝壳，反映当时守军以贝类为主要食粮，由于炮台出土的军用器物不多，估计炮台是在从容的情况下迁移，所有军备都有充足的时间迁移至新建的九龙炮台。

九龙寨城位于九龙半岛东北角，是1846年两广总督耆英上书奏请兴建，1847年建成。寨城如平行四边形，长210米，宽120米，有6座瞭望台，4道城门，南门为正门，门楼上有"九龙寨城"和"南门"两石额。寨城内有房舍、衙门、官舍等建筑，驻兵数百，以抗衡占据香港岛的英军。1898年英国和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99年，但同意寨城仍由中国管治。1899年，在英军威胁下，清兵自寨城撤走。之后，寨城人口大为减少，到20年代，寨城已呈破败之象。第二次大战期间，日军占领香港，寨城城墙被日军完全拆毁，石条移作扩建启德机场之用。战后寨城人口激增，城内出现非法占用土地和乱建房屋的情况。至1987年香港政府宣布清拆寨城，于原址兴建公园。古物古迹办事处在寨城清拆期间，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进行了两次勘查和试掘[56]，藉以了解寨城原址的保存情况。发掘工作集中在原寨城的东门和南门进行。在离地表深约2米处，发现了东南两门的墙基，部分保存完整，残存最高的地方有1.5米以上；两个城门的石板通道都更接近完整，南面的城墙都基本有墙基保存。此外还发现了原来并无记载的城内石板街及排水沟。整个发掘的最大收获是两块分别刻有"九龙寨城"和"南门"的石额在南门原址出土。

（执笔：招绍瓒、邹兴华、李浪林）

注　释

①⑦ Finn, J. D., Archaeo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58.

② Schofield, W., An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ek Pik, Journal Monograph I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Hong Kong, 1975.

③ 陈公哲：《香港考古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4期。

④⑯ 秦维廉编：《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香港考古学会专刊第三本，1978年。

⑤⑪㉚㉝㊼㊿ Meacham, W.,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Journal Monograph Ⅳ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⑥ 邓聪、郑炜明：《澳门黑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⑦ 邹兴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载于邹兴华编：《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

⑧ 区家发等：《香港石壁东湾新石器时代遗址1987、1988年两次发掘综合报告》，《香港考古学会会刊》第12期，1990年。

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九龙西贡南区地下文物调查报告》，古物古迹办事处内部资料，1998年。

⑩ 区家发：《浅谈长江中下游诸原始文化向广东地区的传播与消亡》，载于《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

⑫ (a) Kelly, W. J., "Tung Kwu", JHKAS", vol. Ⅴ, 1974, pp. 17 22.

(b) Kelly, W. J., "Tung Kwu Phase 3", JHKAS, vol. Ⅵ, 1976, pp 51－54.

(c) Meacham W., "Tung Kwu Phase 4" JHKAS, vol. Ⅵ, 1976, pp. 55－66.

⑬ Meacham, W., "Sai Wan", JHKAS, vol. Ⅶ, 1979, pp. 36 37.

⑭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⑮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⑰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6期。

⑱ Meacham, W.,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at Yung Long South"，载于《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⑲ Drewett, P. L., Neolithic Sha Lo Wan,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Occasional Paper No. 2, Hong Kong, 1995.

⑳ 邹兴华：《香港沙柳塘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收获》，载于《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㉑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香港回归后首次考古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7日第2版。

㉒ Crawford, J. R., "Po Yue Wan", JHKAS, vol. Ⅺ, 1986, pp. 64－79

㉓ 古物古迹办事处：《屯门龙鼓滩1994年发掘报告》，古物古迹办事处资料。

㉔ 区家发、莫稚：《元朗下白泥吴家园沙丘遗址调查试掘工作报告》，《香港考古学会会刊》第14期，1998年。

㉕ 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大屿山扒头鼓发掘报告》，古物古迹办事处未刊资料。

㉖ 韩康信、董新林：《香港马湾岛东湾仔遗址古人骨的考察与鉴定》，古物古迹办事处未刊资料。

㉘ 区家发等：《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简报》，载于邓聪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㉙㊺ Meacham, W., "Sha Po Tsuen", JHKAS, vol. ⅩⅢ, 1993.

㉛ 邓聪等：《北大屿山1991年考古调查报告》，古物古迹办事处内部资料。

㉜ Williams, B. V., "Hai Dei Wan", JHKAS, vol. Ⅷ, 1980.

㉞ Davis, S. G., Tregear, M., "Man Kok Tsui, Archaeological Site 30, Lantau Island, Hong Kong", Asian Perspectives, vol. 4, 1960.

㉟ Meacham, W., "Tai Long", JHKAS, vol. Ⅸ, 1982.

㊱㊸ 邓聪等：《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6期。

㊲ Rogers, P. R., Tung Wan Tsai: A Bronze Age and Han Period Coastal Sit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Hong Kong, 1995.

㊳ Meacham, W.,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 of North Kau Sai Chau, 古物古迹办事处未刊资料。

㊴㊼ 香港考古学会：Report on the 1992 salvage excavation at Penny's Bay, Lantau, 古物古迹办事处资料

㊵ 屈志仁：《李郑屋汉墓》，香港市政局，1970年。

㊶ 广东省博物馆等：《深圳市南头红花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㊷ 萧国健：《香港前代社会》，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61页。

㊸ 同㊱。

㊹ Meacham, W., "Pui O", JHKAS, vol. Ⅹ, 1984, pp. 60－69.

㊺㊻ Cameron, H., Williams, B. V., "Sham Wan Tsuen", JHKAS, vol. Ⅹ, 1984, pp. 10－54.

㊽ 古物古迹办事处：《大屿山东涌沙咀头1995年发掘报告》，古物古迹办事处内部资料。

(51) 区家发等：《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香港区域市政局，1997年。

(52) Meacham, W., "A Ming Trading Site at Penny's Bay, Lantau", JHKAS, vol. Ⅻ, 1990, pp. 100－115.

(54) 澳门文化司署编：《澳门大三巴遗址：面向未来的丰碑》，1994年。

(55) Rogers, P. R., "Tung Lung Fort: A Ching Dynasty Fortification on Tung Lung Island, Hong Kong", 古物古迹办事处资料。

(56) 古物古迹办事处：《九龙寨城考古工作报告》，古物古迹办事处内部资料，1994年。

* JHKAS: Journal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附表　香港近十年考古调查和发掘

序号	遗　址	发掘日期	发掘单位
1	大屿山石壁东湾发掘	1988年1月至3月	香港考古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深圳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2	南丫岛沙埔村发掘	1988年3月至4月 1989年1月至2月	香港考古学会
3	屯门龙鼓滩抢救发掘	1989年10月至1990年3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4	屯门龙鼓上滩抢救发掘	1990年1月至3月	香港考古学会
5	大屿山竹篙湾抢救发掘	1990年9月至10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6	赤鱲角历史及考古调查与发掘	1990年9月至1991年7月	香港考古学会
7	南丫岛大湾发掘	1990年11月至12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8	大屿山方角咀抢救发掘	1990年12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9	大屿山沙咀头试掘	1991年1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10	大屿山北部考古调查	1991年4月至8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由广东省博物馆、山西考古研究所及广东罗定博物馆协助）
11	大屿山妹湾仔、白芒及扒头鼓抢救发掘	1991年12月至1992年8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由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助）
12	马湾沙柳塘湾抢救发掘	1991年12月至1992年1月	香港博物馆
13	大屿山竹篙湾末期抢救发掘	1992年2月至3月	香港考古学会
14	大屿山横塘抢救发掘	1992年9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15	屯门涌浪北抢救发掘	1992年4月至7月 1992年9月至11月 1993年1月至3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续附表

序号	遗　址	发掘日期	发掘单位
16	屯门涌浪南抢救发掘	1992年5月至7月 1993年2月至3月	香港考古学会
17	大屿山东涌考古调查	1992年12月至1993年1月	香港考古学会
18	马湾考古与历史调查	1993年1月至3月	白尔德博士
19	大屿山狗虱湾考古调查	1993年5月	香港考古学会
20	大屿山沙螺湾岬角考古调查	1993年4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21	大屿山沙螺湾岬角抢救发掘	1993年6月至8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22	九龙寨城考古勘查	1993年11月至1994年1月 1994年5月至6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23	长洲大鬼湾抢救发掘	1993年12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24	北滘西洲考古调查	1994年1月至2月	香港考古学会
25	长洲西湾抢救发掘	1994年1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26	大屿山青洲仔考古调查	1994年1月至3月	区家发
27	马湾东湾仔抢救发掘	1994年2月至5月 1994年10月至12月	罗美娜
28	元朗鳌磡石抢救发掘	1994年4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29	龙鼓洲及沙洲抢救发掘	1994年5月至7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30	喜灵洲考古调查	1994年9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31	北滘西洲抢救发掘	1994年9月至10月	香港考古学会
32	屯门龙鼓滩抢救发掘	1994年10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33	大屿山狗虱湾抢救发掘	1994年10月至12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34	南丫岛沙埔村抢救发掘	1994年11月	香港考古学会
35	东涌沙咀头	1995年2月至4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深圳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36	南丫岛洪圣爷湾抢救发掘	1995年6月至9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续附表

序号	遗　址	发掘日期	发掘单位
37	小鸦洲深湾调查	1995 年 8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38	小鸦洲深湾调查	1995 年 12 月	香港考古学会
39	南丫岛榕树湾调查	1996 年 1 月至 2 月	香港考古学会
40	南丫岛大湾发掘	1996 年 3 月至 5 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41	西贡沙下调查	1996 年 4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42	屯门小榄调查	1996 年 6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43	大屿山万角咀调查和抢救发掘	1996 年 7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44	南丫岛北南丫学校抢救发掘	1996 年 12 月至 1997 年 1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45	第二次香港考古遗址普查	1997 年 1 月至 1998 年 12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由区家发、罗美娜、邓聪、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祖彼德博士、深圳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协助)
46	马湾东湾仔试掘	1997 年 1 月至 2 月	香港考古学会、古物古迹办事处
47	屯门龙鼓滩抢救发掘	1997 年 2 月至 4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48	屯门扫管笏调查	1997 年 2 月至 4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49	东龙炮台发掘	1997 年 5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50	屯门小榄抢救发掘	1997 年 5 月至 6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51	马湾东湾仔北抢救发掘	1997 年 6 月至 11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52	南丫岛沙埔村抢救发掘	1997 年 7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53	元朗下白泥试掘	1997 年 12 月至 1998 年 1 月	香港考古学会
54	元朗屏厦路调查	1998 年 1 月至 4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55	屯门 54 区调查	1998 年 1 月至 2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56	西贡沙下考古调查	1998 年 1 月至 3 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续附表

序号	遗　址	发掘日期	发掘单位
57	沙洲调查	1998年2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58	大埔元洲仔调查	1998年2月至3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59	屯门龙鼓滩抢救发掘	1998年2月至3月 1998年5月至6月 1998年10月至11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60	屯门新庆村抢救发掘	1998年3月至4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61	元朗13、14区调查	1998年5月至8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62	屯门洪水桥调查	1998年5月至9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63	将军澳西岸公路调查	1998年9月至12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64	元朗锦田支路调查	1998年9月至11月	古物古迹办事处

台湾考古五十年

文物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部编

台湾省位于我国的东南海上，同福建省隔台湾海峡相望，包括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台湾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海拔100米以上的山地和丘陵约占全岛的三分之二，中央山脉将台湾岛分为东西两部分，平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在气候上台湾属于亚热带季风区；台湾的地质构造与中国大陆是属于一个整体。台湾省人口2000多万，少数民族约占3%，依其分布的地区和汉化程度，可分为两个族群：高山族和平埔族。高山族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东部河谷和沿岸平原以及兰屿一带，多少保留各自的文化特征；平埔族，主要居住在北部海岸和西部平原一带，大都已经汉化。自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过，生活在台湾的居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台湾地区的考古工作肇始于日据时期，1896年日本人栗野博之丞在台北市郊的芝山岩采集到石器，1897年圆山贝冢发现，近代考古学的方法逐渐传入台湾。日本学者在台湾发现并发掘了一批遗址，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鹿野忠雄[1]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台湾地区的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关系问题。1949年，李济、石璋如等著名学者随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起迁至台湾，不久台湾大学设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后改称人类学系），开始了由中国学者主导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新阶段，他们积极在台湾地区开展考古工作，带动了台湾地区考古的发展。50年来，台湾考古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已发现的遗址总数有一千五六百处，初步建立了台湾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并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开展了文化生态学、民族考古学研究。有学者对这50年考古工作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分之为四期[2]。第一期，从1949年到1961年，这一时期不仅发掘和调查了许多遗址，而且遗址层位的发现初步建立了区域文化年代学。第二期从1961年到1971年，比较重要的是长滨文化的发现和台湾大学、耶鲁大学合作进行的台湾史前史研究计划，为配合这一计划对凤鼻头、大坌坑、营埔等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三期以"浊大计划"作为开始标志，70年代后期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被引进到台湾。1979年李光周将抢救考古（Salvage archaeology）或契约考古（Contact archaeology）的概念

带到台湾[3]，其田野工作由纯粹为了研究与教学转向了强调工程救险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台湾考古进入了第四阶段。此外，台湾历史博物馆于1995年成立了专案小组，开始进行水下考古工作[4]。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了关于台湾的记载。大约从17世纪中叶开始，关于台湾地区较为可信的文字记载更加丰富了。一般把台湾考古分为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两部分，界限就是从17世纪中叶划开。本文将台湾50年来的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作一简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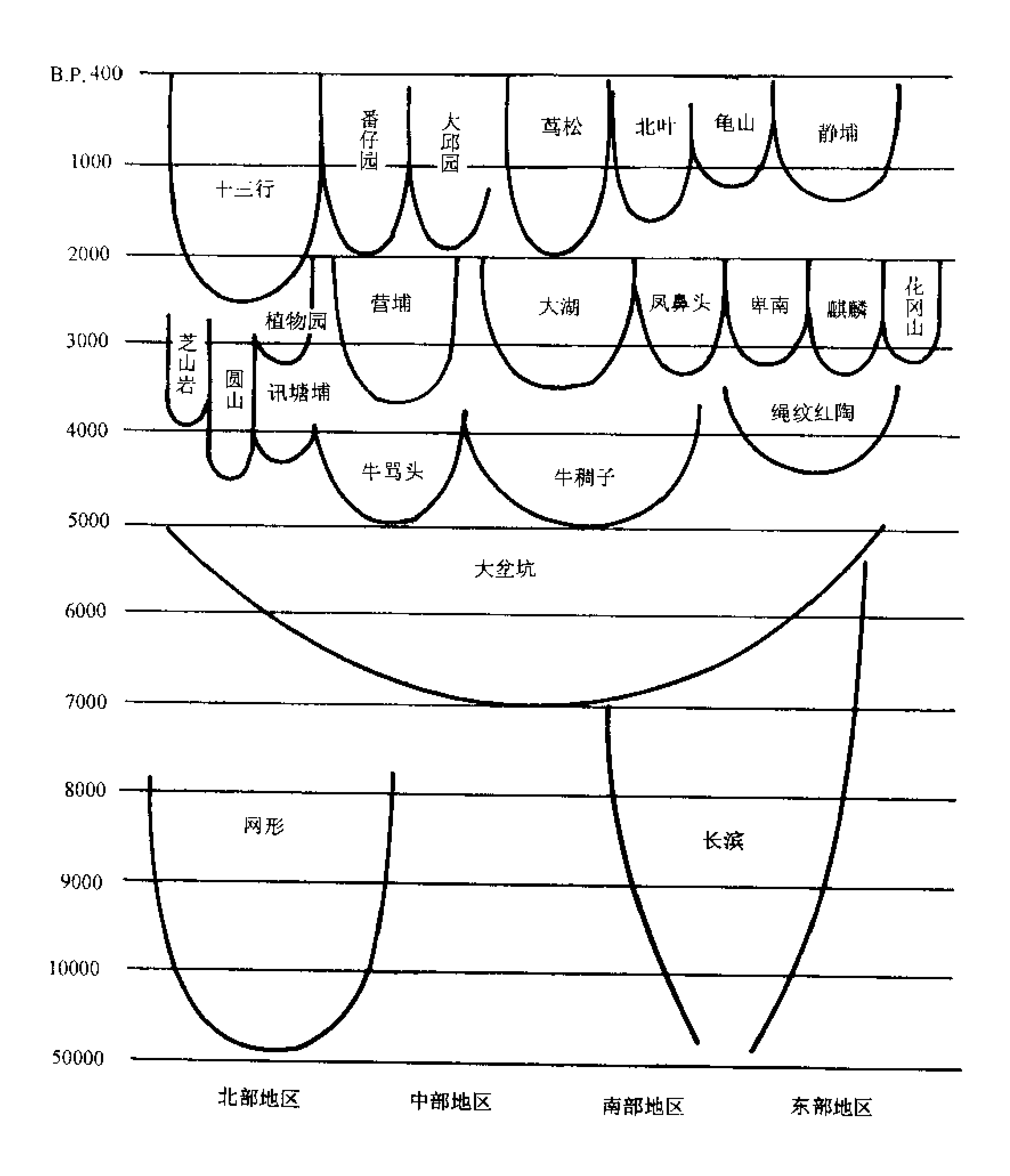
一

史前考古是台湾地区考古工作的重点，目前已发现的史前遗址有1000多处。台湾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在七八十年代已经初步建立起来，90年代由于新资料的充实，又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目前还未形成共识，刘益昌（表一）[5]、连照美[6]、臧振华[7]等学者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一般都把台湾的史前文化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其中旧石器时代为先农业文化阶段，新石器时代早期为原始农业阶段，晚期为高级农耕文化或谷业农业阶段。

1. 旧石器时代

台湾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间陆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在距今5万～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台湾就有人类居住。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化有东部及恒春半岛沿岸的长滨文化和西海岸中北部丘陵台地地区的网形文化。这两个文化的年代和华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同，但延续的时代较晚。这个阶段的遗存在鹅銮鼻地区[8]和苗栗县鲤鱼潭水库附近也有发现。

长滨文化因最早发现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而得名[9]，1968年3月发现，同年12月由台湾大学考古发掘队对其进行了初步发掘，此后又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打制石器6000多件，以石片石器为主，打击石片主要使用锐棱砸击法，石器的主要类型有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另外该遗址也有比较丰富的骨角器。根据对地层中所含碳样测定，最早的数据为距今1.5万年，另外4个数据为距今6000～5000年，其年代跨度较大，可能长滨文化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10]，也有学者认为长滨文化的遗物可早到距今5万年[11]。此外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一带的河床上，曾发现了晚期智人的右顶骨化石残片，该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镇人”，年代距今约3万～2万年前。属于左镇人的材料至今已有8件，分别出自菜寮溪的臭屈和冈子林河段[12]。左镇人被推测为长滨文化的主人，当时人们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还没有出现农业。网形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北、中部地区，以苗栗网形地区的伯公垅遗址为代表，其典型石器为单面石核



表一　台湾地区史前文化的时空架构示意图

据刘益昌《台湾的史前文化与遗址》，1996年。

砍伐器和刮削器，与长滨文化的石片石器有所区别[13]。

对于台湾古人类和文化的来源，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从大陆迁徙而来。近年来在福建省漳州境内“东山人”、“清流人”等人类化石和一批旧石器地点的发现，对于研究台湾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提供了直接线索。在晚更新世后期，气候变冷，海平面下降，台湾海峡的一部分成为陆桥，使大陆的人类和哺乳动物能够迁徙到台湾。在长滨发现的动物化石种属与大陆所见基本相同，其石制品中锐棱砸击的石片和石核为我国华南地区典型的器物。台湾海峡在1.5万年以前全是陆地，研究表明，最早在距今约6万年前，当大陆的史前人类通过闽台之间的惟一陆上通道“东山陆桥”入台的时候，途经的是低丘草原少林的环境和温偏凉的气候条件[14]。

2. 新石器时代早期

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全岛，在澎湖列岛等附属岛屿上也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台湾与福建、浙江就是一个文化系统[15]。这个时期不但聚落的数量大大增加，分布范围扩大，而且在晚期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目前可将台湾的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大约距今约五六千年，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在日据时期鹿野忠雄就曾作过推测[16]，台湾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是绳纹陶文化；而直到张光直1964～1965年对大坌坑和凤鼻头两遗址的发掘，才正式确立了这一文化；80年代在澎湖列岛的发掘，大大加深了对于这一文化生活方式的认识。

大坌坑文化也被称为“绳纹陶文化”，最先发现于台北县大坌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台湾西海岸，以西南海岸最为密集，另外在东部海岸[17]、澎湖列岛也有发现。主要遗址除大坌坑外，还有圆山下层、凤鼻头、台南八甲村[18]等，大都属于贝丘遗址。

大坌坑文化的陶器比较原始，质地松软，胎壁较厚，火候不高。陶色红褐或灰褐色，器形简单，主要有罐、钵和碗，往往在口部外缘唇、颈之间有一圈圆脊。主要纹饰为拍印粗绳纹和划纹，也有彩绘和镂孔。虽然台湾学者大都认为大坌坑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根栽或园艺式的农业[19]，但迄今并没有发现与农业活动有关的直接证据[20]。

大坌坑文化可能和长滨文化并存了一段时间，但从文化面貌上看，大坌坑文化并不是从长滨文化发展来的。其陶器的特征与大陆东南闽粤沿海的绳纹陶非常相似，很可能是距今7000年以来在大陆东南沿海形成的，以适应海岸和海洋环境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之一[21]。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台湾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考古学文化是从大坌坑文化发展而来，大坌坑文化的主人很可能是南岛民族的祖先之一[22]。

3. 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台湾的原始文化进入到一个繁荣的阶段，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各个地区出现不同的地域文化。一般将这一时期分为四区：西海岸北部、西海岸中部、西海岸南部和东海岸。按时代的早晚可分为两段，早段的年代在距今5000～3500年，

主要包括圆山文化、芝山岩文化、绳纹红陶文化等；晚段的年代在距今约 3500～2000 年，主要有植物园文化、营埔文化、卑南文化、大湖文化和麒麟文化等。

圆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东北部沿海和台北盆地，以台北圆山贝冢遗址为代表。1953～1954 年石璋如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该遗址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出土红褐色素面陶器，下层出土绳纹陶器，第一次为台湾史前文化建立了地层上的年代标尺[23]。以圆山遗址上层为代表的圆山文化陶器夹砂陶较多，陶色以红褐色为主，器形以鼓腹圈足罐为主，多素面无纹，器表常施红彩。石器有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巴图形石斧、三角形带孔石镞和带槽网坠等。玉器使用较多，骨角器也常见。圆山文化中尚有少量的铜器，如在大坌坑窑后圆山文化层发现两翼式青铜镞，在圆山遗址出土两翼形青铜镞和手镯一类的青铜片，当是与大陆频繁交流的产物。圆山贝冢中曾发现仰身直肢墓葬。

芝山岩文化仅发现于台北芝山岩遗址。该遗址 1981 年 2 月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芝山岩文化层叠压圆山文化层的地层关系。陶器有罐、钵、碗、豆等，纹饰繁杂，有绘纹、绳纹、方格纹、划纹、圈纹等。石器较为发达，骨角牙器也很多。另外还发现了木器，类型包括尖状器、掘棒、陀螺形器和木桨形器。芝山岩遗址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炭化稻谷的遗存，经过鉴定为粳稻，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绳纹红陶文化，分布广泛，台湾西海岸中南部和澎湖地区的文化面貌比较一致，是台湾文化的主要基干，有学者按地区的代表性遗址分别称为“凤鼻头文化”、“牛稠子文化”、“牛骂头文化”（或称为“草鞋墩文化”）和东部地区的绳纹红陶文化等，可分为澎湖锁港、屏东垦丁、高雄凤鼻头三个类型[24]。凤鼻头遗址发掘后，张光直推测这个文化是从大陆渡海而来，原型应当是青莲岗或马家浜文化[25]。70 年代“浊大计划”发掘了中部地区的牛骂头遗址，发现细绳纹红陶中有不少大坌坑文化陶器的特征，为认识这个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新材料。现在学者认为，绳纹陶文化时代约距今 4700～3500 年，除来源于大坌坑文化外，也吸收了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文化成分，如稻作农业、农具、陶器中的鼎和豆等，因此造成了文化的变迁[26]。台湾西海岸南部的牛稠子文化材料比较丰富，并可以进行类型的划分，其中垦丁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27]，陶片上有豆类和稻壳印痕，稻壳经鉴定属于籼稻；当时的人们有拔牙习俗。

植物园文化分布在台北盆地和淡水河中下游一带，以台北植物园遗址为代表，有关这个文化的内涵了解不多。陶器陶质细腻，陶色褐色或红色，主要器形为罐，主要饰以方格印纹。石器与圆山文化大体相似，但打制品与磨制品数量相当。

营埔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中部大肚溪和浊水溪中下游一带，以 1964 年发掘的台中营埔遗址为代表，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南投顶崁子、曲冰[28]和大马璘遗址[29]等。“浊大计划”主要在这个地区进行，促进了对营埔文化的认识。营埔文化分布较广，各遗址间有地域上的差异。陶器陶色灰黑色，次为红褐色，还有一些磨光黑陶。器形以罐、钵为

主，纹饰种类较多，主要有羽状纹、波浪纹、圆圈纹、贝纹、弦纹和彩绘纹等。石器种类繁多。在营埔遗址的陶片上曾发现有稻壳的印痕，经鉴定属于印度亚种的栽培种[㉙]。在曲冰遗址发现了大量与房屋建筑有关的遗迹。

大湖文化主要见于台湾南部，以高雄大湖遗址为代表，遗址多为贝丘遗址。陶器以夹砂灰、红陶为主，器形有盆、杯、钵、罐等，陶器多为素面，纹饰有刻划纹、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还有相当数量的彩陶和黑陶。骨角贝器比较发达。

卑南文化主要见于台湾东部的海岸山脉和花东纵谷南段的河旁阶地、海边阶地或山区的缓坡地，以台东的卑南遗址[㉚]为代表。卑南遗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是目前台湾地区所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个遗址，经过十多次发掘，是80年代抢救发掘中最为重要的发现，出土的文物比较丰富。石棺墓中出土有陶罐、壶、杯、纺轮等，此外还随葬数量较多的玉质装饰品和工具、武器，其中以玉玦数量最多，最富有特征。成年男女有拔牙的习俗。卑南遗址及其他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兴盛的玉器工业，构成了台湾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是以卑南文化为主导，并且很明显在当时仅有卑南遗址是此工业的中心地区。卑南出土的外缘带突起的玉玦，相似的器形在广东石峡和广西地区皆可见到，它们可能有一定的联系。有学者从卑南文化玉器制作技术的发展阶段和年代分析，认为其玉器来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很大[㉛]。

麒麟文化[㉜]又称“巨石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东部海岸山脉中段东面的山麓，与卑南文化并存，发现十多处遗址，仅在台东麒麟遗址进行过发掘。其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形以罐为主，另外还有钵、纺锤等，大都素面无纹。该文化最主要特色是在遗址中发现成群的经人工雕琢的大型巨石，如岩棺、岩壁、石像、石轮、石柱和中孔石盘等，据推测这些巨石可能和祭祀等礼仪有关。

另外还有发现在南部丘陵及山麓地带的“响林文化”，年代距今3000年前后。

4．铁器时代

也有人把这一阶段称为金属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距今2000～400年之间。古代台湾的金属器时代少见青铜器，铁器时代出现较晚，发展极不平衡。约在公元前后，相当于中原的汉王朝时期，台湾沿海地区大体进入以铁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期，在十三行遗址发现了铁渣，还发现了炼铁作坊遗迹和炼炉，但在东部地区和中央山区等地仍以石器为主。由于铁器的使用，使农业有更普遍的发展。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在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中部的番仔园文化、南部的茑松文化和东部地区的静埔文化等。台湾铁器时代最重要的发掘当属台北十三行遗址的发掘。

十三行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沿海和台北盆地，以台北县十三行遗址为代表。在花莲县普洛湾、崇德等遗址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可称为普洛湾类型。十三行文化的陶器

以红褐色夹砂罐、瓶、钵、盆等为主，饰有方格纹、斜方格纹、菱眼、圆圈、刺点和平行线等几何形花纹。石器不多，大多数生产工具和武器可能是铁制。此外，还出土大量的玛瑙、玻璃手镯、玻璃耳玦、玻璃珠及其他质料的珠子。墓葬流行侧身屈肢葬，头向西南。居民以农业为主，种植水稻，同时也兼营渔猎，同岛内和大陆有较为密切的交流。该文化可能和凯达格兰族有关。十三行遗址还出土了唐宋时期的铜碗、铜钱和瓷片，反映了与大陆的贸易往来。

番仔园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中部沿海一带，以台中县番仔园遗址为代表，遗址多为贝丘遗址。陶器以灰黑色罐、瓶、钵为主，饰方格纹、刺点纹、鱼骨纹、波浪状篦纹和曲折纹，石器以打制的石刀最多且富有特色。也已经使用了铁器。墓葬以俯身直肢为主，头向多东向，有的还将陶罐覆盖在死者的头部。捕鱼、采贝和狩猎是当时生活的主要来源。

大邱园文化主要分布在南投县浊水溪中游河谷一带，以南投田寮园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红褐色夹粗砂素面软陶为主，多为敛口罐形器，石器类型丰富，没有发现铁器。大邱园文化的内涵尚待进一步探索。

茑松文化主要分布在西南部，以台南茑松遗址为代表。遗址面积一般较大，大都有贝冢。陶器以夹砂红褐色素面陶为主，主要器形为罐和钵，还有少量甑，器表多抹光或施红色陶衣，石器非常少见，晚期的遗址基本不见。已经出现了铁器。

静埔文化主要分布在花东海岸一带，以花莲静埔遗址为代表，其他重要的遗址有白桑安、水琏、富南和小马洞穴上层等。陶器以红褐色的夹砂陶为主，主要器形有侈口罐、釜、钵、瓮、瓶、杯和碟等，大都素面无纹。石器只有少数的石锄、锛、杵等，缺乏有刃石器，应是被铁器取代的表现。从器物的形制和遗址的年代来看，该文化可能属于阿美人的遗存，也被称为“阿美文化”。

龟山一类遗存目前主要见于屏东一带，以龟山遗址为代表，另外在台东初鹿遗址也发现类似的陶片。除陶器、石、骨角器外，还有铁器和带釉硬陶。该遗存的陶器与其他同时期文化有明显的差异。

除了台湾岛以外，1983 年春至 1985 年夏台湾学者在澎湖列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试掘[34]。两年间调查了该群岛中的 32 座岛屿，发现遗址 91 处，其中属于史前时期的有 52 处，发掘了果叶 A、锁港、南港和赤崁头等 4 处遗址。果叶 A 是以粗砂绳纹陶为特征的短暂性聚落遗址，年代距今 4800～4600 年。在该遗址的贝冢中首次取得了大坌坑文化生活形态的最直接的证据。当时的居民主要以采集沿岸潮间带上贝类和鱼类为主，贝类以岩礁上的单壳贝为主，鱼类则主要是近海的珊瑚礁鱼类为主，当时可能也采集海边的藻类。澎湖列岛的粗绳纹陶文化遗存与广东沿海的绳纹陶文化遗存有明显的相似之处[35]。锁港、南港以细绳纹陶为特征，发现墓葬 4 座，其年代距今 4600 年左右。

赤崁头遗址以素面红陶为特征，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

二

澎湖地区在宋代隶属泉州晋江县，元代曾于此设立澎湖巡检司。在澎湖地区发现的历史时期的遗址和文物比较丰富，反映了与大陆的交往比较密切。目前考古学家在澎湖地区发现的历史时期的遗址有39处，其中3处经过科学发掘。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到唐末就有大陆居民在澎湖列岛开发的线索[36]，发现了当时的临时性短期聚落，可能当时来自大陆东南沿海的渔民把澎湖作为一个临时性的捕鱼基地或休憩之地。到了南宋时期开始有了大的定居聚落，当时以捕鱼、采贝、耕种等为生，与大陆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白沙岛发现的一处南宋时期的房基，以卵石和岩块铺造，长约15米，宽约5米，是目前在台湾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汉人建筑遗迹。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1975年以后，台湾学者在澎湖列岛采集、发掘的宋元陶瓷标本多达万件以上[37]，大致可分为青瓷、白瓷或青白瓷、黑釉瓷、陶质器皿和曾竹山陶瓶五大类。青瓷数量较多，主要为福建同安窑系产品，也有一部分出自浙江龙泉的窑口。白瓷、青白瓷主要出自福建的窑场，另有少量来自江西。黑釉瓷器皆为建窑系列的产品。泉州晋江磁灶曾竹山陶瓶的数量最多，残片达2015件，分布于所有澎湖宋元遗址，这种陶瓶细口、丰肩、修身、小足，从口唇到肩部施釉成一环，器表平坦，器内布满拉坯痕迹，可能是一种用以盛装水银的外销瓷[38]。另外也曾发现有景德镇民窑明末清初之际的产品[39]。澎湖列岛出土的陶瓷有一部分是住岛居民日常生活使用后的遗弃品，相当多的是经商贸易的物证，澎湖列岛介乎大陆与台湾岛之间，是早期中国对外航运的中心点。除陶瓷外，在澎湖地区还出土有"开元通宝"、"政和通宝"、"熙宁通宝"等铜钱。

近年来台湾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的重点又有新变化。由于台湾早期文献史料较少，使用考古学的方法、运用考古材料，对于荷据时期（1624～1684年）和后来明郑（1661～1684年）的聚落及其内涵进行考察，探索早期历史已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如史语所考古组在高雄的发掘，揭露出从明末到日据时期连续堆积的文化层和建筑遗迹[40]。从明代晚期开始有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汉族与高山族人民一起开发台湾。通过考古学对于当时聚落的考察，可以探讨清代社会发展模式等问题，希冀恢复一部拓殖移民社会的发展历史[41]。

三

50年来台湾考古学研究中的专题研究范围很广，而且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闽台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课题之一。1989年9月曾在福州召开闽台古代文化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闽台地区史前人类的关系[42]，大坌坑文化与富国墩、壳丘头一类遗存的关系[43]，闽台地区彩陶[44]和几何形印纹陶[45]的关系，闽台地区凹石[46]和石锛[47]的关系研究等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由大陆学者讨论较多，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相关问题的研究会更加深入下去。

从60年代开始，考古学的文化生态研究就在台湾地区起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张光直主持的“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计划”）[48]，该计划于1972年进行，延续了4年时间，为浊大流域的史前年代序列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首次将多学科的合作及生态研究的概念引入到考古学研究的领域。从8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对于史前经济活动[49]、史前海洋资源开发的研究[50]等。

民族考古学的研究一直是台湾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南岛语族起源和迁徙问题[51]的研究涉猎较多，已有的研究表明，大坌坑文化可能代表了已知最早的一部分原南岛语族，铁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可能就是现代台湾南岛语族的直接祖先。

近年来，台湾考古正朝“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以及技术国际化”[52]和“课题深入化和资料细微化”[53]的方向发展。就台湾而言，考古学上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在本地就可以解决的，还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54]，因此与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相结合，也是台湾考古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50年来台湾考古取得长足的发展，考古学资料展现的台湾史前文化的源头是我国华南大陆，同时其文化的许多重要文化特质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较强的一致性，但也表现出阶段性的滞后特点。考古调查和发掘证实，从唐宋至明清东南沿海居民逐渐移居台湾，与台湾的土著居民一起为共同开发宝岛台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本文主要参照臧振华《台湾考古》、《台湾考古综述》；知原主编《面向大地的求索——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附录1；王文建《九十年代的台湾考古学》（未刊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台湾省文物地图集专题组：《近十年台湾考古综述》，文物出版社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台湾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等文编成。

（执笔：晓　言）

注 释

①⑯ 鹿野忠雄：《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层》，《学海》1卷6号，1943年7月。

② 臧振华：《台湾考古》，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印行，1995年；《台湾考古综述》，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台湾与东南亚考古》讲义。

③ 李光周：《从垦丁的考古发掘说起》，《人类与文化》1978年11期。

④ 杨式昭：《澎湖海域古沉船发掘报告》，第七届中国海洋发展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年；黄永川：《关于澎湖海域古沉船——将军一号的初步发掘》，《中国民族学通讯》36：12～16页。

⑤ 刘益昌：《台湾的史前文化与遗址》，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6年。

⑥ 连照美：《台湾地区史前文化层序表》，基本承自80年代的认识，仅作细部调整，见《都兰遗址考古学研究报告》表二十五，《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专刊》，第二十二种，1996年；另有《考古学上台湾地区文化层序表》，在铁器时代单列出龟山文化，见《七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台湾——台湾铁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之表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53期，1998年。

⑦ 臧振华：《台湾考古文化年表》，与刘益昌拟定的序列较为接近，但增添了澎湖地区的序列，而且对文化的划分较为概括，见《台湾考古》之表七。

⑧ 李光周：《鹅銮鼻公园考古调查报告》，台北，1983年。

⑨ 宋文薰：《长滨文化》，中国民族学会出版，1969年，台北。

⑩ 戴国华：《简论长滨文化的年代》，《考古与文物》1990年2期。

⑪ 宋文薰：《由考古学看台湾》，《中国的台湾》，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台北。

⑫ 连照美：《台南县菜寮溪的人类化石》，《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44期，1981年。

⑬ 刘益昌：《史前时代台湾与华南关系初探》，《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三）》，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年。

⑭ 尤玉柱：《史前时期人类迁徙台湾诸问题的探讨》，《文物季刊》1996年4期。

⑮ 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文物》1989年6期。

⑰ 在卑南遗址发现大坌坑文化遗物，见连照美等：《卑南遗址发掘资料整理报告第三卷——遗址堆积层次及文化层出土遗物之分析研究》，1986年12月。

⑱ 黄士强：《台南县归仁乡八甲村遗址调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35、36期合刊，1970年。

⑲ 李匡悌：《浅淡台湾地区农业栽培的考古学研究》，《田野考古》3卷1期，1992年。

⑳ 安志敏：《闽台史前遗存试探》，《闽台古文化论文集》，《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㉑㉒㉖ 臧振华《试论台湾史前史上的三个重要问题》，《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45期，1989年。

㉓ 石璋如：《圆山贝冢之发掘与发现》，《大陆杂志》9卷2期。

㉔ 臧振华：《论台湾的细绳纹陶文化：兼论台湾史前文化来源问题研究的概念和方法》，《田野考古》1卷2期，1990年。

㉕ K. C. Chang, et al, Fa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73 (1969).

㉗ 黄士强等：《垦丁国家公园考古民族调查报告》，1987年5月。

㉘ 陈仲玉：《曲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二，1994年。

㉙ 石璋如、刘益昌：《大马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十二种，1987年。

㉚ 转引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台湾省文物地图集专题组：《近十年台湾考古综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㉛ 宋文薰、连照美：《卑南遗址第九—十次发掘工作报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专刊》，第八种，1987年；《卑南遗址第十一—十三次发掘工作报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专刊》，第十二种，1988年；连照美、宋文薰：《台东县卑南文化公园考古试掘报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专刊》，第十五种，1989年；连照美：《台大考古队卑南遗址抢救发掘始末》，《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45期，1989年。

㉜ 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东亚玉器》，1998年。

㉝ 宋文薰：《台湾东海岸の巨石文化》，《えとのす》6，1976年。

㉞ Tsang Cheng－hwa,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 95.

㉟ 臧振华著、林建红译：《台湾大坌坑文化的年代及其来源》，《南方文物》1997年2期。

㊱ 臧振华：《考古出土的台湾古史》，《文史知识》1990年4期。

㊲ 陈信雄：《澎湖宋元陶瓷》，澎湖县文化中心，1985年。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澎湖发现的宋元陶瓷专辑）63期。

㊳ 叶文程、罗立华：《澎湖发现的泉州曾竹山宋元陶瓶》，《闽台古文化论文集》，《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㊴ 刘良佑：《从澎湖出土之瓷器残片探讨其年代及起源诸问题》，《'89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

㊵ 臧振华、高友德、刘益昌：《高雄县左营凤山县旧城试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本4分，1993年。

㊶ 臧振华：《考古学与台湾史》，《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

㊷ 尤玉柱、张振标：《论史前闽台关系及文化遗址的埋藏规律》；陈国强、周立方：《闽台远古人类文化关系》，均见《闽台古文化论文集》，《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金家广：《论台湾远古先民的故乡华南》，《文物春秋》1996年1期；曾五岳：《论旧石器时代的漳台关系》，《南方文物》1996年3期。

㊸ 吴绵吉：《大坌坑文化与富国墩类型》；杨式挺：《试论闽台粤先秦考古学文化关系》，均见《闽台古文化论文集》，《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㊹ 林聿亮：《闽台彩陶略论》，《闽台古文化论文集》，《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吴春明：《粤闽台沿海的彩陶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㊺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第五章第二节《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文物出版社，1987年。

㊻ 郑辉：《闽台凹石初探》，《闽台古文化论文集》，《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㊼ 傅宪国：《闽粤港台地区石锛横剖面的初步考察》，《文物》1992年1期。

㊽ 张光直编：《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本，1977年。

㊾ 李匡悌：《鹅銮鼻公园地区史前渔捞活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1989年。

㊿ Tsang Cheng－hwa, Marine Exploitation in Prehistoric Taiwan. Pre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chaeology and the Museum. Taiwan Museum, Taipei, 1995.

51 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1期；安志敏：《闽台史前

遗存试探》，《闽台古文化论文集》，《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⑫ 张光直：《台湾考古向何处去》，《田野考古》3卷1期，1992年。

⑬ 《田野考古》编辑委员会：《“台湾考古学何处去”座谈会记录》，《田野考古》3卷2期，1992年。

⑭ 知原主编：《面向人地的求索——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1999年。